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任：李铁映

主任：王忍之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齐世荣 朱庭光 金冲及 阎明复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慎明 郭永才

副主任：何秉孟（常务） 沈志华

郑异凡 李正乐 谢寿光

执行总主编：沈志华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明*	于沛	王正	石泽
叶军	叶书宗*	刘逖	刘仲亨*
邢广程	孙凌齐*	沈志华*	吴伟*
杨存堂*	杨建国	金雁	郑异凡*
张盛发*	赵国顺*	闻一	姚海*
徐天新*	薛衔天	戴隆斌*	

秘书：方琼

编务：罗淑娴 闻静 胡甫强 宗静

注：\*为分卷主编。

- 本课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
- 本《选编》为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 本课题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 本《选编》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 省、部、军级党政领导干部，宣传理论部门及外事部门局级以上干部；
- 从事苏联东欧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或教学的具有正高以上职称的人员；
-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社会科学院及党校图书馆。

##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sup>①</sup>。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年12月

## 体 例 说 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 34 卷(包括总目录卷 1 卷),收入自 80 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 10000 余件,文献上限为 1917 年初,下限至 90 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 本卷前言

本卷选入的档案文献内容比较丰富，共分为 11 个专题，主要反映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

“苏联与安哥拉独立运动”（1973 年 12 月至 1979 年 2 月）：该专题收入的 10 份文件，包括苏共中央的会议记录，苏联使馆的报告，苏联领导人与有关国家和组织领导人的谈话记录等等，反映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安哥拉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过程中，以及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方针和决策等。

“对外军事援助和情报工作”（1974 年 4 月至 1980 年 9 月）：收入该专题的档案文献，在内容上比较分散，其中包括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支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恐怖活动的报告，关于将来自越南的美制轻武器转给他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的报告，以及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活动的情报通告；苏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向保加利亚派遣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和提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驻民主德国代办处工作人员薪金的决定。这些文件，大体上从一些侧面反映了 70 年代后期苏联对国外共产党国家和革命组织的军事援助情况，以及对敌对国家有关情报的反应。

“苏联对埃索冲突的斡旋”（1977 年 1 月至 1978 年 8 月）：该专题收入的 34 份文件，包括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期间，苏联领导人与双方会谈的记录和往来函电，以及苏联外交部门的有关报告等，反映了苏联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两国



之间进行斡旋的情况。

“勃列日涅夫后期的苏美关系”（1977年2月至1980年10月）：该专题选编是涉及1977年至1980年间苏联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分析及苏联所采取的对策和措施的档案文献，其内容涉及到中、近东问题，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苏联的“人权”和“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在欧洲部署新型导弹问题，以及苏联对中美缓和的反应等等。

“苏联与尼加拉瓜的关系”（1978年2月至1980年9月）：该专题收入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与尼加拉瓜关系的14份文件，包括苏联党和政府的决议，苏联使馆的报告，苏联领导人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等有关方面的会谈记录等。

“苏军出兵阿富汗（二）”（1978年5月至1980年11月）：有关苏军入侵阿富汗的档案文献，本书第32卷已经单独成立专题，作为补充，本专题又收入了16份文件，其中包括苏联驻阿富汗使馆的外交活动，苏联领导人与阿富汗有关人士的会谈记录，苏共中央的会议记录等等，主要反映的是入侵前期苏联策划和准备的情况。

“苏联与古巴的关系”（1979年2月至1981年12月）：该专题选编的是此期苏联与古巴之间外交接触，以及有关美古关系情报的文件，共29份。

“苏联与80年代初的波兰局势（二）”（1980年9月至1984年4月）：该专题选编的是此期涉及苏波关系的档案文献，本专题文件共25份，包括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局势及对团结工会政策的会议讨论记录。及与波兰党政领导人的谈话和谈判记录等。

“关于改进劳动组织和加强劳动纪律的决定”（1980年10月）：该专题收入的两份档案文件反映的是80年代初苏联国营企业中劳动组织和生产条件状况，职工的不满情绪，以及苏共中央关于改进

劳动组织工作的决定。

“苏联的生态环境问题”（1989年12月至1991年8月）：该专题收入的4份文件反映了80年代末苏联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作为附录，还收入了关于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一份材料。

“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1991年2~7月）：该专题收入的3份档案文献，是1991年华沙条约组织缔约国有关解散该组织的声明和议定书。作为附录，收入了截止到1988年华沙条约组织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力量对比及苏联战略武器装备的资料。

叶书宗

2001年6月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出版人：谢曙光

编审人：刘仲亨 陆象淦

发行人：胡鹏光 王菲

编辑主任：程晓燕 许春山

编辑：章若男 陈云卿 徐文渊 周绍珩

封面设计：孙元明

内文设计：范 迎

责任印制：盖永东

编 务：宗 静

# 目 录

本卷前言 ..... 33 - 1

## 苏联与安哥拉独立运动

(1973年12月至1979年2月)

专题说明 ..... 33 - 1

№11834 库拉科夫关于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3年12月21日) ..... 33 - 2

№11835 乌里扬诺夫斯基关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层状况的报告 (1974年1月7日) ..... 33 - 5

№06169 苏共中央书记处给苏驻赞比亚大使的电报 (1974年1月10日) ..... 33 - 7

№06162 安德罗波夫关于秘密移交武器给勃列日涅夫的报告 (1975年5月16日) ..... 33 - 9

№11836 阿法纳欣科同阿戈斯蒂纽·内图的谈话纪要 (1975年7月4日) ..... 33 - 10

№06160 兹韦列夫关于安哥拉形势给国内的政治信函 (1976年3月1日) ..... 33 - 14

- №06157** 沃罗比约夫同阿·内图的谈话纪要  
(1976年9月4日) ..... 33-24
- №06092** 洛比诺夫同卢武阿卢的谈话纪要  
(1978年6月27日) ..... 33-26
- №06094** 洛比诺夫同卢武阿卢的谈话纪要  
(1978年8月4日) ..... 33-30
- №06170** 伊利乔夫同保罗·若热的谈话纪要  
(1979年2月9日) ..... 33-35

### 对外军事援助和情报工作

(1974年4月至1980年9月)

- 专题说明** ..... 33-43
- №06145**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支援巴解组织恐怖活动致勃列日涅夫报告(1974年4月23日) ..... 33-44
- №06162**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研制和使用精密战术武器的后果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5年12月14日) ..... 33-46
- №06161**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从越南转拨美制轻武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5年12月31日) ..... 33-48
- №11837** 乌斯季诺夫关于保请求派遣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6年5月7日) ..... 33-50
- №11838** 萨温金关于执行驻保总司令代表助理职务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6年5月17日) ..... 33-53
- №11839**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执行驻保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职务的决议(1976年5月26日) ..... 33-54

- №06159**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同意派遣驻保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的命令 (1976年5月27日) ..... 33-56
- №06158**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西方特工机关对经互会刺探意向的汇报 (1977年9月3日) ..... 33-57
- №11840** 德鲁戈夫关于提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驻东德人员外汇薪金的报告 (1980年9月15日) ..... 33-59
- №06103**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提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驻东德人员外汇薪金的决定 (1980年9月17日) ..... 33-61

### 苏联对埃索冲突的斡旋

(1977年1月至1978年8月)

- 专题说明** ..... 33-63
- №06156** 西尼岑同英国驻埃塞俄比亚参赞巴尔特罗普谈话纪要 (1977年1月28日) ..... 33-65
- №06154** 西尼岑同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参赞马林的谈话纪要 (1977年2月2日) ..... 33-68
- №06014** 拉塔诺夫同古巴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诺沃阿的谈话纪要 (1977年2月10日) ..... 33-73
- №06152** 阿勃拉西莫夫关于民主德国党代表团访问索马里致波诺马廖夫的报告 (1977年2月18日) ..... 33-74
- №06151** 萨姆索诺夫同索马里总统西阿德谈话纪要 (1977年2月23日) ..... 33-77
- №06150** 苏驻索马里大使馆关于索马里革命的报告 (1977年3月11日) ..... 33-81

- №06120** 西尼岑与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巴依耶的谈话纪要  
(1977年3月18日) ..... 33-92
- №06104** 西尼岑与美国驻埃塞俄比亚政务参赞马林的谈话  
纪要(1977年5月9日) ..... 33-96
- №06084** 外交部关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领土争端及苏联立  
场的简要报告(不早于1977年5月19日) ..... 33-98
- №06155** 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的领土争端和苏联的立场  
(简介)(不早于1977年5月19日) ..... 33-105
- №06085** 苏联外交部非洲司整理的苏联与索马里关系的报  
告(1977年5月24日) ..... 33-110
- №06119** 拉塔诺夫同门格斯图的谈话纪要  
(1977年6月29日) ..... 33-115
- №06106** 拉塔诺夫与门格斯图的谈话纪要  
(1977年7月29日) ..... 33-117
- №06016** 拉塔诺夫同古巴军事专家组长阿纳尔多·奥乔亚的  
谈话纪要(1977年7月17日) ..... 33-120
- №06086**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局势向  
非洲国家呼吁的决定(1977年8月4日) ..... 33-125
- №06105**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致非洲进步国家领导人  
信的记录(摘录)(1977年8月4日) ..... 33-126
- №06108** 拉塔诺夫与门格斯图的谈话纪要  
(1977年8月5日) ..... 33-127
- №06109** 拉塔诺夫与门格斯图的谈话纪要  
(1977年8月7日) ..... 33-129
- №06107**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交给苏联的谈判备忘录  
(1977年8月11日) ..... 33-131

- №05910**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支援埃塞俄比亚的记录  
(摘录)(1977年8月11日) ..... 33-134
- №06087** 伊利乔夫同卡西姆的会谈记录  
(1977年8月11日) ..... 33-135
- №06088** 伊利乔夫与卡西姆第二阶段的会谈记录  
(不晚于1977年8月13日) ..... 33-155
- №06089** 伊利乔夫与卡西姆第三阶段的会谈记录  
(不晚于1977年8月19日) ..... 33-175
- №06110** 拉塔诺夫同古巴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诺沃阿的会谈  
纪要(1977年8月23日) ..... 33-190
- №06111** 拉塔诺夫同美国驻埃塞俄比亚临时代办廷金的谈  
话纪要(1977年9月3日) ..... 33-192
- №06090** 拉塔诺夫与非洲统一组织总书记姆布穆阿的会谈  
记录(1977年9月2日) ..... 33-195
- №06118** 拉塔诺夫同门格斯图的谈话纪要  
(1977年9月5日) ..... 33-198
- №06112** 门格斯图召见苏联等国大使的谈话纪要  
(1977年9月10日) ..... 33-201
- №06114** 拉塔诺夫同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格德勒-基奥基  
斯的谈话纪要(1977年9月14日) ..... 33-203
- №06113** 拉塔诺夫同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常务秘书达乌伊特  
的谈话纪要(1977年9月17日) ..... 33-206
- №06115** 外交部第三非洲司关于苏-埃关系的资料  
(1978年2月7日) ..... 33-211
- №06091**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继续调节索-埃冲突的会议  
记录(1978年3月9日) ..... 33-218



- №06116 外交部第三非洲司关于索—埃冲突的资料  
(1978年3月31日) ..... 33—219
- №06117 苏驻埃大使馆关于埃塞俄比亚同西方国家关系的  
资料(1978年8月12日) ..... 33—226

### 勃列日涅夫后期的苏美关系

(1977年2月至1980年10月)

- 专题说明..... 33—232
- №06153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同美国会谈“人权”问题的  
决定(1977年2月18日) ..... 33—233
- №11841 安德罗波夫关于抵消美国人权宣传作用的措施给  
苏共中央的报告(1977年3月21日) ..... 33—237
- №06149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对付美国“人权”宣传措施  
的决定(1977年3月24日) ..... 33—240
- №06015 葛罗米柯就限制战略武器和近东问题同万斯的谈  
话记录(1977年3月28日) ..... 33—241
- №06125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权问题给苏驻外人员指示  
的决定(1977年5月19日) ..... 33—244
- №06136 安德罗波夫关于美国情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7年10月29日) ..... 33—256
- №06126 安德罗波夫关于“独立工会”问题致苏共中央的  
报告(1978年4月5日) ..... 33—259
- №11842 科尔尼延科关于通报与万斯会谈情况给苏共中央  
的报告(1978年4月25日) ..... 33—260
- №06135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同万斯会谈总结的会议记录  
(1978年4月27日) ..... 33—261

- №06171**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国际形势估计的会议记录  
(1978年6月8日) ..... 33-263
- №06133** 葛罗米柯同万斯就中东问题的会谈记录  
(1978年7月12日) ..... 33-268
- №06129** 加列诺维奇就有关戴维营会谈同埃及代表的谈话  
给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报告  
(1978年10月10日) ..... 33-279
- №06144** 安德罗波夫关于美国情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9年2月15日) ..... 33-282
- №06147** 苏共中央关于保障维也纳高级会晤的宣传措施  
(1979年5月29日) ..... 33-284
- №06139**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侵略  
行径的会议记录(1980年3月13日) ..... 33-286
- №06028**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在西欧生产和部署美式  
新型导弹补充措施给政治局的报告  
(不晚于1980年4月15日) ..... 33-290
- №06097**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美中军事合作的会议记  
录(1980年10月2日) ..... 33-292

## 苏联与尼加拉瓜的关系

(1978年2月至1980年9月)

- 专题说明**..... 33-298
- №06017** 费佳宁同瓜达穆斯的谈话纪要  
(1978年2月23日) ..... 33-299
- №11843** 叶甫谢耶夫同奥尔捷加的谈话纪要  
(1978年4月27日) ..... 33-302

- №11844** 费奥多罗夫为组团参加声援尼加拉瓜国际会议给  
苏共中央的报告（1979年6月26日） ..... 33-305
- №11845** 布鲁坚茨关于同意组团参加尼加拉瓜国际会议给  
苏共中央的报告（1979年7月2日） ..... 33-309
- №06146** 苏共中央关于同意组团参加声援尼加拉瓜人民斗  
争国际会议的决议（1979年7月5日） ..... 33-319
- №06100** 马纳索夫同路易斯·莫杰斯托的谈话纪要  
（1979年12月14日） ..... 33-321
- №11846** 季马科夫同海麦·乌伊洛克的谈话纪要  
（1980年1月11日） ..... 33-323
- №06131** 苏共中央关于无偿援助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决  
定（1980年3月13日） ..... 33-325
- №06124** 勃鲁捷茨和斯莫尔斯基关于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  
线联系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0年3月14日） ..... 33-328
- №06096** 苏共中央关于苏共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联系计  
划的决议（1980年3月17日） ..... 33-332
- №11847** 科瓦廖列夫关于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联系计划  
文本致苏共中央办公厅的报告  
（1980年4月18日） ..... 33-336
- №11848**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援助尼加拉瓜开展扫盲运动  
的决议（1980年5月20日） ..... 33-337
- №11849**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意对尼加拉瓜宣传措施的  
决议（1980年5月29日） ..... 33-339
- №06031** 切加耶夫同奥尔捷加关于尼加拉瓜问题的谈话纪  
要（1980年9月25日） ..... 33-343

## 苏军出兵阿富汗 (二)

(1978年5月至1980年11月)

- 专题说明**..... 33 - 346
- №06128** 普扎诺夫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驻阿富汗大使的谈话纪要 (1978年5月6日) ..... 33 - 348
- №06122** 普扎诺夫同驻阿富汗巴基斯坦大使阿尔沙德和伊朗大使达乌基的谈话纪要 (1978年5月9日) ..... 33 - 350
- №06123** 普扎诺夫民主德国访阿代表团谈话纪要 (1978年5月20日) ..... 33 - 352
- №06137** 舒米洛夫同美国驻苏大使馆一秘汤姆逊的谈话纪要 (1978年5月25日) ..... 33 - 354
- №06093** 加夫里洛夫同英国驻苏大使馆一秘斯季韦·贝恩德的谈话纪要 (1978年7月19日) ..... 33 - 356
- №11850** 舒米洛夫同美国驻苏大使馆一秘汤姆逊的谈话纪要 (1978年8月16日) ..... 33 - 358
- №06163** 博尔德列夫同努瓦维尔及其副手戴-博韦的谈话纪要 (1979年6月19日) ..... 33 - 360
- №06127** 苏驻阿富汗使馆关于阿富汗政治形势信函的摘要报告 (不早于1979年6月27日) ..... 33 - 362
- №06101** 博尔德列夫同久蓬的谈话纪要 (1979年8月9日) ..... 33 - 365
- №06038** 苏联驻古巴大使沃罗特尼科夫同霍赫扎特的谈话纪要 (1979年9月24日) ..... 33 - 367

- №06095** 科瓦廖夫同维克谈话纪要  
(1980年1月4日) ..... 33-368
- №06138** 科尔尼延科同约特逊的谈话纪要  
(1980年2月24日) ..... 33-375
- №11851** 科尔尼延科同约特逊的谈话纪要  
(1980年2月24日) ..... 33-378
- №06102** 苏共中央宣传部整理的关于反阿富汗敌对宣传的  
资料(1980年6月22日) ..... 33-380
- №06121** 科尔尼延科同弗罗曼-麦里斯的谈话纪要  
(1980年7月11日) ..... 33-392
- №06142** 舒米洛夫同阿布尔·法兹尔的谈话纪要  
(1980年11月4日) ..... 33-397

## 苏联与古巴的关系

(1979年2月至1981年12月)

- 专题说明**..... 33-399
- №06023** 沃罗特尼科夫同罗德里格斯的谈话纪要  
(1979年2月12日) ..... 33-400
- №06040** 苏驻古巴大使馆关于美国和古巴关系给国内的报  
告(不早于1979年4月) ..... 33-403
- №06018** 马纳索夫同李善义的谈话纪要  
(1979年4月10日) ..... 33-409
- №06148** 马纳索夫同塞·盖拉·伊达尔戈的谈话纪要  
(1979年4月14日) ..... 33-412

- №06019** 马纳索夫同伊·马尔米耶尔卡·佩奥利的谈话纪要  
(1979年4月24日) ..... 33-414
- №06020** 苏驻古巴大使馆关于古美关系致国内的情报函  
(1979年4月26日) ..... 33-416
- №06021** 马纳索夫同劳·瓦·维沃的谈话纪要  
(1979年5月7日) ..... 33-426
- №06022** 沃罗特尼科夫同莱因的谈话纪要  
(1979年6月12日) ..... 33-429
- №06024** 沃罗特尼科夫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谈话纪要  
(1979年6月25日) ..... 33-432
- №06025** 沃罗特尼科夫同劳尔·卡斯特罗的谈话纪要  
(1979年9月1日) ..... 33-434
- №06039**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古巴问题的会议记录(摘录)  
(不早于1979年10月11日) ..... 33-438
- №06026** 谢列茨基同安东尼奥·阿尔别苏的谈话纪要  
(1979年12月27日) ..... 33-440
- №06027** 苏驻古巴大使馆就古-美教育、科学和文化关系  
给国内的汇报(1980年2月22日) ..... 33-444
- №06029** 苏驻古巴大使馆就古巴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态  
度致国内的政治信(1980年7月4日) ..... 33-448
- №06031** 哥恰连科同马尔季涅斯的谈话纪要  
(1980年9月5日) ..... 33-451
- №06030** 谢列茨基同季普顿的谈话纪要  
(1980年9月24日) ..... 33-453
- №11852** 奥罗佩萨关于格林纳达革命需要援助致沃罗特尼  
科夫的信(1980年10月7日) ..... 33-455

- №11854** 列别杰夫转呈格林纳达求援信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0年11月26日) ..... 33-457
- №11853** 扎格拉金关于关于古巴要求派苏专家去格林纳达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0年12月1日) ..... 33-459
- №06032** 苏共中央关于同意古巴和格林纳达政府要求的决  
定(1980年12月5日) ..... 33-461
- №06033**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专家帮助安装电台的命令  
(1980年12月8日) ..... 33-463
- №11855** 奥加尔科夫关于出使古巴军事代表团人员致苏共  
中央的报告(1981年1月22日) ..... 33-464
- №11856** 索科洛夫关于出使古巴军事代表团人员致苏共中  
央的报告(1981年1月24日) ..... 33-466
- №11857** 萨温金关于国防部专家组出使古巴致苏共中央的  
报告(1981年1月30日) ..... 33-467
- №11858** 奥加尔科夫关于出使古巴军事代表团人员致苏共  
中央的报告(1981年2月3日) ..... 33-486
- №06034**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防部专家组出使古巴的决  
定(1981年2月5日) ..... 33-487
- №06035** 鲍里索夫关于古美关系的报告  
(1981年9月14日) ..... 33-488
- №06036** 切尔内什与蒂普敦的谈话纪要  
(1981年9月21日) ..... 33-492
- №06037** 沃罗特尼科夫就罗德里格斯与黑格的谈话致苏共  
中央的报告(1981年12月7日) ..... 33-495

## 苏联与 80 年代初的波兰局势 (二)

(1980 年 9 月至 1984 年 4 月)

- 专题说明**..... 33 - 521
- №06134** 瓦赫拉麦耶夫关于波兰局势给国内的报告  
(1980 年 9 月 15 日) ..... 33 - 523
- №06041**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同波兰党政代表团会谈  
的会议记录 (1980 年 10 月 29 日) ..... 33 - 539
- №11859** 罗曼诺夫关于整顿波兰出版物在苏联发行问题给  
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0 年 10 月 30 日) ..... 33 - 546
- №06143**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的会议记录  
(1980 年 10 月 31 日) ..... 33 - 549
- №06141** 泽列诺夫关于反对派在格但斯克海岸的活动给国  
内的汇报 (不早于 1980 年 11 月 20 日) ..... 33 - 553
- №11860** 苏共中央关于为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中央机关  
增加编制的决议 (1980 年 12 月 2 日) ..... 33 - 559
- №11861** 扎米亚京等关于采取补充措施监督波兰出版物发  
行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0 年 12 月 5 日) ..... 33 - 560
- №05994**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的会议记录  
(1980 年 12 月 11 日) ..... 33 - 562
- №06099** 苏共中央关于限制订阅波兰报刊的决议  
(1980 年 12 月 22 日) ..... 33 - 565
- №06042**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的会议记录  
(1981 年 1 月 22 日) ..... 33 - 570



- №11862** 罗曼诺夫关于检查波兰出版物情况总结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1年3月19日) ..... 33-576
- №06043**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报告与波兰代表会谈结果的会议记录 (1981年3月26日) ..... 33-583
- №06044**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的会议记录 (1981年4月2日) ..... 33-586
- №06045**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与波兰代表团会晤情况总结的会议记录 (1981年4月9日) ..... 33-594
- №06046**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与卡尼亚电话交谈情况的会议记录 (1981年4月16日) ..... 33-603
- №06047**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共与波兰统一工人党会谈情况的会议记录 (1981年4月30日) ..... 33-607
- №06048**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与卡尼亚谈话情况的会议记录 (1981年6月18日) ..... 33-612
- №11864** 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等部门关于完善物质技术基础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1年8月3日) ..... 33-618
- №11863** 佳热利尼科夫关于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等部门通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1年8月14日) ..... 33-620
- №06049**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的会议记录 (1981年9月10日) ..... 33-622
- №06050**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给雅鲁泽尔斯基口信的会议记录 (1981年11月21日) ..... 33-626
- №06051**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的会议记录 (1981年12月10日) ..... 33-632

- No06054** 苏共中央关于向兄弟党和国家领导人通报波兰问题的决议 (1981年12月13日) ..... 33-643
- No06052**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同奇莱克会谈总结的会议记录 (1982年1月14日) ..... 33-645
- No06053**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与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总结的会议 (1984年4月26日) ..... 33-652

### 关于改进劳动组织和加强劳动纪律的决定

(1980年10月)

- 专题说明**..... 33-660
- No06140**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改进劳动组织工作的决定 (1980年10月15日) ..... 33-661
- No06098** 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劳动组织和劳动纪律工作的指示 (1980年10月24日) ..... 33-666

### 苏联的生态环境问题

(1989年12月至1991年8月)

- 专题说明**..... 33-668
- No03712** 关于苏联全国生态环境的报告 (摘录) (1989年12月) ..... 33-669
- No03713**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基洛夫格勒市保护生态环境倡议小组致科尔巴科夫的公开信 (1990年1月18日) ..... 33-674

- №03714** 苏联关于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计划及  
远景目标 (摘录)  
(1990年12月) ..... 33-677
- №03718** 纳扎尔巴耶夫关于关闭哈萨克核试验场的总统令  
(1991年8月29日) ..... 33-682
- №03720** 列加索夫院士谈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 (摘录)  
(1988年5月20日) ..... 33-684

### 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

(1991年2~7月)

- 专题说明** ..... 33-691
- №03715** 华沙条约缔约国布达佩斯声明  
(1991年2月25日) ..... 33-693
- №03716** 关于废除华沙条约的议定书  
(1991年7月1日) ..... 33-695
- №03717** 《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布达佩斯声明  
(1991年7月2日) ..... 33-697

## 【专题说明】

# 苏联与安哥拉独立运动

(1973年12月至1979年2月)

西南非洲的安哥拉，面临大西洋，1884年正式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1961年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1975年11月11日正式宣告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领导安哥拉争取独立武装斗争的有两个组织：以阿·内图为领导人的“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以霍尔敦·罗伯托为领导人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由于部族的不同和纷争，又出现了以希潘达为首的乌姆崩杜族势力与内图之间的矛盾。在争取独立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以赞比亚为依托，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苏联也趁此楔入西南非洲，扩大在西南非洲的势力和影响。1975年11月安哥拉正式建国时，内图成为共和国总统，苏联把这看做是它的对外政策的重大胜利之一。

本专题文件共10份，反映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安哥拉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过程中，以及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方针和决策等。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许洪声、张寰海翻译)

No 11834

## 库拉科夫关于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

### 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3 年 12 月 21 日)

绝密

苏共中央

关于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势

最近一个时期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人员减少。苏联援助和支持的主要战斗政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正在经历严重的危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内图及其周围的人在建立领导机关时忽视部族问题，对政治教育工作估计不足以及一长制领导方法，导致部族矛盾尖锐化和党内分裂。形势加剧是因为葡萄牙人派出自己的间谍企图挑起并加剧矛盾，旨在从内部破坏运动。

内图不是分析危机的原因，而是企图以武力镇压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对于那些在苏联受过训练，本来可以给他以必要帮助的干部，内图总是怀疑他们，把他们看做苏联影响的传播者。

内图在今年初宣布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有阴谋，随后从自己的对手中枪毙了 5 名最积极分子。被认为是领导层中的第二号人物希潘达被指责同阴谋有关，撤消了他的一切职务。仅仅由于赞比亚当局的干预，才未让内图对他进行肉体摧残。

今年 8 月份受在安哥拉一部分部队支持的赞比亚境内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几个主要营地的战士起义了。起义者与希潘达建立了

联系并要求召开地区性会议选举新领导人。内图拒绝满足该要求，并停止向起义者提供给养。结果在安哥拉的作战行动停止了。许多战士被迫回到赞比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战斗部队人数从5000人减少到3000人。葡萄牙人重新控制了一些解放区，并使将部分讨伐力量从安哥拉调往几内亚（比绍）成为可能。

由于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和赞比亚当局的坚持，11月份成立了由内图和希潘达拥护者参加的调解委员会。但是迄今他们尚未取得积极成果。内图千方百计拖延委员会的工作，顽固地坚持不同意满足起义者关于选举新领导人的要求。他想利用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援助依旧归他支配的条件，用饥饿封锁的方式摧毁他们的抵抗意志。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分裂为另一个安哥拉民族主义组织——“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该组织以扎伊尔为基地，以霍尔敦·罗伯托为首的领导人坚持亲西方的方针。

1972年12月，内图在非洲统一组织的调解下同霍尔敦·罗伯托签署了关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联合协议，同时强调要逐步解散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利用扎伊尔领土在安哥拉北部开展斗争。实际上，该协议只给霍尔敦的组织带来了好处。被任命为最高联合政治委员会主席的霍尔敦，现在以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首脑出现。来自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和一系列非洲国家对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援助也恢复了。

在蒙博托总统的支持下，在扎伊尔建立了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战斗部队，该阵线的外交活动积极开展起来。现在霍尔敦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近期他打算访问罗马尼亚。对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来说该协议暂时一无所获。内图派往金沙萨的代表被扎伊尔当局逮捕。蒙博托总统不容许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战士和武器自由通过扎伊尔国境。

这样一来无论从赞比亚领土上，还是从扎伊尔领土上，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现在实际上均未进行战斗行动。

我们认为，为了加强苏联在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立场和积极开展解放斗争，最好采取如下措施：

1. 委托苏联驻赞比亚和刚果人民共和国大使向内图和希潘达阐明我们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目前形势的关切，提请他们注意尽快采取措施克服危机并恢复解放斗争的必要性；提醒他们，苏联给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援助取决于斗争的进展状况。

2. 如果邀请蒙博托总统访问苏联的决定能够通过，就将同他讨论有关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在安哥拉的联合斗争的前景问题，首先要研究在适当时机我们同霍尔敦·罗伯托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建立接触的问题。

B. 库拉科夫（签字）

1973年12月21日

№11835

## 乌里扬诺夫斯基关于安哥拉人民解放 运动领导层状况的报告

(1974年1月7日)

绝密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正在经历一场由争夺领导权斗争和部族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严重危机。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着主要在东部战线从赞比亚领土上出发开展的安哥拉民族解放武装斗争。前线战士基本上由乌姆崩杜部族人组成。但是在党的领导人中丹尼尔·希潘达是该部族惟一的代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要求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按部族代表比例分配的领导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阿戈斯蒂纽·内图指责希潘达和乌姆崩杜族积极分子背叛，并把他们开除出党。

内图的行动引起了支持希潘达的前线战士的强烈不满。为了压制不满，内图停止向前线供给弹药，军事行动实际上也停止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危机极大地削弱了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当局以及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都主张通过妥协恢复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统一。内图与希潘达之间的斗争在继续并且达到尖锐的程度。

考虑到目前的局势，苏共中央国际部认为有必要委托苏联驻赞比亚大使会见内图、希潘达及其拥护者，表达我们对安哥拉人民解



放运动领导层内部矛盾和安哥拉解放运动状况的关切心情，同时弄清他们对恢复统一和进一步发展民族解放斗争问题的态度。现附上苏共中央决议草案<sup>①</sup>。

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 P. 乌里扬诺夫斯基（签字）

1974年1月7日

---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决议草案。

№06169

## 苏共中央书记处给苏驻赞比亚大使的电报

(1974年1月10日)

绝密

卢萨卡

苏联大使

请您拜会阿·内图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单独同瓦·希潘达及其拥护者），受上级委托向他们转达说，对因党内领导人的分歧而形成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形势表示严重不安。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层内缺乏团结，这大大地削弱了民族解放力量，并使葡萄牙人有可能转入进攻，消灭安哥拉爱国者所取得的军事和政治成果。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武装部队被迫交给敌人一些早已解放的同赞比亚交界的地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的矛盾破坏了非洲葡萄牙殖民地所有民族解放力量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统一战线。葡萄牙军事指挥部正在把一部分军队从安哥拉调往几内亚（比绍）。

苏联一贯把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看做是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主导力量，并给予该党以很大的军事的、政治的及其他物质援助。苏共中央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层内的事态及安哥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状况极为关切。当前最重要的是决不容许加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的分裂和党内斗争，恢复党的团结并且不给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最终破坏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以可乘之机。

请告诉他们，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关于给予 1979 年度军事及其他物质援助的请求已满足。给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物资现已运抵刚果人民共和国和坦桑尼亚。但是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继续不断的分歧给苏联各组织对该党的援助造成困难。

还要告诉他们，莫斯科想弄清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希潘达及其拥护者）对于恢复党内团结及进一步发展民族解放斗争问题的态度。

请汇报完成情况。

(签名)<sup>①</sup>

---

① 此处有两人签名，但字迹不清。

№06162

**安德罗波夫关于秘密移交武器  
给勃列日涅夫的报告**

(1975年5月16日)

特殊重要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75年5月16日  
№1218 - A 06  
莫斯科市

致勃列日涅夫同志

根据苏共中央决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75年5月14日将一批外国武器和弹药（自动步枪53支，手枪50支，其中包括10支无声手枪，子弹3.4万发）转交给克格勃秘密谍报人员——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外事部领导人B.哈达德。

武器的秘密移交是在亚丁湾<sup>①</sup>中立水域夜间以不接触方式，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利用苏联海军侦察艇进行的。

外国人中只有哈达德知道指定的武器是我们移交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签字）

---

① 亚丁湾，阿拉伯海西端的一个海湾，介于阿拉伯半岛与非洲之间，主要港口有亚丁、吉布提和柏培拉。

№ 11836

## 阿法纳欣科同阿戈斯蒂纽·内图的谈话纪要

(1975 年 7 月 4 日)

摘自阿法纳欣科日记

机密

在大使馆接见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阿戈斯蒂纽·内图。向他通报说，苏共中央正在注视安哥拉局势的发展。苏联人民关心安哥拉民主力量的胜利。仅在 1975 年就已给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以相当多的援助。受苏共中央的委托我们同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 M. 恩古瓦比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讨论了给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援助的问题。

阿·内图感谢苏共中央所给予的援助。他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近来扩大了同非洲各国政府的接触。在这些会晤过程中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希望在非洲增加拥护自己的人数。最近的一项任务就是不容许在即将在坎培拉（乌干达）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上讨论卡宾达问题。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对于同蒙博托密切合作的 H. 阿明今年将成为非洲统一组织席一事表示担心。内图说，我们担心乌干达总统将建议非洲统一组织理事会讨论卡宾达问题。内图说，正因如此我们在尼日利亚，现在又在刚果同恩古瓦比总统、刚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洛佩斯、党中央委员奥巴马-伊图、外交部长加纳奥举行了会谈。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刚果劳动党之间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刚果劳动党之间就非洲和安哥拉制定统一政策和采用共同措施进行定期协商达成协议。为了加强我们的宣传工作，在国内广播电台投入使用之前，先恢复布拉柴维尔电台的“战斗的安哥拉”广播。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通知说，同刚果劳动党谈判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卡宾达问题。刚果人民共和国决定在非洲统一组织理事会上不支持今年2月刚果和扎伊尔提出的关于卡宾达自治的要求。鉴于自己在卡宾达问题立场的变化，刚果人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代表团保证说，他们将停止援助卡宾达民族主义组织“弗赖克”。因为双方已就卡宾达问题达成协议，刚果人民共和国允许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利用自己的领土过境运送苏联及其他友好国家给该组织提供的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与此同时，刚果人批准了关于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关闭同卡宾达的陆路边界。为了运送给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物资到安哥拉，特划拨黑角的港口和机场。过境物资应该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通过海上或空中实现。阿·内图对同刚果人的谈判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他强调说，刚果拒绝支持卡宾达自治的要求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与刚果劳动党关系正常化是重要步骤。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接着评述了安哥拉国内形势。他指出，国内三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存在为国内反动势力活动创造了良好局面，使政治、社会、经济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内图特别指出目前活动的两伙反对安哥拉的反动派。第一伙，他特指国内的葡萄牙反动派。他们加剧国内紧张局势，挑动大批白人迁离安哥拉。大量技术专家出境已经给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损失。白人反动派受到安哥拉当今上层官员和绝大部分葡萄牙军官的保护。第二伙反动势力就是国外的反动派。内图把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也归入其中。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说，今年6月份发生的武装冲突显示

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武装部队的力量。尽管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在军事方面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不比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弱。阿·内图宣称，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国内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这种影响还在继续增长。同时他承认，安哥拉西北部省份今年6月以后被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所控制。此外，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在比亚及其毗邻地区影响很大，那里居住的人多数为本国居民。

内图认为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是代表反对白人的军官利益的组织。但是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没有大批武装力量，希望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之间起中介作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表示愿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结成战术联盟。这种结盟的愿望是已由一些非洲国家，首先是刚果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表达的。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对于在纳库鲁（肯尼亚）签订的所有协议是否能履行表示怀疑。可能破坏履行协议的原因之一就是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侵略性，它大概不会放弃进行武装挑衅的行动。内图强调说，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继续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它期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决定请求苏共中央提供军事和财政的补充援助。今年7月末将派遣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央政治局委员伊科·卡莱尔（总司令）为首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代表团去苏联。

内图通报说，根据中国政府的邀请，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代表团于今年6月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排组织这次访问时，赞比亚、坦桑尼亚和刚果人民共和国也积极地参加了。在谈判过程中，中国人向他们的代表团保证说，他们将停止对所有三个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军事援助，直至安哥拉获得独立。

感谢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提供有意义的情报。答应向苏共

中央转告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关于提供军事和财政的补充援助的请求。

参加会见的还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央政治局委员希奥·拉腊、若热·埃德瓦尔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总参谋部成员佩德罗·王东年，以及苏联驻刚果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Б.Г. 普季林。

苏联驻刚果人民共和国大使 叶·阿法纳欣科（签字）



№06160

## 兹韦列夫关于安哥拉形势给国内的政治信函

(1976年3月1日)

绝密

苏联驻刚果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布拉柴维尔市

Экз. №1

Исх. №92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入了自己发展的新阶段，该阶段的标志是：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遭到军事失败，几乎全国领土都获得解放，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府得到国际上广泛的承认。在共和国形势中发生的这些深刻的实质性变化，给军事、政治、经济及其他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任务。

军事形势的特点是完全消灭了在国家北部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雇佣兵，并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开赴与扎伊尔接壤的整个国境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完全控制了为赞比亚和扎伊尔提供出海口的特谢拉德索萨至洛比托的铁路。

在国家南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古巴部队解放了木萨米迪什—塞尔帕平托，并且继续进攻。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后障碍就是盘踞在距纳米比亚边境 100~200 公里处安哥拉领土上的南非共和国军队，他们企图把这一片拥有一座水电站的地区永远置于自己的

控制之下。

安哥拉领导人和古巴人打算继续战斗，直至安哥拉领土的全部解放。内图总统、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总书记卢西奥·拉腊、古巴部长会议副总理弗拉维奥·布拉沃及其他安哥拉和古巴领导人在同苏联代办的会谈中不止一次地宣布，他们将尽量避免同南非共和国发生广泛的军事冲突，并希望借助政治和外交斗争形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内图总统今年2月19日在同苏联代办的会晤中谈到安哥拉领导人准备同南非共和国代表建立联系以求进行谈判，并通过和平方式解放安哥拉的全部领土。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治局2月19日的声明中要求“立即和全部从安哥拉领土撤走南非侵略者的武装力量，以避免进一步毫无意义的流血”。该声明中还说：“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无论如何也不会对邻国进行侵略活动”。同时安哥拉领导人和古巴人不排除同南非共和国有广泛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对此已有所准备。在安哥拉南部地区古巴武装力量增长很快。

今年2月15日古巴共产党和政府驻安哥拉首席代表、古巴共产党中央书记霍尔赫·里基特在同苏联代办的会谈中宣布，“到2月底古巴部队将进逼南非共和国军队占领的地区。让我们看看他们是自己撤离还是不得不把他们打出去。”里基特指出：“但是，只有当借助政治和外交手段达不到解放全国之目的时，才动用军事力量。”

另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务是镇压、限制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颠覆破坏活动或使其中立化。解决该问题时，安哥拉领导人除军事方法外广泛而又积极地采用政治的和外交的斗争形式。根据安哥拉方面的倡议，2月28日，内图总统在布拉柴维尔与蒙博托总统举行了会谈。会谈过程中，蒙博托同意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框架内停止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卡宾达解放组织在扎伊尔领土上的敌对活动。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广泛利用政治斗争形式，旨在瓦解敌人的队伍，分化其头目，吸引一切可以团结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周围的人们到自己方面来。特别是，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治局2月19日的声明中，号召“一切受傀儡组织迷惑误入歧途的爱国者和那些有良心的领导人回国参加恢复因殖民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破坏和创伤的工作”。

在原来由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营控制的解放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那里的居民表示关心，并向他们解释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政策。所有这一切均取得积极成果。居民返回城市和乡村。对抗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制度的行为日渐减少。按内图总统的话说，不久前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首领萨文比表示同意停止在安哥拉领土上的游击战。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首领霍尔敦·罗伯托暂时尚未发表这样的声明。

安哥拉领导人和内图总统本人认为尽快建立强有力的国防军具有重大意义，把它看做是巩固国内政局、保卫安哥拉革命成果以及援助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和进步制度的主要措施之一。2月19日在同苏联代办的谈话中，内图总统宣布打算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现代化军队，以便在必要时能够捍卫进步非洲的利益。

安哥拉领导人希望苏联和古巴在建立国防军中起主要作用。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在罗安达建立军事科学院的决定。内图总统请求苏共中央派遣苏联军事专家和讲课教师来科学院任教。一些军事教练中心在古巴的帮助下正在组建。

今年2月21日安哥拉颁布了一项法令，根据该法令，凡年龄在18~35岁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义务服兵役。服役期为24个月，其中包括训练士兵所需的时间。

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声明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安哥拉人民和安哥拉人民解放武装部队只要得不到“侵略者放弃自己阴谋”的

保证，就不可能放下武装。

阿·内图及其他安哥拉领导人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过去和现在坚决不能接受从安哥拉撤出古巴军队和苏联军事专家的要求。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迅速加强。共和国成为非洲统一组织的全权成员国。从2月17日起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陆续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家便是法国。美国在外交上孤立安哥人民共和国的政策遭到失败。据3月1统计，有90多个国家已经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便为其加入联合国和专门化的国际组织创造了现实条件。

安哥拉领导人实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方针，主张加强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同苏联和古巴的关系。2月2日，在罗安达举行的国际声援安哥拉人民斗争会议上，内图总统作了纲领性发言，对苏联、古巴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的政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其他一些发言中，其中包括2月23日在苏联建军节招待会的讲话，内图公开宣布，没有苏联和古巴巨大、无私和全面的援助，安哥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安哥拉最可靠的盟友。为安哥拉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表示，今后愿意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同苏联和古巴的全面合作，利用他们的经验，依靠他们的支援。同时，安哥拉领导人强调指出，他们打算实行不结盟政策，“我们再次确认我们完全忠于不结盟政策”。今年2月2日，内图总统在声援会议的发言中声明，“我们不打算允许，我们这里谁也没请求允许，建立与国防利益不能不息息相关的军事基地。我们丝毫不打算参与军事集团之间存在的争论，尽管我们对限制战略武器、缓和政策和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和平和信任的局面非常感兴趣。”

总的来看，安哥拉领导人希望将来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非洲大陆起积极和进步作用。在非洲国家中，安哥拉同几内亚、几内亚

(比绍)、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莫桑比克及其他几个国家形成最密切的关系。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治局主张同邻国，首先同扎伊尔和赞比亚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方面已取得积极成果，这一点由安哥拉方面倡议的今年2月28日在布拉柴维尔举行的内图与蒙博托谈判的结果得到证明。用内图总统的话说，现在以同样的目的着手准备他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会晤。

毛主义中国的政策在安哥拉遭到包括来自内图总统方面的不止一次尖锐的批评，中国被公开谴责为“同敌人站在一个战壕里，同南非共和国、美国及其傀儡建立反常的联系。”用外交部长若泽·爱德华多的话说，现在罗安达和北京之间完全缺乏接触，而且尚未采取任何步骤来建立这种接触。苏联大使馆认为，今后可以期望中国和安哥拉建立外交关系和发展两国的经济联系。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对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一方面由安哥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长期斗争所决定；另一方面由不结盟原则，在发展经济合作、开采和出口石油（“哈夫石油公司”）和金刚石以及获得大量贷款的直接利益所决定。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承认，以及他们准备在新协议的基础上继续和发展同安哥拉的经济合作，这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导致外国资本广泛渗透到国家经济中，并且会给安哥拉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造成困难。安哥拉领导人看到了这种危险，但在目前条件下不得不去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合作。

在回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信中就此问题阐述的想法时，内图总统在今年2月19日同苏联代办的谈话中说：“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迅速而广泛地承认，无疑将伴随着来自妄图改变我国目前发展方向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影响。”鉴于此，阿·内图表示完全同意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关于必须提高警惕，千方百计加强武装力量和安哥拉

人民解放运动组织以及人民政权机关的意见。

在内政方面，国家迅速解放所持续的过程向安哥拉领导人提出了一些新的困难的和亟待完成的任务。其中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政权机关，在解放区恢复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组织。这些组织的许多成员被敌人野蛮地杀害。正经历一个建立青年、工会、妇女组织的过程。对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注意。国家加强对所有宣传机关和宣传工具活动的控制。开展了加强民族团结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团结的斗争。

团结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战争期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对安哥拉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方法和具体途径的分歧居于次要地位。现在，当战争即将结束时，这些分歧日益明显，以致可能引起内部斗争尖锐化，并对安哥拉革命造成严重的困难。

安哥拉领导人在解决上述及其他许多问题时所遇到的严重困难之所以日益加深，是因为干部奇缺、部落本位主义和种族主义表现、亲毛派和其他“左”倾集团的活动，等等。不得不同失业、通货膨胀、粮食短缺进行斗争，许多经济问题也具有政治性质，并被敌对分子利用。

尽管如此，建立国家和巩固制度的过程仍在继续。来自苏联、古巴的有效支援，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广泛的外交承认和军事上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这一进程。

采取立法和行政措施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如通过了人民政权机关法、国有化法、劳动纪律法，实行义务兵役制，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实行个人身份证制度，普及义务教育和医疗服务，加强安全和警察机关体制等。准备颁布使所有土地国有化的土地改革法。今年下半年拟进行拥有广泛立法职能的人民议会选举，议员大多数为工人和农民。内图在今年2月2日的讲话中阐述了安哥拉内政和社会经济发展纲领。总统宣布该纲领“指引我们建立社会主义

社会”。从这一点出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治局委员及其他负责工作人员对学习列宁著作和苏联、古巴及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深感兴趣。许多安哥拉部长已经致函苏联相应主管部门，建议互换代表团以便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国家经济状况仍然很艰难。多数工业企业关闭。失业和通货膨胀率增加。开工的企业入不敷出。劳动生产率低下。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奇缺。加工工业原料缺乏，同时也缺乏供各省、地区和企业之间进行经济联系所必需的交通工具。在国家北部、东部和南部广阔的解放区极端贫困，那里经济生活完全瘫痪。近些天来粮食问题尤显突出。解放区居民正在挨饿。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不削弱完成首要任务——从外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全国——力量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旨在克服经济困难的措施：

决定给予具有重要意义的企业以财政和其他援助；次要企业只好关闭。

改组国家银行和金融体制的工作业已开始；苏联专家以技术顾问身份参加该项工作。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开始同美国哈夫石油公司和金刚石公司谈判，指望在他们的帮助下理顺石油和金刚石生产，从而保证国家的外汇收入；

向解放区紧急派去非常委员会和行政工作人员以动员和组织居民来完成恢复经济的首要任务。

罗安达港口的工作被纳入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首先修造能向安哥拉运送粮食的船舶；

在罗安达及其他城市建立人民商店，店内按固定价格向居民出售食品，按国营系统向商店供货，国家帮助扩大消费合作社网。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把恢复国内经济的巨大希望寄托在苏

联—安哥拉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上。作为这方面的重要步骤就是第一个苏联经济代表团访问安哥拉，该团的结论和建议将奠定发展苏联安哥拉经济合作的基础。

为了进一步巩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进步制度，扩大苏联和安哥拉的全面合作，同时加强苏联在安哥拉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影响，苏联大使馆认为应该：

——始终不渝地执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原则性政策，全部解放安哥拉，全面援助以内图为首的进步制度；

——建立和发展苏共和苏联政府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阿·内图，总理洛普·杜·纳西门托，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总书记卢西奥·拉腊以及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治局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其他成员的个人联系；

——考虑到内图总统表示愿意在今年8~9月份访问苏联，认为目前审议关于邀请他于1976年下半年正式访问苏联可能性的问题是适宜的，这对于巩固苏联与安哥拉关系和加强我们在安哥拉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继续和大力扩大苏共中央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持；  
鉴于安哥拉领导人准备把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改造成为执政党，认为建议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熟悉苏共党建方面的经验很重要；

——在即将同内图总统的谈判过程中或是个人信函中，可以就关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非洲大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揭露毛主义和在不结盟运动中协调进步国家的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交换意见；

——在研究苏联与安哥拉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及相应协议草案准备情况之后，认为目前审议关于邀请洛普·杜·纳西门托总理正式访问苏联签订双边协议是适宜的。这种意愿安哥拉人民共



和国总理在2月23日苏联建军节招待会上已经表示过；

——安哥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安哥拉领导人，特别是内图总统对苏联友好信函的态度，为发展与安哥拉互利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按照苏联大使馆和第一个苏联经济代表团的意见，对于两国合作来说最有良好前景的领域有渔业、地质勘探、采矿工业、空中交通。苏联可以通过培训安哥拉民族干部以及向安哥拉各部和主管部门派遣苏联专家和顾问，给予安哥拉以巨大的援助。

内图总统请求苏联政府派两位能够就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各样问题提出专业性很强的忠告和建议的专家；

——培训安哥拉军队并提供武器装备，训练安哥拉军事干部应该是苏联与安哥拉合作的主要领域之一；

——必须极为重视加强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这方面有重大意义的是：

满足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由4人组成（情报部秘书长、电台和电视台台长、通讯社社长和安哥拉新闻中心主任）的安哥拉意识形态战线领导干部代表团访问苏联的请求。该团访苏将为签订相关领域合作协议准备条件，并有助于我国影响的大力加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请求已于一个半月前寄往莫斯科，但眼下未见答复；

尽快满足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罗安达建立新闻分社的请求；

向罗安达派“苏维埃影片出口公司”代表；

——扩大双方作家协会系统以及群众团体（苏联列宁共青团、苏联妇女联合会）和体育组织之间的联系；

——为了提高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效率并消除非健康竞争现象，认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协调和协商各项行动，尤其是在经

济合作领域。

苏联大使馆认为，正因为这样，苏联与古巴在安哥拉政治思想、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具有特殊的意义。

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战争期间合作和密切协调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现在，在和平建设的条件下，在苏联、安哥拉、古巴三方合作的协调基础上的这种宝贵的经验，必须在各方面大力发展和加强，这必将有助于巩固我们的地位和抵制帝国主义大国、毛主义者及其他反动力量的敌视活动。

苏联驻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Г. 兹韦列夫

№06157

## 沃罗比约夫同阿·内图的谈话纪要

(1976年9月4日)

机密

摘自沃罗比约夫日记

1976年9月13日

今年9月4日应阿·内图总统的邀请访问了他。

阿·内图问是否从莫斯科收到苏联方面对非洲南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有关想法的情报，如果可能，鉴于定于9月15日将举行5位总统（安哥拉、坦桑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博茨瓦纳）会晤，他请求谈一谈上述情报。

我回答说，这方面的情报尚未收到。在中央寄来的资料的基础上，我向总统谈了有关非洲南部3个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和会谈的情况。

我请总统交换与即将举行的会晤的意见，及其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评价，非洲其他国家的立场。阿·内图通报说，5位总统决定提前举行会晤（不是像先前确定的9月15日），2小时后他将飞往达累斯萨拉姆。会议主题——讨论基辛格与沃斯特会晤及其对非洲的影响。他，内图，尚不知在会上需要提出什么，也不知应该持什么立场。内图在首次参加这类会议（坦桑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已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会晤）时，看来局限于倾听自己同事对会议的意见，然后再确定自己的立场。例如，他，内图，不

完全理解为什么达累斯萨拉姆（会晤）必须有基辛格参加。他也不清楚为什么卡翁达总统始终坚持在同沃斯特的接触中让基辛格起中介作用。

阿·内图继续说，他在不了解坦桑尼亚及会议其他参加国立场的情况下，现在难以说出对上述问题的某种想法，但会议结束回国后这些问题他会清楚多了。看来，他很可能赴莫斯科向我们转达有关情报。

内图总统感谢（我们）迅速答复。他宣布，完全同意苏联方面的全部想法并强调，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对佛得角共和国，法国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兴趣增加了。内图对苏联拟扩大同佛得角共和国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合作表示非常满意。

总统继续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治局通过特殊决议，委托负责外交政策所有最重要问题的政治局委员、总理洛普·杜·纳西门托就进一步发展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关系问题准备补充建议。他请求苏联大使向洛普·杜·纳西门托详尽通报有关苏联方面就南大西洋形势，及同佛得角共和国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关系问题的想法。

内图说出了他的主张：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就国际问题，特别是有关非洲和南大西洋问题经常交换情报。他说，他打算在莫斯科会谈中触及这些问题。

苏联驻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大使 Б. 沃罗比约夫（签字）

No 06092

## 洛比诺夫同卢武阿卢的谈话纪要

(1978年6月27日)

应邀拜访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国际问题书记П. 卢武阿卢。

卢武阿卢宣布，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目前已向非洲各国派出一些代表团，去陈述安哥拉对扎伊尔的关系，以及关于在扎伊尔沙巴省发生的事件的真正性质等问题的立场。代表团再次强调：在沙巴省发生的事件无论是同安哥拉，还是同苏联以及古巴都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事件都是扎伊尔的内部问题。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声称，有些客观因素促使在这一地区经常发生冲突和形成紧张情势。殖民主义者在必要的时候就在国家之间划出边界并不注意居民的部族成分。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个大的部族隆达人就被分解成几个部分，目前他们生活在三个国家里，即扎伊尔、安哥拉和赞比亚。除此之外，现在在安哥拉有25万多扎伊尔难民，他们主要都是隆达人，其中有2万~3万左右是过去的军人，即所谓的“加丹加宪兵”。战争过后，扎伊尔的中央政权为了独立开始迫害居住在沙巴省的隆达部族。有的被非法逮捕，有的被处决，包括那些出身隆达族的扎伊尔现役军人。

值得注意的是，沙巴省是扎伊尔的一个最富足省，能保证国家相当数额的外汇收入，同时还有巨型的外国垄断组织，投资加工该省的自然资源。

扎伊尔的经济形势是灾难性的：物价飞涨惊人；营私舞弊席卷

全部国家机构，其中包括军队；居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以及大部分现役军人的困境都无法忍受等，都使得金沙萨的政府和隆达族之间的冲突尖锐起来，有时就引起扎伊尔军队中隆达族出身的军人举行暴动。在这种冲突尖锐的时候，在安哥拉隆达族出身的难民就想尽力帮助住在沙巴省的同乡。除此之外，显然，在安哥拉所有的难民都想回到祖国扎伊尔去。隆达族人成群结队地从安哥拉向扎伊尔转移和再返回来，实际上是不可能加以控制的，因为安哥拉和扎伊尔之间的边界线长达约 2000 公里。

卢武阿卢强调说，每次一发生内部冲突，蒙博托就利用借口想对它实行国际共管。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声称，西方列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对沙巴省最近发生冲突的干涉，以及他们提出组建非洲国家之间的武装力量的建议等，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当前镇压隆达族叛乱以及保护蒙博托体制，而且还为了有可能使外国垄断组织继续开发沙巴省的资源。

卢武阿卢声称，“南非共和国表示愿意参加非洲国家武装力量这一事实，就能证实我们对这一力量具有新殖民主义性质的评价。还能证实这一评价的是，中国派遣军事教官去扎伊尔，并建议非洲国家武装力量应配备武器装备”。

根据卢武阿卢的评价，问题在于南非共和国创建的是帝国主义的非洲国家武装力量，其目的是支持非洲不得人心的反动体制，并对非洲的进步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展开斗争。

西方国家的长远目的在于巩固南非共和国在非洲中央地区的地位，以便以后“能闯入”印度洋，也就是为了新殖民主义征服非洲。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声称，能够证实安哥拉领导人对扎伊尔事件评价的，同时还有一些西方国家关于给予金沙萨经济援助的决定。众所周知，西方国家作为提供这种援助的条件是：第一，扎伊尔的经济和财政管理应进行这样的改革，即

美国、法国、比利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都能控制整个经济和财政以及行政机构的活动。第二，他们提出要求金沙萨中央政权应同隆达族和解，以便外国垄断组织能够安稳地开采沙巴省的资源。最后，西方国家坚持扎伊尔同安哥拉和解，以便能恢复从沙巴省沿本格拉铁路线运送自然资源。

卢武阿卢在这方面指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内图在6月9日自己的声明中宣布，扎伊尔的难民被从扎伊尔的边境地区转移到安哥拉，安哥拉要解除“弗赖克”部队的武装，他们将撤离安加拉的沙巴省；安哥拉政府建议扎伊尔首先将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埃塞俄比亚“弗赖克”等基地撤离安哥拉的边境地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在这一声明中同时还强调说，难民根据他们的选择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居住。卢武阿卢说，“这一立场是完全符合非洲统一组织的章程和国际法的”。

然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谈到纳米比亚问题。他通报说，在评价南非共和国在安哥拉的卡辛加有侵略行为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联合国取得重要胜利之后，安哥拉领导立即就得出结论，南非共和国的侵略行为是在追求下述目的：削弱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并强迫它接受五大西方强国关于纳米比亚的计划；赢得时间，以便在纳米比亚建立能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相对抗的政治傀儡势力；恐吓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削弱它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

卢武阿卢指出，事件完全证实安哥拉领导的这种评价是正确的。譬如，目前南非共和国在纳米比亚叛徒季潘格的帮助下建立了所谓的“民主党”和所谓的“纳米比亚民族阵线”。沃斯特从一开始就狂热地企图准备伪造选举，以便按着罗得西亚“内部调解”的模式在季潘格傀儡的帮助下达到“内部调解”的目的。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声称，安哥拉人

民共和国将继续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他说，“安哥拉的领导认为，为了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南非共和国应当：在纳米比亚宣布独立之后正式确定期限将鲸港（沃尔维斯港）移交给该国当局；在过渡时期撤走目前在靠近安哥拉边境地区纳米比亚南部基地上的军队；立即释放在纳米比亚的所有政治犯”。卢武阿卢同时还指出，安哥拉同意联合国提出的应在纳米比亚的过渡时期发挥作用。

最后，卢武阿卢强调说，西方国家围绕安哥拉的策略并不能迫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脱离它所选择的道路。他声称，“我们坚定和彻底地选择了我们的朋友，这就是苏联、古巴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和古巴的援助和支持，安哥拉将沿着已选好的道路走下去”。

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提供信息表示感谢。我方亲手交给他苏联政府关于非洲声明的原文（葡萄牙语）。强调说，这是苏联为捍卫非洲国家的独立，声援大陆各族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干预而斗争的一项重要政治行动。指出，其中包括对非洲形势的评价是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观点一致的。然后，又转交给他《真理报》上发表的有关美国对外政策文章的葡萄牙语译文稿件。

还面交了关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以基里连科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抵达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电影片。

卢武阿卢对苏联始终不渝地支持非洲的进步势力表示感谢。他说，立即将声明的原文报告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他同时对苏共中央赠送的礼品也表示感谢。

在就国际问题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卢武阿卢请求提供关于南也门在不成功的政变之后形势的信息。

参加会谈的有使馆参赞 C.C. 罗曼诺夫。

苏联驻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大使 A. 洛比诺夫（签名）



№06094

## 洛比诺夫同卢武阿卢的谈话纪要

(1978年8月4日)

1. 拜访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国际关系书记<sup>①</sup> 卢武阿卢，并向他通报了关于非洲共产党会议的与会者都希望由塞内加尔非洲独立党政治局委员阿马塔·丹斯科带着给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会议总结的通报去安哥拉。

卢武阿卢声称，很遗憾，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有塞内加尔非洲独立党代表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并带来关于非洲共产党活动报道的反面经验。按照卢武阿卢的说法，一名该党的代表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到安哥拉已经一个多月，而且他来这里的所有花费都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承担。他任意地到各处去，包括国内的一些不是没有危险的地区，而且关于这些也都不告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好不容易才把这位代表送回国去。因此，为了研究共产党会议的上述状况，卢武阿卢要求通知他：哪些非洲国家共产党参加了会议，什么时候想派自己的代表来转给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通报。

2. 重新向卢武阿卢提出关于必须批准苏联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之间领事公约问题。卢武阿卢回答说，他不了解这一问题，但

---

<sup>①</sup> 原文如此。1978年6月27日谈话时，洛比诺夫称卢武阿卢的职务是“国际问题”书记。

是，他要征求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意见，而且尽可能快地让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审查这一问题。

3. 鉴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关系部正式领导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卢武阿卢提出个人请求，尽可能地帮助提供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工作的外交官住房。关于这方面指出，因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提供给苏联外交官住房，苏联大使馆不得不到私营部门去找住房，而且有一些苏联外交官已经有好几个月都没有住房。

卢武阿卢回答说，罗安达目前的住房形势非常紧张，因此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外交官的住房上很难帮助苏联使馆。但是，卢武阿卢答应要研究这一问题。

4. 在进一步会谈的过程中，卢武阿卢谈到关于非洲大陆南部的政治形势问题。他指出，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其他进步国家对西方和反动的非洲政体试图利用在扎伊尔沙巴省所发生的事件攻击进步的非洲国家进行一致的反击之后，形势有了根本的变化。西方，首先是美国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强迫蒙博托走向安哥拉的关系相对正常化的路。因为，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反安哥拉组织、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加丹加宪兵”搞分裂活动问题，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内图建议建立国际监督这些组织的基地撤离安哥拉和扎伊尔边境地区的委员会。安哥拉一方建议安哥拉、扎伊尔、赞比亚和刚果的代表，作为处于非洲这一地区的国家代表和直接为了巩固该地区的安全都纳入这一委员会里。然而，扎伊尔却不接受国际委员会的这种构成，它建议要列入卢旺达和苏丹的代表。安哥拉一方不想给蒙博托制造破坏谈判的借口，所以同意扎伊尔的建议，并且也从自己一方提出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作委员会的候选成员。在安哥拉和扎伊尔

的会谈中，关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等组织的基地撤离安哥拉和扎伊尔的边境地区，不承认扎伊尔支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关于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大使馆等都已达成协议。

卢武阿卢指出，美国和西方国家迫使蒙博托走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路，作为给西扎伊尔经济援助的条件，因为，西方垄断集团对开采沙巴省的自然资源很感兴趣，没有安哥拉和扎伊尔的关系正常化和不开通本格拉铁路线，开发是不可能有效益的。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强调说，在使我们同扎伊尔关系正常化的同时，安哥拉尽力想达到蒙博托有名的中立体制，缩小帝国主义利用扎伊尔作为侵略进步非洲国家后方基地的可能性。蒙博托拒绝支持搞分裂活动的反安哥拉集团：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同时，还要为安哥拉北方地区巩固和平和安全创造条件，使安哥拉的领导有可能集中精力于国内的民族政策。

然后，话题转到的纳米比亚的事态发展。卢武阿卢指出，在罗安达会晤中，5个西方国家使联合国有可能就纳米比亚问题召开安全理事会并通过两个有关的决议，其中包括鲸港的专项决议。

根据卢武阿卢的意见，这些决定使纳米比亚的独立斗争又有了新的前景。同时规定按协商的预定步骤南非共和国军队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边境地区撤到离边境150英里的基地，并受联合国部队的监督等都会消除，或者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减少南非共和国对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支持的可能性。

这样，在安哥拉就能够为确保南部居民的和平生活和恢复南方各省的经济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卢武阿卢强调说，“所有这一切，显然并不说明帝国主义已改变了自己的目的，因此，我们不能放松我们的警惕性。”

关于纳米比亚本身今后事态的发展，卢武阿卢指出，安哥拉领导人怀疑联合国在这个国家所起的作用以及进行选举的原则本身。不过他指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同意让联合国在纳米比亚的过渡时期发挥领导作用，并且也同意进行选举。因此，不应该反对这样做。

卢武阿卢声称，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该国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内部，取决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坚决地同南非共和国制造的傀儡政治势力进行斗争。

根据他的意见，联合国一开始履行已协商好的计划，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便应该毫不迟延地返回纳米比亚，在那里开展工作，以便“不让南非共和国制造的那些政治势力控制战场，他们已经在纳米比亚开始活动，利用南非共和国提供的设备、技术和由南非共和国培训的技术专家进行政治宣传工作。现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而进行的斗争中，不应该让别人超过自己。”说到这里卢武阿卢指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候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不是立即返回安哥拉，他说，也不是调整好在广大群众中的政治宣传，我们却花费一些时间去研究各种决议案和文件，结果使得傀儡组织“能够控制战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说，在这之后，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才掌握了政权，大家都非常清楚。他同时还指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应该坚决要从联合国秘书长那里得到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有利的关于联合国派往纳米比亚特种部队组成问题的决定，坚决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或者是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指令行动的那些国家列入该特种部队的成员中。

感谢卢武阿卢提供的信息。

5. 最后，卢武阿卢感兴趣的是苏联是否同厄立特里亚的民族分立运动组织没有联系。从他提出的问题可以了解到厄立特里亚分

立主义组织已经或者试图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 劳动党建立联系。

陈述了苏联的原则立场，支持埃塞俄比亚的进步政府，支持它在为保卫革命成果而进行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企图破坏该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煽动。强调说，厄立特里亚问题，是埃塞俄比亚的内政问题，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它的解决。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 劳动党书记对解释表示感谢，对解释的情况表示同意。

参加会谈的有使馆参赞 C.C. 罗曼诺夫。

苏联驻安哥拉人共和国大使 洛比诺夫

№06170

## 伊利乔夫同保罗·若热的谈话纪要

(1979年2月9日)

摘自伊利乔夫日记

1979年3月2日

在罗安达逗留期间会见了若热<sup>①</sup>，向他转达了葛罗米柯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满意地指出苏联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在一些极为重要的国际问题，其中包括南部非洲问题上一致或接近。详细阐述了我们对该地区局势的评价，强调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中，苏联援助和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方针不变。对于无论是在每一支为解放而斗争的队伍中，还是在“前线”国家中，均缺乏团结表示忧虑。突出了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继续斗争和总政治纲领的重要性，以及“前线”国家为保证这种团结的责任问题。双方就其他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若热表示同意对南部非洲形势所做的评价，提出安哥拉与苏联一样，对那里复杂的局势表示关切，尽管对其看法并不持悲观态度。

他说，津巴布韦解放阵线内缺乏团结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引起不安。安哥拉方面曾不止一次地提请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

---

<sup>①</sup> 保罗·若热，安哥拉外交部长。

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注意，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首先在政治方面需要团结。部长认为，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之间分歧的原因之一是津巴布韦爱国阵线中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战略。他说，津巴布韦问题对于安哥拉领导人来说是非常复杂的。津巴布韦周围的局势和力量分布情况还不清楚。若热说：“在寻求夺取津巴布韦独立的道路中，决定性的话应该由爱国阵线说，而不是‘前线’国家”。

安哥拉方面的意见是，对津巴布韦爱国阵线两派的影响来自某些外部势力，其中也包括对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形成这样的局面：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而不是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有着良好的关系，与此同时后者则依靠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支持。这也表现在“前线”国家本身的相互关系上：具有良好双边关系的安哥拉和赞比亚支持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而同样实现密切的双边合作的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则支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在谈到津巴布韦及其周围局势的特点时，部长指出，如果说从前某些“前线”国家接受英美调解计划时仅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表示怀疑，那么今天，实际上所有国家都不接受该计划。两极分化非常明显：一端为美国、英国、扬·史密斯、穆佐列娃、西托尔和奇劳，另一端是“前线”国家支持的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尽管这种支持尚未非常明确地确定下来。

若热认为，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津巴布韦问题的解决办法：一种是在保证爱国阵线两部分团结的条件下加强武装斗争，在调解津巴布韦问题的谈判前巩固津巴布韦境内军事政治阵地，（如今津巴布韦境内的游击斗争有所发展，令人遗憾的是缺乏团结和配合）；第二是举行有美国、英国、史密斯、穆佐列娃、西托尔和奇劳为一方，爱国阵线为另一方参加的会议。但这是危险的，因为这样津巴

布韦爱国阵线在会上会陷于少数，而且内部还缺乏团结。

部长再次声明，当然只有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而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才应该解决津巴布韦的问题。为了参加会议，该阵线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政纲，因为主要问题是夺取政权，还应该表明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目的。

在回答我们同内图总统谈话中提出的意见（尽管在爱国阵线中存在着不同意见，但是不应该拒绝团结统一的思想）时，部长承认，加强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政治团结问题现在应该提到首位。他声明，安哥拉领导人详细考虑了旨在克服爱国阵线内部的分歧的可能实现的新倡议的问题。他一边考虑一边说，比如可以举行新的有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领袖参加的“前线”国家领导人会议，或者采用其他步骤。部长说，我们还未考虑好，先将这方面可能采取的步骤通报给你们。

部长指出，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重大责任应由英国承担，它从1965年就容许史密斯制度的存在。

若热讲道，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早已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设有代表处。在达成建立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协议之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代表也在这里出现。安哥拉宣布，它只承认津巴布韦爱国阵线代表处，并将给它以援助。当然，这种援助基本上给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早有关系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但安哥拉方面也准备援助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如果它调整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关系的话。

话题转到纳米比亚问题时，部长说，那里的局势很复杂，但比较清楚，因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一个受到普遍承认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惟一代表。问题在于是否能有效地贯彻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435号决议。

在阐述所有涉及纳米比亚问题过程中部长提出一个想法：在调



解纳米比亚问题中关键的话应由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来说。他说：“我们不能代替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而不是我们同意在纳米比亚领土上停火，举行选举并部署联合国军队”。

在谈到安哥拉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看法时，若热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在现有计划基础上解决纳米比亚问题都应该尽量减少流血牺牲，而主要是要有利于纳米比亚人民，而不是帝国主义。用他的话说，安哥拉现在给予并将继续给予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尽可能多的援助——政治的和物质的，为它作战提供自己的领土，协助它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援助。他宣布，应该估计到纳米比亚武装斗争水平正在下降，因为最近一个时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更注重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手段。安哥拉本国由于纳米比亚的局势每天受到来自南非共和国及其傀儡的进攻，尽管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朋友的帮助下成功抵抗并制止了敌人渗透。

若热说，纳米比亚调解纲领的完成在很多方面取决于未必去全面实现联合国计划的南非共和国。安哥拉方面对于顺利实现瓦尔德海姆<sup>①</sup>计划有很大疑虑，因为它看不出有什么保证让南非共和国执行计划并从纳米比亚撤军，使即将举行的选举能公平举行，也不清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战士将以什么资格返回纳米比亚参加选举。

在这一视角下，安哥拉人也同目前在罗安达的联合国秘书处特别代表阿赫蒂萨里讨论纳米比亚问题。部长说，他将把可能举行的新一轮会晤讨论结果向苏联代表团通报。

至于谈到南非共和国的形势，正如部长所说的那样，安哥拉支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认为在南非共和国的斗争，考虑到该国的

<sup>①</sup> 瓦尔德海姆，联合国秘书长。

军事援助及其他军事政治因素，必将是为了大陆的解放所进行的最复杂的斗争。

同一天午饭后同若热的谈话继续进行。

根据先前达成的协议，外交部长秘密通报了安哥拉方面同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阿赫蒂萨里进行谈判的情况。

他通报说，阿赫蒂萨里来这里是为了阐释联合国实现安理会435号决议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如下几项：

1. 停火。建议从2月26日起实现停火，而选举建议从今年9月份最后一周开始。

2. 南非共和国撤军和联合国驻军。根据安哥拉统计，南非共和国军队人数现在约5万人，应当在12周内缩减到1.5万人，具体是：自2月26日起从第3周到第6周南非军队人数缩减到1.2万人，从第6周到第9周到8000人，从第9周到第12周到1500人，这些人分1个或2个队驻在布隆方丹和奥奇韦罗。与此同时，即从2月26日以后的第3周开始，根据国内局势需要，联合国军分批进驻纳米比亚，在南非共和国军队缩减到1500人时联合国军最多可达7500名现役军人，其中包括2300名后勤保障人员。

3. 遣返纳米比亚难民。预计从2月26日起纳米比亚境外的纳米比亚人就能够踏上祖国的土地。

安哥拉方面这时产生问题：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战士是武装的还是非武装的返回？他们应该被安置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指定的基地，还是由联合国指定的基地？被遣返回来的难民可能到哪里去？是返回故乡，还是到专门营地？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认为，难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可以分配到他们愿意去的地方，而南非共和国认为他们只能去营地。

4. 以联合国的力量对在安哥拉和赞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军事编组实行监督。安哥拉像赞比亚一样反对该建议，因为它与

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相矛盾，而实施该建议就可能使联合国军有可能控制国家的国防体系。

5. 联合国军的部署。预计将联合国军基本上布署在纳米比亚的北部地区，即像部署南非共和国的军队一样，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国境线附近。该建议也是安哥拉不能接受的。

6. 联合国军的组成。根据联合国秘书处的建议，驻纳米比亚的联合国武装力量拟以营建制由下列国家组成：加纳、苏丹、孟加拉、巴拿马（或印度）、芬兰、加拿大、南斯拉夫（或罗马尼亚）；此外，辅助部队应该由下列国家提供：澳大利亚（工程兵）、英国（通讯）、丹麦（行政）、联邦德国和荷兰（医疗保障）、瑞典（供给）。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从自己方面向阿赫蒂萨里提出了自己关于组建联合国军的建议：英国、坦桑尼亚、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印度、伊拉克、牙买加、芬兰、瑞典、南斯拉夫和巴拿马。

部长指出，因为南非共和国不同意这个组成名单，看来联合国秘书长不得不以新编组名单代替。

阿赫蒂萨里认为，组编联合国军纯属联合国安理会的权限范围，无论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还是南非共和国，对该问题均无否决权。

部长宣布说，安哥拉总的来说不同意关于联合国军组成问题的提法，认为已经有了解决近东类似问题的反面经验，假如欧洲人能够解决未来纳米比亚的问题，那就怪了。

对联合国计划进行总的评价时，若热强调指出，安哥拉领导人不相信南非共和国会彻底执行该计划。他说，对这方面只要我们没有保障，我们就会等待纳米比亚形势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做出最终决定。关于该立场安哥拉方面已向阿赫蒂萨里坚定地宣布过。

感谢部长（给我们）真诚的通报。向他阐述了苏联解决纳米比

亚问题的立场，强调指出了我们对西方大国在该问题上耍的花招持否定态度，也不信任阿赫蒂萨里的努力，认为他们的拖延战术目的是在纳米比亚调解的幌子下埋上一颗定时炸弹。

表示希望安哥拉领导人考虑到其崇高的威望，利用一切现有的条件进一步加强“前线”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合作，旨在戳穿西方大国在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的阴谋，巩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进步、反帝方面的阵地，保证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团结统一。

若热声明，安哥拉高度评价苏联给予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他强调指出了这样一个思想，即许多非洲国家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支援才取得独立。

若热还指出，安哥拉方面认为苏联在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上的努力和倡议具有重要意义。

从自己方面强调指出，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裁军的斗争是苏联外交活动的基石。请交谈对方注意，与此同时（这种）斗争无论如何不可能意味着苏联拒绝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这一点勃列日涅夫同志已清楚明确地宣布过。鉴于这个原因，阐述了苏联的立场，而这一立场被缓和的敌人，首先是北京领导人加以利用，曲解缓和的概念。向部长通报了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非洲贩卖政策的评价。

在谈到友好国家支持苏联在解决最重要国际问题方面倡议的重要性这一思想时，表示希望安哥拉加入这些领域的主要国际协议。

若热介绍说，北京通过自己的使节（他指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试图阐明在普遍承认的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安哥拉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按照他的话，安哥拉领导人注意到这种愿望，但是必须让中国方面明白，在关系正常化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正式承认安哥拉共和国，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现在在扎伊尔

还有 112 名训练派往安哥拉领土搞破坏的教官，应该全面弄清中国对安哥拉的立场。外长说，现在让中国方面收到我们的答复后自己去想一想吧！

若热接着指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独立存在的 3 年里，安哥拉尚未取得像苏联 60 年内所取得的经验，同样也还不能飞速前进，其中包括在加入国际条约方面。然而他不怀疑安哥拉最终会做到这一点。

最后部长表示同苏联代表团交换意见非常满意，并请向葛罗米柯同志转达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参加谈话的有：安哥拉方面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问题书记阿·旺顿（姆宾达）、外交部副部长席尔瓦·莫拉、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奥·利马；苏联方面有苏联代表团成员、苏联驻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大使洛比诺夫、苏联大使馆高级顾问。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伊利乔夫（签字）

## 【专题说明】

# 对外军事援助和情报工作

(1974年4月至1980年9月)

收入本专题的档案文献，在内容上比较分散，其中包括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支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恐怖活动的报告，关于将来自越南的美制轻武器转给他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的报告，以及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活动的情报通告；苏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向保加利亚派遣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和提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驻民主德国代办处工作人员薪金的决定。这些文件，大体上从一些侧面反映了70年代后期苏联对国外共产党国家和革命组织的军事援助情况，以及对敌对国家有关情报的反应。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许洪声、侯育成、王鹏翻译)

№06145

##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支援巴解组织 恐怖活动致勃列日涅夫报告

(1974年4月23日)

绝密  
特别卷宗  
莫斯科市

致勃列日涅夫同志

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68年起一直保持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政治局委员、外事部领导人瓦迪亚·哈达德的秘密接触。

在今年4月举行的同克格勃驻黎巴嫩头目的会晤时，瓦迪亚·哈达德以秘密交谈的方式阐述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恐怖破坏活动的前景纲领，该纲领主要归结如下：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特殊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效率。从这一点出发，该组织恐怖破坏活动的主要方针是：

——继续以阿拉伯各国的“石油战”为特殊手段反对支持以色列的帝国主义势力；

——在第三国实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人员的行动以获取关于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和打算的情报；

——在以色列领土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对其固定资本属于以色列、英国、比利时和西德公司的金

刚石托拉斯采取破坏活动。

与此相适应，现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对一系列特殊行动进行准备，其中包括打击世界各地（沙特阿拉伯、波斯湾、香港等）的大油库，消灭油船和超级油轮，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驻伊朗、希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代表采取行动，袭击特拉维夫金刚石中心大楼等等。

哈达德请求我们援助他的组织以便获得进行单独破坏性作业所需要的几种特殊技术手段。

哈达德在同我们合作和请求援助时清楚地体会到我们对恐怖（主义）原则上持否定态度，没有对我们提出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这方面活动有关的问题。

同哈达德关系的性质使我们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外事部的活动，对他施加有利于苏联的影响，同时还能利用他的组织的力量保守必要秘密的情况下采取对我们有利的积极措施。

考虑到上述情况，在定期会晤时总体上肯定瓦迪亚·哈达德关于给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援助（特别资金）的请求是适宜的。至于涉及提供援助的具体问题，那么应该注意，这些问题只有在分别考虑苏联利益并防止给我国安全带来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

请审批。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签字）<sup>①</sup>

---

<sup>①</sup> 文件上方有批示：“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格列奇科、葛罗米柯同志—报告。”



№06162

##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研制和 使用精密战术武器的后果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5年12月14日)

莫斯科市

苏共中央：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引起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军政界关注的是所谓精密战术武器的问题。根据预测，制造这种武器可能导致武装力量结构的变化，并且对于未来国际局势的发展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北大西洋公约各国研制精密战术武器是不停的军备竞赛的结果。具有高度自动性和机动性的精密战术武器的主要特点是它首先发便能击中目标，不论距离远近，不管天气条件好坏，白天或夜间。这类武器的实例是：在东南亚战争期间使用过的带激光或电视瞄准的炸弹；各种用激光瞄准的火箭和炮弹（在美国生产的“赫尔费尔”反坦克火箭和155mm自动瞄准炮弹），根据地形地貌不同误差20~40米的“佩子”型战术火箭，无人驾驶飞机，等等。

根据西方专家的意见，精密战术武器的出现将会给国际局势既带来稳定因素，又带来不稳定因素。

新武器的高效性属于稳定因素，它可以减少使用核武器的概率，并可以提高防御一方对抗敌人优势的能力。人们认为，在一些国家大范围地扩散精密战术武器的危险性，以及甚至在尚不具有高度发达科技和工艺基础的国家生产它的可能性，均属于不稳定因

素。这会增加产生局部军事冲突和区域性行动的可能性。

一些外国专家认为，这类武器的出现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不再生产几种现代高价的飞机和装甲坦克，价格比较便宜的坦克、装甲运输车、无人驾驶飞机作用将增强，将来用高度机动的小分队进行作战。正如北大西洋公约军界所认为的那样，靠新式武器保证击中目标的这种威胁，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疏散军事工业企业、武器库和大的军事基地。

美国企图利用与精密战述武器出现有关的新条件以便加强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并“提高自己西欧盟友对其对抗华沙条约力量能力的信心”。

为了进一步增加北大西洋集团武装力量的打击能力，北大西洋公约的军政界人士认为，用小功率核弹头装备精密武器是适宜的。他们的意见是，此类武器系统能击中大的目标，不给民用设施造成实际损坏，也不会造成和平居民的大量损失。新式武器的这些特性，被北大西洋公约领导人当作必须简化通过关于在战斗中使用战术核武器决议手续的根据。

现在制造精密武器工作处于采用试验样品阶段，研究其实际采用后积累经验的阶段，也是积聚新的经验体系的阶段。1975年3月在联邦德国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军事和工业界代表的非正式会晤中，曾做出关于广泛推广精密战述武器的现实性和到80年代初在战斗中使用它的可能性的结论。

因此，精密战术武器的制造可能看做是进一步增加北大西洋公约缔约国武装力量军事潜力的一个方面。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签字）

№06161

##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从越南转拨美制 轻武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5年12月31日)

绝密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75年12月31日

№3240 - A

莫斯科市

遵照苏共中央的委托，国家安全委员会援助某些外国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保证向他们提供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代化武器。

现在，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国家安全委员会感到这类武器短缺。鉴于此，“克格勃”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内务部领导人提出请求：审议划拨美制战利品——1万枝自动步枪和1000万发步枪子弹的可能性问题。

今年12月份越南民主共和国内务部部长陈国环同志秘密通知我们代表说：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原则上解决了该问题。这时陈国环考虑军事战利品归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管辖，建议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武元甲同志提出无偿划拨上述数量武器的请求。

我们认为向武元甲同志提出请求，并通知他这些武器将用于同帝国主义斗争和援助民族解放运动，这种作法是适宜的。

借武元甲同志同意无偿移交我们武器之机，我们认为向他表示感谢，提出将以相同数量的苏制武器作为补偿是适宜的。

已同苏联国防部（库利科夫同志）协商。请求同意。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签字）

№11837

## 乌斯季诺夫关于保请求派遣陆军防空兵 代表助理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6年5月7日)

绝密

苏共中央

报告：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朱罗夫大将请求为驻保加利亚人民军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代表处委派一位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请求的理由是有必要帮助保加利亚人民军掌握、管理和使用最新装备的陆军防空设备。

用新式防空设备装备华沙条约各国陆军始自1973年。1976~1980年间这类装备获得大发展，当时给所有盟军的陆军部长投入大量代号为“箭-1”、“箭-2”、“立方体”和“圆”的对空火箭配套装备。盟军却缺乏管理和在战斗中使用这些设备所必需的经验，同时也没有这方面训练有素的专家。

认为，为了能熟练地帮助保加利亚人民军陆军指挥官和司令部掌握和使用最新装备的防空设备，给驻保加利亚人民军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代表处委派一位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是适宜的。今后，在收到各国国防部的请求时，将委派类似的匈牙利人民军、波兰军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军总司令的助理。

现附上就该问题所做出的决议草案。  
请审批。

德·乌斯季诺夫（签字）

1976年5月7日

附 件

机密

No \_\_\_\_\_

苏共中央关于执行驻保加利亚人民军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代表处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职务的决议。

1. 同意苏联国防部关于执行驻保加利亚人民军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代表处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职务的建议。

2.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就该问题所下的命令草案。

中央书记

机密

No \_\_\_\_\_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1976年\_\_\_\_\_月\_\_\_\_\_日\_\_\_\_\_

1. 允许苏联国防部向驻保加利亚人民军联合武装力量代表处派一位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

2. 与派出上述职务人员有关的开支纳入苏联国防部预算。

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的物质和资金保障按程序并按先前为驻保

加利亚人民军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代表处成员通过决议所规定的范围来实现。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阿·柯西金

№11838

## 萨温金关于执行驻保总司令代表 助理职务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6年5月17日)

绝密

苏共中央：

关于执行保加利亚人民军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代表助理职务

苏联国防部通知，保加利亚国防部部长朱罗夫同志请求派一位苏联军事专家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担任驻保加利亚人民军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请求的理由是有必要帮助保加利亚人民军领导人组织掌握、管理和使用最新装备的陆军防空设备。保加利亚人民军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代表其他兵种的助理职务，已有人担任。

苏联国防部认为满足该请求并提出执行上述职务的建议是可能的。应注意的一点是，与执行该职务相关的开支将纳入国防预算。

我们支持苏联国防部的建议。同意国防部提交的作了文字修改的草案。

现附上苏共中央决议草案。<sup>①</sup>

苏共中央行政机部部长 尼·萨温金（签字）

1976年5月17日

<sup>①</sup> 参见№11839。



№11839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执行驻保  
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职务的决议

(1976年5月26日)

№10 /39, 1976年5月26日

绝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关于执行保加利亚人民军  
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代表助理补充职务的决议

同意苏联国防部关于执行驻保加利亚人民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  
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职务的建议。

赞成苏联部长会议就该问题所作的命令草案（附录）。

表决结果：

赞成者签字<sup>①</sup>

114. 抄送：乌斯季诺夫同志、萨温金同志、斯米尔丘科夫同  
志

1976年5月20日

1976年5月26日发

<sup>①</sup> 此处有8个人签名，字迹无法辨认。

绝密

No10 /39 附件

草案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1976年5月\_\_\_\_\_, No\_\_\_\_\_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1. 允许苏联国防部执行驻保加利亚人民军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的职务。

2. 与执行上述职务有关的开支纳入苏联国防部的预算。

受派遣执行该职务人员的物质和资金保障按程序并按为派出援外苏联军事专家所规定的标准实现。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阿·柯西金

№06159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同意派遣  
驻保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的命令**

(1976年5月27日)

绝密

№1136-PC号，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 允许苏联国防部执行驻保加利亚人民军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陆军防空兵代表助理的职务。

2. 与执行上述职务有关的开支纳入苏联国防部的预算。

受派遣执行该职务人员的物质和资金保障按程序并按为派出援外苏联军事专家所规定的标准来实现。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阿·柯西金  
(盖苏联部长会议事务管理局公章)

№06158

##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西方特工机关 对经互会刺探意向的汇报

(1977年9月3日)

绝密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76年9月3日

№1992 - A

莫斯科市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料分析，西方主要国家特工机关最近时期收集涉及经互会状况及其机关工作情报的活动，明显活跃起来。敌人的侦察机关尤其企图获得下列问题的情报：

——经互会领导机关的工作及其通过的决议、计划、思想观点；

——对上述机关工作人员基本特征的描述；

——经互会各国计划协调体制，在专业化、生产合作和标准化领域的价格和投资政策；

——在国防工业领域的专业化和生产合作；

——经济合作，（经互会）成员国之间，以及同非成员国之间的进出口计划；

——经互会对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也包括对欧共同体贸易的战略路线；

——成员国的外贸交易额，收支差额，外国贷款及其专项利用，外汇及黄金储备；

——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及国际投资银行在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作用；

——在投资和一体化领域的计划项目；

——同经互会普遍思想观点不一致的个别成员国特殊的民族利益；

——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苏联在经互会中领导作用的表现特点。

以情报形式汇报。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签字）

№ 11840

## 德鲁戈夫关于提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驻东德人员外汇薪金的报告

(1980年9月15日)

绝密

苏共中央

### 关于提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国家安全部代办处工作人员外汇薪金问题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德罗波夫同志）建议提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代办处工作人员的外汇薪金。每月给军事人员发 85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克，取代免费的份饭；增加用卢布换外汇的定额；给 1 名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不工作的家庭成员的外汇由 150 增加到 40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克，给 2 名以上的家庭成员由 250 增加到 65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克。像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其他机关同类工作人员一样，代办处工人和职员的外汇工资额提高所得工资的 14.3%。

提出本建议的理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食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苏联驻这一国家的其他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外汇工资近 13 年来提高了 3 倍（包括 1980 年），而代办处工作人员的薪金从 1958 年到现在一直未变，与上述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相比是较低

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代办处的军官将按苏联驻德国军队军官规定的标准发给外汇薪金。所不同的是，代办处军官不享受免费份饭。

除了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全部进行合作外，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代办处还承担着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以及位于西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标的重要任务。这些任务代办处工作人员是在西柏林一贯复杂的形势下和西方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和思想上压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完成的。

为实施上述措施增拨经费的总额相当于一年 172000 卢布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克。

此问题已同苏联财政部副部长 C.M. 鲍里斯同志协商过。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应予以支持。

附苏共中央决定草案<sup>①</sup>。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副主任 B. 德鲁戈夫

---

<sup>①</sup> 参见文件№06103。

№06103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提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驻东德人员外汇薪金的决定**

(1980年9月17日)

同意苏联部长会议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决定（见附件）。

绝密

第229号决定附件

草案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1980年9月，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关于提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  
全部代办处工作人员外汇薪金的决定**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1. 同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80年10月1日：

1) 每月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全部代办处超期服役的校官、尉官、准尉官和军事人员发放在国外期间的补贴85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克取代免费份饭；

2) 除苏联卢布工资外，按1980年1月1日苏联国家银行非贸易支付的牌价发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全部代办处的工人和职员按职务所得苏联卢布工资249%的外汇。

2. 授权苏联国家银行按非贸易支付的牌价每月发给有1名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住的不工作家庭成员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代办处超期服役的校官、尉官、准尉官和军事人员 40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克，发给有 2 名以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住的不工作家庭成员的校官、尉官、准尉官和军事人员 65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克。

3. 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财政部按非贸易手续于 1981 年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增拨 172000 卢布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克，用于本命令第 1 条规定的开支。

4. 删去苏联部长会议 1965 年 8 月 2 日第 596~222 号决定第 8 条最后一段中以下词句：“本条规定的外汇薪金支付办法和数额仍适用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进行协调和联系的全权代表机关的工人和职员”。

苏联部长会议 1974 年 5 月 27 日第 43~154 号决定第 1 条第 2 段中“保留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代办处工人和职员外汇工资支付标准”不再有效。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A. 柯西金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M. 斯米尔秋科夫

## 【专题说明】

# 苏联对埃索冲突的斡旋

(1977年1月至1978年8月)

1977年7、8月间，在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非洲之角的这两个国家，都和苏联签订过程度不同的“友好”、“合作”条约，于是苏联出面从中斡旋他们之间的冲突，结果是不成功的，但苏联却趁此积极向非洲扩张势力。

索马里位于非洲最东部、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半岛上，西与埃塞俄比亚相邻。索马里以伊斯兰教为国政，阿拉伯语是官方用语之一。1960年7月1日成立索马里民主共和国。1969年10月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索马里民主共和国。1969年7月1日，以西阿德·巴雷为领袖的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成立，西阿德成为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并被接纳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还在1974年，索马里就与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接受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两国各级领导人频繁互访。

埃塞俄比亚也位于非洲东部，东与索马里接界，信奉东正教和伊斯兰教。1974年9月12日，以门格斯图为领袖的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发动革命，推翻了海尔·塞拉西皇帝，宣布实行社会主义。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更为密切。1977年5月，门格斯图正式访问苏联，两国签订了文化、科学合作协议；领事协定；经济、

技术合作协定，以及供应武器装备协议。苏联还向埃塞俄比亚派出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和“专家组”。

非洲之角的两个邻国，都和苏联签订有关友好、合作条约，都宣布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却在接受苏联各方面援助时，发生了尖锐的、激烈的武装冲突。

1977年7月23日，索马里政府军大举攻入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东南部的哈拉尔省、巴累省、锡达莫省的大部分土地，包括重要城市基基加，被索马里军队占领。1978年2月，埃塞俄比亚获得大批来自苏联的武器装备之后，由苏联军事顾问团参与制订作战计划，有古巴的坦克兵、炮兵、摩托化步兵担任主攻，开始了大规模反击，把索马里的军队基本上赶回索马里。

1977年7月、8月，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两国代表团都到莫斯科，接受苏联从中斡旋，不欢而散；非洲之角的战火愈演愈烈。1978年3月，苏联又要斡旋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冲突。本专题文件共34份。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校注，  
许洪声、张寰海、侯育成、王鹏翻译)

№06156

## 西尼岑同英国驻埃塞俄比亚 参赞巴尔特罗普谈话纪要

(1977年1月28日)

摘自西尼岑的日记

今天在苏联大使馆同巴尔特罗普<sup>①</sup>进行了谈话，其中如下内容是令人感兴趣的：

谈到在亚的斯亚贝巴青年学生举行的反政府行动时，巴尔特罗普说，鉴于反对派组织的活跃（这反映在近些天来散发“埃塞俄比亚民主联盟”和“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的传单），“这些行动是意料之中的事”。埃塞俄比亚民主联盟利用政府军驻军营长的倒戈占领了胡默拉市，从而使该组织在伯根德省的活动明显加强了。巴尔特罗普认为，埃塞俄比亚民主联盟领导人，特别是门格沙·赛尤姆公爵和内加·特根将军利用在该省居民中的声望，使他们比较容易开展活动。然而，埃塞俄比亚民主联盟未必会指望在伯根德省界外取得重大的军事成绩，但可能希望在亚的斯亚贝巴周围和埃塞俄比亚国境四周制造紧张局势，从而迫使军事委员会，或至少是其某些领导人同反对领袖进行谈判。同时巴尔特罗普注意到，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现领导人“过于被激进方针束缚住手脚”，因此也未必肯做出什么让步。

<sup>①</sup> 罗杰·巴尔特罗普。

谈到前埃塞俄比亚皇太子阿斯法·沃森携家眷住在英国，他经常同访问伦敦的埃塞俄比亚民主联盟领导人联系时，巴尔特罗普说，英国政府解释说这会“对英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同时用他的话说，英国不给埃塞俄比亚民主联盟以任何援助，如果埃塞俄比亚获得财政和物质援助，那么首先是来自某些阿拉伯集团及其支持的厄立特里亚组织，特别是在苏丹的组织。至于谈到前皇太子和其他埃塞俄比亚政治流亡者的活动，只有当与英国法律相抵触时，才会出现强制驱逐他们出境的问题。

谈到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领导机关最近的改组时，巴尔特罗普注意到，这次改组使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几近“独裁者宝座”。尤其是人民群众组织临时局被认为是“门格斯图的政治工具”，而现在它被置于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政治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莫格斯·沃尔德·米卡埃尔的直接控制之下。

他注意到，没有任何理由推测作为选举机关的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领导人立场有什么变化，关于这一点特别是如下事实可以证明：保留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大会、中央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而且还让他占据部长会议主席的新职务。同时在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先前宣布的内政和外交方针以及上述临时局的活动中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尽管可以完全自然地推测，在他们那里可能有人对实现该方针这样或那样问题上坚持不同观点。

在交谈中巴尔特罗普说，1976年11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麦克伦南在《晨报》（1976.9.16）发表致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特费里·本蒂的一封信，信中对埃塞俄比亚当局枪杀反对派人士表示关切，呼吁埃塞俄比亚政府“向本国劳动人民提供真正民主权利，其中包括通过自己选举建立政权和工会的权利”。按巴尔

特罗普的话说，他对该信的发表“很不理解”，因为在他看来其他西欧国家共产党对埃塞俄比亚现制度的立场总的来说是有利的。

我对巴尔特罗普说，如果该信已发表，那么看来它可能是有关埃塞俄比亚国内形势及其社会政治斗争尖锐化情报不足的结果，因为无论是西欧还是某些阿拉伯国家，敌视埃塞俄比亚现在进步制度的报刊都千方百计企图从反面介绍埃塞俄比亚革命和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领导人，故意歪曲军委会所实行的政策。

巴尔特罗普接着说，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外交使团中有这样一种意见，即在苏联、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已达成关于向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提供军事供应协议。能证明此事的是据说1976年12月以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主席特斯费·格布雷·基达尼为首的埃塞俄比亚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当时卡托菲上校正在苏联，好像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不久前也曾秘密访问苏联。

我对巴尔特罗普说，这类传闻没有任何根据。

苏联驻埃塞俄比亚公使衔参赞 C. 西尼岑（签字）

№06154

## 西尼岑同美国驻埃塞俄比亚

### 参赞马林的谈话纪要

(1977年2月2日)

摘自西尼岑日记

今天按事先的商议在美国大使馆会见了马林<sup>①</sup>。其中令人感兴趣的内容如下：

在谈话涉及埃塞俄比亚形势时，马林指出，由于反对军委会的势力，特别是与苏丹毗邻的该国西北地区势力异常活跃，那里的局势很紧张。他注意到今年1月29日和30日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特费里·本蒂针对推行反埃塞俄比亚政策的苏丹和索马里领导人所发表的“措辞严厉的声明”，也注意到发出的“联合一切进步和爱国力量”保卫“革命和祖国”的号召，并且只字未提反政府的左派组织“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马林认为，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由于自己同军委会政策的分歧未必会支持特费里·本蒂的这一号召。

他继续说，同时反对派势力并不统一，他们反对现制度的联合行动带有临时性质。甚至假如反对派势力能推翻现制度，那么此后在他们之间定会开始争权斗争，特别是在保皇的“埃塞俄比亚民主联盟”与“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及其他左翼集团之间。他认

---

<sup>①</sup> 盖尔伯特·马林，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政务参赞。

为，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仍然是现在埃塞俄比亚国内惟一现实的全国性政权，尽管它的政策并未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同时也毫无疑问，与苏丹人和索马里人的声明相反，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对自己的邻国没有“侵略阴谋”，而且由于国内一些复杂的问题也没有这种可能性。

至于谈到军委会内部状况，在12月末为加强国家的“集体领导”进行某些改组后，在亚的斯亚贝巴占上风的意见是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的政策具有“更温和”的性质。但是，从特费里·本蒂的声明来看，看不出这点。

马林认为，总的来看埃塞俄比亚局势将继续复杂并且还要紧张很长时间。

我从自己方面看到，目前该国局势尖锐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些阿拉伯国家及其他敌视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政策和支持反对派的集团公开干涉埃塞俄比亚内政有关。我接着说，归根结底这不仅涉及埃塞俄比亚本身，而且也涉及上述整个地区的形势，涉及某些阿拉伯集团企图完全控制作为国际海上通道的红海，涉及这里发生更加紧张甚至冲突局势的可能性。因此我对马林关于美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以及该地区形势发展前景的意见颇感兴趣。

马林说，美国政府由于总统选举迄今没有可能对自己在该地区的政策进行应有的研究。在埃塞俄比亚1974年制度更替之后美国和埃塞俄比亚关系相当复杂而又矛盾。美国不能不注意该国定期发生的反美行动。譬如，今年1月27~28日在亚的斯亚贝巴青年反政府行动过程中，美国新闻处的玻璃被打碎，并投掷毒气弹，而且还在那里散发“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的传单。毒气弹还投入美国军事顾问团大楼。鉴于特费里·本蒂发表上述声明，1月30日由军委会在亚的斯亚贝巴组织了人民游行，在游行过程中有一些讲演者发表了反美演说，也出现一些反美标语，等等，尽管在官方声



明，包括特费里·本蒂本人的声明中尚未含有任何直接反美的攻击性言辞。

马林接着说，同时埃塞俄比亚政府对于从美国继续获得各种援助，特别是军援表示很关心，经常提醒实现军事供应品及其他物资的期限。在埃塞俄比亚制度更替之前美国给它的军事援助每年达1000万~1200万美元，并且主要是无偿援助（提供武器、弹药、零件等）。近几年来由于美国在同外国军事合作中采取了新方针，美国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援助主要通过贸易来实现，军援清单中包括几种比较现代化的武器，因此这种援助的总价值提高了。譬如，1975年签订的几年合同规定提供总数约为2.5亿美元的武器、零件和弹药。1976年美国就已经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这种武器的一部分，包括几架幻影式歼击机。规定今年还要为埃塞俄比亚海军提供几架这样的飞机及雷达装置。

马林接着指出，埃塞俄比亚现政府也在考察其他来源，在可能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条件下，包括从苏联（他从1976年12月埃塞俄比亚军事代表团访问一事获悉）以及中国（尽管他怀疑中国人能否向埃塞俄比亚提供“重武器”）寻求获得军援途径的路线。

马林强调说，美国不反对新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主义选择”，并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尊重其领土完整的原则，他们反对厄立特里亚的分离。自然，美国关心的是保证该地区的稳定和在红海航行的自由。

在回答相关问题时他说，美国和埃塞俄比亚1953年签署的“互相保障安全”协议主要涉及美国给予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援助并保障“美国的某些利益”，首先是当时很重要的在阿萨姆雷“通讯中心”的工作（现在该中心基本撤走）。但是正如他所理解的那样，该协议并不涉及为保卫埃塞俄比亚安全，如在它遭到侵略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美国武装部队直接卷入的问题。

至于谈到目前埃塞俄比亚与苏丹关系尖锐化，据马林所知，美国尚未采取任何步骤使他们两国关系正常化和遏制阿拉伯国家反埃塞俄比亚的行动，况且埃塞俄比亚政府本身并未就该问题向美国发出呼吁。

在马林看来，该地区出现冲突的局势原因之一很可能是今年吉布提即将独立，因为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之间对吉布提未来政策存在严重分歧。最近几个月索马里人成功地加强了自己在吉布提的政治影响以及同其现领导人的联系，这使埃塞俄比亚人惶恐不安。显而易见，吉布提宣布独立后，无论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经济上考虑，都必然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因为法国人从那里撤走之后吉布提的形势将非常复杂。一些阿拉伯国家已经在那里开设自己的领事馆。美国也打算在它独立前，在征得法国政府的相应允许后做这件事。

在谈话过程中马林对苏联和埃塞俄比亚关系现状颇感兴趣，他提到关于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即将访问苏联的传闻，正如他所理解的那样，据说访苏原因之一与索马里对发展苏联与埃塞俄比亚合作前景持否定态度有关。

我对马林说，我们同埃塞俄比亚传统的友好关系具有发展趋势，这从1976年7月14日就埃塞俄比亚国家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成果所发表的苏联与埃塞俄比亚联合公报，从苏联对埃塞俄比亚技术援助的扩大（派大学讲师、医生等），从去年下半年苏联经济专家在这里的工作等方面可以看到。我发现，两国之间继续进行高层接触在这种条件下是很自然的，但在具体计划中该问题尚未出现。我接着说，我们知道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存在分歧，在这方面我们一贯的路线是促使双方坐到谈判桌旁用和平方式解决，不使该地区局势尖锐化。这就是我们对待当前苏丹与埃塞俄比亚关系复杂化的立场。至于谈到苏联与埃塞俄比亚合作的发展前景，那么它不可

能是反对索马里的，因为我们同索马里也发展友好关系，关于这一点索马里领导人也清楚了解。

马林问，按我的意见，美国在埃塞俄比亚的利益在那些领域同苏联的利益不矛盾。

我说，在我看来，首先可以包括如下领域：实行尊重埃塞俄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政策，不干涉其内政，用现实主义态度对待国内按人民意愿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发生的变化；巩固和平和安全，制止该地区各国之间紧张和冲突局势的发展；支持在红海航行自由原则，这符合国际法公认准则和整个世界的利益。

马林感谢安排了本次谈话，表示在以后的接触中继续就所涉及的问题交换意见，本人对此表示同意。

苏联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西尼岑（签字）

№06014

## 拉塔诺夫同古巴驻埃塞俄比亚大使 诺沃阿的谈话纪要

(1977年2月10日)

摘自拉塔诺夫的日记

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会晤过程中，霍谢·佩雷斯·诺沃阿<sup>①</sup> 通报说，他于2月3日应对方的邀请拜访了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

门格斯图请求大使传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口信，说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请求古巴帮助埃塞俄比亚人民警察，供应轻武器。当时，门格斯图宣布，美国人拒绝供应坦克的备用零件，减少供应一切型号武器的弹药。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估计美国在今年2月3日事件之后，还能对埃塞俄比亚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与此同时，美国给以苏丹、肯尼亚军事援助，鼓励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从事反对埃塞俄比亚政体的活动。

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通知门格斯图，打算按照古巴的模式在企业、机关和农村建立保卫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同城市和农村联合组建的人民警察部队紧密联合，协同活动。不过，采取这些措施的效果将取决于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掌握和支配必不可少的一批武器。

苏联驻埃塞俄比亚大使 拉塔诺夫 (签名)<sup>②</sup>

① 霍谢·佩雷斯·诺沃阿，古巴驻埃塞俄比亚大使。

② 文件上有标注：“苏共中央国际部情报资料部部长已阅。(签名)”

№06152

阿勃拉西莫夫关于民主德国党代表团  
访问索马里致波诺马廖夫的报告

(1977年2月18日)

机密

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馆  
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同志

寄上秘密获得的关于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  
兰贝茨同志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访问索马里、莫桑比克  
和埃塞俄比亚（今年1月31日至2月11日）的报告。

附上第41页，机密。

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 II. 阿勃拉西莫夫（签字）

附 件

机密

1977年2月18日

译自德文

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代表团1977年1月31日至2月1日  
访问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报告

应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领导人邀请，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

记维尔纳·兰贝茨为首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代表团于1977年1月31日至2月1日在摩加迪沙逗留。代表团的成员有：中央委员库尔特·蒂德克、候补中央委员埃伯哈特·海恩里希、中央副部长弗里德尔·特拉贝。

代表团受委托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的信转交给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总书记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西阿德·巴雷，该信是对他1976年11月24日信的复信；签署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与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1977~1978年度合作协议。

穆罕默德·西阿德·巴雷接见了代表团，同他进行了详谈。

维尔纳·兰贝茨转达了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的问候并对他的信作了说明。当时他阐述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对索马里的进步发展的观点，并通报了我们的领导人根据斯多夫同志在索马里和萨曼塔尔同志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会谈结果所做出的决定。宣布德国统一社会党将一如既往给予索马里共和国以力所能及的援助。当时特别指党的协议。

穆罕默德·西阿德·巴雷感谢埃里克·昂纳克的信，并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现的同反帝解放斗争的团结表示感激。索马里认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工作队在培训专家方面所给予的援助是特别有益的。穆罕默德·西阿德·巴雷详细介绍了索马里的国内形势，并特别强调实现党纲过程中的困难。

鉴于维尔纳·兰贝茨关于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的意见，巴雷首先确认和平解决与埃塞俄比亚问题的必要性。但同时可以看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矛盾的，没有摆脱民族主义的特点。他表示怀疑埃塞俄比亚发展中的革命性质，断定埃塞俄比亚领导人是与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有联系的沙文主义者。埃塞俄比亚的进步力量，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在受到迫害和被消灭。

在继续谈话过程中，特别是在阐述我们关于必须协调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进步力量和不能给帝国主义者从两国分歧中获得好处的任何机会的观点之后，巴雷宣布他准备认真研究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特别是门格斯图的任何建议。（附录1）。（在索马里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大使在内的代表团会晤时，苏联驻摩加迪沙大使向我通报说，一月末勃列日涅夫同志也给西阿德·巴雷发去一封信，信中内容包括坚决请求巴雷审视索马里对埃塞俄比亚的立场并避免任何激化）。

在讨论德国统一社会党提出的党的协议草案时，从一开始下述方面便一清二楚：我们两党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合作是该协议的主要内容，这种合作又是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所有关系的核心。但是以政治局委员阿赫默德·苏莱曼·阿卜杜拉为首的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代表团提出大大超过德国统一社会党可能性的要求（建立5所带全套设备的党校，供应82个区党委的无线电设备，提供印刷机器，接纳过多数量的学员去德国统一社会党高等院校学习，等等），这些要求是不能接受的。尽管他们提出这些不现实的要求，仍然签署了协议，该协议是现实的，是对索马里党的巨大援助和支持。（附录2）。

有一点惹人注目：在我们代表团浏览市容和关于党的协议会谈时不止一次地提到索马里从中国得到怎样的援助和支持。

根据来自索马里领导层中的不同情报表明，除了强有力的进步核心外还有一些亲华势力，他们倾向反动的阿拉伯国家方面。（去年索马里被接纳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成为该组织最年轻的成员国）。

№06151

## 萨姆索诺夫同索马里总统西阿德谈话纪要

(1977年2月23日)

机密

摘自萨姆索诺夫日记

1977年3月11日

苏联驻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大使馆

今天拜会了西阿德<sup>①</sup>总统。

受委托向他通报了苏联领导人和勃列日涅夫同志本人关于埃塞俄比亚周围局势的想法。

总统感谢向他通报，然后他说，在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某些受外部挑唆的集团乘机造谣惑众，说什么苏联同埃塞俄比亚的合作是靠损害苏联与索马里的关系实现的。用西阿德的话说，他因此不得不在军事学校的演说中谴责这种观点，宣布在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反苏言论被看做是旨在破坏索马里革命的反索马里的宣传。总统强调说，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埃塞俄比亚革命的援助不仅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他指出，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苏联竭力帮助埃塞俄比亚确立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此种情势下，苏联的目标与索马里的利益完全符合。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关心的是同我们相毗邻的国家成为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sup>①</sup> 穆罕默德·西阿德·巴雷，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



在评价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门格斯图时，西阿德总统称他是埃塞俄比亚进步改革的坚定的和始终不渝的拥护者。但是门格斯图，用西阿德的话说，在解决民族问题中不遵循列宁主义原则。他应该给各民族，其中包括厄立特里亚人和居住在欧加登的索马里人以自决权。按总统的意见，现在正需要门格斯图下决心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解决领土问题，那怕是宣布准备将来肯定研究这一问题。西阿德断定，埃塞俄比亚领导层内争权的斗争在继续，在该国国家机关中似乎没发生任何积极的变化。总统认为，门格斯图不希望同他会见。这里他指的是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并未对由坦桑尼亚副总统琼布带去的尼雷尔总统的信件立即给予答复，据西阿德说，该信中提出他同门格斯图会晤的想法。

在回答苏方想法中提出的某些负责的索马里代表人士在苏丹发言的意见时，西阿德总统断言，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莱曼仅仅阐述了对埃塞俄比亚事件的观点，而卫生部长拉比勒·戈德似乎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他的发言好像是受苏丹人的煽动而为之。总统指出，埃塞俄比亚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索马里民主共和国，而是来自苏丹、埃及、沙特阿拉伯和肯尼亚。西阿德说，据可靠情报，以总部设在伦敦的埃塞俄比亚民主联盟为代表的国内反动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正认真准备针对临时军事行动委员会及埃塞俄比亚其他进步活动家进行广泛的恐怖行动。西阿德否认在索马里领土上专门培训包括索马里军人在内的部队开始奔赴欧加登。总统强调指出，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不打算因欧加登同埃塞俄比亚开战。假如发生冲突，定会损害两国利益，而帝国主义者和阿拉伯反动派将坐收渔利。西阿德同志说，我们对此一清二楚。但是总统强调说，我们将支持居住在欧加登的索马里人争取同自己祖国合并的斗争。他说，欧加登的居民，我们的兄弟姐妹，向我们求援，我们不能拒绝。假如索马里领导人阻止索马里人挣脱埃塞俄

比亚殖民主义枷锁的斗争，那索马里人民是不会理解他们的。

我向西阿德总统解释了苏共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

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索马里与美国接触的问题时，总统讲了自己于1977年2月初在桑给巴尔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扬格会晤的情况。他说，这次会晤是应美国人的请求进行的。用西亚德的话说，扬格向他通报了卡特政府对非洲政策的“新姿态”，强调美国准备同所有非洲国家合作。扬格被告知，各国人民将根据美国政府的实际评价美国的“新”政策。英国首先必须拒绝支持南非白人少数人制度。在回答扬格提出的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为什么总是坚持反美国立场问题时，西阿德说，美国自己推行恶毒的反索马里政策。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坚决谴责美国的近东政策，以及他们在反对进步制度斗争中给予反动势力的支持，谴责在地球不同地点挑起军事冲突。

总统通报说，不久前一位美国国务院的代表从喀土穆来到摩加迪沙。他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外交国务部长阿布杜拉赫曼·贾玛·巴雷会见。美国人请求按他们选择安排同索马里几位国务活动家，包括副总统萨曼塔尔的会见。对此他遭到拒绝。用总统的话说，美国人从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扫兴而归。

根据西阿德总统的建议谈及索马里与苏联之间的合作时，他重提他先前（1977年1月17日）提出过的请求让苏联在法诺勒方案基础上着手开发土地。用总统的话说，索马里既无专家、技术，也无为此所必需的资金，而邀请其他国家来完成该工作并不完全正确。西阿德说，关于开发土地的条款未写入法诺勒建筑方案的协议是因为签署该协议的索马里代表是外行。

总统还提到1976年12月第一副总统萨曼塔尔在莫斯科转交的便函中提出的关于在摩加迪沙地区建设海军基地和在柏培拉及其基斯马尤建设浮动码头的请求。这些计划方案仍然有效，我们期待苏

联政府积极审核。

在谈到不久前交付使用的柏培拉空军机场时，西阿德说，该项工程虽然完工，但未考虑到它可能用于民用航空港的前景。飞机场不仅应该为苏联、而且应该为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服务。他指出，为了使飞机场将来能用于民航，必须在那里建调度站、过境旅客大厅以及其他现代化机场所必需的勤务部门，在市区内还应建一座200~300个房间的宾馆，苏联飞机和舰艇人员也可以在此停留。这些补充建筑物是对军事项目飞机场的一种掩饰。

西阿德总统在对苏联援助组织渔业合作社给予高度评价后提出一项请求：让苏联方面以商品贷款形式划拨资金以补偿地方在这些合作社中的支出，因为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实现这些计划方案中无论是物质还是财务资金都严重不足。总统指出，索马里政府特别请求苏联临时支付合作社移民家庭的最低生活费用，给每个工作人员每天发10先令。用总统的话说，他已指示相应的索马里组织就他谈到的问题准备正式申请书。

西阿德对苏共中央决定对建设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党校给予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他把这种援助看做是苏共对经历困难的建党初期的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兄弟关怀的表现。总统同时还感谢莫斯科研究了关于补充接纳吉布提出身的索马里公民入学并寻找机会在1977~1978学年度满足学习的要求。

苏联驻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大使 Г. 萨姆索诺夫

№06150

## 苏驻索马里大使馆关于索马里革命的报告

(1977年3月11日)

机密

苏联驻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大使馆

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是1976年7月1日由党的成立大会宣布成立的，在建党过程中已开始发展国际联系。

第一，在实现反帝外交政策（其原则和方针在1969年10月第一个革命宪章中已制定）和在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方针（根据1970年10月的第二个革命宪章）过程中最高革命委员会通过6年半的活动积累了大量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非洲和近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密切友好合作的经验。

同苏联的合作具有特殊的意义。1974年10月21日最高革命委员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党的决议。此前已实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与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阿德·巴雷的互访，苏联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生效。最高革命委员会委员们直接参加苏共组织的纪念列宁百年诞辰和苏联成立60年思想政治和理论方面的重大活动，以及苏共24大的工作。苏共对培训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干部的帮助，最高革命委员会同苏共中央的接触，西阿德·巴雷本人亲自参加苏共25大的工作，苏联对制

定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纲领性文件的帮助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在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纲领中所强调的那样，“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最高革命委员会以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利用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满怀信心地引导国家沿着业已选择的道路前进”。

第二，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的建立过程尚未完全结束。在企业、合作社、国家机关、学校、武装部队正在继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小组。根据已掌握的情况看，该阶段计划到今年7月以前结束，然后根据现行党章和载入党章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召开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自然，随着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的成立，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利用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卓有成效的新形式——国际联系上。这是因为必须提高双边合作业已达到的水平，因为索马里方面理解在解决这些问题中苏共和兄弟党所起的作用，还因为在索马里社会的政治发展中所取得的实质性进步以及在完成执政的先锋党的建设有关的任务时需要国际主义援助。

1976年8月初在莫斯科以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政治局委员、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萨曼塔尔为首的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同志的会谈具有重要意义。索马里方面支持苏共中央在主要国际问题，其中包括非洲问题上的立场，因为这完全符合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纲领外交政策内容的原则。

在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纲领中指出，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国际主义原则”，其中可以看到，党的外交政策的任务之一就是“加强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与合作，发展同他们政府、党和社会组织的联系”。指出在这方面

存在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广泛合作所必要的条件，并强调指出“为了交流经验并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情报，继续和加强党的各级组织联系的重要性”。已就党建问题成功地交换了意见。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成员详细了解了苏共的工作经验。

1976年12月15日在莫斯科，M.A. 萨曼塔尔同波诺马廖夫同志的会晤时也涉及到党际合作问题。

在索马里革命7周年之际，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同志致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总书记、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西阿德·巴雷的贺词中强调指出，苏共与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之间联系的扩大将苏联与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之间合作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必将有助于苏联和索马里人民的接近。应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的邀请，以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塔吉克共产党中央书记Ю.И. 波卢卡罗夫<sup>①</sup>为首的苏共正式代表团，首次参加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节日庆祝活动。

苏共中央负责工作人员小组根据已达成的协议在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工作了1个月。该小组在党建问题上给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以很大的帮助，并与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代表们共同研制1977~1978年度党际合作计划，该计划从1977年1月起开始生效。考虑到索马里方面的愿望，计划中所提出的措施旨在谋求苏共方面对在培训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政治和意识形态干部，研究并实际掌握在党建和党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导方面经验中给予有效的援助。

党际合作计划已开始贯彻执行。今年1~2月份，以索马里革

<sup>①</sup> 原文有误，应为 Ю.И. 波卢卡罗夫 (Ю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орокаров)。1951年参加苏共，1975年任塔吉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二书记。

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奥马尔·萨拉德为首的由35人组成的第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小组来到苏联。小组成员包括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员、省和地区党委书记以及社会组织活动家。在莫斯科和阿塞拜疆为他们提供了学习苏共实践经验的广泛可能性。今年2月份，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学校社会科学教师小组被派往苏联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0人，原计划20人）。今年3月初准备派以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中央畜牧业和农业问题部部长阿赫默德·穆罕默德·杜阿勒为首的由35人组成的第二个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党中央、省和地区党委）负责工作人员小组学习苏共经验。计划还规定苏联连续分期分批地接待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负责工作人员小组（每组10~15人）以学习苏共在党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工业和农业以及群众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同时还规定向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派遣社会科学教师 and 现代革命运动问题讲师小组，互换党中央刊物编辑和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代表团。

近几天来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审议并通过了苏联方面提出的按苏联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所有社会组织系统纪念1977年综合合作计划。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还积极审议并原则上解决了关于建立组织和领导在索马里筹备和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60周年一切政治活动全国委员会的问题。

在同苏联大使馆代表的接触时，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负责人表示索马里方面对进一步加强同苏共联系关心，强调了苏共实践经验对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意义以及（苏联）援助在培训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干部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将来签订苏共与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之间党际合作协议的愿望。

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建立起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系。尚在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成立前夕，索马里民主共

和国最高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就参加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九大”。在1976年7月19日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贸易代表团时，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总书记伊斯梅尔·阿里·阿布卡尔强调指出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交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党纲问题方面经验的必要性。在维利·斯多夫（当时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访问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中央委员、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司法和宗教事务部长阿布迪萨拉姆·谢克·侯赛因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后来在12月份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第一副总统萨曼塔尔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期间，以及在今年1月末初2月初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维尔纳·兰贝茨访问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期间，研究了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之间的党际合作问题。以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卡迪尔·哈吉·穆罕默德为首的较大的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小组（总共30人）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学习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实践经验。两国之间工会、青年、妇女组织系统的联系取得顺利发展。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副总统伊斯梅尔率领最高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参加古巴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他在哈瓦那同苏共代表团领导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同志和古巴领导人的会晤和谈话，无论对加速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的成立，还是对将来的党际合作，特别是同古巴共产党的合作，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法杜米·奥马尔·哈什1976年9月访问古巴期间就这些问题举行了预备谈判。双方决定在古巴的圣地亚哥省与（索马里）下谢贝利之间的地方党组织系统建立友好联系。两党之间的合作协议1976年12月于哈瓦那在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第一副总统萨曼塔尔访问古巴期间正式签订。

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党际合作问题，在1976年12月政治局委员、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第一副总统萨曼塔尔访问这些国家期间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之上，但是除了准备促进各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以及情报领域的合作以外，这些问题迄今尚未得到具体解决。在1976年10月以国防部副部长、匈牙利军队总参谋长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期间，同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领导人除了其他问题外还讨论了发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之间联系的前景。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同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缺少接触。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领导人邀请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派高级党政代表团访问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但是越南同志们认为目前派遣这样代表团不可能。

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暂时尚未同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联系，尽管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在致这两个党领导人的公函中，西阿德·巴雷对他们的活动给予高度评价（一封是1976年10月24日致华国锋的，另一封是1976年10月9日致金日成的）。在致金日成的公函中特别写道：“我们希望存在于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为了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将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大使张士杰在公开讲话中呼吁建立中国共产党与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些是事实，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仍未超出国家关系的范围。这从不久前由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签订的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交流情报的两个协议中可以看出。后者称上述协议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协议”，但他们是由政府机关签订的，而不是党的代表签订的。

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积极发展同非洲各国人民革命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

在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与贝宁人民革命党之间已经建立密切友好联系。1976年7月初，对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成立第一个访问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外国高级党政代表团（以贝宁总统、人民革命党主席克雷库为首）给予热情接待；签订了党际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以党中央委员罗杰·加尔巴为首的贝宁党—青年代表团一行114人），应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邀请访问索马里民主共和国3周。在索马里和贝宁联合宣言中双方表示对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给予战斗的声援，支持本大陆一系列国家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采取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方针，强调指出伪社会主义理论的危险性。宣言中指出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原则针对索马里和贝宁条件的创造性运用才能保证两国社会进步的顺利发展；双方高度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积累起来的建设新社会实践经验的意义，呼吁非洲各国加强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团结和紧密合作。宣言中着重指出在非洲积极开展反对传播资产阶级和种族主义思想斗争的必要性，还强调这一斗争应该同实现一些具体措施紧密联系起来，即对于迄今尚带有新殖民主义性质的民族干部教育和培训系统实行根本性改造。鉴于有小批雇佣兵袭击贝宁，西阿德·巴雷致电克雷库表示坚决声援贝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斗争，并准备立即给予一切物质援助以捍卫贝宁革命的胜利成果。

非洲统一组织及其机关为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保持同通常是政党领导的非洲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经常接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在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成立后有机会同诸如萨莫拉·马歇尔和多斯·桑托斯（莫桑比克）、阿格斯蒂纽·内图（安哥拉）、朱利叶斯·尼雷尔和琼布（坦桑尼亚）、乔舒阿·恩科莫（津巴

布韦) 这样一些进步非洲著名的政治家以及马尔加什共和国、刚果、赞比亚、布隆迪等国活动家会晤并谈话。

在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成立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进步的政党,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安哥拉改造的前景以及在其他非洲国家类似的发展趋势, 极大地鼓舞了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这不仅有可能加速非洲摆脱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桎梏, 通过共同努力, 利用共同经验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造方面的问题, 而且有可能使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能够保证自己在非洲进步力量中的先锋作用和崇高威信, 也有可能使他们在解决我们同邻国关系中的特殊问题上支持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今年2月初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三大”发言中, 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副书记、代表团团长伊斯梅尔·阿里·阿布卡尔特别宣布说, 这次代表大会“对于索马里人民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因为它为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之间合作和交流经验开辟新的前景, “这种关系必将按党的系统和群众组织系统得到扩大和发展, 并将进行更高形式的兄弟合作”。以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总书记西阿德·巴雷为首的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代表团参加了在坦桑尼亚举行的纪念坦葛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与非洲阿弗罗·什拉兹 (Афро Ширази) 党合并为坦桑尼亚革命党大会。在会谈期间特别审议了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与坦桑尼亚革命党之间的合作问题。

以乔舒阿·恩科莫为首的津巴布韦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访问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

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在调整同一系列阿拉伯国家进步政党的国际合作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步骤。在1976年7月以伊拉克共产党第一书记阿齐兹·穆罕默德为首的伊拉克共产党代表团访问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期间签订了关于党际联系的议定书, 规定交流党的工作经验的情报, 同时规定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与伊拉克共产

党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合作。但是这项协议实际上未能实现，看来主要是因为伊拉克共产党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关系中出现困难，后者缺少同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类似的联系，同时因为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领导人希望避免出现不利于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与伊拉克发展国家关系的因素。

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开始同统一政治组织—民族阵线（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积极合作。在统一政治组织—民族阵线政治局委员、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萨利赫·穆提厄访问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以及1976年7月14日在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举行的会谈期间签订了两党之间，特别是在培训党的干部、意识形态工作、情报以及对敌宣传斗争方面的合作协议。

1976年11月，在以统一政治组织—民族阵线总书记法塔赫·伊斯梅尔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访问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期间，再次全面讨论了两国党际与国家间合作的问题。决定建立混合委员会，其任务是保证完成党际合作方面的相应措施，同时还初步拟定两国社会组织间积极合作的措施。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1976年12月底，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第一副总统萨曼塔尔访问了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但是后来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两党之间的合作实际上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对待支持埃塞俄比亚进步制度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与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领导人所持的特殊立场是对立的。

至于谈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领导人认为应当优先发展国家间、社会组织间以及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范围内的关系和合作。这也关系到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接待了该党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代表团，但是他们的谈判仅限于在上述范围内的合作问题。这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内复杂的关系和矛

盾倾向，各国和各政党之间的分歧，他们对待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利益的不同态度，以及国家领导人尚未放弃打算让某些阿拉伯国家帮助索马里民主共和国解决同邻国的领土纠纷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也希望得到财政援助，但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别。有一个例外：同苏丹社会主义联盟的某些接触多半带有临时性。

在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其他党际联系中，同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值得注意。以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地区党委书记希齐林·阿基勒·奥凯托为首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了纪念索马里革命7周年的活动。1976年11~12月，应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意识形态局邀请，意大利共产党党员，意共政治学校教授费达拉里在摩加迪沙和一些州对党的、工人和社会的积极分子以及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们讲课。在讲课中宣传所谓“历史妥协”，同社会民主主义合作等思想。今年1月，应同贝纳迪尔州有联系的伦巴第省省长的邀请，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贝纳迪尔省委书记阿布拉拉斯访问了意大利。原定10天的访问继续一个多月。在意大利访问期间阿布拉拉斯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会晤。回到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后他倡议增加索马里同意大利各省合作州的数量。

分析现有实际材料表明，意大利共产党在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活动客观上有助于加强意大利在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影响，也是对意大利私人资本渗透入该国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覆盖物。近来意大利各种访问索马里的代表团数量增加了，而且向他们提供了同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从中央到地方党和干部接触的广泛可能性。虽然如此，但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仍赞成意大利共产党的上述观点及其他某些意识形态立场。

同其他一些党也有过个别联系，其中包括接待德国共产党代表团。

以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局局长阿登·谢克为首的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代表团，积极参加了1976年9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非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

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在同共产党及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同志式合作实际活动方面，以及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在国际形势、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基本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表明，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先锋党的领导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自己国际政策中坚持了国际主义原则。但是事实也说明，近来在该政策中民族主义的倾向正在加强。这一点特别明显，例如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领导人顽固地拒绝对埃塞俄比亚进步的社会经济改造进行客观的阶级分析，在对待该国的革命制度上拒绝实行阶级政策，在民族主义基础上同阿拉伯右翼和反动制度接近，明显企图将非洲反对殖民主义武装斗争口号也转移到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境外索马里人居住的领土，其中包括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领土上，借口说什么他们仍处于殖民主义的附庸地位。

在促进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政策中这种倾向的原因中应当指出的是：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国内困难的经济状况；一部分人民群众对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社会政策的效率失望；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缺乏对国际主义政策应有的经验及对不可分割的国际主义利益和民族利益一致性的正确考虑。这些和其他因素促使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内部和党的领导层中民族主义的立场活跃起来。但是对这些问题要求进行补充分析和更加详尽的分析。

苏联驻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二秘 H. 加耶沃伊（签字）

№06120

## 西尼岑与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巴依耶的谈话纪要

(1977年3月18日)

摘自西尼岑的日记

今天晚上应别尔哈努·巴依耶<sup>①</sup>的要求，到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总部拜会了他。

受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领导的委托，他要我转告莫斯科以下内容。

1. 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鲁贝伊参加的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和西阿德·巴尔列3月16日在亚丁举行的会谈，因西阿德·巴尔列在会谈中持有的立场，以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而告终。

如别尔哈努·巴依耶所说，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高傲地重申索马里对埃塞俄比亚的领土要求，称埃塞俄比亚为“殖民主义大国”，并宣称索马里将继续坚持以前对埃塞俄比亚的政策，直到全体索马里人获得自由。西阿德·巴尔列对门格斯图·海尔极不尊重，粗暴地说后者执行的政策似乎同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政策没有两样。索马里领导人还说，如果埃塞俄比亚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它就应当立即把欧加登交还索马里民主共和国。西阿德·巴尔列提出在“民族基础”上建立两国邦联，即埃塞俄比亚先把欧加登交还索马里作为协调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纠纷的基础。这一建议不仅

---

<sup>①</sup> 别尔哈努·巴依耶少校，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受到门格斯图·海尔的拒绝，而且菲德尔·卡斯特罗和鲁贝伊也表示反对这种办法。这是西阿德·巴尔列表示对他们尊重的原因。

据别尔哈努·巴依耶说，在会谈过程中西阿德·巴尔列说，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想同索马里绝交，那就随他们的便。索马里人民自己完成了革命，没有外援。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援助索马里人，那么反动派国家能援助他们。

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在亚丁会谈中，强调必须团结这一地区的进步力量，共同反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活动。而且他强调说，没有其他进步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是不能顺利发展的。

别尔哈努·巴依耶说，尽管会谈的结果是这样，埃塞俄比亚领导仍然认为，会谈给埃塞俄比亚带来无可争辩的外交胜利，因为明显地，而且在古巴和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领导人面前暴露了索马里不仅对埃塞俄比亚，而且对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共同任务的真实立场。据别尔哈努·巴依耶的看法，他说古巴同志也这样认为，在会谈中西阿德·巴尔列对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采取如此不调和的立场，显然事前得到反动的阿拉伯国家的允许和支持。

2. 别尔哈努·巴依耶继续说，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领导认为，亚丁会谈结果公之于世后，索马里同反动的阿拉伯国家密切合作的反埃塞俄比亚的活动预计会大大活跃起来。据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从摩加迪沙得到的消息，苏丹总统尼迈里近日到达索马里。因此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注意到埃及报纸《阿里·阿赫拉姆》关于在目前条件下出现了索马里参加苏丹、埃及和叙利亚政治联盟的可能性的报道。别尔哈努·巴依耶指出，众所周知，沙特阿拉伯继续争取索马里中止同苏联的合作，包括军事合作，许诺给予索马里人必要的援助。

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警惕地注视着索马里武装团伙加强向欧加



登的渗透，而且现在这些团伙中有改穿便衣的携带现代化武器的索马里军人。别尔哈努·巴依耶指出，由此可见最近在哈拉尔地区和基基加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的极不寻常的性质，在冲突中索马里人毁坏了数辆埃塞俄比亚军队的装甲车。3月17日索马里空军“米格”歼击机在基基加地区埃塞俄比亚领土上空进行多次挑衅飞行。

根据以上所述，别尔哈努·巴依耶要求把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的请求转告苏联政府：采取可行的措施制止索马里的反对埃塞俄比亚的行为。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不排除这种可能，即索马里现在可能正准备对埃塞俄比亚进行严重的武装挑衅，因此如能从苏联方面得到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则不胜感激。

从我们方面我请别尔哈努·巴依耶注意，在这种形势下埃塞俄比亚必须克制。接着，我强调了苏联全面支持埃塞俄比亚革命的原则路线，最近对与埃塞俄比亚毗邻国家采取的外交措施。

别尔哈努·巴依耶说，埃塞俄比亚不想使自己同索马里的关系尖锐起来，也不想持强硬的立场。他满意地指出苏联对埃塞俄比亚革命的支持，特别强调了开始供应苏联武器的意义。

3. 据别尔哈努·巴依耶说，现在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面临的尖锐问题是：要不断地供应埃塞俄比亚军队弹药和现有武器的配件。美国人以由于这种或那种武器涨价须修改一些合同为借口，拖延以前议定的这类供应以及商业性的武器供应。也不能排除美国完全停止这种供应的可能性，从而置埃塞俄比亚武装力量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领导依然指望苏联给予埃塞俄比亚必要的全面军事援助，但他们明白掌握苏联的武器需要时间。因此现在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急于寻找搞到美制武器、弹药和配件的途径，因为现在埃塞俄比亚军队是美国武器装备的。

别尔哈努·巴依耶说，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最近派代表团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越南有大量美国武器配件。代表团应于下

周到达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因此，别尔哈努·巴依耶代表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希望苏联方面说服越南同志，尽可能用美国武器给予埃塞俄比亚以必要的援助或无偿援助；如不能无偿援助，也向我们出售。而且他指出，和以往不同，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拟直接同越南人讨论这一问题，而不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介。

从我这方面我答应按要求转达别尔哈努·巴依耶所说的希望和请求。

在会谈结束时别尔哈努·巴依耶提出个人的请求，希望苏联能有一所高等学校接受他的弟弟阿卜拉哈姆·巴依耶（19岁）入学。反革命分子，包括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说阿卜拉哈姆和“法西斯团体”有亲属关系，要杀害他，因此阿卜拉哈姆不能上学，不得不在朋友（费谢赫·巴依耶，律师）处躲藏。在这种情况下希望能尽快送阿卜拉哈姆去苏联。他的文化程度为中学六年级（毕业年级），但是因为他现在不能上课（他在家里向老师学习）和考试，所以看来他不能得到正式的中学毕业证书（他在文格塔中学学习，不久前那里由英国教师执教）。

我对别尔哈努·巴依耶说，他所说的希望和关于他弟弟的情况我一定告知苏联大使。我个人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须向苏联有关主管部门进行咨询。

苏联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C. 西尼岑

№06104

西尼岑与美国驻埃塞俄比亚政务  
参赞马林的谈话纪要

(1977年5月9日)

摘自西尼岑的日记

今天在巴基斯坦大使馆招待会上，马林（代替临时代办，因后者去阿比让参加美国大使会议）就埃塞俄比亚—美国关系讲了以下情况。

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关于在4月末关闭一些美国在埃塞俄比亚的机构（军事顾问团、战略无线电中心和阿斯马拉领事馆、美国高分子化合物生物实验室和阿基斯—阿别巴讯息中心）的决定，以及自今年5月1日起终止1953年签订的《关于互相保证安全》的协议（美国大使馆收到了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关于这一问题的普通照会）是美国没有预料到的，因此提出了关于制定美国在这种条件下对埃塞俄比亚的新方针问题。马林说，新方针还没有制定好。尽管埃塞俄比亚当局对上述美国机构工作人员表现出应有的礼貌，除报刊宣传外，这里没有发生任何敌视美国公民的行动。但美国大使馆还是认为，美国将难于同埃塞俄比亚现政权保持稳定的公务关系。可能美国要撤出这里的经济援助使团。显然也将完全终止军事方面的联系，尽管现在在美国还继续培训一些埃塞俄比亚军事人员（飞行员等）。在现有情况下华盛顿可能不急于任命美国驻亚的斯亚贝巴新大使。

据马林说，但是所有这些都并不意味着美国准备撤出埃塞俄比亚，因为美国考虑到这个国家对美洲大陆和重要的红海战略地区的意义。美国和从前一样，反对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分离出去，赞成红海航运自由，关于这一点美国政府不止一次向埃塞俄比亚政府声明过。与此同时，美国对埃塞俄比亚同邻国的关系可能发生危机，对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明显的不信任，深感不安。

马林认为门格斯图访问苏联是“苏联的成功”，是埃塞俄比亚现政权优先向苏联倾斜方针（首先是军事方面，特别是购买现代化武器方面）的反映。他认为，但是埃塞俄比亚—苏联的接近可能使苏联同索马里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复杂化，从而加剧这一地区的不稳定。

我对马林说，我们对埃塞俄比亚的政策具有原则性，即不针对第三国，符合加强这一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利益。

注：在同我们的私人交谈中美国代表没有掩盖对埃塞俄比亚最近的反美行动的激动，对美国对这个国家的下一步方针没有信心，因为华盛顿意见纷纭。在西方人的谈话中还流露出一种说法：现在还不清楚，苏联能不能承担援助埃塞俄比亚的全部重担。

显然，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一方面破坏埃塞俄比亚革命，另一方面还想保留对这个国家的一定影响。比如，最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所属的国际发展会决定向埃塞俄比亚提供无息贷款 4000 万美元，用于道路和水利建设。

苏联驻埃塞俄比亚公使衔参赞 C. 西尼岑

№06084

## 外交部关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领土争端 及苏联立场的简要报告

(不早于1977年5月19日)

(简要情况)

索马里正在觊觎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领土(欧加登区),其理由是有大量的索马里人生活在那里(100万人左右)。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索马里还是意大利殖民地的时候,就第一次提出了确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边界问题。由于在反对埃塞俄比亚战争中遭受失败,意大利政府于1896年通过其代表切萨雷·涅拉济尼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曼涅里克二世<sup>①</sup>签订了和平条约。在该条约的基础上于1899年签订了关于意大利殖民地同埃塞俄比亚确切边界线的协定。然而,在同切萨雷·涅拉济尼谈判过程中,曼涅里克二世仅在地图上划了一条埃塞俄比亚领地同意大利殖民地(索马里)的分界线,在协定中并没有规定这条线就是边界线走向的条款。

1908年又重新提出了边界问题,因为,在5月16日签订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划界协议时,主要是根据种族划界的,而在他们游牧的生活方式条件下,这种划界法是极不清楚的。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30年代初。1931年意大利在离印度洋沿岸约180海里处单方面地竖立起界标,“强占”了东非洲靠近索马

<sup>①</sup> 曼涅里克二世(1844~1913)1889年登基为埃塞俄比亚皇帝。1909年因病实际上已不问政治。

里的领地、埃塞俄比亚欧加登省的部分地区，这就是意大利于1934年的12月与乌阿尔-乌阿尔地区挑起边境事件的借口，结果爆发了1935~1936年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的战争，随后意大利人便占领了埃塞俄比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从埃塞俄比亚赶走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之后，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法属索马里除外）的大部分领土处于不列颠军事行政当局的管理之下。1954年12月，英国政府同埃塞俄比亚签订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英国军队撤出欧加登省，然后恢复埃塞俄比亚对该地区的管辖权。与此同时，协议谴责了索马里的当地居民有权使用欧加登地区牧场的说法。

可见，埃塞俄比亚的部分领土，人所共知叫做欧加登地区，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成为意大利索马里的领地，或者是联合索马里部落建立什么国家的成员。

1960年索马里政府宣布独立之后，不承认规定他们同埃塞俄比亚划定边界线的条约，因为，认为这些条约的签订没有索马里人参加，他们具有殖民主义者的性质。

根据同索马里的边界线是上述一些国际条约划定的这种情况，埃塞俄比亚人在全力批驳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对领土的觊觎。他们另外的借口就是1964年在开罗通过的非洲统一组织决议，因为，该决议提出，所有非洲国家都应该承认他们获得独立时存在的边界线。

1964年初，领土之争尖锐起来，结果导致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公开的武装冲突，不过，经非洲统一组织的调停，冲突很快就平息下来。苏联政府对双方都提出，要求立即停火，应该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所有争议问题。这也同样使得冲突缓和下来。

1970~1971年间，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进行了一连串的谈判，但都毫无效果。1972年底至1973年初，发生了一系列的边

境事件（在乌阿申、邦戈尔、杰洛以及其他等地区），这些事件通过和平手段都得到妥善解决。

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相互关系的紧张不止一次地引起非洲统一组织的关注。然而，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领土之争，在非洲统一组织框架范围之内寻找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努力，暂时还没有结果。

1976年1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全体大会的例会期间，根据西阿德·巴雷的倡议举行了两次他们同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代表之间的会晤。在会晤期间提出了双方的关系问题。双方领导人都确认，交换意见是有成效的，因此，表示希望继续对话。

索马里的领导人虽然也强调，问题的解决应该采取和平的手段，通过谈判，但是，仍然像以前一样不放弃要求欧加登重新同索马里合并。在索马里的报纸和刊物上开始出现一些有反埃塞俄比亚倾向的文章，在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居民中煽起民族主义情绪。根据现已掌握的资料，索马里人在欧加登地区继续活动，派去一些由自己基于军官指挥的武装队伍。

埃塞俄比亚的新领导一方面拒绝讨论领土问题，一方面做好一切准备就划清现有边界进行谈判，另一方面还表示支持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发展经济、文化和其他等联系。

1977年3月16日，西阿德总统在亚丁举行同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会晤，当时参加在座的有卡斯特罗和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别伊阿里。

门格斯图要求西阿德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去对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因为，他们无论是对埃塞俄比亚，还是对索马里所造成的威胁都是一样的。而西阿德却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提出了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是欧加登地区并入索马里。他

要求立即解决移交欧加登问题，随后就成立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联邦国家。西阿德在会晤时宣布，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领土问题上不支持索马里，那么他被迫就得求助于阿拉伯和西方国家。

南也门的代表提出建议，组建一个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南也门和古巴等高级代表参加的协调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争端问题委员会。西阿德拒绝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不过，到目前为止，该建议继续有效。

两国之间的关系同时还由于吉布提问题 - 法国的阿法尔和伊苏斯领地更加复杂起来，因为，法国打算在本年之内让该地区独立。该地区对埃塞俄比亚切身利益关系重大，因为，吉布提是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线的终点站，埃塞俄比亚的主要对外运输都是通过这条线路实现的。至于说索马里人，自认为法国阿法尔和伊苏斯领土，或者他们把这一领地称作“法属索马里”，是“大索马里”五个地区（过去的英属索马里、意属索马里、肯尼亚的东北省、欧加登、吉布提）中的一个地区，其居民大部分是由同索马里人有血统关系的部族组成。

在联合国大会第 25 次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议证实，吉布提人民无条件地享有刻不容缓的、绝对独立的权力，同时，还号召所有国家“对这一地区应放弃任何性质的覬覦，并宣布对支持这一类企图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无效”。无论是埃塞俄比亚，还是索马里都是投票支持这一决议的。

与此同时，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政府不掩盖自己的希望，希望吉布提的居民独立之后，能表示同意同索马里合并。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第 13 次全体会议（1976 年 7 月）就透露了这一点。会上索马里的代表就不支持埃塞俄比亚关于共同宣布放弃贪图领土的要求，并确信，吉布提的主权不应该受“来自列强保证人警察行动威胁”的支配。1976 年 12 月西阿德总统对一些非洲国家元首更明确地宣



称，“如果这些保证条件的目的是强迫索马里放弃联接我们同吉布提人民的血缘关系、历史和文化的共同性，那么我们要声明，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索马里，同埃塞俄比亚一样都投票赞同1976年11月23日联合国大会第31次会议通过关于吉布提问题的决议，该决议重申该地区的人民享有独立的权力。在联合国两国的代表都声明，他们的政府都将承认、尊重和维护吉布提获得独立之后的独立、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可是，在联合国大会的例会上，在辩论的过程中，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的发言都表明，在解决吉布提的途径上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分歧，仍同以前一样很大。特别是在政治难民返回领地的问题上表现出这样的分歧来。埃塞俄比亚人指责索马里人说他们打算以本国公民为借口转送难民去吉布提，其目的是保证以后能把吉布提并入索马里民主共和国。

索马里领导人对厄立特里亚的态度同样也给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留下了消极的痕迹。如索马里支持埃塞俄比亚的分离主义者，看来他是指望厄立特里亚脱离埃塞俄比亚，进而导致多民族的埃塞俄比亚国家的分裂，这会使得欧加登地区更容易地并入索马里民主共和国。

最近，索马里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开展了反埃塞俄比亚的宣传活动，其目的是对埃塞俄比亚的新体制在立场观点上能预先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索马里政府认为，对索马里人来说，还应继续推行原有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政策”。去年，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副总统萨曼塔尔在对一系列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古巴进行访问期间就陈述过这样的观点。然而，在所有场合下，这一观点都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为了对谋求欧加登和吉布提能得到人们的支持，索马里在阿拉伯各国同样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索马里人同时

还指出，吉布提并入“阿拉伯世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国），会在实施变红海为“阿拉伯湖”的计划过程中答应提供给它诸多的好处。

阿拉伯的反动派支持和加强了索马里人的反埃塞俄比亚的情绪，其目的是给进步的埃塞俄比亚领导施加压力。1977年1月出境去喀土穆时索马里社会主义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苏莱曼就公开讲演，发表粗暴的反埃塞俄比亚的攻击性言论。苏莱曼公开表示支持厄立特里亚的分离主义者，同时还提出有利于非洲统一组织总部从亚的斯亚贝巴搬迁到另一个首都的建议。不久之前，苏丹和一些非洲国家根据就西方的理解也曾发表过类似的演说。

从60年代开始，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关系的尖锐程度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在加重，于是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就请求苏联政府对其他国家政府施加影响以达到局势正常化的目的。最近，无论是索马里，还是埃塞俄比亚都不止一次地提出支持苏联更积极地参与调节他们两国间的双边关系。同时，他们任何一方都认为，苏联支持的就是它的观点，借此从对方赢得自己的威望和友好关系。

1976年1月，西阿德·巴雷通报苏联政府关于他打算就组建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联邦问题同埃塞俄比亚领导进行谈判。为此，总统请求苏联一方充当谈判的调停人。既然联邦的目的和性质以及埃塞俄比亚可能采取的立场都不很清楚，于是就决定回避对我们之间关系主动权的裁定以及就此问题的调解。1976年11月西阿德·巴雷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即让苏联一方通知埃塞俄比亚的领导关于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同埃塞俄比亚就现有的争议问题开始和平对话的愿望。这一愿望通过苏联驻亚的斯亚贝巴大使馆已通知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政治外事事务委员会主席。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索马里做短暂停留期间，今年的4月初波德戈尔内在摩加迪沙同西阿德举行了会晤。西阿德表示已

做好准备继续寻求相互都能接受解决摆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面前问题的形式，并请求苏联协助促进他同门格斯图的会晤。

在今年5月4~8日，以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为首的埃塞俄比亚国家代表团正式访问苏联期间所进行的苏联和埃塞俄比亚谈判过程中，埃塞俄比亚一方通报了关于波德戈尔内同西阿德·巴雷会谈的情况。为了适应西阿德总统的愿望，我们建议门格斯图能提供良好的帮助在苏联组织和进行以确立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友好睦邻关系为目的的高级领导会晤。门格斯图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表示同意讲他与此有关的意见。可是，今年的5月19日在同苏联大使会谈时，西阿德总统却宣布，目前他没有准备好坐到谈判桌上同门格斯图进行谈判。

关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领土争论问题苏联不止一次地得到过两国政府的通报，苏联的态度是：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通过谈判调解其分歧并能找到缓和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关系紧张的途径。

苏联外交部第三非洲司<sup>①</sup>

<sup>①</sup> 该档案没有时间标识，这里的时间是根据文件内容推算的。

No 06155

## 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的 领土争端和苏联的立场（简介）

（不早于 1977 年 5 月 19 日）

索马里觊觎埃塞俄比亚的大片领土（欧加登地区），理由是那里居住着大量索马里人（约 100 人）。

埃塞俄比亚人断然拒绝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领土要求，他们的理由是，同索马里的边界已经国际条约，特别是经 1908 年埃塞俄比亚同意意大利签订的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划界协议确定。他们还援引 1964 年在开罗通过的非洲统一组织决议，该决议中说，所有非洲国家都应该承认它独立时存在的边界。

同索马里关系的紧张导致埃塞俄比亚帝国在反对索马里的基础上同肯尼亚的接近（索马里人拒不放弃让居住索马里人的肯尼亚北部边界地区同索马里合并的要求）。1963 年两国之间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

1964 年初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发生了直接军事对抗，但是在非洲统一组织的斡旋下这场冲突很快得到调解。苏联政府已向双方呼吁立即停火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

1970~1971 年间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这些谈判毫无结果。1972 年末至 1973 年初发生了一系列边界事件（在瓦申、邦戈尔、多洛等地区），后来通过和平手段得到调解。

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关系的紧张不止一次地引起非洲统一组织的关注。但是寻求两国相互之间在非洲统一组织范围内可以接

受的领土争端的解决办法目前尚未找到。

根据西亚里·巴雷的倡议，1976年1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理事会期间他同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进行了两次会晤，会晤时提出了双边关系的一些问题。两国领导人确认，交换意见是有成果的，并表示了继续对话的愿望。目前这方面尚未采取实际步骤。

尽管索马里领导人也强调通过谈判的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但像从前一样拒不放弃将欧登加同索马里合并的要求。据现有资料统计表现，索马里人继续在欧登加活动，在军官的指挥下将本国武装部队陆续调往那里。

埃塞俄比亚的新领导人在拒绝讨论领土问题的同时，表示准备就勘定现存边界进行谈判，并表示愿意发展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及其他关系。

两国关系还由于法国今年允许其独立的法属阿法尔和伊萨领地—吉布提而复杂化。对于埃塞俄比亚来说，这块领土直接关系到其重要的切身利益，因为吉布提是以亚的斯亚贝巴为起点铁路的终点站，埃塞俄比亚主要外贸运输是通过这条路实现的。而索马里人则认为，法属阿法尔和伊萨领地，或他们称之为“法属索马里”的这块领土是“大索马里”的5个部分之一，因为它的人口大部分由同索马里人有血缘关系的部族组成。

第3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认吉布提人民拥有立即无条件独立的权利，同时还呼吁所有国家“放弃追求这块领土的任何野心，并宣布任何支持这种野心的行动无效”。无论是埃塞俄比亚，还是索马里对该决议均投赞成票。

与此同时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政府并不掩饰自己希望吉布提人民独立后会发表同索马里合并的意见。这尤其表现在第13届非洲统一组织大会上（1976年7月），会上索马里代表不支持埃塞俄比亚

关于发表放弃领土野心联合声明的要求，肯定吉布提的主权不应该取决于“保证国警察行动的威胁”。1976年12月西亚德总统在告非洲国家首脑的呼吁书更加肯定地宣布，“如果这种保证的目的是迫使索马里放弃我们同吉布提人民的血缘关系、历史和文化的共同性，那么我们宣布这是办不到的”。

无论是索马里，还是吉布提均投票赞成第31届联合国大会1976年11月23日关于吉布提的决议，决议重申确认这块领土上的人民拥有独立权。两国驻联合国的代表都宣布他们的政府将承认、尊重吉布提的独立及其获得独立后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是在联合国大会辩论过程中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的发言表明，两国之间关于解决吉布提问题的途径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尤其表现在关于政治流亡者回国的问题上。埃塞俄比亚人谴责索马里人打算在流亡者的幌子下把本国公民派往吉布提以保障以后吉布提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合并。

索马里领导人对厄立特里亚的立场也对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造成不利影响。索马里在支持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者时看来指望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的分离将导致多民族的埃塞俄比亚国家分裂，从而有利于欧加登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合并。

索马里政府近来积极开展反对埃塞俄比亚宣传和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旨在预先争取对其在埃塞俄比亚新制度方面所持立场的支持，它认为该制度在对待索马里人方面仍然推行前帝国的“殖民主义者政策”。这一观点在去年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副总统萨曼塔尔访问一系列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古巴期间表现出来。但是在所有场合这种观点均不被人理解。索马里为了获得别国对其对欧加登和吉布提野心的支持，也在阿拉伯国家采取了一定的步骤。在这种情况下索马里人指出，吉布提与“阿拉伯世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国）的合并必将在实现把红海变成“阿拉伯

湖”计划中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不少的收益。阿拉伯反动派支持索马里人旨在对进步的埃塞俄比亚领导人施加压力的反埃塞俄比亚的意图，并且煽风点火，火上加油。索马里总统西亚德拟1977年初访问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苏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为准备这次访问，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莱曼于1977年1月初访问喀土穆时公开发表反埃塞俄比亚的攻击性演说。苏莱曼明目张胆地表示支持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者。也表示支持不久前苏丹和某些亲西方的非洲国家提出的关于将非洲统一国家组织总部从亚的斯亚贝巴迁往其他国家首都的建议。

从60年代开始几乎每当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关系严重尖锐化时，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均请求苏联政府对另一国政府施加影响以使局势正常化。近来，无论是索马里，还是埃塞俄比亚都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希望苏联更加积极参与调解他们两国关系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中的每个国家都指望苏联为此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同对方的友好关系支持其立场。

1976年1月西亚德·巴雷向苏联政府通报了关于同埃塞俄比亚领导人谈判建立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联邦的打算。因此总统请苏联方面在谈判中充当中间人。因为对联邦的目的和性质以及埃塞俄比亚可能采取的立场均不清楚，故决定回避我们对该倡议的态度和在该问题上的中介作用。1976年11月西亚德·巴雷表示希望苏联方面向埃塞俄比亚领导人转达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愿意就有争议的问题同埃塞俄比亚开始和平对话。该愿望已通过苏联驻亚的斯亚贝巴大使馆传达到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政治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1976年末古巴人和南也门人发出倡议，愿意在调解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关系中提供中介服务。索马里政府一方面不拒绝这一建议，另一方面表示希望苏联代表也直接参与斡旋。埃塞俄比亚方面在正面肯定斡旋倡议时未表达类似的愿望。古巴和也门民主人民共

和国通过外交渠道对安排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领导人之间的会晤采取了某些步骤。

苏联在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曾不止一次地传达到两国政府，归结起来就是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通过谈判调解自己的分歧并找到缓和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紧张关系。

苏联政府旨在调解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关系的友好建议两国政府都乐意接受。在答复我们的呼吁时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都宣布自己准备通过谈判解决所有有争议的问题，并且不容许挑起新的武装冲突。

苏联外交部第三非洲司<sup>①</sup>

---

<sup>①</sup> 该档案没有时间标识，这里的时间是根据文件内容推算的。



№06085

## 苏联外交部非洲司整理的 苏联与索马里关系的报告

(1977年5月24日)

(简要报告)

苏联和索马里之间的关系，随着外交关系的建立（1960年9月11日）是和睦友好的。1969年10月21日其国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之后，这一关系就更加扩展起来。

1974年7月8日至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正式访问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这是发展苏联和索马里关系的重要阶段。在访问期间波德戈尔内同志同西阿德总统于1974年7月11日签订了苏联与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条约。根据谈判终结公布了苏联和索马里公报，在公报中就世界政治和双方关系等极其重要问题阐述了双方的总观点。

以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西阿德·巴雷为首的索马里代表团参加了苏联共产党第25次代表大会，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接见了他们。同时举行了会晤，然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同西阿德总统之间举行了会谈。

1976年8月以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副总统穆罕默德·阿里·萨曼塔为首的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根据访问终结公布了苏联和索马里公报，这是对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1977年5月4日波德戈尔内同志从坦桑尼亚、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等地的短期旅行中返回时在索马里做了暂短的停留。波德戈尔内同志同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西阿德·巴雷进行会谈时，主要关注的是埃塞俄比亚国内及其周围的形势以及协调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睦邻友好关系问题。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对许多重大问题都支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决议。对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斗争问题的观点一致或者相近是在国际舞台上协同行动的最好基础。

与此同时，在某些问题上苏联和索马里的观点是有本质差别的。譬如，索马里代表团在联合国上发言支持修改联合国宪章，特别是支持限制安理会常务理事国的“否决权”以及扩大安理会成员国的构成；虽然索马里一方同意考虑苏联对海商法现实问题的立场并就此问题不事先采取单方面的行动，1972年却通过了（1973年公布并生效）规定领水宽度为200海里的法律。索马里作为联合国印度洋问题专门委员会的成员积极支持“世界这一区域带”的公告。由于同苏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的意见有分歧，索马里的领导便正式采取“中立”的立场。在一些演说中索马里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苏联给予索马里相当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两国之间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基础是1961年6月2日签订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以及1972年2月5日、1972年5月6日、1974年9月11日、1975年5月16日、1975年6月18日和1976年6月19日等对该协定又补充签署了一些议定书。

苏联提供给索马里的贷款和无偿援助（不包括专项贷款）到1976年的年底总金额高达2亿120万卢布，其中1亿5600万卢布

是国家贷款，4520万卢布是无偿援助。

到1976年年底已使用6070万卢布，其中包括1750万卢布商品信用。

使用这些贷款在摩加迪沙组建了乳品厂（1965年），在基斯马尤组建了肉类联合加工厂（1968年），在柏塔拉组建了深水港（1969年），在拉斯霍雷组建了奥品罐头厂（1970年），还建立了出租苏联交通运输设备和农业技术设备的国家机构以及其他一些工程项目等。

靠苏联的援助在索马里建成的一些基础工程项目都在不间断地连续工作，而且效益也都很好。他们是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国家工业部门的基础，因此，带来了这一领域里所取得的大量利润。

按照1974年4月26日签订的议定书，在索马里建成了一所苏联—索马里联合公司“索马里公司”。

在法诺尔区朱巴河坝上建发电能力为5000千瓦的水力发电站和长52公里，带可蓄水面积为8300公顷分排水网的灌溉渠。索马里人认为实施这一规划具有极大的政治家意义和经济意义。

除此之外，利用贷款还在摩加迪沙、柏塔拉、基斯马尤等城市建石油库，在摩加迪沙和哈尔格萨改建无线电广播电台以及为了在索马里建鱼品工业而进行的许多项目的施工等。

苏联在无偿的基础上援建的有：印刷厂、两所医院、中等寄宿学校、无线电广播电台；进行地形测量和测绘工作。

按照1972年5月31日签订的政府间的协议在摩加迪沙组建了苏联微生物学和病毒学科学研究实验室。

在1974~1975年由于干旱几乎席卷全国，苏联给索马里以相当大的援助，运给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粮食，石油产品和一些其他器材。

苏联积极参与了把游牧民族从遭受自然灾害地区迁往新的地

区，在无偿的基础上提供给索马里 12 架运输机和 160 多辆载重汽车，总合起来共转运大约有 12 万人。迁移活动结束后，全部载重汽车作为礼品都转给了索马里一方。苏联政府的这一举动赢得了索马里领导和社会舆论的较高评价。

1976 年 3 月，在索马里和苏联合作问题的备忘录中，索马里一方要求在近 5 年为了发展分拨给它 13 亿卢布（半数贷款，另一半是无偿援助）作为粮食和发动机用燃料。这一请求，实质上是 1977 年 4 月西阿德总统托付给波德戈尔内同志的备忘录再一次的重复。

苏联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 1976 年的贸易额是 1540 万卢布。苏联出口给索马里机器和设备、备件、棉织物、水泥、药品、可燃烧材料和润滑材料（1130 万卢布）。除此之外，苏联还无偿地提供给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一系列商品（1976～1977 年第一季度为 1420 万卢布）。

苏联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在巩固索马里国家防御能力，提供武器和派遣军事专家等方面都进行了友好合作。因此，1976 年 8 月萨曼塔尔访问了苏联，为此目的，索马里又获得补充贷款数额为 1 亿 3920 万卢布。一大批索马里军事人员在苏联军事院校里接受培训。

1977 年 4 月西阿德总统转给波德戈尔内同志一份备忘录，请求给予军事援助，金额为 13 亿卢布。

根据索马里人的请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帮助他们制定今年 7 月 1 日宣布成立索马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纲领文件。

在苏联的协助下，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组建了政治科学学院，由苏联教师授课。目前，在苏联和高等政治学院学习的，有 150 人以上的学员是来自索马里。

苏联和索马里文化与科学的联系发展很顺利。在索马里民主共

和国工作的有苏联教师、医生，在国家机关里工作的有的苏联顾问，在苏联协助建设的企业里工作的有苏联专家。

从1959年起已有1600多名索马里人毕业于苏联的院校；目前，在苏联非军事的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里就学的索马里人的就有284名。

苏联驻索马里大使是萨姆索诺夫，格奥尔吉·叶戈罗维奇（1974年10月20日递交了国书）。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是阿里·哈吉·哈希（1975年12月23日开始就任大使）。

苏联外交部第三非洲司

1977年5月24日

No06119

## 拉塔诺夫同门格斯图的谈话纪要

(1977年6月29日)

摘自拉塔诺夫的日记

今天我拜会了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根据中央的委托向他陈述了苏联关于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关系的立场，强调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军事冲突对两国革命成就的危险。

门格斯图听了以后，对苏联领导人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关系正常化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并讲了以下事宜。

军事委员会关于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关系的立场依然未变。军事委员会过去和现在都赞成通过谈判协调同索马里的关系，赞成同这个国家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而且军事委员会认为，与完全投靠帝国主义的苏丹不同，索马里是一个已宣布拥护科学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有友好关系的国家，这为建立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埃塞俄比亚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指导，并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

对苏联政府的愿望军事委员会重申，埃塞俄比亚对索马里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已通知苏联政府，它接受西阿德·巴尔列关于安排索马里—埃塞俄比亚顾问级会谈的建议。当然，埃塞俄比亚不是作为乞求者，而是作为平等的伙伴去参加会谈。

为了使索马里不向右转（现在已有此种迹象），埃塞俄比亚准

备对苏联的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至于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在西部解放阵线的掩护下已在对埃塞俄比亚进行破坏，该阵线的指挥部设在摩加迪沙。这个阵线的武装队伍已占领了埃塞俄比亚东部的几个村庄。这些队伍连苏制对空火箭炮都有。当然，埃塞俄比亚部队不得不同这个阵线的队伍作战。

最后门格斯图请求苏联政府协助让索马里士兵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出去。在回答苏联大使的问题时门格斯图说，埃塞俄比亚同吉布提共和国的关系是不错的。但这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怕埃塞俄比亚或索马里兼并它，所以同意法国驻军。在这种情况下，门格斯图说，如果能使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合作，如果这些国家声明保证吉布提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那么就可使法国军队撤出吉布提，使这个国家沿着进步的道路发展。

苏联驻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大使 A. 拉塔诺夫

№06106

## 拉塔诺夫与门格斯图的谈话纪要

(1977年7月29日)

摘自拉塔诺夫的日记

我访问了门格斯图，并把勃列日涅夫同志给门格斯图的信交给了他。这封信是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收到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费克列·塞拉西·沃格杰列斯经基里连科转交的门格斯图的信之后给他的回信。

门格斯图要求对勃列日涅夫同志同志式的、开诚布公的信转达他的衷心感谢。门格斯图说，我们同意信中的建议。

门格斯图高度评价苏联给予埃塞俄比亚的支持，尽管这给苏联—索马里的关系造成一定的困难。门格斯图说，我们理解，苏联面临进退两难的处境：给予埃塞俄比亚军事援助，就要牺牲在索马里的利益。门格斯图说，我们在考虑这些问题，并且明白，埃塞俄比亚的革命义务是要考虑到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他指出，同时我们期望，埃塞俄比亚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胜利能为共同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在回答苏联大使（同门格斯图的会谈是一对一）关于需要的不是反对索马里，而是保护索马里的观点时，门格斯图说他同意这一点。比如，迄今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没有支持索马里反对西阿德·巴雷并在埃塞俄比亚寻求援助的势力。门格斯图说，我们也没有在索马里组织游击运动，尽管我们有过，现在还有这方面的条件。但



在摩加迪沙，除了西部索马里解放阵线司令部外，还没有厄立特里亚分裂组织代表处、人民革命党代表处、埃塞俄比亚民主联盟代表处、提格雷人解放阵线代表处和奥罗摩人解放组织代表处。

在回答苏联大使根据勃列日涅夫同志信中的论点所谈的需要保持同索马里的对话的意见时，门格斯图说，他同意勃列日涅夫同志的看法。他继续说，我们接受了苏联的建议，当索马里在欧加登的破坏活动有所收敛时在莫斯科举行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会谈；也同意现在，一部分索马里常规军进入埃塞俄比亚领土时继续讨论。但是即使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下台的情况下，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也不会对索马里做出领土让步。门格斯图指出，现在在人民中，甚至在领导集团中已经在议论，看来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既不能保卫厄立特里亚，也不能保卫欧加登，因此需要罢免它。也有消息说在议论政变问题。别尔哈努·巴依耶奉命回亚的斯亚贝巴参加咨询会议。门格斯图继续说，会议以后他立即返回莫斯科，因为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过去和现在都赞成就建立全面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合作问题同索马里人进行友好谈判。门格斯图答应考虑再次发表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关于和平解决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纠纷以及厄立特里亚问题纲领的方式（比如对埃塞俄比亚新闻社举行记者招待会）。

苏联大使提请门格斯图注意一些私营书店进行的反社会主义的，甚至反苏的（毛分子的）宣传。

门格斯图说，宣传马克思—列宁思想的工作的确还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改组了人民群众组织临时委员会，撤换了该委员会的领导人。

门格斯图指出，至于中国人，他们不仅散发资料，而且直接支持厄立特里亚分裂主义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

在会谈过程中也提到一些有关埃塞俄比亚武装力量建设的组织性质问题。

最后，门格斯图说：“我们倾听苏联同志关于寻找政治解决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办法的忠告。我们将来也要力争这样做，因为已经有许多人被枪杀或投入监狱。比如，我现在就制止那些要求对宣布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反对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的犯了错误的进步组织要采取镇压措施的人。现在最重要的是组建一个政党和一支工农军队，因为旧军队有它的弱点，看来在军事方面，反革命比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估计的要强大得多”。

苏联大使再一次强调无论如何必须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领导人保持联系。

苏联大使还请门格斯图注意，在他给勃列日涅夫同志的信中关于军事装备供应不配套的说法好像不符合实际。

门格斯图就此说道，看来这一说法的译文不准确，因为他指的不是这种或那种武器的供应不配套，而是请求增加供应其他装备，特别是坦克和把坦克从港口运到目的地的拖车，等等。

苏联驻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大使 A. 拉塔诺夫

№06016

## 拉塔诺夫同古巴军事专家组长 阿纳尔多·奥乔亚的谈话纪要

(1977年7月17日)

摘自拉塔诺夫的日记

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会谈过程中，苏联大使对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军事形势陈述了如下的看法。

索马里人的分立主义者夺取了厄立特里亚省和埃塞俄比亚东部地区一些战略上的重要据点，说明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

1. 没有充分估计厄立特里亚省分立主义者的军事潜力，因此，没有采取重大措施加强厄立特里亚省的集团军。这时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指望能说服厄立特里亚省机关领导，就政治上调解厄立特里亚问题进行谈判。

2. 没有料到索马里驻欧加登的正规军直接参与了战斗行动。因此证明，埃塞俄比亚指挥部没有采取措施在靠近索马里的边界地区建立防御带。这时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显然是担心索马里会采取一些措施，诸如埃塞俄比亚会拒绝同索马里用和平时方式调解自己的分歧问题。

3. 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军事潜力。没有注意到的是，旧军队虽然直接参加了革命，实际上并没有经受革命斗争的锻炼，因为，下层士兵的基本要求是提高薪水和改善领退休金的保障制度，而军官团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就是反对革命的。

对此还应该补充的就是关系到厄立特里亚了。埃塞俄比亚的指挥部在革命后的三年里对厄立特里亚人的武装力量没有一次想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因此，埃塞俄比亚的部分正规军实际上是稳坐在军营里。

只是在两三个月之前，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从社会主义国家那里获得武器装备之后才急忙开始组建新的正规部队，同时组建人民警察。

目前，埃塞俄比亚的武装力量构成是：正规军有6个师（55000人）；民兵部队有8个师（10万人左右）和警察部队（4万人）等。

可是：

1. 埃塞俄比亚的军队在武器装备的质量上要比索马里的军队差；
2. 民兵部队的战士还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战斗训练。

凡此种种就导致了分立主义者有可能控制厄立特里亚75~80%的地区，包括克伦、纳克法、戈腊、德卡梅雷、捷谢涅伊等城市。他们的武装力量有18000人。

埃塞俄比亚的指挥部在厄立特里亚有正规军2万人，而目前又调往那里5个师的民兵部队。这就有可能在苏丹不往那里投入武装力量的条件下控制厄立特里亚地区。

在厄立特里亚地区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指望分立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阿拉伯国家能在政治上被迫进行调整，并同意厄立特里亚内部自治。

在欧加登区，主要是从索马里秘密派遣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的部队，近些日来已控制这里的大部分地区。该阵线在哈拉尔、基基加、戈腊、迪雷达瓦等城市都进行了战斗。

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在欧加登地区的部队不超过一万人。现

在，民兵部队正派往那里。埃塞俄比亚指挥部认为欧加登区的极其危急，因为索马里还在继续往那里派遣军事人员和重型武器。

可见，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有条件改变厄立特里亚，还有欧加登的军事形势。然而，为此它必须解决下述问题：

1. 保证武装力量交通运输工具（直升机、动重汽车以及其他等），以便能将自己的后备力量在需要的时间迅速派往需要的地点；
2. 建立发动机用的燃料储备并且能得到提供燃料的工具；
3. 建立罐装食品以及药品的储备。

在武装力量中还必须加强政治工作，为此需要政工干部，而政工干部都很不足。

在社会政治结构中革命力量已超过反革命力量。然而，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虽然采取了一些组织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措施（各处都组建农民协会和城市居民的团体），但广大居民阶层（多数都是文盲）的政治觉悟水平仍很低。

在临时军事委员会里可以看到张皇失措分子。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同以前一样仍然是埃塞俄比亚革命的主要领袖。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必须解决下述政治任务：

1. 采取一些补充措施巩固自己的社会基础。为此，必须具体说明社会经济政策，以便使得农民坚信，土地是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不会匆忙地进行集体化。除此之外，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最低限度是有利于促进民族资产阶级的中立化，为此，适当地让他们理解，体制并不打算剥夺他们的权力。

2. 发展和具体说明民族政策（组建民族自治区），虽然这样做目前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在过去遭受歧视的非阿姆哈拉部族中还没有培训出来一批干部。

3. 组建政党和不仅有工人与农民，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人民阵线。

4. 活跃对外政策，特别是在非洲国家，确信门格斯图在利伯维尔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全体大会上所发表的声明，埃塞俄比亚不打算输出革命。因此，将遵循不结盟的路线；对在政治上调解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分歧的纲要将具体加以说明。

在以后的会谈过程中得出共同的结论是，严重的局势迫使当局必须建立一个某种形式的国家保卫委员会，它拥有全权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去保卫革命；建立最高军事统帅部，最低限度还得有两个方面军（北部方面军和东部方面军）和相应的司令部与参谋部。

同时，还得承认的是，目前武装力量的结构，从长远看，应改造成符合现代军事思想的要求，当然，不用说要酌量埃塞俄比亚的现实条件。不过，实现这种想法的障碍却是部分军官团在军事上不内行，而且还有保守思想。譬如，像总参谋部在周详考虑组建坦克师团的想法，而对空防御的办法却是在现有的步兵师团里停止使用这一类武器（坦克，对空射击装备）。

今年7月16日古巴的同志们已经清楚，最近，菲克列·谢拉西耶·沃格杰列斯小组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决定向苏联提出请求供应坦克、装甲运输车以及其他等；当时，尽管对根据早先签订的协议而从苏联引进的技术还没有培训好干部。鉴于此，阿纳尔多·奥乔亚对门格斯图说，如此不严肃地对待这一件事会给军事委员会的威望带来损失的。事后给阿纳尔多·奥乔亚留下的印象是，门格斯图已经理解到这一点。

不严肃，更甚的是不负责任地对待军事问题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有人偷偷地抛给门格斯图必须准备进攻哈尔格萨（索马里）的念头。这就提供索马里公开用坦克和飞机更集中地进攻欧加登正规地区的借口，这样的举动对埃塞俄比亚就不能不说是惨重的政治后果。

阿纳尔多·奥乔亚声称，在厄立特里亚军事上的失利在临时军

事行政委员会里引起某些分歧。大部分委员会的成员都建议，现在在采取军事措施之前试一试再同厄立特里亚省机关进行一次谈判。多数委员会的委员都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当分立主义者进攻的时候，他们或者不同意进行谈判，或者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割让厄立特里亚省。因此，大多数委员会委员支持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办法，也就是说，哪怕是取得部分军事胜利之后，再向厄立特里亚省机关提出建议进行谈判。

阿纳尔多·奥乔亚同时还通报说，在最近的一次同他的会谈中门格斯图宣称，埃塞俄比亚同中国的关系逐渐地、也一天比一天地更复杂起来。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已经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上是在援助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鉴于此，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决定，同中国不公开发生冲突，同北京保持最低限度的联系，同时，还采取……<sup>①</sup>

苏联驻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大使 拉塔诺夫（签名）

---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缺页。

№06086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局势 向非洲国家呼吁的决定

(1977年8月4日)

呈送：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波诺马廖夫、鲁萨科夫、库兹涅佐夫等同志。

1977年8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第66次会议记录摘抄

鉴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尖锐化，

现向进步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发起呼吁

1. 批准给驻阿尔及尔、塔那那利佛、巴马科、比绍、布拉柴维尔、达累斯萨拉姆、科纳克里、拉各斯、罗安达、卢萨卡、马普托、科托努、的黎波里等的苏联大使指示方案（附上<sup>①</sup>）。

2. 责成苏联外交部将这一呼吁书通过各社会主义国家驻莫斯科的大使通告其各国家的领导人（中国除外）。

中央委员会书记

<sup>①</sup>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06105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关于致非洲进步国家领导人信的记录（摘录）

（1977年8月4日）

绝密  
仅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基里连科同志

出席人：安德罗波夫、库拉科夫、马祖罗夫、佩尔谢、杰米契夫、波诺马廖夫、索洛缅采夫、齐米亚宁、里亚鲍夫、鲁萨科夫。

8. 关于由于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关系紧张致非洲进步国家领导人的信

库兹涅佐夫报告说，埃塞俄比亚人给非洲统一组织发去了控告信，所以我们致信非洲进步国家领导人，号召他们采取措施使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关系正常化，将是及时的。

波诺马廖夫支持库兹涅佐夫同志的建议。

基里连科：在这里我们同这个国家的处境非常困难。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同索马里争吵，也没有任何理由同埃塞俄比亚争吵。我们对他们在相互关系方面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应当通过决定。

№06108

## 拉塔诺夫与门格斯图的谈话纪要

(1977年8月5日)

摘自拉塔诺夫的日记

应门格斯图邀请我拜会了他（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别尔哈努·巴依耶也在座）。

对苏联给予埃塞俄比亚的援助（包括决定供应拖车、直升飞机和交通工具）表示感谢以后，门格斯图要求向苏联领导人和勃列日涅夫同志本人转达以下事宜。

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认真研究了勃列日涅夫在回信中的建议，并准备照办，即争取政治解决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纠纷。8月8日，别尔哈努·巴依耶以及政府顾问米卡埃尔·伊姆鲁和格塔切乌·基勃列特飞往莫斯科，继续同索马里代表团谈判。

门格斯图继续说，而索马里反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行动却继续升级。现在索马里不断轰炸欧加登地区的城市（多洛，在与肯尼亚接壤的边境），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在等待对哈拉尔·戈腊—达乌阿等城市的轰炸。由于轰炸，工业和农业企业以及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埃塞俄比亚飞机直到现在仅限于轰炸索马里的坦克、大炮，与索马里飞机进行空战，避免轰炸索马里的城市，因为不这样会使这一地区成为大的国际战争策源地。门格斯图强调，我们不想进攻索马里。

因此门格斯图要求苏联政府酌情对索马里采取补充措施，直至

经济制裁。另外通知索马里政府领导人，埃塞俄比亚准备在苏联参加下同索马里进行谈判。现在最主要的是尽力制止索马里的空中战斗行动，因轰炸不仅使和平居民精神恐慌，而且使军队士气沮丧，以至可能引起政权的政治危机。

最后，门格斯图要求通知他苏联将采取的可能的措施。

在会谈过程中苏联大使向门格斯图通报了苏联政府关于供应从港口把坦克运到目的地的拖车、直升飞机和交通工具的决定。

苏联驻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大使 A. 拉塔诺夫

№ 06109

## 拉塔诺夫与门格斯图的谈话纪要

(1977年8月7日)

摘自拉塔诺夫的日记

我拜会了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列格谢·阿斯法乌也在座）。

1. 奉中央委托我向门格斯图通报了苏联领导人为支持埃塞俄比亚而采取的措施。

门格斯图要我为此转达他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同志本人的衷心感谢。他说，我们坚决相信苏联，并期望苏联进一步援助，因为埃塞俄比亚边境地区的形势越来越复杂。索马里继续每天轰炸多洛市和巴列伊市。索马里军队在西欧加登，现在有迹象表明索马里军队向该地区北部运动。埃塞俄比亚军队缴获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型的武器。据尚未核实的消息，法国人开始用飞机从吉布提向摩加迪沙运送法国型的武器。苏丹、埃及、沙特阿拉伯在厄立特里亚分裂主义分子组织的掩盖下向厄立特里亚投放自己的部队（苏丹）和武器。苏丹向分裂主义分子供应美国武器和不久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的武器。

门格斯图强调说，我们的斗争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卫革命并使革命取得最后胜利。门基斯图继续说，鉴于埃塞俄比亚革命是共同革命斗争的一部分，我觉得有必要继续今年5月开始的同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商谈。这时他指出，我曾给菲

德尔·卡斯特罗和埃里胡·霍涅克鲁去信，建议同他们在柏林会谈，然后一起去莫斯科会见勃列日涅夫同志，较详细地讨论埃塞俄比亚国内和周围的形势。

门格斯图没有直接回答苏联大使关于目前形势是否允许他出国的问题。他仅仅提出，旧的国家机关需要更新，但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现在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缺少革命干部。

在会谈过程中门格斯图要求研究在加强红海沿岸地区方面给予援助的可能性（提供海岸炮垒）。

门格斯图还说，希望根据以前商定的军事交流计划苏联军事代表团最近能到达埃塞俄比亚，以加强两国军队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埃塞俄比亚军事代表团可在以后局势稳定时再去苏联访问。

2. 完成了关于苏联和埃塞俄比亚就开辟苏联和埃塞俄比亚港口之间直达航线进行谈判的委托。

门格斯图同意开辟这样的航线和签订有关这一问题的协议以及有关航运局的政府间协议。

3. 完成了在南非共和国进行核试验问题的委托。

门格斯图欢迎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的倡议（塔斯社声明）。而且他指出，在最近的非洲统一组织大会上埃塞俄比亚建议把南洲共和国借助西方国家核武器库造成威胁问题纳入议事日程，但是所谓法语非洲国家集团否决了埃塞俄比亚这一建议。门基斯图说，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的非洲国家必须开展运动，不准加强威胁全非洲的南非共和国的军事实力。

最后门格斯图再次请求转达他对苏联领导人和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感谢。

苏联驻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大使 A. 拉塔诺夫

№06107

##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交给苏联的谈判备忘录

(1977年8月11日)

1. 关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为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并创造两国和谐合作条件而举行会谈的见解，是在1977年4月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和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同志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时苏联首次提出的。

2. 1977年7月的第二周，社会主义的埃塞俄比亚军政府收到苏联驻亚的斯亚贝巴大使馆关于1977年7月26~28日在莫斯科举行顾问级会谈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在会谈前夕和会谈过程中无论埃塞俄比亚，还是索马里都不要做任何可能使问题复杂化的事。埃塞俄比亚还得到保证，索马里不会开始军事行动。

3. 1977年7月23日，莫斯科会谈开始以前3天，索马里对埃塞俄比亚开始了公开的直接侵略，从而破坏了举行会谈的必要条件。

4. 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别尔哈努·巴依耶少校率领的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按期到达莫斯科，目的是向苏联政府解释，由于索马里的行动而造成的现在的局势对预定会谈的目的和任务有许多不利之处，因此进行这样的会谈已没有实际意义。

5.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惊讶地指出，索马里坚持要讨论它提出的“领土纠纷”。由于同索马里没有领土纠纷，埃塞俄比亚认为，在被迫条件下进行谈判是不适宜的。

6. 仔细研究了苏联提供给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并转到亚的斯亚

贝巴的工作文件。还决定公布索马里的侵略行径造成的局势没有变化这一事实。非洲统一组织委员会1977年8月5~8日在利伯维尔(加蓬)召开的协调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纠纷的会议具有重要意义。会上通过了建议,主要部分如下。

1) 重申16(1)决议和27(11)决议,根据非洲统一组织章程各成员必须尊重获得独立时的边境以及坚持各成员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原则。

2) 号召冲突双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根据非洲统一组织的章程和有关决定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3) 重申非洲统一组织不同意任何外因,特别是非非洲国家干涉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的内政,号召根据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14条决议拒不接受类似的无理干涉。

4) 号召各国不做任何不利于冲突双方取得谅解,加剧紧张和冲突,并使两个邻国的和平、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的事。

5) 建议非洲统组织协调委员会主席立即开始同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国家首脑接触,争取停止军事行动,创造有利于和平解决问题的局面。

7. 根据以上所述决定,埃塞俄比亚根据非洲统一组织在利伯维尔通过的建议和含有以下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关系正常化必需的初步措施的苏联工作文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讨论:

1) 双方放弃以武力解决纠纷,采取紧急措施,停止军事及其他敌对行动;

2) 双方负责边境的和平与安全;

3) 不进行互相敌对的宣传,鼓励发展友好关系;

4) 双方承认保持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紧张状态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不利于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双方表示同意建立和保持各种级别的

相互联系。

最好能保留工作文件中列举的各点。

8.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期望，有关以上所述的协议能导致停止军事冲突，能按非洲统一组织有关决定精神全面消除侵略后果。

别列日科夫 译



№05910

##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关于支援埃塞俄比亚的记录（摘录）

（1977年8月11日）

担任会议主席的是：基里连科同志

参加会议的有：安德罗波夫、库拉科夫、马祖罗夫、佩尔谢、杰米契夫、索洛缅采夫、卡皮托诺夫、齐米亚宁、里亚博夫、鲁萨科夫等同志。

二、关于有关非洲之角局势正常化和帮助与支持埃塞俄比亚领导的一些补充措施（安德罗波夫、库兹涅佐夫、索科洛夫等同志提出的问题）

基里连科：列昂尼德·伊里奇要求尽快审理埃塞俄比亚的申请，然后，尽可能地给予他们必要的援助。他委托葛罗米柯、乌斯基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等同志提出建议。同志们已完成了这一委托。

马祖罗夫、安德罗波夫、佩尔谢指出上述援助埃塞俄比亚的措施很重要。

决议通过。

№06087

## 伊利乔夫同卡西姆的会谈记录

(1977年8月11日)

机密

摘自伊利乔夫<sup>①</sup>日记

记录№10, 1977年8月11日

### (第一阶段)

1977年7月24日索马里技术顾问代表团抵达莫斯科。1977年7月25~29日在索马里代表团的下榻地举行了欢迎仪式。

7月25日

在最初的欢迎仪式开始之前, 根据卡西姆<sup>②</sup>的倡议举行的两人单独会谈中都宣称, 索马里技术顾问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怀着良好的愿望和绝对的信任, 渴望苏联在解决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争端问题上给予友好的帮助。可是, 根据卡西姆的说法, 索马里代表团对埃塞俄比亚一方的真诚和良好愿望表示怀疑, 因为值得注意

---

① 伊利乔夫·列昂尼德·费多罗维奇 (1906~ ) 苏联哲学家, 苏联科学院院士, 1965年起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② 候赛因·阿卜杜勒迪尔·卡西姆, 索马里矿产和水利资源部部长, 当时率索马里技术顾问代表团访苏。

的是，索马里不止一次地建议埃塞俄比亚在建立两国联盟的前提下解决争端问题，对此埃塞俄比亚的反应都是公布双方之间秘密谈判的记录，并且在报刊杂志上掀起攻击索马里的运动。

众所周知，其他非洲国家和不是非洲国家都试图在调解双方之间的争端问题上能起到调停者的作用，然而，这种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

索马里代表团认为，在即将举行的技术顾问的会晤上所要讨论的课题，正如两国之间的争端问题的实质一样，不是两国之间关系的紧张，也不是标界或者修改边界问题，而是殖民主义形势，即部分索马里的领土以及生活其中的居民要陷入埃塞俄比亚的殖民统治之下。索马里代表团认为，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对其人民和部分其他国家的领土继续进行殖民主义压迫的话，这种国家就不能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这种殖民主义形势早在埃塞俄比亚帝王存在时期，埃塞俄比亚获得独立之前就已出现。根据索马里一方的意见，阿比西尼亚改称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帝国改称社会主义的埃塞俄比亚等这种变换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改变事态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索马里代表团认为，在即将举行的双方科技顾问代表团会晤时应该讨论的主要问题，这就是关于给予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境内被压迫的索马里少数人以自决权和独立的问题。

在当前的谈判中，部长继续说，问题可以说是必须在二者之中进行抉择：要么就实质问题进行对话，要么限制讨论次要问题的范围，以便什么都一般地谈，就是不涉及问题的实质。索马里认为，现在进行的军事行动，这是索马里的一些爱国主义者在殖民者主义者的领土上为自己自决和独立的权力而进行斗争的行为，因此，在即将举行技术顾问会晤的议事日程上首要问题就应该是关于非殖民地化问题。只要解决这一问题之后，然后才能转而着手讨论其他次要问题，诸如弱化两国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

卡西姆指出，形成这种局势是埃塞俄比亚长年破坏索马里领土完整，压迫和消灭生活在殖民统治领地上的索马里人的结果。

最后，卡西姆强调说，索马里代表团已做好准备千方百计地促进苏方实现其友好帮助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技术顾问代表团会晤的使命。

至于说自己，我们宣布，两国都是我们的朋友，两国之间已形成的这种紧张关系令人十分忧虑和不安。强调，凭借武力解决争端问题，特别是考虑到世界现代的局势是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危险是诸如此类的紧张形势可能会被非洲的敌人，无论是索马里，还是埃塞俄比亚进步改革的敌人所利用。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国家相互间的关系上没有什么问题不能通过和平途径，非得使用武力才可以解决的。苏联方面在即将举行的技术顾问代表团会晤上能看清自己有如下的任务给予友好的帮助：

1. 创造两国之间都怀有友善态度的气氛；
2. 确保都能认识到，凭借武力是不能解决争论问题的；
3. 竭尽全力以使技术顾问们会晤的结果能提出两国政府以创造友好和睦邻环境为目的的建议，作为解决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现有争论问题的基础。

提出，苏联方面不打算强加给他们解决两国之间争论问题的任何决定。

面对面的会谈结束之后，举行了苏联代表和索马里技术顾问代表团的会晤。

欢迎索马里技术顾问代表团并且表示满意的是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双方已决定开始在莫斯科进行有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对话。

声明，同意西阿德总统请求组织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在莫斯科进行的会晤给予友好帮助之后，苏联方面遵循的原则是其特有的国际主义义务，帮助同我们友好的国家，发展和加强他们的全面合

作。

看出，我们对待双方都不抱什么成见，都是友好和真诚的。

期望，即将举行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会晤会得出肯定的结果。说过，如果我们没有说，现在地区的形势已复杂化，因此，必须采取坚决果断和刻不容缓的措施，那么我们就不是真诚的。很希望双方代表团从一开始尽力创造实事求是的气氛，表现出有良好的愿望，积极的态度，决不采取最后通牒式的、不容反驳的立场，否则会使其失去进行谈判的可能。

我们坚信，非洲之角局势的正常化，同埃塞俄比亚建立友好睦邻关系，都是符合索马里的利益的。显然，世界的形势，同埃塞俄比亚建立和平友好的联系是为索马里革命迅速前进，为顺利解决摆在国家面前复杂的国民经济任务，为提高索马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之丰衣足食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说过，我们很想听取索马里代表团有关它认为必须共同讨论问题的范围的意见，以及会晤的日程，包括会晤持续的总时间和其他程序问题。从自己的角度，我们不打算用什么时间的框框限制会晤，并准备最大限度地考虑双方有关这方面的愿望。

进一步指出，正如我们所知，索马里一方建议讨论关于埃塞俄比亚政府应提供给各民族自决权的问题。我们不能预先说，埃塞俄比亚一方坚持什么立场，但是可以推测，问题的这种提法，多半会理解成是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

不论是我们，还是你们都清楚的是，埃塞俄比亚的领导在自己的纲领性文件中宣称，他们打算在民主的基础上解决民族问题。显然，为了实施这一纲领必须要有相应的形势。

在我们看来，在技术顾问们的会晤上研究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问题，也就是说，正如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这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但是不应该以事先解决最基本的，首先是领土方面的争论问题

为前提。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建立友好和睦邻关系，这才是共同寻求解决基本问题途径的关键。这一观点我们不止一次地向索马里的领导者们阐述过，而且也没有遭遇来自他们方面的反对。

由于我方的友好帮助，如果在会晤结束时，技术顾问们能各自向自己的政府提出有关向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关系正常化大踏步前进的建议，那么，实际上代表团的会晤是有成效的。

苏联方面已做好一切准备进行合作，并给予双方的技术顾问一切可能帮助他们为向各自的政府提出建议，但是，不准备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我们做好准备积极帮助寻找互相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能表现出都有愿望，那么在苏联代表不参与的情况下，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代表团都能够会面。

我们已做好准备，会晤之后就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见面，如果有必要这么做的话，还要再同索马里的技术顾问们谈一谈，其目的是确定统一的立场，决定应进行讨论问题的范围以及程序问题等。

我们代表团在这方面可能提出的想法基本上可归纳如下：

1. 可以断定的是，保持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不符合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人民的利益；

2. 双方都拒绝使用武力解决争端问题；渴望尽全力用和平的手段，通过谈判的途径去加以调解；

3. 双方有义务在边界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全，克制任何形式的敌对行动，不大规模地做反对对方的敌对宣传，千方百计地鼓励全力发展友好关系；

4. 双方都渴望采取一些措施去发展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两国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交流经验和其他等，包括双方都做好一切准备进行正常的、互相间的和任何级别的协商。

显然，首先任何一方都必须停止军事行动。

苏联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发展全面合作的原则路线大家都非常

清楚。我们国家的政策始终循规蹈矩，从不随心所欲地被动。苏联今后巩固同索马里人民的友谊和革命团结，完全按照我们国家之间友好和合作条约，给予他们帮助与支持。

卡西姆对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所给予的热烈欢迎和殷勤接待表示感谢。

他强调说，索马里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是真心诚意的，是同志式的，其基础是完全信任和相互理解。正是因为如此西阿德总统才向苏联领导人和勃列日涅夫本人提出请求给予友好帮助，以便探索解决对索马里，甚至对地球的这一整个地区都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即处于埃塞俄比亚控制之下索马里领土的非殖民地化问题。

正如西阿德总统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指出的那样，索马里的立场是，生活在埃塞俄比亚殖民统治之下的索马里人民应该享有自决权。勃列日涅夫在回信中就涉及到有关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苏联充当调解人。结果，不久前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第一副总统萨曼塔尔访问苏联，他同苏联领导们就讨论了这一问题。

因为深信不疑的是，在莫斯科可能找到解决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争端问题的办法，所以，索马里的领导人就派出了目前的技术顾问问题代表团，他们满怀着良好的愿望。

根据我们的意见，卡西姆继续说，非殖民地化和享有自决权问题应该成为同埃塞俄比亚代表会晤的基础。甚至如果埃塞俄比亚代表团会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干涉埃塞俄比亚的内政，我们仍然打算向他们阐述自己的这种观点。对我们重要的是能够宣布关于享有自决权的保障。

问题的实质在于，消除现有的紧张状态，在给处于埃塞俄比亚殖民主义压迫之下的的索马里人民自治权上不应该有紧张状态，在划界、重新划界或者是确切弄清边界线上不应该有紧张状态。在索马里人民的面前历史的责任落到我们肩上，这就是要求首先解决主

要问题，应该深入现象的本质和讨论已形成局势的原因，而不是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当然，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问题可能会在会晤时进行讨论，但是这是结果，而不能是原因。

索马里的革命从一开始就始终不渝地支持，并且正在支持不论是在埃塞俄比亚，还是在整个非洲大陆上的先进改革。正因为如此，索马里是第一批国家之一，即断然宣布，海尔·塞拉西体制被推反，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在埃塞俄比亚执政之后任何人都不能干涉该国的内政。

卡西姆声称，我们确信苏方，代表团在其友好帮助下组织的会晤上不打算采取断然的，最后通牒式的立场。相反，不论是在会晤日程上的所有问题，还是问题的实质，索马里代表团都本着实事求是和建设性的精神加以解决。我们还可以讨论其他次要问题，主要的是寻求和平地和体面地解决摆在两国面前问题的办法。建立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是巩固非洲之角地区进步势力的阵地和加强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基本条件。我们不相信武力，我们要维护和平。

回答说，从卡西姆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的主要结论，这就是关于索马里代表团在会晤时不打算采取最后通牒式的，断然的立场。然而，毫无疑问，同这一声明相抵触的是索马里代表团提出如下的主要思想，会晤的主要问题应该是像他表示的那样，提出“在埃塞俄比亚统治之下索马里领土的非殖民地化”问题。后一点未必同第一点完全一致。与此同时，我们高兴地指出索马里一方确实愿意也同时讨论其他问题。

7月26日

欢迎索马里的代表们并建议继续交换意见，本来在前一次会晤就已经开始。



卡西姆请求简要通报关于苏联代表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会谈时一些主要方面。

回答说，苏联代表团已认清自己的任务并不是向一方通报关于自己同他们会谈的内容。为了保证工作有起色，首先我们必须确定讨论的主要问题。为达到此目的应该明确一些具体方面，这就是：

1. 根据索马里代表团的意见，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共同会晤时应该讨论问题的范围如何？

2. 索马里的代表们是否认为，苏联代表团成员也应该参加此次会晤？

3. 索马里的技术顾问们自己是如何认识会晤的程序的？

双方的立场原则上我们或多或少是清楚的。应该说，他们的分歧暂时还很大。因此，苏联代表团试图寻找一个共同点，以便能保证我们的工作能有进一步的改进。很想再重复一遍的是，生硬的态度未必能够多少获得一些肯定的结果。应该有灵活性，处理问题方法明智，可是，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非洲之角地区最近的局势急剧地复杂起来。

我们坚决要求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这是当前会晤的基础。如果在这里能够找到彼此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到那个时候就能够确定下来获得肯定结果已具备先决条件了。

卡西姆表示愿意说出索马里一方所提出一些问题的观点并强调他们很希望苏联的代表们一定能参加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的会晤。

他说，很自然已下达给我们有关的指示，还给我们提出了任务，以便决定我们在会晤时进行讨论问题范围的立场。我们认为，经过苏联的努力，如果我们已经谈过的那一基本问题能够提交讨论就能取得一些结果。

从1974年开始，当埃塞俄比亚实施新的政治体制时，索马里

政府不止一次地试图解决领土问题，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地区的公正和巩固和平。但是，我们的所有倡议都遭到埃塞俄比亚一方的批驳。众所周知，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都表示愿意友好地为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正常化效力。这些倡议的失利都是由于对方固执己见和无灵活性造成的。正因为如此，卡斯特罗的调解使命就毫无结果地结束了。

出自寻求解决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争论问题的愿望，西阿德总统致函勃列日涅夫，请求苏联在调解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领土争端问题上给予友好的帮助。我们十分高兴地得知，苏联同意承担这一使命。我们也高度评价埃塞俄比亚一方愿意坐到谈判桌上进行谈判。

索马里领导人已注意到所有这一切，授予代表团全权在有关领土争端问题的范围内同对方进行辩论。我们希望，经苏联的调解是可能找到一定的解决办法的。如果领土争端问题能作为讨论的基础，那么我们就能够审查其他次要问题。

至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会晤的程序问题，我们同意苏方有关这方面的任何建议。要重复的只是，辩论的实质应该是领土的争端，换句话说，就是埃塞俄比亚把部分索马里的领土非殖民地化问题。

引证我们提出的关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的立场有严重分歧的想法之后，卡西姆声明，这对他来说并不突然。这种观点上的分歧始终都存在，因为殖民主义者的利益同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如果埃塞俄比亚放弃自己的殖民主义政策，就能保证会晤的成功。

我们同意你们，不应采取生硬的态度，如果讨论的对象就是我们提出的基本问题的话，我们也就不准备那样做。我们同意研究现象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我指出，交谈者重复了前一次会谈中他们所说的所有一切方面。而目前非洲之角的形势愈来愈复杂，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认为，这就提出了对双方的想法进行某些修改的必要性。

从索马里代表团的声明中可得出结论，代表团有权讨论的只是领土问题。这就告诉我们，索马里领导的努力，一些非洲国家领袖们的努力以及卡斯特罗同志等就调解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争论问题的努力都没有获得成效。能否由此得出结论，因为三国的努力都不顺利，争端问题就应该靠武力，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加以解决？我们的观点则是，争端问题应该通过和平的途径，谈判的办法去解决。为此不应该指望任何的努力。

苏联方面高兴地接受西阿德总统的声明，说索马里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借助武力去解决争论问题。就此问题在致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论述过，去年访问苏联的索马里党和政府代表团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总之，在这方面不止一次和急切地向我们做过保证。我们对这些声明也都坚信不疑。

然而，我方现有的情报说明，现在已开始有一些公开的军事行动。索马里的正规部队靠坦克和飞机已越过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边界线。我想强调的是，问题在于具体事实，而不是推测。

从我们的观点出发，为了解决国家之间的产生的任何问题，首先必须创造有利的气氛。我们作为出力给予友好帮助的一方认为，目前主要的任务应该是停止军事行动。我们要求不论是索马里一方，还是埃塞俄比亚一方应该对此给予响应。

在我们看来，目前的问题在于：或者非洲之角将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实现阴谋的场所，或者经过共同的努力我们能够把非洲之角变成睦邻友好与和平的地区。

我们要求双方代表团都坐到谈判桌旁进行谈判，互相都应该提出并相应地听取对方的观点，都能重视寻求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

途径。

这就是我们的观点。

卡西姆指出，按全部情况看来，在某些方面索马里和苏联双方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

你们经常提到的一个用语是“关系正常化”。但是，如果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还谈得上什么正常化。所有，以前的所有调解不成功的根源就在于没有找到病因。

他同样不安地指出，你们的另一句话是“使用武力”。这是否意味着苏联怀疑索马里的爱好和平的政策？难道我们没有在革命之后八年的时间为了调整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确实作出了努力，尽管部分索马里人民处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始终主张谈判，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现存的问题。我们反对使用武力占有不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你们提到，索马里军队越过了埃塞俄比亚的边界线。但是，显而易见苏方也清楚的是：30万武装的埃塞俄比亚人抢劫财物、强奸妇女和打死和平的索马里居民。不就是因为如此索马里人才对我们目前正处于埃塞俄比亚殖民主义统治的地区诉诸武力以便自己获得解放的吗！也就是因为如此才开始进行解放运动和战斗行动的。历史是不能否定人民为自由而进行斗争的权力的。所有非洲国家都能够为此作证。

埃塞俄比亚本应该解决生活在被占领地区上索马里人民非殖民主义化的问题。但是，却没有这么做，所以，人民才拿起了武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指出，当没有其他出路时，就应该拿起武器进行斗争。

你们要求我们停止军事行动。可是，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力去保卫我们国家的主权吗？显然，你们都知道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在利伯维尔召开最近的一次非洲统一组织全体大会上发表声明说，

他不承认索马里民族的存在。实际上这就等于既向索马里，也向在被占领的土地上的索马里人民宣战。这样能不说明我们有权起来自卫吗？我们对诸如此类的威胁不可能无动于衷。当问题涉及到要消灭索马里人民的时候，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对造成的局势，对局势的尖锐化，其责任全部和完全都应由埃塞俄比亚去承担。我们渴望得到和平，但是，回报的却是战争。

我们带着和平的使命来到莫斯科，我们对苏联的信任已得到证实，但是，能说也信任亚的斯亚贝巴吗，因为他们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消灭索马里人民。应该全说真话，而不能是半真半假。那么谁是非洲之角和平的敌人，谁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手中的工具？是经常叫喊和平的那个人或者是宣布要消灭索马里的那个人？

卡西姆接着说，至于说到殖民主义瓜分非洲的历史，他声称，埃塞俄比亚本身就已经参与了。如果说19世纪末的埃塞俄比亚和海尔·塞拉西体制下的埃塞俄比亚是殖民主义国家的话，那么这一点也完全可以用于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因为这里的海尔·马里亚姆政权实施的是同样的殖民主义政策。

还能说埃塞俄比亚有什么社会主义方向吗？其实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在这个国家里，议论得很多，但是，做得却很少，说的是这件事，而做的却是另一件事。埃塞俄比亚人拒绝用和平的方式调解争端，他们采用军事行动反对和平的索马里人。这就是他们所持有的态度，既固执，又傲慢。

回到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双方的会晤上，卡西姆说，如果要提出索马里反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行动问题，那么索马里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就不讨论任何问题。在埃塞俄比亚和生活在被占领土地上索马里人民所开展的解放运动之间是在进行着战争。就是这一运动在开展斗争，而不是索马里人民共和国。

什么军事行动应该停止？难道问题不是关于解放斗争吗？众所

周知，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起，苏联就始终不渝地支持世界各个地区的解放运动。苏联在联合国的活动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想再重复一遍的是，如果埃塞俄比亚一方能作为基础讨论领土争端问题，我们就同意坐下来进行谈判；但是，如果他只提出索马里的什么武装行动问题，那么无论是会晤工作，还是双方的关系都不会有什么好的起色。

卡西姆在结束谈话时说，我不知道苏联在这方面能否采取什么办法。遗憾的是我们有卡斯特罗同志进行调解的令人不愉快的例子，当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的声明提出领土问题不合理时，然而，却同意讨论任何次要问题。

相信我们的诚意吧，如果苏联的友好帮助得不到良好的结果，我们将会感到遗憾的。

苏联代表团已完全弄明白，根据索马里一方的意见，领土问题应该是会晤的主要问题，而其余的都算是次要问题，指出这一点之后说，苏联支持西阿德总统的请求，同意为组织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双方的会晤，以达到局势的正常化和建立双方之间友好睦邻关系的目的而从中斡旋。现在我们被迫遗憾地确认，双方代表团坐下来进行谈判的必要形势暂时还没有形成。接着强调说，苏联在被压迫民族为其自由和获得自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方面的立场任何人都不能怀疑的。

如果说到当今的埃塞俄比亚，那么埃塞俄比亚它从本质上是不同于海尔·塞拉西执政时期的埃塞俄比亚。在那里进行进步的革命性的巨大改革。现在已弄清楚，我们同你们对新埃塞俄比亚的体制的评价并不一致。同时还想指出的是，我们了解到何种程度，在埃塞俄比亚实行帝制的情况下你们是不能提出如此尖锐的非殖民主义化问题的。

如果你不同意埃塞俄比亚人的意见，说你们的关系中没有领土

分歧，请坐到谈判桌上同他们进行谈判并讨论双方感兴趣的一切问题。显而易见，应该根据西阿德总统说的想法，必须寻找出解决问题的“体面说法”。

卡西姆说，我们毫不怀疑地承认，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苏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还想指出的是，处于埃塞俄比亚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索马里人民的斗争是这一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你们要求我们停止军事行动，然而，这种军事行动本来我们还没有开始呢！从我方而言，我们采取的只是反对军事的行动。问题只在于为本民族的解放而进行斗争的西部索马里人民所采取的武装行动。

最后，卡西姆感兴趣的是，他能够将西阿德总统的私人信件转给勃列日涅夫同志。

强调说，对苏方来说索马里代表团立场是明确的。再一次重复的是，在我们看来，只有刻不容缓地采取解决停止军事行动的办法之后，在研究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现有的分歧问题上才能取得一些进展。眼下最主要的是，决不能允许无法补救地发展事态，应为和平解决所有问题能坐下来进行谈判创造有利的形势。

至于涉及到为了递交信件，请求同勃列日涅夫会晤的事，回答说，目前勃列日涅夫不在莫斯科。看来，明天将会有一位苏联负责的领导人来接待您。

7月29日

欢迎卡西姆，并且说，在最近的几天里举行了同索马里代表团的会晤和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的会晤，在这些会晤中，各方都对在非洲之角地区所形成的局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都根据收到的指示阐述了各自政府的立场。分别会晤的结果证明，代表团继续持有相反的观点。索马里一方像原来一样坚持，讨论的对象应该是领土问题，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却断言，这种问题并不存在。各代表团

所阐述的立场实质就在这里。

我们仍然认为在现阶段我们从中斡旋的首要任务就是停止军事行动，并为进行谈判创造有利的形势。

照我们的看法，国家之间，甚至于具有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之间的任何争论问题，都应当在共同努力和良好愿望的基础上通过和平的途径，坐下来谈判的办法加以解决。我们是借助武力解决争论的原则的反对者。

根据收到的情报，现在索马里正规军的一些分队在坦克和炮兵部队的援助下越境之后已深入到埃塞俄比亚的领土。因此，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紧张的事态正发展成直接的武装冲突。几乎全世界的刊物都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我们都知道，索马里政府坚决驳斥其军事力量已参加在欧加登区军事行动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置辩的是，紧张局势开始发展成武装冲突，而这一点对非洲之角地区的进步势力来说可能产生最大危险。已形成的局势可能会使事态无法控制。

我们不希望好友之间的旋律被敌对势力的噪音所淹没，这种势力竭尽一切可能企图破坏苏联和索马里之间在友好和合作条约范围内所存在的友谊。形势要求采取坚决的措施以便保持事态在严格的控制之下。苏联方面愿意尽一切可能以便促进在政治上调解两国之间的分歧和尽快地实现关系的正常化。

考虑到正在同索马里代表团团长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团长个别交换意见，苏联代表为了从中斡旋，在工作程序上提出研究的意见，第一步是有关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关系正常化：

1. 双方都不能采取武力解决争端问题。采取紧急措施停止武装和其他敌对行动；
2. 双方都应承担义务保持边界上的和平与安全；
3. 不能通过群众舆论的手段搞反对对方的敌对宣传，应鼓励



努力发展友好关系；

4. 双方都得承认这样的事实，即维持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不符合他们各自人民的利益，还妨碍统一力量为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而斗争；

5. 双方表示同意，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建立和保持相互间各种程度的接触。

强调说，我们把这些看成是工作凭据，包含有苏方实现斡旋使命的建议。显然，我们是根据，他能将信息传给索马里政府。

卡西姆声称，索马里代表团对他们以前说的想法没有什么补充，并且很有把握地说，苏方提出的建议会转给索马里的领导。

通知索马里代表团说，苏方刚刚将包含有苏联提给索马里一方加以研究的那些建议的工作凭据转交给了埃塞俄比亚的技术顾问们。

卡西姆说，索马里代表是在苏联实施从中斡旋的使命情况下来到莫斯科同埃塞俄比亚人进行谈判的，领有其政府的指示要讨论实质问题，就是领土问题。意见已指出，要进行辩论次要问题似乎是徒劳的，因为漏掉了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关系复杂化起来这一主要原因。卡西姆继续说，在进行交换意见的过程中，现在有可能声明和重复的这一点，就是索马里坚决遵循的原则——捍卫所有还没有独立的民族争取自由的权力。因此，处于埃塞俄比亚压迫之下的索马里人民同其他民族一样有争取自由和人道尊严的权力。同时，我们赞成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存在的一切问题。

在分析友好辩论的应有地位时，他说，索马里代表团得出如下结论。已弄清楚从谈判一开始，苏联方面与讨论问题有关系的立场，很遗憾同索马里一方的立场并不一致。双方代表团在观点上的这些差异很难应该作为讨论对象的首要问题达到相互都有共识。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所持的态度认为“领土问题并不存在”，因此，“它就不能成为讨论的对象”。这是断然的反对，不允许带有任何的积

极性去着手谈判。

卡西姆接着指出，苏方主张，似乎索马里正规武装力量的分队在坦克、炮兵和飞机的援助下越过边界，破坏了主权，侵入了埃塞俄比亚的领土。索马里一方否认并认为诸如此类的论点是毫无根据的。

他说，索马里政府同我们地区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认为，处于埃塞俄比亚压迫之下的索马里人民在为争取解放而进行斗争。这就是存在的现实。

卡西姆继续指出，交给索马里一方的工作指示文件，表明的是苏联一方自己的立场，不能成为现阶段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开始谈判应有的基础，因为在评价应进行讨论问题的本质和刻不容缓的性质上，索马里代表团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的意见有分歧。说他的代表团虽有兴趣，却很扫兴地注意到，在交给的文件里不提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基本分歧问题，也就是领土问题。如果埃塞俄比亚人拒绝讨论这一问题，那么索马里代表团只好向其政府汇报现时事态的状况了。

卡西姆很感谢通知并且说，他很想提一提在勃列日涅夫的回信里有关今年5月西阿德·巴雷向他提出请求的一些情况。“勃列日涅夫宣布，同意从中斡旋，我们严肃、负责地对待这件事。我们想，为了建立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友好关系可以在广泛的基础上开始对话。我们认为，能够打开共同探索调解困难争论问题道路的关键是非洲之角的友好睦邻关系”。

我没有要评述这一段文字，它是十分清楚的。

早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相互关系尖锐化之前，苏联就建议要从中斡旋。在这之后，我们认为必须继续自己的使命，以便达到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善，为能顺利讨论所有争论问题创造良好气氛。

在我们暂时进行会商的同时，苏联领导人第二次向西阿德总统发出了私人信函。或者像昨天勃列日涅夫给索马里总统私人的信

件，其意思是简要地说，让索马里一方采取相应的步骤制止紧张事态的扩大。

提醒谈判对注意的是西阿德总统的下述主张，即指出索马里的愿望是所有争论问题只能用和平的手段加以解决，决不能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

“我们始终都愿意同埃塞俄比亚政府建立合作关系和进行对话”（引自1976年10月22日庆祝革命七周年时西阿德·巴雷总统发表的演说）。

“索马里绝没有在非洲大陆进行战争的意图。我们的国家是进步的，因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战争是徒劳无益的，战争会给我们自己带来灾难……”（引自1977年3月26日在索马里宗教活动家讲习班结业式上西阿德·巴雷发表的演说）。

“没有一个索马里正规军的士兵跨越过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引自1977年6月29日同苏联大使的谈话）。

“索马里的代表授权去办的事情就是千方百计地避免用武力解决争论问题。应该在维护双方尊严的情况下找到‘得体的政治解决办法’”（引自1977年6月30日同苏联大使的谈话）。

在苏联，对西阿德同志的声明持信任态度。

根据我们的看法，说现在出现的就是那种形势，即在交给索马里代表团工作文件上包括的有关建议，那怕是初步需要行动的那种形势。

索马里一方确认，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已持断然的立场，因此，已没有条件进行必要的对话。可是，索马里的代表甚至还采取了最后通牒式的态度，认为应该进行讨论的惟一问题就是领土问题。我们不得不指出确有其事的是，双方代表团都在坚持不同的观点，已放弃进行友好事务对话的途径。

表示遗憾的是，索马里代表团对苏方提交给它审理的工作文件

问题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并且声称，该文件不能成为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代表团之间进行对话的原则，强调说，附有苏方建议的这一文件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斡旋的使命。它本身只能是双方能创造进一步积极进行谈判条件所实施初步措施的一些意见。代表团双方都采取如此断然的态度，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下只能使事态陷入绝境。

最后，使人感兴趣的是，索马里代表团团长就工作文件发表的见解是他个人的意见，还是索马里政府的看法。

卡西姆说，尽管索马里代表团在工作文件中已发现有许多错误和漏洞，但它仍然将其内容转达给自己的政府。他接着指出，近日来，他不得不经常听对其国家不公正的指责，似乎是他们侵犯了埃塞俄比亚的领土。今天，他同样还有机会碰上一些暗示，说西阿德总统说的和做的似乎相互都不一致。

卡西姆说，毫不奇怪的是，你们声称，采取断然的立场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如果说我们来到此地是为了讨论主要问题，而建议我们讨论的却是一些次要问题，这怎么能说是断然态度呢。更甚的是，尽管我们已解释清楚，处于埃塞俄比亚压迫之下的索马里人民是在进行解放斗争，而你们却经常说索马里一方在扩大战争。我坚决驳斥这样的论点。昨天，我们的外交部长同样也驳斥了诸如此类的声明。

接着交谈者提出问题，伊利乔夫是否怀疑，索马里代表团团长确实代表自己的政府，因为当时他曾问过，索马里一方提出有关工作文件问题是谁的主张，是个人的，还是政府的。

回答说，他不怀疑，索马里技术顾问代表团是代表其政府的，当我们提出自己的问题时，首先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关于工作文件的意见是否是索马里政府的反动势力提出来的。

你们说，苏方指责你们侵略，以及暗示说，索马里政府在行动上说的和做的并不一致。不要说支持我们，也不要按自己的想法去

解释我们说的话。这并不能帮助相互理解。我们知道关于你们提到索马里政府在辟谣的事。可是我们掌握有情报和必要的材料，在其基础上我们才做出自己的结论。如果我不告诉你们这些，我就不能算是一个襟怀坦白和能表现友好之情的人。

根据苏方的意见，现在应该讨论的是其他问题，也就是怎么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建立起友好睦邻关系。经过从中斡旋，我们建议双方能采取一些重要措施，实施这些措施才有可能创造正常的条件为非洲之角的形势正常化而讨论能做得到的进一步措施。确定这些措施的性质，这是你们国家的事。当你们做出这种决定，我们就同意重新为你们从中进行斡旋。

卡西姆答应将工作文件的内容传达给索马里政府。他说，我们来此地是带有一定使命的。遗憾的是我们没能顺利开始谈判，所以，我们报告我们的领导关于已造成的局势，随后我们再同苏方建立联系。

在最后说，苏方已知道索马里的这一声明。至于说苏联，他认为，它会继续从中斡旋的使命。

参加会谈的：苏方有苏联外交部第三非洲司司长 B.A. 乌斯季诺夫、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助理 П.Ф. 里亚朵夫、苏联第三非洲司处长 Л.Л. 米罗诺夫；索方有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非洲司司长侯赛因·哈桑·法拉赫、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驻苏大使阿里·哈吉·哈希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阿里·伊斯梅尔·瓦尔萨梅。

会谈的翻译是苏联外交部翻译处的三等秘书 С.В. 别列日科夫，记录员是苏联外交部第三非洲司的二等秘书 С.И. 波捷欣、苏联外交部第三非洲司的三等秘书 P.A. 伊波拉欣莫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Л. 伊利乔夫（签字）

№06088

## 伊利乔夫与卡西姆第二阶段的会谈记录

(不晚于 1977 年 8 月 13 日)

### (第二阶段)

1977 年 8 月 7 日代表团团长从摩加迪沙返回莫斯科。1977 年从 8 月 8~12 日在索马里代表团的下榻地举行了欢迎仪式。代表团团长 8 月 13 日又飞回摩加迪沙。

8 月 8 日

欢迎了卡西姆和索马里代表团，让人关心的是，代表团团长回摩加迪沙征求其领导的意见之后能通报些什么。

卡西姆介绍了索马里代表团的新成员，有：贾姆·穆罕默德，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索马里发展银行行长；艾哈迈德·杜阿列，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农业和畜牧业部部长。说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没有什么变化。代表团成员侯赛因·哈桑·法拉赫晚一些时候来莫斯科。

代表团渴望能尽快地返回莫斯科，以便能知道有关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对话的新情况。显然，苏联的代表已将这些情况介绍给索马里代表团了。

说，我们有一些关于地区事态发展的消息，显然，索马里一方也已熟悉。

众所周知，在谈判第一阶段的末尾，苏联方面考虑到非洲之角形势的复杂化和同各代表团进行个别谈话的结果，向双方提出了自己的工作文件，可能成为技术顾问们会晤有转机的出发点。现在我们希望索马里的代表们在回摩加迪沙征求了意见之后提出自己关于上述文件的看法。

卡西姆提出，在7月29日最后一次会晤上索马里一方已说明自己对苏联工作文件的态度，指出其中有许多严重的疏漏，就是：无论从什么角度上都没有提在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双方会晤时应该加以讨论的最基本的领土问题。因此，当时就宣布，这一文件是不能成为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进行谈判的基础。

交谈者声称，在第一个回合的过程中关于这份文件，关于同苏联代表们的所有会晤和会谈的情况，代表团都全面地报告给索马里的领导了。现在已得到自己政府的新指示，他应该重新声明的是，苏联的文件没有反映他的国家的立场，因为它没有提关于领土问题。

说，如果我们准确地理解了索马里一方的话，那么他对苏方工作文件事先的评价在征求过领导的意见之后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变化。换句话说，代表团认为，唯一应进行讨论的问题是领土问题，苏方提出的工作文件是不能成为进行谈判的基础的。苏方很想知道：索马里代表认为怎样使继续谈判具有基础。

卡西姆回答说，在同埃塞俄比亚的代表们进行任何辩论的过程中索马里一方过去放到第一位的，将来也要放到第一位的就是处在埃塞俄比亚殖民主义压迫之下索马里人民和索马里领土的非殖民地化问题。在讨论基本问题的情况下，他们也同意研究其他次要问题。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占第一位的应该是这一项基本问题。正是这样才能考虑，在苏联从中斡旋之下，索马里一方才提出了倡议双方进行会晤。

如果埃塞俄比亚一方能改变自己对于这一基本问题的态度，到那

时就能够开始同样地讨论其他次要问题了。

表示出来的意见是，现在索马里一方所阐述的立场，实质上是一种毫无选择余地的，事实上是一种最后通牒式的。

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确认，双方的观点是互相对立的。如果索马里代表团宣布只同意讨论领土问题，或者换句话说，是非殖民地化问题，那么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就拒绝研究这种问题，因为对埃塞俄比亚来说，革命和国家的领土完整是不可分割的概念，也是不能进行讨论的。

凡此种种我们认为，继续下去，只会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应该寻找途径摆脱影响开始辩论的所有障碍。强调说，工作文件的出现是我们同双方代表团个别会谈的结果。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双方同意工作文件上的规定，那么这就能够通过和平的途径调解好摆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面前的问题。

苏联承担从中斡旋的使命，其出发点就在于双方能采取积极的态度。因此，我们企望索马里代表团提出进行审查的索方文件能反映出积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该文件很有可能成为进一步进行谈判的一定基础。我们可以想象到，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是能够这样办的。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共同努力之下结束战争的扩大。

可是，如果问题的情况如旧，或是讨论领土问题，或是拒绝辩论，因为，对此问题似乎还没有形成应有的基础，那么意义同样，实际上这是破坏双方之间进行谈判的最大可能。相反，在目前的条件下，应该做的一切都是试着寻找某一种统一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说法，依靠这一点事情才能向前推进。

卡西姆声称，某些事实和事件索马里一方是采用不同于苏联的态度去审察的。首先，这关系到要求停止军事行动问题。索马里一方认为，军事行动不是昨天，也不是两个星期之前开始的，而是索马里人民站起来同埃塞俄比亚殖民主义者进行武装斗争，已经进行



了20多年。交谈者再一次重复说，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不参与任何军事行动。因此，应该向反对西索马里解放阵线而进行战争的埃塞俄比亚提出这种要求。如果从他们一方能够停止军事行动，那么很显然，解放阵线也就放下了自己的武器。结果我们才能同埃塞俄比亚讨论我们相互之间关系正常化问题。

接着卡西姆要求明确的是，为什么苏方得出结论说，索马里的态度破坏了经苏联从中斡旋而举行双方会晤的思想本身。难道不正是索马里提出倡议进行这种会晤的吗？而同时埃塞俄比亚一方则根据苏联代表团的通报判定断然拒绝讨论领土问题。索马里过去和现在都支持用和平的办法解决问题，而且也支持苏联继续进行从中斡旋的使命。

至于说最后通牒式的态度，那恰恰是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所坚持的。埃塞俄比亚一方在拒绝讨论领土问题的同时，还同样采取僵硬不妥协的态度。索马里代表团认为，如果能接受首要审理问题的下述程序：非殖民地化问题在先，然后才是由此而产生的其他一切问题，那么工作就会出现一定的起色。

索马里代表团是怎么理解的，邀请他们返回莫斯科并不是为了要知道他们有关对苏联工作文件的意见，而是为了通知他们什么新的信息。

已弄清楚的是，索马里代表团自己表示打算返回莫斯科。其希望是，正如我们理解的那样，要寻找在实事求是环境下解决问题的途径。

为什么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会晤一开始不能讨论主要问题，也就是领土问题呢？对这一问题可能的回答是，首先要求双方都得停止军事行动，只能在这之后才可以讨论无论是索马里，还是埃塞俄比亚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

强调说，作为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忠实朋友，友好和合作条约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要求它停止军事行动并且还要求它所做

出的一切都是为了同埃塞俄比亚关系的正常化。

卡西姆对苏联为了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双方之间开始对话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索马里政府，索马里革命社会党和人民对苏方关心解决作为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相互关系基础的关键问题表示感谢。他们不止一次地特别表示出自己信赖苏联的努力，因为对待所有发展中国家，显然其中也包括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索马里都是出自它的国际主义义务。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今后还将发展自己同苏联的合作关系，而且还希望苏联继续努力寻求解决主要问题的办法，直到该问题得到彻底的调解为止。

交谈者继续声称，然而，不得不重复的是，在苏方提出的工作文件中有严重的疏漏。索马里代表团只能提出自己的文件，而其中占第一位的问题是关于处在埃塞俄比亚殖民主义压迫之下的索马里领土的非殖民地化问题。

接着卡西姆感兴趣的是苏联对西索马里人民解放运动的态度。至于说到我们，他说，那么我们认为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就像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其他等一样都是民族解放运动。

交谈者说，殖民主义者之间，不论他们的肤色如何，是不可能有所差别的。当然，过去的欧洲殖民主义列强试图证明，他们的殖民地似乎在法律的基础上都是宗主国的组成部分，但是，同样也很自然的是世界共同体批驳了这些主张。索马里也是这么做的，因为，问题涉及到埃塞俄比亚把索马里的土地殖民地化了，埃塞俄比亚把这些土地并入自己的版图。

西索马里人民完全有权在为本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直到埃塞俄比亚放弃自己的殖民主义政策为止。因此，这一斗争还将继续下去。

埃塞俄比亚的新体制是在利用社会主义漂亮的空话，可是，实质上却在继续原帝制的殖民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的特点，同从前一

样就是虚情假义和两面派。现在，当极其尖锐地提出部分索马里领土非殖民地化的问题时，这一体制企图引开世界舆论的注意力，虚情假义地指责，似乎是索马里开始侵略，反对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人同意在莫斯科会晤，与此同时还在找各种国际组织，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这能证明他们的真诚吗？

再说，当谈到关于埃塞俄比亚时，这里指的不是埃塞俄比亚人民，索马里同他们有着悠久的联系，而是指在其国内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的新体制。

可看到，苏联和索马里各方对在埃塞俄比亚所发生的事件和新体制所采取的一些实际措施的评价，已弄清楚，是不一致的。除此之外，该问题已超出当前会晤的目的范围。

苏联同意从中斡旋的观点是明确的，也是毫无歧义的。它是为了帮助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寻求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问题的途径。如果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对苏联爱好和平的政策表示信赖，也信任我们的良好愿望，那么就不能不注意到我们的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要求。现在索马里正规军参与军事行动的事实已不会引起怀疑。关于这一点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而且，还是最高级的人物提出的。

一切争论问题只能在和平的形势下坐到谈判桌上加以解决。现在我们作为从中斡旋的一方希望能得到索马里代表团的工作文件，如果其中能考虑到苏联工作文件的规定，那么索马里代表团用这一点就能表明国家的英明。

在下次会晤上继续交换意见。

8月10日

欢迎了索马里代表团的团员们，并且问他们能通知苏方什么新情况。

卡西姆感兴趣的是埃塞俄比亚的技术顾问代表团是否已抵达莫

斯科。看来，这是第二轮回合谈判开始的时机。

已证实的是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已抵达莫斯科，而且指出，苏方同他们已进行过会谈。其主要结果是埃塞俄比亚的技术顾问们已考虑好，对已形成的局势做出现实的评价，用工作文件的形式提出了能代表自己意见的想法。他继续说，我们希望能收到他们提出的这一文件，今天，我们更盼望的是你们提出的这份文件。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同我们一样都认为，双方通过书面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更为合适。拥有三方的工作文件，尽力去制定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就能更容易一些。

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今天我们同索马里代表团的谈判以转交工作文件到此为止。这就有可能使对话转入具体问题。

卡西姆说，工作文件和解决摆在我们面前问题的原则方法之间是有差距的。而且后者也不能提出什么必需的工作文件。

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埃塞俄比亚一方的原则立场如何，其态度能开始看到有什么起色。

指出，苏方感到很为难的是，准确通报双方代表团每一方所坚持的态度。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口头通报的。总的来说，索马里代表团所持的观点是同埃塞俄比亚的观点完全相反的。

我们认为，继续下去，看不出工作文件之间和双方原则对做法上有任何矛盾。正如前面我们指出的那样，苏方向双方代表团提出自己的工作文件供讨论，其根据就是地区的冲突局势愈来愈尖锐，而且，双方都在坚持不一致的观点。为了保证工作有起色，我们要求双方代表团所提交的工作文件既能反映他们的观点，又能反映对苏联工作文件的态度。根据我们的看法，这就是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关系走上正常化道路的第一步。

从事从中斡旋使命的苏联一方收到双方代表团书面形式的想法之后，就有了思索下一步措施的基础了。

卡西姆更明确地说，使他感兴趣的并不是埃塞俄比亚一方观点上的细微差别，而只是它对会晤本质的原则态度。我们代表团认为，其实工作文件在辩论过程中能够编制出来，显然，为了这一点我们和埃塞俄比亚人都应该互相了解观点。

然而，索马里代表团同意提交自己有概括性的简要通报，决不重复已经说过的一切，只阐述它的原则立场。我们要苏联代表能转给我们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编制的文件副本，以便熟悉其中的内容。很自然，我们不反对把我们的文件转给另一方。然而，如果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对这一点有什么反对意见，那么显然就没有必要把我们的文件转交给他们了。

（卡西姆亲手将索马里代表团附有译文的文件原本交给了伊利乔夫）。

再一次强调说，苏联从中斡旋的使命是在调解他们的相互关系上向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提供全面的帮助。很自然，是在双方代表团都同意的情况之下相互都向对方介绍他们工作文件的内容，我们就是要做这些。

卡西姆强调说，在分析了苏方编制的文件的同时，然后又阐述其意见是索马里代表团千方百计地竭力避免做出断然的结论。我们企望苏联代表们同样也能准确地对待索马里的文件。

然而，他继续说，我们很想再一次指出，苏联的工作文件中并没有我们总是在说的那个主要问题，也就是他应该认为是最重要的。

他指出，虽然现在转交的文件中没有反映出索马里一方对待我们工作文件的态度，它用口头的形式已做出这种反映。

我们赞同你们的意见，为了探索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不应该采取断然、最后通牒式的立场。

卡西姆在结束会谈时说，索马里代表团很想请苏方下一次给予

协助。由于索马里代表团的代表们没有做会谈记录，所以，索马里一方希望能得到苏联同志所做的记录。

回答说，苏联代表团对索马里一方谈话的革命内容只做简要的记录，而不是共同的记录。众所周知，预先并没有规定相互要交换会晤的记录稿。如果索马里代表团对其意见应有的固定说法有什么怀疑的话，那么你们就可以放心了。

卡西姆声称，看样子对他的理解是不公正的。问题只是必须要有一些参考资料，以便能帮助索马里和苏联双方回忆会谈的全过程。很自然，应排除的是索马里一方对苏联从中斡旋使命的性质和形式产生某种怀疑。

如果苏联代表团如此对待我们的呼吁，那么我们就撤消我们的请求。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可以认为是全都涉及到了。建议下次会晤继续交换意见。

8月11日

他说，很想向索马里代表团通报关于埃塞俄比亚代表团转交给苏联代表备忘录的事。埃塞俄比亚的代表们陈述了形势，目的是为了把文件的内容用口头形式奉告索马里代表团。在这里他们指的是索马里简要工作报告的内容同样也用口头的形式通报给它。

卡西姆表示同意仔细听完埃塞俄比亚备忘录的内容。

指出，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备忘录中指出的是，对苏方筹备的工作文件已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它同时还声称，认为非洲统一组织委员会于今后8月5~8日在利伯维尔就调解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冲突举行例行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宣读了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革命决定部分）。

通报说，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备忘录中接着说的是关于在非洲统

一组织上述建议的基础上，以及根据苏联工作文件上的条款继续在莫斯科进行辩论的决定。（宣读了苏联工作文件的内容）。同时，埃塞俄比亚代表团陈述了保留苏联工作文件中条款顺序的愿望，它同时还表示希望根据非洲统一组织有关决议的文字和精神，彼此都同意上述所有条款就能停止军事行动和消除侵略的后果。

至于说索马里建议讨论领土问题，那么埃塞俄比亚一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它的意见，这种问题并不存在。

我们希望，研究埃塞俄比亚备忘录之后索马里一方应就我们进一步工作的进程，特别是在什么形式可以进行第一次三方会晤等说出具体建议。

卡西姆以索马里代表团的名义对埃塞俄比亚备忘录所陈述的内容表示感谢。接着，他感兴趣的是，埃塞俄比亚同意苏联在提出讨论领土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斡旋使命，这件事是否确实。交谈者指出，当索马里一方向苏联提出请求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关于正常化的事务进行斡旋时，它指的也就是这个问题才是进行讨论的主要对象。

回答说，交谈者已经注意到，正如在勃列日涅夫的回信中对西阿德·巴雷提出的问题所指出的，苏方已看清在进行斡旋的使命中的基本任务，目的就是要达到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关系的正常化。

在苏方对埃塞俄比亚提出类似的呼吁中可看出，苏联对索马里的要求表示支持，并考虑到能为埃塞俄比亚所赞同，所以，同意为了审理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化问题从中进行斡旋，协助通过和平的途径坐到谈判桌上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论问题。

卡西姆说，如果他已正确地理解，那么在辩论的过程中苏方就不能把领土问题理解成是应该进行讨论的那些问题的一部分。

解释说，在一件西阿德·巴雷的信函中确实阐述过索马里政府

关于必须审理领土问题的观点。可是，苏方的回函中却没有确定在他实现其斡旋使命过程中能够提出进行讨论问题的范围。在形成的局势中苏方认为，在我们的工作文件中已反映了这一点，就是为了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关系正常化决定采取第一步措施，首先必须解决停止军事行动问题。而这一点照样地也能创造正常的气氛，使有可能进一步通过和平的途径，而不是诉诸武力的办法去解决两国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问题。

卡西姆强调说，当苏联同志说到必须停止军事行动时，他应该指出这样的事实，即索马里人民的解放力量在进行反对埃塞俄比亚军队的武装斗争。

索马里代表团是能够用其手中所掌握的现有资料来证明这一点的。

接着，他感兴趣的是，苏方理解“形势正常化”这一术语。如果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关系中已存在有紧张气氛，那么其首要原因就是部分索马里人民的居住地在继续变成埃塞俄比亚的殖民地。如果埃塞俄比亚认为不存在领土问题，它并没有侵占部分索马里的领土，那么我们就不能把这一点看成是严肃的立场问题去进行谈判。

我们的政策并不在于当在地图上提出了涉及人民命运的问题时，要想寻找什么应急办法和巧妙手段。我们是客观地对待已经形成的局势，不过，我们很遗憾的却是在我们的对方中间看不到有类似的态度。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很想讨论停止军事行动问题。然而，西索马里人民的解放运动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停止进行武装反抗：如果人民能获得自决权。埃塞俄比亚的行动是违背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章程和决议的。

在 1973 年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第 10 次例会上根据索



马里的要求成立了斡旋委员会，其任务就是使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关系的正常化。然而，其活动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埃塞俄比亚拒绝同委员会合作。现在，当处于埃塞俄比亚统治下的索马里人开始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积极的斗争时，看来，该国家已看到应恢复斡旋委员会的活动，其工作过去曾千方百计地受到阻止过，因为对其无利，所以要摆脱。

我说，必须客观地看待已形成的局势。不论是索马里，还是埃塞俄比亚，都是同苏联友好的国家。我们同其中的一国已签订友好和合作条约，同另一国也发表关于相互关系友好和合作原则的宣言。我们在自己面前提出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解决争论问题的愿望引向政治调解的轨道。出这种主意、这种建议的只能是朋友，是高度珍惜自己同一方，也同另一方关系的朋友。

现在的客观情况是这样：正在进行军事行动，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参加行动的是索马里武装力量的分队。摆在我们面前作为进行从中斡旋的国家只有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是心平气和地去观望有的地方在流血，或者是表现出自己的忧虑，非常的不安。同样，还必须考虑到的是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描绘出来的是燃烧起狭隘民族主义强烈欲望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的形象。在这种条件下真诚的朋友是不能袖手旁观的，也不能不去努力制止诸如此类的事态发展，因为，这会引来严重的后果。要知道其结果是双方都有逐步被占领的危险。在这种局势下，除了停止流血这个主要问题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能够解决呢！

你们询问，在听取了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的意见之后，苏方坚持什么立场。我们的观点是，必须采取在我们的工作文件中已提到的第一步措施（对文件的条款做了说明）。苏联对这两个国家都满怀尊敬，认为执行其工作文件的建议是惟一正确的措施。双方都表示出有良好愿望的情况下，在这一措施之后，显然，还应该

采取方向是为了同我们关系友好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其他办法。

我们不想马上评论是这一方正确，还是另一方正确。我们有权力去做一切，为的是不带任何成见地去帮助创建能调解两国之间尚未解决问题的正常条件。

我们表示希望我们的斡旋使命能够继续下去。

卡西姆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对苏联理解关系正常化这一术语问题，他没有得到回答。

指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包含在苏方的工作文件里，其内容已刚刚引证过。

卡西姆说，他很想得到就某一些问题的补充说明。特别是，当说到关于渴望两国之间关系正常起来时，苏方提到可能解决所有争论问题。在这个清单里是否也包括领土问题。

同时，不清楚的是当提到燃烧起狭隘民族主义强烈欲望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时，指的是什么。最后，宣布说，必须解决主要问题。

我们感兴趣的是苏方说主要问题指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很想采取第一步措施，但是，同时还想知道，他们会引向何处。希望，在最近的一次会晤上我们能收到相应的说明。

索马里代表团要举行必要的一些咨询会议，然后，再就今天通知它的信息陈述自己的看法。

我说，苏方对此已知悉。

8月12日

互相问候之后说，交谈者知道，苏方已通报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关于索马里代表团工作记要的内容，索马里代表团照样也熟悉了埃塞俄比亚一方的备忘录。

结果清楚地描绘出双方所坚持的态度立场。让人感兴趣的是索马里代表团下一步工作具有的性质。

卡西姆赞同谈判的总形势是清楚的这一看法。他继续说，从埃塞俄比亚口头陈述的工作纪要中能明白的是另一方同原来一样仍然在坚持断然、僵硬的立场，甚至可以看做是最后通牒。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完全不能接受的是在会晤时应讨论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看法，应该是现在的主要问题。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拒绝审理索马里的领导人和处在埃塞俄比亚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索马里人民的非殖民地化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像索马里代表团认为的那样，会晤还在继续。

我们的出发点同原先一样，应绝对优先审理的两国双边关系问题就是领土问题。

至于苏联代表团的立场，那它在举行会谈的过程中就清楚地为我们确定下来。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对索马里一方有关苏联工作文件方面观点的反应。

卡西姆继续说，我们想以同志的方式对苏方寻求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会晤时的共同立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表示极大的感谢。我们代表团完全赞同关于苏联继续进行斡旋使命的意见。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索马里代表团认为必须回摩加迪沙并向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和索马里政府报告关于谈判上已形成的局势。

强调说，苏联打算继续从事从中斡旋的使命。感谢对话人能高度评价苏联为寻求互相都能接受的解决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关系正常化的办法所付出的努力。

同时应确认的是同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举行个别会晤和会谈的结果是，双方暂时都不妥协，实际上都在坚持互相排斥对方的立场。

然而，苏联代表团和从前一样认为，在事态的发展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有关履行苏联工作文件的规定是办不到的这样的事情。这一文件仍然有效，甚至还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还在继续扩大军事行

动。显然，苏方已经看到已产生的困难，也了解每个代表团对审理现有问题的态度。不过很明显的是做出任何结论都有些匆忙，尽管“砰的一声门已关上”。相反，为寻求合理解决同苏联有友好关系的两国之间问题的大门却是敞开着。

对交谈者和索马里代表团的团员们能同苏方合作表示感谢。举行一些会谈的特点是坦诚直率，就像朋友之间应有的那种样子。同时，还希望，索马里代表团征求领导人的意见之后再返回莫斯科，以便能继续交换意见。

最后，感兴趣的是，索马里代表团打算什么时候飞回摩加迪沙。

卡西姆回答说，8月13日星期六代表团乘民航的航班起飞。

对在莫斯科的索马里代表们给予殷勤地接待表示感谢之后，卡西姆请求继续两个人单独进行会谈。

在单独会谈中卡西姆谈的内容如下。

第一，索马里技术顾问代表团感到不安的是得到关于在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上有一些打算的通知。众所周知，索马里珍惜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埃塞俄比亚同苏联保持关系并且它还宣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虽说索马里在评价这些原则上同埃塞俄比亚有分歧，而且根据索马里的看法，埃塞俄比亚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道路上还没有真正地站立起来，但仍然还有希望的是，埃塞俄比亚目前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会导致积极的结果。

虽然根据现有的情报看，暂时情况还不十分完整，摩加迪沙却认为，埃塞俄比亚可能“从手指的缝隙中”消失，然后去投靠另一个阵营。如果当采取措施组织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就重要问题进行谈判时，埃塞俄比亚却相反投到其西方传统联盟阵营的怀抱，这对历史来说，是一种耻辱。

交谈者说，苏方很清楚，索马里指望要在东非建立一个强有力

的政府，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把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都联合到一起。这说明，并不是随口乱喊口号，而是由于双方种族亲近，地理相邻，索马里像以前一样还希望思想意识上也一致。如果能够建成这样的联合政府，那么它就能成为发展东非洲地区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力量和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索马里对这样的一些通告很担心，也认为必须告知苏方这些的原因。

第二，在报刊杂志和广播中埃塞俄比亚发表的声明都相当坚决，说它打算对索马里进行一番教育，让它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同时还说，它打算公开向索马里宣战，在这方面能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其中还提到苏联。索马里代表团作为自己的朋友还提到苏联。索马里代表团作为自己的朋友想问苏联代表，这里有多少实话。索马里一方认为，在埃塞俄比亚有某种力量在行动，如果不是政府的兵力，那就是亚的斯亚贝巴的其他一些什么集团，这种势力在发泄战争的狂热。因此，代表团认为必须将这一点也要通报苏方。

对情报表示感谢。指出，索马里代表团的第一次通报过于笼统。帝国主义和阿拉伯反动集团的阴谋以及他们的打算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既要打击埃塞俄比亚，也要打击索马里。两国宣告实施的社会主义方针他们并不满意。显然，必须提高警惕。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所形成的局势，据苏方看，有助于实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目的。索马里走上为了在东非洲建立按你们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这条路，会更快地损害你们摆在自己面前的目标。我们都清楚的是，在埃塞俄比亚存在有反动势力，存在有内部的反革命，在埃塞俄比亚正在进行斗争。

不过，根据我们的情报，埃塞俄比亚的领导核心执行的是进步

方针。遗憾的是，在这件事上对其评价我们同你们有分歧。

众所周知，在同苏联大使的会谈中，西阿德·巴雷声称，索马里政府并不反对苏联在两国签订协定的范围内提供给埃塞俄比亚援助。我们援助埃塞俄比亚，同样我们也援助索马里，但是，你们知道，这种援助的目的是为了国家防御，而不是为了侵略。

他说，在报刊上我一直都没有看到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的声明，说他们打算“要对索马里进行一番教育”。很可能这是公众舆论手段所干的事。很遗憾，双方的公众舆论手段都在互相指责对方，而且都很过分。因此，苏联希望不能随心所欲地感情用事，而要谨慎明智从事，不能从民族利益出发，而要根据国际主义，根据巩固进步力量的立场利益行事。现在已形成的局势很危险，如果不加以抑制，那么它就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这类冲突的不可逆转性可造成重大的后果。

因此，苏联领导们友好地规劝你们领导人要考虑整个形势，行事要有开阔的国家和国际主义的胸怀。苏联希望同其有友好关系的两国之间能避免冲突。现在主要的是终止扩大紧张局势，停止流血。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势是，现在除了苏方在工作文件中提出的建议之外，已没有其他进行调解的基础了，因为埃塞俄比亚一方已经接受了苏方的文件，而索马里代表团，很遗憾还没有接受。

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谈判的进程并没有使你们双方代表团都满意，而且连苏方也都不满意，虽然苏方已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可是我们认为还必须继续努力，以便达到事态的转机，这才合乎进步势力和社会主义的要求。

卡西姆指出，西阿德·巴雷在同苏联大使进行会谈时确实说过，索马里并不反对援助，其中包括苏联给予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援助。但是，他同时还说过必须遵守均衡关系。交谈者声称，很想表示出真心诚意地希望苏联在处理事务时要明白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到目

前为止，暂时还没有解决索马里的部分领土问题，索马里的革命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再说这种危险并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因为索马里的部分领土正处于埃塞俄比亚的统治之下。诸如此类的危险激起生活在不属于索马里版图的领土上的索马里人一种巨大的渴望要获得民族的解放。为了索马里能在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做出贡献，整个索马里民族应该坚强地站稳脚跟。

在西阿德·巴雷同埃塞俄比亚军事行政委员会的前任主席捷费里·班季会晤时，就曾建议他作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联邦的领导人，以便能那样解决民族的问题。但是，埃塞俄比亚却否定了这一建议，因此，在西索马里所造成的局势就超出了监督的范围。卡西姆希望，苏方能完全理解这些话的含义。

声称，我只能重复的是，我曾说过的，并希望索马里一方能正确地理解说过一些话的含义。还补充说，如果不停止军事行动，就应该意识到索马里应承担的那种全部责任。

参加会谈的：苏方有苏联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 O.H. 赫列斯托夫、苏联外交部非洲第三司司长 B.A. 乌斯季诺夫；索马里方面的有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索马里发展银行行长贾姆·穆罕默德，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农业和畜牧业部部长艾哈迈德·穆罕默德·杜阿列，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阿里·哈吉·哈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阿里·伊斯梅尔·瓦尔萨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驻苏联使馆武官萨拉赫·哈吉。

会谈的翻译是苏联外交部翻译处的三等秘书 C.B. 别利日科夫，记录员是苏联外交部第三非洲司的三等秘书 P.A. 伊波拉欣莫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И. 伊利乔夫（签字）

附 件

1977年8月10日会晤时，索马里代表团转交  
给苏联代表团的文件（英译俄）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索马里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就解决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以达到公平合理地和平地和牢固地解决这一领土问题为目的，从中进行斡旋。

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得到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完全同意之后，苏联同意履行其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义务，接受从中进行斡旋的使命。

考虑到，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政府授权高级代表的代表团全权代表政府，就上述问题进行辩论和谈判。

同时还考虑到在1977年7月的最后一周和8月8日这一过程中苏联和索马里双方之间进行交换意见。

对苏联代表于1977年8月8日向索马里代表团提出的呼吁做出反应，就是提交工作文件，它能成为进行辩论的基础。

应认清的事实，就是埃塞俄比亚将大部分索马里的领土及其居民殖民地化，这是目前在非洲之角造成紧张局势的惟一原因，以及这样的紧张局势无疑是不符合该地区人民的利益，而只能符合共同敌人，国际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利益。

因为坚决深信不疑的是，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长期争论的首要原因就是大部分索马里领土及其居民继续被埃塞俄比亚殖民地化和加以军事占领，所以，该领地的非殖民地化则是压倒所有其他一切的、绝对首要问题。

根据列宁的原则，各民族都享有自决、人格、自由和民族主权



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以及在以后的联合国大会 1514 号决议中都有反映，而同时，埃塞俄比亚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是要永久保留对上述索马里领土及其居住的居民进行殖民统治，显然是同这种高尚的原则相对立的。

索马里代表团提出下述意见作为辩论的基础：

“处在埃塞俄比亚统治之下的索马里领土及其居民的非殖民地化”。

C. 别列日科夫译<sup>①</sup>

---

<sup>①</sup> 文件上有批注：“索马里代表团团长在转交文件时，称它是代表团就基本问题陈述看法的工作纪要。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情报资料处处长（签名）”

№06089

## 伊利乔夫与卡西姆第三阶段的会谈记录

(不晚于 1977 年 8 月 19 日)

### (第三阶段)

1977 年 8 月 14 日索马里技术顾问代表团团长返回莫斯科。1977 年 8 月 15~19 日在索马里代表团的下榻地举行欢迎仪式。代表团于 8 月 20 日飞回摩加迪沙。

8 月 15 日

卡西姆代表索马里代表团对苏方能找到机会有效地举行这次会晤表示感谢。

接着指出，他曾答应尽可能快地从摩加迪沙返回，如今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只隔 24 小时就回到了莫斯科。让人感兴趣的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朋友是否能表现出这种工作的高效能。

我说，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离开莫斯科的那一天，正好索马里代表团团长也离开了莫斯科。显然，苏方晚些时候才能知道埃塞俄比亚代表团返回苏联的时间。

卡西姆接着说，在莫斯科继续进行交换意见的需要使我迅速地回来。这一类咨询会议具有积极的意义，能够使索马里一方得到满意。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的是，8 月 14 日塔斯社有关非洲之

角地区事态的声明。很想得到有关上述声明一些情况的说明，首先是关于促使苏方做出这类声明的原因和动机的说明，因为，这种声明给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带来了新的机遇。

早在7月25日的会晤上，双方代表团就商定，谈判要能推心置腹。塔斯社的声明，根据索马里一方的意见，却是背离了已达成协议的要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的程序。卡西姆说，两个代表团在苏联的从中斡旋之下有了接触，现在这种接触却公开了，这就是对上述程序的破坏。

回答说，塔斯社的声明并没有什么新内容，索马里代表团从其上一次同苏联代表们的接触中也没有知道什么。塔斯社的声明中并没有包含有关苏方从事斡旋使命的什么情况。推心置腹的谈判没有受到破坏，因此，索马里代表团团长就匆忙地做出结论，说情报有流失现象。同时还强调说，苏方所从事的斡旋使命仍然还在继续。

卡西姆对有关他们匆忙做出结论的说法表示反对。补充说，会晤一开始就对谈判程序达成了协议，如果连谈判的内容也没有泄露出去，在程序的顺序上就背离了协商的结果。在进行推心置腹的谈判时，从中斡旋的使命要求特殊的谨慎和信任。索马里代表团团长离开莫斯科只有一昼夜，而在此期间苏联的报刊上就公布了塔斯社的如此重要的声明，其中说索马里一方没有及时地让公众了解。这一声明的出现，根据索马里代表团的意见，只能导致关系复杂起来和冲突国际化。应该坚持和遵守原则。不然，双方就会遇到不必要的“出人意料的事”。

回答说，对交谈者所说的上述问题完全不同意。无论我们会晤的程序，还是原则都没有遭破坏。从中斡旋的使命仍然不公开，任何地方也不能把它宣扬出去。至于说在苏联报刊上刊登的内容，那么这个问题却完全是在苏方的管辖范围之内。这无论如何也涉及不到斡旋的使命，关于这一点在塔斯社的声明中一个字都没有提。如

果没有各种议论和流言蜚语，那么最近在反动报刊上诸如此类的挑拨性材料公布的也并不少。

卡西姆说，在塔斯社的声明中还是有所透露，根据他的意见，关于苏联的斡旋使命，特别是他引证了声明中的第五段，是这样说的：

“苏联从其国际主义义务出发，怀着对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友好感情和深深的敬意，已努力并继续不断地努力用和平的手段促进调解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确保非洲之角稳固和长久的和平。和平地在政治上通过在谈判桌上的谈判解决复杂问题，其中包括殖民主义过去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这是惟一正确而明智的途径”。

接着卡西姆引证了声明的开头说，“根据得到的情况，在埃塞俄比亚的领土上，在欧加登地区，正在继续扩大索马里正规部队和埃塞俄比亚军队之间的战斗行动。飞机、坦克、大炮都参与了军事行动”。在塔斯社的声明中直接而又明确地说，在埃塞俄比亚的领土上正在进行战争，索马里的正规军参与了这一战争。因而，问题是索马里人入侵了欧加登地区。根据索马里一方的意见，这一声明包含着针对索马里的断然指责。

我再次强调说，苏方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破坏斡旋使命的程序。索马里代表团有意变动一下范围，试图把苏联报刊上有关非洲之角事态的报道同苏联实现斡旋的使命连在一起。此外，推心置腹地对索马里代表团团长说，苏联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本人再一次致函西阿德总统，表达了苏方对在非洲之角地区所发生事件的观点。这一点在塔斯社的声明已经公布。

至于苏联努力用和平手段调解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并确保非洲之角稳固和长久的和平，那么这种努力在苏联行使从中斡旋使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斡旋使命只是这方面的行动之一而

已。在这方面强调说，塔斯社的声明，根据我们深信不疑的看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而且也不应该使谈判产生困难。

卡西姆说，塔斯社的声明对索马里一方来说是极其意外的。还补充说，如果在这方面它有意见的话，那么他们涉及到的只是程序问题。他继续指出，索马里代表团想同苏方继续交换意见，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就提出自己具体的建议。

最后，再强调说，苏方一点都没有破坏会晤的程序。

8月17日

对索马里代表团的团长和团员们表示欢迎。

卡西姆感兴趣的是埃塞俄比亚的代表们是否已返回莫斯科。

回答说，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暂时还没有来到苏联。苏方并不掌握埃塞俄比亚代表团近期的打算。

卡西姆说，正如在最后一次会晤上商定的那样，索马里代表团同意提出自己有关今后工作的想法。同时应提一提，很难想象在另一方缺席的情况下能够向前推进多远。

卡西姆继续说，希望作为我们工作基础的某一些因素应该更明确，我想强调的是，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现有的争论决不能同非洲的其他边界争论相提并论。只要回忆一些历史事实就足够了。到19世纪末，非洲有两个独立的国家——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他说，幸亏现在涉及到殖民化还是非殖民化问题上，我们没有对第一个国家产生什么不良的感觉。

说到埃塞俄比亚，必须指出的是，它同欧洲列强一样参与了殖民主义瓜分大陆的行动。早在1891年，埃塞俄比亚皇帝曼涅里克二世就致函英、法和意大利等国政府，指出，如果欧洲列强来到非洲是为了瓜分它，那么埃塞俄比亚并不打算作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也就这样，结果分三个阶段：1897年、1948年和1954年，索

马里的领土并入了埃塞俄比亚的版图。谈到这里时，卡西姆补充说，最近在某些的圈子里，他指的不是莫斯科，开始表露出有关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领土争端的本质的一些想法。他们试图使人相信，这一问题应该按照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并根据有关非洲国家在他们获得独立时划定边界的“占领地保有”<sup>①</sup>原则加以解决。

然而，根据索马里一方的意见，只有过去曾经是殖民地的那些国家才能适用这一原则。西索马里是在它已是独立国家的时候陷入埃塞俄比亚控制之下的。

卡西姆继续说，索马里政府不止一次地试图在其他非洲国家的帮助下开始同埃塞俄比亚政府对话，目的是和平解决索马里领土非殖民地化问题。可是，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对此坚定地回答却是拒绝。

结果，西索马里的爱国力量就拿起了武器，以便解放自己的祖国。就是这样便产生了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它绝对不是什么起义者、恐怖分子、分立主义者或者是叛乱者等集团。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确实是为了自己祖国的独立而开展起来的解放运动。该阵线的行动激发人们向往社会的公正，其目的是获得解放之后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索马里一方坚信，西索马里解放阵线不会停止自己的合法斗争，直到为寻求和平解决问题而采取实际措施为止。

索马里代表团认为，应该放弃互相指责和反指责，应该避免任何类型尖酸刻薄的声明，而应该想办法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至于说索马里一方，它诚恳、坦率地承认形势的复杂性，按它的意见，这种态度是能够找到彻底调解任何问题的办法的。

索马里代表团是根据其政府的指示持这种立场的。根据它的坚

---

<sup>①</sup> 原文为拉丁文 *uti possidetis*，意为允许交战各方分别占领在结束军事行动时所实际占领的地区。

定信念，只是确定争论的性质，承认提出非殖民地化问题的合法性，还可以想办法调解其他问题。

索马里代表团完全不能接受指责，说有索马里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领土的事。换句话说，就是它断然否认索马里武装力量的正规部队参与了当前冲突这一事实。

然后，卡西姆，根据他的判断，话题转到分析会晤的具体机遇上。指出，索马里代表团实际上是第一次陈述自己对苏联工作文件的看法。我们认为，他说，该文件的许多想法，首先是其前两项的内容带有泛指性。但是，根据代表团的意见，他们并没有充分考虑已形成形势的现实，因此，对当前的谈判并不完全合适。显然，问题就带有泛指性，是能反映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也是按原则正确地提出的，但是，他们却不能成为谈判的基础。

代表团建议就下述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点：“埃塞俄比亚完全承认和同意处在它占领下西索马里人民享有无条件独立的权利”。

根据索马里代表团的意见，这就是 *condicio sine qua non*，换句话说，这一点是首先应讨论的，否则就不可能再去研究其他问题。

第二点：“和平获得独立的形式以及尽快停止目前在埃塞俄比亚政府和西索马里解放阵线之间正在进行军事行动的途径和方式方法”。

我们认为，卡西姆指出，这两点是能够全面反映客观实际的。至于说其他问题，那么我们是同意苏联工作文件中指出的第3、4、5点所包含的一些想法。

所有这些情况在索马里的文件中在连续不断地陈述，所以，根据代表团的意见，这些问题似乎同样还应该在会晤时研究。

至于说在埃塞俄比亚的备忘录中包含有关于索马里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论点，那么索马里代表团对此却完全不接受。我们打算讨

论埃塞俄比亚人向我们提出的那些问题。既然索马里并没有侵略埃塞俄比亚，因而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这一个问题；既然没有侵略，那么讨论消除其后果的问题同样也就毫无意义了。

说苏方细心地听取了索马里代表团对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关系现状的历史前提以及代表团新工作文件基本方面的一些看法。

我指出，遗憾的是在索马里的文件中关于拒绝对方尽力停止敌对行动的事什么都没有说。虽然索马里代表团肯定地说，苏联文件中的第1和第2条带有泛指性，苏联代表们仍然像从前一样认为，它们绝对是具体的，因为，它们的目的是无条件地停止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军事行动。

苏联代表团坚持的意见是，现在双方都加入了武装行动。所以，在它看来，解决现有一切问题的前提首先应该是放弃采取任何军事力量。这是关键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才能够为在和平状态下进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强调说，苏方考虑到一切情况，也注意了已形成的局势，认为其文件中的一切条款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他们确都是经过冷静分析形势之后指出来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要求索马里代表团再次认真研究苏联工作文件中的前两点。

我强调说，苏联从事从中斡旋的使命，这是勃列日涅夫和西阿德·巴雷交换信函的结果，并不是要讨论什么具体的问题或者是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在关系上所产生的问题，例如，领土问题，<sup>①</sup>发生冲突的双方应更好地了解事情的实质。现在在已形成的局势里很难想像怎样才能解决任何一个具体问题。要知道，为此首先应该创造适当的条件。因此，苏方首先就看到自己所从事的从中斡旋的使命就是帮助创造这种条件，以便坐到谈判桌上解决一切问

<sup>①</sup> 此处档案复印件有几行复印不清。



题。

说，有关索马里代表团新工作文件方面的这些意见只能事先加以研究才行。

卡西姆指出，苏联工作文件中第1和第2点其实在索马里代表团工作文件中的第2点上就有反应。上面提到不论是这一个，还是另一个文件中的一些情况都不是相互排斥的，因为他们实际上都反映了问题的本质。索马里一方并没有拒绝苏联同志提出的工作文件，同时还建议制定包罗万象的会晤日程，根据索马里的意见，索马里的文件中各点都能够成为会晤的日程。

索马里代表团同苏联代表团一样认为，必须停止双方之间的武装行动，指的双方就是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和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索马里政府是能够尽一切可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停止这些军事行动的，当然，在共同审理问题的范围内其条件是埃塞俄比亚政府采取措施提供西索马里人民独立的权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索马里政府才能采取在西索马里解放阵线方面的相应措施。

这样，代表团才能想象到，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着的，他们才能为谈判打下必要的基础。

卡西姆同时还说，索马里代表团留意到这种意见，即说出来的意见只是苏方初步的见解。

强调说，苏方希望每一方代表团，不论是索马里，还是埃塞俄比亚，在自己面前看到的不是敌手，而是谈判的伙伴。不用说，我们意识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却很高尚。苏联的代表们既不计较时间，也不计较精力，都是为了表示对双方的尊敬，都是一切为了同苏联友好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在会谈的最后，索马里代表团转交了自己的工作文件的文本（附后）。

8月18日

根据索马里代表团团长的请求，举行了单独的会谈。

卡西姆宣布：

1. 他受索马里政府的委托向苏联政府通报的是，在形势的发展中在东非洲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证明有些不是非洲国家却企图把冲突推向国际化和扩大化，还有的却在干预冲突。几天前西阿德总统在声明中说，有一个已参加社会主义合作的友好国家正在过问此事，其领导人和所推行的政策在索马里享有很高的威望。根据摩加迪沙得到的情报，古巴军事人员就被卷入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西阿德总统接着声称，在索马里民族的公民在欧加登地区正在死于不是非洲人之手这样的形势面前，索马里不打算袖手旁观。

2. 当说到帝国主义的报刊掀起谰言中伤运动时声称，索马里不能成为这一运动的牺牲品，无论帝国主义宣传使用什么诡计，它仍然和从前一样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巩固同苏联的友谊。

同时表示对某些事情的担心和惶恐，即从8月14日开始“在苏联报刊上出现大量的声明和评论”，并且指出，恰好在苏联实施斡旋使命，尽力帮助寻找能够摆脱在东非洲业已形成局势出路的时候，诸如此类的声明就是对帝国主义宣传的火上浇油。这一类报道根本就不能促进实施从中斡旋的使命，另外，不经苏联政府的同意，这些声明也不可能得到发表。按他的话说，苏联报刊上开展的运动并不能为寻求和平解决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发生一些问题的办法创造有利形势。交谈者说，如果这种运动不停止，那么索马里人民开始就要问，为什么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演说都包含有对索马里的指责，又为什么索马里政府对此却没有反应。

接着有把握地说，帝国主义宣传所使用的任何诡计都不能欺骗

索马里，但是，其他别人却有可能落入其圈套而上当受骗。

我问，消息的可靠性有多大，能根据它发表声明说“古巴军事人员卷入了军事冲突”吗？你们是否已陷入帝国主义宣传的圈套？除此之外，这一类问题直接去问古巴同志不是更好吗？

卡西姆答，我们不说没有根据的话。就此问题我们已同古巴人建立了联系。

我说，至于交谈者关于第二点的声明，那么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第一，关于苏联和索马里之间关系的状况，以及对苏联给予索马里各方面的帮助所表示的感谢——愉快地接受。苏联过去是、今后也是要尽力保持和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苏联根据自己的倡议过去没有做过，今后也不会去做任何有害于这种关系的事情。

接着坚决地回答了声明的第二部分问题，包括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有关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冲突的一些论点是在给帝国主义的宣传火上浇油。

在提出这一点的同时，您是否能好好地想一想？我是否应该说，凡此种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苏联公众舆论工具的心愿。苏联的报刊客观上就其实质而言及其所发表的东西恰好都是专门揭露帝国主义阴谋诡计的，都是有助于促进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关系正常化的。交谈者很关注的是，在某一些时间内苏联的报刊已不再发表有关非洲之角地区发生事件的什么报道，而遵循的却是帮助创造有利于从事斡旋使命的形势。

问，索马里的报刊对帝国主义宣传机构的谰言中伤是如何反应的呢？请求解释清楚的，譬如，西方的报刊关于沙特阿拉伯支援索马里武器的报道，关于索马里向一些西方国家要求提供武器等的报道，可靠程度有多大。再一次强调的事实是，苏联报刊发表的一些东西绝没有使形势复杂化，而是相反，千方百计地在促进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关系的正常化。

交谈者从各个方面都关注苏联报刊所发表报道。说出的想法是，交谈者声明的第二部分多半应该看成是偶然的失言。

卡西姆回答说，说到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演说，他指的是某一些发表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帮助帝国主义的宣传，使其在社会舆论中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可是，他从不怀疑苏联报刊的客观性。重复说，根据他的意见，苏联报刊上最近发表的一些东西并不有助于巩固苏联和索马里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因为其中包含有针对索马里的指责，说它入侵了埃塞俄比亚。很有把握地说，从索马里一方来说任何时候也没有做过有损索马里和苏联之间友好关系的事。

指出，看来，如果发表的只是索马里一方的说法，那么对卡西姆来说，苏联的报刊就是客观的了。我们对客观性有另外的理解。交谈者关注的是，西方报刊关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向索马里提供军事援助，以及关于索马里向某些西方国家提出请求援助供应武器等报道的可靠性到底有多大，对以前提出的这一问题说了两次，他都没有回答。这一次想请他给予回答。（交谈者又一次地避开了，没有回答）。

会谈结束时卡西姆说，鉴于他转达给我的情报——“关于古巴军事人员一事”，通过苏联外交部第三非洲司 Б.А. 采波夫转交的他要同基里连科会晤的请求也就失去意义了。

此事已知悉。

8月19日

互相致意之后，索马里代表团团长发言。

卡西姆请求说——对苏方有关8月17日转交给它工作文件方面的意见。

首先指出的是，苏方表示自己有信心，尽管局势已形成，苏联

行使从中斡旋的使命仍将继续。苏联政府坚信必须寻求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关系正常化的途径。甚至已考虑到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双方的观点暂时分歧很大这种事实，苏联代表团仍然一如既往地确信，归根到底合理的想法最终要占上风的，解决争论问题也会被转向政治调解的轨道。只有这一途径是明智的。

至于说索马里的新工作文件，那么苏方正在认真地研究和分析之中。初步可以指出的是，该文件的内容，很遗憾，并没有提出向前推进的基础。其中提出来的中心问题多半都是对埃塞俄比亚一方的一些消极反应。根据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在上一次同苏联代表们会晤过程中所陈述的观点，我们是能够做出上述这样的结论的。

苏联一方同从前一样认为，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们建议它的工作文件只可能成为在会晤取得积极结果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作为以后采取积极措施，达到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关系正常化目的的基础。

卡西姆表示感谢，苏联打算继续行使自己从中斡旋的使命，因为，这完全符合索马里一方的利益和它的愿望。

接着交谈者重复了自己政府有关必须在埃塞俄比亚承认西索马里居民享有独立权利的基础上解决现有问题的观点。他指出，索马里始终不渝地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调解争论问题；同时，还认为全面支持各民族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斗争又是自己的天职。这完全是属于西索马里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卡西姆继续说道，在我们看来，在没有解决引起西索马里人民武装行动的成为人们关注中心的非殖民地化问题之前，是不可能涉及到进行什么建设性谈判的问题的。

然后，卡西姆声明，既然埃塞俄比亚代表团不在莫斯科，这样一来，在苏联代表们参加之下双方会晤的前景就不明确了，所以，索马里代表团打算飞回摩加迪沙。只有当苏方认为通知索马里的领导人恢复会晤很适当时，它再返回莫斯科。

强调说，苏联行使的从中斡旋的使命并没有完成，它还在继续之中。与此同时苏联代表团再一次提醒索马里一方注意的是，军事行动还在继续。愈来愈明显的是局势在沿着战争的轨道发展。因此，根据苏联代表们坚定的看法，首先必须停止诸如此类事件的发展，因为，这类事件可能失去控制，而引起的后果，在当前还难以预料。

国际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让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改变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企图。更有甚者，它愈来愈积极地进行活动，同时在玩弄民族感情。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献身于为社会进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这一事业的国家的国家，有可能为帝国主义提供借口，使他们利用非洲之角的事态，作为从事颠覆破坏活动的试验场吗？这里的答案只能有一个。

我说，苏联方面已经知悉索马里代表的声明，即他们打算回国，并愿意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重新坐到谈判桌旁进行谈判。还表示，希望索马里代表团能向其领导人汇报关于正在举行的会谈情况，以及苏方继续行使从中斡旋使命的真诚愿望。

参加会谈的：苏方有苏联外交部第三非洲司司长 B.A. 乌斯季诺夫；索马里一方有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索马里发展银行行长贾姆·穆罕默德，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农业和畜牧业处处长艾哈迈德·穆罕默德·杜阿列，索马里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阿里·哈吉·哈希，索马里共和国驻苏联领事馆参赞伊斯梅尔·阿里·瓦尔萨梅，索马里共和国驻苏联使馆武官萨拉赫·哈吉。

会谈的翻译是苏联外交部翻译处的三等秘书 C.B. 别列日科夫，记录员是苏联外交部第三非洲司的二等秘书 B.C. 沃罗比耶夫和苏外交部第三非洲司的三等秘书 P.A. 伊波拉欣莫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И. 伊利乔夫

附 件

1977年8月19日会晤时索马里代表团转交  
给苏联代表团的备忘录（英译俄）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代表团

考虑到在1977年7月的最后一周和8月上旬间，能早一些在苏联和索马里双方之间进行交换意见，1977年8月10日索马里代表团转交给苏方已确认的原则，各条款的顺序以及记录的内容。

1977年7月29日苏方转交了经过认真研究的，带有建议性的有关初步措施一些想法的工作文件。

断然拒绝包括有索马里侵略埃塞俄比亚这种论点的任何指责。

已确认处在埃塞俄比亚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索马里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和无条件独立的权利。

建议下述各点议事日程：

1. 埃塞俄比亚完全承认并同意处在它的占领之下的西索马里人民享有无条件独立的权利；

2. 和平获得独立的形式，以及迅速停止目前在埃塞俄比亚政府武装力量和西索马里解放阵线之间所发生的军事行动的途径和手段；

同意苏联文件中第3、第4和第5点所包含的一些思想，也就是：

3. 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都应放弃通过群众舆论的手段进行互相敌对的宣传活动，应鼓励努力致力于发展友好关系；

4. 应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保持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由于

领土问题的结果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并不符合其人民的利益，也影响统一力量为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而进行斗争；

5. 为了达到确定的目标互相之间建立和维持各种层次的联系。

原则看法：

议事日程上各项条款的顺序应保持本工作文件上排列的那样。

译者：C. 别列日科夫



№06110

## 拉塔诺夫同古巴驻埃塞俄比亚大使 诺沃阿的会谈纪要

(1977年8月23日)

摘自拉塔诺夫的日记

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会谈过程中，霍谢·佩雷斯·诺沃阿<sup>①</sup>根据门格斯图的要求主动恢复了关于向埃塞俄比亚派遣古巴军队的谈话。而且他说：“关于古巴驻埃塞俄比亚军事专家领导人阿纳尔多·奥乔阿在同门格斯图的一次会谈中说是否向埃塞俄比亚派遣古巴军队不取决于哈瓦那，而取决于莫斯科的不恰当声明，您是正确的。据古巴驻亚的斯亚贝巴大使馆所知，实际上劳尔·卡斯特罗不久前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的商谈过程中并没有提出能否向埃塞俄比亚派遣古巴军队的问题，因此奥乔阿没有任何根据向门格斯图作上述声明。我们决定把这件事告诉您，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和苏联同志的关系是开诚布公的”。

我向霍谢·佩雷斯·诺沃阿表示感谢。在谈到问题实质时我指出，请古巴军队问题，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对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领导人本人都是棘手的。因为请外国军队，而且不是非洲的军队，可能被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分裂主义分子用作借口，比现在更大规模地请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参加反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行动。

---

<sup>①</sup> 霍谢·佩雷斯·诺沃阿，古巴驻埃塞俄比亚大使。

霍谢·佩雷斯·诺沃阿对苏联大使所说的话没有提出异议。这次他对苏联大使关于必须同埃塞俄比亚领导人一起为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在莫斯科继续顾问级谈判作工作问题的谈话，也没有提出异议。

霍谢·佩雷斯·诺沃阿在谈话过程中保证，他已指示古巴全体外交人员和专家必须向埃塞俄比亚人讲清楚，苏联的援助在埃塞俄比亚人民保卫革命成果和国家领土完整事业中的决定性意义。

苏联驻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大使 A. 拉塔诺夫

№06111

## 拉塔诺夫同美国驻埃塞俄比亚 临时代办廷金的谈话纪要

(1977年9月3日)

摘自拉塔诺夫的日记

根据预约我在苏联大使馆会见了廷金。在谈话过程中他谈了以下意见。

美国与埃塞俄比亚之间没有建立起应有的良好关系，但近来有改善的迹象，美国正在努力这样做。比如美国已宣布，不久准备继续向埃塞俄比亚提供经济援助。我们提出了保持驻亚的斯亚贝巴大使馆以前的编制的问题，首先是经济贸易部的编制（众所周知，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在今年5月取消了美国军事顾问团、武官，要求把大使馆编制缩减一半）。廷金认为，这次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可能满足美国的要求。

美国向埃塞俄比亚领导人保证，美国过去没有，现在也不想干涉埃塞俄比亚的内政，包括厄立特里亚问题。廷金说，而且美国怀疑，实行现在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埃塞俄比亚能不能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正常关系。

据美国的看法，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在社会改造问题上“走得太快了”，而且在埃塞俄比亚还有一种势力，想比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更快地把埃塞俄比亚改变成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廷金认为，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消失”的原

因，就是这一领导集团具有比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更激进的思想  
和行为。

埃塞俄比亚国内问题中最难解决的是厄立特里亚问题，同这个  
问题相比较，连解放欧加登问题也是较容易的。

埃塞俄比亚决不能分裂，并保持同索马里的边界，但是他，廷  
金看不到解决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分歧的可能性，因为索马里未必  
能轻易地放弃对埃塞俄比亚的领土要求。

美国—索马里的关系趋于改善。美国原则上同意向索马里提供  
防御用武器。同时美国宣布，现在，当欧加登的军事行动还在进行  
时，不能提供这些武器。美国还强调，同意向索马里提供武器，并  
不意味着美国不承认埃塞俄比亚的领土完整。

廷金知道关于以色列好像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援助的谣言，  
但他没有见到肯定这些谣言的明显的证据。但是如果以色列在这方  
面要作些什么，廷金说，那是以色列自作主张，就是说，没有同美  
国协商过。

苏联大使强调，苏联支持埃塞俄比亚，但同时尽力说服索马里  
和埃塞俄比亚必须寻求和平解决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冲突的办法。  
苏联认为埃塞俄比亚作为不结盟国家，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既同社  
会主义国家，也同西方强国保持正常的关系。大使补充说，苏联支  
持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主义方针，是因为这一方针是埃塞俄比亚自己  
选择的，而且符合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社会主义方针的政  
策要求所有国家保持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允许私营经济成分、公  
私合营企业存在。

廷金就此指出，他同意是埃塞俄比亚人自己走上社会主义方针  
道路的说法。关于不结盟方针，廷金认为，近来埃塞俄比亚领导人  
确实强调得比以前在他们的声明中提到的多了。

在谈话过程中廷金没有打算对苏联提出什么指责，甚至没有过

问苏联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援助。他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苏联—索马里的关系（西阿德·巴雷莫斯科之行的结果等）。

苏联驻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大使 A. 拉塔诺夫

No 06090

## 拉塔诺夫与非洲统一组织总书记 姆布穆阿的会谈记录

(1977年9月2日)

摘自拉塔诺夫的日记

根据事先协商9月2日会见了埃捷基·姆布穆阿。

在会谈过程中向他陈述了苏联对非洲之角的政策，强调苏联支持埃塞俄比亚确保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特别是加强促进和平调解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军事冲突。同时还声称，为了统一非洲各国的力量以便达到这些目标，其主要方向是为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残余和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及其他等而进行斗争，苏联对非洲统一组织寄予很大的希望。

埃捷基·姆布穆阿坚定而又明确地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苏联在非洲之角的政策使他增色不少。他又重新展示说，苏联是非洲统一组织热爱和平的非洲各国在其为加强独立和非洲国家领土完整而进行历史性斗争中的“天然盟友”。苏联关于埃塞俄比亚领土完整的观点在这方面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埃捷基·姆布穆阿说，苏联往后能援助埃塞俄比亚，其中包括军事援助以便打退外国对它的侵犯。总书记同时强调说，只有改变成有利于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形势才能影响索马里和坚持这种冒险观点的阿拉伯国家改变立场。所有非洲国家，可能吉布提共和国除外，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军事冲突中都支持埃塞俄比亚一方。拥有

合法自卫权利的埃塞俄比亚最终要成为这一冲突的胜利者。

——不久之前在利伯维尔召开的一次例会上，非洲统一组织和平调解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冲突“斡旋委员会”批准了非洲统一组织1964年提出关于非洲国界不可破坏的决议，客观上支持了埃塞俄比亚，并否决了索马里的代表们指责埃塞俄比亚似乎是一个“黑色的殖民主义强国”。

——就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问题，非洲统一组织的部长会议（埃塞俄比亚建议）召开非常会议，根据埃捷基·姆布穆阿的意见，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考虑到目前非洲统一组织并没有自己支配、能够确保1964年决议规定的非洲统一组织全体成员国国家尊严的能力，所以，他（埃捷基·姆布穆阿）提出建议创建附属于非洲统一组织的“支持和平武装力量”。这时，非洲统一组织才能够派遣自己的部队到有边界和领土争议国家（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和乍得以及其他等）的边境去及时防止发生武装冲突。这一问题对非洲统一组织来说愈来愈严重起来，因为，埃塞俄比亚获得解放之后，譬如说，欧加登，索马里，按全部情况看来，不能立刻就放弃其领土并入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吉布提共和国的追求。目前，有一些非洲国家愿意支持埃捷基·姆布穆阿关于创建“支持和平的武装力量”的建议；另一些国家则表示反对这一建议。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更加危险之处在于，实质上这是阿拉伯和非洲之间的冲突，因为，很多阿拉伯国家都支持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索马里的领土觊觎。所以，根据这种原因现在很重要的是应确保埃塞俄比亚的领土完整。

当天傍晚的苏联大使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 П. 克林克尔特举行了会谈，克林克尔特讲了他同非洲统一组织副秘书长 П. 奥努会谈的情况。奥努所持的观点同埃捷基·姆布穆阿的观点一致。这一点表明，非洲统一组织书记处的领导人，尽管对临时军事行政委

员会的内政持批评态度（埃捷基·姆布穆阿说：“他们走得过快，使民族资产阶级都同他疏远了”），仍然认为，确保埃塞俄比亚的领土完整问题是要涉及到所有非洲国家的利益的。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表明，摆在非洲统一组织面前的，是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进行斗争的同时，还有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按全部情形看来，这一问题随着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各种利己主义的私欲得到巩固加强，可以想见，还则会愈来愈尖锐起来，特别是阿拉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非洲国家，尤其是非洲大国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

上述问题同时又同非洲各国与各种社会政治方向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着联系。

所有这些过程同时都以一些合乎实际的想法向非洲的活动家们证明苏联在确保非洲的和平和稳定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埃捷基·姆布穆阿所说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

苏联驻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大使 A. 拉塔诺夫



№06118

## 拉塔诺夫同门格斯图的谈话纪要

(1977年9月5日)

摘自拉塔诺夫的日记

我拜会了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别尔哈努·巴依耶也在座），根据委托向他通报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西阿德·巴尔列访问莫斯科的情况。

1. 门格斯图听了以后，要求为在同西阿德·巴尔列会谈时采取的正确路线，为给予埃塞俄比亚的全面援助，向苏联领导人和勃列日涅夫本人转达他的谢意。同时，门格斯图指出，现在，特别是苏联供应拖车以拖运坦克以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力量平衡开始向埃塞俄比亚方面倾斜。

在谈了对作为政治策略，西阿德·巴尔列采取的措施的看法后（西阿德·巴尔列去莫斯科同时下令进攻基基加），门格斯图说，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谈判的必要条件是索马里军队全部撤出埃塞俄比亚领土。西阿德·巴尔列现在想不仅仅把苏联，而且把他不久前邀请的中介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以及马达加斯加都引入迷途。门格斯图说，但是如果苏联同志和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同志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冲突中坚持原则路线，那么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的朋友则不是所有的人对这场冲突都很了解，所以倾向于相信西阿德·巴尔列的蛊惑人心的谬论。

2. 门格斯图于9月4日自基基加归来，讲述了那里的战斗情

况（非洲最大规模的坦克战）。索马里方面有 4 个摩托化机械旅（第 5，8，9 和 10 旅）参战。索马里进攻基基加的部队被打退后，埃塞俄比亚部队转守为攻，击退了索马里人，彻底消灭了一个坦克营。这一地区的战斗还在进行。门格斯图指出，可能西阿德·巴尔列指望基基加城下的胜利，以使用武力迫使埃塞俄比亚人谈判。如果战败“则向苏联表白自己的善心”。

3. 在回答苏联大使的问题时，门格斯图说，不久前吉布提共和国政府在索马里 - 埃塞俄比亚冲突中对埃塞俄比亚的态度不友好：禁止去吉布提的埃塞俄比亚飞机着陆，给索马里伤兵医疗急救等。但是现在由于索马里的侵略，特别是索马里的破坏者破坏了阿基斯 - 阿别巴 - 吉布提铁路后，吉布提共和国担心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以其政府表示准备同埃塞俄比亚签订贸易协议。门格斯图相信，吉布提共和国政府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一定会日益增强。

门格斯图继续说，现在吉布提有三派政治力量。1) 人民独立运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争取独立和建立进步的政府；2) 民族独立联盟党，争取民族独立；3) 非洲人民独立联盟执政党，争取最后如果不并入索马里，也至少要同索马里建立特殊关系。

埃塞俄比亚支持人民独立运动，并建议该党同民族独立联盟党结盟。人民独立运动将来有可能不得不以武装反对现政府，如果现政府要迫害该党的话。

门格斯图认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埃塞俄比亚的帮助下（如果需要的话）同人民独立运动建立联系，并给予这个党以支持。为此苏联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可派代表团去阿基斯 - 阿别巴或在莫斯科接待这个党的代表团。门格斯图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大家共同努力制止把吉布提变为帝国主义的基地。

4. 在回答苏联大使有关问题时门格斯图说，他准备同苏联高级军事顾问会谈并请顾问原谅，由于忙于领导军务他以前未能这样

做。

5. 谈到全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主义运动，门格斯图说，全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分成两派，其中一派倾向于同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合作。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将继续执行联合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和派别为一个统一的党，并建立民族阵线的路线。

6. 回答苏联大使问题时门格斯图说，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拟改组全埃塞俄比亚争取和平友谊和团结委员会。早些时候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将通告大使馆，苏联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应如何更好地同这个委员会合作。至于苏联委员会拟给予埃塞俄比亚的援助，可以拨给埃塞俄比亚争取和平友谊和团结委员会，与此同时通知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

苏联驻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大使 A. 拉塔诺夫

№06112

## 门格斯图召见苏联等国大使的谈话纪要

(1977年9月10日)

摘自拉塔诺夫的日记

9月10日，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南斯拉夫外交使团团长一起被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请去。埃塞俄比亚方面参加会见的有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阿特那夫·阿巴捷，常务委员会委员别尔哈努·巴依耶以及外交部长菲列克·格德勒-基奥基斯。

门格斯图说，这次会见的目的是通过各国驻亚的斯亚贝巴的代表向各社会主义国家和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通报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揭露的美国（阴谋的倡议者）、苏丹、沙特阿拉伯、埃及、肯尼亚和索马里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反对埃塞俄比亚革命的帝国主义阴谋。

根据经可靠途径落入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的文件表明，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Θ·盖利在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制定了埃塞俄比亚内部反革命分子和支持他们的国家联合行动计划，计划规定了从9月末到10月初的一系列行动，其目的是推翻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建立从属西方的反动政府。这一计划的一部分是在亚的斯亚贝巴杀害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领导人的恐怖行动，另一部分是组织在苏丹和肯尼亚领土上训练的军队的联合进攻，以及索马里侵略的继续。

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还说，在上述文件中列举了各个分队，叙述了他们的具体任务。进攻从西北、西方和南方同时开始，都指向亚的斯亚贝巴。至于索马里，其在埃塞俄比亚领土的军队于今年9月10日再次进攻基基加市。占领该市以后，他们拟进攻该地区行政中心哈哈尔和大工业中心基列-达乌阿。基基加市保卫战在继续。

在参加阴谋的政党和团体中，门格斯图提到厄立特里亚分裂组织、埃塞俄比亚民主联盟，阿法尔族解放运动（该运动的部队应进攻阿萨勃）。

最后，门格斯图说，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正采取措施粉碎这一阴谋，希望援助对埃塞俄比亚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危急时刻给予必要的政治和军事支持。而且他指出，对埃塞俄比亚来说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可能是燃料问题，因为阿拉伯国家准备禁止向埃塞俄比亚提供石油（通过“莫比尔”公司实施）。

各外交使团团长答应把门格斯图传达的消息转告本国政府。

苏联驻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大使 A. 拉塔诺夫

No 06114

## 拉塔诺夫同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 格德勒－基奥基斯的谈话纪要

(1977年9月14日)

摘自拉塔诺夫的日记

今年9月14日，参加埃塞俄比亚革命三周年庆典的苏联代表团会见了菲列克·格德勒－基奥基斯<sup>①</sup>。

在会谈过程中，部长对给予埃塞俄比亚全面的支持和帮助向苏联表示衷心感谢，并作了如下谈话。

鉴于埃塞俄比亚周围极其复杂的形势，特别是索马里军事入侵后的形势，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后还要采取措施，加强同支持埃塞俄比亚的国家的合作和争取旧政体国家的支持，分化公开敌视埃塞俄比亚革命的国家，其中包括阿拉伯国家。最后埃塞俄比亚将力争同叙利亚、伊拉克、苏丹等国建立联系。

大多数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的立场总的看来对埃塞俄比亚是有利的，因为这涉及保持埃塞俄比亚领土的完整，尽管许多非洲国家不能容忍埃塞俄比亚革命及其社会主义方针。非洲统一组织及其组建的和平解决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军事冲突“服务”委员会继续努力停止冲突的工作，并站在埃塞俄比亚一边。但他们的工作受到苏丹的阻挠。

<sup>①</sup> 菲列克·格德勒－基奥基斯，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

苏丹的立场现在是双重性的。一方面，苏丹积极支持厄立特里亚分裂主义，另一方面它担心，如果厄立特里亚以某种形式分离出去，会提供一个鼓励苏丹南部分裂分子活动的危险先例。而且苏丹人担心，埃塞俄比亚作为报复可能帮助苏丹南部的分裂主义者。因此苏丹表现出一定的摇摆性，埃塞俄比亚打算利用这一点。埃及在这种情况下鼓励苏丹干涉厄立特里亚事务，派遣40000军队去苏丹，目的是向苏丹领导人施加一定影响和支持他们对付苏丹南部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这就使苏丹有可能派4000自己的士兵去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也准备加强同西欧国家的联系，特别是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瑞典，芬兰等）的联系，因为这些国家不总是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联盟，比如在美国侵略期间，他们就站在有利于越南的立场上。为达此目的，准备向上述国家派遣埃塞俄比亚大使。

至于美国，它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想推翻埃塞俄比亚现政权（这时部长引用了美国准备的阴谋）。部长说，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准备把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用于为埃塞俄比亚革命利益服务，把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也声称支持埃塞俄比亚领土完整和希望同埃塞俄比亚关系正常化，也用于为埃塞俄比亚革命利益服务。

除外交活动外，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将同美国和西欧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发展合作（为此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已邀请了美国、意大利、葡萄牙的共产党代表参加庆典），也要同世界民主组织、工会组织、妇女组织、青年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亚非团结运动等）发展合作。

部长特别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埃塞俄比亚革命的立场。在革命开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埃塞俄比亚以经济援助，派遣了经济顾问。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中国人开始改变立场，以致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军事冲突中实际上给予索马里全面援助，看来准

备向索马里提供步枪。

指出苏联支持埃塞俄比亚外交活动的重大意义后，部长希望苏联将来继续此种活动，特别是把同阿尔及利亚的友好关系、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各国的影响以及同西方国家、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团体的联系用于此目的。

菲列克·格德勒·基奥基斯对苏联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军事冲突中的鲜明立场表示感谢。部长还强调说，埃塞俄比亚不想分裂索马里，也不想干涉其内政。部长还说，埃塞俄比亚赞成恢复同索马里的合作。埃塞俄比亚政府这样做，是因为索马里有想同埃塞俄比亚建立睦邻和和平合作关系的进步力量。

从我们这一方，叶热夫同志和苏联大使重申苏联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冲突的立场，并指出，埃塞俄比亚必须积极开展对各国的外交活动，还请部长注意苏联支持埃塞俄比亚的外交措施（给索马里和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信函等）。

苏联驻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大使 A. 拉塔诺夫



№06113

## 拉塔诺夫同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常务秘书

### 达乌伊特的谈话纪要

(1977年9月17日)

摘自拉塔诺夫的日记

应达乌伊特<sup>①</sup>的要求我拜访了他。他奉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之命向苏联大使转交了一份代号为“火炬”的关于帝国主义反对埃塞俄比亚的阴谋的文件，关于这份文件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已在1977年9月10日举行的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大使会谈上作了通报。

这份文件是今年2月12日到7月4日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给美国驻喀土穆和达累斯萨拉姆大使馆的指示和电报的综述。

文件中写道，为了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武装干涉并使其局势不稳定成立了3个分队。第一分队为努比亚人队，第二分队为安扬人队。这两个分队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活动，由苏丹领土进入。第三分队由埃塞俄比亚东南部敌对分子组成，由肯尼亚领土进入。上述分队的培训和装备（主要是美国武器）要在9月16日以前完成。“火炬”行动拟于1977年10月1日开始。

整个行动的出发点是在今年10月1日暗杀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由第一、第二分队负责，自苏丹领土进行袭击。

---

<sup>①</sup> 达乌伊特，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常务秘书。

2周以后，第三分队由肯尼亚领土入侵。据行动策划者的意见，开辟新的军事行动战线可使埃塞俄比亚人自动进攻苏丹。如果要回击肯尼亚，则使用海军陆战队和其国家的力量。

苏联驻社会主义的埃塞俄比亚大使 A. 拉塔诺夫

附 件

译自英文

### “火炬”行动

自1977年4月25日开始准备组建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武装干涉并使其局势不稳定的准军事部队。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全部准备工作，包括运送作战所需的物资和人员培训，须在1977年9月16日以前完成。行动应于1977年10月1日开始，代号为“火炬”。

参加这次行动的部队由三部分组成：第一分队为努比亚人队，第二分队为安扬人队，第三分队为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敌对分子。第一、第二分队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行动，根据训练要求要特别注意适应当地条件。第三分队在准备期间主要依靠肯尼亚，军事行动开展以后，则由索马里对他们负责。

上述情况是1977年2月12~26日期间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发给美国驻达累斯萨拉姆大使馆的电报和指示的压缩。发电报和指示的人为该大使馆政治部工作人员基克松·维尔德涅尔，据认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代表。

在后来由艾基·克利少校签署的由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发往美国驻喀土穆和达累斯萨拉姆大使馆的信件中提到参谋部的设备、培

训和行动的目的。艾基·克利少校看来是替换了领导“火炬”行动的基克松·维尔德涅尔。他不是别人，就是艾蒙多姆·克利，是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政治部三秘。

在1977年5月4日克利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战斗装备已在去蒙巴萨的路上（肯尼亚），往指定地点发运装备必须在夜间分批进行，以防泄露消息。在“X日”以前20~30天把装备送到肯尼亚西北部，即发生冲突的地方。

1977年5月18日他的第二封信表明，作战必需的装备已由肯尼亚西北部送至苏丹的目的地。确认主力部队正在进行紧张的训练以后，克利指出必须绝对保守秘密，必须特别注意主要目标（埃塞俄比亚）和经常的训练。

1977年6月23日克利给美国驻喀土穆大使馆发去电报，要求完成以下4项特殊任务：

确定敌军的实力；

根据共产党的军事理论标明敌军实际部署以及援兵人数和调遣方法及工具；

装备送到以后，立即来电报确认收到；

1977年9月16日以前完成全部准备工作，不要对计划作任何修改。

1977年7月2日克利给美国驻喀土穆和达累斯萨拉姆大使馆发了两封电报。

第一封电报讲了定于“X日”开始的行动目的和计划。

目的：杀死埃塞俄比亚政府首脑，造成全国混乱的局面。之后，敌视埃塞俄比亚的军队从西南和东南联合进攻。

行动计划：第一、第二分队1977年10月1日开始行动。第三分队两周后开战。

后方和供应：1号据点将支援西南部的分队。第三分队将在东

南部得到友好国家的支援。指挥部和支援第一、第二分队的团体将在祖巴区和利乌安区，而支援第三分队的团体将在友好国家。

行动时间：开始行动的时间和信号以后另行通知。

第二封电报进一步明确第一封电报规定的行动：

杀害国家元首，使埃塞俄比亚全国一片混乱。随后第一、第二分队在西南部开始进攻。

开辟第二战线，迫使埃塞俄比亚军队不能兼顾。这就为从东南部进攻创造了良好条件，并引起双重混乱。

埃塞俄比亚自动地攻击苏丹，而两周后在东南的行动又使埃塞俄比亚形成同索马里类似的局面。

设在曼杰尔斯的后方服务和物资供应中心保证支援第一、第二分队。

如果肯尼亚受到攻击，海军陆战队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将派往这一地区。

1977年7月4日克利给喀土穆和达累斯萨拉姆发了4封电报。

其中两封电报为已运到或正在途中的军事装备详细清单。总计为：16000支冲锋枪，559000发炮弹，未指明数量的子弹、炸弹、手雷，以及宣传材料。这些装备要送到1号据点。运送从8月27日开始，1977年8月30日装备将运到1号据点。

另外两封电报涉及杀害国家元首的行动。努比亚人分队（第一分队）的杀手要在1977年10月1日鲍乌曼去埃塞俄比亚西南部时将国家元首（鲍乌曼）杀死。为完成这一任务而挑选的另一名执行人将由努比亚人分队（第一分队）提出。

如果西南之行取消，应找到交通工具把杀手送到亚的斯亚贝巴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未能杀死国家元首（鲍乌曼），就要杀死他的副职。克利不止一次地警告说，全部准备工作在1977年9月16日以前一定要完成，定于10月1日（X日）进行的行动必须坚持，

为保证这一行动的成功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在所有电报的结尾克利都建议收电报人，回电发往：国务院东非和中非秘密行动部。

翻者：B. 米沙切夫、B. 米哈伊洛夫

№06115

## 外交部第三非洲司关于苏—埃关系的资料

(1978年2月7日)

苏联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外交关系建于1943年4月21日

1974年埃塞俄比亚革命前。苏联—埃塞俄比亚政治合作立足于苏联和埃塞俄比亚人民之间的历史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两国都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以及埃塞俄比亚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和加强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方面坚持正确的立场。

过去的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曾于1959年、1967年、1970年和1973年访问苏联。

1974年9月12日在埃塞俄比亚掌权后，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宣布了社会主义方针并声称拟与苏联发展全面合作。

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强调说，他们认为苏联是他们的主要对外政策支柱。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对大多数主要国际问题的立场同苏联的立场一致或接近苏联的立场。

1975年1月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领导人提出全面发展苏联—埃塞俄比亚关系问题。我方曾声明，苏联高兴地对待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在进步基础上建设新社会的措施，同意其关于必须发展苏联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全面关系的意见。

政治关系。1976年7月6～12日，以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前主席莫格斯—沃尔德·米卡埃尔为首的埃塞俄比亚国家代表团正式访问了苏联。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团由葛罗米柯领导。科西金同志接见了埃塞俄比亚代表团。

1977年5月4~8日，以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中校为首的埃塞俄比亚国家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勃列日涅夫同志接见了门格斯图。

举行了苏联—埃塞俄比亚谈判，研究了两国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非洲的形势及其他互相关心的国际问题。

为了进一步加强苏联—埃塞俄比亚的关系，通过了关于苏联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友好和合作基础的共同声明，就埃塞俄比亚国家代表团访问苏联结果发表了苏联—埃塞俄比亚公报。在访问期间还签订了文化和科学合作协议、领事协定和1977年5月6日经济技术合作记录。

1977年10月30~31日，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秘密访问了苏联。在会谈时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葛罗米柯同志强调说，苏联拟在以后全面帮助和支持埃塞俄比亚革命。

勃列日涅夫和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同志不止一次交换个人信件，也促进了关系的加强。

以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别尔哈努·巴依耶为首的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参加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60周年庆祝活动。

在埃塞俄比亚周围和国内复杂的形势下苏联给予该国不断的政治和外交支持，对此埃塞俄比亚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表示衷心感谢。

回应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在和平解决厄立特里亚分裂问题方面给予支持的请求，苏联曾就此问题同一些阿拉伯国家和索马里领导人协商。还通报给伊拉克政府，因为伊拉克经苏丹给厄立特里亚分裂分子运去大批苏联制造的武器。

鉴于索马里发动了反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并占领了埃塞俄比亚一大部分领土，苏联坚决支持埃塞俄比亚，给予全面援助，包括

增强其国防能力。我们在正式声明中和致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信函中，以及在与西方国家接触中。一贯坚持必须尽快停止冲突，首先从埃塞俄比亚领土立即无条件撤出索马里军队。

1977年7~8月，苏联在解决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冲突方面作了很多工作。但是在分别会见到达莫斯科的两国代表过程中得知，双方坚持互相对立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代表团都回国了，调解工作也中断了。

党的路线方面的联系。苏联根据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的请求在党的建设问题，组织工会、妇女、青年运动问题，以及解决民族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培训班，按苏共中央的路线培训了120名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积极分子。1977年，这样的培训班又接受了50人。1978年3月，苏联党的工作者4人小组去埃塞俄比亚协助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组建工人阶级的先锋党。

军事合作。1976年12月，在莫斯科签订了1977~1980年苏联向埃塞俄比亚供应一定数量武器和防御性战斗装备的协议。根据埃塞俄比亚方面的请求，部分武器和装备立即供应了，1977年2月无偿给埃塞俄比亚人民警察部队供应了步枪。我们还同意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古巴政府向埃塞俄比亚供应按苏联许可证生产的步枪，也同意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把苏联生产的坦克装甲运输车转售给埃塞俄比亚。

以后，由于埃塞俄比亚又提出要求，苏联方面决定于1977~1980年向埃塞俄比亚增加供应武器和战斗装备以及人民警察用的步枪。此外，还向埃塞俄比亚供应全民性装备，接受埃塞俄比亚军人到苏联学习。

1977年10月，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鉴于索马里的侵略苏联同意迅速增加供应武器和军事装备，加



强埃塞俄比亚的国防能力。

有一个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组在埃塞俄比亚工作。

自1977年11月，以B.И.彼得罗夫将军为首的国家代表团秘密常驻亚的斯亚贝巴。代表团的任务是：同埃塞俄比亚方面一起制定帮助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组建埃塞俄比亚武装力量的措施，帮助埃塞俄比亚军队较快地掌握苏联军事装备的措施，帮助拟定欧加登和厄立特里亚战役的措施。

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关系，是在1959年7月11日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基础上发展的。根据协议苏联向埃塞俄比亚提供贷款，总金额9亿卢布（25亿埃塞俄比亚元），12年偿还，年利2.5%。规定以埃塞俄比亚商品偿还贷款。

1967年，用这笔贷款在阿萨布市建了一座石油加工厂，年产70万吨原油，还建了一座火力发电站，功率为13500千瓦（总投资1580万卢布）。埃塞俄比亚方面按时偿还全部债务。

在巴赫尔-达尔市，苏联建了一座可容1000名学生学习的工学院（造价将近200万卢布），并于1963作为礼品送给埃塞俄比亚人民。

鉴于因干旱造成的埃塞俄比亚的困难局势，苏联于1974～1975年无偿援助130万卢布的食品、医药以及农药。此外，1975年末苏联巡回医疗队前往埃塞俄比亚，帮助遭受旱灾地区的居民（费用为86000卢布）。

根据1977年5月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苏联方面表示同意帮助实施一些方案。其中有：建5座石油基地、1座牛奶厂，改造食品工业企业，进行地质勘探工作，组织机械化开采金矿，以及进行技术-经济论证，在阿瓦什河流域开发6万公顷耕地，组建机械出租站为棉花种植业服务，建农业设备工厂。而且为了按上述方案给当地拨一部分费用，在1978～1980年作为1959年的贷款向埃

塞俄比亚提供总值 1200 万卢布的商品。还规定有关部门的苏联专家将派往埃塞俄比亚进行帮助。

此外，苏联原则上同意帮助埃塞俄比亚扩大阿萨布市的石油加工厂和在莫热区修建深加工阿萨布工厂产品和生产相应石油产品的设备，但须在做好这些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以后双方才作最后决定。

预计实施上述全部项目（扩大石油加工工程除外）约需 2230 万卢布，如果决定实施扩大石油加工工程，这一数字可能增至 5000 万~5200 万卢布，总计相当于 1959 年贷款的未使用部分。

1977 年 8~9 月已将所有项目（其中包括制定石油加工综合体的经济技术论证）的合同交给埃塞俄比亚方面，其中 2 项合同已于 1977 年 10 月签署：制定在阿瓦什河下游开发 6 万公顷耕地的经济技术论证和建奶厂和牧场的经济技术论证。其余的合同埃塞俄比亚专家正在研究。

1977 年 9~10 月，苏联农业代表团访问埃塞俄比亚，熟悉了埃塞俄比亚农业的现状，提出了苏联—埃塞俄比亚在农业方面合作基本方针的建议。

现在在埃塞俄比亚有将近 170 名苏联专家在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红十字联合会和国家教委工作（在高等和中等学校的教师、医生、阿萨布市石油加工厂的专家）。

1977 年 3 月 26 日，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签订了空中交通协议，根据该协议苏联民航总局的飞机定期在莫斯科和亚的斯亚贝巴之间飞行。

苏联—埃塞俄比亚贸易。1977 年，据业务资料，苏联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商品周转额比 1976 年增长了 380 万卢布，达 2370 万卢布（出口 2240 万卢布，进口 130 万卢布）。苏联购买埃塞俄比亚的油料种籽、咖啡；出口机器和各种设备、轧钢、肥皂、建筑材料

等。1977年7月22日，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签订了贸易协议，取代了1959年7月11日签订的贸易协议。

自1967年起在埃塞俄比亚出现了苏联-埃塞俄比亚合资公司，在埃塞俄比亚市场销售苏联拖拉机、汽车及其他商品并进行售后服务。

苏联-埃塞俄比亚文化和科学关系也在发展。自1945年起在亚的斯亚贝巴设苏联文化中心。自1947年苏联红十字会医院在亚的斯亚贝巴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根据1972年5月3日协议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阿姆布市）修建了苏联植物病理实验室，1977年9月正式开业。

苏联通过在高等学校接受埃塞俄比亚大学生和派苏联教师去埃塞俄比亚的办法，帮助埃塞俄比亚培养埃塞俄比亚民族干部。

1977年，苏联高等教育部接受了318名埃塞俄比亚大学生到苏联学习。截止1978年2月1日，在苏联高等学校、技术学校以及研究生院和进修班学习的有923名埃塞俄比亚公民。

埃塞俄比亚和俄罗斯东正教堂建立了相当广泛的友好联系，双方互派教堂代表团。俄罗斯东正教堂给予埃塞俄比亚教堂一定的物质援助。

近来各种代表团来往频繁。埃塞俄比亚工会、教堂的代表、记者、埃塞俄比亚大众传媒工作人员、教育部、警察局工作人员都访问了苏联，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俄罗斯东正教、苏联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苏联红十字会和新月会联合会、苏联妇女联合会的代表团、运动员则访问了亚的斯亚贝巴。

在埃塞俄比亚有苏联新闻社分社，真理报、消息报记者站，塔斯社和国家广播电视台记者站。

苏联驻埃塞俄比亚大使是拉塔诺夫·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自1974年1月14日）。

埃塞俄比亚驻苏联大使是车加叶·麦舍沙（自 1977 年 11 月 30 日）。

苏联外交部第三非洲司

№06091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继续调节  
索—埃冲突的会议记录

(1978年3月9日)

绝密

给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乌斯季诺夫、波诺马廖夫等同志。

1978年3月9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6号记录摘抄

关于有关调解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军事冲突问题的一些措施。

责成苏联外交部、苏联国防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根据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意见的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调解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军事冲突的工作并且提出相应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06116

## 外交部第三非洲司关于索—埃冲突的资料

(1978年3月31日)

自从1960年独立的索马里国成立后，非洲之角各国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其根源是索马里领导人想把索马里部族占居的土地合并成统一的国家并因此向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吉布提共和国提出领土要求。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特别尖锐。两国间不止一次发生边境事件和武装冲突。

1974年埃塞俄比亚革命也未能使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得到改善。而且西阿德总统和索马里其他领导人在关于民族自决权（直至独立）蛊惑人心的声明的掩盖下，加强了对埃塞俄比亚的进逼。索马里人实质上是要求按民族特征把多民族的埃塞俄比亚国肢解。这种要求客观上是反对埃塞俄比亚革命，给内外反动派加油。

在这种条件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做出了努力。1977年3月，根据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倡议在亚丁举行了有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鲁贝伊·阿里参加的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西阿德的会谈，因西阿德坚持非建设性立场会谈没有取得结果。

苏联不止一次呼吁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领导将他们的关系正常化并提出建设性的协调计划，其中包括准备提供服务。1977年7~8月，在同抵达莫斯科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分别会谈过程中

得知，双方坚持互相排斥的立场，而且索马里人继续坚持欧加登脱离埃塞俄比亚的立场。

由于不使用武力获得欧加登的打算落空了，沙文情绪占优势的索马里领导集团开始实际实施其扩张计划，指望趁埃塞俄比亚国内形势紧张的机会取得成功。阿拉伯反动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都怂恿索马里人这样做。据西阿德本人承认，美国答应给索马里军事援助。

1977年7月23日，在索马里领导集团自己组建的解放阵线的幌子下索马里领导集团派军队赴欧加登，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哈拉尔省、巴累省和锡达莫省相当大一部分，只是在1977年10~12月展开的残酷战斗中才被阻挡在重要中心哈拉尔和基列-达乌阿的前沿阵地。

经过相应的准备以后，埃塞俄比亚武装力量于今年2月转守为攻。在3月初解放了重要战略城市基基加，击溃了索马里军队的主力。古巴军人参加了战斗，苏联军事顾问参加了制订作战计划。现在实际已解放全部领土，埃塞俄比亚军队已到达索马里接壤边界。当索马里人处于军事崩溃边缘时，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领导人于今年3月9日决定从欧加登前线撤出自己的军队。而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的代表则宣称，决不停止在欧加登地区的军事行动。对埃塞俄比亚的领土要求遭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坚决拒绝后，索马里领导人于1977年11月13日宣告单方面废止1974年签订的苏联-索马里友好合作条约，要求从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召回全体苏联军事和民事顾问。在索马里展开了反苏运动。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索马里领导人开始公开向穆斯林国家寻求援助，要求他们帮助供应武器，在“伊斯兰教团结”旗帜下派遣军队参加反对埃塞俄比亚的战斗。正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索马里总统西阿德·巴雷于1977年12月末到1978年1月初访问了伊朗、巴基斯

坦、埃及、苏丹、阿曼，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

在冲突期间索马里领导人多次恳切请求美国及其他西方强国援助索马里，干涉非洲之角事件，以便“和平”解决冲突，保护索马里免受埃塞俄比亚的侵略。

在欧加登的冒险彻底失败以后，索马里并未放弃对埃塞俄比亚的领土要求，提出各种条件，继续用其他办法试图达到目的。索马里领导人请求大国保证承认欧加登居民的民族自决权并得以实施。而且索马里领导人请求大国采取紧急措施，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保证从非洲之角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里指的是埃塞俄比亚政府为加强国防而请来的古巴军人和苏联军事顾问。索马里还表示同意向欧加登派“中立部队”。

埃塞俄比亚领导人认为索马里的行动是武装侵略，因此于1977年9月8日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在武装冲突期间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曾表示准备在非洲统一组织范围内和平解决冲突，提出把从埃塞俄比亚领土撤军作为同索马里人开始谈判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多次公开宣布，在从索马里军队手中解放欧加登地区以后埃塞俄比亚不想把军事行动移到本国边界以外。

索马里军队被击溃以后，在今年3月12日埃塞俄比亚外交部的声明中重申，埃塞俄比亚政府愿意在遵守解决国际纠纷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原则基础上，根据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决定恢复非洲之角的和平和稳定。接着，在声明中指出，只有索马里放弃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以及吉布提的部分领土要求，遵守国际协议，恢复非洲之角的和平才有可能。声明拒不接受美国及其盟国试图把撤出索马里军队同解决涉及埃塞俄比亚主权的问题（在埃塞俄比亚领土有埃塞俄比亚政府请来的外国军人；关于向欧加登派遣外国观察员的建议）纠缠在一起的意向。



关于索马里要求给予欧加登居民自决权问题，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声明说，解决这一问题是埃塞俄比亚的内政，因此不能成为解决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冲突的条件。埃塞俄比亚方面还提出了索马里方面赔偿其军事行动在欧加登造成的损失问题。

在同埃塞俄比亚的冲突中，索马里的立场一般得不到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的支持，因为这些国家都赞同在非洲已形成的各国的国界。

非洲统一组织协调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关系专门委员会（由尼日利亚任主席）1977年8月在利比亚召开的会议上，拒绝承认西部索马里解放阵线为民族解放运动，要求两国政府停止敌对行动，在不破坏非洲各国边界原则基础上和平解决纠纷。在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号召所有国家，特别是非洲以外的国家，不要介入冲突。

一些非洲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迄今就调解冲突所做的努力，由于双方所持的对立的立场而没有收到积极的效果。

反动的穆斯林政体在冲突期间支持索马里。但是据现有情报，在欧加登作战期间西阿德总统未能说服他们往该地区派遣军队，尽管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埃及秘密地给索马里提供武器。

另一方面，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阿尔及尔以及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却支持埃塞俄比亚。而且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给埃塞俄比亚提供了武器，派去了军人。

在冲突过程中苏丹的立场发生了变化。由于种种原因苏丹放弃了激烈反对埃塞俄比亚的方针。

主要的西方国家口头上拥护政治解决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冲突，强调自己的“中立”，实际上想利用冲突来破坏埃塞俄比亚的革命政体，打击索马里进步力量，以及削弱苏联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影响。西方国家实际上执行暗中帮助索马里的政策。但是由于种种

原因他们没有直接向索马里提供军事援助。首先他们不想把埃塞俄比亚完全彻底地抛开，指望以后在那里恢复自己的地位。他们也不能不考虑，索马里的行动没有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而同西方有密切关系的肯尼亚严厉谴责了这种行动。

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想把解决冲突的倡议攫为己有，以加强其在非洲之角的地位。在欧加登尚被索马里军队占领的情况下他们提出立即开始谈判的建议，使索马里方面能从实力出发参加谈判。他们还提出把冲突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的主张，在安理会西方国家指望给埃塞俄比亚施加压力。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从欧加登撤回索马里军队的决定立即被美国领导人利用，宣称苏联和古巴的军人必须迅速撤出埃塞俄比亚。西方国家还主张派“中立的”外国观察员去欧加登，监督从该地区撤军，保证该地区居民的安全。

中国领导人站在反对苏联的立场上对待冲突，他们想把所发生事件的全部责任都推到苏联一边。他们对冲突不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而实质上支持了索马里。有资料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向索马里提供步枪。

社会主义国家对非洲之角冲突的立场是：谴责索马里的侵略行径，给予埃塞俄比亚国际主义的援助和支持。

古巴在这方面表现特别积极。在索马里军队占领欧加登的条件下，古巴应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请求派坦克兵、炮兵、飞行员以及摩托化步兵帮助埃塞俄比亚武装力量，对此事今年3月16日卡斯特罗正式发表了声明。在埃塞俄比亚反攻过程中古巴军队担任主攻任务。苏联和古巴经常联系，在支持埃塞俄比亚革命方面互相配合。

苏联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冲突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因为这一冲突不利于该地区的进步力量，有把非洲之角变为国际紧张局势严重策源地的危险。

非洲之角武装冲突开始后苏联主张尽快停止冲突，在双方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不破坏边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和平协调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种协调的必要条件是停止军事行动，索马里军队立即无条件撤出埃塞俄比亚领土，否则在非洲之角可能出现类似近东的局势。

我们对非洲之角形势的原则立场，在 1977 年 9 月 28 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A. 涅托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讲话中，1978 年 1 月 12 日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布迈丁访问苏联时科西金的讲话中，以及在 1978 年 1 月 18 日塔斯社的声明中都作了明确的表示。

苏联反对西方国家要把关于非洲之角形势的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意见，因为他们可能借此掀起敌视苏联和古巴的运动。而且苏联认为，非洲统一组织应继续努力帮助解决索马里 - 埃塞俄比亚冲突，因为该组织在这方面还有潜力。

苏联对索马里 - 埃塞俄比亚冲突的立场不止一次地向非洲和阿拉伯进步国家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通报过。

苏联一贯奉行全力帮助和支持革命的埃塞俄比亚政体的坚定路线。在冲突期间采取的紧急的补救措施，加强被侵略的埃塞俄比亚的国防能力。我们停止了向索马里供应作战设备、武器和弹药。1977 年 11 月索马里方面做出不友好行动以后，苏联停止了同索马里的经济、贸易和军事合作。

今年 3 月初西阿德总统请求苏联作中介解决索马里 - 埃塞俄比亚冲突，并表示准备恢复索马里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

我方同意作中介，如果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对此没有异议，而索马里政府对解决冲突也采取现实立场的话。而且要西阿德注意，索马里方面提出的解决冲突的各种条件（给欧加登居民自决权）只能拖延关于停止冲突谈判的进行，因为这样的条件在任何主权国家都

不能接受的，只能使中介工作难于进行。

关于恢复同索马里的友好关系，我方原则上表示，在索马里对恢复非洲之角的真正和平采取具体措施后我们准备这样做。

我们向埃塞俄比亚领导人通报了西阿德的建议后，埃塞俄比亚领导人作为答复首先对索马里领导人的诚意表示怀疑，然后说，如果索马里的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准备宣布放弃反对埃塞俄比亚、反对苏联、反对古巴的立场；宣布尊重埃塞俄比亚的领土完整，并根据现行国际条约同意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边界界碑，停止支持反对埃塞俄比亚领土完整和统一的破坏活动，并在以后以某种方式向本国社会舆论和世界舆论界通告索马里的这一新立场，埃塞俄比亚准备在莫斯科，在苏联参与下开始同索马里谈判。

现在索马里领导人不接受这些建议，继续坚持自己的条件。

欧加登战争的根源实质上反映了参战双方的国内形势。索马里的形势非常紧张。由于经济形势恶化和生活水平下降，各阶层居民对现领导的不满情绪增长了。西阿德用枪杀和迫害来压制公开的不满。埃塞俄比亚在军事上的胜利，一方面促进了爱国进步力量的团结，加强门格斯图及其战友的地位；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主义者（包括领导人中的）的活跃，以致提出彻底结束索马里的威胁的意见。

总之，非洲之角的形势依然是复杂而紧张的。实际停止军事行动目前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而索马里对欧加登、肯尼亚部分领土和吉布提共和国的觊觎，则孕育着新的武装对抗。这种形势为帝国主义和阿拉伯反动集团插手非洲这一地区提供了可能，因此恢复这里的和平，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达成停止冲突协议符合我们的利益。

№06117

## 苏驻埃大使馆关于埃塞俄比亚 同西方国家关系的资料

(1978年8月12日)

革命前埃塞俄比亚的主要活动方向是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和“共同市场”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这表现在该国的对外政策方面，尽管形式上它属于不结盟国家。

西方国家影响埃塞俄比亚的主要办法是经济贸易牵制以及该国国防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革命前，1974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埃塞俄比亚的外贸周转中占主要地位。比如1973年，资本主义国家的份额在埃塞俄比亚的外贸中占70%，而社会主义国家仅占3%。军用物资则完全依靠美国。

西方国家首先考虑的是埃塞俄比亚在红海地区、非洲之角以及整个非洲在同苏联对抗方面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该国在非洲大陆的重要政治地位。

在帝制时期，西方各国、首先是美国 and 共同市场国家间在对待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和政治方面存在分歧。共同市场国对美国在埃塞俄比亚的优势地位不满。后来日本也成为竞争者。革命前外国对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投资总额为5.04亿卢布。

1974年以后，由于埃塞俄比亚决定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且要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西方国家在政治，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国家对外政策的方针也发生了变化。埃塞俄比亚开始依靠社会

主义阵营各国，首先是苏联，实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由于西方公司在埃塞俄比亚的财产被国有化，并转为国有经济，外国资本在埃塞俄比亚地位受到严重损害。1975年2月国有化工业企业（72个加工工业企业，主要是外资企业）的资金占国家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41%。还有21个私营公司的投股部分也转为国有。在国防问题上埃塞俄比亚实际上已断绝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采取了用苏联武装重新装备军队的方针。

但是，如果认为埃塞俄比亚已完全摆脱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那就错了。到1978年5月埃塞俄比亚欠西方的债务为3.51亿卢布。而且埃塞俄比亚一般每年要用1300卢布按时偿还债务和贷款以及利息。这占年出口收入的5%。这种政策使埃塞俄比亚减少了用于发展经济的新资金。埃塞俄比亚迫切需要经济援助。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取代，也不准备完全取代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技术合作。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控制下的国际组织的经济援助总额中，有于偿还债务和贷款的占75%（1978年5月）。

在长期不懈的争取埃塞俄比亚的斗争中，西方国家注意的首先是经济因素。他们把埃塞俄比亚推上与西方经济合作的道路，这样他们就可达到政治目的，使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即使不排除，也要削弱苏联的影响。

西方列强重视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们认为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发展，或至少是“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因为伴随民族主义而来的是同社会主义国家保持距离，“洗刷”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实行“同东西方保持等距”的政策。

西方国家还利用这一事实，即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有节制地发展同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合作。这样的国家有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罗马尼亚，尽管他们有另外的看法。

令全体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领导人都解的是：1977年3月

埃塞俄比亚就向经互会提出发展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建议，但到现在也未做出任何具体决定，仅限于表示愿意合作。

西方国家还寄重大希望于埃塞俄比亚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军官的构成人员的不变上。许多政府官员和军官在西方受到教育，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因此不愿意埃塞俄比亚实行社会主义的方针和优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很清楚，由于缺少用相应办法培养的干部目前不能更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制度依然是过渡的，新的地方政权机关尚未建立。国家领导人为奠定这方面的基础仅仅是刚开始工作。

总之，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和西方国家正在研究争取埃塞俄比亚的长远方针。从他们无视索马里的冒险，不让索马里取代埃塞俄比亚这一点上也可窥见一斑。他们一方面在索马里建立立足点，另一方面把埃塞俄比亚留作战略目标。这说明，美国、英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多么耐心地对待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的演讲和报刊中激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攻击。

国家首脑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在首都大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在美国新任大使在场的情况下提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阴谋。帝国主义在埃塞俄比亚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和实际的同盟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充分利用这一因素，甚至都不拒绝使用中国人发明的反苏宣传口号。

另一方面，虽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针（这表现在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在喀土穆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部长会议和首脑大会上的发言中，以及在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代表会议的发言中），但不能认为在埃塞俄比亚统治集团中关于对外政策方针和不结盟政策实质问题的斗争已经结束。在这一斗争中在军官中仍然相当有力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还起一定作用。

在谈埃塞俄比亚同西方各国的关系之前，应当指出，在反对帝

国主义的总方针范围内，埃塞俄比亚依然区别对待美国和共同市场国家。

反对帝国主义宣传的主要火力是指向美国、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其次是指向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

埃塞俄比亚同美国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埃塞俄比亚领土上撤消了军事基地、宣传机构、军事代表团，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减少一半。自 1976 到 1978 年埃塞俄比亚没有美国大使。埃塞俄比亚政府 3 个月没有对新任美国大使表示同意，只是在认真讨论后才表示同意。在此期间埃塞俄比亚人提出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停止反对埃塞俄比亚的运动，特别是同人权问题有关的反对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埃塞俄比亚将断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之后，美国不得不做一定的妥协。

为了保住在埃塞俄比亚岌岌可危的地位，美国尽力使用上述提到的因素（经济压迫，同国家机关保持联系的埃塞俄比亚人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美国买不买咖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埃塞俄比亚的财政状况，因为 1977 年出口咖啡的收入占埃塞俄比亚出口总收入的 75%。美国纠缠不休地向埃塞俄比亚提供经济援助，特别是答应埃塞俄比亚援助欧加登和沃洛居民的不断请求。他们还强调说，美国给的基本上是“人道主义”援助，而苏联只在提供军援方面慷慨大方。尽管两国国家关系恶化，但美国给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援助却增加了。比如据为了收集该地区情报而访问非洲之角国家的美国议员团的资料，1977 年这种援助为 1100 万美元，1978 年则为 1500 万美元。

今年 7 月美国公布作为援助提供食品 12500 吨，总价值 700 万埃塞俄比亚贝尔。据美国大使馆资料，自 1975 年美国给埃塞俄比亚的有成效的援助已达 7500 万埃塞俄比亚贝尔。

埃塞俄比亚同共同市场国家的关系取决于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双



边利益。为了在本国利益范围内保持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西欧国家耐心地对待革命。和美国一样，无论对索马里侵略和对厄立特里亚的分裂他们都表明支持埃塞俄比亚领土完整。法国新任大使向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递交国书时甚至说，法国“尊重”埃塞俄比亚选择的在社会主义方针政策范围内发展的道路。在西德大使被迫从埃塞俄比亚撤走和在埃塞俄比亚特种工作机关工作的专家被辞退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

埃塞俄比亚人对法国和意大利持比较温和的立场。比如，他们到现在没有批评法国人在绍阿省的行为。据现有资料，他们同法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因，是法国促进了埃塞俄比亚同吉布提的关系正常化和 3000 名索马里军人撤出吉布提。

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有经济利益，所以在解决厄立特里亚问题方面意大利能起好作用。今年 5 月意大利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受到热情接待。在谈判过程中讨论了有关双边经贸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以及意大利商人在埃塞俄比亚的地位问题。

令人瞩目的是，正是在意大利代表团访问亚的斯亚贝巴时，在法国大使和门格斯图会谈以后，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决定给美国驻埃塞俄比亚新任大使恰宾发确认书。

共同市场国家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内协调其在埃塞俄比亚的活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埃塞俄比亚没有正式代表处。意大利大使说，欧洲经济共同体援助埃塞俄比亚的计划为 8000 万美元，但是他说，埃塞俄比亚人只用了这一数额的 1%。最近，埃塞俄比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就实施改善埃塞俄比亚咖啡种植园的方案达成原则协议，费用为 2000 万美元。

在埃塞俄比亚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日本占有特殊地位，日本从革命开始对埃塞俄比亚内政就奉行克制的老一套的政策。日

本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加强自己在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地位和发展日本—埃塞俄比亚贸易。日本以借债和贷款形式的“援助”到目前为止有 1150 万卢布。1977 年埃塞俄比亚向日本出口额为 1700 万卢布，而进口额为 4600 万卢布。

苏联驻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大使馆 武官 Ю. 布达科夫

## 【专题说明】

# 勃列日涅夫后期的苏美关系

(1977年2月至1980年10月)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对非洲冲突的干预，以及中美之间关系出现的缓和趋向，苏美关系进一步紧张起来，冷战状态由此加剧。

本专题选编是涉及1977年至1980年间苏联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分析及苏联所采取的对策和措施的档案文献，其内容涉及到中、近东问题，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苏联的“人权”和“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在欧洲部署新型导弹问题，以及苏联对中美缓和的反应等等。尽管比较零散，但还是可以看出此期苏联对外政策坚持强硬立场的基本倾向。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许洪声、侯育成、张寰海、王鹏翻译)

No 06153

**苏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同美国会谈“人权”问题的决定**  
(1977年2月18日)

No II46 / X

绝密

送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柯、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扎米亚京等同志

苏共中央政治局 1977年2月18日会议第46号记录摘要

关于给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就“人权”问题同万斯会谈的指示批准给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就该问题的指示草案（见附录）

中央委员会书记

第46号记录第10点附录

机密

华盛顿

苏联大使馆

第一，请拜会万斯并告诉他，您受委托将如下意见转达给卡特

总统和他——国务卿。

美国方面向我们提出关于释放按我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苏联公民金兹堡问题在莫斯科引起极大的疑惑。

这种在关心“人权”的幌子下干涉我国内政的做法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

自然，每个人都有权对一些事物，其中包括对某国的自由和人权状况有自己的观点。对这些问题及其在美国的状况我们也有自己的理解。

但是将这些观点搬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并使其复杂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否则无法评价美国政府代表的立场，他们企图把纯属苏联国家内部权利的问题当作讨论的对象。这就触及到我们两国关系的原则性方面，而这一点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这种立场我们根本不能接受。

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都不尽相同。因此，当然我们对待这样或那样问题的看法极不相同。

我们在苏联感到自豪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我们的制度不仅宣布，而且实际保障所有苏联人的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免费医疗权、休息权，并真正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

与此同时苏联法律使我们人民防备诸如任何形式的战争宣传，传播种族不平等和民族仇视思想或使人们道德败坏的企图等反社会的倾向。我们任何人也无权破坏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不想将自己对人权和自由的理解强加给任何人，尽管在其他社会制度上产生的许多东西我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不难想像，假如我们从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出发，开始把发展同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这些国家现在就存在诸如千百万人的失业、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种族歧视、妇女不平等的地

位、国家管理机关对公民权的破坏、对进步人士的迫害等等)联系起来,那将会是什么样子。

顺便提一句,如果谈到对人权的关心,那看看美国一贯援助一系列国家的独裁和反人民的制度便一目了然,在那里经常和粗暴地践踏最起码的人权和自由。

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统统摆到我们国家之间关系方面来,显然,其结果只有一个:这只能使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将解决那些真正能够和应该成为我们国家之间相互关系和合作对象的问题引向歧途。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旨在保障人生活在和平、免于战争和军备竞赛、安全环境和人民之间友好交往权利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遭到践踏。

因此我们坚决主张,那些反映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中不同的国内发展问题,不应成为国家关系的讨论对象。

该原则与其他基本原则一起被载入1972年签署的“苏美相互关系基础”,并非偶然。回忆一下如下事实也并非多余:尚在1933年建交时我们两国承诺绝对相互尊重按自己意愿建设自己生活和反对以任何方式干涉另一方内政的无可争辩的权利。

然而,美国方面的言行并非总是一致的。关于“关心苏联人权”的声明,实际上变成对把自己置于苏联社会对立面的某些人士的支持和直接教唆。这里谈论的绝不是美国政府对某些美国记者在苏联活动(他们专门搜寻并大肆吹嘘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持示威性赞成的态度问题。这类活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有人直接参与。我们能够具体叫出他的名字来。

(对大使:如果交谈者问,具体指的美国大使馆参赞中的谁,可以点出一秘普雷塞尔的名字)。

当苏联当局根据苏联法律对违法的苏联公民采取某些每个国家都有权采取的措施时,却被美国方面积极用来损害我们两国的关系。

此外，众所周知，美国大使馆驻莫斯科代表秘密会见萨哈罗夫<sup>①</sup>，后者是涉及我国国防问题机密的携带者。根据美国大使馆的倡议进行的最近一次会见是2月8日。这是一件极不寻常之事，任何“人权”之类的借口都掩盖不了美国间谍机关反对苏联和苏联社会制度的直接活动。

至于谈到“美国公众舆论和国会情绪”等问题，须知在苏联也有自己的公众舆论，它坚决拒绝任何强加给我们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毫不相容的秩序的企图。

第二，谈话进行之后应该通过塔斯社将大致如下内容转达给莫斯科：

2月某某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拜访了国务卿万斯并提请他注意美国方面与积极发展苏美关系目的不相符合的言行。就此强调指出，苏联方面坚决拒绝在所谓“保卫人权”的幌子下干涉其内政的企图。

关于美国基本人权状况苏联方面可以说出许多事实，而且有真正充分的理由，如几百万人失业，种族歧视，男女不平等，公民个人自由受到侵犯，犯罪增加，等等。但是，有一点应该清楚，企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把这类问题带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能使关系复杂化并妨碍这些问题的解决，而这些问题真正能够并应该成为两国相互关系和合作的对象。

苏美之间和平共处和建设性合作的关系，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只有当它依靠相互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时（关于这一点苏美关系基础文件中已载明），才能卓有成效地发展。

完成情况请用电报通知。

---

<sup>①</sup> 安·德·萨哈罗夫，苏联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70年代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

No 11841

## 安德罗波夫关于抵消美国人权宣传作用的 措施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7年3月21日)

绝密

1977年3月21日

No575

莫斯科

苏共中央

关于今后抵消美国间谍机构在有关“人权”的反苏宣传中作用的措施

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说，经苏共中央同意在《消息报》公布的揭露美国间谍机构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间进行的具有敌视和教唆性活动的材料，在抵消美国进行的有关“人权”的反苏宣传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获得的资料表明，上述措施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在美国报纸、广播和电视报道中令人感到公众舆论对卡特行政当局推行的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和公开干涉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方针的忧虑。颇具典型意义的是，在美国大众传媒的评论中未引用维护该方针的任何严肃的论据。

在《消息报》上公布的材料，在驻苏联的美国外交官和记者中间引起惊慌失措，对他们同“持不同政见者”的接触起了抑制作



用。根据来自华盛顿的消息，他们拒绝任何评论，他们毫无根据地否认公开信和文章中所阐述的事实。

与此同时，美国大使馆官员在自己的周围表示担心苏联方面可能要求从苏联驱除因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而损害名誉的美国外交官普雷塞尔；组织有公开信作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并在其他报纸上公布新的揭露材料。在支持同美国驻苏代表积极接触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人和“持不同政见者”中间也产生某种混乱。

《消息报》揭露美国间谍机构在有关“人权”的反苏宣传中所起作用及“持不同政见者”真面目的行动，受到苏联公众的欢迎。绝大多数苏联公民，其中包括犹太民族，认为这一行动是及时的，并认为这对于支持同外国人联系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有移民倾向的人是一帖清醒剂。

考虑到美国国务院的官方人士和美国宣传机关竭尽全力散布关于公开信作者的各种谣言，使人们怀疑所公布材料的真实性，以图降低这次揭露性行动的效果，还考虑到他们继续进行有关苏联“人权”的反苏宣传，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在美国国务卿万斯访问我国后，就今后抵消美国间谍机构在反苏宣传中所起作用而采取如下措施是适宜的：

——举行记者招待会，安排一位美国或另一位西方记者同公开信作者谈话，为了将来在《消息报》和国外报刊公布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内容，应有一位苏联新闻记者参加；

——通过塔斯社、新闻社和国家电影和电视委员会的渠道，在对外报道和广播中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备好的文章；这些文章以事实为基础，其中包括1976年因为美国间谍机关服务的间谍罪被判刑的卡扎奇科夫案件材料，说明利帕夫斯基事件并非美国间谍机构利用“持不同政见者”搞反苏间谍破坏活动的惟一事件；

——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渠道组织向华盛顿及美国驻苏大使

馆，以苏联个别公民和集体的名义寄发一批抗议美国干涉苏联内政的信件；

——为了不引起美国当局对苏联驻美国代表处工作人员采取报复措施，只限于损害美国驻苏联使馆一秘普雷塞尔和记者奥斯诺尔的名誉，而不采取正式驱逐出苏联的措施。

附上决议草案<sup>①</sup>，请审核。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签字）

---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参见№06149文件。

№06149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对付美国“人权” 宣传措施的决定

(1977年3月24日)

№II50 / 71

绝密

特件

送安德罗波夫、齐米亚宁同志全部文件；扎米亚京、阿法纳西耶夫、阿列克谢耶夫、托尔库诺夫、拉宾等同志——第2、3件

1977年3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50摘录

关于今后抵消美国间谍机构在有关“人权”的反苏宣传中作用的措施

1. 同意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77年3月21日№575 - A报告中就该问题所提的建议。

2. 在《消息报》上公布同公开信作者利帕夫斯基的谈话。

3. 委托塔斯社、新闻社和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在对外报道和广播中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备的材料，用事实指出美国间谍机构直接参预利用“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敌对和间谍活动。

中央委员会书记

No06015

## 葛罗米柯就限制战略武器和近东问题

### 同万斯的谈话记录

(1977年3月28日)

绝密

3月28日(17时30分至20时00分)

葛罗米柯：我们之间的谈判，今天早晨勃列日涅夫开始参加。我想建议转换话题，谈谈与限制战略装备有关的一些问题。

万斯：同意。

葛罗米柯：首先，我想就这些问题谈谈一些总的想法。很可能又要重复那些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对美国方面说过的一些话，但是，这种重复我想是有理由的。

由于一些客观原因，限制和停止军备竞赛，缩减战争危险都是苏美谈判的核心方向。在这一方向的范围之内占中心地位的自然就是限制战略武器问题。

显而易见，没有必要再谈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了。它的意义在午前勃列日涅夫同您，万斯先生交谈时再一次地强调过，我们在早餐上交换意见时，也同样简短地议论过。我想只是强调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双方关心的程度应该是一样的。然而，未必能找到一台案秤，其指针能指出一方在这方面关心的程度要大于另一方。

这种情况就决定解决该任务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所以，并非偶然，苏联和美国都认为在这方面的主要原则就是双方的平等和

同样的安全，也就是说不允许单方面拥有超过对方的优势。并非偶然的是，这一公式牢牢地……<sup>①</sup>

葛罗米柯：如果您不反对的话，国务卿先生，咱们改换话题，讨论近东问题。我们还有许多有关裁军方面的问题。但是，我想把它的分成类，然后分别地加以讨论。现在就不拖延，适当地谈谈近东的形势。

万斯：我不反对，部长先生。

葛罗米柯：近东的局势是我们两国之间讨论的课题，其中包括在最高级会谈中讨论了好长时期。我们同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都讨论过这一问题，尽管都不那么深入和详细。讨论问题时，都是在领导人新上任时。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而近东的局势却极其危险，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深信，如果你们认为，给某个国家2亿~3亿，甚至10亿美元就能买到近东的和平的话，那么就大错而特错了。

万斯：我们并不那么认为。

葛罗米柯：很好。这令我们很兴奋。由此可见，应该寻找政治上解决的办法。关于这一点您可能知道，我们已及时地达成协议，即美国和苏联在近东要协调一致地行动。遗憾的是，这种协调一致的行动并没有得出什么重要的结果来。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一点点稍详细的情报都没有交流。已达成的协议故意不去执行，早就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至今仍是如此。而近东的局势，我再重复一遍，我们还是感到，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不错，现在，那里的大炮还没有响，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

在1973年末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我们一些国家经过共同的努力似乎是已经能够开始调解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也有过正式

<sup>①</sup> 档案复印件此处缺行。

的协议，以后要为在近东建立稳定、牢固的和平而共同行动。然而，遗憾的都是美国方面在此之后很快单独地行动起来，遵循自己某种特殊随机应变的，照我说，是极其随机应变的意图。这种行动方式，包括从美国民族利益角度来看也是鼠目寸光和极端错误的。我们认为这是很明显的。

我想直截了当地说，苏联并不要在近东地区为自己寻求什么特殊的权利或者什么优势。但是，我们认为，任何其他人也都不应该妄想得到这些。我们只希望一点，就是离苏联边境很近的这一地区最终能建立巩固的和平。不过，这种和平可能存在的基础，只能是重视所有那些利害相关的国家，首先是直接发生冲突的国家的法律权利和利益。

为了能够真正促进调解工作，必须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再反复讨论4次，也不会有什么理想的起色。我想简要地说说这些问题，而不叙述详情。有可能，我说的，对我们今后讨论这一问题有好处。

第一，照我们深信不疑的看法，进行调解的出发点应该是不能用战争的办法获取领土这一原则，而且还得用众所周知的决议形式把它固定下来……<sup>①</sup>

---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

№06125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权问题 给苏驻外人员指示的决定

(1977年5月19日)

绝密

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苏斯洛夫、  
波诺马廖夫、齐米亚宁、斯米尔秋科夫

1977年5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第56次会议记录摘抄

因西方对人权问题议论纷纷而给苏联大使的指示

批准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给苏联大使的指  
示草案（见附件）。

中央书记

第56次会议记录附件

机密

致全体苏联大使和苏联代表

近来西方就臆造的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破坏人权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有准备的宣传运动。这一公开挑衅和蛊惑人心的喧嚣的先锋，像过去一样首先是美国及西欧一些国家反共反苏的反动势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而且是新美国政府最高政治

集团中的官方人士，也极其热情地加入了这一运动。

在保卫人权的虚假幌子下敌视我们的运动，首先同西方反对和平、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的积极活动具有密切联系。这一运动的目的是转移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困难，特别是席卷全社会的经济危机、新的社会政治动荡的视线；同时也想削弱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抹黑，阻挡人民了解我国生活方式的真相，歪曲苏联对外政策的宗旨和原则，妄图破坏苏联日益增长的国际威信，特别是在伟大十月革命 60 周年前夕。

各苏联大使馆和代表处要坚持不懈地进行系统的工作，坚决反对这一敌视的运动，积极揭露其蛊惑人心和诋毁的性质，干涉别国内政、对和平事业非常危险的政治方针。在工作中要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资料、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讲话以及现有的指导性文件为依据。进行这一工作要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当然要注意所在国的特点，政府和领导人或交谈者的立场，要同兄弟国家大使馆密切合作。

1. 首先要强调，这类运动当然丝毫不能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牢固性，但是对紧张局势的缓和很不利，妨碍近年来国际关系中的积极进程。十分清楚，西方开展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人权问题的运动，在一些地方差不多是国家级政策机关发动的。它能严重毒害国际氛围，在各族人民中撒播不睦和怀疑的种子。

要指出，这类办法当然不能促进实际上应当而且能够解决的国际问题的解决，而只能为解决这些问题增加困难。围绕社会主义国家人权问题大作文章，其目的就是使世界局势不稳定，从而扩大军火库。值得提出的是，在开展的挑衅喧嚣中起很大作用的，正是那些想用苏联军事威胁论来恫吓本国人民的人。

这里当然还有另一种目的，即从消极方面来影响那些以现实态度对待国际事务，并主张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西方国家的政府领



领导人。

2. 谈到问题的实质时要指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避而不谈人权问题。要知道正是为了这一点，60年前俄罗斯才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保证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建立了最正义的和最人道主义的、对劳动人民有利的社会组织。

要特别强调，在苏联最全面、彻底地实现了人权和人的自由。苏联人不受剥削，享有劳动权、免费医疗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休息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加管理国家权。社会主义民主可靠地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个人和住宅不受侵犯。

苏联没有失业。我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全体具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都有工作，每个公民都能有工作并按其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得到劳动报酬，没有不平等待遇。妇女不平等问题已解决。

苏联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典范。全体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在经济、国家、文化和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平等，是不能违反的法律。

苏联公民所有这些权利和自由都写入苏联宪法和加盟共和国宪法。这些权利和自由的实现由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相应的法律做保证。

在揭露一些西方国家发动的保卫人权运动的伪善性质时，要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没有这些权利或严重损害了这些权利。比如在美国，宪法中连形式上也不承认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迄今在法律上也没规定美国妇女的平等地位。

在1966~1974年联邦调查局对被控有破坏行为的50万美国人进行了调查。尽管这些行为连美国国会机关都承认并未超出法律范围。在1953~1973年有将近15万封信被非法拆开（美国国会的报

告“调查工作和美国人的权利”，1976年）。

3. 苏联在保证人权和人的基本自由方面参加国家间的国际合作。正是由于苏联积极争取，在联合国宪章里才规定了保障人权方面的基本原则。如各民族平等和自决，不准许种族、语言、宗教信仰、性别方面的歧视。由于苏联代表团的不懈努力。在联合国宪章里才写进了关于要使全体居民都有工作做的条款。

1966年根据这些原则制订并通过了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关于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权利公约。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下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支持下在公约里写进了许多进步条款。其中有：禁止宣传战争，民族自决权，男女权利平等，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仇视，承认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在1976年生效的公约中规定了签约国的义务：在没有做到的地方采取法律措施及其他措施实现公约中规定的人权。

众所周知，公约中规定的权利已写入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及其他文件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权力在许多方面往往比公约条例更进一步。特别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权不仅仅是宣言，而且通过建立必要的物质条件，提出具体的措施来保障全体公民实现自己的权利。

许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迄今尚未批准人权公约，尽管假惺惺地指责别的国家破坏公约中规定的权利。他们在保障人的基本自由和人权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此外，美国也不是人权方面许多其他公约的签约国，如制止种族隔离犯罪公约、消除各种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及其他公约等。

美国尚未批准上述公约这一事实，使我们可以积极地就人权问题进行会谈。应当着重强调这不是偶然现象，因为美国的法律包括宪法在内，落后于国际公约的要求，所以美国才不批准公约。那么

美国代表根据什么才能谈保障权利呢？

在参加保卫人权的国际合作方面苏联主张：这种合作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主权国家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进行。根据联合国宪章在人权方面的合作应促进互相尊重并遵守人权。而直接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过去一贯是、将来依然是国家的内部事务。

众所周知，在公约中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实现，如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包括离开国家），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但根据国际文件一些权利可能受到限制。正如公约强调的，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为了社会秩序，为了居民的健康和道义，这些限制在任何民主社会都是需要的。

4. 美国官方人士也想利用联合国机关进行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

比如在今年2~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就提交了关于苏联是否遵守人权问题的文件，但是这一企图没有受到委员会会员国的支持。

在保卫人权的借口下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积极活动，想在联合国建立一个特殊机构（最高人权委员、人权法院等），它有权监督和检查一些国家人权情况，向政府发布指示，要求政府在这方面要做些什么。这种打算与联合国宪章“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直接抵触。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人权方面的国际协议，联合国要检查的项目可能是严重破坏人权的情况，这些情况是由于侵略战争和领土占领、法西斯政策、种族灭绝、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而产生的，他们是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智利法西斯委员会对人权的破坏、以色列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对人权的破坏、英国在北爱尔兰对人权的破坏，以及南非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都是这方面的例证。

5. 敌对运动的组织者千方百计妄图指责我们不执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关于人权的条例。西方国家不仅靠最后文件装出人权保卫者的姿态（尽管没有任何依据），而且要取得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权利。

在这方面要讲清楚：第一，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所谓自由报刊所描绘的被歪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与实际情况毫无共同之处。自由报刊经常报道的关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虚假情况据各个方面判断，是有其一定目的的，那就是想转移世界舆论对举世闻名的美国特有丑恶现象、失业及其他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注意力，同时给早已消除这些弊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势抹黑。

第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贯严格遵守最后文件中规定的所有原则，其中包括尊重人权原则。最后文件中规定，全欧洲会议与会各国要按国际协议，包括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的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而苏联正是这样做的。

第三，正如最后文件中所规定的，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严格遵守主权平等原则范围内，根据本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待有关问题，包括道德方面的问题。最后文件中明确指出，全欧洲会议与会各国要像尊重判定法律和行政法规权一样，互相尊重自由选择和发展本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体制的权利。要特别强调最后文件中的以下一条：与会国将抵制任何形式的干涉，直接的或间接的，单独的或集体的对内政或涉及另一与会国内部权威机构的外交事务的干涉，不论其相互关系如何。

苏联不想当老师，因为现在谈的是国家的内政；但苏联也不允许任何人以老师的姿态来教训自己如何处理内部事务。

6. 驳斥以下论点：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卫人权运动，特别是西方一些高层官方人士的公开讲话，好像并不是干涉其他国家内政，而是连社会主义国家本身都承认的一种思想斗争。要注意，西

方一些官方人士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挑衅讲话除破坏活动与支持国家间正常关系不相容的举动外，不能做另外的解释。

要强调，我们的确承认思想斗争、世界观斗争在国际局势缓和时期仍然存在。但是这种斗争，同思想破坏活动和在别的国家建立非法组织毫无共同之处。把这些问题视为国际关系，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就意味着把这些关系引向绝路，从而为解决在互不干涉内政条件下在主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应该而且能够解决的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困难。

7. 在保卫人权的借口下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及其代表进行的挑衅运动，实际上受反社会主义的各种社会渣滓和刑事犯罪分子的支持和教唆。对这样的人因其行为而采取的措施完全符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的70条和190条及其他加盟共和国刑法典相应各条。正如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联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这种人走上了反苏道路。他们不守法，在国内得不到支持，就到国外，到帝国主义破坏中心（宣传和侦查中心）寻找支持。保护2.6亿苏联人的权利、自由和安全，不受这类社会渣滓的侵犯，这不仅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由于西方宣传机关不停地大谈所谓“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努力在这些人 and 帝国主义代理人周围建造一个“光环”，你们在这一问题上也应采取进攻的立场，在就这一题目的系统谈话中尽量使用有关这一问题的新的补充资料。

8. 鉴于华盛顿发动的宣传运动会在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集团中引起消极反应，所以在各种有关人权的谈话中要重点揭露美国本国的社会制度。要善于有理有据地粉碎美国把自己打扮成民权的典范和最高世界仲裁的企图。

9. 应尽可能让大使馆和代表处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能就人权问题进行谈话，让他们把事实告知尽可能多的对所在国国家政策和社

会情绪有影响的人。

苏联记者要注意必须在资本主义国家破坏人权问题方面多做工作。

10. 你们要进行系统的工作，找出西方国家保证人权方面的政策和实际中的薄弱之处，要特别注意这些国家的法律和法庭的判决情况，向中心提出在保卫人权借口下向我们进行政治进攻的西方国家进行反宣传的建议。

(只发给华沙、布拉格、柏林、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索菲亚、哈瓦那、乌兰巴托、河内、贝尔格莱德。向所在国外交部长或其他代理人介绍本指示内容，并表示希望所在国也在这方面进行相应的工作)。

机密

给苏联大使和苏联代表的指示的附件

关于保卫人权的挑衅运动的组织者想造成这样的事实，似乎在苏联存在一个反对派，而当局在镇压这个反对派。

很遗憾，在我国还没有其政治和道路面貌与现实的意识相对立的人。这类失意者、蜕化变质分子、虚无主义者、造谣中伤者，西方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这些背叛者总共才一小撮。请看一看西方报刊的报道：许多年来只用同样几个姓名，依靠二三十个“持不同政见者”。这是实际情况的反映，说明背叛者只是少数几个人。

这类背叛者的真实政治面貌也非常清楚。西方和他们自己都承认，“持不同政见者”只是想改善社会主义体制。但是当这些人到了国外时，他们很快就吐露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比如索尔仁尼琴在其诽谤文章“牛犊抵橡树”中公开宣称，对

苏维埃制度的仇恨支配了他。

以下事实十分清楚地说明西方称之为人权斗士的人的真面目：他们一到国外，就去与帝国主义秘密机关保持密切联系的反苏中心工作。比如加利奇、科尔扎文、沙里亚、什捷伊恩在自由广播电台工作，这个电台的领导委员会是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机构之一。马克西莫夫和戈尔巴涅夫斯卡娅在给西方反共运动定调子的《大陆》杂志社工作。

事实表明，“持不同政见者”一般同反苏的侨民组织或帝国主义专门机构保持联系。比如，承担法律责任的亚基尔、克拉辛、布科夫斯基曾同反苏组织“人民劳动联合会”保持联系。金兹布尔格和加兰斯科夫遵照这一组织的指示想在莫斯科组建慕尼黑反苏出版社《播种》的秘密分社。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维特利奇内由于同国外反苏中心有联系被揭发。

背叛者的整个面貌都是和苏联道德、整个生活方式相对立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受到苏联人民的愤怒谴责。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西方外交官和记者的豢养和支持，这本身就违反赫尔辛基协议。

最后文件中在决定相互关系原则时写道：签约国对另一国的内政或涉及另一国内部权威机构的外交事务将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单独或集体的任何干涉。那么怎么能把这一原则同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讨论“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一致起来呢？

人权保卫者认为，似乎在苏联任意把“持不同政见者”因其不同政见而送上法庭。实际上在苏联不追究政治观点。但根据苏联法律要追究从事反苏宣传破坏或削弱我国社会制度的人，或系统散布谎言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人的责任。因此现在谈的不是追究观点，而是谈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70条和190条，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刑法典相应条款规定的故意进行的

行为的惩罚。

许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亚基尔、克拉辛、久巴、霍洛德内、马拉姆金等）发表了揭发性声明，他们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而且揭发了他们的后台——国外的反苏组织和他们与之联系的敌人的思想意识中心。

这样就无可反驳地证明，个别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不是因为他们的政见不同，而是因为他们犯了反对国家的实际罪行，是因为他们从事各种反国家的活动（直至恐怖活动）。

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行法规都对反国家利益的活动规定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比如意大利刑法典中规定：对在国外散布夸大或有偏见的有关国内形势的信息；降低国家威望或从事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的活动的人，处以5年以上监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131节这样写着：对为了诽谤国家机关或最高机关的决定，散布明知为捏造或被歪曲的事实的人处以罚款或剥夺自由，不超过2年。

这一刑法典第100节规定：对散布一种谎言，但这种谎言如果成为现实就将影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部安全或对外关系的人；或者广为传播这种谎言，致使外国信以为真，从而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部安全或对外关系造成威胁的人，剥夺自由6个月以上。对制造一种谎言，而这种谎言如成为现实就将影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部安全或对外关系的人，处以同样的惩罚。未遂罪也受惩罚。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这类法律，但我们的敌人在为“持不同政见者”辩护，却只字不提这类法律。

资产阶级报刊散布苏联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谣言，说有1万名政治犯。实际上到今年5月1日，只有122人由于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70条犯了反对国家罪，受到惩罚。

据西方报刊资料，在北爱尔兰从1969年到去年年中有1500多



人死亡，数千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

苏联宪法规定公民有集会结社的权利。当然和所有国家一样，行使这种权利时要通知有关机关并应得到有关机关的准许。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都证明这一点。

有人问，在苏联谁并在什么时间批准了保卫赫尔辛基协定小组的活动？权威机关给“持不同政见者”发了在莫斯科或苏联其他城市公共场所举行集会的有关批准书吗？

参加小组的许多人近10~15年来不止一次因反对国家罪及其他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如金兹布尔格，1936年出生，早在1962年就因诈骗受审判，1967年因妄图在莫斯科成立全国劳动联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受审判。近年来他无所事事，担任了所谓索尔仁尼琴基金会的主管人。这个基金会实际上是给敌对分子反苏活动拨款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对因刑事犯罪被审判的人进行物质支持的组织。众所周知，按西方国家的法律背着国家进行财务操作是要受到严惩的。

参加小组的还有皮亚特库斯，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因敌对活动三次被审判；坎特巴，乌克兰地下土匪组织成员；职业刑事犯马尔钦科，曾被流放伊尔库茨克州。

领导“莫斯科小组”的奥尔洛夫，长期不工作，早在1956年就走上了反对社会的道路。当时他是苏共党员、国家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理论和实验物理研究所初级研究人员。他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因而被开除出党并在《真理报》上受到批判。近年来他被选为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但是他置科学研究工作于不顾，全力以赴从事反社会活动。奥尔洛夫是许多挑衅声明的撰稿人，答外国记者问的发言人，各种公开反对宪法活动的参加者。1976年5月他同西方代表建立了罪恶联系，组建并领导了所谓“苏联促进赫尔辛基协定实现小组”，企图开展半公

开的、有组织的反苏活动。

应当指出，各种“持不同政见者”都号召给苏联施加压力。初看起来，这可能对西方有利。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者”助长了对已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的破坏。正是在东西方国家这种合作的基础上赫尔辛基会议本身才得以召开并做出决议。在这方面“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却破坏了缓和和最后文件条例实际实施的重要基础。

№06136

## 安德罗波夫关于美国情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7年10月29日)

绝密

第2347号-A

### 1977年10月28日关于美国情况的报告

卡特在美国民众中的威信继续下降。美国国内对当局批评的增长（因为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没有取得具体成就）使总统非常不安，他特别重视个人的威信，以便为第二任选举打下基础。由于美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复杂，不好解决，总统采取了于近期取得巨大外交成就的方针。

据卡特的意见，在现有形势下在这方面最有可能做到的是同苏联签订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新协定。围绕关于巴拿马运河新条约在美国形成的局势也迫使卡特尽快准备协议。如果这些条约得不到批准，会影响政府下一步工作的效率，特别是会严重削弱政府通过国会进行其他国际协议的可能性。总统期望签订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这样的对外政策成就，不仅能大大提高其政府的威信，而且能为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创造良好的条件。

现在政府采取措施，使国会和全美国公众舆论都能支持未来的协议。在正式讲话中，卡特、万斯、布热津斯基都强调美国需要签

订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协定。总统和国务卿同重要参议员会晤，说服他们最好能支持未来的协议。

与此同时，卡特政府还在努力争取召开日内瓦近东和平代表会议，因为首先在近东调解方面美国要力争保住倡议权。此外，卡特认为，召开日内瓦代表会议这件事有助于巩固他在美国国内的地位，因为这件事会使美国公众认为是总统个人的功绩。

美国表示准备在协调近东问题方面同苏联合作，说明美国政府明白没有苏联参加在这方面是不能取得成绩的。同时，美国将争取把苏联在协调近东问题方面的活动限制在只参加解决召开日内瓦代表会议的程序问题。卡特特别希望苏联能对美国和以色列共同提交的召开日内瓦代表会议计划的主要对手叙利亚，给予有利于美国的影响。

美国注意到，在全欧会议参加国代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人权问题的立场已强硬了。在贝尔格莱德同苏联代表非官方的谈话中美国人以白宫的新指示为依据，这些指示是在对代表团在会议上的立场过于温和不满的国会的压力下制订的。据美国人说，指示中建议避免同苏联直接冲突，集中主要力量批评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破坏人权”。

近来美国和南斯拉夫的接触多起来，原因是美国力图使南斯拉夫保持不结盟立场，不让南斯拉夫同苏联接近。此外，美国人认为，南斯拉夫在“第三世界”很有威望，能影响不结盟国家，使他们不接受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策有偏见的看法。据卡特政府的企图，美国如能扩大同南斯拉夫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强调独立的南斯拉夫在欧洲的关键作用，及其在不结盟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就能达到上述目的。

在卡特周围关于政府即将改组的谣传日益增加。有一种意见到处传播，说卡特可能免去财政部长勃利门塔尔的职务，据总统的意

见，他不胜任同国会和工商界协调关系的任务。勃利门塔尔的可能接替人是特使斯特劳斯。他在法律界和工商界享有威信。美国政界人士说，斯特劳斯近来是白宫的常客之一。

共和党开始准备国会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将在1978年秋季举行。共和党领导人准备提出这样的纲领，即不仅对中等收入的选民（党的基本选民）有吸引力，而且对不大富裕的美国人也有吸引力。党的领导还未能组织广大群众批评卡特政府的对内政策，因为卡特解决美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办法开始越来越具有保守性，这种性质一般是共和党总统所具有的。因此共和党人准备集中力量批评卡特的对外政策，首先是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新条约。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06126

**安德罗波夫关于“独立工会”问题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8年4月5日)

机密

关于限制与所谓“克列巴诺夫集团”有关的敌人的敌对活动的措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向苏共中央作了报告（1978年2月11日，1978年3月24日）<sup>①</sup>。

鉴于苏联驻国外代表处要求就所谓“独立工会”给予实际答复，国家安全委员会重申以前所发表的看法：在现阶段无论国外或国内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都是不适当的。

在回答上述问题的提问时，我认为正确的立场应当是：任何“新的”、“自由的”或“独立的”工会在苏联都不存在，而且我国劳动人民也看不到有其存在的必要。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这些文件。

№11842

科尔尼延科关于通报与万斯会谈情况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8年4月25日)

机密

苏共中央

苏联外交部提出指示草案和给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除外）领导人关于在莫斯科同美国国务卿万斯谈判情况总结的通报。

最好把谈判中涉及近东问题部分通报给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此外，由于法国方面提出了要求，

№06135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同万斯会谈总结的会议记录

(1978年4月27日)

绝密

П102 / 1 号

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波诺马廖夫、鲁萨科夫、里亚鲍夫、斯米尔诺夫、扎米亚京

抄自 1978 年 4 月 27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第 102 次会议记录  
关于同美国国务卿万斯谈判的总结

1. 同意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同访问莫斯科的美国国务卿万斯的谈话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同他进行的谈判。

2. 委托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里亚鲍夫、斯米尔诺夫组成的委员会在今年 5 月 12 日前为同美国代表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定期会谈提出建议。

3. 应将在莫斯科同美国国务卿万斯谈判的情况通报社会主义国家、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和法国政府。

批准给驻索菲亚、布达佩斯、柏林、华沙、布拉格、河内、哈瓦那、平壤、乌兰巴托、贝尔格莱德苏联大使的指示草案（附件 1）；批准给驻大马士革、贝鲁特、亚丁、阿尔及尔、巴格达、的黎波里、阿曼苏联大使的指示草案（附件 2）和给驻巴黎苏联大使的



指示草案（附件3<sup>①</sup>）。

苏共中央政治局  
分送苏共中央政治局各委员表决

---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这三个附件。

№06171

**苏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对国际形势估计的会议记录**  
(1978年6月8日)

绝密

№II107 / III

呈送：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格里申、葛罗米柯、基里连科、柯西金、库拉科夫、库纳耶夫、马祖罗夫、佩尔谢、罗曼诺夫、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谢尔比茨基、阿利耶夫、杰米契夫、库兹涅佐夫、马谢罗夫、波诺马廖夫、拉希多夫、索洛缅采夫、契尔年科、多尔吉赫、齐米亚宁、卡皮托诺夫、鲁萨科夫、里亚鲍夫、扎米亚京等同志。

1978年6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07会议记录  
国际形势若干问题

1. 赞成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该问题发言中所阐述的意见（附讲话原件）。
2. 委托苏联外交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苏共中央国际部、联络部和对外政策宣传部参考政治局会议上交换意见的情况，准备相应的材料和文件草案，并送交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政治局

№107 会议记录附件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若干国际形势问题的讲话

同志们，从刚才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给我们讲的情况可以看出，葛罗米柯同志在美国逗留期间，无论是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委员会的安排中，还是在同卡特和万斯的谈判过程中，以及在同许多国家代表的双边会晤和交谈时，都做了大量的和有益的工作。我想，我应该赞成这项工作，将它写进我们的决议。

然而仅仅局限于这一点是不正确的。从葛罗米柯同志的通报中，从近期通过不同渠道得到的广泛情报中，完全清楚地看到，我们正在经历国际关系发展中最复杂的时期。目前形势严重恶化。这种恶化主要来源于卡特政府中日益增多的侵略者，来源于总统本人及其最亲近的同僚们，首先是布热津斯基讲话中越来越激烈的反苏性质。

从全面看，卡特并非简单地受当前最狂妄反苏分子的影响，调整美国的军事工业综合体，而是打算在反苏政策和回到“冷战”的旗帜下为自己当选新一任总统而斗争。

美国政府的这一路线现在已在西方大国、北大西洋公约集团、非洲及对华政策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对这一切做出反应？

我想，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容许的。应当为和平缓和积极而顽强地斗争。应当竭尽全力阻止推行孕育着新的世界大战威胁的政策。这里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对全世界来说都引人注目的步骤。

具体地讲，如果讲最近一个时期，我认为可以做如下几件事。

第一，在我们的报刊（同时在各大报）上发表长篇和措辞严厉的声明，比如题目可叫“评卡特政府的政策”。发表这种无任何人签字的声明，这甚至会更加引人注目。声明中直截了当地说：在美

国政策中发生了对和平事业来说危险的变化；在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编造的谎言和诽谤的掩盖下，正干着反对和平与缓和的具体勾当；故意延缓同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进程；企图粗暴地干涉我国的内政，实际上两国之间的联系正在缩小；制定新的广泛的，甚至是10年以后的军备竞赛计划，尽管各国人民希望裁军；目前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似乎已经同好战的、反苏的中国统治者找到了共同语言，众所周知，后者把和平与缓和说成是骗局，而战争才是惟一真正有前途的。

美国政府成为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军事干涉和公开干涉国家事务，无情镇压革命解放运动政策的鼓舞者。

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目前所有这些倾向也为最近在华盛顿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定了基调。美国一方面给与自己思想一致的人打气；另一方面拉拢动摇和怀疑者，同时对不同意参加该集团的国家施加压力，妄图把该集团重新推上“冷战”的道路，并积极准备热战。

卡特外交政策的所有危险方面都应该清楚地，无需多余的戏剧性，在该文件中展现出来。还应该向其他国家和美国的公众舆论指出，卡特、布热津斯基之流打算玩多么危险的游戏。

最后以平静的、明确的语气肯定我们缓和发展同美国友善、互利关系的方针来结束该文。

第二，华沙条约缔约国就北大西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总结发表集团声明。考虑该文件必须协商一致，其中包括同罗马尼亚的协商一致，故文件措辞不能太尖锐，多强调我们政策的建设性方面。

令人遗憾地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工作及其决议并未缓和和巩固和平，而是使国际局势尖锐化，加强军事准备和军备竞赛。紧急号召增加军事拨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代表为中子、化学、细菌武器大肆宣传，大谈特谈生产各种武器的长期纲要

——这些就是本次会议以及会议以后工作的全部意义。

华沙条约各国谴责这种政策，并相信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也谴责它。他们企图把日益广泛的军备竞赛强加给我们，但我们坚决主张阻止军备竞赛，主张在各种集会场所就这些问题具体协商。为了顺利完成同美国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苏联做到了它能做到的一切。在维也纳的谈判中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灵活的立场并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设性建议。华沙条约国家主张严格遵守和平共处原则，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无论是以军事干涉形式，还是以另一种破坏活动形式出现。

文件结束部分还应该紧急呼吁回到缓和、相互尊重和互利合作的道路上来，而上述这一点在赫尔辛基会议文件、苏美及其他双边文件和联合国许许多多决议中均有明确记录。

第三，苏联政府就非洲事务发表专门声明。在该文件中坚决戳穿和揭露帝国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非洲，其中包括非洲三角地区、扎伊尔等国政策的阴谋。在此同时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对非洲的军事干涉、破坏活动及其他形式干涉其内政的政策。指出现代殖民主义者打着“非洲团结”的虚伪旗号在非洲从反动的、反人民的制度下雇佣走狗和自己政策的传播者。指出应当相信，真正的非洲团结——非洲独立国家和爱好自由人民的统一意志，捍卫自己国家独立及其国内自由发展的决心——一定会占上风。

就这样3个文件，我想，如果近期能准备好就发表。当然，完成此事非一日之功，可合理安排时间抓紧进行。

同时可以给我国驻非洲进步国家、或多或少独立国家的大使发出指示，以便同上述国家的领导人做相应的工作。

根据我刚才讲过的那些文件的精神，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其他渠道——同兄弟党的联络渠道，在各国际社会组织等渠道开展工

作。

至于谈到联合国大会裁军特别委员会的工作，看来，必须利用我们的大众传媒工具在苏联建议的视角下继续阐述这个题目。在这里还应该支持现在和将来在大会中出现的健康的和建设性的事物，揭露裁军敌人的花招。

如果同志们同意，大概我们就可以委托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相应部门（国际部、联络部和对外政策宣传部）准备我们提到的材料。

№06133

## 葛罗米柯同万斯就中东问题的会谈记录

(1978年7月12日)

第一阶段会谈于7月12日开始。

根据万斯的建议在全体会议开始以前，少数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参加会谈的苏方有 A.Φ. 多勃雷宁、B.C. 谢苗诺夫和 B.M. 苏霍列夫；美方有约尔恩克、图恩和克莱默。

万斯：我想在全体会议开始以前，我同您单独谈5~10分钟是会有好处的。我建议，今天上午我们集中精力交谈和制订关于限制战略武器新条约有关的问题。如果您同意这一点，我想第一个发言并提出这一点。

我认为在这两天内我们能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是极其重要的。我想如果双方都有良好的愿望，这种进展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方面将全力以赴，促使我们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

今天上午我想谈谈新型火箭问题。在这方面我准备先谈谈双方以前陈述的各自的立场，然后提出一些新的建议。

万斯：还有一点我们需要协商，因为记者们可能要问到这一点。我指的是我们下一次的会谈。我们知道今年秋天您将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开幕式。看来下次会谈将在那时举行。

葛罗米柯：如果提出这一问题，我们方面可能回答说，下次会谈大概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

万斯：我认为这种会谈是必需的，所以我想得到明确的答复。

葛罗米柯：我说了，我们大概在上述时间会谈。我这样说是留

有余地，因为谁也不知道在上述时间之前会发生什么事。但总起来看可以这么说，而且比较肯定。

现在谈关于近东的局势问题。这次会议在苏联代表处举行，在这个意义上您是我们的客人，这是第一。第二，您即将参加不久将在伦敦举行的专门谈近东问题的会议。如果您不反对，那么您作为行家里手今天在这里也应就这个问题第一个发言。

万斯：好。请允许从形势分析开始。然后我谈下周在伦敦举行的，我将参加的外长会议。

第一，以色列和谈及双方已提出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有关建议。有此之前，他们也提出了关于签订大家都能接受的协调近东问题协议的原则宣言（须在日内瓦会议上研究决定）。

谈到这一原则宣言，双方最大的分歧，是以色列军队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出的问题，以及巴勒斯坦人参与决定其未来命运问题。很清楚，双方都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基本问题。关于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双方存在很大分歧。原则宣言中的其他部分不会引起纷争。

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问题有相应的双方两个建议，反映了一些一致的意见以及立场上的一些分歧。在这些建议中可区分出四点一致的意见。

在每份建议中都为西岸和加沙地带规定了为期5年的临时过渡制度，在此期间由巴基斯坦人实行某种形式的管理。

其次，在这些建议中详细规定了保证安全的措施，并指出这种安全应通过双方谈判来保障。

安全措施中包括在上述过渡时期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限制以色列的武装力量。尽管在建议文本中没有写明确，但已注意到在保证安全方面还将采取其他措施。这些措施有：使用电子仪器报警；安排有限数量的联合国部队；其他类似的保安措施。



最后，两份建议都从双方的共同目的出发，希望保证真正的和平，建立双方的正常关系，其中包括开放边界，一国居民自由去另一国的领土等。

与此同时双方立场的最大分歧在于5年过渡期以后该怎么办。阿拉伯的立场，我想您很清楚，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该地居民的政权和主权；怎么建立？要根据这些领土上的居民通过某种全民公决方式决定的计划和措施来进行。而以色列则相反，不愿意说他们准备离开西岸和加沙地带，认为这些领土的主权问题应推到上述5年过渡期以后再解决，而且在这5年中任何一方都不提涉及主权问题的要求。以色列人坚决主张，5年以后可经各方同意后决定：在当时形势下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应如何解决与西岸和加沙地带主权有关的问题，应如何管理这些地区。

葛罗米柯：您说的“经各方同意”在这里究竟是哪方？

万斯：“各方”这里指的是埃及和以色列。

众所周知，在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居民中对头5年过去以后该怎么办的看法也有分歧。但是现在大部分政府成员明确表示支持贝京总理的立场，即整个问题的解决应放在5年以后。当然，在以色列对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存在分歧。比如耶路撒冷东部怎么办？但我在发言中只想反映谈判桌上双方建议中的主要问题。

现在谈即将举行的，我拟参加的伦敦会议。双方已各自提出了建议，现在正如我期望的，在这次会谈中他们可能互相解释这些建议。看来，每一方也要向另一方提出建议中需要解释或澄清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提交的建议是相当概括的。

希望经过持续两天的讨论，能扩大达成协议的共同基础，澄清双方建议的内容，使双方能互相了解各自的立场。我想这次会谈可成为双方就中东问题恢复谈判的开端，因为谈判将在埃尔阿里舍、西奈半岛、比尔谢巴、以色列定期举行。

当然，现在可能谁也不能说在这次会谈中能否取得真正的进展。看来只有在这次会谈的一、两次会议后才能清楚，这种办法能否取得肯定的结果。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黎巴嫩的形势。我可以告知您，近两、三天来那里有些进展，特别是在北黎巴嫩基督教的力量和叙利亚的力量对抗减少了。叙利亚军队撤离了一些黎巴嫩基督教军队以前占有的地区，而后者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所提出的观点。这样，冲突和对抗就有了一些缓和，这是好事。

该地区最大的问题之一实际上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政府的领导软弱无力。由于没有真正的领导人，现在谁也不能团结起黎巴嫩的武装力量和控制国内出现的人数众多的武装集团。

迄今仍不清楚，萨尔基斯<sup>①</sup>是否退休。关于尽快推举萨尔基斯退休后的继任人，以防在这方面出现真空的问题，在议员中议论纷纷。

我们一贯坚持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建立接触，提醒他们保持克制并缩减军队人数，特别是在北黎巴嫩。而且我们向黎巴嫩人说在萨尔基斯退休后不能出现真空。与此同时，我们同以色列人也保持经常接触，号召他们帮助与他们有联系的黎巴嫩基督教徒，使后者也保持克制。我们警告以色列人，在现在的形势下事件最危险的发展趋势是以色列军队再次进入黎巴嫩。

最后，我认为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能使黎巴嫩现在的局势尖锐起来。问题是，有将近 20 名联合国军事人员被巴勒斯坦人扣押。我必须指出，该地区的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对待这些士兵。如果杀了他们或伤害他们，我担心局势会尖锐起来，黎巴嫩南方的冲突会很快升级。我诚恳地希望苏联能让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

<sup>①</sup> 埃·萨尔基斯，1976~1982 年任黎巴嫩总统。

人施加影响，以便尽快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葛罗米柯：就您所谈到的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有关西奈半岛的领土问题。这些领土是否应该全部让出来？如果是，那么何时、在什么时候让出来？在您的谈话中我没有听到这一点。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叙利亚。您只是在谈黎巴嫩形势时提到叙利亚。戈兰高地的情况怎么样？您所谈的事件中漏掉了。也可能是由于您还须同埃及和叙利亚的领导人会谈，所以没有涉及这一问题。

万斯：我没有谈叙利亚是由于第二个原因。我没有进一步谈叙利亚的问题，是因为我需要同我的同行——叙利亚和埃及的外交部长会谈。谈到叙利亚人，他们对我们说，现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正进行讨论，他们不想参与，决定持旁观态度。另一方面，萨达特发表了一种观点，说如果能制定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协调和签订相应协议的原则宣言，那么正如他所期望的，叙利亚人和约旦人就会参加谈判，讨论与近东形势有关的所有问题。

关于西奈半岛问题，如所周知，在没有找到解决西岸、加沙地带问题以及原则宣言问题的办法以前，萨达特不会签订有关这方面的任何协议。

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埃及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之间已进行过讨论，在讨论中涉及到西奈半岛问题，就一些问题已预先达成协议，这些问题在任何就此达成的最后协议中都应有所反映。与此同时，这里依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难题。

葛罗米柯：我们注意地倾听了您对近东形势的评述。我须从头说起，我们不太相信以色列和埃及单独取得的成绩。以色列和埃及还不是整个近东，埃及也不是全阿拉伯世界。因此我再一次强调，我们不相信他们单独取得的成绩。我们相信全面彻底地解决近东问题，所有有关方面都参加，巴勒斯坦人也参加。我们不止一次地阐明这一立场，今天我不重复。我们认为协调近东问题的最好办法，

是召开包括苏联和美国各有关方面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

众所周知，曾开过一次日内瓦会议。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这次会议远未能协调所有的问题。在筹备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障碍，以致未能开成，现在召开日内瓦会议依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对此感到遗憾。

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问题我们不止一次进行过详细讨论。而且苏联和美国甚至在去年10月发表了专门的共同声明，表示支持召开日内瓦会议。但声明中所谈的事迄今仍未做到，其原因您是很清楚的。

如果现阶段不召开日内瓦会议，那么很清楚（您也知道这一点），如果以色列和埃及在谈判中取得某些结果，那时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因此我说，即使以色列和埃及结成联盟，那么还是不能保证近东的和平。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政策，反对侵占阿拉伯领土。苏联认为，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单独协定是有害的，因为它无助于近东问题的和解，相反会撒下这一地区更大冲突的种子。即使只就巴勒斯坦问题来说，那么这一问题不解决中东就不可能有和平可言。

您希望我们通过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人施加影响。确实您把这件事同黎巴嫩当今事件联系起来。正如我以前所说的，我们过去不止一次从正面劝说巴勒斯坦的组织和阿拉法特。此外我说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对巴勒斯坦人给予了克制的影响。但是您很清楚，在巴基斯坦运动中有各种团体和派别。

现在我们是以色列和埃及单独协定的见证人，这一协定是经美国同意、赞成并参与而签订的。这一情况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您所说的我们发挥影响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将消极地对待巴勒斯坦的组织和阿拉伯国家。我们过去没有消极地对待，将来也不会消极地对待。这是由我国的地位、地理因素及其他各种因素决定

的。

我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忽视日内瓦会议，而我们坚信在各方努力下日内瓦会议能达到近东的和解。我再重复一次，我们支持日内瓦会议。

至于以色列，它诅咒日内瓦会议，根本不想听到这个词。我说，不止一次听到以色列方面对日内瓦会议及其参加者的侮辱性声明。十分清楚，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后台，他们对在大家满意的基础上集体解决近东问题的这种方法——日内瓦会议不会如此放肆，如此无理。我们苏联力争这一问题能圆满解决。即使以色列满意，也使阿拉伯各国满意。谁能比我们最坚决、次数最多表示支持保留以色列的独立和主权？谁也不能比。以色列的代表也知道这一点。以色列所有的政治活动家和党派都很清楚这一点。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我们几十次表示支持以色列的独立，我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非常清楚，情况会比今天糟得多。

您期望事情会成为您所期望的那样，因为你方供应以色列大批武器，它现在比阿拉伯国家强。但这不是保证该地区和平的可靠基础。近20~25年的事实和事件可雄辩地证明这一点。您现在对萨达特转向你方感到满意。但我们如果也两次或三次更多地向他提供武器，他是否会转向另一方？我们和你们作为大国不应只限于在今天的框框内来看形势，而应看得更远。否则不会有助于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对近东、欧洲和亚洲同样如此。

最后我想说，我们的立场您是很清楚的。我们坚持这一立场，而且不准备放弃这一立场。至于单独的协定和计划，我们不能赞同，理由我已向您讲过。

不论我们是否愿意，但苏联和美国都是近东形势的有关方面。我想您不会反对我的如下意见，即我们应当继续互相通报有关这一问题的情况。如果如您所说的，您能向我们通报关于伦敦会谈的情

况，当然我们将对此表示感谢。我想这不会损害你方的利益，而且在当今时代秘密是保不长久的，很快就会泄露的。

我们认为就中东问题继续交换意见不仅仅是在正式会议上，如现在的会谈，日内瓦会谈，莫斯科或其他地方的会谈，而且在日常工作接触中也应这样做。我们赞成这一问题尽可能多地、尽可能经常地交换意见。

请直截了当地说，您认为伦敦会谈与会各方有多大可能达成协议？

万斯：百分之一。

葛罗米柯：向您祝贺。这样说来，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既然概率这么小，您为什么还去伦敦？

万斯：伦敦会谈进行以后我很愿意向您通报会谈情况。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取得成就，我认为会议也算没有白开。我同意您所说的各方面的安全只有在真正和平的条件才能取得。我方努力争取这一地区的真正和平。即使仅仅能制定出原则宣言（请您注意，原则宣言中预计包括去年秋天我们所做的有关中东问题的共同声明中所有的主要问题），那么这也是向日内瓦会议前进了，因为我不止一次指出，日内瓦是惟一能签订包括所有问题的、保证该地区形势稳定的、全面持久的中东和解协议的地方。

在这方面我想还提一点想法。如果在即将举行的伦敦会谈中即使能就恢复埃及和以色列的谈判达成协议，我们也是欢迎的。如果在以后的谈判过程中解决了西岸和加沙问题，那么这正是原则声明条款中所缺少的一环。正如我已说过的，这会扫清通向日内瓦会议的道路。

葛罗米柯：我说一点。如果我们两国在解决中东问题过程中不必让总统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就这一地区发生的这种或那种事件用直拨电话互相通话；相反，使他们能为在中东取得和平而互相祝贺，

那就太好了。

\* \* \*

下一部分即会谈的结尾部分是在双方翻译参加下一对一进行的。

葛罗米柯：近来有些意见认为须同苏联达成协议，协调关系等。但这些意见是顺便说的。我们希望这些意见能通过明确反映美国政治路线的方式来发表。

我想知道，我所说的是偶而的意见还是长远的政策，美国是不是在研究对苏联的政策，这是不是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未来政策。

谈到对美国的关系，我们的路线仍然和以前的一样，关于这一点我已多次直截了当地谈过。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明确指出过这一点。

不久前《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编辑部的文章。我可以确认，文章阐述了我国官方对美国的对苏现行方针的看法。在最近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我作了报告，代表苏联全体领导人确认了这一观点。

如果看一看我们的报刊，就会知道我们一贯赞成发展苏联和美国之间友好关系，履行按所签合同和协议我国应承担的所有义务，缓和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

如果谈到广泛的、超出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纯双边谈判范围的裁军问题，我们同你们的立场简直是对立的。因为苏联赞成实际的裁军。仅就联合国大会专门裁军会议期间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事情来说吧。这是什么？是对我国和平政策的报复？是对我国根据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发展友好关系的政策的报复？是对我们号召承担世界和平命运的责任的报复？

我想听听您对我所谈的意见的回答，回到莫斯科以后我将向勃列日涅夫本人和全体苏联领导人转达，同时请您把我们谈话的内容

转告卡特总统。

万斯：我很高兴回答您的问题，并对有机会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表示欢迎。我国对苏联的政策没有变化。我们在努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希望这种关系能够摆平。我们希望两国能在各方面较密切地、经常地交换意见。

我们知道，由于我们两国领土面积大以及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实力强，有影响，我们承担着特别的责任。

我们认为，使我们两国关系接近和密切，符合两国的利益。这既是由于实际的和政治的原因，也是由于过去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曾有过密切的友好关系。

“冷战”时期是我们两国关系中不好的时期，但后来幸而这个时期结束了，我们的关系改善了。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近一年来，出现了一些因素，使我们产生了分歧，给我们的关系造成了困难。这些分歧还表现在对非洲和在非洲大陆产生的各种情况的立场和看法上。这些分歧表现在对人权、公民权的看法上。这些分歧表现在对苏联现行的诉讼程序的看法上。

这些分歧使我们的关系紧张了，并在某些问题上在我们两个大国之间开了一条鸿沟。

但是我们方面愿意探寻共同的基础，发展我们的关系，希望将来我们能扩大这一基础，把我们的关系恢复到正确轨道上来。

总统和我真诚地希望这能成为现实。在不久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卡特总统谈到苏美关系的状况时说他非常希望改善苏联和美国的的关系。

我们两国合作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关于限制武器的谈判。这里有进一步共同努力的重要方面和共同基础。

我希望我们以后也能遵守尼克松总统时期在《苏联和美国相互



关系基础》中规定的所有最重要的原则。

葛罗米柯：这确实是一份好文件。

万斯：现在我们要翻过去一页，踏上新的道路，在努力建设美好未来的过程中彼此互相关心。我们的心愿、政策的基础就在于此。

最后我想说，我认真阅读了《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我决定不公开回答文章中我不同意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这样做只能加剧我们之间的争吵。我想最好是根据我们的行动来评论我们的政策，我希望这些行动是为了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

葛罗米柯：我认真听取了您的意见。我不再重复我已说过的话。我简单谈了对我们看到的美国政策的看法，并简述了苏联的政策。现在只回答您的意见中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国的内政。我们的这一立场坚如磐石。进行审判、执行我国国内法律完全属于我们自己范围内的事情，是苏联的内政。这一点我请您向总统、美国政府和所有与此有关的人讲清楚。

最好把我们的关系纳入现实的轨道。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路线。如果美国也能坚持这样的路线，我们就能乐观地展望未来。

最后我请您向卡特总统转达我最良好的祝愿。勃列日涅夫向卡特总统的问候昨天我已向您转告了。

万斯：卡特总统也委托我向勃列日涅夫和您转达他最美好的祝愿。勃列日涅夫和您的问候当然我一定愉快地向总统转达。

№06129

**加列诺维奇就有关戴维营会谈  
同埃及代表的谈话给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报告**

(1978年10月10日)

苏共中央国际部：

兹将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 АН.А. 葛罗米柯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临时代办舍尔巴伊的谈话纪要作为通报给你们送去。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  
语文科学副博士 Ю.М. 加列诺维奇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 АН.А. 葛罗米柯  
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苏联临时代办  
舍尔巴伊先生的谈话纪要**

1978年10月5日应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苏联临时代办的要求我接见了。参加谈话的还有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顾问 М. 基瓦尼先生和非洲研究所阿拉伯国家研究室主任 В.С. 科宾。谈话的内容是戴维营三次会谈后的近东形势问题。舍尔巴伊根据文稿谈了自己的看法。

舍尔巴伊竭力为戴维营会谈结果和埃及政府的方针辩护，理由如下。

1. 由于近东冲突具有国际意义，因此要用世界手段，而不是用局部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为此埃及近来用新的办法对待解决近东问题。表现之一是萨达特的倡议，最后签订了众所周知的协议。据交谈者的看法，苏联对此问题也须用新的办法，否则以色列就会利用戴维营的成果。

2. 舍尔巴伊说，我们认为苏联和埃及一样希望和平，但由于不了解埃及的新政策，苏联否定了戴维营的成果，支持对立的强硬阵线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对待近东问题的办法是不成熟的。

3. 埃及人继续说，在戴维营萨达特总统捍卫了全体阿拉伯人的利益，因此苏联否定戴维营成果的态度客观上帮助了以色列。据交谈者的看法，苏联应结束消极观望，积极参与解决中东冲突。

4. 据舍尔巴伊的看法，埃及现在的立场是正确的，许多国家认为埃及现在的立场是从实际出发的，而苏联支持的强硬阵线国家的立场大大削弱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立场。他指出，我们希望这些国家能更好地理解埃及新方针的实质，最终能和我们站在一起。

我向对方指出，苏联对戴维营成果的立场是明确的，在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巴库的讲话中有清楚的阐述。我们承认，近东冲突与国际危险有最直接的关系。而戴维营决定与冲突的根本原因无关。从本质上看决定是鼓励了以色列的侵略政策。

苏联对戴维营结果的看法决不是不理解埃及的立场，而是根据多年来埃及也同意的正义的原则。

我特别指出，戴维营协议完全忽略了近东冲突的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而这一点连以色列总理贝京在戴维营会议后的声明中也确认无疑。众所周知，他说，特拉维夫永远不会同意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耶路撒冷将永远是以色列的首都，以色列永远不会退到1967年边界。接着在谈话过程中我强调，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不把侵略者占领的全部土地退还给阿拉伯国家，就根本不可能解决近东问题。

我指出，这就是苏联学者经过客观分析并考虑到包括埃及人民在内的近东各族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的坚定不移的意见。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 А.А. 葛罗米柯

№06144

## 安德罗波夫关于美国情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9年2月15日)

绝密

苏共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式访问以及两国领导人进行定期会晤，按白宫评价，可以扩大中美两国在政治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与此同时美国的政治观察家注意到，围绕邓小平访问在美国掀起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逐渐消失，而在行政当局初期的愉悦和激动的感情均已过去。正如驻华盛顿的西方国家外交界所强调的那样，白宫现在必须严肃地考虑一些问题：由于这次访问美国赢得了什么？中国获得了什么？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过高？在一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美国大使的报告中指出，看来卡特过高估计俄国人对达成有关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兴趣，他过分玩弄“中国牌可能迫使苏联掀翻牌桌”。

美国国会里指出，中国政治的不稳定性及其经济的弱点不能构成“对发展中美关系方面持乐观主义的足够牢固的基础”。有些参议员表示担心，美国行政当局赞同北京的口头声明及其侵略意图，可能对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产生消极影响，使这些国家加强反美情绪。

由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国际财务分会主席斯帝文森提交国会审议的同社会主义国家贸易法案，按美国实业界评价，首先旨在为

发展美中贸易创造条件。值得特殊注意的是，尽管在法案中也提出审议简化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提供最惠国待遇和进出口银行贷款手续，但在法案中仍保留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自由移民政策”的要求。该要求，用美苏工商委员会会长福雷斯特的话说，完全可以让中国人满意，因为他们在移民问题上持“灵活的立场”。正如福雷斯特所强调的那样，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曾宣布，“中国领导人准备容许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民，数量不限”。

与此同时，在国会有一种意见：斯蒂文森在推行自己的法案中遇到主要来自卡特政府方面的某些困难，卡特认为他的倡议“为时尚早”。

伊朗巴赫蒂亚尔政府的垮台，（美国）国务院认为是对美国地区政策的严重打击。卡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同霍梅尼周围建立更加密切的接触，减少该国反美情绪的尖锐性，企图缓解伊朗危机的后果。按华盛顿政界的评价，正是在这方面应该审议卡特做出的，在2月12日新闻发布会的声明，即政府“支持同那些控制伊朗政府的人接触，并准备同这些人合作。”正如国务院所认为的那样，由于伊朗军队对霍梅尼任命的巴扎尔甘政府的行动保持中立，白宫看来不得不正式承认它。

与此同时，美国急剧减少在伊朗的美国公民人数，并满足伊朗方面关于废除军事供给协议的要求。

白宫里已经开始准备1980年的总统选举。

总统助理乔丹被任命为研制卡特竞选战略的负责人。今年春天即将从美国总统贸易谈判党代表职位上退下来，并完全从事选举活动的斯特劳施将把竞选活动全过程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及“卡特连选连任全国委员会”协调起来。白宫新闻秘书帕韦尔和总统顾问柯尔伯将像1976年那样起积极作用。

尤·安德罗波夫（签字）

№06147

## 苏共中央关于保障维也纳高级会晤的宣传措施

(1979年5月29日)

为了在宣传方面保障维也纳高级会晤，巩固其积极成果，并且在会晤过程中以及在准备批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期间广泛影响公众舆论，特此采取如下措施：

1. 委托《真理报》编辑部与苏共中央对外宣传部和苏联外交部协商准备一篇编辑部文章，在关于苏美关系的维也纳会晤前夕正式发表。该文章应强调苏联对解决诸如国际缓和，限制军备竞赛，经济贸易合作的正常化与发展等苏美双边和国际问题的原则路线。

2. 认为在维也纳会晤结束后由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对苏联和外国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是适宜的。

3. 认为在维也纳谈判过程中定期与美国代表团代表联合或单独对外国新闻界代表举行新闻发布会是适宜的，会上可以就讨论的问题，阐述苏联的观点。

4. 在《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上发表将要签署的限制战略武器第2号文件。

5. 允许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在征得美国国务卿万斯同意的情况下，在维也纳会晤结束或在会晤过程中对其采访。

6. 认为在限制战略武器第2号文件签署之后，由一位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在苏联电视上发表讲话，解释该文件的意义——限制军备竞赛道路上的重要步骤——是适宜的。

7. 为了报道维也纳会晤，派遣苏联记者组前往维也纳，小组

成员委托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宣传部和苏共中央宣传部确定。

规定在派遣的记者中至少包括 5 位著名的苏联记者，以便同报道这次会晤的美国记者工作。

8. 苏联大众传媒工具必须围绕限制战略武器 2 号协议进行宣传以保持舆论的平衡，具体论证，指出该条约对缓和紧张局势，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改善苏美关系的积极意义。必须对反对签署和批准该条约人的立场进行批判。

9. 委托苏共中央有关各部和苏联外交部在会晤结束后准备提出与维也纳高级会晤成果和缔结限制战略武器 2 号条约有联系的进一步措施的建议。

10. 请政治局审批。

中央书记

送政治局：

1.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2 页

2. 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宣传部（扎米亚京同志）和苏联外交部（科尔尼延科同志）№14641 号便函，1 页

合计，3 页

菲尔萨诺娃（签字）

1979 年 5 月 30 日



№06139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美国 在波斯湾地区侵略行径的会议记录

(1980年3月13日)

绝密

第 П187 / 55 号文件

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鲁萨科夫、齐米亚宁、洛谢夫、托尔库诺夫、拉宾、阿法纳西耶夫、阿列克谢耶夫、西巴耶夫、帕斯图霍夫、阿克谢诺夫、费多罗夫、伊勃拉基莫夫、克鲁格洛沃伊、尼科拉耶沃伊—捷列什科沃伊、扎米亚京、季亚热尼科夫

摘自1980年3月1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第187次会议记录

关于使反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侵略行径的国际社会舆论活跃起来的措施

1. 批准给驻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苏联大使的指示文本（附件1）。

2. 同意使反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侵略行径的国际社会舆论活跃起来的措施计划（附件2）。

3. 塔斯社、新闻社、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台、中央各报编辑部

要继续宣传苏联对波斯湾地区问题的政策和反对美国在该地区侵略行径的国际社会舆论。

中央书记

第 187 / 55 号文件附件 1

机密

亚丁

苏联大使

同 A.Φ. 伊斯迈尔会晤，根据委托讲以下问题。

众所周知，美国在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地区集结了大批海军。美国人并不隐瞒，他们想向革命的伊朗和阿拉伯国家施加军事压力，在该地区确立自己的军事经济统治。为达此目的，他们想在这里拼凑新的军事集团，物色军事基地，建立所谓“快速反应部队”，进行征战并占领具有经济军事战略意义的地区。

这样，美国统治集团想恢复殖民主义时代的掠夺，践踏各族人民的民族权利、主权和独立自主。这一方针更加剧了近东的局势，因为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继续侵略阿拉伯国家，这里的局势本来就非常危险的。

我们认为，在这种局势下最好采取措施，开展广泛的国际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在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地区的侵略方针。这一地区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步的党和组织的统一舆论可作为运动的开端，要求从该地区撤出美国军队，停止帝国主义阴谋。这一运动无疑会有助于揭露、粉碎帝国主义在近东和中东的罪恶阴谋。

我们认为，也门社会主义党可担当组织该地区进步力量共同舆论的倡议者。

用电报告知 A.Φ. 伊斯迈尔的答复。

第 187 / 55 号文件附件 2

机密

使反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侵略行径的国际社会舆论活跃起来的措施计划

1. 苏共中央国际部召开苏联社会组织领导人会议，提出苏联代表在国际民主组织领导机关的方针，目的是使外国爱好和平，反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侵略行径的舆论活跃起来，以及更好地协调这些舆论。

2.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苏联青年组织委员会、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苏联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联系协会联合会、苏联妇女联合会都就这一切问题发表声明。

向波斯湾和毗邻地区各国以及西方有关国家友好组织揭露美国在波斯湾地区行径的危险性，宣传苏联的总政策、特别是在该地区政策的和平目的。

3. 苏联亚非国家团委员会和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研究今年能否按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和世界和平理事会路线，召开波斯湾地区人民团结和反帝的非常国际代表会议。

4.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协助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印度和平团结组织，筹备和召开亚洲和平安全国际代表会议（德里市，今年3月23～25日），这次会议可能成为抗议运动的实际开端。要采取必要措施增加波斯湾和毗邻地区各国参加会议代表的人数。

5. 苏联有关组织和主管部门要利用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提出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侵略行径问题，并尽可能争取通过有关这一问题的文件，如：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石油工业工会国际代表会议（的黎波里市，今年3月24～30日），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在地中海

召开的反对军事基地、拥护安全和合作国际代表会议（马尔他，今年3月28~30日），巴勒斯坦农民团结国际代表会议（巴格达市，今年3月30日至4月2日），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国家妇女组织国际研讨会（也门，今年4月），工会世界联合会委员会例会（科托努<sup>①</sup>，今年4月16~17日），阿拉伯大学生联合会代表会议（的黎波里市，今年4月），亚非国家团结组织召集的纪念万隆会议25周年的国际会晤（科伦坡市，今年4月18~24日），阿拉伯青年联合会组织的巴勒斯坦黎巴嫩青年团国际代表会议（黎巴嫩今年4月），亚非国家团结组织主席团例会，等等。

---

<sup>①</sup> 科托努，非洲贝宁湾贝宁的港口城市。

№06028

##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在西欧生产和 部署美式新型导弹补充措施给政治局的报告

(不晚于1980年4月15日)

第206号

1. 基本同意关于发动社会舆论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在西欧地区生产和部署美式新型导弹的补充措施。

苏联各社会团体应充分利用同西欧各国有计划的联系与贸易往来,以及苏联驻这些国家大使馆提出的一些补充建议,使开展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国主义计划运动在该集团领导机关举行春季例会(今年5~6月份)之前能逐渐开展起来,并取得更大的效果。

2. 批准发给国际民主机构中苏联代表的指示文件。

3. 塔斯社、新闻社、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各中央报刊杂志编辑部应加强对作为国际局势紧张主要原因之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在美国压力之下通过的布鲁塞尔会议决议给予有理有据的抨击,宣传苏联关于缩减欧洲中程导弹及削减地面武器装备,从而根本缓和各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建议,阐明苏联社会人士和国外爱好和平力量支持这些建议的舆论。

4. 鉴于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拥护和平和裁军会晤将在巴黎举行,在同各兄弟党代表进行工作协商会议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部门应向这些代表通报关于发动社会舆论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在西欧地区生产和部署美式新型导弹的计划措施

情况。

5. 呈交政治局批准。

中央委员会书记

送交政治局：

1.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2 页
  2. 发动社会舆论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在西欧地区生产和部署美式新型导弹的补充措施计划（附件 1），3 页
  3. 发给各国际民主机构中苏联代表的指示文件（附件 2<sup>①</sup>），3 页
  4. 外交、宣传各部门和国际部的报告（扎米亚京，扎格拉金等同志）第 10766 号，2 页
- 总计 10 页

比列亚诺夫（签字）<sup>②</sup>

1980 年 4 月 15 日

---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上述两个附件。

② 在另一份同样内容的档案文献中，有书记处对此问题的表决记录：

表决结果

1980 年 4 月 15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

中央书记苏斯洛夫	同意
戈尔巴乔夫	同意
波诺马廖夫	同意
卡皮托诺夫	同意
多尔基赫	同意
齐米亚宁	同意

№06097

苏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反对美中军事合作的会议记录  
(1980年10月2日)

绝密

№П217 / 57

呈送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苏斯洛夫、吉洪诺夫、乌斯季诺夫、波诺马廖夫、鲁萨科夫、扎米亚京、斯米尔秋科夫等同志。

苏共中央政治局1980年10月2日第217号会议记录摘录  
关于开展补充工作以便反对美国—中国的军事合作。

批准给苏联的大使们和苏联的代表们的指示方案（见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 件

机密

给全体苏联大使和苏联代表

目前，美帝国主义和北京霸权主义所形成的伙伴关系作为在世界政治中的一种新的不良现象，一种对全人类最危险的事物，正在军事领域中愈来愈活跃地地扩展起来。华盛顿考虑到在自己的战略

利益中，“强大的和稳定的”中国可加以利用，所以在军事技术领域里扩大有效协助中国的规模。特别得到证实的是，美国当局同意向中国提供美国的现代化设备和技术工艺，这些都能够广泛用于军事目的。

随着美中军事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在国际关系中的破坏因素增多起来。

根据你们早些时候收到的指示并考虑所在国家的特点，请继续揭露西方侵略集团，首先是美国同中国领导集团密切亲近的危险性，但要注意下述情况：

1. 在发展和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同时，美国的统治集团认为用“有利的”前景是能够影响中国的，使其在政治上纳入他们可接受的轨道。中国领导人从不反对趋附迎合诸如此类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治活动在国际舞台上经常是一种“安定的”因素。因此，在这种目的驱使下，他们既不丢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论调，又开始利用更加灵活的华丽词藻。然而，借助于假惺惺的“热爱和平”，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具有更大“威望”的同时，北京认为只有赢得时间是才能实现加速国家的武装化。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却经常采取强权政策，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承担不可容忍的“教授经验教训”功能，用武器的威力“惩罚”不顺从者。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从前一样在逃避承担某些有关裁军方面的国际法义务，企图降低在这一领域里取得一些成绩的意义，拒绝参与采取措施限制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北京开始生产和试验能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开展创建中子武器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世界的军备竞赛并直接同缓和紧张局势的利益相抵触。北京的这种路线无论对美国或日本都带来严重的威胁。

3. 毫无根据的理由是，有人认为，北京宣布的所谓“现代化



纲要”似乎是中国要摆脱经济落后的一种新政治方针。事实上这一方针首先是希望促进实现历来要加快把中国变成军事“超强国家”的计划，而解决最尖锐的提高中国人民过低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问题又推迟到不确定的未来。在中国无人掩盖，“现代化”是准备战争的最好方法。在实践中不可遏止的军国主义化促使中国本身经济下滑，不安定因素增长。因此，那些积极参与中国“现代化”规划的国家，实际上帮助的只是在扩大它的军事潜力，而对中国人民本身来说，都是帮倒忙。

另一方面，国家军国主义化的方针不可避免地会引起预测不到的变化和曲折，进一步表现出对外政策的冒险主义，造成国际局势的危机和不稳定，使国际形势更加紧张起来。任何的介入，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促进中国的军国主义化，特别是美国的援助扩大了中国的军事潜力，致使中国为实现其自己的霸权主义阴谋获得了必不可少的强大打击力量。在这样的条件下，北京不仅仅会抗拒所有巩固和平和缓和的积极建议，而且还会直接挑起国际争端，这就意味着产生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在增加，对全人类、包括对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威胁在扩大。

借口打算提供给中国的军事装备和技术“不是杀伤性的”而是“防御性的”，“有双向用途的”等等，都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诸如此类的分类法十分空洞，而在于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能使其腾出力量和资金去扩大主要强大的打击力量——核导弹潜力。

4. 北京很早就提出了改变全世界力量对比关系和当前国际关系整个结构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从而引起人们严重的不安。提供给中国某种军事技术或者装备，这是破坏已形成的世界军事战略平衡和军备竞赛新阶段的一个步骤。军事力量平衡遭到破坏就动摇了关于限制战略军备谈判的基础本身，因为，苏联和美国商定遵循

的主要原则是在保证国家安全上平衡的原则。

至于说到苏联，那么它拥有保卫自己利益的一切条件，并能打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图谋不轨的念头。有人企图把美中关系看成是利用中国作为对苏联施加压力和搞军事平衡的一种手段，这些人的念头是鼠目寸光。有人希望把中国的扩张转向北方，这是在冒最大失算的危险。鼓励扩大中国的军事潜力会加大把某些国家纳入到北京政策轨道的危险，而今后会造成这样的局势，即这些国家本身就要成为中国扩张政策的牺牲品。因此，站在现实的立场上应该承认，“强大的”中国将为自己的扩张政策选定另一种方针：尽快开使吞食邻国，占领对全世界来说非常重要的地区，而绝不会成为美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手里的工具。

5. 发展中国和美国之间军事政治合作引起许多国家的惊慌不安，已使国际局势明显地恶化起来，寻求巩固世界各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现实途径更复杂起来。北京领导人指望各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唆使一些国家去反对另一些国家，挑拨军事冲突，希望以此为实现其霸权主义计划创建有利的基础。北京并不掩盖自己让苏联和美国在热核战争中冲突起来的目的，因为它企望在热核战争竞赛中获得世界霸权。

那些坚持必须要“加强”中国的人，其依据是，北京正陷于同苏联的对抗和同亚洲的争端之中，因此，对西方不会有危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停下来，任何人都不能担保再经过5~10年北京不开始打出反美和反日的一张牌，以及不利用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去反对那些曾不负责任地纵容过和帮助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新武器装备的国家。

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的扩张程度直接与中国军队武装力量的强大成正比。现在与中国相邻的，首先是中国领导人认为是属于自己传统影响范围的那一些东南亚国家，它们已经亲身体会到直接的威

胁。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当美国及其盟友们帮助中国得到更现代化的武器时，中国对自己的邻邦会采取什么举动。中国想办法首先把东南亚国家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然后，进军到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沿岸。

在此种条件下，企图闭上眼睛不看中国政策上的危险倾向而竭力袖手旁观，这样做只能鼓励中国进行新的冒险和加强扩张政策。反之，亚洲国家的共同努力就能够阻止中国走上扩大军事势力——首先是针对这一地区的国家的——的道路。

（仅仅供德里的大使用。美国纵容和直接支持中国的战备活动不能不同印度的利益相抵触。虽然中国领导人同印度就关系正常化问题正在进行谈判，而在中国战略家们的武器库里仍然是整套给这一国家施加压力的方式方法。在美国和中国的一些计划里还有让巴基斯坦发挥比从前更为重要的给印度施加压力的杠杆作用，以及美国与中国在西南亚进行侵略活动的根据地的作用。在同美国的合作中，北京将大量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往邻邦印度，并在扩大军事狂热气氛的帮助下试图在政权里保持像目前巴基斯坦推行的那种不得人心的体制。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正在加速战备，修建导弹基地和通往西藏的战略公路，积极支持印度东北地区分立主义分子的活动，实际上是在进行针对该国的“没有宣布的战争”）。

毫无疑问的是，随着自己军事工业潜力的加强，中国采取的方向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宣布要觊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邻国领土的野心。这就不仅使亚洲的形势严重地动荡起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威胁到其他地区。

在业已形成的条件下，苏联不能不做出相应的结论。我们不仅要用心观察美国和中国在军事领域里合作趋向的发展，而且还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巩固我们边界地区的安全。我们决不允许军事战略平衡朝着有利于反和平事业力量的方向变化。

(仅供柏林、布达佩斯、华沙、布拉格、索非亚、乌兰巴托、哈瓦那、河内，万象、金边、喀布尔的大使用。请将下达给苏联大使的指示——为社会主义、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业而开展抵制因美中军事和政治同盟建立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的工作，通报所在国的外交部，请向交谈者介绍上述指示的内容)。

请同驻古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老挝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馆(代表处)协调一致后开展自己的工作。

必须认真观察在实施扩大美中军事合作计划上的一切对外政治步骤，定期地在业务上将情况汇报给中央，同时对我们利益趋向不利的中立化应提出相应的建议。

## 【专题说明】

# 苏联与尼加拉瓜的关系

(1978年2月至1980年9月)

尼加拉瓜位于中美洲中部，东临加勒比海，西涉太平洋，战略地位重要，是美国的“后院”。1926年，美国借口保护其利益，出兵尼加拉瓜。奥古斯托·桑地诺领导了反对美国占领军的游击战争，终于在1933年迫使美国撤回尼加拉瓜的占领军。桑地诺被尼加拉瓜人民尊为民族英雄。1934年，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塔乔暗杀了桑地诺，建立了亲美的政权。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是卡洛斯·丰塞卡·阿马多尔领导，于1958年成立的，坚持以武装斗争来推翻索摩查·塔乔的家族独裁政权。1976年索摩查·德瓦伊莱当选总统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仍然坚持武装斗争。

本专题收入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与尼加拉瓜关系的14份文件表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积极发展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联系，不断加大对其反政府的力度，这显然是出于苏美对抗的要求。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许洪声、张寰海、侯育成、王鹏翻译)

№06017

## 费佳宁同瓜达穆斯的谈话纪要

(1978年2月23日)

在大使馆的领事处会见了瓜达穆斯<sup>①</sup>。会谈时涉及到某些尼加拉瓜内政问题。

介绍了如下令人感兴趣的情况：

尼加拉瓜的政权形式上是在国民自由党（ЛНП）手中，它代表的是索摩查家族独裁的利益。参加政权集团的同时还有一个传统保守党。

民主解放联盟（ДЛСО）反对独裁，它联合了七个政党和两个工会中心——劳工总联盟（独立的）和尼加拉瓜工人中心（宗教民主主义的）。1974年建立的民主解放联盟是一个成分复杂，政治上临时联合组织，其中可以分出三个基本的政治派别：左派进步力量，包括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НСП）和劳工总联盟（BKT）；右派势力，包括立宪主义运动、民族动员和民族保守运动——代表美国垄断组织和大民族资产利益的一些党的联盟；各种小资产阶级派别集团——有自由独立党、民族戒备运动、尼加拉瓜劳动者工会中心和社会宗教党。

1961年创建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up>②</sup>在积极反对索摩查的独裁统治。它是在脱离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年青的派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不止一次地改变自己的政治色彩，但

① 卡洛斯·瓜达穆斯，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驻古巴代表。

② 原文如此。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于1958年。

是，却没有改变其武装斗争的工作方法。目前，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又分成三个主要派别：以海梅·维洛克为首的“理智派”，以奥特加尔兄弟为首的“调解派”和著名政治活动家亨利·鲁伊斯领导的“人民持久战争”的追随者的。这三个派别之间正在为争夺阵线的领袖地位而展开斗争。最大、最有势力的派别是调解派，因为，该派得到来自民族资产阶级年青代表们提供的巨额财政支持。他们的“立脚点”主要是在城市。“人民持久战争”追随者这一派在山区和农村活动，得到国内农村居民的支持。桑地诺分子这一派的代表都住在古巴。

1977年10月尼加拉瓜国内的政治形势急剧紧张起来。“理智派”以全体阵线的名义加强了反对独裁专制的武装斗争。可是，由于他们的活动，却使所有的左派先进势力，其中包括桑地诺分子的其他两个派别的名声都受到损害。因为，他们对“理智派”开始发动的武装行动都不清楚。索摩查利用桑地诺分子发动的武装行动给左派势力施加压力，然后从政治舞台上再除掉自己的对手。这就像对待霍阿金、恰莫拉独裁统治的著名敌手那样，于今年1月13日被处死。

实际上，政府已失去对国内政治形势的控制。与此同时，反对派势力离群索居，所以，也就没有夺取政权的现实可能条件。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是在已形成的局势下同意同专制政府进行“对话”，以便能强迫政府让步。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要求对所有的政治犯实行大赦，给各党派和工会组织活动自由，取消新闻检查，委任非党活动家作武装力量的司令官，侦查和惩治在枪杀进步农民和工人领导人事件中的罪人。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关于同索摩查“对话”的建议得到天主教会进步派别的支持。持反对态度的是桑地诺分子和以胡利奥·布里先奥为首、1976年11月同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脱离关系的集团。

当涉及到今年1~2月发生的全国总罢工时，瓜达穆斯指出，罢工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劳动人民的行动没有统一领导。加入民主解放联盟的资产阶级各党派一开始支持罢工，但是后来在同美国有联系的势力压力之下却迎合索摩查政府的要求，实际上是背叛了反对党。这次全国大罢工证明尼加拉瓜人民要推翻独裁专制的愿望在日益高涨。索摩查体制的威信已丧失殆尽。政府变动，进行民主改革，都是不久将来的事，交谈者这样强调说。

反对党的一些政治界人士认为，建立民主的“过渡”政府才是摆脱国内复杂政治形势的出路。未来政府首脑宝座上有最大可能性的候选人名字叫拉米罗·萨卡萨·格雷罗，是立宪运动的领导人，他从1969年开始公开反对索摩查的独裁专制。

尼加拉瓜共产党在这样的条件下主张团结所有左派势力，以便能在国内真正地进行民主主义改革，瓜达穆斯这样说。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馆三等秘书 B. 费佳宁（签名）



№11843

## 叶甫谢耶夫同奥尔捷加的谈话纪要

(1978年4月27日)

摘自叶甫谢耶夫的日记

根据大使馆领导的委托，我接待了Д. 奥尔捷加<sup>①</sup>。在谈话时对方讲了尼加拉瓜最近的事件。他特别指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支持的人民群众积极协调的行动，索莫萨政权已完全孤立，国内已形成了推翻这一政权的良好形势。他继续说，但是现在尼加拉瓜没有能团结人民并领导人民推翻专政的资产阶级政党。

据对方的看法，卡特政府现在处境也很困难，它非常了解尼加拉瓜政局的复杂性。索摩查的代理人杀害了美国认为能领导尼加拉瓜政府的记者霍金·乔莫罗以后，除保留现政权外美国一筹莫展。与此同时，美国人还想寻找代替乔莫罗的人。这样的候选人之一可能是尼加拉瓜实业界代表、年轻的工程师阿利风索·罗别洛。罗别洛领导着一个联合资产阶级反对派、主张救国、主张反索摩查的各派力量一致行动的民主运动组织。

据奥尔捷加说，另一个政治团体，即民主民族解放联盟，也主张推翻索摩查王朝<sup>②</sup>。只是乔莫罗死后这个团体还没有领导人。

① 奥尔捷加，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

② 尼加拉瓜没有建立过王朝统治，这里是指索摩查的家族统治。1821年，尼加拉瓜脱离西班牙，成为中美洲联邦成员。1839年建立共和国。1934年，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总司令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塔乔暗杀了桑地诺，并于1937年出任总统。1967年2月6日，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当选总统。被称为索摩查“家族政体”。

交谈者认为，第三个政治团体，即尼加拉瓜最积极的政治军事力量，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据对方说，它同尼加拉瓜共产党人建立了良好关系。

奥尔捷加说，这三个政治团体保持着联系，根据最低的共同纲领协调行动。最低共同纲领规定：推翻索摩查专政，在尼加拉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解散民族近卫军，建立新的军队；属于索摩查家族的一切资源（土地、银行、工业、贸易及其他企业）收归国有；保留没有因同索摩查的联系而臭名昭著的人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换言之，在尼加拉瓜进行人民民主（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革命制度下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共存，包括剥削阶级的私有制在内。

奥尔捷加指出，尼加拉瓜人民的斗争得到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巴拿马及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委内瑞拉政府给予我们巨大的物质和道义的援助。桑地诺阵线认为，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给予尼加拉瓜人民的支持给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势力造成一定困难。与此同时桑地诺阵线正采取措施巩固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争取得到他们的物质和道义支持。他继续说，特别是在决定尼加拉瓜革命命运的现在，当阵线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工作，在城市和矿区开始组建人民军队，从而需要大批经费的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和支持对我们来说就更为需要。

奥尔捷加代表阵线领导对苏联人民向尼加拉瓜劳动人民的斗争所表示的同情表示感谢；并指出，他们将更感激社会主义国家对他们的斗争给予的可能支持。

我对奥尔捷加说，一定将谈话内容报告大使馆领导。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工作人员马努艾利·麦基纳参加了谈话。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馆一秘 Ф.叶甫谢耶夫

№ 11844

## 费奥多罗夫为组团参加声援 尼加拉瓜国际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9年6月26日)

机密

苏共中央：

### 关于声援尼加拉瓜人民斗争的国际会议

根据尼加拉瓜爱国力量代表的请求，世界和平理事会倡议召开声援尼加拉瓜人民斗争国际会议。由于业已完成的筹备工作的结果，达成关于在今年7月13~15日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举行会议的协议。

预计会议将有200多位各民族和平运动拥护者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尼加拉瓜爱国组织代表团也将参加会议。

会议的筹备引起了拉丁美洲民主公众各界的广泛关注。委内瑞拉成立了得到执政党某些支持的全国筹备委员会。从总体上为把本次声援会议变成在反帝基础上促进大陆民主力量加强团结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创造了条件。

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罗米希·蔡德拉呼吁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委员会为举行会议给予组织上和财务上的支援。特别是世界和平理事会领导人请求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保

证会议上的同步翻译，并对运送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部分代表给予支援。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注意到成功举行声援尼加拉瓜人民斗争国际会议具有政治意义，因此认为今年7月11日派遣苏联公众代表团去加拉加斯参加为期7天（考虑到民航飞机班次）的会议是适宜的，代表团成员如下：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德罗维奇·杜金——诗人，列宁格勒州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代表团团长），

奥列格·康斯坦丁诺维奇·伊格纳捷夫——《真理报》观察家，恩里·格奥尔吉耶维奇·皮利亚——苏联声援智利民主人士委员会责任书记。

派遣上述同志的问题已分别征得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罗曼诺夫同志）和《真理报》主编阿法纳希耶夫同志的同意。

我们认为满足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请求并派遣9名同步翻译人员到加拉加斯（其支出由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1979年度费用核销），也是适宜的。

考虑到目前采取的这一行动在1979年度苏联社会团体同资本主义和解放了的国家联络计划中没有规定，故我们认为应尽可能帮助世界和平理事会部分代表团团员过境。有鉴于此，我们请求委托苏联民用航空部保证用民航飞机将持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证明的3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会议参加者途经莫斯科返回祖国，其费用由苏联和平基金会以卢布支付。此外我们请求委托苏联民用航空部保证往返运送60名会议参加者由莫斯科到加拉加斯，其飞机票以卢布支付。该问题已征得苏联和平基金会（尼科诺夫同志）同意。

会议结束以后，以蔡德拉为首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应玻利维亚总统的邀请将访问该国。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团将会见知名的

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声援尼加拉瓜人民斗争的群众行动。

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请苏联派 1 名加拉加斯会议代表加入该代表团。

我们认为皮利亚同志可以参加该团，并允许他从加拉加斯去拉巴斯，在玻利维亚逗留 5 天。

苏联公众代表团访问的费用可以从 1979 年度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预算中支付。

附上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请审批。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 费奥多罗夫（签字）

附 件

草案

机密

### 苏共中央关于同意组团参加声援 尼加拉瓜人民斗争国际会议的决议

1. 允许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于今年 7 月派遣苏联公众代表团赴委内瑞拉，为期 7 天，代表团由 M.A. 杜金、O.K. 伊格纳捷夫和 Э.Г. 皮利亚同志组成，另有 9 名同声翻译人员。允许皮利亚同志由委内瑞拉去玻利维亚，为期 5 天。

2. 苏联民用航空部负责用民航飞机，按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证明，将 30 名亚非国家的会议代表运抵莫斯科并送回祖国，并保证 60 名外国与会者往返运送由莫斯科到加拉加斯，飞机票以卢布

支付。

3. 派遣苏联代表和翻译人员的费用由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核稍。外国与会者往返莫斯科的路费和过境逗留费用由苏联和平基金会核销。

4. 要保证塔斯社、新闻社、国家广播电影电视委员会和《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共青团真理报》等中央报纸编辑部，以及《新时代》杂志社和《莫斯科新闻》编辑部及时报道会议的过程和工作总结。

No 11845

## 布鲁坚茨关于同意组团参加尼加拉瓜 国际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9年7月2日)

机密

苏共中央：

关于参加筹备和举行国际声援尼加拉瓜人民斗争会议

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倡议，今年7月13~15日将在加拉加斯市（委内瑞拉）举行国际声援尼加拉瓜人民斗争会议，将有200多名各大洲、各民族和平运动拥护者、一系列国际组织的代表，其中包括尼加拉瓜爱国组织代表团，参加会议。该倡议得到拉丁美洲民主社会各界、乃至委内瑞拉执政党的广泛支持，这为使本次会议变为促进大陆反帝力量团结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创造了前提条件。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提议派遣由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诗人、列宁格勒州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杜金同志（代表团团长）、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库林同志、《真理报》评论员伊格纳捷夫同志、苏联声援智利民主人士委员会责任书记皮利亚组成的苏联社会人士代表团，参加为期7天的会议。

同时委员会请求允许满足世界和平理事会领导人关于（苏联）部分参加举行会议的组织 and 物质保障的请求，为此必须派遣由9人组成的同声翻译小组，并保证用民航飞机接送30名有关国家参加会议的代表到莫斯科和回国，并负责用飞机运送60名外国代表往



返莫斯科—加拉加斯，用苏联卢布支付费用。

派遣苏联代表的费用由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负责，外国代表的路费及过境逗留的费用由苏联和平基金会负责（与尼科诺夫同志协调）。

苏共中央国际部支持上述建议。

附苏共中央决议草案<sup>①</sup>

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 K. 布鲁坚茨（签字）

1979年7月2日

###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证

姓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杜金

派出单位：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派往何国：委内瑞拉

期限：7天

身份：代表团团长

出生时间：1916年11月20日

出生地：伊万诺沃州谢列茨克区克列夫涅沃村

民族：俄罗斯

文化程度：大学

职业：诗人

党证号码：10246604

是否出过国：1978年——葡萄牙，1979年——芬兰

从前是否加入过苏共：否

---

<sup>①</sup> 参见文件№11844附件。

掌握何种语言：无

是否受过党内处分：否

婚否：已婚

是否受过律制裁：否

受过何种奖励：一枚列宁勋章、一枚二级卫国战争勋章、一枚劳动红旗勋章和三枚奖章

###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工作简历

1930~1934年——伊万诺沃纺织厂织布学徒工；

1934~1939年——伊万诺沃市《时刻准备报》、《列宁主义者报》、《工人区报》文学编辑；

1939~1941年——红军战士、红军作家（冈古特市汉科半岛）；

1941~1942年——喀琅施塔得市《火力盾牌报》编辑；

1942~1942年——23军军报《胜利旗帜报》作家；

1942~1945年——列宁格勒市前线《保卫祖国报》作家；

1942年至今——苏联作家协会会员

住址：列宁格勒市瓦西里耶夫兄弟街8号11室，住宅电话：  
33-26-27

### 直系亲属资料

妻子——伊里娜·瓦古拉耶夫芙娜·塔尔萨诺娃，1920年生于莫斯科州奥金措沃车站，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电影剧本编辑组成员。

住址：列宁格勒市瓦西里耶夫兄弟街8号11室。

父亲——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杜金，1890年生于伊万诺沃州谢列茨克县克列夫涅沃村。1950年在伊万诺沃市逝世。

母亲——叶莲娜·瓦西里耶芙娜·杜金娜，1883年生于弗拉基米尔省舒伊斯基县科热夫尼科沃村。1929年在伊万诺沃州谢列茨克区克列夫涅沃村逝世。

妹妹——法伊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博加乔娃，1920年生于伊万诺沃州谢列茨克区克列夫涅沃村。

住址：波尔塔瓦市

弟弟（同父异母）——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杜金，1936年生，第五汽车场司机。

住址：伊万诺沃市纬纱街73号80室。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阿·柳利亚耶夫（签字）

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 奥列尔（签字）

1979年6月28日

## 证 件

姓名：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库林

职务：自1965年起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

出生年：1925年

出生地：萨哈林州亚历山德罗夫斯克

民族：俄罗斯

文化程度：大学

入党时间：1945年

党证号码：00001214

所学专业：西方各国国际问题

掌握何种外语：西班牙语

党内是否受过处分：无

是否受过政府嘉奖何种：1 枚二级卫国战争勋章、2 枚红军勋章、12 枚奖章

毕业学校（名称、时间）：1956 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苏联外交国际关系学院

出否出过国（何时何地）：

1944~1955 年——以苏军军人身份去过波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

1958~1963 年——驻阿根廷大使馆；

1967、1968、1970、1972、1974、1975、1977~1978 年去过墨西哥；

1970 年——法国、保加利亚；

1971 年——捷克斯洛伐克；

1972 年——智利；

1973 年——民主德国、阿根廷；

1974 年——哥斯达黎加；

1975 年——多米尼共和国、民主德国；

1978 年——民主德国；

1979 年——西班牙

是否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党中央、州委、边疆区委员：否

### 工作简历

1943~1943 年——沃罗涅日无线电专家学校学员（西伯利亚军区，新西伯利亚市）

1943~1943 年——莫斯科红军通信总局预备役部队后备通信营

1943~1943 年——第四坦克兵团 247 后备营（布良斯克市）

1943~1950 年——乌拉尔第 10 坦克志愿军第 62 近卫坦克旅，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驻德苏军。

1950~1956 年——莫斯科国立苏联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学员

1956~1957 年——莫斯科苏联外交部第 10 司试用人员

1957~1958 年——莫斯科苏联外交部领事局顾问

1958~1963 年——苏联驻阿根廷大使馆试用人员、武官

1963~1963 年——莫斯科苏联外交部拉丁美洲国家司三秘

1963~1963 年——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干部局二秘

1963~1965 年——苏共中央国际部初级顾问

1963 年至今——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

苏共中央国际部处长 库达奇金（签字）

## 证 件

姓名：奥列格·库斯坦丁诺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派出单位：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派往何国：季内瑞拉

期限：7 天

身份：代表团团员

出生地点：列宁格勒州普希金诺市

出生时间：1924 年 1 月 4 日

入党时间：1945 年

民族：俄罗斯

文化程度：大学

党证号码：00167309

所学专业：历史学 - 国际问题专家

早期是否曾加入苏共：否

党内是否受过处分：否

是否受过法律制裁：否

受过何种奖励：1枚荣誉章、2枚奖章

是否出过国：1978年——蒙古

掌握何种语言：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

家庭状况：已婚，2个孩子

### 工作简历

1941~1946年——在苏军服役；

1946~1951年——莫斯科国立苏联外交部国防关系学院学员；

1951~1954年——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文学编辑，  
国外部副主任；

1954~1957年——苏联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  
二秘；

1957~1959年——莫斯科苏联中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  
员会拉丁美洲国家司视察员；

1959~1962年——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编辑委员会委员  
和编辑部国际部编辑；

1962~1964年——新闻社和《共青团真理报》驻巴西里约热  
内卢记者；

1964年至今——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国际信息部评论员。

住址：莫斯科市伏龙芝河滨大待38号1单元215室

电话：253-30-96（办）；242-39-82（宅）

### 直系亲属资料

妻子——马尔克谢娜·米哈伊洛夫娜·伊格纳季耶娃（瓦谢娜）

1924年生于列宁格勒市，苏联外交部外交学院讲师

住址：莫斯科市伏龙芝河滨大街38号1单元215室。

父亲——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伊格纳季耶夫，1897年生于莫吉廖夫州博利齐市，死于1961年。

母亲——马里娅·纳乌莫芙娜·伊格纳季耶娃，1901年生于莫斯科市，1975年死于莫斯科市。

妹妹——兹拉达·康斯坦丁诺芙娜·伊格纳季耶娃，1931年生于莫斯科州兹韦尼哥罗德市，苏联科学院全苏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研究员。

住址：莫斯科市高尔基街21号37室

弟弟——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伊格纳季耶夫，1937年生于莫斯科市，苏联高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11司司长。

女儿——尤利娅·奥列戈芙娜·贡恰连科，1950年生于莫斯科市，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住址：莫斯科市伏龙芝河滨大街38号1单元215室。

女儿——叶利扎韦塔·奥列戈芙娜·伊格纳季耶娃，1955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国立莫斯科大学学生。

住址：同上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阿·柳利亚耶夫（签字）

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 奥列尔（签字）

1979年6月28日

## 证 件

姓名：恩利·格奥尔吉耶维奇·皮利亚

派出单位：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派往何国：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

期限：12 天

身份：代表团团员

出生日期：1938 年 3 月 10 日

出生地点：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

民族：格鲁吉亚

入党时间：1960 年

党证号码：00074979

文化程度：大学

早期是否曾加入苏共：否

是否受过党内处分：否

是否受过法律制裁：否

是否受过奖励：否

是否出过国：1979 年——民主德国、芬兰、委内瑞拉

掌握何种语言：西班牙语

家庭状况：已婚，有 1 女儿生于 1976 年

### 工作简历

1956~1959 年——位于泽斯塔福尼市的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地方工业部捷尔夫斯克码瓦厂管理员；

1959~1960 年——位于第比利斯市的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电机和仪表制造工业局“小电动机”厂学车工，后为定额员；

1960~1962 年——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五金化学工业局第比利斯轧铜厂车工；

1962~1967 年——莫斯科国立苏联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学生；

1967~1973 年——莫斯科列宁共青团中央高级团校翻译、系



主任、分校主任，该校特殊翻译；

1973年至今——莫斯科苏联声援智利民主人士委员会责任书记

住址：莫斯科市莫尔达古洛娃街12号1单元43室

#### 直系亲属资料

妻子——纳塔利娅·弗拉基米罗芙娜·皮利亚，1949年生于莫斯科州柳别列茨克区科捷尔尼卡镇，列宁共青团中央工作人员

住址：莫斯科市莫尔达古洛娃街12号1单元43室

父亲——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皮利亚，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社会保障部医生检查员

住址：第比利斯市瓦日·普沙韦尔大街第3街区3单元46室

母亲——奥莉加·伊拉克利耶芙娜·皮利亚，1918年生于泽斯塔福尼市，家庭妇女

住址：第比利斯市瓦日·普沙韦尔大街第3待区3单元46室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阿·柳利亚耶夫（签字）

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 奥列尔（签字）

1979年6月28日

№06146

## 苏共中央关于同意组团参加声援尼加拉瓜 人民斗争国际会议的决议

(1979年7月5日)

绝密

№Cr-166/31rc

### 中央书记处№166/rc 记录摘抄

#### 关于参加筹备和举行国际声援尼加拉瓜人民斗争会议

1. 允许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派遣由列宁格勒州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 M.A. 杜金同志 (团长)、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 K.H. 库林同志、《真理报》评论员 O.K. 伊格捷耶夫、苏联声援智利民主人士委员会责任书记 Э.Г. 皮利亚组成的苏联社会人士代表团, 于今年7月前往委内瑞拉参加为期7天的国际声援尼加拉瓜人民斗争会议。

2. 委托民用航空部根据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申请, 用民航飞机接送参加会议的30名亚非国家代表到莫斯科和回国, 同时负责用飞机运送60名外国代表往返莫斯科——加拉加斯, 用苏联卢布购买机票。

3. 派遣苏联代表的费用由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负责, 外国代表的路费及在莫斯科过境逗留的费用由苏联和平基金会负责。

4. 塔斯社、新闻社、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中央各机关报社和《新时代》杂志社及《莫斯科新闻》国外版，必须保证报道会议的过程和总结。

中央委员会书记

No 06100

## 马纳索夫同路易斯·莫杰斯托的谈话纪要

(1979年12月14日)

应路易斯·莫杰斯托<sup>①</sup>的请求我接见了 him。

路易斯对不久前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成果，以及同苏联同志的会晤、会谈表示非常满意。他说，我们想再一次对波诺马廖夫同志及其他苏联朋友的热情接待，对我们的问题的理解以及同我们发展全面关系的愿望表示衷心感谢。

在会谈过程中路易斯提到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集体关于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得到经济和财政援助的灵活政策。他强调说，只是在没有政治或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才接受这种援助。路易斯继续说，而且尼加拉瓜宣传媒体对这种援助故意不予报道，不加宣扬，对来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则非常重视。

路易斯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集体非常关心加强、扩大和具体落实同苏联的合作，首先是党务方面的合作。他说，最好有一个苏联共产党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合作计划。在计划中规定在苏联培养经济、计划、意识形态、党的建设、国家安全、教育、法理学等方面的尼加拉瓜干部的数额。路易斯指出，我们非常需要你们的顾问，在尼加拉瓜建立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方面给予实际的帮助。

他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集体拟制订1980年国有经济

---

<sup>①</sup> 盖里·路易斯·莫杰斯托，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集体执行委员会委员、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军事委员会主席。

发展计划，对管理机关进行一些结构改革，对政府的成员做一些调动。

他强调说，现在最主要的是保卫我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建立新的武装部队，因此需要武器。路易斯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同苏联国防部会谈过，现在想知道，对我们的请求有没有答复。

交谈者很关心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在莫斯科转交给勃列日涅夫同志的信的回信。

路易斯不止一次地强调派苏联高级代表团去尼加拉瓜访问的重要性，因为代表团可以就地了解尼加拉瓜的情况。

他对《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刊登的塔斯社关于尼加拉瓜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的先锋作用的报道，表示不太理解。而且他指出，在尼加拉瓜革命发展中的先锋力量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我请路易斯尽快答复关于确认苏联驻尼加拉瓜大使的要求。他说，他明天飞往马那瓜，向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集体汇报此事。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临时代办 M. 马纳索夫

No 11846

## 季马科夫同海麦·乌伊洛克的谈话纪要

(1980年1月11日)

摘自季马科夫的日记

我会见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海麦·乌伊洛克。

在谈话过程中乌伊洛克说，阵线领导高度评价同苏联的关系。他特别强调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从来没有以任何理由指摘过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他表示期望以后有成效地发展尼加拉瓜和苏联各方面的关系。接着乌伊洛克表示了坚定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因为它的政策是无原则的，不可靠的。

在谈到国内的政治形势时乌伊洛克指出，政权完全属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至于经济则大部分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乌伊洛克接着说，由于我们绝对完全控制着政权，我们一举就能剥夺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只是我们认为现在不合时宜。

交谈者认为，在现在条件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恢复经济，保证正常供应居民食品和日用品，建立自己的工业和有效的农业。而现在我们不得不出口棉花和木材，进口布匹和木制品。

接着乌伊洛克确认了尼加拉瓜其他领导人所说的话：国家生活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既有外部敌人，又有内部敌人。因此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执行政策非常谨慎，既要注意阵线内部的团结，又要注意全国的团结。

最后乌伊洛克说，尼加拉瓜不仅期望援助，而且期望经济合

作。据他说，国内有丰富的实际上根本未开采的自然资源（矿物、森林、鱼、肥沃的土壤）。

顾问 B.Б. 舒宾同志参加了谈话

苏联驻尼加拉瓜临时代办 A. 季马科夫

№06131

**苏共中央关于无偿援助桑地诺  
民族解放阵线的决定**

(1980年3月13日)

中央书记处第202号记录摘抄

关于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请求

同意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该问题的命令草案（见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第202号记录附件

机密

草案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无偿援助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物资的命令**  
(1980年3月，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 应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的请求，兹责成外贸部：

于1980年第3季度无偿向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巴尔里卡达》报社提供600吨新闻纸，记在满足兄弟党需求基金项目



下；

于1980年第2季度按所附清单无偿向《巴尔里卡达》报社提供照相器材，记在外贸部出口基金项目下；

2. 责成：

造纸工业部于1980年第2季度按外贸部订单在孔多波加纸浆造纸联合工厂生产600吨新闻纸；

交通部和海运部按外贸部订单把上述新闻纸运抵科林托港（尼加拉瓜），用苏联卢布结算。

3. 给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生产和运送600吨新闻纸以及照相器材的费用记在苏联无偿援助外国国家预算拨款项目下。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柯西金

附 件

机密

供给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巴尔里卡达报社》照相器材清单

- |                                       |      |
|---------------------------------------|------|
| 1. “泽尼特—ТТЛ”摄影闪光灯                     | 10台  |
| 2. “费尔—11M”摄影闪光灯                      | 12台  |
| 3. “乌帕—5M”照相放大机                       | 4台   |
| 4. 黑白胶卷，宽35毫米，长60米                    | 150卷 |
| 5. “乌尼勃罗姆”相纸，有光泽的，标准的，薄的，9×12，一包20张   | 25包  |
| 6. “乌尼勃罗姆”相纸，有光泽的，反差特大的，薄的，9×12，一包20张 | 25包  |
| 7. “乌尼勃罗姆”相纸，有光泽的，                    |      |

软的，薄的， $9 \times 12$ ，一包 20 张	25 包
8. “乌尼勃罗姆”相纸，软的，薄的， $18 \times 24$ ，一包 20 张	20 包
9. “乌尼勃罗姆”相纸，有光泽的，软的，薄的， $18 \times 18$ ，一包 50 张	20 包
10. 黑白相纸显影剂，一包溶解溶液 25 公斤	25 包
11. 定影剂，一包溶解溶液 25 公斤	48 包

№06124

## 勃鲁捷茨和斯莫尔斯基关于与桑地诺民族 解放阵线联系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0年3月14日)

机密

### 关于苏共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 阵线签订联系计划的情况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盖里·路易斯在同苏联驻尼加拉瓜临时代办谈话时(1980年2月26日)建议在尼加拉瓜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讨论尼加拉瓜方面很重视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和苏联共产党的联系问题。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是执政的政治团体。其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在阵线的基础上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便在尼加拉瓜建设社会主义。从战略上和国内及中美洲地区的实际政治形势来考虑,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目前不宜公开宣布自己的最终目的。

我们认为可以同意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建议,并建议该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签订苏联共产党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1980~1981年联系计划。

实施双方联系计划规定的措施所需费用可记在党的预算项目下面。这一问题已同E.M.季亚热利尼科夫同志协商过。

附苏共中央决定草案。

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 K. 勃鲁捷茨  
苏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П. 斯莫尔斯基

附 件

###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苏共与桑地诺民族解放 阵线建立联系计划的决议

1. 批准苏共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1980~1981 年联系计划（见附件）。

2. 苏共中央国际部、组织部、宣传部、事务局负责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代表团的接待、服务和组织工作。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在苏联的费用以及苏共党员干部和苏联教师去尼加拉瓜的费用记在党的预算项目下面。

3. 责成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办公室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地诺学校的教学方面给予组织和方法上的帮助。

附 件

机密

## 苏共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 阵线 1980~1981 年联系计划

苏联共产党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双方愿意发展友好团结的关系，共同拥护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科学社会主义，为合作创造良好条件，根据反帝力量团结一致的利益在 1980~1981 年双方关系方面达成如下协议。

### 1. 交换党代表团

1) 苏方每年接待两个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党代表团，每个代表团不超过 5 人，期限不超过 14 天，目的为学习苏联共产党在党的组织工作、思想工作和地方政权机关领导工作方面的经验；

2) 尼加拉瓜方面每年接待一个苏共党员干部代表团，3~4 人，不超过 12 天，了解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工作情况。

### 2. 合作培养政治干部

1) 苏方接受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到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学习：1980 年 4 月 35 人，学习 2 个月；9 月 65 人，学习 6 个月。

1981 年两批各 50 人，第一批自 3 月 1 日开始，第二批自 9 月 1 日开始。

每年接受受过中等教育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 15 人到苏联高等学校学习。

每年接受 3 名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中央机关报《巴尔里卡达》报工作人员到《真理报》交流工作经验。

2) 尼加拉瓜方面 1980~1981 年接受：

党的建设问题顾问，每年 5 人，期限 15 天；

苏联教师和专家，每年 5 人，到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地诺学校讲课，期限为 15 天；

苏联讲师，每年 3 人，根据双方议定的课题给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干部讲课和讲演，期限 10~15 天；

3) 苏联共产党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将推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地诺学校在组织工作和科学方法方面的合作。

4) 苏联共产党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将互相交换党的定期出版物（报纸、杂志、小册子等），使自己的党员和人民了解对方国家的经验和成就。

5) 苏联共产党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将交换对双方有利的有关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信息。

\* \* \*

苏联共产党每年接待 15 名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到苏联休养和治病。

\* \* \*

苏联共产党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表示准备举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的会谈，交换有关双方关系和国际形势现实问题的意见，促进苏联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各社会团体之间相互接触和联系。

\* \* \*

双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实施本计划，并准备研究苏共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合作过程中发生的其他双边联系问题。

苏联共产党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06096

## 苏共中央关于苏共与桑地诺民族 解放阵线联系计划的决议

(1980年3月17日)

绝密

№СТ - 202 / 53rc

中央书记处第202号 / 53rc 记录摘抄

关于苏联共产党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联系计划

1. 赞同1980~1981年苏联共产党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联系计划(见附件)。

2. 责成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党务组织工作部、宣传部、事务管理局负责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代表团的接待、服务和组织工作。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来苏联的旅费和在苏联的生活费,以及苏共中央党务工作者代表团和苏联讲师去尼加拉瓜的派遣费均从党的预算中支付。

3. 责成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院长办公室负责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民族领导所属的桑地诺学校在实际的组织工作上和科学的教学方面给予帮助,以保证其教学的全过程。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 件

机密

属 п.53rc, пр.№202

## 1980～1981 年间苏共中央和尼加拉瓜桑地诺 民族解放阵线之间联系的计划

苏联共产党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根据友好和团结一致的精神双方愿意发展相互间的关系，同时指出，共同忠实于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为合作创造良好条件，遵循统一反帝势力的利益，达成在 1980～1981 年间双方关系方面的如下协议。

### 1. 交换党的代表团

1) 苏联方面每年接待两个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党的代表团，每个代表团的成员不超过 5 人，期限为 14 天，目的是为了学习苏联共产党在党的组织工作、思想工作和领导地方政权机关工作等方面的经验。

2) 尼加拉瓜方面每年接一个苏联共产党党务干部代表团，其成员为 3～4 人，期限不超过 12 天，目的是了解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活动情况。

### 2. 合作培训政治干部

1) 苏联方面接受学员到苏联共产党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进行培训：

1980 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一个组为 35 人于 4 月份（学习期限为两个月），另一个组为 65 人于 9 月份（学习期限为 6 个月）；



1981年分成两组，每组各50人（第一组从3月1日开始学习，第二组从9月1日开始学习）；

接受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受过中等教育的成员一组（每年不超过15人）到苏联高等学校学习；

接受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中央机关报《巴尔里卡达》报编辑（每年）三人到《真理报》交流工作经验。

2) 尼加拉瓜方面 1980~1981年接受：

党的建设问题顾问小组（每年不超过5人），期限不超过15天；

苏联教师和专家小组（每年不超过5人）到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民族领导所属桑地诺学校讲学，期限不超过15天；

苏联讲师小组（每年不超过3人）根据双方商定的选题给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积极分子授课和发表演说，期限不超过10~15天。

3) 苏联共产党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将促进苏联共产党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民族领导所属桑地诺学校之间在实际组织工作和科学教学方法方面的协作。

4) 苏联共产党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将交流党的定期出版物（报纸、杂志、宣传小册子以及其他等），目的是使其党员和人民熟悉每个国家的经验和成就。

5) 苏联共产党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将交流对双方都有利的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等斗争的信息。

\* \* \*

苏联共产党每年接待10~15名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到苏联休养和治疗。

\* \* \*

苏联共产党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都同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代表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民族领导的代表进行会晤，交流有关双方关系和国际局势上迫切问题的意见；促进发展苏联和尼加拉瓜共和国各社会团体之间的相互接触与联系。

\* \* \*

双方将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实施本计划，并同意研究苏联共产党中央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之间在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其他双方联系问题。

苏联共产党（同意）

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同意）

№11847

## 科瓦廖列夫关于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联系计划文本致苏共中央办公厅的报告

(1980年4月18日)

现送上苏联共产党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1980～1981 年联系计划原件，该计划根据中央决议（1980年3月17日）于今年3月19日在莫斯科签订。

代表苏联共产党在计划上签字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同志；代表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计划上签字的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执行委员会委员、尼加拉瓜计划部长盖里·路易斯。

附件：苏联共产党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1980～1981 年联系计划俄文本和西班牙文本。<sup>①</sup>

苏共中央国际部秘书处处长 M. 科瓦廖夫

---

① 参见文件№06096 附件。

№11848

苏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援助尼加拉瓜开展扫盲运动的决议  
(1980年5月20日)

绝密  
苏共中央  
1980年5月20日

中央书记处第211次会议记录摘抄

关于援助尼加拉瓜开展扫盲运动。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该问题的命令草案（见附件）。

中央书记

第211次会议记录附件

机密  
草案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援助尼加拉瓜的命令

1. 责成苏联教育部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于1980~1981年派15名有国外工作经验、掌握西班牙语的教学法专家去尼加拉

瓜组织扫盲工作。

对苏联专家组长按派往国外从事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外汇工资表中的第5类确定外汇工资，对教学法专家按第6类确定外汇工资。

2. 责成苏联贸易部用市场基金于1980年第二、三季度作为礼物向尼加拉瓜供应教学笔记本50万本、铅笔50万支，第四季度教学笔记本50万本、铅笔50万支。

责成造纸工业部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尼加拉瓜生产上述数量的笔记本和铅笔。

3. 责成无线电器材工业部于1980年作为礼物给尼加拉瓜生产并供应1000台热带用鹰牌收音机。

4. 责成外贸部把本命令第2、3条规定的铅笔、笔记本和收音机提供给尼加拉瓜，责成民航部用莫斯科—马那瓜航线的班机把本命令第1、2、3条规定的专家和货物运到尼加拉瓜，用苏联卢布交付运费。

5. 生产和运输笔记本、铅笔、收音机的费用以及15名教学专家出差1年的费用，包括与卢布等值的外汇费用，记在苏联无偿援助外国国家预算拨款项目下面，外汇记在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外汇基金项目下面。

6. 责成苏联外交部将苏联就援助尼加拉瓜开展扫盲运动所采取的措施通知尼加拉瓜政府。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柯西金

№ 11849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意  
对尼加拉瓜宣传措施的决议**

(1980年5月29日)

绝密

中共中央

1980年5月29日

中央书记处第213号记录摘抄

关于向尼加拉瓜进行报道宣传的一些措施

同意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宣传部和国际部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中央书记

第213号记录附件

机密

苏共中央：

关于向尼加拉瓜进行报道宣传的一些措施

1979年7月民族爱国力量在尼加拉瓜的胜利和同年10月我们两国间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为向这个国家进行报道宣传工作创造了条件。苏联宣传单位和主管部门到目前在这方面进行了并正在进行着以下工作。

### 塔斯社

1979年9月在马那瓜开办了记者站，有记者两名；1980年1月记者站改为塔斯社分社，安装了电讯装置（现在只有单方面的电话联系）。

1980年5月14~19日接待了“努艾瓦·尼加拉瓜”通讯社副总经理，同他进行了关于签订信息交换合作协议的谈判。

### 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

根据1979年10月22日决定开办有两名记者的记者站，记者有权去中美洲各国。记者拟于1980年7~8月到工作岗位。现在通过古巴定期给尼加拉瓜电视台传送苏联电视资料。

### 新闻社

通过两个渠道与尼加拉瓜建立电讯联系：拉丁报社和“努艾瓦·尼加拉瓜”通讯社，每天给他们发三、四种材料。

建议苏共中央在马那瓜开办新闻社分社，在尼加拉瓜出版理论月刊《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3000份）和信息日报。

定期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出版的报纸《巴尔里卡达报》邮寄资料。

新闻社的出版社经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定期（根据出版情况每月一、二次）给马那瓜苏联大使馆航空邮寄宣传材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文件、党的教育网用的资料等（自1979年10月已寄去59种书和小册子，共8500册）。

### 苏联国家出版印刷和书籍发行委员会

1980年4月用党的预算经费给尼加拉瓜（盖里·路易斯）邮去83种社会政治书刊（包括列宁著作），共830册。

### 国家电影公司

建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转送尼加拉瓜20~25部苏联电影，建立影片储备，转送桑地诺电影学院10盘苏联胶片，建立电

影史料馆，暂送 10 台放映机（16 毫米）。

通过苏联影片出口公司正在谈判向尼加拉瓜出租苏联影片问题。

古巴同志赠给尼加拉瓜 20 部西班牙语苏联大型影片，在尼加拉瓜组建国家电影发行公司。

“国际书店”全苏联合公司

同国营公司签订了销售苏联书刊的合同。1980 年 4 月航空邮寄 1 万多册、轮船运去 7 万多册各种题材的书，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定期给尼加拉瓜桑地诺劳动者工会中心邮寄社会政治书籍。最近将发去电影放映机和影片，通过工会向社会发行。

苏联青年组织委员会

1980 年给“7 月 19 日桑地诺青年联合会”寄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有关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的文件和资料，以及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文艺著作和有关苏联青年的记录影片。

另外最好：

准许塔斯社同“努艾瓦·尼加拉瓜”通讯社签订交换信息合作协议；

责成塔斯社租用莫斯科—马那瓜通讯线路同“努艾瓦·尼加拉瓜”通讯社交换信息；

责成塔斯社帮助尼加拉瓜建立摄影社，包括提供设备和摄影器材；

通过国家出版社，印刷和书籍发行委员会在尼加拉瓜革命胜利一周年之际（7 月 19 日）在尼加拉瓜举办苏联政治书籍展览会，然后把全部书籍赠给尼加拉瓜政府；

责成国家出版社印刷和书籍发行委员会在 1980 年第 3 季度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发运给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奥尔捷加，包括运费在内总金额不超过2000卢布，此项费用记在党的预算储备金项目下面；

责成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同古巴方面谈判，通过古巴给尼加拉瓜增加苏联广播电视材料；

通过苏联对外友好协会给苏联大使馆发运向社会发行的书籍和影片，责成大使馆组织审阅，并转交给尼加拉瓜的社会团体；

责成苏联妇女联合会用书籍、影片和其他宣传材料支援尼加拉瓜桑地诺妇女联合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项措施的实施可不必另外拨款。已同苏共中央事务局、有关单位和主管部协商过。

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宣传部

苏共中央国际部

№06031

## 切加耶夫同奥尔捷加 关于尼加拉瓜问题的谈话纪要

(1980年9月25日)

摘自切加耶夫的日记

在古巴外交部会见了Э.Ф. 奥尔捷加<sup>①</sup>。在会谈中涉及到尼加拉瓜形势的几个问题。

奥尔捷加说，尼加拉瓜革命进程的特点，是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分化，在许多地方同古巴革命胜利后发生的情况相似。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不甘心丧失自己的特权，作绝望的挣扎，妄图使局势有利于自己。为达此目的，他们公开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对立，开展反对共产党的运动。这些势力的喉舌是《拉·普连萨》报。它诬蔑、中伤尼加拉瓜真正的朋友——苏联和古巴。这些势力称古巴为苏联的仆从，想利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同古巴的密切关系来损害桑地诺领导人在广大居民阶层中的声誉。奥尔捷加强调说，但这类行动只能暴露他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真实目的，促进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团结，使尼加拉瓜革命力量更加警惕并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奥尔捷加说，反对派的资产阶级政党竭力敦促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进行选举。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知道，桑地诺阵线无

---

<sup>①</sup> 埃·菲·奥尔捷加，古巴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司工作人员。

疑能在其中取得胜利的选举会转移人民对解决迫切问题的注意力，因此把选举延到1985年。奥尔捷加说，我们期望，届时尼加拉瓜革命力量会更强大，并能消除反对派的影响。

奥尔捷加指出，桑地诺领导人不能不多虑，现在私营经济在国民生产总量中占57%，而在农业中达80%。因此领导人认为，在革命进程的现阶段资产阶级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尼加拉瓜的经济复苏做了不少工作。所以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不得不对资产阶级实行灵活的方针：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实行的社会经济改革范围内孤立其最反动的分子，支持其余部分。

奥尔捷加强调说，至于反革命，共有5~6个反革命团体。他们互无联系，目前还不构成很大威胁。

奥尔捷加接着说，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感到不安的是少数民族问题（尼加拉瓜200万人口中少数民族为30万人），特别是同印第安部落的关系问题。他们生活在加勒比海沿岸，迄今不认为自己为尼加拉瓜人。在阶级斗争尖锐时，他们可能被反动派利用于从事反革命活动，因为他们很容易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为了积极吸引印第安人参加新生活建设，尼加拉瓜政府决定在古巴帮助下修筑公路，把国家的中心地区同加勒比海沿岸连接起来。

奥尔捷加说，桑地诺领导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对革命的最终目的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在尼加拉瓜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成员中也存在分歧，特别是对达到最终目的的斗争形式看法不一致。这一情况以及没有大家公认的首领给桑地诺阵线领导工作造成一些失误。他们通过决定，包括关于当前问题的决定，往往是很不容易的事。奥尔捷加说，我们对此是理解的，并认为这一缺点是成长中的问题，正如古巴的经验证明，将来一定能消除。

谈到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政策时，交谈者指出，美国人实行不灵活的政策，忽视古巴革命的教训。在他们的行动中有两种方针：一方面，美国实行强硬的方针，包括对尼加拉瓜施加压力，恫吓，威胁。这一方针的拥护者是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美国国会中的鹰派。美国继续在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领土上训练前索摩查民族近卫军成员中的恐怖小组。据交谈者说，第二种方针，即温和方针的拥护者是美国国务院，部分国会议员和卡特总统本人。他们的工作重点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美国帮助下能使尼加拉瓜离开革命社会经济改革道路。奥尔捷加指出，由于美国没有对尼加拉瓜的统一的政策，以及美国和西欧国家之间存在分歧，桑地诺领导人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西欧一些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给予尼加拉瓜以财政援助。

奥尔捷加把古巴—尼加拉瓜的关系视为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兄弟关系。他指出，两国签订的关于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协议对两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根据这一协议，古巴援助尼加拉瓜 5000 万美元，用于发展尼加拉瓜的教育、卫生和捕鱼业。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馆一秘 B. 切加耶夫

## 【专题说明】

# 苏军出兵阿富汗（二）

（1978年5月至1980年11月）

亚洲中西部的内陆国家阿富汗，4/5的国土是山地和高原。全国人口约1600万，40%是普什图人（阿富汗人），属伊斯兰国家。1978年4月27日，亲苏的军官发动政变，达乌德总统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纳伊姆被政变军队用乱枪打死。政变的直接发动者、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主席、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塔拉基成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统。不久，塔拉基与政府总理阿明之间的矛盾就尖锐起来，并达到互为水火的地步。1979年3月20日，塔拉基在出访古巴途经苏联时，和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勃列日涅夫答应，在现有的500多名将军和军官的“顾问团”之外，再增派150~200名军官，以及党员工作者，支援塔拉基。经过与苏联的密谋，塔拉基准备废掉阿明。

塔拉基与苏联的密谋，被阿明察觉。于是，掌握军权的阿明先发制人，调遣军队于1979年9月14日攻打总统府。在激烈的战斗中，塔拉基受重伤，不治而死。阿明成了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统。

1979年3月20日，勃列日涅夫和塔拉基会谈时还说：关于提出要求苏联出兵阿富汗问题，“我们进行了全面研究，仔细权衡了利

弊，现在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您：不应该做这件事。如果做了，就等于帮了敌人的忙”。两天以后，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说：“出兵阿富汗是不适宜的，因为这样做只能帮我们共同敌人的忙”。

但是，为了控制阿富汗，苏联最终还是转变了政策：从不主张出兵改为大规模的军事入侵。主要原因是自从塔拉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坚持中立、不结盟政策的阿富汗政府，打死达乌德之后，阿富汗人民纷纷成立各种武装组织，向投靠苏联的塔拉基政府展开了圣战。1979年9月阿明取代塔拉基后，局势更加动荡。全国28个省中，已有25个省在进行反政府的武装斗争。就在这短短的日子里，勃列日涅夫迅速做出新的决定。1979年11月初，苏军的中亚部队开始进入阿富汗，直接参战。1979年12月24~26日，苏军大举侵入阿富汗。苏联在派军入侵的同时，把阿明也废掉了。1979年12月28日，流亡苏联的原阿富汗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卡尔迈勒，宣布自己已被任命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苏联也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

有关苏军入侵阿富汗的档案文献，请参看本书第32卷。本专题的文件集中在1978年5月到1980年11月，共16份文件。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侯育成、张环海、许洪声翻译）

№06128

## 普扎诺夫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 驻阿富汗大使的谈话纪要

(1978年5月6日)

摘自普扎诺夫的日记

为了交换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访问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  
在大使的意见中有以下看法值得注意。

帕舍克<sup>①</sup>说，他所接触政府成员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留下很好的印象。在访问各部长以前，帕舍克得到华沙准许可笼统承诺给予援助，而这种承诺被愉快地接受。计划部长希望波兰专家帮助编制经济状况报告表和制定关于阿富汗经济政策的建议。大使还说，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在援助阿富汗方面联合行动。帕舍克同志说，据他所知，科威特已放弃以前提供给阿富汗的贷款。

金里光<sup>②</sup>说，很遗憾迄今还未收到平壤关于承认阿富汗新政府的通知。前几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拜访了他，但在谈话中没有涉及承认问题。

拉多斯拉沃夫<sup>③</sup>同志谈了他访问计划部长、农业部长、贸易部长的情况，并谈了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援助阿富汗和提出具体援助建议的必要性。

---

① 帕舍夫，波兰驻阿富汗大使。

② 金里光，朝鲜驻阿富汗大使。

③ 拉多斯拉沃夫，保加利亚驻阿富汗大使。

同水平很高的马克思主义者、农业部长泽拉伊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觉得泽拉伊有点急于求成，他谈到没收国内高级神职人员土地的打算。大使谈了保加利亚建立人民政权后对神职人员、修道士的土地采取了谨慎小心的办法，他强调，保加利亚神职人员的物质财富和在群众中的影响是逐渐被消除的。拉多斯拉沃夫同志还向部长介绍了保加利亚组建合作社的经验和保加利亚共产党对待各阶层农民的政策。泽拉伊对以上说明表示感谢，并说政府将请求保加利亚方面派代表团到阿富汗担任农业部领导在土地改革和组建合作社方面的顾问。

萨莫尼科夫<sup>①</sup> 按照南斯拉夫记者发往贝尔格莱德的报告文本讲述了塔拉基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的答记者问，并指出塔拉基的讲话是很有意思的。大使说，由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于5月5日承认了新阿富汗，他拜会了塔拉基，但是贝尔格莱德广播电台在5月2日就广播了承认新阿富汗问题。显然，正式通知喀布尔由于技术原因延误了一些。

卡尔麦利特<sup>②</sup> 对他同所访问的部长的谈话表示满意，并说很快就将实施共同合作的项目，特别是在喀布尔建无轨电车，这一工作由于阿富汗方面的原因已推迟了半年多。

大使馆二秘 Д.Б. 柳里科夫为谈话作了记录。

苏联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大使 A. 普扎诺夫

① 萨莫尼科夫，南斯拉夫驻阿富汗大使。

② 卡尔麦利特，捷克斯洛伐克驻阿富汗大使。



№06122

## 普扎诺夫同驻阿富汗巴基斯坦大使阿尔沙德和 伊朗大使达乌基的谈话纪要

(1978年5月9日)

摘自普扎诺夫的日记

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招待会上我同巴基斯坦大使和伊朗大使进行了谈话。

巴基斯坦大使说，我拜会了塔拉基，宣布了承认。同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理的会谈很有意思。塔拉基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看来同新政府办事比较容易，显然是能做决定又能执行决定的人掌了权。

我问过，大使是否注意到，新政府对普什图问题<sup>①</sup>从一开始就同达乌德持不同立场，他掌权后，政府宣布要用和平的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因此阿富汗—巴基斯坦关系的气氛如何将取决于巴基斯坦方面。

大使表示同意这一点，并说，巴基斯坦将同阿富汗合作并保持友好关系。

伊朗大使说，4月27~28日事件时他在德黑兰准备国王访问阿富汗。现在访问取消了，不久前他回来了。他承认，伊朗将同阿富汗保持友好关系，将给阿富汗经济援助。达乌德政府不想具体解

<sup>①</sup> 普什图问题指阿富汗问题。阿富汗人自称普什图人，同时也泛指居住在阿富汗境外的阿富汗人。

决援助问题，一直拖而未决。同新政府合作将比较容易。

他注意到，我有伊朗报界关于对阿富汗事件反应的报道。如果说一开始报纸还写伊朗愿与阿富汗保持睦邻关系，那么现在众所周知，报纸就写“血腥的暴动”了。

大使说，办报的人总是把力气用到不该用的地方。达乌基在这方面不是内行，否则他就会通知德黑兰不要这样报道阿富汗事件了。

我问，给阿富汗供应伊朗石油产品的情况如何？

达乌基说，4月27~28日事件以后供应量大大减少了。但他认为这是误会，他已给德黑兰发了电报，要求恢复全量供应。

会谈由大使馆二秘 Д. Б. 柳里科夫翻译并做记录。

苏联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大使 A. 普扎诺夫

№06123

## 普扎诺夫民主德国访阿代表团谈话纪要

(1978年5月20日)

摘自普扎诺夫的日记

应恩克斯<sup>①</sup>等的请求我在大使馆接见了恩克斯，代表团团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代表阿尔涅·查伊费尔特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顾问比杰尔曼。

恩克斯谈了以下事情。

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最近在喀布尔开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大使已任命，今天或明天将征询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任命的意见。

2. 他带来了昂纳克给塔拉基的信。

3. 代表团将同阿富汗方面谈判，如果同意将签订民航通航协议。

恩克斯请求协助会见塔拉基。5月20日我会见了外交部秘书长瓦基利，向他转达了恩克斯的请求。同塔拉基的会见定于5月21日。

应恩克斯的请求我讲了阿富汗四月革命的原因，新政权机关及其领导人、今年5月9日塔拉基在喀布尔广播电台发表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主要革命任务，并把广播文本和5月6日塔拉基在记者

---

<sup>①</sup> 克劳斯·恩克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阿代表团团长，时任交通部副部长、民航局长。

招待会上的讲话文本给了他。

恩克斯非常感谢，并说，如果阿富汗政府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准备最近派经济代表团到喀布尔，共同讨论经济技术合作、贸易、文化及其他民主德国和阿富汗之间的联系问题。

苏联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大使 A. 普扎诺夫

№06137

## 舒米洛夫同美国驻苏大使馆一秘 汤姆逊的谈话纪要

(1978年5月25日)

摘自舒米洛夫的日记

应汤姆逊的请求我根据指示在部里接见了。自我介绍时，汤姆逊讲了在印度、尼泊尔、泰国作为“和平使团”成员和外交官的工作情况。他说，在这里的大使馆，他负责亚洲、近东和中东问题。他希望交换有关阿富汗事件的意见，也希望知道苏联和阿富汗关系的发展前景。

我说，据来自喀布尔消息，由于4月革命在阿富汗成立了民主共和国。在共和国领导人纲领性声明中说，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消灭经济落后状况，为阿富汗人民的利益进行进步改革。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对外政策方面准备根据宣布的纲领推行不结盟和中立的方针，同所有国家发展合作，保卫国际和平，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阿富汗新政府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措施，得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小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支持。

我说，关于苏联和阿富汗的关系60年来一直是友好睦邻关系，可以认为在阿富汗建立进步、民主的管理制度以后，这种关系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明访问莫斯科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

方表示坚信苏联和阿富汗的关系、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全面合作会不断地发展。

在回答汤姆逊的提问时，我提请他注意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塔拉基关于在阿富汗从未有过，现在也没有共产党的声明。关于阿富汗发展道路的确定问题，我指出这是阿富汗人民的内部事务。新领导人就阿富汗沿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问题未作过任何声明，只说过新领导人将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建立没有社会压迫的社会。

交谈者还问在新条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将如何发展？

我说，美国在上述国家有自己的大使馆，显然知道这两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据我们所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已声明，愿意同巴基斯坦发展友好关系，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一切问题。巴基斯坦已经承认了阿富汗的民族民主制度。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友好关系无疑会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并有利于该地区和平的巩固。

汤姆逊说，美国已承认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准备继续给阿富汗以经济援助，美国认为，这里发生的变革对克服经济落后和保证该国的“人权”是有帮助的。

阿富汗处处长 O. 舒米洛夫

№06093

## 加夫里洛夫同英国驻苏大使馆一秘

### 斯季韦·贝恩德的谈话纪要

(1978年7月19日)

摘自加夫里洛夫的日记

应贝恩德的请求，根据领导的指示在处里接见了她。

贝恩德说，很想交换关于4月革命之后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形成的局势方面的意见。贝恩德对我们关于阿富汗的新体制很稳固，它的政治方向，反对派（宗教界，封建地主）的潜力以及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对外政策活动等的评价很感兴趣。

在谈话过程中回避了一些直接评价性质的话，引导交谈者注意的是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理塔拉基和副总理、外交部长阿明对外国记者，其中包括BBC记者举行的答记问。指出，4月革命的目的和任务，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就实施今年5月9日宣布的政府纲要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都得到阿富汗人民广泛的支持，让他注意的是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领导声明尊重伊斯兰教和信教人的感情，并说，阿富汗的革命是按阿富汗劳动人民的心愿和利益完成的。强调说，在阿富汗发生的4月事件是该国家和人民的内部事务。

贝恩德试图将在阿富汗发生的政治变革同似乎在巴基斯坦的对外政策上所发生的一些变化联系起来。他发挥其想法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摆在巴基斯坦面前的选择就是：或者加强中央

条约组织；或者逐渐地退出这一联盟，巴基斯坦渴望参加不结盟运动就说明，它做出的选择是倾向于退出中央条约组织。根据贝恩德的说法，关于这一点同时可以证明的就是巴基斯坦人建议与苏联签订类似苏联和土耳其之间所签订的那种政治文件。

他说，关于巴基斯坦一方提出的什么建议我什么都不知道。如果巴基斯坦把问题看成是国家的对外政策，那么在我看来，这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没有联系，因为其领导人声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倒是同把世界划分成军事集团的政策有关，这种政策证明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和保障和平和各民族安全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认为，恰是这种结论就是巴基斯坦的领导们所得出的。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贝恩德说，英国打算继续援助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其规模同以前一致。阿富汗人曾正式宣布了这一点。同时还确认今年和去年一样同意接受二名阿富汗军官进皇家军事学院学习。

中东国家司顾问 C. 加夫里洛夫（签名）



No 11850

## 舒米洛夫同美国驻苏大使馆 一秘汤姆逊的谈话纪要

(1978年8月16日)

摘自舒米洛夫的日记

根据同部领导协商我应汤姆逊的请求接见了。

汤姆逊希望告知他苏联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关系发展现状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关系的现状。

我说，苏联和阿富汗的关系一直是友好和卓有成效的合作。革命民主领导在阿富汗掌权后，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我指出，关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双方表示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现存的纠纷问题。前几天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总理塔拉基答巴基斯坦记者问时再次表示，期望两邻国关于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问题的政治分歧能通过和平谈判得到解决。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汤姆逊说，美国继续援助阿富汗，同阿富汗新制度保持友好关系。而且他说，7月份副国务卿纽索姆曾访问喀布尔，不久前美国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两个协议：在基尔曼德河谷完成动力灌溉建设协议和在阿富汗发展小麦生产协议。

据对方说，阿富汗领导人拖延和平解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纠纷的谈判，可能他们现在忙于内部事务，没有准备好对这一问题的谈判。接着他问苏联对阿富汗不承认久兰达线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国境线的立场持何种态度？

我回答说，我们不知道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国界问题具体说了什么。

汤姆逊还问，塔拉基今年有无可能访问苏联并在访问期间两国签订新的政治条约？

我说，虽然像需要发展和加强两国关系的基础一样，两国经常有人互相访问，但关于这些问题我却一无所知。

阿富汗处处长 舒米洛夫

№06163

## 博尔德列夫同努瓦维尔 及其副手戴－博韦的谈话纪要

(1979年6月19日)

摘自博尔德列夫日记

1979年6月26日

受上极委托我在法国外交部莫斯科办事处会见前来莫斯科苏联外交部进行计划协商的努瓦维尔<sup>①</sup>和戴－博韦<sup>②</sup>。

努瓦维尔谈到苏联比法国同阿富汗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因此他请求讲一讲阿富汗所发行的事件以及目前苏联和阿富汗关系的状况。从自己方面他指出，法国承认阿富汗新政权同它保持关系，这种关系尤其在文化合作领域得到顺利发展。戴－博韦补充说，阿富汗和伊朗局势尖锐化在法国引起不安。法国正密切关注上述国家事态的发展，同时对苏联报刊涉及该地区形势的报道表现极大的兴趣。戴－博韦说，他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在欢迎印度总理德赛的午宴上关于苏联不会对阿富汗的不幸置之不理的讲话。戴－博韦强调说，法国外交部代表们对阿富汗国内政局及其现领导对外政策今后发展的总趋势颇感兴趣。

我谈了四月革命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国内政治形势，革命政权为阿富汗劳动人民利益实行的社会经济改造，以及在克服国家落后

① 努瓦维尔，时任法国外交部亚洲和大洋洲司司长。

② 戴－博韦，努瓦维尔的副手。

和消灭封建主义方面开始取得的重要进步。在谈到四月革命时，我强调指出，这场革命成为根本解决业已成熟的阿富汗社会经济问题的历史性因素。实行土地改革在阿富汗的现有条件下具有特殊意义。自然，在这么落后的国家进行根本性社会经济改造时，无论阿富汗怎样处于革命的时机，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的客观困难。这些困难是受多种结构的经济，不发达的生产力，居民就业问题，低识字率和宗教狂热所制约的。在谈到苏联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时我提请他们注意苏阿平等友好关系的特殊性，这种关系是60年前由列宁奠定基础，现在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苏阿关系基于友好、和平、睦邻、互相尊重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之上的。

革命制度的进步措施引起失去政权和特权的封建主、宗教界反动分子、被推翻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部落上层分子的仇恨。介绍了阿富汗人民反对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情况。我提请法国外交代表注意，西方大众传媒工具，其中包括法国的，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散布各种离奇古怪的有关阿富汗事件的谣言，对阿富汗国内局势的稳定和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加强起消极作用。

在会谈结束时我表示相信，阿富汗人民及其革命的领导人将会在他们选择的实行进步的社会经济改造和建设新生活的道路上取得成就。

努瓦维尔感谢对他的接待和进行谈话，法国方面参加谈话的还有法驻苏使馆参赞沙特勒先生主苏舍先生，大使馆工作人员萨瓦里先生苏联方面有中东司副司长 O.M. 舒米洛夫、第一欧洲司参赞 И.Н. 苏达列夫同志、中东司二秘 Ю.Г. 米申同志和第一欧洲司参赞 A.B. 舒里金同志。

中东司司长 B. 博尔德列夫（签字）

№06127

## 苏驻阿富汗使馆关于阿富汗 政治形势信函的摘要报告

(不早于1979年6月27日)

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1979年4月4日“关于阿富汗国内政治形势的某些因素”的信函

(指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在该期间的全部活动都贯穿着一个思想:希望借纪念四月革命一周年之际进行某些总结。对经济、组织党务工作、宗教工作和军队中的事态变化进行分析。注意到,反动派的活动开始活跃。)

参加反政府斗争的有封建贵族、左翼穆斯林集团、亲华分子和民族主义小团体。诸如巴基斯坦、伊朗、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美国、英国、联邦德国等国家均给予阿富汗新制度的敌人为数可观的援助。

(注意到宗教界反政府的斗争,强调伊朗对阿富汗局势的影响。该信函中的一部分专门谈到1979年3月下半月的赫拉特事件。审查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为改善局势所采取的措施。讲述关于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建立最高保卫祖国委员会。4月2日该委员会召开了首次会议。)

总军事顾问戈列洛夫同志和政治工作顾问扎普拉金同志参加了会议工作。应塔拉基的请求总军事顾问在会上就有关问题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并提出了些建议。特别是提出了如下建议:为保护居民免受敌对势力的破坏和使国内局势正常化。在国内建立8个地方行

政机关领导人的责任区，每个区组建以军事长官为首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活动由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领导，每个区都建立混合军事支队；建议在喀布尔建立包括人民军、外交部、银行、国防部和飞机场在内的4个责任区和2个特殊区。谈了关于向库纳尔省派遣该地出生的负责干部以便同部族领袖工作，而在省内继续对抗的情况下制定旨在镇压武装匪徒以及在使其与巴基斯坦隔离的特殊行为。

（第五部分专门谈了苏联给予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援助的问题。）

3月下半月紧急无偿追加提供的武器有步兵БМИ-1型作战汽车、米-25和米-8Т型直升飞机连同弹药。此外加速提前供应БРТ-60ПБ型装甲运输车、БРДМ-2型装甲侦察汽车、“箭-2М”型移动高射火箭装置及其他武器和物资。专供内务机关的轻武器开始使用，这里指得注意的是近期还要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安全机关提供武器。关于在苏联维修8架米格-21型阿富汗飞机的决定已通过。

考虑到阿富汗方面的呼吁，已通知阿方决定在今年头半年无偿提供阿富汗10万吨小麦；为了缓解阿富汗的财政形势，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将阿富汗提供给苏联的天然气价格由每1000立方米的21.8美元提高到37.82美元；鉴于喀布尔无线电台功率不足，苏联方面作为临时措施表示愿意以阿富汗本国的频离将位于杜尚别地区功率1000千瓦的现有电台和位于库什卡地区功率100千瓦的移动电台提供给阿富汗使用。

苏联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支持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支持包括苏联驻伊斯兰堡和德黑兰大使分别同齐亚·哈克、霍梅尼和巴扎尔甘旨在阻止巴基斯坦和伊朗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内政干涉的会谈，以及苏联报刊、电台和电视台所持的立场。

苏联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关于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实

现土地改革及其对国内政局的影响”的政治信函（1979年6月27日）

（分析在阿富汗实现土地改革的开始、过程和结果）

大使馆做出了如下结论：

苏联顾问积极参加了这项法令的制定工作，土地改革法令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它考虑到了本国的历史特点，政治和社会经济状况。

No 06101

## 博尔德列夫同久蓬的谈话纪要

（1979年8月9日）

摘自博尔德列夫的日记

应久蓬<sup>①</sup>的请求我接见了。

久蓬说，我想向中东国家司提几个有关国家形势的一般问题。我注意到，他所说的首先涉及阿富汗的形势，因为西方政界和社会最关心这一问题。提到苏联报刊和西方国家报刊有关阿富汗的文章和报道以后，久蓬问我们如何评论阿富汗目前的形势。

我回答说，四月革命胜利后阿富汗人民在消除封建残余、建立牢固的民族经济以及使社会制度民主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在评论阿富汗形势时必须认识到，革命政权在现阶段不得不克服许多客观困难。革命改造是在一个落后的、部族关系和宗教起很大作用的国家进行的。实施社会经济改造纲领，特别是实施像土地改革、消灭文盲、改善卫生体制等这样的措施，要遇到来自外国支持的、阿富汗以前的剥削阶级的反抗。我指出，苏联同自己的南邻一直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尽一切可能进一步发展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友好睦邻关系。我谈了对阿富汗形势发展的未来的乐观看法。

在提到布热津斯基和美国国务院代表卡杰尔的有关阿富汗的讲话以后，久蓬说，他认为，他们毫无根据地想把阿富汗事件同苏联

---

① 让·久蓬，法国驻苏临时代办。



- 美国对话联系起来。久蓬继续说，但是法国方面担心，苏联可能处于不得不干涉阿富汗内部事件的地位。久蓬问道，苏联-阿富汗友好睦邻合作条约能否为类似的干涉提供依据。

我说，苏联过去和现在一贯反对外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我引用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1978年11月19日就伊朗事件答《真理报》记者问。我强调说，尽管西方一些人故意歪曲事情的真相，但我们同阿富汗的合作和干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1978年12月5日苏联-阿富汗条约不是军事条约，是发展和平的国家关系的条约。我指出，但是苏联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对涉及其安全的问题不能置之不理。这种态度符合事情的逻辑，也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条款。

久蓬说，从整体上说同意对使该国形势复杂化的因素的分析。他认为，宗教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占特殊地位，在实际上导致在阿富汗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一方面是非宗教的（如果不说无神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府；而另一方面是信教的居民。接着，久蓬推测说，围绕阿富汗问题喊得最凶的中国人，是不会放过利用穆斯林的观点来向苏联进攻的机会的。

在回答会谈对方时我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说，在没有外国干涉情况下阿富汗人民和任何国家的人民一样，能很好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包括部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我强调说，我国对国际事务的原则政策是：各国内部问题的解决，要有利于各族人民，有利于本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

出席会谈的有：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顾问 M. 沙特列和中东国家司二秘别洛沃尔同志。法国大使馆翻译 K. 罗尔林格担任会谈的翻译。

中东国家司司长 B. 博尔德列夫

No06038

## 苏联驻古巴大使沃罗特尼科夫 同霍赫扎特的谈话纪要

（1979年9月24日）

霍赫扎特<sup>①</sup>讲述了从政权中清除塔拉基的必要性。霍赫扎特阐明了自己对四月革命前阿富汗事件的看法，强调了阿明在这次事件中的关键作用。用他的话说，塔拉基周围聚集了一些对四月革命不满的人，他们认为进行四月革命为时尚早，要求阿明辞职。结果由于塔拉基犹豫不决，导致对国内局势失去控制并日益尖锐化。当军队内部局势也开始难以控制时，阿明决定干掉塔拉基。苏联大使认为，霍赫扎特亲近阿明。

---

① 纳吉夫拉·霍赫扎特，阿富汗驻古巴大使。

No 06095

## 科瓦廖夫同维克谈话纪要

(1980年1月4日)

根据维克<sup>①</sup>的请求接见了她。

大使引证波恩的委托书发表了口头声明，在声明中鉴于阿富汗的事态陈述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观点（附上原文）。大使请求将声明的内容报告苏联外交部。

我说，我会将这一请求报告部长。与此同时指出，在大使发表的声明中包含有一系列的评论，但是，同真实的情况完全不一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已经无需谈整个说法的用词了，诸如“武装干涉”、“干涉”等等，这些都是苏方所不能接受的。

继续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鉴于阿富汗的事态在声明中所陈述的观点不能不令人惊奇。首先，让人们注意的是这样的事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走进了一条小胡同，这条胡同是华盛顿开辟的。当然，我们知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美国是盟国。但是，如此带有示威性的支持美国把其他国家都拴到同阿富汗的关系上这种极端路线不论是在我们眼里，还是在那些感到国际利害冲突缓和有出路的人，以及进行公平合作的国家的眼里，绝对不是能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策的一张最好的名片。

目前，在西方围绕和聚集在阿富汗事件周围的都是些蛊惑人心的宣传、欺骗、弄虚作假等勾当。而且在群众舆论工具中间，遗憾

---

<sup>①</sup> 维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苏大使。

的是还在一些官方人士的演说中都是如此。

在大使宣读的声明中，企图提出怀疑是由阿富汗的领导向苏联提出要求援助和对外来侵略的反应给予支持。但是，这种企图不可能得到加强，也不能有任何事实得到充实。而事实是这样，苏联政府关于这一点已通过自己的驻波恩的大使通告施密特总理，——就是根据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请求，苏联军队的有限定员已进入阿富汗领土。这种请求在四月革命之后不止一次地提出：塔拉基政府时期，阿明政府时期（最后一次恰好是1979年12月26日），还有卡尔迈勒·巴布拉克新政府时期都提出过。这是实情，而其他一切都是捏造的。

苏联军队的有限定员离开阿富汗领土，这只能在一旦消失原因，由阿富汗政府向苏联提出请求。提出苏军进入这一请求，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依据正是1978年12月5日签订的阿富汗和苏联两国之间友好、睦邻与合作条约，该条约规定共同的利益就是保证两国的安全。正如我们经通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苏联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同时都可使用单独和集体防御的权利，每个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都享有这一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阿富汗和苏联的这一权利，而其他国家都不止一次地在使用这样的权利。

什么原因促使阿富汗的领导不止一次地向苏联提出军事援助的呢？对此的回答是清楚的。无论是苏联，还是阿富汗都公开地提出过这些原因。苏联军队有限定员的存在，必须、只能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在对外侵略的反应上给予支持和协助。在西方多少次无论是肯定说相反的情况，还是说没有这种侵略，都没有改变事态。有确凿的事实可以证明存在这种侵略。我们都知道这些事实，华盛顿、伦敦、波恩也都了解这些事实，阿富汗人自己每天都同这些事实接触。

这种侵略是从那里来的，这已不是秘密。它是来自巴基斯坦。正是在巴基斯坦的领土上设有专门的军营，武装和训练部队，然后被派到阿富汗以便同合法的政府进行斗争。有不少这样的匪帮在阿富汗已被消灭，他们的许多成员都成为无害的人。他们之中有巴基斯坦人，也有阿富汗人，他们穿过巴基斯坦的边界，然后，经过专门的训练和装备，再重新秘密地派回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之后在苏联就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件，当时巴斯马奇匪帮就被派到苏联的领土上，企图推翻在中亚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

目前，我们是见证人，了解是怎样毫不掩饰地给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其目的是更剧烈地唆使他去反对阿富汗，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扩大侵略规模。巴基斯坦在加紧供应武器。谁在支持这一切，谁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这都非常清楚。然而，毫无疑问的是阿富汗能够捍卫自己。

有时在西方的刊物上传播一些相当卑鄙的说法，似乎在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和阿富汗领导人的变动之间有某种联系。企图得出结论说苏联对阿富汗的内部事务有某种干涉。诸如此类的论点其本身没有任何基础。

再说，这两个事件在时间上似乎是吻合，但是两者之间绝没有任何因果联系。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阿富汗的领导曾不止一次地向苏联提出请求给予军事援助。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发生变更之前，也就是在阿明政府时期，我们的军队开始进驻。苏联、苏联军队同上述的变化没有任何关系。任何相反的论点都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坚决不能接受。

从大使发表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处在这样一些国家之间，目前他们试图把阿富汗的形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这样的讨论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众所周知，阿富汗政府声明反对在安全理事会审议这一问题。某些国家的行动企图违背

阿富汗合法政府的立场，绝不能另外加以评定，否则会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的文字与精神的。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人都无权限制阿富汗的主权，干涉它的内政。企图想把所谓的阿富汗问题塞进安全理事会的那些人在扮演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不受欢迎的假保卫者，也就是说这种角色无论如何都不能同巩固联合国宪章中国际交往的标准与原则相一致。

非常明显的是在安全理事会上讨论阿富汗的局势只能使紧张程度更强烈，并使某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尖锐。可是，不应该怀疑的是苏联无论在安理会，还是在需要的任何地方都能够保卫自己和同阿富汗一致的合法利益。

还想对一种情况提请注意。阿富汗的新领导发表了一系列声明，这些声明，当然如果愿意客观地分析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发生了什么的话，无论是对阿富汗的邻邦，还是对所有希望阿富汗人民以及该地区的各民族和平和安定的那些人，都应该会引起兴趣。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新领导明确宣布，他们将实行和平、不结盟和同所有相接壤的国家睦邻的政策，其中也包括巴基斯坦。但是，关于这一点在西方不知为什么都宁愿避而不谈。

或者拿阿富汗新领导所实行政策的另一个角度，即内政作例子。在阿明执政时期就有违反法制的事，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涉及到特别是宗教界代表和其他一些人的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新领导杜绝了这些违法行为并声称，法制和法律秩序都应遵守，要尊重个人权利和人身不可侵犯。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景。在西方哀悼的不是阿富汗过去镇压中的牺牲者，而是刽子手的末日，他们对这些罪行是应承担责任的。逻辑就是这样，我们会碰到，而且不只是在宣传中，还在西方国家某些活动家的官方声明中。这一事实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它在直接谴责那种今天在阿富汗事件周围鼓动叫嚣的人。

试问，西方为什么不原正视现实，不原客观地评价在阿富汗已经发生过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显然，为的是打算诬蔑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新领导的立场，同时还顺便诽谤苏联的行动。这是一种臆想，然而却是毫无前途的。

据报道，最近在伦敦召开了许多西方国家的代表会议，讨论了对苏联和阿富汗采取某种对抗措施。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做并不能证明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更深入和有远见。如果问题是企图使苏联脱离实施和平、缓和和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政策道路，那么这种做法是徒劳的。上述某些人轻率的举措只能使国际形势恶化。但是，把别人的愿望强加给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办不到的。苏联的存在是和平和国际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必须尊重客观现实。

最后强调说，如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整个国际政策上都能坚持更加现实的立场，那么它就能够帮助使在为和平、缓和以及为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和改善而进行斗争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不受到损失。希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今后能更冷静地评价阿富汗事件。

维克说，关于讲给他的苏方一些想法他立即向波恩报告。在进一步会谈的过程中他试图证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所持立场是正确的，但是并没有提出任何补充论据。

再一次证明我们就讨论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

大使很关注刚刚从汉堡发来的消息说，1月3~4日夜在那里发生了一件企图放火烧苏联民航代表机构的事件。众所周知，不久之前慕尼黑发生了烧毁苏联民航代表机构的事。强调说，在目前的形势下诸如此类的事实特别尖锐。

鉴于发生的事情，维克表示遗憾并相信联邦德国当局无疑会采取必要措施改善保卫苏联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机构，揭露罪犯并

追究其责任。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A. 科瓦廖夫（签字）

1980年1月4日

## 附 件

### 联邦德国驻苏大使维克在苏联外交部发表的口头声明

联邦政府详细研究了1979年12月28日苏联政府关于苏联军队武装干涉阿富汗问题的通报，联邦政府对阿富汗事件的发展同从前一样十分忧虑和深感不安。为武装干涉辩护的基本理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苏联政府确认，阿富汗领导向它提出，请求在反对外来干涉与侵略的斗争中给予援助和支持。这种论点同下述事实相矛盾，即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的第一次行动并不是抵抗阿富汗想像中的敌人，相反却是帮助推翻一个据说曾向苏联提出请求给予集中援助的国家领导。

阿富汗人民用自己政治和军事上的反抗来证明，他们想根据自己的传统和伊斯兰教的教规生活在自由自决的条件下。苏联的军事行动并不能证明是正确的。苏联政府以联合国宪章第51条为借口是跟事实相反的。既不存在进攻苏联，也不存在什么第三个国家武装进攻阿富汗。

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所造成的局势，有充分的理由是给地区和平和稳定造成恐慌。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破坏了各民族和平生存、缓和紧张局势、不可分割以及自决权的基本原则。联邦政府同伙伴们的意见一致，坚持认为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不能不触犯各民族整个群体。因此，它同许多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签署了1980年1月3日给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的信，请求联合国在主要负责维持和平和



国际安全的这一机构里，审议有关在阿富汗已形成的局势问题。根据联邦政府的意见，在安理会审议的目的在于立即停止外国军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以及撤离这些军队。阿富汗人民应该有可能实现自己选举自己的政府和确定自己命运，外国无权干涉。

No06138

## 科尔尼延科同约特逊的谈话纪要

（1980年2月24日）

根据约特逊<sup>①</sup>的紧急请求我接见了。

大使奉命作如下口头声明：

“由于2月21日在喀布尔开始了大罢工，我们收到有关全市一片混乱的报告。那里枪声不断，苏联武装直升飞机、歼击机和装甲坦克都在行动。已宣布处于军事状态，延长了宵禁时间，据报告通讯联系已遭到破坏。

报告强调对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安全感到不安。鉴于苏联军队在喀布尔和其他大城市的积极作用，苏联政府应对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的安全负责。

12月27日我已告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马尔采夫，美国期望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以后，无论如何不能发生使美国工作人员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我们依然坚持这一立场，并期望苏联政府能负起责任。

如果喀布尔的局势从安全观点看来继续恶化，我们可能不得不考虑留在阿富汗的少数美国公民的撤离问题。如果一旦需要实施这一措施，我们期望苏联能协助美国公民安全撤离，以及想离开阿富汗的任何其他外国公民安全撤离。”

我对大使说，由于美国公民在阿富汗的情况，在美国方面发生

---

<sup>①</sup> 约特逊，美国驻苏大使。

一切问题，只能同阿富汗政府研究解决，因为美国在喀布尔有大使馆，阿富汗在华盛顿有大使馆。我强调说，美国方面没有任何依据提出让苏联政府对美国公民在阿富汗的安全承担某种责任的问题。只有接受方才能承担这种责任。比如美方承担阿方外交人员及其他在美国的阿富汗公民的安全的责任；而阿方则为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的安全负责。

接着我指出，约特逊声明中有几点和苏联方面掌握的情况不符。比如喀布尔没有发生过，现在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罢工”，只是有过一些巴基斯坦派遣人员组织并直接领导的反革命分子的挑衅活动。而且不只是巴基斯坦派出的阿富汗人，还有巴基斯坦公民。阿富汗政府还告知，上述人员中有一名美国公民，他已被阿富汗当局拘留。

我补充说，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目前喀布尔的局势业已正常。

约特逊说，他们每天（有时一天数次）收到的美国驻喀布尔临时代办的情报中，说苏联军人和战斗装备分布在该市主要街道交叉点和所有战略要点，其中包括美国大使馆所在区附近。大使说，因此撤离时，美国公民去机场途中必须经过许多苏军和战斗装备分布的点。正因为如此，美方才提出请我方给予可能的帮助问题。

我再次对约特逊说，总之，有关美国公民在喀布尔的安全问题美方须同阿富汗政府研究讨论。但美方的某些具体要求我方是可以考虑的。

后来约特逊还提出一个问题：“我还奉命向您提出美国公民罗伯特·李的问题，他在阿富汗被阿富汗或苏联领导人扣留。我国政府绝对否认李先生和美国情报机关或政府机关有某种联系。我们要求立即释放他。”

我向约特逊宣称，绝不接受美方这一请求，因为一切有关上述美国公民的问题，美国可以、而且应当同阿富汗政府讨论。

约特逊说，想说一些有关罗伯特·李的个人情况。据大使说，罗伯特·李近 30 岁，长期周游亚洲各国，而且不喜欢同美国官方代表交往，因此关于他的情况知道得不多。大使本人认为，李头脑有点不正常，并请求考虑到这一点，趁着现在在决定其命运问题方面还没有走得太远。而且他插话的意思在于，“要把阿富汗这样大的问题往罗伯特·李身上挂，他这个钩子太脆弱了”。

我回答说，除了大使谈到的有关罗伯特·李的个人情况，美方应同阿富汗政府解决与其命运有关的所有问题。

约特逊说，他将把谈到的一切报告给政府。

No 11851

## 科尔尼延科同约特逊的谈话纪要

(1980年2月24日)

在谈其他问题时约特逊说，美国政府在非常认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2月22日的讲话并力图弄明白应如何理解这个讲话，其中有没有某种迹象，表明第三国已经准备了苏联和该地区各国可以接受的什么协议，为解决阿富汗问题铺平道路。

我指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极为明确、清楚地说道，只要一停止外部对阿富汗事务的各种形式的干涉，苏联就立即从阿富汗撤军。也明确指出，组织这种干涉的人（其中直接提到美国）应该保证停止并不再恢复这种干涉。显然，不能允许有这样的情况：干涉停止一、两天，苏联把军队撤出了，然后又恢复了更大规模的干涉。因此必须保证不再恢复干涉，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现在进行直接或间接干涉的人。

还有一点也很清楚，在讨论关于“保证”的细节之前，组织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一方必须原则上声明，他们停止干涉并保证不再恢复干涉。而且在发表声明的同时，能有停止干涉的具体行动。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对待协调局势这件事是严肃认真的。

约特逊说，对美国来说，中立的“缓冲的”阿富汗是可以接受的，考虑到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利益，美国甚至同意苏联人在那里大量存在。他说，这种局势没有使美国不安，因为阿富汗不在美国边界附近，其缓冲国地位和美国利益不矛盾。

而且大使还说，美国无论如何不会干涉阿富汗的事务。他说，在巴基斯坦只有几名美国军事观察员，在这种局势下这是很自然的。

大使还说，在干涉阿富汗事务方面我们过高估计了美国的力量，因为根据当地的条件和特点从巴基斯坦领土上不可能组织受到苏联方面如此强烈反应的举动。

我向大使指出，如他所说，好像美国和阿富汗发生的事情没有关系，美国没有干涉，也没有组织干涉阿富汗的事务，这和我们掌握的事实不符。

约特逊在谈话结束时提出一点意见：在谈话中发现，双方依据的是不同的实际材料，看来需要收集新的情况，他将努力去收集。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 科尔尼延科<sup>①</sup>

分送：

А.А. 葛罗米柯，  
Г.М. 科尔尼延科，  
В.Ф. 马尔采夫，  
И.Н. 泽姆斯科夫，  
И.М. 叶热夫，  
В.Г. 科姆列克托夫，  
В.К. 博尔德列夫，  
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

<sup>①</sup> 文件上有批注：“送苏共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各书记。葛罗米柯，1980年2月25日”

№06102

苏共中央宣传部整理的  
关于反阿富汗敌对宣传的资料

(1980年6月22日)

兹送上思想意识工作组准备的关于反阿富汗的敌对宣传基本方针的资料。

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谢夫鲁克

附 件

绝密

555号

关于反阿富汗的敌对宣传的基本方针

由于粉碎了大的反革命匪帮，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形势逐渐稳定，爱国力量团结在以巴勃拉克·卡尔迈勒为首的阿富汗领导集体周围，迫使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加紧组织思想意识破坏活动。

尽管阿富汗社会政治变革的形形色色内外敌人的言论在一些细微方面互不相同，但其最终思想政治政策和主题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具有“如出一辙”的特点。引人注目的是帝国主义、中国和泛伊斯兰主义宣传中主要的反苏和反阿富汗革命题材密切交织在一起，在阿富汗侨民组织和反革命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中公开使用西

方苏联学和北京苏联学的论据和术语。敌对的宣传中心的言论也有一定的计划性，和阿富汗国内具体的反政府和反苏活动互相配合。

通过对美国宣传工具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顾问、中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伊朗及其他一些国家有关阿富汗及其周围事件的资料，同时通过对广播、报纸、传单和反革命分子散布的谣言的分析，可以将反阿富汗敌对宣传的基本方针归纳如下。

千方百计歪曲四月革命和以后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实质，贬低其意义（一般对1978年4月27日事件不用“革命”这一术语）。请看一些最常见的命题：

“在现代世界进行着两种势力的残酷斗争，其目的是确立对世界的统治。这一斗争的结果之一是‘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政变。这种政变的典型是俄罗斯顾问和国内走狗在阿富汗搞的政变。政变以后，两个党控制了国内政治生活。他们背叛祖国，是伊斯兰教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民族利益的敌人”。（择自《为阿富汗的信仰而斗争阵线》的信）

“四月政变没有国内社会客观基础”。“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是一种俄罗斯革命输出：这种输出是为挽救从属于苏联的政治制度，因为它自身不能保住政权”。“政变是一小撮军事官僚主义集团在苏联军队帮助下，为达到自己个人目的，也为苏联的对外政治扩张而进行的”。“过去的两年多表明，政变的口号和目的没有被居民接受，也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纽约《时代》杂志）

妄图破坏巴勃拉克·卡尔迈勒政府的威信、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对内对外政策。

认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苏联军事干涉的结果”。

在阿富汗伊斯兰革命阵线的一份传单中强调说，“你们说98%的阿富汗工人、农民、先进人物和劳动者支持你们和你们的革命。如果这样，为什么还请大国的军队到阿富汗来？”



“按其性质和行为，阿富汗领导和前塔拉基政权、阿明政体没有任何区别，推行强制政策，破坏人民的民族宗教传统，在苏联指挥棒下行事”。

“巴勃拉克·卡尔迈勒是俄罗斯人的俘虏，与人民完全隔绝”。“卡尔迈勒政体靠苏联军队的存在而存在”。“巴勃拉克·卡尔迈勒是不久就要倒台的政体的领导人”。

在敌对宣传中有不小的篇幅是用所谓个人生活琐事来败坏阿富汗领导人的名声。

“社会和国家的经济走上彻底衰败之路”。“经济领域的反民族政策是民族经济和国家收入急剧下降的原因，民族商人遭到彻底破产……国家预算的主要部分用于军事需要——这一切都是为了血腥镇压我国劳动人民”（摘自《为阿富汗的信仰而斗争阵线》）。

反对今年5月14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对外政策倡议的运动在继续进行。认为这些建议好像只符合苏联的利益。资产阶级报刊继续大量引用西方政治活动家关于这些建议：“仅仅是宣传施”的讲话（白宫，美国），具有美化特点和模棱两可的意思，和苏联与阿富汗以前的立场没有多大区别，“目的在于确立现有的地位”，“没有新内容”，“是宣传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无论是华沙宣言，还是阿富汗政府的声明都是密切配合，企图把仅对克里姆宫有利的谈判战略强加于人”。“莫斯科依然想愚弄自由世界，让人们承认阿富汗革命的不可逆转性质，取代减少苏联驻军”。“打上苏联标记的卡布迈勒倡议要达到的目的，是使卡尔迈勒政权合法化，喀布尔政权的承认”。

敌对宣传集中力量编造关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牢固和与世隔绝，以及全国政局不稳的言论。比如在关于阿富汗国内形势的报道中重点放在“意见分歧”，“残酷的派系斗争”，“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内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内矛盾增长”，“军队和国家机构

组织涣散”，等等。因此西方报刊最近散布关于阿富汗政府领导可能很快易人的谣言。“俄国人在寻找能改善这个绝望的国家的精神状态和听从莫斯科指示的更合适的活动家”。

重申所有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都严厉批评今日阿富汗发生的事件。“他们不希望这个国家的局势按古巴模式正常化，不希望把这个国家变成苏联影响和向中亚渗透的主要前哨阵地”。除了想统治世界的俄罗斯人的强盗政府及其仆从国外，任何国家，无论是邻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支持现政体。因此从这一点来看要继续完全孤立它”。（摘自“为阿富汗的信仰而斗争阵线”的信）

差不多在所有反阿富汗的宣传材料中每天都重复所谓可靠来源的报道，未完全证实的消息或根据叛乱分子中目击者的讲述，关于反政府武装的成绩和反阿富汗和苏联成功战役的报道，关于地方政权机关涣散以及他们不能控制局势的报道。“喀布尔周围的圣战圈在缩小”。“在 16 个省内俄罗斯傀儡的军队已被击溃，阿富汗的伊斯兰革命在上帝保佑下即将到来，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一样，一定能取得彻底胜利”，等等。作为这类谎言的例子可引用法国报刊关于“阿富汗游击队好像占领了赫拉特市”的报道或 BBC 电台关于“战士们同苏联士兵作战”的不断重复的报道，以及“苏军人力物力损失惨重”的报道。

而且这些资料都精心挑选，以便给听众造成这样的印象：阿富汗国内政治形势越来越尖锐，政府危机的顶峰、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即将到来。系统地报道煽动性谣言：阿富汗各阶层居民越来越不满，反对现政权和苏联军队的有组织的斗争在扩大，逃亡人数在增加（“抗议周”）。法国的“蒙德”杂志称“阿富汗居民对现政权普遍不满，准备一有机会就暴动”。纽约《时代》证实“阿富汗儿童已加入抗议行列”。《华盛顿前哨》说“逃亡的人越来越多”，认为“到 1980 年底 1/10 的阿富汗人将成为逃亡者”。BBC 电台说“阿

富汗某卫戍区发生了暴动”。以伊斯兰教穆斯林党的名义今年6月在喀布尔散发的传单中说：“穆斯林弟兄们和爱国者们！不久全国人民将奋起反对苏联人和他们的傀儡。”“一小撮不负责任的行政官僚和军事官僚的末日已经到了。”“敌人完全淹没在人民中，军队是爱国的，反对俄国人。军队已没有组织性，敌人已不能控制军队。（《为阿富汗的信仰而斗争阵线》）

西方、特别是美国和英国，还有中国和巴基斯坦关于苏联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有限军队的职能和行动的宣传，用心十分险恶。最常见的有关提纲可归纳如下：“苏联军队不仅在阿富汗的军事方面起主导作用，在民事方面也起主导作用”。“苏联军队履行警察职能”。（美联社，新华社，“德国浪潮”广播电台）除了不堪一驳的毫无根据的杜撰以外，反苏反阿富汗宣传机关还常求助于历史研究命题，这样的资料不光出现在西方国家和与阿富汗毗邻国家的书市上。这些资料都是有意挑选的历史上的类似事件。“在前几个世纪沙皇俄国对中亚的侵略行径中，可以找到与现在在阿富汗发生的类似事件”（《苏联侵占下的阿富汗》）谈到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史时本书作者认为，俄罗斯人比他们的西欧同行更狡猾，因为他们没有像西欧同行那样搞殖民地，而是直截了当地把别人的土地称为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领土，把整个民族纳入俄罗斯帝国之内。这样，俄国殖民主义应该被认为是更残酷的，因为在这种殖民主义范围内实行的对被奴役民族的俄罗斯化，使它可以无限期地存在下去。书中写道，现在俄罗斯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惟一的殖民大国。许多年来俄罗斯不止一次地声明，俄罗斯外交的主要依据是力量和武器。最后，作者总结说，俄国共产主义的对外政策是沙皇制度对外政策派生出来的；俄罗斯一贯赞成阿富汗中立，支持阿富汗反对英国，等待适当时机自己来干涉阿富汗的内政。

攻击苏联在经济方面援助阿富汗的言论可归纳如下：

“苏联人掠夺阿富汗人民的民族资源。他们在阿富汗北部地区积极开采天然气，给予很低的补偿，自然引起居民的不满”（巴基斯坦）。“俄罗斯人用微不足道的价钱买去阿富汗的民族资源。对社会有害，对俄罗斯人有利的设计方案吞食了全部民族资本”（摘自《为阿富汗的信仰而斗争阵线》的信）。

除上述反阿富汗宣传内容或多或少相同的几项外，在题材方面还有一定的差别。

比如拿西方的，首先是美国的宣传来看，就应指出，所谓阿富汗问题依然是这样一个中心，即围绕阿富汗问题掀起反苏联、反社会主义的喧嚣，用于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为军备竞赛辩护，强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外政策方针。可以看出通过评论阿富汗事件批评苏联整个对外政策的企图。而且资产阶级宣传机关特别广泛地引用和解释卡特、泰勒及其他西方统治集团官方代表的声明，因此其中对苏联和阿富汗的攻击具有国家政策性质。

比如西方报刊都登载了今年6月25日美国国务院代表的评论。“美国不能接受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规定停止我国旨在改变该国政府性质的活动”。美国也在积极兜售其过渡协调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全部苏联军队都须撤离阿富汗，由穆斯林国家军队取而代之，因为后者能保证政权由苏联支持的巴勃拉克·卡尔迈勒政府过渡到新的领导集团。

“十年缓和白白过去。苏联对阿富汗的一次侵略行动，使一切成就化为乌有”。“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局势恶化的根本原因”。

至于中国的宣传，其主要方面集中在挑拨不结盟国家，特别是阿富汗的邻国对苏联对外政策战略宗旨的敌视和警觉。请看新华社一些典型的评论：“阿富汗事件是苏联对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入侵”。“对阿富汗公开军事占领以后人们清楚地看到，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根本不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而是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俄国人入侵阿富汗——这仅仅是苏联向南海推进总战略意图链条中的一环”。“苏联早已把古巴和越南当作进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武器，现在俄国人也想把阿富汗当作这样的武器”。“入侵阿富汗不仅使苏联失去其伊斯兰世界的盟友，也会使它面临失去不结盟运动中志同道合者以及使共产党进一步分裂的危险”。“苏联在历史上首次进攻一个不结盟国家，这无疑严重损害其声誉”。“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人，西欧、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坚决反对入侵阿富汗”。“由于向南扩张，俄罗斯已成为亚洲的主要危险。占领一个不结盟国家意味着苏联扩张侵略政策的新阶段。”“苏联政府是在步俄国沙皇19~20世纪之交在远东大国霸权主义行径的后尘”。

北京广播电台大力渲染一种论调，说阿富汗事件是缓和政策的破灭。在不久前新华社的一篇评论中说，“事件表明，缓和对苏联来说是束缚自己的手脚，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苏联可以把双手伸向四方，却禁止别人干涉，这就是社会帝国主义关于缓和的理论”。（《人民日报》）。

无论是北京还是西方的宣传机器，近来积极鼓动与阿富汗毗邻国家的反阿富汗、反苏联情绪，联合区域性的反阿富汗集团。在这方面特别明显的事例是挑拨伊朗。类似意向的论据如下。“伊朗可能成为苏联侵略的下一个牺牲者，因为苏联想波斯湾，未必能满足于阿富汗”。“俄国人今天的政策是促进了美国在亚洲腹地军备的升级。苏联驻军于阿富汗是美国在波斯湾地区集结海军的理由”。在上面提到的《苏联占领下的阿富汗》一书中作者把美国苏联学和北京的宣传结合在一起，发挥成以下的观点。“虽然巴基斯坦是俄国人去西亚高地路上的一把特殊的锁，但势单力薄，承受不起压力。在西南亚俄国人正制定涉及三个伊斯兰国家利益的战略计划：

经土耳其去地中海地区；经伊朗到世界能源储藏地；经巴基斯坦控制去南亚的战略门户”。为了鼓吹苏联侵略的谬论不惜使用各种谎言：新华社今年5月19日关于“据现有消息，苏联在苏联—伊朗边境配置了大量军队”的报道，伊朗右翼报刊关于借口保证苏联南部边境安全在苏联—伊朗边境建设入侵伊朗造成直接威胁的机场和其他军事设施的虚假报道，以及关于苏联空军为恫吓伊斯兰国家而侵犯伊朗领空的报道，巴基斯坦报刊关于苏联支持分裂主义分子自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领土去俾路支斯坦的报道。

西方和中国的宣传机器常常使用一些伊朗领导人，如伊朗外交部长戈特扎杰的反苏言论。

沙特阿拉伯、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宣传机关领导的伊斯兰和泛伊斯兰的宣传，其实质是把伊斯兰教用于反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斗争。

以防止共产主义渗入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捍卫伊斯兰教的纯洁、与共产主义互不相容为基础的伊斯兰团结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大多数资料之中。而且引人注目的是穆斯林国家在政策方面相互合作的具体措施。伊斯兰和泛伊斯兰的宣传号召根据在伊斯兰法典面前全体穆斯林人人平等的公理，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没有民族和地理界限的教义全体穆斯林团结一致。而实际上在伊斯兰宣传中赋予这种团结一致以反苏反共的思想。

特别强调苏联对穆斯林生活方式的军事和思想威胁，而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则比较温和，而且常常归咎于对西方道德风尚堕落的模模糊糊的谴责。欧洲伊斯兰理事会正式机关、在沙特阿拉伯大使领导下在英国出版的杂志《冲击》在确认国家沿伊斯兰道路发展性质方面起理论指导作用。

伊斯兰宣传的方法和论据总的来看不是独创的、新的。许多论点和术语都是来自西方的苏联学和报刊。但是题材和资料的挑选，

传播的速度和针对性，对穆斯林听众和读者的影响都说明这一宣传机构在反阿富汗运动中的特殊地位。穆斯林对阿富汗事件批评的矛头直指阿富汗现行体制，认为它与伊斯兰教精神相敌对，直指苏联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援助，认为这种援助毁掉了伊斯兰教传统，支持反革命，把反革命说成是为伊斯兰教的自由正义和纯洁而斗争的运动。

阿富汗地下反革命的活动实际上是和泛伊斯兰敌对宣传结合在一起的，不过在政策方面反革命的活动具有较实用的、具体的特点。通过对散发给居民的传单和广播的分析可以认为，除了广泛地激发反政府、反苏情绪外，在破坏性的宣传活动中越来越明显地采用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方针和组织原则，即：团结一切对现行制度不满的团体和个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向和反革命侨民组织的联合一切力量的意图相一致。

“只有依靠穆斯林居民的支持，只有在一定的领导集团帮助下，同市民地下团体和反对俄罗斯人的爱国军队一起战斗，我们的斗争才能胜利，才能消灭伊斯兰教的敌人，阿富汗荣誉和尊严的敌人”（《为阿富汗的信仰而斗争阵线》的信）。

今年6月在喀布尔散发的所谓“反抗运动组委会”的声明中有一些新的原则性观点：

只有具有科学的革命政治路线和坚强的经过考验的领导人的民族阵线才能保证民族运动的进步和胜利。

在全国领土上的积极斗争应该以小的、容易控制的、经过训练的小组为基础进行进攻性的游击战，注意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目标。夺取地区，没有足够的武器防守，只能带来不必要的牺牲……组建没有严密组织的数千人的队伍是遭受沉重打击的原因……最终还是引起悲观失望；

应该在俄国人所属企业机关中展开游行和罢工，通过组建坚强

的地下组织使敌人处于经济政治不稳定状态；

必须通过政治口号武装群众：无条件撤出苏联军队，成立有一切爱国力量参加的民族政府，举行一切不从属于外国的人的政治游行，等等。

这个声明中有一点具有特殊意义，它说明声明的作者想同阿富汗侨民组织划清界限，并指出他们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中的矛盾。

“团结一切组织、团体、阶层、爱国进步分子的民族阵线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国内独立的爱国立场……我国大多数人不知道，侨民是西方听话的仆从和无耻的盟友，他们不希望我国摆脱危机。他们站在一贯的政治立场上，认为我国是角逐场，想在世界舞台上从中为自己捞取好处。他们依靠美元和英镑，鼓吹最落后、最反动的观点。实际上他们不能领导运动”。

这份传单中还有一点指出，部分地下反革命分子开始认识到，居民对伊斯兰教旗帜下的恐怖战术越来越不满。“伊斯兰教谴责掠夺、自相残杀……伊斯兰教不准焚烧学校，枪杀祖国的知识分子、青年男女学生”。

但是，许多反政府传单却保有极端主义性质，号召直接参加恐怖行动和罢工，用迫害来威胁不响应罢工号召的商人、职员、工人。这些材料尽管披着伊斯兰教的宗教外衣，却带有明显的美国或中国烙印。近来，大量传单的术语和特点越来越说明他们的作者是受伊朗（确切地说是霍梅尼）影响的人。

想激发穆斯林居民对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共产主义思想的敌视，是反革命宣传的重要方针。

总之，尽管散发传单的组织各种各样，但传单的内容有许多共同之外。列举其中几种如下：1. 重点放在号召联合和团结所有大大小小抵抗团体、所有民族、社会阶层、阶级，不分性别、宗教信仰（不过指的是逊尼派教徒和什叶派教徒）和年龄。



2. 积极宣传穆斯林口号“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死！”。到处都有天堂。号召人民在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中自我牺牲。

3. 用于瓦解阿富汗军队的传单有以下特点：

1) 对士兵

“让俄国人去打仗，阿富汗士兵各回各家。人民已起来反抗，而你却无所事事。祖国的命运取决于你。全体人民，妇女、男人和儿童，把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现在只有你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全世界都在看着你。和背叛行为决裂吧！”

2) 对军官

“你在你的脖子上要套上多少罪孽？你保卫屠杀你父母和孩子的血腥的俄国士兵的卫戍区要保卫到什么时候？你怎么能忍受镇压阿富汗人的俄国坦克的轰隆声？！你怎么能忍受你妻子和姐妹的哭泣声？！非常遗憾，你在保卫没良心的政府，你听不到人民的呻吟声。我们最后一次告诉你，人民的自由或被奴役取决于你”。

3) 对全军

“你们只有两条路：或者永生，或者死亡”。

“和我们一起战斗的人，真主永远和他在一起！”

地下组织印刷的传单一般言简意赅，思想内容是无可争辩的信条和现成的结论，常引用古兰经中的教条。传单一般以古兰经引文开始，而引文常常同传单内容没有意义上的联系，以下面这样的口号结束：“团结万岁！”“打倒苏联人的奴才巴勃拉克！”“用自己的鲜血洗刷污点！”“死亡或自由！”等等。传单的署名一般是各种组织的名称或者就写着：伊斯兰教弟兄。传单大多数是手写后复印的。少部分是在印刷厂印制的。最近的传单基本上是彩色是的、大尺寸的、有政治漫画或领导人的相片。

每天在居民中传播谣言是地下组织宣传很有影响的渠道。这些谣言一般都把空想出来的事实附在印刷的反革命材料上，或者具有

教唆性质。

根据以上所述，同苏联大使馆、党的顾问团和苏联其他代办处一起采取实际措施，揭露反阿富汗宣传，使阿富汗居民团结在卡尔迈勒领导的政府周围。

在报刊、广播电视和群众政治工作中展开四月革命成就的宣传，具体说明革命给阿富汗各阶层带来了什么。

定期刊登和广播揭示阿富汗—苏联合作成果，苏联对阿富汗的无私援助的材料。

自“马尔斯”站投入使用以来，在阿富汗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有效地利用《时代》的反宣传材料。

同时印刷了文章和评论，出版了传单，揭露反革命及其领导人的罪行，他们同美国、埃及、中国特工站和反动的阿拉伯政体的联系。

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各部部长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省委苏联党的顾问会议上，以及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宣传单位领导人和书记会议上同党的顾问团领导人格列科夫同志一起讨论了加强反宣传问题。

召开了巴赫塔尔通讯社各省通讯员讨论会。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有一个教学组在培养政治评论员。

№06121

## 科尔尼延科同弗罗曼—麦里斯的谈话纪要

(1980年7月11日)

摘自科尔尼延科的日记

应大使<sup>①</sup>的请求我接见了她。

大使是从他对苏共中央1980年6月23日全会决议中关于“缓和是世界舞台上近十年来形成的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的论点从理论观点感兴趣开始的。大使问，这是否意味着，根据苏联的看法如果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缓和将成为不可能？

我说，无论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如何，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一贯主张和平共处，通过和平竞赛、思想斗争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纠纷，而不诉诸武力。苏维埃政权从建立的最初开始就明确规定了这条路线。但是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并不准备和平共处。

恰恰是苏联一贯主张缓和，而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在确信同我国空谈力量徒劳无益时，才走向缓和。因此大使提出的苏共中央全会决议中的论点反映了一种客观事实，即只是由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出现了战略的力量平衡，缓和才成为实际可能。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苏联在取得大致平衡以后，不想在军事上争优势。关于缓和和力量平衡的关系问

---

<sup>①</sup> 指法国驻苏大使弗罗曼—麦里斯。

题，大致和缓和可分或不可分问题一样。苏联一贯主张把缓和推广地球上各地区，赋予缓和以全球性。正因为如此，才根据我们的建议把相应的条款纳入联合国的最后文件。我们对这一点的立场依然未变。但这决不是说，由于某一地区紧张就否定保持全局缓和的可能。不应忘记，比如当苏联和法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积极贯彻执行缓和政策时，在越南进行着流血的战争。当苏联接待尼可松，签订战略武器协议，总之，大做缓和工作时，美国炸弹却在越南狂轰滥炸。这一事例说明，不能把缓和可分或不可分的概念绝对化起来。

弗罗曼-麦里斯提示说，法国对美国在越南的行为持批评态度，相比之下，法国现在认为，苏联在阿富汗的行为是对缓和的打击。

我说，当然，我们看到阿富汗及其周边国际形成的形势，不利于缓和的巩固和扩大。问题在于，由于其他国家采取了同缓和直接矛盾的行动，我们才在阿富汗不得不采取行动。所以关于国际局势恶化的起因我们在观点上是有分歧的。

弗罗曼-麦里斯对这一点表示同意。大使说，法国认为不久前关于从阿富汗撤出部分苏联军队的决定是正确的措施，是向正确方向迈进一步。他问道，你们认为以后形势的发展将如何？为了促进法国政府和苏联政府都赞同的政治协调而应采取的那些措施怎么办？他继续问道，最近同法国人交换几次意见是否使苏联方面产生了新的想法？

我回答说，现在阿富汗的形势略有好转。首先是巴基斯坦派过来的大股匪徒已被击溃。这就使我们有可能略减我军驻阿富汗的人数。

至于以后的政治协调措施，我们认为有一种办法，关于这种办法在华沙会谈时及以后都向法国人讲过。这就是使阿富汗同其邻国，首先是同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关系正常化，因为对阿富汗民主共

和国人民和政府的现实威胁来自这两个国家。今年5月，阿富汗政府已阐明自己的立场，就是开始谈判，谈判的目的为保证停止干涉阿富汗的内政。在有些国家做出相应保证条件下出现的正常化的现实，就会使阿富汗政府认识到，苏联军队驻防阿富汗不是必要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必须实施所有政治协调措施，然后再开始谈撤出苏联军队。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综合起来研究和解决，即在政治协调过程中研究和解决。

弗罗曼-麦里斯问道，所谈的苏联的办法是不是讨论有关问题的一种平行办法，即一方面讨论政治协调问题；另一方面讨论撤出苏联军队问题。

我说，当我们谈“综合”政治协调时，这就是说撤出苏联军队同停止干涉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内政，保证不恢复干涉，具有有机联系。而“平行论”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两种行为似乎彼此没有联系。

指出苏联的政治协调办法中明确了当事人（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其他一些被请来做担保的国家）以后，大使问道，关于撤出苏联军队问题的讨论采取何种具体形式，何人参加讨论？

我说，当事人应根据每个具体问题来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如果需要谈这些国家停止干涉阿富汗内政的话。至于在阿富汗的苏联军队，他们是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在那里驻防的。因此，当他们不需要在那里驻防时，从阿富汗撤出的问题应当由苏联和阿富汗解决。

大使问道，如果撤军问题只具有双边性质，那么那些被请来在政治调解范围内做担保的国家对苏联军队可能返回阿富汗有什么保证？

我说，如果来谈类似的假设论，协调实际上就成为不可能的。实际上如果这样假设，那么不禁要问，苏联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能

得到什么保证，比如来自巴基斯坦领土的侵略行径不再发生。应当从实际出发，遵循政治现实主义，不要创造假设的情况。

弗罗曼-麦里斯问道，伊斯兰代表会议组建的“三人委员会”和有关各方的接触能否促进政治协调？

我说，这个办法从一开始看来就是没有前途的，不现实的。因为上述委员会是在不承认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现政府的基础上成立的。众所周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已声明准备同该委员会委员个人会谈，而不同赋予一定全权的那样的委员会会谈。而且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想知道，这些先生们有没有一些现实主义精神，是否准备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但是委员会的先生却认为，与其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接触，不如组织一场有阿富汗暴乱分子参加的闹剧。我们认为，委员会的“三人”今后的活动也是没有前途的。

大使悲观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差不多所有通向协调的道路在他看来都被堵塞了。无论伊朗或巴基斯坦都不想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五月建议中提出的道路。同委员会接触的方案也是不现实的。

我说，我们相信政治协调之路，并等待总有一天路上的障碍会被清除。在目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们不是消极地等待。苏联在这方面仍继续做工作。我们决不放弃说服该参加同阿富汗正进行直接谈判的各方需要进行合理的政治协调的尝试。特别是同巴基斯坦在继续接触。如果法国能利用自己的条件，把应走现实之路的哪一方推上现实之路，那就好了。

弗罗曼-麦里斯接着提到了中射程火箭问题。他说，因为法国不参加讨论这一问题，所以在这方面他没有特别的信息。他问道，如何解释苏联方面关于准备把研究中程核武器问题同研究美国的先进基地核设施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声明。

我向对方解释说，这种提法，是指研究中程火箭核武器和美国

的先进基地和设施不是简单地平行地研究，而是互相联系的研究。实际上，不仅中程火箭，而且在射程方面次于中程火箭的美国的先进基地和设施都能达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因此，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密切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根据法国大使馆顾问不久前同近东部副主任的会谈，大使对苏联方面对“九国”关于近东的声明的批评（他认为）表示惊奇。大使希望认真对待他认为含有重要论点的文件。而且他强调了这样几点：如“九国”准备参加提供具体的担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建议各有关方面，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谈判。当然，在声明中法国的立场不是百分之百地得到反映，但按照这一倡议西欧其他国家接近了法国的立场。

我回答说，我们对“九国”声明的态度可用一句谚语来表达：“大山生了一只小老鼠”。这样说是我们不想说，通过这一文件事实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但很遗憾，西欧国家的立场没有像一些人期待的走得那么远。连法国的立场也没有得到完全的反映。大家也都知道，在阿拉伯世界，由于华盛顿先发制人的强硬立场“九国”声明被认为是软弱无力的。

弗罗曼-麦里斯问道，勃列日涅夫不久前呼吁恢复集体协调近东危机后，特别是联合国大会拟召开巴勒斯坦问题特别会议之际，苏联方面关于推动协调的新的可能性有没有什么打算。

我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即“九国”宣言不能使通过集体努力解决近东问题的可能性到来得更快。我说，我们在继续考虑近东问题，并准备继续就这一问题同法国方面交换意见。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 科尔尼延科

№06142

## 舒米洛夫同阿布尔·法兹尔的谈话纪要

（1980年11月4日）

摘自 O.M. 舒米洛夫日记

1980年11月12日

根据委托我应阿布尔·法兹尔<sup>①</sup>的要求接见他。

巴基斯坦人要求告知他卡尔迈勒正式访问苏联时苏联—阿富汗谈判的实质内容。

在谈话过程中我叙述了苏联—阿富汗高级会谈的主要内容，强调必须通过协商，首先是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和巴基斯坦的协商，对在阿富汗周围形成的局势进行政治协调。

我指出，双方都同意根据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今年5月14日的建议对由于阿富汗形成的局势进行协调。协调规定，首先通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协商停止外部入侵。这既符合阿富汗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巴基斯坦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巩固区域和平的任务。

我表示，希望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拖入反阿富汗破坏活动的阿富汗的邻国，首先是巴基斯坦能明白干涉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内政，是不会有结果的，是没有前途的。阿富汗的革命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任何迫使阿富汗人民如何建设自己生活的企图都将遭到拒绝。

在谈话过程中我强调，巴基斯坦没有理由认为民主阿富汗会对

---

<sup>①</sup> 阿布尔·法兹尔，巴基斯坦驻苏临时代办。



它构成威胁。停止自巴基斯坦领土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事务的干涉是政治协调的现实的步骤。在苏联—阿富汗谈判过程中已确认，苏联从阿富汗领土撤军的时间可在政治协调文件中加以规定；在保证停止外部入侵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以后。

接着我说，谈判时阿富汗领导人通知了苏方他们加强同外部干涉和反革命作斗争所采取的措施；实施旨在使社会经济生活民主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消灭剥削和落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阿富汗人民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对革命政权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所实行的社会经济改造越来越信任。

双方对苏联—阿富汗关系的现状表示满意，并宣称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种关系。

我方宣称，苏联人民今后将加强同阿富汗人民的团结，给予国际主义援助，扩大并完善全面的合作。

阿布尔·法兹尔回答说，巴基斯坦非常愿意协调同邻国的关系，特别是由于在巴基斯坦领土上有许多阿富汗难民。阿布尔·法兹尔说，巴基斯坦正在努力恢复政治局势，特别是伊斯兰代表会议的例会。另一位参加谈判的人指出，协调区域政治局势的重要部分是自阿富汗撤出外国军队。巴基斯坦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结果。他总结说，现在期望联合国能对阿富汗问题做出正确解决。正确解决阿富汗问题应包括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及为阿富汗难民返回祖国创造必要条件。

我向阿布尔·法兹尔指出他反对在阿富汗保留一定数量苏联军队的观点，并强调，只有阿富汗—巴基斯坦双方直接谈判并保证停止自巴基斯坦领对阿富汗事务的干涉才能达到政治解决。

中东国家司副司长 O. 舒米洛夫

## 【专题说明】

# 苏联与古巴的关系

(1979年2月至1981年12月)

加勒比海西部的古巴共和国，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国，距美国的佛罗达州仅180公里，古巴东南沿海的关塔那摩，自1903年以来，一直被美国租为海军基地。然而，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以后，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采取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针，并与苏联建立了密切关系，这无疑使美国感到不安。1961年美国对古巴的武装入侵和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实际上反映出美苏的冷战战场已经扩大到拉丁美洲地区。由于地理的原因，苏联和古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美、古的三角关系，以及苏联对拉丁美洲政策。因此，苏联和古巴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

本专题选编的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苏联与古巴之间外交接触，以及有关美古关系情报的文件，共29份。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许洪声、刁绍华、侯育成、张寰海、王鹏、赵静男翻译)

№06023

## 沃罗特尼科夫同罗德里格斯的谈话纪要

(1979年2月12日)

机密

摘自沃罗特尼科夫日记

拜会了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德里格斯<sup>①</sup>，受托对他说，苏共中央想以秘密方式向古巴领导人通报就勃列日涅夫同志和美国总统卡特即将在维也纳举行的会晤中我们的基本立场。

罗德里格斯感谢（给他们提供了）“非常重要和有益的情报”，并答应立即将此情报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报告。

他强调说，古巴完全支持并赞同我们拟在同美国总统会晤中所持的原则立场。

罗德里格斯注意到，今天引起全世界公众，特别是美国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与签署限制战略武器第2号条约有关的问题。罗德里格斯继续说，在美国参议院审准条约过程中最关心的人便是国家总统本人，因为正确解决该问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其威信，无论是在国会，还是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

罗德里格斯注意到，不久前布热津斯基讲话的平和与温和态度，及其中所表示的“和平腔调”。他发觉，这个讲话旨在某种程度上安抚国内公众舆论，舆论普遍支持国会批准限制战略武器第2

---

<sup>①</sup> 卡洛斯·拉菲尔·罗德里格斯，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副主席。

号条约，尽管不应该排出在美国国会和报刊中的激烈辩论和煽动性讲话。

他强调指出，苏联在即将举行的同美国总统的会晤中所持的原则立场及其行动，均符合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切身利益。

罗德里格斯在回答我提出的他如何评价不结盟国家协调科伦坡会议的成果时说，在这方面应该指出三点：

1. 古巴方面把斯里兰卡会议总结看做是一次重大的胜利。今天可以肯定地说，各种各样使第六次高级会议延期或改换开会地点的企图遭到彻底失败。在科伦坡重申会议要召开，而且就在今年9月，在哈瓦那召开。

2. 在科伦坡还留下关于埃及在不结盟运动中的成员国资格及邀请柬埔寨参加高级会议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将在哈瓦那高级会晤时最终解决。

罗德里格斯说，在埃及的成员国资格问题上，伊拉克和利比亚最坚决主张把埃及开除出不结盟国家运动。阿尔及利亚人则借口该问题的复杂性，认为现阶段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埃及开除出不结盟国家运动。一些阿拉伯国家未发表明确的立场。该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下将由非洲国家在哈瓦那会议上的立场来确定。

从同罗德里格斯的谈话中可以理解到，古巴不会参加争取将埃及开除出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公开斗争，最终解决将取决于会议上的具体情况。

关于柬埔寨在第六次不结盟国家运动会议的代表资格，古巴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柬埔寨人在哈瓦那会晤时缺席，尽管古巴已向金边发出正式邀请（斯里兰卡邀请了柬埔寨驻联合国代表参加科伦坡会议）。

3. 罗德里格斯宣布，这是最困难的一点。这里说的是，在讨论由斯里兰卡准备的并且南斯拉夫支持的最后文件时，古巴和南斯

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对一系列原则性提法的不同观点重新暴露出来。文件中强调了运动的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但其中还保留南斯拉夫人关于不结盟国家运动的不结盟政策和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著名提法，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的观点。南斯拉夫人在哈瓦那会议上还要竭力推行自己的路线。古巴必须在高级会晤时反对南斯拉夫的论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不结盟国家不想参与到同南斯拉夫的这一冲突中去，因为他们担心会把自己归入“苏联集团”。正如罗德里格斯所认为的那样，在不结盟国家运动中在该问题上支持古巴立场的暂时是少数。

在会谈结束时罗德里格斯说，在来莫斯科参加经互会成立30周年活动期间，他想详尽地向苏联领导人通报哈瓦那会议的筹备进程。他表示愿意会见苏斯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和鲁萨科夫同志。罗德里格斯强调说：“我们需要苏联朋友的建议和帮助”。

苏联驻古巴大使 B. 沃罗特尼科夫（签字）

№06040

## 苏驻古巴大使馆关于美国和 古巴关系给国内的报告

(不早于 1979 年 4 月)

机密：№1

### 古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及可能出现的后果

近些年来，古巴和美国关系的发展特点是：两国对许多国际问题（非洲的一些事件；古巴在不结盟运动中威信和影响的生长；它积极支持全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与运动）的立场观点冲突较大，其结果使两国关系是不止一次地更加紧张起来。

不久前发生的苏联军人出现在古巴，以及美国海军在关塔那摩基地的登陆演习等事件，就是这种紧张关系的最新例证。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事实表明，不久前发生的冲突，虽然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复杂化起来，但是并没有使之终止。因此，不应该地把这些都看成是美国又回到全面对抗古巴的政策上来。正在履行早已达成的协议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属于这类协议的，如在古巴有 3600 名政治犯获释，其中包括因从事反对古巴安全活动而被判刑的一些美国公民；迁居美国的古巴人回来与家人团聚，以及在古巴有亲属关系的移民回古巴观光等。

至于说美国，也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步骤以促使两国间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美国的特工机关能预先通知古巴有关已定居美国，旨在反对古巴的古巴反革命组织所进行的一些挑衅活动，逮捕法办了

其组织的一些积极成员。美国政府允许古巴的官方机构在美国银行开户，允许一家每3个月一次汇往古巴500美元和每人出境可带价值100比索的古巴商品。

近些年来，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们，访问过古巴之后，都不止一次地非公开地通报给古巴领导人，说美国就同古巴的关系上采取的个别不友好行动并不带有原则性，其目的是为了反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那些美国有影响的阶层安静下来。重新审查美国所实施古巴政策的前提。主要在于，60年代初，美国制定在经济上封锁古巴政策的有效性。随着古巴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的发展和深入，在一直不断地减弱。在很大程度上，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极力想利用美国中断同古巴的传统经济联系这一时机，把古巴当成新的销售市场和原料的补充产地。发达国家的这种态度也同样促使美国重新审查对古巴的政策。

继续实施孤立古巴的政策，以及给古巴施加直接压力的做法是毫无前途的，这一认识决定了美国在尽力削弱古巴同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的关系上寻求新的方式和方法。

古巴在革命之前国内就确定对美国设备的零件、配件、原料和材料十分有兴趣，利用这一点美国就预见到对古巴进行新经济渗透，以及使自己的地位在古巴能逐渐得以巩固的可能。

使美国同样产生一定希望的就是，古巴有些居民崇拜美国的日常生活用品，这样通过广泛供应日常生活用品的途径，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可以用来影响其国内的舆论。

同古巴关系的正常化，其中包括，特别是交换信息，发展科技、文化、体育以及其他等联系，扩大美国人的旅游规模，在这里应注意的是国家巨额的外汇欠款。人们对古巴都非常感兴趣，美国把它看成是思想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渠道。

古巴侨民大规模地回国观赏、会见亲友<sup>①</sup>，则是这方面十分典型的经验。

这给古巴带来了明显的物质利益，其表现形式是从古巴的社团成员身上获取了巨额的外汇收入。根据初步估计，从1979年的1月起至4月止其数额可达1亿美元<sup>②</sup>。与此同时，在国内某些居民对物质生活状况不满情绪明显加重，这表现在，例如请求允许出国同家人团聚的申请书数量剧增，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增多，还有一些其他的形式等。

除此之外，国内的宣传机关和大多数居民在意识上都长期把“侨民”这一术语同叛徒、反爱国主义者的概念联想在一起；对国家在这一问题的政策迅速变化显得政治和思想上都毫无准备，这就不能不在人民中间引起一定程度的张皇失措以及对目前所发生变化的实质的解释有抵触情绪。

从另一方面说，发展同在美国的古巴社团的联系，会加速对其统一的冲击。对美国政府来说，来自古巴侨民一方的压力已在加大，因为，他们不是支持，就是反对同古巴的关系正常化。最近，在其追随者中有一派在积极活动，情绪极其急进，其成员主要都是青年，他们表示赞成返回祖国。然而，古巴方面关心的是在侨民中间发展对古巴有利的倾向，暂时还不能发允许回国的证件，理由是，例如志愿者必须证明回国后拥护新的社会制度，并在美国以行动证明积极拥护古巴。

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不能把古巴看成是发展关系正常化的积极参与者。不过，在我们看来，目前它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并不十分

---

① 从1979年1~3月，回古巴的有两万人，而全年则有10万人。

② 这种费用的估算是：住旅馆的费用和饮食费，不管怎么使用每人每昼夜都得用掉45~50美元，在日常生活用品商店的专卖部按议价购物，包括为住在古巴的亲属购置耐用消费品以及汇款等。



坚定，因为，在其国内的政治生活中正孕育着复杂化的可能。由此应严肃认真地提出一项任务；刻不容缓地纠正和加强在广大群众中宣传工作的有关方针，对古巴发展它同美国的关系来说，意识形态的影响，归根到底是国内的政治影响，多数都取决于宣传工作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再则，在经济领域里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景和可能后果，古巴估计得相当实际。根据相互都有利的原则重新恢复经济联系，双方都不止一次地确认这种关系是正确的，可是古巴不打算发展这种联系去损害它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这里不涉及社会主义友好国家。

第一，这里的前提是希望对资本主义市场的策略有自由。

第二，古巴想要向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演示，古巴并没有忘记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之后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当时，这些国家的许多公司都没有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第三，所以这一点看来是主要的，国内都非常了解，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中，某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重（特别是购置机器和配套设备时）长期地过大，就会造成在技术工业和标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方面对其依赖程度的增大。在这方面结果是同美国的关系完全破裂，虽然革命前它在古巴对外经济联系的总体上都起过一定的作用，这种结果不仅不能忘记，而且在确定古巴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联系的地缘结构时还应该经常加以注意。正是这点就说明了，古巴不止一次地认定，对它来说已认识到依赖某一国家供应配件、原料、物资及其他等所花费的代价，要比商品的代价高得多。古巴在英国和法国等收购了很多机器和设备，价格比日本同类商品要高15~25%。

美国某些工商界对恢复同古巴的贸易联系产生兴趣，不只是因为可能使用古巴的市场，而且还可以在美国市场上保证销售许多古

巴的商品。譬如包括镍、海产品、烟草、烟叶制品、蜂蜜、罗姆酒、柑橘类和其他鲜水果、鲜蔬菜、糖和糖浆等。进口古巴柑橘类的好处是离市场近，因而能节约运费，另外，佛罗里达的柑橘种植场定期地遭受霜冻，毁坏果实收成，古巴可以保证这里不再受损失。

最后，根据古巴某些柑橘类的竞争能力不高，指望他们的出口价格能低。美国收购古巴糖，每年大概不超过20万~30万吨，这是由于原有的生产和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规模决定的。

根据对未来经济关系双方都能接受的形式问题的初步讨论，不排除给古巴提供贷款的可能。但是，贷款的必须条件，最好还是像美国提出的恢复商品交换那样，古巴一方应支付美国资产国有化费用。古巴方面表示已准备好执行这一条件，因为，原则上它从来也没有拒绝过。关于这一讯息，一方面美国认为还是一种证明：古巴严肃认真地打算使双方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激起在该国内过去的资本存储者千方百计地利用已形成的局势以便施加压力。结果向古巴要求索赔的余额开始迅速地增加，最后达到25亿~30亿美元。对此的反应是由于封锁、破坏活动、秘密外运各种贵重物品以及其他等给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损失，古巴反索赔30亿美元。然而，照这样就此问题互相交换意见的结果是各方原则上同意美国资产国有化的实际价值应根据革命前夕的估定，最后确定其价值在7.5亿~10亿美元的范围之内。

从自己一方，古巴同意赔偿，同时也提出事先完全取消封锁的要求。

目前，实施这一条件对美国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近些年来这一封锁实质已有很大变化，譬如：进入古巴港口的第三国船舰已多年不受制裁（禁止访问美国港口），允许许多美国公司在其他国家的分公司将自己的产品出售给古巴以及其他等等。实际上，经

济封锁只不过变成双方之间都失去了经济联系，恢复这种联系，实际上就标志着封锁已经彻底地被清除。

因此，美国 and 古巴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毫无疑问互相都有利，不过，发展这一过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其期限也会有自己的限度的。

在美国当前的总统选举之前，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指望这种关系实质上肯定会有什么新进展，何况社会舆论就此问题正提出种种责问，这已证明，美国的选民平均有半数左右是反对在外交上承认古巴的。

除上述所指事实之外，所指定的范围还确定古巴感兴趣的是扩大同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经济和科技合作的规模，发展和该国加强参与到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体系中去。

后者说的主要是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可以实现这种合作（贷款、价格、协调计划以及其他等）。

同美国恢复经济联系会引起古巴从根本上改变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摆脱其市场的方针，特别应注意的是它拖欠他们巨额欠款，这是在编制计划和研制与预测国家经济发展远景时不能不加以着重考虑的问题。

古巴事先没有进行全面准备，就在非经济领域里发展同美国的关系，那么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遇到严重的问题。

（签名）<sup>①</sup>

---

<sup>①</sup> 签名字迹不清。

№06018

## 马纳索夫同李善义的谈话纪要

(1979年4月10日)

机密

摘自马纳索夫日记

应大使的请求接见了<sup>①</sup>。他说，由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特前来辞行，并对苏联大使馆领事处工作人员尽快满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来访请求表示谢意。

李善义通报说，他打算在回北京途经莫斯科时，作为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客人在那里逗留几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古巴大使馆的一秘任临时代办；这位中国人说，新任大使尚未任命。

在谈话过程中他谈到了中国国内形势问题。用大使的话说，“四人帮”给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他接着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措施，其中包括提高公社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城市中开始建筑住宅；大、中、小学的教学大纲得到调整。这时（这位）中国人指出，国家边境地区职工的工资比其他地方的高。大使认定，从1959年起中国食品的价格一直未变。他说，提高生活水平的措施受到国内居民的热烈欢迎。

<sup>①</sup>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古巴大使李善义（音译）。

大使说，目前注意力主要集中到工业、农业现代化和发展科学上面。

我向大使介绍了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他兴致勃勃地倾听我的讲话后说：“我们是邻居，我们有漫长的共同边界，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使用的河流。一些民族居住在边界两侧——这些都是睦邻友好的客观因素。”

在回答“您如何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延长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决定？”问题时，大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即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没有必要将该条约延期。

我向大使阐述了人所共知的苏联政府声明的内容。

这位中国人聚精会神地倾听我的话后，改换了话题，并开始对苏联古巴合作现状，特别是外贸总额及古巴购买苏联石油和古巴向苏联出售糖的价格感兴趣。这时，这位中国人显得消息灵通，熟悉情况。我在已经公布的数据资料范围内回答了他的问题。

大使问：“古巴在苏联的帮助下建了许多企业吧？”我回答说，这要比我们在中国建的200个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少得多，然后列举了一些出名的苏古合作项目。

他对古巴工业、农业（包括畜牧业）的发展颇感兴趣。我对他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均包括在何塞·马蒂计划委员会主席乌·佩雷斯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会议的讲话中及他在不久前答《流浪者》杂志记者问中。

大使自己提议谈谈中国的外交政策，他说，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日本签订了和约，整顿了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日条约性质的意见，大使说：“该文件并不是针对第三国的。”

他回避了有关越南的话题，仅限于指出不久将在河内开始谈

判，在谈判过程中将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告别时大使说：“我们两国之间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进行着贸易，有定期的铁路和空中联系，但是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存在着应当解决的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是两个伟大的邻邦，理应和睦友好相处，我想将来会实现的。”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临时代办 马纳索夫（签字）

№06148

## 马纳索夫同塞·盖拉·伊达尔戈的 谈话纪要

(1979年4月14日)

机密

摘自 M.A. 马纳索夫日记

我参加了在这里休养的苏共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小组同塞·盖拉<sup>①</sup>的谈话。在谈话过程中他详细叙述了古巴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谈了在改善党的社会成分方面所面临的任务。

盖拉同志通报说，现在古巴共产党队伍共计 333101 人；其中正式党员 278185 人，候补党员 54916 人。共有 22000 个基层党组织，689 个党委会，169 个市委会，和 14 个省委会。

由于进行了改善党的主要成分工作，党和工人成分明显增加，现在占 44.2%。依次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26.2%，技术员、工程师、教师、医生——13.9%，党的工作人员——1.3%，其他——4.8%（这些数字不包括内务部和革命武装部队的党员）。

盖拉说，党组织所面临的任务是，首先接纳在物质生产领域工作的人员入党，用工人和农民充实古巴共产党的队伍。

他指出，在进一步提高共产党党员的普通教育和文化水平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还有许多工作

---

<sup>①</sup> 塞昆迪诺·盖拉·伊达尔戈，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党中央办公厅主任。

要做。党的普通教育水平如下：初等教育（6 年级）占 39.3%；不完全中等教育（9 年级）占 30.4%；中等教育（12 年级）占 12.6%，未完成初等教育（6 年级以下）占 11.6%；高等教育占 6.1%。

党的年龄构成：27 岁以下占 3.2%；27～35 岁占 40.6%；36～45 岁占 32.6%；46～55 岁占 14.9%；55 岁以上占 8.7%。

在共产党的队伍内男性占 82.9%，女性占 17.1%（包括军人同志）。

盖拉同志详细介绍了国内群众性社会组织以及古巴共产党对其领导的情况，并提供了关于上述组织人员构成的一系列数字资料。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共计有 444552 人，大学生联合会——63000 人，何塞·马蒂少先队组织联合 210 多万个孩子，即占有所有学生的 99.4%。

（古巴）工人中央工会会员共计 2274979 人。共有 18 个行业工会和近 45000 个基层工会组织。国内有 34 名全国劳动英雄。

古巴妇女联合会包括 2312472 人，占全国妇女总数的 81%。古巴妇联约有 50000 个基层组织。

保卫革命委员会联合了全国几乎所有的成年人，成员总数 5149945 人，其中妇女占 50%。

全国小农协会共有会员 202520 人，其中 147502 人为个体土地所有者，而其他会员为其家属。

在谈话结束时盖拉通报了有关定于 1980 年末举行的共产党“二大”的筹备工作情况。他指出，目前党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到检查古巴共产党“一大”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和方法上来。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大使馆参赞 E.И. 格罗穆什金同志。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临时代办 M. 马纳索夫（签字）



№06019

## 马纳索夫同伊·马尔米耶尔卡·佩奥利的 谈话纪要

(1979年4月24日)

机密

摘自马纳索夫日记

拜会古巴外交部长伊·马尔米耶尔卡同志后，根据委托请求以秘密方式向古巴领导人通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志访问叙利亚的情况。

伊·马尔米耶尔卡感谢通报，指出，“该情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和有益的。”

他强调，在阿拉伯国家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会议前夕并非偶然进行的这次访问有重大意义。伊·马尔米耶尔卡说，首先这次访问像苏联方面正确评价的那样，有助于叙利亚领导人在反对帝国主义在近东阴谋的斗争中树立更大的信心和决心，这从叙利亚在巴格达会议的立场上得到反映。

葛罗米柯同志的访问无疑对巴格达会议决议的性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对埃及的政治和经济制裁大大削弱埃及的立场，并可能使其在阿拉伯世界完全孤立。

因此，伊·马尔米耶尔卡通报说，一些阿拉伯国家驻古巴大使在同他谈话中提出了关于将埃及开除出不结盟运动，或者不让它出席即将在哈瓦那召开的会议的可能性问题，提出该问题的理由是埃

及同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军事勾结。

谈到叙利亚同伊拉克的接近时，部长说，在两国之间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包括领土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可能促进他们的联合。他接着说，在这种条件下叙利亚和伊拉克首先应该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层内达到行动的统一。他说，依我之见，葛罗米柯同志的访问在这方面来说是积极的，因为它促使叙利亚和伊拉克更严肃认真地对待加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层内的团结问题。

伊·马尔米耶尔卡同志强调，苏联对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条约的评价与古巴完全一致。这在菲·卡斯特罗致阿萨德的公开信（回信）中得到阐述。

根据部长本人的提议谈到中国侵略越南问题。就此他通报说，越南方面不赞成古巴关于在即将召开的哈瓦那会议通过专门谴责中国侵略的决议。伊·马尔米耶尔卡说，越南人答复我们说，通过该决议未必适宜，因为条件尚不成熟。部长指出，我们古巴人总不能比越南人更越南人。他继续说，看来越南人对中国过于小心谨慎；他们甚至在遭到侵略时尚未中断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部长不赞成柬埔寨通过越南向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递交关于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派驻该组织代表处的信件。伊·马尔米耶尔卡同志说，我想在这段时间内完全可以选出一个人，并派他当柬埔寨驻联合国的合法代表。

在谈话结束时我向部长转交几期《消息报》，这些报纸上报道了各国驻苏联大使递交国书的消息。

伊·马尔米耶尔卡对我们登载新任大使照片和小传的作法表现了很大兴趣，并说他将向国家领导人建议仿效我们的经验。

苏联驻古巴大使馆临时代办 M. 马纳索夫（签字）

№06020

## 苏驻古巴大使馆关于古美关系 致国内的情报函

(1979年4月26日)

绝密

1976年末完全中断的古美关系的缓和进程，随着美国总统卡特上台又恢复了。看来，美国新的行政当局指望通过关系正常化和扩大同古巴的贸易在其经济中恢复某些阵地，并利用该国经济困难为本国利益服务。这里也不排除将来古巴“脱离”苏联的可能性问题。

卡特周围的有影响人士（埃·杨、麦戈文等）对其政策变化影响很大，他们认为正常化可以为美国使古巴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中立化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美国方面从这种新的观点出发发表了正式声明，声称准备“无先决条件地”开始同古巴讨论两国间现存的问题。卡特行政当局为消除紧张关系还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停止（美国）侦察飞机在古巴领空飞行；采取某些措施制止古巴反革命分子从美国领土去进行恐怖活动；撤销访问古巴的禁令。美国当局警告古巴流亡分子准备敌对行动，一些活动的参加者被捕并被提交美国法院。

古巴领导人持观望立场，尽管对美国的这些姿态反应是肯定的。在一系列公开演讲以及在同这一时期来哈瓦那访问的美国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的会见中，菲·卡斯特罗一再表示古巴原则上准备改

善同美国的关系，作为一种必要的条件就是要求取消经济封锁。

1977年初双方在改善关系方面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3月份，根据美国的倡议在纽约举行了中断外交关系后的首轮外交部副部长级的直接谈判；4月份，在哈瓦那签署关于在200海里区域内捕鱼协议和关于划分海上经济区临时协议。根据美国人倡议9月份在瑞士驻哈瓦那大使馆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设立办事处。允许美国公民携带住在古巴的家属出境去美国。

从1977年末起古巴的非洲政策，特别是它对埃塞俄比亚的国际主义援助延缓了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然而，尽管（美国）报刊和一些国会议员就古巴军事介入埃塞俄比亚发表威胁性声明，美国行政当局仍反对对哈瓦那施加强大的压力，并希望保留对话的条件。1977年12月份，参议员里奇蒙和霍兰受卡特总统的委托访问古巴，向菲·卡斯特罗表示总统因“古巴加强干涉”埃塞俄比亚而担忧。1978年2月份，墨西哥外交部长罗尔·加西亚秘密来访，他受洛佩斯·波蒂略总统的委托向菲·卡斯特罗转达了美国副总统沃尔特·弗雷德里克·蒙代尔的口信。口信中表示美国政府对古巴军队介入埃塞俄比亚而不安。通过洛佩斯·波蒂略将古巴就该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转达给卡特，声明驻埃塞俄比亚的古巴军事专家在必要时只在该国领土上参加军事行动。

1978年5月份，在扎伊尔沙巴省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事件期间（该事件把美国人同古巴介入非洲联系起来）菲·卡斯特罗接见美国驻哈瓦那办事处主任莱因，并通过他向卡特转达秘密口信，口信中强调古巴与沙巴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美国政府曾努力消除因美国围绕向古巴提供苏联米格-23飞机所掀起的宣传运动而于1978年末出现的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菲·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秘密会见卡特行政当局代表时，后者企图为美国侦察飞机在古巴上空恢复飞行辩解，说什么米格-23的出现

引起美国的极大忧虑，总统不得不采取“会使美国人民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的立场。美国人还声称，那时在古巴海岸附近美国海军演习是在传统区域内进行的，并非针对古巴。古巴方面知悉这些解释。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原因，但在双边关系的某些具体问题上仍然继续有所进展。1977年末鉴于划分海洋经济区临时协议有效期满，美国人建议进行新的谈判。12月份签署了最终划定两国海界条约。1978年1月份，达成两国海岸防卫协议，规定援助在佛罗里达湾遇难的船只，共同开展反走私麻醉品的斗争，制止古巴反革命分子从美国领土出发去进行恐怖活动。

允许古巴人在美国银行开设账户，对古巴驻华盛顿办事处的正常工作尤其必要，同时允许办事处将领事收入转回哈瓦那。允许留居美国的古巴移民每3个月给古巴的亲属寄500美元。美国访问古巴的旅游者每人有权限带100美元的古巴商品。

作为对卡特行政当局这些“姿态”的回报，古巴政府释放3名在这里被判处间谍罪（8年）的美国人。还声明准备积极研究其余在押美国人的问题，条件是美国也释放争取波多黎各独立的战士洛利塔·莱布朗及其3位同志。曾留住在这里的美国公民携家属（合计约250人）返回美国；双重国籍人士（480人）被准许离境。

双方之间的政治对话得以维持。在各种级别的接触中，包括1978年8月在（美国）亚特兰大，10月在（墨西哥）库埃纳瓦卡的秘密会晤时就广泛的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那时美国人强调古巴对非洲的军事介入是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他们企图在这方面对古巴施加压力，力争古巴至少从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部分撤军。与此同时，美国官方人士在秘密会晤时宣布，如果古巴真想改善关系，就应该在位于非洲和波多黎各的对于美国是“生命攸关的”方面采取“积极步骤”。譬如，开始从安哥拉和埃塞俄比

亚撤军，那时美国就将准备研究撤销对古巴出售药品和几种制镍工业设备禁令的问题。他们指出，古巴军队对非洲的介入以及他们可能对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干涉引起美国的不安，也无助于总统着手解决经济封锁问题。美国人希望得到古巴不通过军事途径干涉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保证，呼吁古巴支持两方“和平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

作为对美国人的回答，古巴坚定地宣布绝不接受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任何先决条件，在自己外交政策的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同时强调，古巴对非洲及其他国家的声援和它给予安哥拉及埃塞俄比亚的援助不可能成为同美国谈判的对象。菲·卡斯特罗同美国人会晤时指出：“只有当那里的局势达到和平与安全时，我们才能从那里撤军。而这只有在同这些国家政府协议的基础上，而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才能做到。”

还指出，古巴不反对和平的政治解决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问题，但绝不为自己在该地区的未来政策承担义务，因为种族主义制度可能对安哥拉进行挑衅和侵略行为，为此“需要给以回报”。同时强调，古巴坚持建设性的立场并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冲突，其中包括非洲国家之间出现的冲突。实例之一就是古巴人及时积极努力和平调解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协助改善安哥拉—扎伊尔之间的关系。

在同卡特行政当局官方代表会晤过程中，菲·卡斯特罗特别强调：经济封锁和美国在关塔那摩基地的存在是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他强调，古巴认为利用封锁作为“施压和提出要求的手段”的政策是极不道德的。对美国人宣布，非洲和波多黎各问题与经济封锁没有联系，古巴不会把这些问题作为撤销经济封锁进行谈判。菲·卡斯特罗强调指出：“古巴不是中国，也不是埃及。它不属于那样一些可以对其施加压力或收买的国家。”

与此同时，在这些接触的过程中，古巴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曾宣布准备在关系总的正常化，并在撤销经济封锁的条件下，讨论关于为美国人财产国有化赔偿问题，按他们计算这笔赔偿总计 18 亿美元（按 18 年、6% 利率计算，总额大约翻一番）。对美国人来说，古巴自己也对经济封锁给它造成的损失提出索赔，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就该问题进行谈判。

古巴领导人鼓励美国某些实业界人士对研究未来经济贸易联系前景所表现的兴趣。“国际贸易”组织在哈瓦那举行了有美国、日本和某些西方国家大公司领导人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参加者在美国政界拥有广泛的联系，并且可以对国会施加古巴所需要的压力。

1977 年末应东西方贸易委员会的邀请，古巴外贸部长费尔南德斯访问了美国。他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有 80 多个美国工商企业公司的领导人和负责贸易的助理国务卿和国务院代表参加的会议。部长宣布，在撤销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古美贸易每年可能达到几十亿美元。古巴感兴趣的是在美国获得粮食、饲料、化学产品、有色与黑色金属、建筑材料、各种设备及其他商品。

美国实业界人士，来自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商人访问了古巴。古巴人认为，有些美国公司对同古巴做生意很感兴趣。这些公司甚至准备放弃对自己被（古巴）国有化资产索赔。

但是经济封锁实际上原封未动。对出口美国商品，进口古巴产品，由美国政府和私人财务机关向古巴提供商业和财政贷款，由美国和含有美国资本的第三国银行以美元结算等禁令仍然有效。

与此同时，美国不得不改变反映在第三国同古巴贸易上的有关政策。允许财政部、商业部和国务院给那些由美国垄断组织控制的国家发放同古巴做生意的许可证。他们可以出口非战略物资和进口古巴的非战略物资。还允许从美国制品占 20% 以上的第三国向古

巴出口商品。

但是不允许在第三国的美国垄断组织的子公司以美元同古巴结算，向它提供 1 年以上的贷款和转让技术。

据美国驻古巴办事处统计，从 1975 年 10 月起到 1979 年 1 月止，美国财政部向在第三国的美国公司的子公司共发放出口总额 4.5 亿美元非战略物资的许可证，但并非所有出口申请都能实现，而非美国直接生产商品份额不过 5~6%。

许可证发给诸如电动机、工业用秤、拖拉机、小轿车和载重汽车、造纸工业设备、制药原料、荧光灯、灭草药、纺织机器、锅炉等商品；禁止出口航海系统、计算机、通讯系统、配电设备、建筑机器、电子试验设备等等。50% 以上发放许可证的申请都是加拿大和阿根廷的美国公司分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取消经济封锁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导致两国之间贸易的发展，古巴还必须首先履行美国 1974 年贸易法的一些规定——保障出境自由，签订双边贸易协定。非此古巴便不能获得最惠国地位，美国进出口银行和商品信贷公司也不会向古巴提供贷款。不获得上述地位，古巴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将被征以高额海关税（例如，每磅烟草征税 4.5 美元，占其价值的 25% 以上，而最惠国的相同商品每磅征税仅 0.95 美元，占其总价值的 5%）。

美国曾试图实行限制日本、意大利和法国进口古巴镍的规定。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宣布，美国将不允许进口利用古巴镍生产的特殊钢材。与此同时，据“国际商人合作社”统计，在 1977~1978 年古美接触过程中有 5 个美国主要的镍公司宣布自己对取消镍生产和贸易方面的经济封锁后同古巴合作感兴趣。

近来在古美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实质性的转机，那就是古巴政府决定释放 3000 多名政治犯（每月不少于 400 人），让他们出境回美国；允许希望同自己的家属在国外团聚的古巴人出境，也允许



古巴移民探望自己的亲人。这个基于对移民内部状况全部分析的决定意味着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从前在该问题上的政策。1978年11~12月在哈瓦那同古巴在国外团体代表的谈判中，菲·卡斯特罗确认了这个决定并强调每月将释放500名政治犯。但是该决定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美国允许他们入境回国。

在1978年末同美国行政当局秘密会晤中，菲·卡斯特罗指出，使做出上述决定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就是卡特政府的政策，卡特政府“停止鼓励恐怖破坏活动和对古巴内政的干涉”。用他的话说，这创造了一个能够用另一种方式研究移民问题的新局面。

美国拒绝毫无准备地接受古巴的建议，后者取得了道义上和政治上的重大胜利——从美国行政当局的手上找到了所谓“破坏人权”的王牌。美国必须对古巴的倡议做出反应。美国政府也面临古巴国外团体的强大压力。在这种条件下美国正式宣布将接受所有政治犯（3500），后者及其家属是古巴按每月400人释放出来的。为了研究该问题，美国司法部专门委员会来到哈瓦那。1978年10月份第一批政治犯携家属去美国。今年3月末，为了给到美国去的每月400人创造条件，美国人实行新的简化了的给政治犯发放护照的手续。

从今年起古巴移民开始到这里同自己的亲人见面。据朋友们估计，这些人1979年达10万余人。今年头3个月来这里的古巴移民近2万人。

古巴领导人懂得，鉴于实行新的移民政策，必须加强国内的思想工作。该问题在菲·卡斯特罗今年2月党中央七中全会和全国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的讲话中占有重要位置。根据党中央革命方针部所作的结论，制定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大批移民前来会见亲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委托各级党组织向劳动人民解释目前对古巴国外社团政

策的意义。

古美在文化、科学和体育方面的接触取得一定的进展。调整好这些接触是达到两国相互理解的手段之一，也是获取外汇的补充来源。譬如，古巴芭蕾舞团 1978 年在美国进行有偿巡回演出。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演出中观众约 10 万人。芭蕾舞团团长阿·阿龙索被选为肯尼迪艺术中心的名誉外籍成员。美国出版了她写的古巴芭蕾舞论文集。

去年和今年“伊拉凯莱斯”、“蒙卡达”、“曼瓜雷”、“洛斯帕皮涅斯”、“阿拉贡”等音乐团体以及阿·布劳韦尔、罗德里格斯、米尔亚涅斯等作曲家兼演奏家，还有马丁涅斯、布尔克等歌唱家先后去美国巡回演出。

美国演员和舞蹈家参加了第 6 届哈瓦那国际芭蕾舞节。今年 3 月份在这里最大的卡尔·马克思大厅举行了 3 次古美音乐家和歌唱家联合音乐会。参加上述音乐会的有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德里格斯和阿·哈特，以及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佩雷斯·埃雷拉。

古巴文化部长阿·哈特在哈瓦那同“古巴维纳集团唱片”公司副总裁讨论了在美国发行古巴音乐唱片的可能性。

1978 年曾邀请 35 位美国的电影评论家，在观看古巴影片及与同行会见的基础上，在美国报刊发行了一系列有关古巴电影业的正面材料。这就保证了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芝加哥及洛杉矶古巴电影周的成功举办，以导演埃尔瓦雷斯为首的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参加了电影周的活动。该团同美国电影艺术家和大学师生会见。

美国一家租赁公司得到一些古巴影片，以便在电影剧院和电视上放映。美国将用拉丁文翻印《古巴电影》月刊。1978 年通过意大利的中介公司购进 16 部美国影片。

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了首项接触。去年年末以高等教育部部长弗·韦希诺为首的代表团访问了美国。该团结识了 8 所大学，同他

们的校长、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以及一些众议员进行了会见。应弗·韦希诺的邀请，匹茨堡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教师今年访问了哈瓦那大学和中央大学、理工学院和农学院。建议互换小批农业专业的留学生。参议员麦戈文的儿子在哈瓦那大学就读。

正在调整学术机关之间的某些联系。譬如，国家学术研究中心接收美国的信息资料。美国方面建议古巴在研究利用太阳能为生产和生活场所制冷方面进行协作。

今年 3 月份，应卫生部长 X.Γ. 穆尼斯的邀请，美国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内著名外科医师 X. 里奇蒙来这里访问。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宣布，古巴的卫生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其儿童的低死亡率以及对于成长中一代健康保护的关心，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谈判时古巴方面试探从美国购买药品的可能性。里奇蒙受到了菲·卡斯特罗的接见。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系统，在美国通过了几种古巴药品的试用期。

在哈瓦那和纽约，非政府的对拉丁美洲文化联络组织之间互换了书籍。同年古巴各国人民友谊学院副院长 X. 盖亚尔多访问了美国，以便同纽约的“美洲之家”就在地方公众中间组织古巴真相的信息工作进行谈判。

今年 4 月份，应古巴各国人民友谊学院的邀请，第 13 次访问古巴的是由 130 名进步青年美国人组成的小组。

每年古美拳击会晤已成为传统。今年美国运动员参加了哈瓦那国际古典式和自由式摔跤比赛。人们正期待他们参加以巴尔因托斯兄弟命名的国际田径比赛。

分析古美联系的发展可以得出结论：古巴领导人在同美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立场坚定，坚决拒绝美国对古巴施压的企图，绝不在自己内外政策的原则问题上让步，绝不把它作为关系正常化的筹

码。

古巴领导人也懂得同美国关系完全正常化会在国内意识形态方面和国际舞台上导致什么样的消极后果。

与此同时可以确定，同美国在各个领域，主要是在文化、科学和体育领域的接触将会继续下去并不断扩大。双方对保持两国关系的现有水平并使其有所进展均表现出兴趣。

注意到有关古美关系问题在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现在和将来利益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就此从古巴人那里获得情报的必要性时，利用苏古国家和党领导人以及外交部负责工作人员的相互访问和会晤，继续同古巴朋友就该问题交换意见是适宜的。

看来，必须对美国行政当局为同古巴关系正常化所提的条件给予特殊的关注。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 B. 沃罗特尼科夫（签字）

№06021

## 马纳索夫同劳·瓦·维沃的谈话纪要

(1979年5月7日)

机密

摘自马纳索夫日记

受苏联大使的委托，在党中央会见劳·瓦·维沃<sup>①</sup>向他通报了关于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同牙买加人民民族党执委会委员的会谈情况。

劳·瓦·维沃感谢通报，指出这次会见的重要性，它有助于发展苏共和牙买加人民民族党之间的联系，首先为在苏联培训人民民族党干部创造了条件。

随后，在会谈过程中，劳·瓦·维沃讲了自己不久前按菲·卡斯特罗的指示访问几个非洲国家的情况。谈话人继续说，上述访问的起因是我们从驻非洲一些国家大使馆所得到的情报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在我的面前提出一项任务：到当地了解形势，同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以及同苏联驻这些国家的大使们进行交谈，以便获得关于南部非洲事态的全面和客观的情报。

他说，我受委托向乔舒阿·恩科莫和罗伯特·穆加贝转达，古巴不能满足他们关于派遣飞行员反击对爱国阵线武装部队训练营地空

---

<sup>①</sup> 劳尔·瓦尔德斯·维沃，古巴共产党中央书记。

中攻击的要求；向前线国家的领袖和领导人阐述了古巴建立津巴布韦临时政府的计划。

劳·瓦·维沃这时发现，当前在安哥拉，在古巴与苏联之间尚无明显的相互联系，在埃塞俄比亚我们的几个国家达到完全协调的共同行动，他强调说，古巴和苏联对南部非洲的政策也应该协调起来。

交谈人阐述古巴计划实质如下：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被解放的领土上宣布成立津巴布韦临时政府；建议乔·恩科莫任总统职务，而罗·穆加贝任总理；临时政府的行动纲领规定实现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造，保证承认该政府国家的利益；保障白人的权利，拟定进行国家立法机关的选举；宣布宪法保证，等等。

用劳·瓦·维沃的话说，乔·恩科莫和罗·穆加贝以及前线国家的领导人都同意该计划。据古巴方面估计，临时政府在初期可能得到30个国家的承认。

交谈者指出，英国积极干涉赞比亚事务有可能保证傀儡政府的胜利，也可能引起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之间的冲突，假如他们的行动达不到统一的话。

他通告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武装部队共计有2.4万人（每个组织各1.2万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部队现在无所事事。雇佣兵中有3000名黑人和2000名白人。

劳·瓦·维沃简介了自己同苏联驻莫桑比克大使的谈话内容。用他的话说，在讨论南部非洲的形势时，我们的大使指出，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在没有革命形势和文明的国家不应该把事件估计得过早。劳·瓦·维沃说：“对此我开玩笑地回答苏联大使，假如勃列日涅夫同志和菲·卡斯特罗同志决定我国两国参加罗得西亚的战斗，那么我们会参加。”

应我的请求，劳·瓦·维沃简短地通报了古巴共产党中央最近一次全会的情况。他通告说，全会对党的一大决议完成情况作了总结，揭露了国家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缺点，并指出克服这些缺点的途径。鉴于全会就该问题所作的决议草案未完全反映经济形势的诸多方面的问题，故委托党中央有关部门继续完成，然后予以公布。

谈到中央全会关于任命利奥涅尔·索托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议时，劳·瓦·维沃高度评价他（他说：“这不是加西亚·佩莱斯”），并通告说，利·索托将研究党对国家经济的领导问题；按党的系统委托他负责何塞·马蒂计划、国家银行、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及其他中央国民经济管理机关。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馆  
公使衔参赞 M. 马纳索夫（签字）

№06022

## 沃罗特尼科夫同莱因的谈话纪要

(1979年6月12日)

机密

沃罗特尼科夫日记摘抄

今天接见了前来进行礼节性拜访的莱因<sup>①</sup>先生。在谈话过程中比较有兴趣的有如下几点。

1. 在回答我的问题“你如何评价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与美国总统卡特在维也纳会晤的意义?”及“你认为美国国会能批准限制战略武器第2号条约吗?”时,莱因回答道,这次两国元首之间的会晤无论对美国,还是对苏联,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同时为扩大苏美关系各领域开创了新的可能性。莱因说,不仅两国,而且全人类的幸福与安全均取决于这次会晤的结果。在评估美国国会批准限制战略武器第2号条约的可能性时,莱因表示自己坚决相信条约会被批准,尽管他承认在美国军事工业集团有影响的人物中有某种反对派,他们竭力贬低即将举行的高级会晤是因为签署和批准限制战略武器第2号条约似乎仅仅对苏联单方面有利。莱因说:“卡特行政当局的言行不一致往往给这种意见帮了忙,尽管现在卡特总统本人向美国人民展开广泛宣传

<sup>①</sup> 莱因是瑞士驻古巴大使馆代表处主任。自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之后,美国奉行孤立古巴的政策。古巴和美国之间的某些外交事务,通过瑞士驻古巴大使馆转达双方意向。



解释条约意义的运动”。一个美国人企图把一些众议员对条约持否定态度解释成仅仅是他们对军事技术问题不内行，同时说该文件的政治意义对美国国会的所有代表（极少数除外）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2. 在谈话过程中莱因先生阐明了美国在尼加拉瓜问题上的立场。他深信，美国政府绝不会采取单方面支持索摩查制度的行动。与此同时他承认如下事实，即尼加拉瓜事件触及美国私人资本的利益，其资本所有者无疑想保留现存制度。莱因先生说：“但是我国政府现在支持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提出的旨在有冲突各方参加的政治和平解决尼加拉瓜的倡议。”

我回答交谈对方说，只有尼加拉瓜人民才应该解决该问题，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选择他们最满意的政体。

3. 交谈对方通告说，今天夜里一架按国内航线飞行的、舱内载有240名乘客的美国飞机由美国偷开到古巴。据说这事是一名旅美的古巴人干的，此人曾在古巴空军部队当过飞行员，1969年把一架军用飞机偷开到美国。用他的话说，美机在那里着陆后，菲·卡斯特罗乘车来到机场亲自领导调解这次冲突。飞机加油后载着全部旅客飞回美国。

在谈到这件事时，莱因先生表示赞赏古巴政府在解决归还偷开到古巴的飞机以及犯罪的美国公民问题时做出的迅速反应和给予的帮助。

听完交谈对方的话后，对他说，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并不总是这样做，例如在美国迄今居住着2名未受到惩罚的犯罪分子，他们当时在打死1名女服务员后将一架安-24飞机从苏联偷开到土耳其。

4. 在谈话结束时莱因先生在回答他对古美关系正常化前景的意见问题时，通告说，现在他的本国政府虽然仍保留对古巴的经济

封锁，但是在研究向古巴出售一些商品，包括药品和粮食时重新审核经济封锁中的一系列规定。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 B. 沃罗特尼科夫（签字）

№06024

## 沃罗特尼科夫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 谈话纪要

(1979年6月25日)

绝密

摘自沃罗特尼科夫日记

应我的请求，菲·卡斯特罗今天接见了。我受委托向他通报了关于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与美国总统卡特在维也纳会晤和谈判的结果。

1. 菲·卡斯特罗在仔细倾听我的通报后，对此表示感谢。他说：“这一情报非常重要而有意义，是苏联对维也纳会晤结果的综合评价，这次会晤就其成果而言是苏联外交政策和勃列日涅夫本人的令人信服的成绩。菲·卡斯特罗强调说：我已给勃列日涅夫同志发去贺电，该贺电的全文也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

在继续谈话中，菲·卡斯特罗谈到了尼加拉瓜发生的事件和在华盛顿最近举行的美国国家组织会议的结果，他认为这次会议是美国帝国主义在西半球又一次大的失败。用他的话说，这次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充分显示，越来越多的拉丁美洲国家“不听从”美国的指挥棒。他还指出，这些问题明天将成为在哈瓦那同委内瑞拉代表会晤时讨论的对象。菲·卡斯特罗宣布说：“我相信美国人不敢单方面干涉尼加拉瓜的事务，而索摩查迟早要滚蛋”。

2. 菲·卡斯特罗自己提出了关于不久前撤销古巴共产党中央书

记处书记劳·瓦·维沃同志职务的问题，说他未能尽职尽责，在不久前访问一些非洲国家时未能准确无误地完成委托给他的任务。

菲·卡斯特罗说：“我们委托他一项，也是主要的任务——向几位非洲领袖通报，我们不能给予他们军事援助，而劳·瓦·维沃却醉心于解决他无权讨论的其他问题。这就给我们的行动带来损害。不仅在我们的苏联朋友，而且在非洲人中间产生一些怀疑和误解。我们对劳·瓦·维沃的行为讨论很长时间，承认他过去的所有功劳，但是不能原谅他在完成如此重要和必须慎重对待的任务中所表现的无组织、无纪律和任性。这是惟一正确的决定。现在我们任命赫苏斯·蒙塔涅·奥罗佩斯担任国际联络部部长职务，这是一位有经验的、久经考验的同志。他是一位严肃认真、纪律性很强、好深思同时又是一位善于交际的人。”

为了完成上述指示，我再次请他相信，莫斯科完全信任古巴领导人在非洲所采取的行动，在罗得西亚问题，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苏联和古巴行动是一致的，立场是统一的。

3. 在谈话结束时菲·卡斯特罗通告我，甘蔗收获季节实际上已经结束，但看来由于雨水过多在该季节中未能收获计划中的800万吨糖。他指出：“几个地方加起来能收790万吨糖，也许还会多一点。”谈到向苏联供应古巴糖的问题时，菲·卡斯特罗说：“就该问题我已同罗德里格斯（他向我通报了阿尔希波夫同志的信和您同他的谈话内容）和其他古巴同志谈过话，我获悉你们在食糖供应方面有些困难。我们尽量做工作以减少缺口，补偿7月，也许还有8月食糖供应的不足，但是一部分糖（近8万吨）很可能要到12月供应。”这时菲·卡斯特罗多次强调他们将不会允许再发生此类情况。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 B. 沃罗特尼科夫

№06025

## 沃罗特尼科夫同劳尔·卡斯特罗的谈话纪要

(1979年9月1日)

绝密

摘自沃罗特尼科夫日记

9月1日，劳尔·卡斯特罗<sup>①</sup> 来访大使馆。他怀着不安的心情讲了西方，首先是美国大众传播媒，在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期间所开展的反对古巴的宣传运动，尤其大肆渲染所谓“苏联在古巴加大军事介入的力度和步兵的存在”，并具体地指出，有为数3000人的陆军旅。近日来美国官方人士加入了该宣传运动。劳尔·卡斯特罗谈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霍尔迪·卡特的发言，后者谈到似乎“不久前发现在古巴有苏联军队”。劳尔还谈到（美国）参议员斯通和切尔奇要求就苏联在（古巴）岛上军事介入问题进行调查。此外，劳尔·卡斯特罗继续说，美国驻哈瓦那办事处新上任的主任韦恩·史密斯9月1日拜访古巴外交部。在同古巴外交部副部长托里斯谈话中，他说，他受委托转达美国政府就“已被证实”在古巴苏陆军旅一事表示“关切”。托里斯回答他说，古巴方面不能接受如此提出该问题，已经不止一次地对美国外交人员指出，只要美国不懂得古巴是一个主权国家和对它应当像对一个主权国家一样对话，那么两国之间就不可能达成共识。史密斯急忙解释说，他

<sup>①</sup> 劳尔·卡斯特罗，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古巴革命武装部队部长。

仅收到传达“关切”的指示，并不要求对自己发言的回答。他补充说，国务院认为通过双方外交途径，而不进行公开争论对参议员斯通和切尔奇的声明做出反应是适宜的。美国外交官也对他同托里斯就这种不愉快的问题进行的首次会见表示遗憾。

鉴于美国的这些行为并考虑到该问题在不结盟国家会议上随时有可能发生，菲德尔·卡斯特罗请劳尔·卡斯特罗同苏联方面协商寻求可能的答案。古巴领导人提出如下解决方案：“实际上，17年来在古巴确实驻有象征性的苏联军队，如建立了由苏联军事专家训练（古巴）革命武装部队军官掌握和保养新的军事技术装备的训练中心”。在提出该方案时劳尔·卡斯特罗强调他们的出发点是基于过去同美国人就苏联在岛上军事介入问题冲突的经验和原则意见，并认为我们不应该掩盖事情的真相，更不应该向美国人让步，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解释他们否认岛上训练中心存在的企图，无非是想否认古巴和苏联有权建立这类中心并往那里派遣必要的军事人员。劳尔·卡斯特罗补充说，美国人早就知悉有关该陆军旅的情况，但却厚颜无耻地宣称“不久前”才发现。他同时强调指出，毫无疑问，除了（美国）内政和外交原因，这场甚嚣尘上的反古宣传正是由在哈瓦那召开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引起的。

在讲完这些反古宣传后，劳尔·卡斯特罗谈到拟定今年9月8日苏联军舰访问古巴的问题。他委婉地提出希望这次访问尽可能推迟到晚些时候，即“围绕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风波平息之后”。

接着他叙述了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的过程。9月1日，在会议结束前（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日程实际上已经确定。引起重大争论的惟一一项就是将西撒哈拉问题列入日程的问题。摩洛哥代表反对将该议题列入日程，他断言，这“不是殖民主义问题，该问题已在联合国框架内并已同西班牙签定协议后加以解决了”，等等。有几个国家支持他，但是他们处于少数：31个就该问题发言的

代表团中，仅4个要求不把西撒哈拉（问题）列入高级会议议程。

劳尔·卡斯特罗把8月30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铁托举行的午餐会议说成是纯礼节性的安排。但是次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同铁托的会谈，他认为是有益的。对不结盟运动的许多问题未能达成共识，而就柬埔寨的代表资格问题每位领导人仅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在会谈时明显发现铁托不希望同古巴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公开对抗，故会谈总的气氛是相当平静的。在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单独在一起时，南斯拉夫领导人竭力使他相信，南斯拉夫的政策无论如何不是反苏的，他特别举例说，他不允许在南斯拉夫出版反苏书籍，如果他预先知道其内容的话。

劳尔·卡斯特罗还说，铁托周围的人，特别是米尼奇，对古巴和苏联的态度要比他（铁托）本人明显更带有“挑衅性”。最明显的是，在会谈过程中米尼奇企图抢在铁托之前讲自己的答复或者企图按他自己的理解解释铁托说的话。譬如，铁托同意对新闻界发表南斯拉夫—古巴联合公告，但米尼奇立即说这难以实现，结果联合公告未能产生。

门格斯图还会见了铁托。他开诚布公地当着铁托的面就南斯拉夫不结盟政策方面提出一系列问题，但铁托并未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并对保持运动团结的普遍观点和呼吁说几句敷衍的话。

铁托是否在（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隆重的开幕式上或在工作会议过程中发言尚未决定。南斯拉夫人自己认为，他（铁托）作为运动创始人中惟一活着的人，有权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言。但是不管通过什么决议，总的来说，铁托怎么也得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之后讲话。

就拟议中的尼加拉瓜国防部长访苏一事，劳尔·卡斯特罗再次强调，这里将谈的根本不是协调军事合作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其作用仅仅是对贝纳迪诺·蒙泰尔施加政治影响和进行教育。劳尔·

卡斯特罗讲，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曾劝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从转变到革命方面来的原索摩查军官中任命一名国防部长。阵线领导人选择了贝·蒙泰尔，此人给人的印象是正直、诚恳，但在政治上立场不稳定。他纯粹被人当成“门面”，军队建设并不通过他，这方面的全部实权归桑地诺人民军总司令翁贝托·奥泰格。贝·蒙泰尔察觉到这一点并打算辞职。为了防止他辞职并让他看到自己的威望，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安排部长访问古巴，并请古巴人协助安排贝·蒙泰尔到其他国家访问。古巴朋友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不应该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更不应该去苏联。他们把该意见告诉了翁·奥泰格。他回答说理解他们的担心，但他解释了贝·蒙泰尔和现状并说，已经答应他访问古巴、阿拉伯国家和欧洲。他再次肯定地说，这次访问仅仅是非正式、秘密和纯“起教育作用的访问”。在翁·奥泰格的第二次请求后，同时考虑到是他们自己劝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任命一位前索摩查军官为国防部长，古巴领导人决定将此事向苏联方面加以说明。

劳尔·卡斯特罗还谈到曾到古巴访问的尼加拉瓜外交部长米盖勒·迪埃斯科塔，说此人从前是耶稣会的神甫，但似乎属于拉丁美洲为数不多的“红色神甫”之一。他颇有教养并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见解，但他的政治观点不能说是明确的和稳定的。然而他在美洲国家组织讨论尼加拉瓜问题会议的过程中和现在，在哈瓦那不结盟运动外交部长会议上，都表现得很好。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任命他为外交部长也是遵循菲德尔·卡斯特罗吸收几名神职人员入阁的建议办的。政府中的第二位神甫是文化部长。

我感谢劳尔·卡斯特罗转达了有关情报。

苏联驻古巴大使 B. 沃罗特尼科夫



№06039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古巴问题的 会议记录（摘录）

（不早于1979年10月11日）

.....

### 8. 关于同西班牙签订发展经济和工业合作的协议

苏斯洛夫：外贸部提交了一份关于发展苏联与西班牙之间经济和工业合作协议草案。这里谈的是要同西班牙方面进行谈判并签订协议。

帕托利切夫：我将赴西班牙。我想，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 9. 来自哈瓦那的№741和№744专电

苏斯洛夫：同志们，你们已经谈了这两份电报。其中之一提出一个问题，即劳尔·卡斯特罗在同我们的大使谈话中谈了替换古巴在埃塞俄比亚驻军所产生的困难。在第二次谈话中劳尔·卡斯特罗说安哥拉人大概请求古巴承担自己驻安哥拉军队的费用。第二，他说，安哥拉人对待古巴代表相当没有分寸。

下面谈到援助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武器的问题。他指出，苏联同志们援助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武器，而该组织的战士们根本不战斗，也不想战斗。那么就要问：为什么援助他们武器？一句话，这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亟待我们进行研究。我想，应该委托国防部和中央国际部审议一下在这两份电报中提出的问题，可考虑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意见后向中央提出建议。

全体：同意。

10.1979年10月11日来自哈瓦那的№738和№745专电。

苏斯洛夫：在这两份电报中我们的大使通报说，古巴人今年不能提供协议所规定数量的糖。因此，显然我们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补充这一数量（糖）。

吉洪诺夫：应当在其他国家采购糖。为此需要不少于3.45亿外汇卢布。

苏斯洛夫：让我们委托部长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建议。

11. 关于苏联 - 中国谈判的过程

苏斯洛夫：昨天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伊利切夫同志的记录已分发了，让我们听听他的讲话。

伊利切夫：苏联代表团遵照指示提出“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草案供研究。根据该宣言，我们发言阐述通过该宣言的必要性，即该宣言可以使苏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恢复苏中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这完全符合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华关系的原则和一贯的方针。中国代表团团长作了内容广泛的发言，发言中毫不掩饰地提出了众所周知的中国方面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如下：……<sup>①</sup>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

№06026

## 谢列茨基同安东尼奥·阿尔别苏的 谈话纪要

(1979年12月27日)

摘自谢列茨基的日记

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行的谈话中，阿尔别苏<sup>①</sup>讲了一些有关现阶段古巴和美国关系方面的看法。

他说，美国对同古巴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政策受两种因素制约，即军事战略利益和国内形势。首先，对待古巴的态度从军事战略的观点来看，美国领导人有两条路线：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两条路线。布热津斯基认为，“古巴在经济上依赖苏联的结果”，就是它没有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它成了“苏联的附庸国”，因此，同他们对话就没有意义了。所有的，譬如涉及到古巴在美洲或者在美国中央地区的活动问题，都应该同苏联一起进行审议，因为苏联会“给古巴施加相应的压力”。

阿尔别苏说，另一条路线是美国国务院对古巴所采取的。在那里的人都认为，所有涉及到古巴的问题，仍然必须对它本身进行审议，而不必同苏联摆在一起。

阿尔别苏说，近几个月来，美国领导人采纳了布热津斯基的上层路线，这不仅对美国同我们的关系，而且还对他们在拉丁美洲的

---

<sup>①</sup> 霍谢·安东尼奥·阿尔别苏，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美洲局美国处处长。

整个政策都产生了不良影响。由于苏联的军事教练中心设在古巴，美国挑起了一场有名的“小危机”，恢复了在我国领土上的侦察飞行，在关塔那摩基地进行了挑衅性的大演习，在我们海岸附近进行海军训练。阿尔别苏指出，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同美国的关系“达到从 1979 年卡特上任以来的最低点”。

阿尔别苏说，与此同时国务院也不想完全“关上门”，还表示有兴趣同我们保持联系。继续有人到我们这里来，虽然人数很少，如美国议员，办公务的人们，大学教授等，保持着文化和体育方面的联系。交谈者指出，国务院签订我们两国保卫海岸线的协定，允许我们运载主要是古巴团体的成员飞往美国。到今年年底美国人应该同我们签订捕鱼问题的协议。显然协议得由美国政府确认，然后转交给参议院批准，而美国的国会现在正在休假。

阿尔别苏说，以前美方对古巴做出的其他一些“姿态”仍然有效。譬如，在华盛顿允许我们在美国银行开设账户，这是正常工作所必须的，以便能往哈瓦那汇领事签证费。居住在美国的古巴公民和以前一样有权每三个月汇给自己在古巴的亲属 500 美元。美国的旅游者可以带回价值 250 美元的古巴商品。阿尔别苏再一次地重复说，凡此种种，我们估计都是国务院竭力想保持同我们的一定程度，那怕是最低限度的联系，为日后改善关系创造有利的基础。

阿尔别苏说，从 1978 年 12 月起，在同古巴进行“不公开会晤”的问题上，美国方面就没有表现出多大的主动性。过去这种会晤要就非常广泛的国际问题，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问题交换意见。他指出，显然，卡特行政当局更为深信不疑的是，我们不会在我们对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政策的原则性问题上，尤其是在保持对古巴进行全面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做出什么让步。阿尔别苏说，的确美国人表现出有兴趣的是同我们驻华盛顿的办事处进行单独对话，但是，这种对话带有非常现实的性质。譬如，由于苏联的军事专家

在古巴而产生“小危机”时，他们就同我们在那里的代表一起审议这一问题。

阿尔别苏说，美国方面在尼加拉瓜问题上还想给我们施加压力。然而，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正式呈文他们都没有提给我们。他指出，况且提出这一问题对卡特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的政敌也可以利用这一点。要是卡特宣布，古巴干涉了尼加拉瓜的事务，那么就有了借口指责他没有及时对索摩查给予必要的支持，而且这也是他所感兴趣的。

阿尔别苏说，关于美国人撤消对古巴的经济封锁问题，仍然没有什么行动，而且目前也没有排到日程上。他指出，的确可以等待，当国会重新聚会时，再解决关于提供给我们在美国购置一些药品和制剂的许可证问题。交谈者强调说，问题可能在于目前只能是部分撤消经济封锁。

阿尔别苏说，据他所知，美国人没有用任何形式提出关于古巴加入特拉捷洛尔科条约或是防止核扩散条约。他指出，况且美国很了解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接着阿尔别苏说，毫无疑问，实际上在那里已进行的选举运动会给美国对我们的态度造成更大的影响。他指出，要知道不久前发生的“小危机”说明，卡特想证明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当涉及到美国的利益时，能够“坚强”。他想摆脱对手提出对他的指责，指责说他“软弱”。

阿尔别苏说，除此之外，可以认为所谓的“扩张主义”是比美国的选举运动更为重要的一点。他指出，同时，首先指的是苏联，它的活动，譬如在非洲，但是，这不能不触动我们。

阿尔别苏说，在美国开展的选举运动同时还使得从前主张改善同古巴关系的许多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现在都不公开议论这件事了。参议员麦戈韦伦现在应该表现慎重，因为重新选他的那个州对他的

保守情绪是了解的。同样还可以说参议员乔尔切。其他的一些“年青的参议员们”，譬如里奇蒙德和诺兰，虽然这一次他们不再参加重新选举，但是，同样也认定现在不谈同古巴关系正常化问题为好。

阿尔别苏说，至于说在今后的总统选举中谁能取胜，那么在我们看来，预测还有些过早。我们并不排除譬如卡特可能成功。的确，肯尼迪可能保证得到民主党员、州长、州议会和国会里的多数支持。同时不能不考虑的是过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什也可能取胜。阿尔别苏指出，如果我们拿共和党人来说，那么现在好像里根州长要比肯尼迪有更多的机会胜出。

阿尔别苏最后说，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在大选和新总统进入白宫之前，哪怕甚至重新让卡特代表美国行政当局，在改善同古巴的关系计划中都不可能指望有什么特别的措施。许多情况都取决于大选之后国际总形势的变化，譬如伊朗、美国中部地区的事态会怎样发展下去。他指出，要知道对美国来说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伊朗。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A. 谢列茨基

№06027

## 苏驻古巴大使馆就古—美教育、科学和文化 关系给国内的汇报

(1980年2月22日)

卡特政府上台后，美国和古巴的缓和进程处于最低点。但是双方在建立教育、科学和文化关系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古巴领导人看到这是现阶段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的一种可行的办法。古巴领导人关心这些关系也是从实际考虑出发的，目的是培养和提高自己某些专业干部的业务水平，在一些科研领域进行合作研究，通过演员在美国演出以得到外汇，在美国出版古巴文学著作。此外，古巴想通过类似的联系向美国公众宣传自己的政策和革命成就。

古巴高等教育部部长维西诺 1978 年末的美国之行，为教育方面的联系，同时就两国高等学校之间一些联系打下了基础。匹茨堡大学、马萨诸塞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的代表访问了古巴。他们参加了哈瓦那农学院科研和实践代表会议。今年 1 月在哈瓦那大学为霍普金斯大学的教师举办了讲习班，在两周期间教师们听了许多门课程：古巴通史、古巴经济发展中当前的问题和远景、教育、文化、国家建设过程、对外政策。3 月份，将为古巴教师回办讲习班。今年初美国教育工作者协会代表团曾访问这里，部长会议副主席、教育部部长费尔南杰斯接见了代表团。哈瓦那工学院副院长奥乔阿曾去美国了解工程干部在美国进修的情况。一批古巴大学生在美国大学实习。

1979年5月古巴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美国。代表团团长、科学院院长托列斯指出，访问是参观性质的，目的是协调两国科学机构的关系。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人建议交换学者，合作研究农业、海洋和加勒比海域的生物、利用太阳能降低生产生活用房室内温度。除了一些美国物理专家、生物专家和历史学家来这里访问以外，这次访问没有取得显著成果。国家科研中心、基础技术研究院和美国一些科研机构还交换信息资料。

1979年有两个美国医生代表团访问了古巴。其中一个代表团由教育卫生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奇蒙德率领。他受到卡斯特罗接见。古巴方面想从美国购买一些药品和邀请美国医生给本国专家讲课。今年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师在哈瓦那心脏和心血管外科学院讲了一系列课程。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批古巴医生在美国进修。

文化联系一般是在非政府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古巴方面愿意给予这种联系以官方性质。比如在这里，就在美国生产唱片进行谈判的哥伦比亚某公司副董事长，就受到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部长哈特的接见。美国人有时也采取这种办法。比如他们派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官方代表团来参加去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加勒比地区各民族的艺术联欢节。在美国就这一问题进行协商的全国作家艺术家联合会的代表在美国国务院受到接见，并对他说，虽然同古巴的政治正常化有困难，发展文化关系是可以的，其中包括国家方面的关系。

古巴演员在美国演出已是经常性质。最近去美国的有：国家芭蕾舞团、民间声乐团，各种独唱、独舞演员。他们巡回演出时间很长，遍及各大城市。比如观看芭蕾舞演出的已达10万人，观看声乐演出的已达63000人。另一方面，古巴坚持对等回访的建议，尽可能限制美国艺术对居民的影响。比如去年在哈瓦那举行的古巴和美国音乐演奏会引起居民无与伦比的兴趣，特别是青年。在古巴发



行的美国音乐唱片，虽然价格很高（10比索），但很畅销。

美国文化活动家一般同其他国家的代表一起应邀参加大型的活动，如传统的国际芭蕾舞节，今年1月举行的哈瓦那戏剧节。古巴各族人民友好研究院副院长加伊亚尔多的美国之行以后，同纽约古巴研究中心的联系活跃起来，这有利于在知识分子、大学生中宣传古巴的成就。画家别尔格兰和作家鲍尔涅特通过美国这一社会机构去美国讲古巴造型艺术课和文学课，举行艺术座谈会。

在电影方面也保持一些联系。1978年，请来一些美国电影评论家，他们回国后在美国报刊发表大量有关古巴电影的资料。这使以后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组织的、有以阿尔瓦列斯导演为首的代表团参加的古巴电影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79年，在旧金山国际电影节期间组织放映了阿列阿导演的电影。35名美国电影评论家出席了去年12月在哈瓦那举行的第一届新拉丁美洲电影节。通过纽约和罗马的租赁公司把古巴电影片卖给美国，购买美国影片在古巴放映。1979年这里首次放映了20部美国影片（1978年16部）。正在研究在美国发行英文版《古巴电影》杂志。

“普连季谢·霍尔”出版社、“亚德列-普列斯”出版社和国家版权中心正在哈瓦那就在美国出版古巴文学作品问题进行谈判。今年美国将出版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索塔马里的著作，以及作家鲍尔涅特、莫列霍、罗赫利奥等的作品，共10部，通过瑞士银行结算。

同旅居美国的古巴侨民知识分子也有一些文化联系。去年其代表（近40人）应邀来古巴访问。正在研究引进古巴侨民的资金，实施维修哈瓦那老区历史文物计划问题。

1979年，有8400名旅游者访问了古巴。每年一次在古巴和美国轮流进行的拳击和篮球比赛已成为传统。

上述各方面的双边联系，有助于为协调两国睦邻关系创造条

件。但是这些联系，也被美国一些团体用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古巴同志指出，在这里的美国专家对古巴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研究课题、技术装备、人员水平、同苏联科研机构的合作非常感兴趣。两名调试美国设备的美国工程师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到哈瓦那工学院，由于从事和他们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活动而被驱逐出境。最近在这里举行的钓鱼比赛期间，美国参赛者在自己的快艇上隐藏4名古巴人非法出境。瑞士驻哈瓦那大使馆美国处力图同古巴知识分子中最有前途的代表建立联系。在去美国时常常对他们特别关照，提供高级宾馆，大量个人用的美元。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这样的看法：在美国、加拿大、西欧进修和实习，比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好。在演艺界，某个艺术家在美国的演出被认为是自己威望的一种标志，古巴报刊对这类巡回演出的广泛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种看法。正在采取措施，消除同美国进行科学文化联系的这种消极后果。去美国的主要是思想和道德品质最好的人。演员去美国的条件之一，是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预先演出过。这种做法被认为可以限制美国生活方式对他们单方面的影响。

古巴支持同美国进行一定的科学文化联系是由于：可以加深同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的合作；可以通过宣传机关宣传教育、科学、卫生、文化方面的成就和普及性；解释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先进作用、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馆文化专员 T. 杜尔蒂耶夫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馆二秘 Ю. 费尔斯塔诺夫

№06029

## 苏驻古巴大使馆就古巴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 态度致国内的政治信

(1980年7月4日)

机密

遵循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古巴共产党中央和古巴共和国政府在自己的对外政治活动中坚持的是国际主义原则路线，方针是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团结一致，扩大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的兄弟般的联系，加强和平和国际安全，加速紧张局势的缓和过程，限制军备竞赛，裁减军备。在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开幕式上卡斯特罗发表演说时强调说，“和平、缓和、和平共处，所有这些都应该需要，都应该达到，都应该去争取；因为，他们本身都不能自然而然地出现，而且，在当今的世界，如果我们希望人类安然无恙……，那就不存在有任何其他供选择的余地……。同时，还应该支持在这方面的所有措施。所以，我们应该满意地欢迎苏联和美国之间签订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第2条约。同时，更准确地还有像在这方面拟定的一些进一步的措施……。不过，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措施不管怎么肯定和重要，距离理想毕竟还很远，还得逐渐地裁减核武器直到完全销毁核武器。对所有国家来说，最终能摆脱困境的惟一正确出路，就是停止军备竞赛。”

古巴是下述条约、议定书、公约的参加国，即关于禁止在宇宙

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装备核武器的条约；关于禁止在大海、大洋的底部及其深处装备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条约；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剧毒性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毒气和细菌等武器的日内瓦（1925年）议定书；关于禁止使用军事性或者其他任何敌对性手段影响自然环境的公约，以及一系列其他种种条约。

同时，它直到如今仍没有参加莫斯科关于禁止在三个范围内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没有参加防止核扩散条约和没有参加特拉捷洛尔科条约。古巴领导人解释说，不参加这些条约的原因是，他们的国家还不能放弃拥有任何武器的权利，目的是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在他们的领土上还保留有美国的海军基地，这是违背古巴人民的主权意愿的——以及迫使美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里停止反对古巴的敌对行动。至于说特拉捷洛尔科条约，古巴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古巴代表团团长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有关裁军非常会议上发言的观点。他声称：“问题不是古巴不承认必须停止扩散核武器……我们同时还认为，墨西哥政府提出关于签订特拉捷洛尔科条约的建议之后，对地区来说，却是迈出了良好的一步。但是，根据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古巴的关塔那摩部分领土被美国非法占为海军基地，古巴就不能消极地、单方面地放弃拥有任何一种武器的权利……。除此而外，任何人都不能要求我们当核大国在这个内陆上实施侵略政策，甚至在今天还采用露骨的威胁反对古巴的时候，把我们国家的立场都转成顺从已签订条约的规定和自愿放弃我们的权利。罗德里格斯在结尾时说，问题涉及到教训和政治原则，所以，我相信，任何人只要善于认真思考，就会理解我们的道理”。

在联大的最近一次会议上就是根据这些理由，当表决这样一些文件时，如“关于禁止为核武器生产裂变材料”的决议；苏联提出的有关“在当前还没有核武器的那些国家的领土上防止装备核武

器”的决议草案；“防止使用核武器”问题的草案等，古巴人都投了弃权票。

虽然如此，古巴朋友指出，他们高度评价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所提出的旨在限制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竞赛的一切措施和倡议，支持他们有关不允许进一步扩散核武器的一些步骤，并强调他们不是形式上参加上述一些条约的国家，虽然由于上述一些原因认为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形式上不参加这些条约是合适的，但是，他们决不有意破坏条约中所协商的结果。

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古巴一贯支持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外交倡议。譬如，在联大第34届会议上，古巴代表同大多数国家的代表投票赞成苏联提出的“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容许实施霸权主义政策”的决议草案；在审理裁军问题时，他们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也进行了合作。古巴投票支持通过的“关于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平利用原子能”决议，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和禁止使用新类型、新体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决议，支持苏联提出关于必须尽快签订“加强不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公约”的建议。它是以多数票通过的关于“以裁军为目的国际合作宣言”决议以及有关裁军问题谈判决议等的共同倡议，它还支持苏联在讨论我国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关于签订“在国际关系中不诉诸武力的世界条约”以及关于实施“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等建议的立场。

古巴的代表支持把印度洋变成“和平地带”的思想，谴责美国在世界这一地区扩大其军事力量的行动。他们……<sup>①</sup>

---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

No06031

## 哥恰连科同马尔季涅斯的谈话纪要

(1980年9月5日)

根据预约我在外交部会见了马尔季涅斯<sup>①</sup>，并作了交谈。

关于古巴和美国的关系，马尔季涅斯讲了以下情况：众所周知的秘鲁大使馆（今年4月）和美国办事处大楼（今年5月）事件及大批反社会分子经马里艾尔港去佛罗里达州以后，并且由于美国今年5月在古巴海岸进行军事演习，古巴和美国的关系非常紧张起来。现在经马里艾尔港出境和反社会分子去美国办事处大楼的问题已不那么尖锐了。马里艾尔依然是开放港口，现在每周有数艘美国船到达那里，他们能够冲破佛罗里达海岸设置的军事封锁。

关于以前的政治犯去美国办事处大楼问题，马尔季涅斯说，古巴政府从一开始就持强硬立场。我们对美国人说，不会准许任何一个进入大楼的人出国。他们都应无条件地离开大楼并向古巴当局投降。近几周内过去的政治犯及其家属在美国人的压力下大批离开美国办事处大楼。离开大楼后他们在国家安全机关受到有关的检查，然后回到自己家里。其中一些人得到古巴当局批准并按规定办法出国了。

司长继续说，美国人想就把他们不欢迎的反社会分子送回古巴问题同我们谈判。他们发来照会，其中指出，他们不准许罪犯在美国定居，想把他们送回古巴。马尔季涅斯继续说，我们在答复照会

<sup>①</sup> 马尔季涅斯，古巴外交部北美司司长。

中指出：我们不知道美国当局不准许犯罪分子在自己的领土上居住，如果美国实行这样的政策，那么就把在美国已20多年的巴蒂斯塔罪犯送回古巴，已附上在美国居住的200名巴蒂斯塔罪犯的名单。马尔季涅斯说，关于反社会分子我们回答说：经马里艾尔港离开古巴的任何人目前都不在诉讼和追捕之列。如果说其中有些人过去犯过罪，那么当时已受到应有的惩罚。

马尔季涅斯指出：美国声称，他们将单方面派飞机把反社会分子送回古巴。古巴警告美国说：古巴决不允许侵犯其主权，美国要承担入侵古巴领空的全部责任。

马尔季涅斯说：如所周知，古巴侨民大批回国探亲对古巴具有消极后果。今年侨民入境大大受到限制，基本只准许童年时随父母一起出国的年轻人回国。马尔季涅斯强调说，此外，只有那些其成员是优秀的革命者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家庭，才能获准邀请在美国的亲属。

马尔季涅斯说：在美国总统选举以前，未必能举行古巴—美国双边关系的全面谈判，其中包括停止美国经济封锁和特务飞机的侦察飞行，取消关塔那摩军事基地。如果卡特获胜，这类谈判就可能举行，尽管谈判将是困难的、长时间的。卡特是互设办事处的倡议者，如果他当选，他有责任采取措施使双边关系正常化。

据交谈者说，现在在文化和体育方面出现了一些恢复古巴—美国接触的迹象。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临时代办 B. 哥恰连科

No 06030

## 谢列茨基同季普顿的谈话纪要

(1980年9月24日)

摘自谢列茨基的日记

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谈话中，季普顿<sup>①</sup>谈了几点关于美国—古巴关系现状的看法。他说，美国方面高度评价并欢迎古巴政府关于它将把因驱赶美国飞机而犯错误的古巴人交还美国的声明。季普顿强调说，这一决定是古巴自己做出的，没有同美国方面进行任何商量。他指出，不久前驱赶我国飞机的两名古巴人已被送回美国并交给法庭。

季普顿说，他们感谢古巴方面协助解决藏在美国驻哈瓦那利益部的人的问题。现在所有这些人均已离开美国利益部大楼。其中一半已同家属一起（近510人）去了美国。据交谈者说，古巴当局很快给他们办理了出境手续。

古巴方面的这一举措，季普顿说，大大改善了两国关系的气氛，美国宣传媒体在美国加以广泛宣传。

季普顿说，据一些消息，古巴政府拟在近期解决古巴人经马里艾尔港非法去美国问题。据他说，美国方面对此举的评论是：“很好”。季普顿指出，因为我们已6次向古巴政府提出这一问题。

季普顿认为，古巴政府近来采取的所有这些措施说明，古巴政

<sup>①</sup> 季普顿，美国驻哈瓦那利益部一秘。



府关心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支持卡特的立场。交谈者指出，因为卡特现在希望在同古巴的关系中保持平静，不希望在竞选的最后阶段让这个问题变成同里根争论的又一个尖锐问题。

季普顿说，美国也采取一些措施，改善同古巴关系的气氛。他指出美方的措施是：由于古巴外交人员在纽约被杀，卡特给卡斯特罗的亲笔信，国务卿马斯基由此发表了声明。季普顿指出，我们也把这件事的调查进程通知古巴。此外，据他说，美国当局首次追究了不久前驱赶古巴船的4名古巴人的法律责任，并邀请船长在美国出庭作证。

季普顿说，美国和古巴关于关系正常化的全面谈判不能早于下一年的1月份，即新总统上任以前。他指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谈判都将是长时期的、困难的。季普顿说，毫无疑问古巴方面肯定会提出同我们关系正常化的3个主要条件，即取消经济封锁，撤消关塔那摩军事基地和停止美国飞机在古巴上空的侦察飞行。会谈对方指出，但是我们也有对古巴的要求。

谈到美国大选前的形势，季普顿指出，现在不可能说谁将是下一任美国总统。他认为，里根很有可能入主白宫。会谈对方说，在某一类选民中他有自己稳定的选票，对卡特则不能这样说。还要注意，独立的总统候选人安德森夺去卡特的大量选票。

苏联驻古巴大使馆参赞 A. 谢列茨基

№11852

**奥罗佩萨关于格林纳达革命需要援助  
致沃罗特尼科夫的信**

(1980年10月7日)

译自西班牙文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80年10月7日“第二次党代会年”

致苏联大使维·伊·沃罗特尼科夫同志

尊敬的沃罗特尼科夫同志：

如您所知，格林纳达革命需要广泛的国际支持和援助。

为此，我国领导人除采取其他类似措施外，准备赠给格林纳达1台中波广播电台和1台功率为75千瓦的苏联制造的电台发射器，我国维利亚—马里亚电台（哈瓦那）现在使用的发射器和这一台完全一样。

这种类型的发射器是我国惟一的一台。这台发射器是在古巴人员参加下苏联专家安装的。鉴于我国技术人员在安装设备期间获得的经验实在不够（不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安装，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直接安装的），最好请苏联专家帮助在格林纳达安装这一设备。

正因为如此，我们请您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转达我们的请求，让古巴邮电部和苏联邮电部互相配合，共同完成这一计划。

借此机会再次向您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并对您肯定将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赫苏斯·蒙塔涅·奥罗佩萨

№11854

## 列别杰夫转呈格林纳达求援信

###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0年11月26日)

根据苏共中央国际部（A.C. 切尔尼亚耶夫同志）的请求，将通过苏联外交部收到的格林纳达副总理、财政计划和贸易部长别尔纳尔德·科阿尔德的信的译文呈上。

附：上述信函内容共二页。摘自 H/BX. №0503，机密，只给收件人。

B.H. 列别杰夫

附 件

译自英文

1980年10月29日

致苏联邮电部长瓦·阿·沙姆申同志

尊敬的沙姆申同志：

首先请接受我的祝贺，祝贺您不久前被任命为苏联邮电部长<sup>①</sup>。

如您所知，古巴共和国赠给格林纳达1台中波电台。根据同古

---

<sup>①</sup> 瓦·阿·沙姆申 1975年任苏联邮电部第一副部长；1980年任苏联邮电部部长。

巴邮电部达成的协议，电台将由古巴和格林纳达专家共同安装。电台还配有1台苏联制造的功率为75千瓦的电台发射器。

古巴方面认为，为尽快安装发射器并使其更有效地工作，在开始时最好请苏联专家帮助安装和调试发射器。

因此，也由于我知道您能给予帮助，我请您帮助派2~3名专家来格林纳达6个月，帮助安装和调试发射器并提供技术咨询。

这些专家将观察设备的组装和调试，教授格林纳达技术人员使用和维修规程。

他们要在电台大楼竣工后到达格林纳达，但是现在不能说出准确日期。我将高兴地根据工程进展情况尽早通知您准确日期。我们预计，这些专家应在1981年第1季度来格林纳达。

最后，敬爱的沙姆申同志，请允许我预祝您在完成您承担的艰巨任务中取得巨大成绩，并对您无疑将参与解决我提的重要问题表示感谢。

致礼。

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财政计划和贸易部长  
别尔纳尔德·科阿尔德

№11853

## 扎格拉金关于关于古巴要求派苏专家去 格林纳达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0年12月1日)

机密

苏共中央

关于古巴共产党中央和格林纳达政府的请求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央国际部部长奥罗佩萨在给驻古巴大使的信中说，古巴领导人为表示对进步政体的支持，拟赠给格林纳达政府1台中波转播台和1台古巴人现有的苏联制造的功率为75千瓦的电台发射器，并请求派苏联专家去格林纳达帮助古巴人安装和调试电台的设备。

也收到格林纳达副总理科阿尔德给邮电部长沙姆申的关于派2~3名苏联专家去格林纳达6个月，帮助安装和调试电台设备并培训当地电台技术人员的请求信。

最好答应古巴共产党中央和格林纳达政府的请求，派2名专家和1名翻译去格林纳达6个月，帮助安装和调试电台并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同时应要求格林纳达方面为我国专家和翻译提供在格林纳达的住所和交通工具，费用由格林纳达方面承担。

专家和翻译出差用的苏联卢布（约14000卢布）可记在苏联无偿援助外国国家预算拨款项下；外汇（约7000卢布）可记在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预算项下。

已同邮电部副部长 B. H. 列别杰夫、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 И. И. 切尔内舍夫和财政部副部长 С. М. 鲍里索夫协商过。  
苏共中央决定草案见附件。<sup>①</sup>

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 B. 扎格拉金

1980年12月1日

---

<sup>①</sup> 参见 No06032 文件。

№06032

**苏共中央关于同意古巴和  
格林纳达政府要求的决定**

(1980年12月5日)

绝密

关于古巴共产党中央和格林纳达政府的请求

1. 同意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这一问题的命令（附件1）。
2. 批准给驻古巴苏联大使的指示文本（附件2）。

中央书记

附件 1

机密

草案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1980年12月\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鉴于古巴共产党中央和格林纳达政府的请求，责成苏联邮电部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于1981年派2名专家和1名翻译去格林纳达，与古巴专家一起帮助安装和调试古巴政府赠给格林纳达的转播电台设备，并培训格林纳达的电台技术人员，费用由苏方承



担，期限6个月。

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同格林纳达方面协商关于给苏联专家和翻译提供在格林纳达的住所和交通工具问题，费用由格林纳达方面承担。

上述专家和翻译出差格林纳达的卢布支出记在苏联无偿援助外国国家预算拨款项下，外汇支出记在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预算项下。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H. 吉洪诺夫

附件2

机密

哈瓦那

苏联大使

请会见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奥罗佩萨以及格林纳达驻古巴大使，告知他们：根据古巴共产党中央和格林纳达政府的请求，决定于1981年在商定的时间派2名苏联专家和1名翻译去格林纳达与古巴专家一起帮助安装和调试古巴方面赠给格林纳达的转播电台设备和培训格林纳达在电台工作的技术人员，期限为6个月。

告知格林纳达大使，上述专家和翻译的出差费由苏联方面承担，但格林纳达方面要给他们提供在格林纳达的住所和交通工具，费用由格林纳达方面承担。

执行情况用电报告知。

№06033

**苏联部长会议**  
**关于派遣专家帮助安装电台的命令**

(1980年12月8日)

机密

第2512号命令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鉴于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格林纳达政府的请求，责成苏联邮电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于1981年派遣两名专家和一名翻译去格林纳达，费用由苏方承担，为期6个月，目的是同古巴专家一起帮助安装和调试古巴政府赠送给格林纳达无线电广播电台的设备，以及帮助培训格林纳达无线电台的技术人员。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同格林纳达一方商定，苏联专家和翻译在格林纳达的住所和交通工具均由格林纳达一方提供。

上述专家和翻译出差去格林纳达的苏联卢布支出，应记入苏联国家预算无偿援助外国用的拨款账户上；而外汇支出则记入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预算账户上。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吉洪诺夫

№11855

奥加尔科夫关于出使古巴军事代表团人员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1年1月22日)

机密

份数编号：1

№318 / 6 / 0226

苏联国防部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

莫斯科市

苏共中央

根据1981年1月6日№II-231/48决议，申请批准由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率领军事代表团出使古巴共和国，期限为10天，代表团成员有：

——空军第一副总司令和军事委员叶菲莫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空军元帅；

——海军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副总司令和军事委员叶戈罗夫，盖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海军上将；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十总局局长卓托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陆军上将（经1978年10月19日批准，准许在任该职期间多次出国）；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总局第五处处长卡拉什尼科

夫，叶甫根尼·弗拉季米罗维奇陆军中将；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组织动员总局组织处第一副处长扎伊采夫，伊万·尼古拉耶维奇陆军中将；

——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工程总局副局长科纳科夫，彼得·伊万诺维奇陆军少将（经1979年3月30日批准，准许多次出国，有效期为3年）；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总局第三处副处长布鲁京，格尔曼·亚历山德罗维奇陆军少将；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十总局第一处、第五处处长格里高利耶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陆军少将（经1980年9月17日批准，准许多次出国，有效期为2年）；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特种使命军官马尔恺洛夫，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陆军上校。

根据苏共中央1976年8月26日批准的№СТ-23/41rc规定，兹推荐亚·尼·叶菲莫夫、盖·米·叶戈罗夫、尼·亚·卓托夫、叶·弗·卡拉什尼科夫和格·亚·布鲁金，是考虑到他们熟悉构成重大国家机密的特别重要的情况，而推荐伊·尼·扎伊采夫和尤·亚·马尔恺洛夫，是考虑到他们熟悉构成国家机密的情况。

总参谋长、苏联元帅 尼·奥加尔科夫

№11856

**索科洛夫关于出使古巴军事代表团人员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1年1月24日)

机密

份数编号：1

苏联国防部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

№318 / 6 / 0260

对1981年1月21日发出的№318/6/0226公文的补充

根据1981年1月6日№ПІ-231/48决定，申请批准苏联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特种使命将军弗罗洛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陆军中将作为由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成员出使古巴共和国，期限为10天。

根据苏共中央1976年8月26日批准的№СТ-23/41гс规定，兹推荐尼·亚·弗罗洛夫同志，是考虑到他熟悉构成特别重大国家机密的情况。

苏联元帅 谢·索科洛夫

№11857

## 萨温金关于国防部专家组 出使古巴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1年1月30日)

绝密  
特别卷宗

苏共中央

关于国防部专家组出使古巴

根据苏共中央1981年1月6日的决定(П231/48)，由总参谋长兼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尼·瓦·奥加尔科夫同志率领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将出使古巴共和国。

有鉴于此，国防部呈请批准下列人员作为该代表团成员赴古巴共和国，期限为10天：

空军元帅亚·尼·叶菲莫夫——空军第一副总司令和军事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海军上将盖·米·叶戈罗夫——海军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副总司令和军事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陆军上将尼·亚·卓托夫——总参谋部第十总局局长；

陆军中将伊·尼·扎伊采夫——总参谋部组织动员总局组织处第一副处长；

陆军中将叶·弗·卡拉什尼科夫——总参谋部作战总局第五处处长；

陆军中将尼·亚·弗罗洛夫——总参谋长兼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特种使命将军；

陆军少将格·亚·布鲁京——总参谋部作战总局第三处副处长；

陆军少将维·米·格里高利耶夫——总参谋部第十总局处长；

陆军少将彼·伊·科纳科夫——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工程总局副局长；

陆军上校尤·亚·马尔恺洛夫——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特种使命军官。

代表团拟于2月6日启程。旅行费用由国防部预算支出。

考虑到亚·尼·叶菲莫夫、盖·米·叶戈罗夫、尼·亚·卓托夫、伊·尼·扎伊采夫、叶·弗·卡拉什尼科夫、尼·亚·弗罗洛夫、格·亚·布鲁京和尤·亚·马尔恺洛夫等同志熟悉特别重要领域的情况，特希望国防部的本项申请能够得到支持。

附上苏共中央决定草案<sup>①</sup>。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干部部部长 H. 萨温金（签字）

1981年1月30日

### 证明材料

呈请苏共中央批准

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叶菲莫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同志出使古巴共和国

该同志自1969年3月起任空军第一副总司令和军事委员

<sup>①</sup> 参见文件№06033。

生年：1923年2月6日

出生地：沃罗涅日州康捷米罗夫卡区康捷米罗夫卡镇

民族：俄罗斯

1943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党证号：01785040

教育程度：高等

何时毕业于何校：1951年毕业于空军学院，1957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所学专业：作战指挥

掌握何种外语：否

是否受过党籍处分（何时由于何事受过何种处分）：否

是否出过国（何时到过何处）：1944～1945年——德国。1945～1946年——波兰，随同苏军，1970年——阿拉伯埃及共和国，1972年——索马里、印度，1976年——墨西哥、捷克，1977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1978年——越南、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古巴、土耳其，1979年——叙利亚，1980年——安哥拉

是否最高苏维埃代表，州委、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何种）：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是否获得政府奖励（何种）：列宁勋章两枚、红旗勋章5枚、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红星勋章、三级“苏联武装力量为祖国服务”勋章和奖章两枚

军衔：空军元帅

工作经历：

1941～1942年：空军驾驶员学校学员，哈尔科夫军区

1942～1944年：驾驶员，强击飞行团小队长，西线

1944～1945年：强击飞行团中队长，第二白俄罗斯战线

1945～1946年：强击飞行团主任领航员，第二白俄罗斯战线，



北方集团军

1946~1951年：空军学院学员

1951~1954年：近卫强击飞行团团长，外高加索军区

1954~1955年：近卫强击飞行师飞行教导队副队长，外高加索军区

1955~1957年：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员

1957~1958年：歼击轰炸飞行师师长，波罗的海军区

1958~1959年：近卫轰炸飞行师师长，波罗的海军区

1959~1961年：空军战斗训练副司令，波罗的海军区

1961~1964年：空军第一副司令，波罗的海军区

1964~1969年：空军司令，喀尔巴阡山军区

1969年至今：空军第一副总司令和军事委员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副部长 И. 拉林（签字）

1981年1月28日

证明材料

呈请苏共中央批准

叶戈罗夫，盖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同志出使古巴共和国

该同志自1977年7月起任海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副总司令和军事委员

生年：1918年10月30日

出生地：列宁格勒州沃洛索夫斯克区列斯特诺沃村

民族：俄罗斯

1942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党证号：00922001

教育程度：高等

何时毕业于何校：1940年毕业于伏龙芝高等海军学校，1944年毕业于潜艇航行军官培训班，1959年毕业于海军学院

所学专业：指挥，战术作战

掌握何种外语：否

是否受过党籍处分（何时由于何事受过何种处分）：否

是否出过国（何时到过何处）：1944~1945年——芬兰，1974年——挪威，1977和1978年——法国，1980年——叙利亚

是否最高苏维埃代表，州委、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何种）：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是否获得政府奖励（何种）：列宁勋章、红旗勋章3枚、一级卫国战争勋章两枚、红星勋章、十月革命勋章和奖章10枚

军衔：海军上将

工作经历：

1936~1940年：伏龙芝高等海军学校学员

1940~1943年：潜艇领航员，波罗的海舰队

1943~1944年：潜艇艇长助理，波罗的海舰队

1944~1944年：潜艇航行军官培训班学员，列宁格勒市

1944~1950年：潜艇艇长，波罗的海舰队

1950~1953年：堪察加海军分队潜艇艇长，太平洋舰队

1953~1954年：潜艇分队队长，太平洋舰队

1954~1956年：潜艇总队参谋长，太平洋舰队

1956~1959年：海军学院学员，列宁格勒市

1959~1961年：潜艇师师长，北方舰队

1961~1963年：潜艇分舰队队长，北方舰队

1963~1967年：北方舰队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

1967~1972年：海军战斗训练副总司令兼海军战斗训练处处

长

1972~1977年：北方舰队司令和军事委员

1977年至今：海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副总司令和军事委员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副处长 И. 拉林（签字）

1981年1月28日

### 证明材料

呈请苏共中央批准

卓托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志出使古巴共和国

该同志自\_\_\_\_\_年起任总参谋部第十总局局长

生年：1923年12月8日

出生地：沃罗涅日州上哈夫卡区彼罗夫卡村

民族：俄罗斯

1944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党证号：01793509

教育程度：高等

何时毕业于何校：1949年毕业于装甲坦克军事学院，1954年  
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66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所学专业：诸兵种合同作战指挥

掌握何种外语：否

是否受过党籍处分（何时由于何事受过何种处分）：否

是否出过国（何时到过何处）：1954~1962年——民主德国，  
1970~1972年——越南，随同苏军

是否最高苏维埃代表，州委、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何种）：否

是否获得政府奖励（何种）：十月革命勋章、红旗勋章 5 枚、二级卫国战争勋章、红星勋章和奖章 8 枚

军衔：陆军上将

工作简历：

1940~1941 年：海军航空兵学校学员，沃罗涅日通讯学校学员

1941~1942 年：步兵旅独立通讯营副连长、连长，中亚军区和西部战线

1942~1943 年：通讯军官进修班学员，坦克军独立通讯营通讯连连长，莫斯科军区

1943~1945 年：无线电专科学校无线电科教员

1945~1949 年：装甲坦克军事学院学员

1949~1952 年：装甲坦克高等军官学校教员

1952~1954 年：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员

1954~1956 年：近卫坦克师机械化团参谋长，苏联驻德国集团军

1956~1958 年：苏联驻德国集团军司令部军事科学组研究员

1958~1961 年：摩托化步兵师摩托化步兵团团长，苏联驻德国集团军

1961~1964 年：近卫坦克师参谋长兼副师长，苏联驻德国集团军和白俄罗斯军区

1964~1966 年：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员

1966~1968 年：近卫摩托化步兵师师长，白俄罗斯军区

1968~1970 年：坦克军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白俄罗斯军区

1970~1972 年：南方集团军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

1972~1977 年：总参谋部管理总局情报处长

1977~1978 年：总参谋部作战总局第一副局长

1978年至今：总参谋部第十总局局长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副部长 И. 拉林（签字）

1981年1月30日

### 证明材料

呈请苏共中央批准

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扎伊采夫，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同志出使古巴共和国

该同志自1977年3月起任总参谋部总组织动员局组织处第一副处长

生年：1923年3月3日

出生地：伏尔加格勒州列宁斯克市

民族：俄罗斯

1944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党证号：01780519

教育程度：高等

何时毕业于何校：1949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67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所学专业：指挥

掌握何种外语：否

是否受过党籍处分（何时由于何事受过何种处分）：否

是否出过国（何时到过何处）：1945~1946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奥地利、匈牙利，1968年——捷克，1979年——匈牙利，1980年——波兰、尼加拉瓜

是否最高苏维埃代表，州委、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何种）：否

是否获得政府奖励（何种）：列宁勋章、红旗勋章、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红星勋章两枚、三级“苏联武装力量为祖国服务”勋章和奖章 20 枚

军衔：陆军中将

工作简历：

1941~1942 年：涅文诺梅斯航校学员，日托米尔步兵学校学员，北高加索军区

1942~1946 年：步兵师步兵团排长，团副参谋长，斯大林格勒战线，第三乌克兰战线和南方集团军

1946~1949 年：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员

1949~1958 年：总参谋部武器装备计划和物资技术供应局军官、高级军官、主任监察员和科长

1958~1964 年：陆军总参谋部武器装备计划和军事技术局副局长、处长、副局长

1964~1965 年：总参谋部第三局副局长

1965~1967 年：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员

1967~1968 年：军副参谋长，外高加索军区

1968~1971 年：总参谋部组织动员总局组织处副处长

1971 年至今：总参谋部组织动员总局组织处第一副处长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系部副部长 И. 拉林（签字）

1981 年 1 月 30 日

## 证明材料

呈请苏共中央批准

卡拉什尼科夫，叶甫根尼·弗拉季米罗维奇同志出使古巴共和国

该同志自1976年4月起任总参谋部作战总局第五处处长

生年：1928年7月28日

出生地：塔什干市

民族：俄罗斯

1950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党证号：01774880

教育程度：高等

何时毕业于何校：1955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71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所学专业：指挥

掌握何种外语：否

是否受过党籍处分（何时由于何事受过何种处分）：否

是否出过国（何时到过何处）：1949～1952年——随苏联军队赴奥地利，1961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外公差

是否最高苏维埃代表，州委、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何种）：否

是否获得政府奖励（何种）：红星勋章、三级“苏联武装力量为祖国服务”勋章和奖章9枚

军衔：陆军中将

工作简历：

1946～1949年：列宁格勒和基辅炮兵学校学员

1949～1952年：榴弹炮团排长、连长，中央集团军

1952~1955年：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员  
1955~1959年：特种使命防空军管理局侦察军官  
1959~1965年：国内防空导弹部队司令部防空导弹处高级军官  
1965~1968年：防空兵团 61772 部队队长  
1968~1969年：防空导弹旅旅长  
1969~1971年：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员  
1971~1973年：防空兵团副司令，莫斯科军区防空部队  
1973~1976年：莫斯科军区防空部队作战处处长兼副参谋长  
1976年至今：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处长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副部长 И. 拉林（签字）

1981年1月28日

### 证明材料

呈请苏共中央批准

弗罗洛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出使古巴共和国

该同志自1977年2月起任总参谋长兼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特种使命将军

生年：1928年10月20日

出生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索尔维切高德斯卡区福法耶夫斯卡亚村

民族：俄罗斯

1952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党证号：01780070

教育程度：高等



何时毕业于何校：1962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72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所学专业：指挥

掌握何种外语：否

是否受过党籍处分（何时由于何事受过何种处分）：否

是否出过国（何时到过何处）：1962~1969年——随苏军驻扎德国，1970~1978年——赴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捷克、越南、蒙古、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出差

是否最高苏维埃代表，州委、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何种）：否

是否获得政府奖励（何种）：三级“苏联武装力量为祖国服务”勋章和奖章 18 枚

军衔：陆军中将

工作经历

1949~1952年：切列波维茨步兵学校学员

1952~1953年：机枪炮兵步兵排排长，滨海军区

1953~1957年：机枪炮兵步兵团体育运动训练主任，远东军区

1957~1959年：步兵营副参谋长、独立步兵旅步兵连连长，远东军区

1959~1962年：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员

1962~1968年：军参谋部作战和侦察科军官、高级军官，苏驻德集团军

1968~1970年：总参谋部作战总局战线作战高级军官

1970~1972年：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员

1972~1977年：总参谋部战线科高级军官、组长、副科长、科长

1977 年至今：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特种使命将军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干部副处长 И. 拉林（签字）

1981 年 1 月 28 日

### 证明材料

呈请苏共中央批准

布鲁京，盖尔曼·亚历山德罗维奇出使古巴共和国

该同志自 1979 年 7 月起任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处长

生年：1928 年 4 月 20 日

出生地：莫斯科市

民族：俄罗斯

1956 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党证号：01780066

教育程度：高等

何时毕业于何校：1961 年毕业于装甲坦克部队军事学院，  
1969 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所学专业：指挥

掌握何种外语：否

是否受过党籍处分（何时由于何事受过何种处分）：否

是否出过国（何时到过何处）：1950～1956 年——随同苏军驻扎在罗马尼亚，1961～1967 年——随同苏军驻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是否最高苏维埃代表，州委、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何种）：否

是否获得政府奖励（何种）：红星勋章、三级“苏联武装力量

为祖国服务”勋章和奖章8枚

军衔：陆军少将

工作经历：

1947~1950年：基辅自行火炮联合学校学员

1950~1952年：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排长，独立机械化军

1954~1958年：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连长，独立机械化军和波罗的海军区

1958~1961年：装甲坦克部队军事学院学员

1961~1962年：坦克团营长，苏驻德国集团军

1962~1967年：苏联驻德国集团军坦克军参谋部作战科军官、苏驻德国集团军作战参谋部作战科军官和高级军官

1967~1969年：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员

1969~1979年：总参谋部作战总局战线高级军官、战线组组长、战线科副科长、战线科科长

1979年至今：总参谋部作战总局管理处副处长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副部长 И. 拉林（签字）

1981年1月28日

## 证明材料

呈请苏共中央批准

格里高利耶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出使古巴共和国

该同志自1972年5月起任总参谋部第十总局处长

生年：1925年8月7日

出生地：莫斯科州叶戈里耶夫区克鲁吉村

民族：俄罗斯

1944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党证号：03490545

教育程度：高等

何时毕业于何校：1958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

所学专业：指挥

掌握何种外语：否

是否受过党籍处分（何时由于何事受过何种处分）：否

是否出过国（何时到过何处）：1964～1966年——国外公差，1969年——坦桑尼亚、伊拉克、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古巴，1971～1978年——赴尼日利亚、索马里、几内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公差

是否最高苏维埃代表，州委、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何种）：否

是否获得政府奖励（何种）：红旗勋章、红星勋章、三级“苏联武装力量为祖国服务”勋章和奖章13枚

军衔：陆军少将

工作简历

1942～1944年：列兵，独立营排长，莫斯科步兵学校学员

1944～1945年：步兵团步兵排长、步兵和滑雪连连长，沃尔霍夫战线、第三波罗的海战线、列宁格勒战线

1945～1946年：步兵师独立教导营主任副官，列宁格勒战线和沃罗涅日军区

1946～1949年：库尔斯克州韦谢金斯克区兵役委员会军官，莫斯科军区

1949～1950年：沃罗涅日军区副司令副官、司令主任副官

1950～1953年：沃罗涅日军区司令部秘书处和办公室主任

1953～1955年：沃罗涅日军区步兵团步兵营参谋长

1955~1958年：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员

1958~1960年：摩托化步兵团摩托化步兵营参谋长、营长，  
外贝加尔军区

1960~1964年：摩托化步兵师副团长，外贝加尔军区

1964~1966年：总参谋部第十总局待命分配

1966~1972年：总参谋部第十总局高级军官、副科长

1972年至今：总参谋部第十总局处长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副部长 И. 拉林（签字）

1981年1月30日

### 证明材料

呈请苏共中央批准

科纳科夫，彼得·伊万诺维奇出使古巴共和国

该同志自1979年3月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  
工程总局副局长

生年：1921年7月19日

出生地：基洛夫州基齐敏斯克区拉纳科沃村

民族：俄罗斯

1950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党证号：00134805

教育程度：高等

何时毕业于何校：1952年毕业于空军工程学院

所学专业：苏联武装力量机械工程师

掌握何种外语：否

是否受过党籍处分（何时由于何事受过何种处分）：否

是否出过国（何时到过何处）：1955～1958年——国外公差，  
1970～1980年——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公务

是否最高苏维埃代表，州委、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何种）：否

是否获得政府奖励（何种）：红星勋章、三级“苏联武装力量为祖国服务”勋章、荣誉勋章和奖章8枚

军衔：陆军少将

工作简历：

1939～1940年：伊尔库茨克航空技术学校学员

1940～1944年：航空团和全苏武装力量高级领航员学校航空机械师，莫斯科军区

1945～1952年：空军工程学院学员

1952～1953年：全苏武装力量航空机械试验建造总局高级军官

1953～1955年：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工程总局高级军官

1955～1958年：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工程总局待命分配

1958～1979年：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工程总局总工程师、副处长和处长

1979年至今：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工程总局副局长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系部副部长 И. 拉林（签字）

1981年1月30日

## 证明材料

呈请苏共中央批准

马尔恺洛夫，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出使古巴共和国

该同志自 1977 年 1 月起任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特种使命军官

生年：1933 年 9 月 13 日

出生地：塔什干市

民族：俄罗斯

1958 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党证号：03490739

教育程度：高等

何时毕业于何校：1966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

所学专业：指挥

掌握何种外语：否

是否受过党籍处分（何时由于何事受过何种处分）：否

是否出过国（何时到过何处）：1956～1963 年——随苏军驻扎民主德国，1978 年——在土耳其执行公务

是否最高苏维埃代表，州委、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何种）：否

是否获得政府奖励（何种）：三级“苏联武装力量为祖国服务”勋章和奖章 7 枚

军衔：陆军上校

工作简历：

1952～1954 年：乌法军校学员

1954～1956 年：机械化师机械化团排长、共青团书记，外高加索军区

1956~1963年：近卫摩托化步兵连共青团书记、步兵排长、步兵连长，苏驻德国集团军

1963~1966年：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员

1966~1968年：摩托化步兵营营长、近卫摩托化步兵师司令部作战科高级助理，莫斯科和远东军区

1968~1973年：总参谋部军事科学局高级研究员

1973~1974年：第一副总参谋长的特种使命军官

1974~1977年：国防部副部长兼苏联国家技术委员会主席的特种使命军官

1977年至今：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特种使命军官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干部副处长 И. 拉林（签字）

1981年1月30日



№11858

## 奥加尔科夫关于出使古巴军事代表团人员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1年2月3日)

机密

份数编号：1

苏联国防部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

№318 / 6 / 0393

莫斯科市

根据1981年1月6日№II-231/48决议，申请批准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组织动员总局组织处第一副处长扎伊采夫，伊万·尼古拉耶维奇陆军中将与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特种使命军官马尔恺洛夫，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陆军上校作为由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成员出使古巴共和国，期限为10天。

根据苏共中央1976年8月26日批准的№СГ-23/41гс规定，兹推荐伊·尼·扎伊采夫和尤·亚·马尔恺洛夫二同志，是考虑到他们熟悉构成特别重大国家机密的情况。

总参谋长、苏联元帅 尼·奥加尔科夫（签字）

№06034

苏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国防部专家组出使古巴的决定

(1981年2月5日)

绝密

特别卷宗

同意国防部关于今年2月由总参谋长兼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尼·瓦·奥加尔科夫同志率领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出使古巴共和国，期限为10天。代表团成员有：空军元帅亚·尼·叶菲莫夫、海军上将盖·米·叶戈罗夫、陆军上将尼·亚·卓托夫、陆军中将伊·尼·扎伊采夫、陆军中将叶·弗·卡拉什尼科夫、陆军中将尼·亚·弗罗洛夫、陆军少将格·亚·布鲁金、陆军少将维·米·格里高利耶夫、陆军少将彼·伊·科纳科夫和陆军上校尤·亚·马尔恺洛夫。

表决结果：

苏斯洛夫（签字）……<sup>①</sup>

抄送葛罗米柯、鲁萨科夫、……<sup>②</sup>

已分发：1981年2月5日，哈尔图林娜（签字）<sup>③</sup>

① 此处签名一人，其余6人签名字迹分辨不清。

② 其余4人姓名字迹不清。

③ 文件上有批注：“代表团的费用由国防部预算支出，希知照执行。”

№06035

## 鲍里索夫关于古美关系的报告

(1981年9月14日)

机密

份数编号：3

目前美国与古巴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这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冒险政策引起的。如菲·卡斯特罗所指出的，随着里根总统入主白宫，美国又开始叫嚣要把古巴从美洲大陆的政治地图上消灭掉，激起反对古巴的情绪，大谈特谈制定海上封锁，乃至直接军事侵略的计划。美国当局更加公开地策动在美国的古巴反革命组织制定反对古巴革命的武装行动，破坏古巴国民经济和对古巴领导人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的计划。美国人在各种国际组织中、在世界各国群众性信息工具中系统地进行敌视古巴的宣传。用菲·卡斯特罗的说法，美国“加强了旨在对古巴进行经济封锁的活动，利用自己的影响以期达到禁止古巴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售镍”。

里根当局把古巴在本地区的对外政策视为“苏联政策的延续”。因此，里根当局的代表人物声称决心“还击莫斯科与哈瓦那的阴谋”。美国从这点出发，近来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致使古美关系恶化。

如古巴外交部领导部门所指出的，美国人目前重新强化了控制，禁止美国公司及其在第三国的分公司向古巴出售技术和其他产品，禁止西方国家用古巴出口的镍和其他产品制造的工业品进入美

国市场。结果，某些意大利和加拿大公司被迫中止了与古巴的经济合作。美国政府制定给加勒比地区国家经济援助计划，坚决拒绝把古巴包括在内，禁止在美国资本控制下的国际金融机构向古巴提供信贷。在华盛顿当局公开的压力下，8个发达国家和14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把古巴排斥在“南北对话”之外，给古巴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首领的威信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减少了古巴今后获得西方经济援助的可能性。

美国政府为了达到从外交上在西半球孤立古巴的目的而花费了不少的力气。在美国的影响下，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走上冻结与古巴人的合作，而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则中断了与哈瓦那的关系。挑起了厄瓜多尔大使馆里举世皆知的事件，致使古巴与这个国家关系尖锐化起来。古巴与巴拿马关系中出现了某种低落。西加政府在牙买加执政以后，与这个国家的关系也恶化了。

里根当局尽力说服拉美各国与古巴冻结政治和经贸上的交往，人为地制造了苏联继续向古巴运送军事装备的“问题”。美国人断言，如今古巴的军事潜力“超过了防务需要”，似乎是为了将来利用它反对拉美邻国。

美国人在这个杜撰的借口下展开了反对古巴的运动。他们特别指责古巴通过尼加拉瓜向萨尔瓦多和其他中美洲国家运送从苏联得到的武器。9月1日，美国国务卿就已正式声明，说萨尔瓦多游击队里有古巴的军事专家。

有鉴于此，古巴政府发表声明，揭穿了美国发动的中伤诽谤运动。美国人的断言被称作“无耻的和卑劣的谎言”，完全被推翻。声明中说，萨尔瓦多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古巴的军事人员，因此美国政府对自己的造谣不能拿出任何证据。

里根政府违背现行的国际实践，不仅不限制古巴的反革命组织在美国的活动，而且事实上推动他们进行反对自己祖国的敌对活

动。今年6月，马坦萨斯省破获一个破坏团伙，这是反革命组织“阿尔法-66”投到古巴领土上来的。审讯过程中查清，这个团伙的任务是进行破坏和暗杀活动，从事颠覆性宣传。

今年8月12~13日，“古巴人联合会”组织的一伙反革命的古巴流亡者，企图把“和平空降兵”空投到关塔那摩美国军事基地，目的是在那里组建“自由古巴临时政府”。虽然这一挑衅阴谋没能得逞，朋友们并不排除古巴反革命有可能重新采取类似的行动。

譬如8月30日，美国海岸警备队阻截了16名古巴流亡者，他们再一次企图“和平进入”关塔那摩美国军事基地，他们没有隐瞒自己的反革命计划。“古巴人联合会”这个流亡组织的首领们公开声称，他们不放弃建立“古巴流亡政府”和坚持反对古巴革命的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的企图。美国当局对这个组织以及其他反对古巴的组织的活动不加任何限制。用古巴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K.阿尔考威的话来说，里根当局目前对待古巴没有明确制定的政策。然而，美国人在进行敌视古巴的种种活动的同时，又让人了解他们有兴趣与古巴讨论涉及到两国利益的个别问题。特别是美国南部各州的政府和社会团体表示越来越关注1980年夏逃离古巴的古巴人中，有大量反社会分子在他们的领土上活动，也关注古巴新的功率强大的中波无线电广播，这干扰了美国南部的地方无线电广播。

9月初，美国和古巴官方代表就重新确定无线电频率问题举行了预备性会谈，因为美国和古巴的无线电台使用同一波段广播。会谈在积极的气氛中进行，将要继续下去。

可是古巴人现在并不期待美国方面能够认真地提出使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建议。古巴外交部认为里根当局将来对待古巴也会奉行强硬路线，输出反革命，镇压这个地区民族解放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古巴打算一如既往，采取坚定不移的和始终如一的路线，支持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经济和政治

独立的斗争。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 鲍里索夫

原件一份，归档

增印并分送：

- 1——苏联外交部第一拉美司；
- 2——苏联外交部美国司；
- 3——苏共中央国际部

№06036

## 切尔内什与蒂普敦的谈话纪要

(1981年9月21日)

机密

份数编号：3

摘自 Ю.С. 切尔内什日记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馆

我在日本大使馆的招待会上遇见了约·蒂普敦<sup>①</sup>，与他谈话时要求他对在哈瓦那召开的国际议会联盟第六十八次大会给予评价。

美国外交家立即猛烈批评古巴人，带着明显的愤怒声称，菲·卡斯特罗在大会上讲话时粗暴地违反了国际伦理，公开对里根总统进行侮辱，从而也侮辱了美国。据蒂普敦说，古巴领导人“丧失了分寸感”，力图给“第三世界”各国造成良好的印象，把自己描绘成他们惟一的保卫者和首领。这个美国人认为，菲·卡斯特罗“古怪的”讲话所期望的正是这一点，他近来系统地，而常常是毫无根据地批评里根。约·蒂普敦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举出了菲·卡斯特罗反对里根的激烈声明，这是早在后者当选总统之前做的。

蒂普敦为了发挥这个思想，宣称菲·卡斯特罗在大会上的讲话把美古关系有可能正常化的“一切桥梁都焚烧了”，如今在里根在任的整个期间都丧失了改善美古关系的机会。约·蒂普敦说，他认

<sup>①</sup> 约翰·蒂普敦，美国驻古巴办事处一等秘书。

为古巴领导人的这种政策最低限度是轻率的，因为它加剧了围绕着古巴本来就已很紧张的局势，增加了出现对于古巴来说各种不良后果的危险性。

我问蒂普敦具体指的是什么，他对这个问题回答说，美国当局在业已形成的局势下将更难于制止住在佛罗里达的具有敌对情绪的古巴流亡者危险的偷袭。他这时提到今年8月发生的事件，当时“古巴人联合会”组织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乘三条船企图从关塔那摩美国基地登陆，其目的是在那里成立临时政府。众所周知，美国巡逻队经过努力，在海上把这些船只阻截并且遣返回迈阿密。

约·蒂普敦解释说，类似的事件将来也会不断发生，况且在美国与古巴目前这种关系下，古巴流亡者的活动将会越来越积极和自行其是。

我回答说，古巴的“毛毛虫”及其组织的偷袭对于古巴来说从来不构成严重的威胁，古巴在20年前在吉隆滩能够成功地保卫自己，而如今拥有更大的力量和手段，足已击溃任何侵略。

我提醒交谈者，菲·卡斯特罗在大会上的报告中专门强调他对美国的指责并非针对美国人民，而只是针对里根总统的现政府，古巴人对这个政府的真实意图不抱任何幻想。我向约·蒂普敦举出古巴人爱好和平的倡议、他们力求与美国达成更大的相互谅解等这些众所周知的实例，可是美国对此回报以对古巴进行新的细菌破坏，对古巴岛加强经济和政治封锁。

我指出，美国现行的对外政策的侵略矛头不仅遇到了古巴和社会主义友好国家激烈的协同一致的抨击，而且也遭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对。国际议会联盟第六十八次大会的工作就是例证，美国及其亲密盟国的立场在大会上蒙受了明显的损失。

谈话结束时，我对美国驻古巴利益部的领导人魏因·斯米特突



然返回华盛顿的原因发生了兴趣。问道：这是否与美国打算收缩或中断与古巴的外交接触有关。

约·蒂普敦回答道，斯米特被召回国务院是为了磋商国际议会联盟大会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他此行不带有政治外交行动的性质。

大使馆参赞 Ю. 切尔内什

原件一份，归档

增印并分送：

- 1——苏联外交部第一拉美司；
- 2——苏联外交部美国司；
- 3——苏共中央国际部

№06037

**沃罗特尼科夫就罗德里格斯与  
黑格的谈话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1年12月7日)

绝密

份数编号：仅此一份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馆

寄上苏联大使馆从卡·拉·罗德里格斯处得到的他于今年11月23日在墨西哥与美国国务卿亚·黑格谈话的速记稿。

附上西班牙文本38页，译文26页，仅此寄上的一份。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 B. 沃罗特尼科夫 (签字)

附 件

译自西班牙文

### 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博士于1981年11月23日  
在墨西哥庆祝“吉隆滩胜利二十周年”集会时与  
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的谈话  
(速记稿, 国务委员会)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 何塞, 你为什么不再跟我们一起呆一会儿呢? 我想要说上几句开场白。

何塞·卡斯坦耶达: 啊, 是的。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 总共只呆一小会儿(用英语说)。您可以坐一会儿吗?

何塞·卡斯坦耶达: 是的, 当然。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 等一下(用英语说)。

我觉得必须而且应该向墨西哥政府表示古巴政府的谢意, 因为它在促成这次会晤时表现出良好的意愿。

当墨西哥政府向我们提出这个倡议时, 我们立即回答表示同意。的确, 这是个很艰难的时刻, 因为我们在我们革命的整个时期从来都没有遇到对我们国家这种一连串指责和威胁。此外, 我们得悉我们的交谈者将是国务卿先生, 而黑格先生本人恰恰是这种倾向最积极的表达者之一。然而, 我们认为这次会晤符合我们自从古巴革命胜利取得政权的那一时刻起一贯坚持的那些原则。

我们从来都不拒绝对话。我们一向认为对话应该在平等、相互尊重的条件下进行; 从我们这一方面来说, 我们从尊重原则的角度

看待对话，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是不容讨论的。

这些年来，我们曾经与美国政府有过接触：与福特当局，与卡特当局在相应的层次上。有过接近的时刻。后来产生了一些情况，中断了这种接近。

我们在给墨西哥政府的公函中想要说明，我们从我们这一方面来说完全同意洛佩斯·波尔蒂利奥总统昨天表达的思想，他号召停止双方近来广泛采用的口头恐怖主义并且开始缓和。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在我们坚持的原则范围内，我们认为这是可能的。我们正是带着这种意图来参加这次会晤的。这次会晤并不轻松，将要谈到的是调解一些已尖锐化到对抗的边缘的问题。然而，我们认为只要双方都表现出相互尊重并且尊重每一方的权利，就能找到不仅双方都可接受，而且整个地区都可接受的解决途径。

亚历山大·黑格：我高度评价您的开场白。有一个时期，我十分关注您的辉煌的职务业绩。我也非常感谢洛佩斯·波尔蒂利奥总统几个月以前向里根总统提出的建议，他表示要充当这次会谈的促成者。

何塞·卡斯坦耶达：联系人。

亚历山大·黑格：我们没有与“促成者”相应的词汇，因此您认为更好一些，那么也可说是“联系人”或者“桥梁”。

（何塞·卡斯坦耶达走出大厅。）

我们在华盛顿认为这对于我们会晤来说是一次非常合适的机会，因为的确，我们在这二十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危机的时刻；即使是没有这些危机，这二十多年也是很艰难的。在我们面前惟一的道路是通向做出选择的必要性。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认为在进一步向前迈进之前，必须在两国政府间进行谈判。

早在本次会晤开始之前，我就向何塞表示了我们的谢意。他这种积极的倡议使我们有可能讨论局势，从第一次会晤开始，在研究

引起双方不安的那些问题方面向前推进。

我非常感谢您从遥远的地方来参加这次非正式的不公开的会晤。我们从自己方面打算对这次会晤保密。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这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也是这样决定的。

亚历山大·黑格：我与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时间也许远远超过您所想的。我最早开始在华盛顿工作是在约翰·肯尼迪总统时代。在所谓导弹危机之后，我给塞鲁斯·万斯当助手，现在清楚记得这次危机之后那些沉重的日子；每一方为了反对对方而采取的行动，归根结底给你们带来的不是潜在危险的后果，而是相对安静的生活的时期。后来，从1975~1976年开始，由于各种原因，事态变得很糟，而且继续恶化。现在我们走到了边缘，显而易见，即使是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许可以把它叫做危险。

考察一下近二十年来我们的关系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对于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1975年在我以前同事福特和基辛格当政时开始的困难，以及在越南和水门事件影响下形成的美国国内局势——正是他们，而不仅仅是通常的地缘政治原因——成了关系不断恶化和分歧扩大过程的基础，我把这视为国际和平事业非常危险的因素。

那时我正在国外，然而却与基辛格和福特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当时在政策上没有力量在美国取得普遍的支持，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当时是正确的。后来福特总统的政府辩证地反映了美国人民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之后的精神状态。

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任何一种施加力量都会产生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发生了这种事。如今我们民族的士气相当旺盛了，允许军费开支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同时又能同意限制社会经济方面的开支。这种士气表现在对解决国际矛盾的日益增长的强

烈要求上，因为美国人民把这些矛盾看成是对和平的威胁。

说到美国与古巴，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从来都不存在由于种族的和精神的冲突而形成的紧张关系。恰恰相反。美国人和古巴人在历史上曾经是非常亲密的，有过良好的关系，相互尊重的关系。然而，从客观现实出发，——理由充分也罢，不充分也罢——美国的人民把一系列事件看成是对自己切身的民族利益的挑战，看成是武装干涉。这种局面是长期形成的，从1975年开始，直到今天。起初是安哥拉，后来是埃塞俄比亚、南也门、对北也门的威胁，古巴在所有这一切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从1978年开始，我们在我们这半球上又看到了60年代初所特有的那种行动的复活。从美国的利益角度来看，人民把这些行动当成是不能允许的武装干涉行为。60年代就是这样。70年代初开始了寂静的时期。后来又强化了紧张气氛。根据我们主观的评价，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离不开与苏联的关系，离不开苏联的行动。

导弹危机之后，我们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紧张时期。1969年底情况有所好转，尽管当时在越南存在着冲突，而且苏联在这场冲突中起了重要作用，坦率地说，起了主要的作用。当时我曾经到过那里，我想，美国人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在那个形势下事情做得不体面。这是解决问题的尝试，其出发点纯粹是考虑到越南两个部分之间的所谓社会公正性，当时须要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只是超级大国才使这场战争成为可能的。美国人从这里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国内的力量应该创造条件，——通过和平的途径也好，通过流血的途径也好——为了保障自己的未来。惟有纯粹依靠自己的资源，——理由充分也罢，不充分也罢——他们才能表现出人民中间的关怀与相互关系。我可以这样说，美国对待中美洲正是持这种立场。

我不认为里根总统对古巴的社会制度抱有某种先入为主的看

法。他的看法应该由古巴人民来决定。

我们虽然存在着意识形态的矛盾，但有能力共处，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与其他一些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南斯拉夫和东欧越来越多的国家。不管苏联如何狡辩，问题完全不在这里。换句话说，根据一切来判断，从美国对待古巴政治制度的态度方面来说，他们把我们之间的困难硬说成是意识形态上的不满。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我和您在这里，很好。（用英语说）

亚历山大·黑格：我说过，我们注意到在苏联全球性的活动与古巴地区性的活动之间的一致性。

我们掌握了数字，知道你们的资源有三分之一来自苏联：与交通、设备、材料，以及支持古巴经济所必需的所有资产、设施相关的一切。

另一方面，我们在1975年曾经是那种形势的见证者，迫使我们主观上认为苏联领导人很看重我们国家发生的变化，把这看成是地缘政治性质的变化——我指的是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这一点从其在非洲、东南亚、西北亚和西亚扩展活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样一来，就存在一种倾向——正确的也好，错误的也好——断定莫斯科与哈瓦那之间在采取国际行动方面达成了一致，如果说这种一致不是自觉的，最低限度也是事实上的。这一切在美国造成一种情绪，导致了里根先生的执政。

我们密切地关注着社会舆论的要求，我相信，美国人民的情绪绝对有利于我们与古巴关系的变化，这不是好的意义上的，而是威胁意义上的变化。我在这里也许从主观上曲解了概念，但这却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我认为任何一个领导人执政时都形成了对事物的见解，里根总统也不例外。假如考虑到他不久以前对他应该如何履行自己的使命的理解，他或许也是例外。但是我可以让您相信，他是个爱好和平

的人，是个希望把武器的重担从人民的肩上卸下来的人，是个并不反对社会变革的人。他对坎昆会晤的矛盾的态度，他在加勒比地区发展的基本方向上的倡议，应该成为坐标。我根据他的指示会晤了东欧各国的领导人和安哥拉制度的代表。我认为这一切足以证明问题并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地缘政治。正是因此，他出于这种理解，准备不让事情发展到最危险的边缘。我最近几个月一直忙于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非常了解古巴在安全、经济和防务方面的现实。我们十分清楚古巴最薄弱的地方。我们与苏联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他们非常理解这些辩论的意义，了解行动的界线，一旦越过这个界线，就可能引起超级大国间的对抗。我们对这种对抗做好了准备。

同时，我们也非常细致地分析了古巴的需要，从它对未来的希望的意义上来。我们觉得古巴人民由于在国外的牺牲而遭受了许多痛苦。我们估计，目前尚存在着可能性来实现它在我们这个半球的关系，以及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

您知道，部长先生，所谓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有许多领导人如今拒绝苏联的武器、它的技术、与它的贸易，拒绝参与经济合作，因为在这里得到的奖赏要根据牺牲的刻度盘来测量。你们自己由于这种现实而遭到痛苦，你们有权参与国际贸易，包括与美国的贸易。我了解，里根总统认为与古巴的贸易是可能的。我们应该用相互尊重的精神来谈这件事，您曾经提到相互尊重的精神，这种精神应该成为独立世界的宗旨。为此，则应该考虑到地缘政治的现实。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非常感谢。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听取了国务卿先生阐述的各项原则。我起初特别留意两点。首先，留意您讲到里根在与古巴的双边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在和平问题，以及今天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上总的立场



的那些话。

我们非常清楚地感觉到里根及其领导集团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待问题的危险性。坦率地说，在各种声明中，首先在里根那里，我们看到了很大的意识形态的负担。我们非常惊讶的是在国务卿的声明中也发现了这一点。这不只一次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根据从欧洲一些著名的领导人那里获得的信息来判断，我们对黑格先生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形成了另一种印象。我们认为他的立场是更实用主义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立场不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这种立场只不过是更实用一些，没有更多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们所听到的让人有理由深思。

让我感到重要的第二点，在于祈求美国与古巴两国人民的相互感情。我对此完全赞同。

尽管22年来不断发生尖锐的冲突，古巴却没有反美情绪。人民中间没有，我们当领导者的也不依靠反美的感情。我们可以十分断然地谈论这一点，任何一个美国人，不管他的职位和立场，与我国人民会见的过程中都表现出这一点。

我现在——听了国务卿先生方才说这番话之后——感到满意的是有可能把我们如今的矛盾尖锐化列在地缘政治原因上。但愿我能有必要的良好口才，在我们可以支配的短暂的时间里能够证明地缘政治的现实，实际上并不是像让人觉得的那样。

我很清楚，国务卿先生是位酷爱哲学的人。譬如说，早在17世纪，自从休谟时代起，就已证明：“B”实际上出现在“A”之后；这并不意味着“A”必定是“B”出现的原因。为了不让您劳累，我尽量以最简短的形式讲讲我们对1975年以来的各种事件的解释。我们去了安哥拉，但丝毫都不希望在那里建立我们的驻军。谈到驻军，我指的是正规军。第一批派往安哥拉150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国家的事件后来会酿成什么。这一点我可以完全

肯定地向您声明。

我们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早就保持联系，支持他们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涅托总统要求我们帮助他培训一批人，以便依靠这批人组建安哥拉军队。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向安哥拉三所学校派出了 150 人：一所学校在南方，另一所在东北，第三所在罗安达附近。后来事态是这样发展的：我们突然得到涅托的通知，说他们遭到了进攻，扎伊尔人和霍尔敦·罗伯托的军队从北方，南非从南方。

我可以断然地让您相信，因为我直接参与了这件事。当决定往安哥拉派遣古巴军队的时候，我们没有就此事向苏联进行任何通报。我们甚至不清楚苏联对此的观点。我们对于不得不派遣的军队丝毫没有数量观念。就这样，第一批被派去了，当时军队在南方离开纳米比亚国境线已有 400 多公里，几乎是 500 公里，抵达了洛比托和本格拉，而扎伊尔的军队离罗安达只有 30 公里。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起初派遣的不是正规部队，而是几支特遣队。

诚然，后来在古巴和苏联之间出现了行动上的一致，因为苏联已经对安哥拉承担供给武器的义务，它不得不加速履行这项义务。结果我们就这样商定了，我们也不否认这一点，苏联开始运送一定类型的武器，而我们则派遣人员供他们使用。

就是这样。当我们被卷入安哥拉事件之后，我们从来也没有从地缘政治方面想到安哥拉在苏联利益方面的重要性。我们把安哥拉看成是一个友好的国家，发现那里有一批革命者为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南非而进行着斗争，于是我们也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后来轮到了埃塞俄比亚。那里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们根据索马里的请求而与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关系，我们对这个国家发生的进程持有相当的怀疑。当时领导革命的不是门格斯图。政权掌握在特菲里·班特的手中。当时我率领古巴代表团到哥

伦比亚去参加不结盟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议。我奉命在那里建立合作关系，与特菲里·班特和当时任索马里副总统的阿里·布卡尔建立合作关系，其目的是企图使双方和好，但由于遭到特菲里·班特的拒绝而没能办到。

后来，索马里副总统兼国防部长萨曼塔尔访问古巴。前几次会谈是我同他进行的。会谈的过程中，他向古巴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以便进攻埃塞俄比亚，声称这个国家对北非的社会主义构成最大的危险。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想过我们的军队可能到埃塞俄比亚去。我们有一批人在索马里帮助建立警察，而苏联在索马里有武装力量，并且使用索马里的港口伯培拉，作为自己的海军基地。这样一来，便实现了与索马里的紧密合作。

萨曼塔尔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进行了谈话，他们劝说他表现出忍耐，举行谈判。

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非洲期间起初会见了西亚德·巴雷，后来在埃塞俄比亚会见了门格斯图，与他们商定在亚丁举行历史性的会晤。参加这次会晤的有门格斯图及其助手们、西亚德·巴雷及其助手们、当时任也门总统的阿里·罗伯亚、法塔·伊斯玛伊尔和现任南也门总统的阿里·纳塞尔，而代表古巴出席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我。菲德尔为了取得各方的一致从晚上10点工作到早晨7点——我谈到菲德尔，这是因为他是这次会晤的核心。然而并没有达成一致，因为西亚德·巴雷坚决反对这次会晤提出的各项建议。虽然会晤没有取得一致，但是西亚德·巴雷承诺不进攻埃塞俄比亚。可是后来西亚德·巴雷向埃塞俄比亚进攻的时候，我们感到自己对门格斯图承担义务，因为他是被我们吸引参加在亚丁举行的和平协商的。

迟早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您可以相信我，也可以不相信，但终究会有一天将成为公开的对象。

事件的外部地缘政治性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本质。我曾经享有特权陪同菲德尔·卡斯特罗会见苏联领导人。参加会见的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他刚从非洲归来）、葛罗米柯、鲁萨科夫。正是我们，热烈地论证了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援助的必要性。这是不同于安哥拉的形势，因为这里事先进行过谈判。但在谈判中，正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个提出军事援助的。历史将澄清这一切。

我没有明白您关于也门所说的话，因为那里从来不曾有过我们的军队。尼加拉瓜也是这样，下面我们将要谈到。

在也门，我们靠着为数不多的专家帮助组建警察。在这里，我可以让您相信，如果说也门人开始的战争没有变成持久的南北战争，那么这在许多方面有赖于古巴。古巴不仅丝毫没有参与这场战争，而且完全彻底地反对这场战争，也门军队的司令丧失了自己的一切阵地，他现在的处境……在许多方面与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

这样一来——我希望在这方面完全明朗，——让我感兴趣的首先是事件发展的逻辑，正是逻辑。

现在让我们回到拉丁美洲上来，这里，恰如您所说的，从1975年开始发生了往典型的60年代事件的回归。

正如您所指出的，美国与古巴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平静的时期。我也跟您一样，要说这个平静时期被安哥拉事件所中断了。我认为这与基辛格国务卿的自尊心有关，他曾有过自己的解决安哥拉问题的计划，但没有把阿戈斯廷奥·涅托包括进去——斯托克威尔在他的书中对此做了很好的描绘，任何人都无法否定这本书，——基辛格本来与我们保持着联系，从这时起却变成了我们最凶恶的敌人。

卡特政府上台了，开始了漫长的和艰难的过程。我们认为卡特政府的主要活动家们明白了安哥拉事件的意义，但不幸的是中央情报局关于沙巴的情报把一切都破坏了。

正是那一天，我应该与塞鲁斯·万斯在纽约会晤，并且也会晤了。在此之前一个小时，卡特总统在芝加哥发表了讲话，把沙巴事件的责任推给了我们，可是我们与这起事件没有丝毫关系，我们就这起事件曾经与我们的安哥拉朋友进行过认真的争论，警告他们沙巴宪兵部队在边境上的移动将有危险，这就把整个事情弄糟了。

然后出现了尼加拉瓜。

国务卿先生，我认为您让地缘政治的海市蜃楼给推到错误的解释上去了，因此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譬如说，我想要指出，沙巴的错误具有最不良的后果。我们从1976年以来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任何话，没有人给我们施加任何压力，而开始从安哥拉撤出我们的人，因为认为那里的人数多于为保障这个国家最低限度的安全所需要的——这个国家当时正处在为其组建武装力量的时期。沙巴事件迫使涅托绝望地向我们提出要求，不仅不让我们撤出人员，而且要派回已经撤出的一部分人员。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在安哥拉拥有的人员多于1976年。

在中美洲。把现在中美洲发生的事看成是外在爆炸性现实的结果是错误的。不仅我们这样谈论，甚至就连像洛佩斯·波尔蒂利奥这样温和的国务活动家都公开地支持这种观点。我想，他了解卡洛斯·安德雷斯·佩雷斯。我认为卡洛斯·安德雷斯·佩雷斯是一个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也持有这种评价。凡是多年来一直对中美洲形势进行分析的人，凡是多年来一直研究它的人，都会一致同意这样一种见解，认为形势是爆炸性的，自然是危险的。

反对索摩查的斗争环境产生了这些事件。我们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援助桑地诺阵线，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援助他们。但是我们并不是他们的惟一援助者。您知道，拉丁美洲有好几个政府所给的援助，远远超过了我们。这样一来，把拉丁美洲的情况视为肿瘤的观点，必须排除。

我们是桑地诺派非常亲密的朋友。但是，认为桑地诺派受制于我们提出的建议，是个严重的错误。一切都相反。他们非常清楚应该做些什么。

我们认为桑地诺派倾向于在尼加拉瓜保留多元化体制。也很清楚，某些桑地诺派想要进行一场比现在更深刻的革命。这是事实。我们一向说真话，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我认为他们非常清楚地懂得加速深化革命的进程并不是容易的，也不是所希望的。您昨天行前在华盛顿说并不排除与桑地诺派谈判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是对的，尽管您针对尼加拉瓜的声明很像是威胁，说所剩时间不多了，这让我很不安。我的确对这项声明深感遗憾，我们可以就此交换意见。

我们过去和未来都与尼加拉瓜团结在一起，并且向它提供援助，因为认为这是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权利。我们并不打算放弃团结一致，认为这是我们的权利，不管其后果如何。我认为古巴丝毫没有干涉尼加拉瓜。我们在那里有 2759 人，其中 2045 人是教师，240 人是技术人员，159 人是医生，66 人是护士。我们在尼加拉瓜没有军队。我们在那里有数十名各种不同级别的军事人员，协助组建武装力量，训练尼加拉瓜军队。这就是我们在那里有的一切。

我们不只一次听到国务卿先生说我们向尼加拉瓜派出 500 ~ 600 名士兵，听到美国其他领导人说我们在那里有 3000 名军事教官，我们确实觉得这一切都是不理智的，因为我想我们有能力了解我们有什么。埃万斯和诺瓦克曾经写道，两天的过程中，来了 500 名古巴人；我们准备公布他们这么写的那一天到那里去的 500 人名单，说出他们的姓名、在古巴居住的地址、在古巴教书的地点。我们可以公布他们现在教书的地点。我们可以公布在尼加拉瓜的 2700 名古巴人的姓名和工作地点。可以很容易地相信这些。是的，我们的确有 2759 个人。这是正确的。但是这一切都能很容易地到

各地去验证，在尼加拉瓜没有士兵。

我们不禁感到奇怪，听到人们说古巴向尼加拉瓜运送武器，尼加拉瓜得到这些武器是为了自卫，而且这些武器只是通过古巴运送的。我甚至听到过黑格先生本人就此的声明。如果美国的侦察机关谈论这一点，他们所说的并不是他们所了解的，因为他们很容易检查这些武器来自何处，是如何运进去的，用什么运到的，通过什么途径，就会发现其中没有一件是通过古巴的。

很自然，我们不乐意讲这些武器来自何处以及如何运到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央情报局很清楚这些武器是如何运到的，通过什么途径，来自何处和共有多少。那么为什么还说是通过古巴，为什么断言古巴搅进这件事中去了？古巴同意尼加拉瓜武装起来。尼加拉瓜人清清楚楚地告诉过我们，我们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武装起来并非因为他们与洪都拉斯为邻，并非因为萨尔瓦多可能进攻他们，也并非因为危地马拉可能参与对他们的进攻，而是由于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再加上来自美国方面的威胁。这是显而易见的。请您说说看。我知道，恩德尔斯曾经向尼加拉瓜人宣布，武装起来是荒唐的，因为美国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一切都摧毁。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正确的。然而，没有一个尊重自己国格的小国不进行反抗而甘心于承认自己失败。我认为必须理解这一点。我想应该理解这一点。

萨尔瓦多。

黑格先生，我们在那里没有军队，也没有军事顾问，我非常明确地向您宣布这一点，我们也如此明确地向世界其他部分的领导人说过这一点。说到这些举世皆知的古巴士兵，我们倒是希望能够拿出一个给我们看看。说那里有古巴士兵，在那里随处都能认出古巴人，可是在萨尔瓦多却不能找到古巴人，因为那里没有古巴士兵，没有古巴军事顾问。

我们解释这一切是希望在目前的条件下不发生戏剧性的对抗，本来可以通过谈判的途径取得相互谅解。我们说没有向世界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派遣武装力量，我们这么说并非因为是古巴违背了道德准则，或者这么做是不合法的。有可靠的事实：美国在世界不同部分有自己的军队。里根总统承认美国向逃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反革命分子提供支援。他公开宣布这一点。

不久前，政府强迫国会废除了“克拉克修正案”，借口是它可放开手脚支持萨温比以及其他一些反对安哥拉政府的势力。坦率地说，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拥有我们所不能有的权利，难道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最大的国家，而我们则是一个小国？我认为持这种立场是非理性的。这就是我们所持的出发点。

好了，我已经尽量详尽地证明了地缘政治原因是不存在的。我们可以说明以下几点：“白皮书”表明了什么？“白皮书”里包含着某些真话，也包含着某些谎言，引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证明萨尔瓦多反对统治集团的革命者与苏联保持着联系。如此说来，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事实：苏联绝对不愿意在任何方面束缚自己。我认识那里提到的一些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是存在的，而且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可是这些工作人员没有权力，他们甚至连一块硬糖都无权以苏维埃国家的名义赠送给他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苏联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搅进被看成是革命进程，而它并不希望参与的事件中去。

我想要就此向您再补充几句。美国的某些领导人经常坚持这样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在美国与古巴中间充当敌对因素，在古巴煽动仇视美国的感情。我可以说，恰恰相反。我们与苏联有矛盾，其中有许多是古巴的言论、行动和立场引起的，因为这不符合苏联在世界的这个地区的意图。我认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发展的进程如果能成为苏美矛盾中新的要素，那么没有任何事情比这种进程



更让苏联领导人不安的了。我想，如果黑格先生和里根先生有可能跟菲德尔·卡斯特罗谈话，那么他一定会向他们讲到这一点，而且比我讲得更多，因为尽管我也出席了许多次会晤，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就这个问题比他讲得更多。

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对待萨尔瓦多的事件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呢？当前，我们主张政治调解。政治调解，我们的理解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指洛佩斯·波尔蒂利奥总统昨天谈到的那层意思：召开立宪大会，但必须有搅进这场冲突的各种力量参加并且取得他们的同意，其中包括革命民主战线和法拉崩多·马蒂民族解放战线。这就是古巴的立场。

我们准备在这个方向下做出任何妥协；如我们所理解的，其他各方，也包括美国在内，也要做出相应的妥协。我们大家都应该承担义务。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对这一切的参与程度。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向洛佩斯·波尔蒂利奥总统、社会党国际副主席维什涅夫斯基、加拿大自由民主党主席布罗德宾特都曾讲过我们的这个意图，跟特鲁多交换信件时在给他的一封信里也谈过。我是在重复我们准备做的事。

您涉及到了我们的困难和薄弱之处。这是正确的。我们有薄弱之处，我们的人民由于美国的封锁而遭受了许多痛苦。你们把这叫做禁运。我们认为自己被美国所封锁了。我们在物质上遭受到痛苦。我们的医院有时没有药品。我们在经济上遭受了痛苦。我在3天之前收到伦敦的通知，其中说某些公司由于美国人的压力而在获得镍的方面出现了困难。日本人多次向我们宣布说，由于美国人的压力，他们不能把与我们的经济关系发展到他们本来想要达到的水平。

我们非常懂得，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也讲过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我们的条件就会好一些。美国距离我们

只有几海里，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这个事实本身会使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容易解决。我们现在没有的技术，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我们现在没有的资金，我们有可能获得；我们认为这是很理想的和可能实现的。可是为了让您能够明白我们的观点，我要说，我们打算为了获得这些而牺牲我们认为我们的主要原则的东西。当然，您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牺牲这些原则。可是我从美国现在的政府的观点考虑，还是想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并不要求我们成为美国的盟友和同意那里现存的社会体制。我们不喜欢美国的社会体制。可是很自然，这是美国的社会体制，美国人民自己决定他们该怎么办。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应该考虑到下述情况：

第一，古巴的主权——是不可剥夺的原则，应该理解为领土主权，包括关塔那摩基地在内；我们有权与全世界进行贸易，包括美国在内。

第二，我们有权与“第三世界”各国团结合作，特别是与拉丁美洲各国。

第三，我们与苏联的友谊。我们是苏联的朋友，是亲密的朋友。我们坚决否认任何把我们视为苏联在世界某一部分代理人的想法。我向您解释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样的。我们对苏联的确怀着感情，这种感情不仅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而巩固，而且除此之外，我们从苏联得到了为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所必需的重大援助。当然，仅仅靠着这种援助，我们不能使我们的国家快速地发展，这种援助是需要的，而且也是我们所希望的。然而，我们认为这种援助与美国和古巴之间的正常关系是不能共存的。

亚历山大·黑格：罗德里格斯先生，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有成效的交换意见。我相信，如果我不同意这种逻辑，您会原谅我。几个月以前，由于我们的干预而防止了你们驻安哥拉的军队与南非军队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可是下一次，我们也许不再会有这种成

功，借助于我们的压力未必能够制止他们的推进。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可是我要说，我们的力量距离他们很遥远，这不只是你们的干预，而且是我们的谨慎。

亚历山大·黑格：我了解这一点。我很清楚。可是他们再往前推进就要到达你们的基地了，我们防止了这一点。关于他们的行动计划，或者他们何时开始行动，我们一无所知。但是他们所暴露出来的，——这成了他们关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行动的信息的来源。他们甚至抓了一名苏联俘虏，这个俘虏自从被俘的那一刻起就不停地讲述安哥拉活动的规模和行动配合。他对自己的观察没有丝毫隐瞒。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但这不是古巴的俘虏。不是吧？

亚历山大·黑格：不是。我们知道古巴的武装力量驻守在何地，也知道古巴要是撤离安哥拉，那是非常理想的。这会有助于安哥拉，有助于古巴，有助于解决纳米比亚独立和局势正常化的问题。这一点，我跟苏联人、安哥拉人、“前线”国家讨论过，有一种意见日益强烈起来，就是认为你们应该怎么办。

至于您所描绘的那些事件以及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我可以让您相信，他们掌握了有关你们往别的国家派出的军用飞机的情报。我可向您提供关于这样一些事情的情报，这些事情的发生也许政府部分成员并不知道。有这种可能。这在我们国家有时也出现，不是非常经常，而是在个别情况下。

我们认为古巴在安哥拉驻军是对非洲大陆的威胁。此外，我们认为尼加拉瓜在萨尔瓦多的活动也是一种严重的威胁。我可以断然地让您相信，我们掌握了这种参与的大量证据，对此无须任何怀疑。这是事实。我们有照片、文件、审讯记录和被审讯者的“证言”。因此，我不能同意您对我说的。这不是指的什么事情不能说。您有完全的权利说您想要说的，可是我们也有权从事件中做出我们

自己的结论，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我们有证据，所以我们向您说这一点。

很遗憾，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美国与古巴之间的辩论不能解决问题，相反，有一系列领域不会对古巴的主权带来任何损害。然而，古巴却在向大陆输出革命和流血。

我们知道你们写些什么，我们知道你们维护什么，我们知道你们谈论些什么，并且认为这对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所以我们不能以别的形式研究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所说的是客观现实。

您抱怨制裁。我们不曾进行过有效的制裁，但是我们可以把制裁用在食糖上，用在你们用来换取外汇的一切部门的产品上。然而，我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们不希望出现其他一些复杂问题。我应该向您说明这一点。您谈到与桑地诺派团结合作问题。我认为你们若是让古巴人回到自己的家里，那就是向他们提供了最好的团结一致的服务。你们可以告诉桑地诺派，让他们建立一种不违背人权的制度……<sup>①</sup>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是让医生、教师回家吗？是让 3000 名……<sup>②</sup>的古巴人回家？

亚历山大·黑格：我们掌握了有关医生、教师、安哥拉的老兵和军事顾问，他们的头衔、姓名及其从前的活动最详尽的情报。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拿出来见识一下倒是满有意思。

亚历山大·黑格：我可以让您相信，您为我们描绘的那幅见义勇为的图画不符合实际情况。不想说那里没有相当数量的教师，可是他们向尼加拉瓜儿童传授的是你们的哲学，正如他们在智利企图做的那样。可是我们不同意你们有这种权利。尼加拉瓜人有权向自

<sup>①</sup> 原文如此。

<sup>②</sup> 原文如此

己的人民传授人民自己所选择的东西。你们深深地卷进桑地诺派的革命运动中去了，我们认为这对于我们大家：对于古巴人、对于我们这个半球、对于尼加拉瓜都构成非常大的冒险。我们认为古巴应该重新考虑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要要求古巴卑躬屈膝。说的不是这一点，说的是中美洲日益扩大的流血的局面。

我们认为，对于萨尔瓦多来说，惟一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允许萨尔瓦多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就是通过各方都参加的选举程序的途径。成立立法大会，政治程序应该完全符合人民意志。可是我们不能同意尼加拉瓜在团结合作或者其他任何革命谋略的幌子干涉萨尔瓦多的事务，而它长期以来却是这么干的。而那里有你们的人，你们提供援助，则促进了这一点，这正如黑夜过去之后紧跟着白昼来临一样。这是客观的现实。

我不怀疑您所援引的有关沙巴或者埃塞俄比亚的状况的事实。可是出现一个问题：古巴军队有什么理由仍然滞留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履行各种各样的使命。为什么那里的当局愿意这样？我给自己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不是指埃塞俄比亚，而是说安哥拉。

您说你们没有参与南也门，可是我对您说，我们计算过从埃塞俄比亚飞往南也门的大大小的飞机，我们也收听了无线电广播……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你们也看见了古巴人？

亚历山大·黑格：我们截获了西班牙语广播。我每天都阅读。假如这不是你们，那么就是有一些埃塞俄比亚人能非常漂亮地讲西班牙语。因此，我对您说，这一切都是现实，不管它是否属于地缘政治的范围，它让美国相信它有地缘政治的联系。

因此我们如果关心不久的未来实现和平与稳定，就应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否则我们就应该走另外一条路，我不认为这条路在我和您这次谈话之后会对你们

有利。我知道，美国也愿意这样，可是它已经做好准备，在多年没有准备采取措施之后很快采取措施。因此我对您说，必须尽快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请您相信，这些解决办法不会触动古巴的声誉、主权和完整，也不会触动古巴人民。任何人都不希望这样。这是很愚蠢的。运用武力来达到这一点是轻而易举的，这也是客观的事实。然而，说真话，我们认为时间在流逝。

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材料，我们掌握的情报拿出来给美国社会舆论看。你们看见了“白皮书”，可是我们还有 50 份。我们有许多卷，有无线电广播记录，有技术侦察资料，我们掌握了照片。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很出色的“白皮书”制造厂。

亚历山大·黑格：这仅仅是第一章。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可是我明白，你们有很出色的“白皮书”制造厂。

亚历山大·黑格：然而总统不愿意这么做，尽管准备这么做，而且不久就做。这会引来更严重的敌对，会唤起更大的感情对立。我坚持认为您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我所说的话，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美国人在所描绘的事件面前都不得不做出这种评价。这并不是说你们的参与不像您所讲的那样，然而我们却把它视为对我们的切身利益和本半球的和平与稳定的利益的严重威胁。

假如您同意这种意见，认为本半球需要稳定与和平，那么你们就应该提出一个不伤害你们的尊严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怎样办才能不至于让任何人要求你们这么做？我已经说了，在客观上应该赞扬古巴的坚强意志，赞扬它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基本问题在这方面仍然还是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所遇到的那个问题：在可以接受的合法的框架内实行和平的变化，而不是通过流血、武装的途径，不是通过煽动恐怖主义和革命的途径。

如果说古巴革命成熟到这种程度，那么这很好。如果不是这

样，那么我们就走对抗的道路，而且很快就会这样。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像是夸夸其谈，可是请您相信我，我查阅了许多文件、世界各地进行的会谈内容；许多可能是不准确的，我相信“白皮书”里也有不准确之处，不可能不是这样。这涉及到侦察，涉及到截获的文献，我们基本上是在哥伦比亚看到了这些文献，古巴人在那里的活动很可观，我们没有提出哥伦比亚问题……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我们也可以谈谈这个问题……

亚历山大·黑格：你们的参与是很大的……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大。

亚历山大·黑格：……但大到足够出现问题了。在危地马拉也发生了这种事……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如果您允许，我把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谈。

亚历山大·黑格：……好的，我说的是我们应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要快。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亚历山大·黑格：应该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任何人都没有赋予古巴干涉本半球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神圣权利，不管它使用什么论据来为这么做寻找理由。您知道，我们如今在萨尔瓦多有 34 名军事顾问。可是古巴在尼加拉瓜有多少？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我们在那里的顾问并不太多，不多。

亚历山大·黑格：我们有情报，您说在尼加拉瓜有许多自由力量，这是对的。他们每天都向我们报告所发生的事。都是不能接受的。如您所描绘的，这都不取决于你们主观上认为是温和的，这不可能被接受。本半球各国都很关心。过去有过一段时间，古巴在不结盟世界持有良好的立场。必须让我们达到相互理解，否则后果将

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不说美国军队将对尼加拉瓜进行干涉，我们不会这么做。可是我们对于 5 万人的军队和 20 万人的警察却找不到解释。对此不能辩护。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为什么不能？

亚历山大·黑格：很好，它作为一个国家，有这种权利，可一旦选择了这条道路，就应该为这种选择付出代价。这将引起本地区所有的国家的关注，他们应该反对这么做。这是一种危险。这有什么必要呢？我没有消息说明某个国家想要进攻尼加拉瓜。如果您指的是一小撮索摩查分子，他们在洪都拉斯进行走私活动，甚至没有武装，那么洪都拉斯政府声明要把他们驱逐到别的地方去，这将排除进攻的任何借口。这种努力已经进行了数个月之久。我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对您说，我们的时间在流逝。

正是因为如此，恰如您所说的，墨西哥人才提出了这种做法。我研究了卡特执政时期进行的所有谈判，他们只不过是一系列拖延的策略，不让事情得到进展。这样做没有得到任何成果，毫无结果。我们不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你们不愿意，我们也不愿意。但是我们需要的准备充分的会谈主题以及贵方关于将会取得某些成果的信号。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因此我们时间有限，我将尽量简短和客观。

第一，你们坚持主张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并且表现了美国对这种解决办法的兴趣，丝毫不让古巴卑躬屈膝和不威胁古巴的主权。我们准备寻找这种解决的办法，我们应该在下一次商定采取哪些步骤，因为这涉及的不仅仅是美国和古巴，而且也牵涉到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和革命力量，他们有自己的标准，有自己的观点。我们想墨西哥在这件事情中可以充当联系环节。我们也可以更坦率地交换意见。



亚历山大·黑格：让我们保持直接的接触，不要像以前做的那样，用不着中间人。我们可以派我们的特使沃尔特斯将军到哈瓦那去。我们可以轮流在哈瓦那和纽约会晤，因为我想应该尽快开始对话。

卡洛斯·拉·罗德里格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准备这么做。但是我想要提出几点订正，因为可能产生误解。

我不想现在就事实开始辩论，尽管有时也需要讨论是否有歪曲之处。当沃尔特斯将军到哈瓦那去的时候，我认为重要的是让他带来足够的材料，以便有可能讨论针对这些事实做出诠释。

我记得，“猪湾”事件就是在古巴的人提供的情报引起的，中央情报局根据这个情报做出了错误的结论。至于您提到的飞机问题，我可以告诉您，我了解古巴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政府中没有派系。我们有劳动分工。然而政治局委员们都了解军人所做的一切。我可以请您相信，您对我说的一些事情，我丝毫不能同意，我公开声明，我不能。关于安哥拉，关于埃塞俄比亚。人们会问，我们为什么去那里。就是因为他们希望我们去那里，就像去安哥拉一样。如果由于现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了解联系小组会晤的结果，了解非洲各国外长的决定，我们看到有可能达成关于纳米比亚的协议，显然有几点有所进展），如果由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安哥拉人允许我们撤出军队，我们准备离开那里。对此丝毫没有怀疑。可是让我担心的是我们在安哥拉不仅有数千名士兵，而且还有数千名建设者，非军人。

您掌握的关于尼加拉瓜的情报完全的虚假的。我们可以与沃尔特斯将军在一起花上几天的时间详尽细致地讨论这一切。我们可以讨论这一点，我们可以通报你们感兴趣的一切细节，因为不愿意由于错误而出现对抗。

我们也准备进行对抗。我们知道，这种对抗对于我们人民来说

是有戏剧性的。我们没有丝毫怀疑。但是我们也不怕对抗。我们害怕的是由于双方的错误而出现的不必要的对抗，由于缺少联系而使数千名美国人和数万名古巴人死亡。这让我们不安。让我感到不安的还有解释上的其他因素，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这些。如果需要，我在任何一天都可以到纽约去并且组织另一次更细致的会谈。可是您个人的某些解释却引起我的关注，正如您所说的，您的解释与美国总统的解释也完全一致。譬如说，我不认为美国有权干涉与古巴教师在尼加拉瓜任教有关的事务。他们讲授什么，这个问题应该由尼加拉瓜政府来决定。我可以请您相信，这是一些小学教师，他们未必能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不知道您是否试图阅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可是对于我们 2700 名教师来说给印第安孩子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我们认为只有尼加拉瓜政府，而不是任何别的政府，才能决定是否需要我们的教师。我坚信这一点，因为与尼加拉瓜领导人谈得足够多了，此外，还与菲德尔谈过，从我没有参加过的一些谈话中得悉，尼加拉瓜人没有丝毫的愿望和兴趣入侵洪都拉斯。他们清楚地懂得，这会引发与美国的对抗，对于尼加拉瓜人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被卷入与美国的对抗更糟糕的了。

关于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对话。您说，我们的时间在流逝。让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吧。我想要说一件事：古巴从来不说谎。菲德尔从来不说谎。凡是我們说的，我们一定算数。我对您说过，我们准备走上什么道路，在哪些方面能够达成协议，在哪些方面不能达成协议。凡是我們说：“我们有义务这么做”，——我们一定做到。

您讲过哥伦比亚。您不了解 M-19 的成员如何到了古巴。图尔拜总统与我进行过电话通话，他要求我，要求我！让我们在古巴接收 M-19 成员，因为他们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馆里扣押了一

些大使。因此他们便来到古巴。他们呆在古巴，接受了训练，就像其他数千名来到古巴的人一样。任何一个拉丁美洲人来到古巴：知识分子、诗人、军人——都想要让我们教会他们射击。我们也就教会了成千上万的人。这是真事。我们从来都不掩盖真事，可是我们与培训渗入哥伦比亚的小组却没有任何关系，与武装却没有任何关系。这么说的国家都很清楚是谁培训了他们，是谁给了他们武器，是谁把他们组织起来。我可以请您相信，菲德尔·卡斯特罗尽一切力量不让发生冒险，不是为了图尔拜政府，而是为了那些年轻人，我们知道，他们将被消灭。那是一种不理智的冒险。

然而古巴为什么培训了 M-19 的人呢？根据我们的倡议，我们与阿芬索·洛佩斯·米切尔逊总统达成过协议，那是他开始执政的时候，那时重新承认了古巴：我们不在任何方面帮助任何游击队小组，我们履行了这一协议。您可以就此询问阿芬索·洛佩斯。对于图尔拜政府，我们也坚持这一点。只是在图尔拜政府对联合国采取敌对立场之后，——我们在地缘政治方面把这解释为美国的推动，——只是那时，我们才感到自己不再受这种义务的束缚了。

凡是 we 承担起对某个国家、某一集团或政府的义务，我们没有一项不履行。这一点美国应该是清楚的。

## 【专题说明】

# 苏联与 80 年代初的波兰局势（二）

（1980 年 9 月至 1984 年 4 月）

1980 年 7 月，波兰政府决定将肉类食品销售价提高 40~60%。早已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统治十分不满的市民和工人，在听到这一决定后，华沙、罗兹、奥斯特洛夫、卢布林等大城市的工人，当天就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以补偿因肉价上涨给工人带来的经济损失。罢工很快扩展为全国性的罢浪潮，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罢工越来越向政治方面倾斜。

8 月 24 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召开八届四中全会，对政治局的组成做了重大调整。随着，国务委员会免去了巴比乌赫的政府总理职务，任命平科夫斯基为政府总理。但是，罢工浪潮并未因此而平息下来。8 月 31 日，以政府副总理雅盖尔斯基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同以瓦文萨为首的三联城罢工委员会，签署了“21 条协议”，这就是著名的“八月事件”。厂际罢工委员会承诺：8 月 31 日 17 时结束罢工。9 月 5 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六中全会，卡尼亚取代盖莱克，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

“八月事件”后，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团结”工会，农村则建立“团结”农会。瓦文萨成为团结工会全国协调委员会主席。由于对原波兰工会联合会的失望，工人纷纷加入团结工会；很多波兰统一工

人党党员，包括多名中央委员，也加入团结工会。原来的工会土崩瓦解。

1981年2月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八届八中全会，由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出任政府总理（仍兼任国防部长）。3月19日，比得哥什的团结工会占领该省的省委办公大楼，和保安部队发生大规模冲突，这就是“比得哥什事件”，全国性的罢工浪潮再起。1981年7月14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产生了由200人组成的新中央委员会；其中除16名是上届原中央委员外，其余全是新人。卡尼亚仍当选中央第一书记。全国社会更加不安，经济状况日益恶化。10月16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九届四中全会，卡尼亚辞职，由雅鲁泽尔斯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兼任政府总理、国防部长。1981年12月12日晚，波兰国务委员会宣布，从13日起全国实行军事管制，进入军事状态；并成立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决定一切。1983年7月22日，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布翁斯基宣布结束军事状态。

本专题选编的是此期涉及苏波关系的档案文献，从中可见苏联政府，尤其是苏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对波兰局势的关注、焦虑、思考、决策，以及他们与波兰党政领导人的反复谈话、交谈、谈判、互访。本专题文件共25份。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由张环海、刁绍华、赵静男翻译）

No06134

## 瓦赫拉麦耶夫关于波兰局势给国内的报告

(1980 年 9 月 15 日)

机密

苏联驻格但斯克总领事馆

1980 年 9 月 15 日

今年 8 月下半月，起初在格但斯克沿岸，后来也在其他省发生了许多企业和单位工人罢工的紧张事件，成千上万的职工参与了这些事件。在格但斯克省，总共有近 500 个企业和单位、20 多万职工参加了罢工。在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大罢工以前，在格但斯克省切夫市今年 7 月 2 日，即政府关于在议价商店增加肉和肉制品销售或提高肉制品价格的决定生效后第二天，波利莫厂 900 名工人集体停工一天。通过给企业工人增加工资 10% 的办法，使冲突局部得到解决。

格但斯克港机械车间工人的罢工于 7 月 31 日开始，延续到 8 月 2 日。在此期间港口运输工人曾两次停工。地方党和行政经营机关再次较快地平息了冲突，局部满足了工人的要求。

以后事件的发展表明，中央和地方党和国家机关从柳勃林事件开始，通过局部满足停工企业集体要求平息冲突的作法，未能消除日益增长的紧张气氛，尤其是工人对形势的不满；相反，满足一个企业工人的要求推动了其他企业工人也提出自己的要求。据现有资料，关于不全面深入研究形势就用这种方法解决冲突所带来的危险

和消极后果，早在今年6~7月份地方党和行政经营机关就曾不止一次地向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报告过。今年7月，格但斯克和埃尔布拉格省党委对此也曾谈过，但不论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都没有采取具体和根本性的措施。正如当地许多同志认为的那样，今年6~8月初卢布林、华沙、切夫和格丁尼亚发生的罢工，是反对派反社会主义力量研究了党与政府一方和工人阶级一方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和口号的反应以后，精心策划和组织的。工人要求的演变也说明这一点。如果说切夫市“波利莫”工厂的工人仅仅提出了经济要求，那么格但斯克港机械车间罢工工人的要求中就有了政治要求，如取消新闻检查，给予言论自由和更多的民主权利；追究使国内经济陷入困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责任；怀疑党能找出摆脱困境的出路，对党的政策不信任，等等。

格但斯克港机械车间工人罢工后，差不多有两周时间平安无事，看来地方同志和中央领导都放心了。许多人承认，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罢工没有准备。这说明不了解真实情况，不了解人们的情绪，对形势和对方没有足够的估计，脱离工人阶级。

8月14日早晨6时30分，第一班上班后在列宁造船厂出现一批青年工人，约50~70人。他们手持标语牌，上面写着：恢复安娜·瓦连金诺维奇（吊车司机，因违犯纪律被解职，自由工会会员）的工作，提高造船厂全体职工工资各1000兹罗提，保证生活费增长补贴。后来这批工人分成几个较小的组，去造船厂各车间，开始鼓动已开始工作的工人放下工作、罢工。

上午8点在厂长办公室周围聚集了约300人，到9点钟聚集了1000多人。这时停止了给造船厂供电和煤气。上午10点钟造船厂办公大楼前聚集了3000多名工人。实际上造船厂的工作完全停止

了。聚集在办公室前的工人“推举”莱赫·瓦文萨<sup>①</sup>领导的罢工委员会同厂领导人谈判。11点，造船厂厂长 K. 格涅赫同志和党委第一书记 Ю. 伏伊奇克同志来见罢工工人。聚集的人不听他们的话，对他们发出嘘声。在工厂会议室同罢工委员会开始了谈判。谈判进程通过造船厂广播网进行了转播。谈判开始前罢工委员会宣称：造船厂开始了罢工。罢工委员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关闭工厂所有的大门，只准进入、不准任何人出去。

罢工委员会代表罢工工人向造船厂领导人提出十多个各种社会经济要求。除上述三点要求外，又提出以下要求：

平衡各类职工子女一次性补助数额；

增加退休金，降低退休年龄，女人 55 岁，男人 60 岁；

取消政府关于增加议价商店售肉量的决定，并完全取消议价体制的商业；

解决为 1970 年悲惨事件中造船厂牺牲的工人建纪念碑的问题。

在提出这一要求时，罢工委员会委员安娜·瓦连金诺维奇要求厂长格涅赫在 12 月 17 日以前，即 1970 年著名事件 10 周年之际把牺牲工人纪念碑建好。安娜容许攻击苏联，指责苏联在卡廷枪杀 15000 波兰人<sup>②</sup>，说无论在苏联和波兰都没有英雄纪念碑。安娜的讲话引起在场人的掌声，没有受到工厂领导人有理有力的反击；

恢复罢工委员会主席莱赫·瓦文萨的工作；

---

① 莱赫·瓦文萨，生于 1943 年，是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该造船厂 1970 年 12 月事件领导人之一，但已 4 年多不在该厂工作。自从 1970 年 12 月罢工事件后，厂方以“违犯劳动纪律和在工人中进行非法宣传”为由，于 1976 年将其解雇。瓦文萨曾是科尔组织的积极分子，事件发生后代表所谓自由工会。此外，他还是地下报纸《工人》的编辑。据一些资料说，瓦文萨的父亲在美国。

② 指“卡廷事件”。1940 年 4、5 月间，苏联内务部报请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批准，集体屠杀被俘的波兰官兵共 21857 人。参见本书第 19 卷有关专题的档案文献。



成立自由工会，取代现有工会；

保证不追究参加罢工的人，特别是组织者及其助手们的责任。

科斯科尔组织的领导人Б. 鲍鲁谢维奇和Б. 雷宾斯基、Д. 科勃兹杰伊、Т. 舒德洛夫斯基、М. 格热瓦切夫斯基、А. 哈利、К. 别林斯基、Е. 米列维奇出现在造船厂。

在几小时的谈判中造船厂办公室同意罢工工人的一些要求，特别是准备按5级工资表规定的工资水准提高工资，建议工人自治委员会成立小组，研究为1970年十二月事件牺牲者树碑的建议。同时造船厂领导向工人保证，其他要求将予以研究并尽可能由有关机关完成。

8月15日，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又有一些企业停工，其中有巴黎公社造船厂、维斯捷尔普里亚特英雄造船厂、修船厂以及港口。许多市内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没有出车，清晨出车的有轨电车也陆续回库了。这些企业工人的要求基本和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的要求相同。

应当指出，自8月15日早晨格但斯克街上出现了用电缆铁条武装起来的青年小组，他们把乘客赶出电车和汽车，强迫电车和汽车司机回库，而且工人纠察队就再也不准他们出来。这样，格但斯克和以后格丁尼亚的城市交通在一些流氓青年的压力下基本上停顿。也曾试图使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线的电气火车停止运行。

在此期间，对不愿参加罢工、想离开停工企业的人，对继续开工企业的领导人、党的积极分子、普通党员和工人经常进行威胁、恫吓、恐吓，甚至打骂。

在罢工委员会，首先是事件初期就作为指导和宣传中心的巴黎公社造船厂罢工委员会及其支持者的工作中，明确地提出千方百计增加停工企业、组织和机关数量的路线。在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散发了成千上万张在巴黎公社造船厂的印刷厂印刷的传单，有几十名

宣传鼓动员。

正如朋友们<sup>①</sup>指出的，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巴比乌赫 8 月 15 日的电视讲话没有使形势好转，也没有扭转事件的进程。

8 月 16 日星期六，列宁造船厂办公室同罢工委员会就罢工工人提出的主要要求达成协议。14 点 20 分签订了关于就提出的所有问题达成协议的协议。根据协议罢工宣告结束，18 时，工人们离开造船厂，8 月 18 日星期一开始正常工作。关于谈判结果达成的协议和停止罢工的决定，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通过造船厂内部广播电台向工人们做了通告。但是，过了一会儿，他走到造船厂大门口宣布继续罢工，其目的已不是解决已达成协议的造船厂工人的问题，而是为了团结，好像是为了其他企业代表的要求。这时，一部分工人离开了造船厂，但是许多工人没有被准许离开工厂。在造船厂门前的人群面前，一些与造船厂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开始讲演，激化反政府、反党情绪。晚上组建了厂际罢工委员会，并在 8 月 17 日星期日的传单中正式宣告其存在。各罢工企业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成员莱赫·瓦文萨成为该委员会的领头人。

今年 8 月 18 日星期一，停工企业和机关增加到 120~130 个，在厂际罢工委员会号召总罢工以后，在格但斯克沿岸罢工企业和机关数简直是按时增加。当天，各地罢工企业和机关工人都提出了要求（见附件）。这些要求都是以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并上交的。

厂际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 and 策动者已不隐瞒他们要完全控制沿海形势的目的。在传单和讲演中他们号召全体居民同罢工工人联合起来，鼓吹波兰人的“团结”精神。在继续上工的企业和机关开始出现戴红色和白红色袖标的青年人，以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名义坚决

<sup>①</sup> 指波兰党领导人。下同。

要他们停工，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联合起来。据现有消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用威胁、强迫、恫吓的方法行事，积极使用蛊惑方法和波兰人的“团结”精神。在一些企业，罢工委员会靠工人纠察队把党和工会积极分子以及波兰统一工人党普通党员赶出大门，用肉体摧残威胁他们。在一些工厂妄图赶走管理领导人或把他隔离起来。利用索波特联欢节进行宣传鼓动，三次散发厂际罢工委员会传单。

厂际罢工委员会还要求国家协调冲突委员会不要同企业的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而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开始谈判的条件是解除同国内其他地区进行电话联系的封锁。盖莱克同志当日的广播电视讲话没能给事件发展进程带来根本变化。

应当指出，自国家政府委员会建立（8月17日）到今年8月23日，朋友们同单个企业的罢工委员会进行了谈判，以后同一批企业（17个）的代表进行了谈判，努力用满足这些企业工人的经济要求来分裂罢工者的所谓“团结”，从而局部地平息冲突。换句话说，朋友们想在完全不同的新的条件下用老方法解决问题。很遗憾，这种策略没有收到预想的结果。朋友们承认，这种策略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后未能收到良好效果，因为8月19日早晨停工企业和机关的数量已达160~180个，并继续迅速增加。

格但斯克、索波特和格丁尼亚市的形势继续恶化。在巨大的城市经济机制中日常生活失去组织。波兰统一工人党格但斯克委员会报纸《维堡之声》今年8月20日在《我们的评论》一文中就这一点写道：……这里差不多已停工一周了，正常的生活节奏业已消失。人的日常生活和个人问题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城市交通停顿、商店关门、服务行业停工，以及许多其他行业不正常工作，为解决这些问题造成巨大困难。学校开始无限期停课。公民的自由受到限制，而且常常受到逼迫。以武力制止想离开停工企业的工人。有的工人想为城市设施正常履行职责，其设备和工具就遭到破坏。还传

播关于停止上水道、下水道工作的威胁等。有时拒绝提供汽车运送极其需要的物资。恫吓商店职工，禁止向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的汽车司机出售汽油。剥夺解决对成千上万人日常生活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好与坏的问题，需要不必要的问题，希望和无所为的问题，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几千名戴红袖标的人要解决成千上万无红袖标的人的生活条件问题需多长时间？省、市政府曾尽力做保障城市日常生活的单位的工作，但朋友们承认，他们的影响极其有限，仅对一小部分企业和单位发生作用。这些企业和单位的领导人和党组织还能控制局势，没有允许罢工。大部分城市经营、商业、供应企业和单位继续按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命令和指示行事。据许多人的看法和我们的观察，在格但斯克、索波特和格丁尼亚市实际上已形成了双重政权的形势。大多数企业和机关基层党组织和省、市党委会的工作都是并行的。只有党政机关和部分积极分子发挥职能作用。厂际罢工委员会已成为罢工者领导中心，它协调和指导罢工委员会的行动，接待其他省的企业代表团、许许多多的西方记者、广播电视记者、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领导人和代表团；向常在造船厂大门前的群众通告刚开始罢工的企业、单位和个人给罢工者基金会的捐献等。城市里的机关、高等学校和企业也给厂际罢工委员会基金组织捐献，而且在不想出钱的人周围立即造成敌视和排斥的气氛。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积极利用居民的宗教感情，每天在造船厂大门前组织祈祷，而且在巴黎公社造船厂祈祷时，神甫宽恕了全体在场人（8000~9000）的过错。

据直接看到企业中事件全过程的许多朋友说，从罢工一开始，罢工委员会、特别是大企业的罢工委员会的行动就组织严密、意志坚决、目的明确。委员会内成立了指导工作小组，分工明确，对执行委托的任务高度负责，纪律严明。罢工委员会的委员实际上早已酝酿好，在经常围绕着罢工领导人的年青人的喊声中推举出。在许

多企业里罢工委员会根本未经选举，他们自行宣告成立，就开始代表集体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罢工委员会的许多领导人和委员是在罢工开始前一、两天才来到造船厂，在很多情况下（列宁造船厂和其他企业）是在罢工开始前一天才来到造船厂。厂长和党委书记宣布后，就在罢工开始四、五天以后，其中一部分领导人和委员又换了其他人。到现在，造船厂罢工委员会的成员中仅留下少数几个人。在新的工会委员会中现在差不多都是新人。还应指出一点，列宁造船厂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构成是，每个罢工企业和机关各派三名代表常驻，其中两名定期更换。所有新代表都参加学习，接受训练。所有这一切说明，罢工是经过深思熟虑、认真准备和严密组织的。莱赫·瓦文萨在回答 BBC<sup>①</sup> 广播电台记者的提问时并不隐瞒这一点，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一些成员也是如此，他们说，在此之前他们接受了 3 年培训。

正如朋友们所说和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及苏联专家的观察，罢工期间在企业和机关里，在大街上和排队时经常听到对苏联不友好的话或反苏言论。有些地方的墙上还出现了反苏标语，还有威胁总领事馆和苏联公民的匿名电话。秘密报纸《工人》的某些期刊登了反苏文章，其目的是激发反苏情绪，歪曲苏联—波兰的经济关系，在居民中造成一种舆论，说“像过去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现在在阿富汗一样，苏联可能要干涉波兰的内政，并把军队开进波兰”。

今年 8 月 23 日，在以 M. 亚格尔斯基同志为首的政府委员会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开始时，格但斯克省有 400 多个企业和机关宣布参加罢工，支持厂际罢工委员会。在埃尔布拉格省，这时所有工业企业、建筑和运输单位实际上都已停工。在格但斯克企业一些

<sup>①</sup> 即英国广播公司。

分支和乌斯特卡造船厂所在地斯伍普斯克省，有近 30% 的工业企业、城市公共交通业、建筑业参加了罢工。在贝戈西省、托伦省、夫洛茨拉夫省和奥利什蒂恩省，一部分工业企业和单位停止了生产。在这些省以及斯瓦普斯克省，在格但斯克、埃利勃伦格和斯鲁普斯克的罢工结束后还有一些企业曾经停工。据与格但斯克省毗邻的各省领导人说，他们感受到海岸事件对本省工人集体的巨大影响和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密使组织工人讲演的企图。

政府委员会同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的首次会谈是在今年 8 月 23 日。以后又陆续举行了四次会谈。对格但斯克电台广播的谈判进程的分析 and 参加谈判的朋友们的讲述表明，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特别是在开始时，感觉到自己是有力量的，表现得很放肆，妄图以力压人。他们对谈判做了认真准备，有经验丰富的、内行的顾问，善于使用蛊惑言词和事实，有理有据地提出要求。头几次会谈进行得很紧张，互不信任，互相猜疑，甚至互相敌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一发言，隔壁房间里的罢工者的代表和造船厂大门前的群众就高声叫好，热烈鼓掌。应当指出，今年 8 月 28 日当关于第一个问题（关于工会）的谈判陷入僵局并中断时，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的局势更加尖锐了。据现有消息，厂际罢工委员会和各企业的罢工委员会惟恐用军队来驱赶罢工者，所以加强了厂区和大门的守卫，有些地方还修了壁垒。

据朋友们的看法，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此期间进行的人事变动，以及广播电视台多次转播的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在琴斯托霍瓦市的讲话具有一定的心理作用，但对厂际罢工委员会和大部分罢工者力争满足要求的决心没有影响。

众所周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采取了现有条件下惟一正确的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今年 8 月 30 和 31 日政府委

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进行了决定性的会谈，双方都做出让步并签订了协议。

在政府委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的最后公报中写道：

经过谈判政府委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就对企业工人来说极端重要的问题达成协议；

厂际罢工委员会提出的21项作为谈判和协商项目的要求，将根据签订的备忘录予以执行；

如何实现备忘录中的决定，是以后政府委员会和将改称独立自主工会厂际组织委员会的厂际罢工委员会协商的项目；

根据以上所述厂际罢工委员会宣布格但斯克海岸的罢工结束，号召所属各企业集体开始工作。

自今年8月31日夜（一部分自9月1日晨）所有企业和机关都开始工作。

8月份在海岸发生的冲突，无疑是由于没有满足工人阶级和其他居民阶层的要求，逐渐背离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6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近年来没有贯彻1970年12月事件后党和政府领导提出的政策和口号。

众所周知的国家经济比例失调、外贸负债、计划管理混乱、生产无组织、社会政治生活不正常、对涉及大多数劳动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久拖不决、无限制地发展城乡私人经济、贪污腐化、营私舞弊、没有克服缺点和困难的老实说法和明确具体的计划，所有这些引起工人阶级和社会其他阶层的不满和不信任。这在工人、工会和党的会议的讨论和批评中，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8次代表大会的会前讨论中，都不止一次地有所反映。但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行政管理机关、党和工会组织的实际工作中，劳动人民没有得到对他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的回答。此外，上述现象近来日趋严重，对劳动人民的批评和意见置若罔闻，管理机

关、党和其他社会组织工作中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行政命令，致使党的威信受到破坏，失去劳动人民对党的信任，他们不相信党能解决存在的问题。

应当指出，发生社会政治危机、对党的信任危机显然也有思想性质的原因。在格但斯克海岸，除了近年来社会经济问题尖锐外，这些思想性质的原因具有特殊意义，所以反社会主义力量力图在这里取得成绩并非偶然。大多数格但斯克、埃利勃伦格和斯鲁普斯克的企业的工人阶级在近 10~15 年中都更新了，但仍代表着第一代工人。许多企业里 50~60 年代的核心工人不到全体工人的 1/3。大部分工人是在互相矛盾的、断断续续的党的思想工作条件下，在小资产阶级观点赚钱心理、消费和坐享其成情绪广泛传播的条件下受教育的。

许多地方党和经营管理领导人，忠于党的事业的党员认为，在党的领导下在国内和党内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一样，纵容了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放松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居民阶层中，首先是在青年中进行高度社会主义觉悟、坚信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和坚定的思想政治观点的教育。

所发生事件的一个特点，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参加罢工。正如地方同志所说的那样，其中大多数是由于形势所迫、团结感、不想离开集体和支持提出的要求而消极地加入罢工队伍的。据朋友们说，一小部分党员积极参加了罢工的组织 and 行动。

根据许多忠诚的党员的看法和我们的观察，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上述思想工作中的缺点，在于近年来选择和接收党员工作中犯了错误；还在于党员迷失了方向，对类似事件没有思想准备，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也不相信党的力量。有些同志认为，由于许多忠诚的党员感到失望、痛苦、悲观，在党内发生了信仰危机，这也许是对的。



分析表明，基层党组织、党的机关和安全部门在事件发生前夕，没有掌握各单位的全部情况，不了解劳动人民的情绪，对反对派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估计不足。事件的全过程证明，这些力量逐渐激发了不满情绪，使形势紧张起来，酝酿和领导事件进行了系统的、目的明确的、极其秘密的工作。据许多同志的评论和我们的观察，他们能正确选择冲击时机，提出符合人们情绪的恰当的口号并善于使用这些口号，他们的行动是有组织的、坚定的。一些朋友认为，实际上这是一次公开力量检阅，是“沉默的、潜在的反革命”的一次出击。在沿海和全国大罢工的浪潮中它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朋友们被迫在政治上做出重大妥协，正如一些同志所说的，“向右跨一步，向后退一步”。

沿海的形势现在仍然是困难的，不稳定的。生产水平和工作节奏低于事件发生以前。在企业 and 车间继续争论是否停工问题，因为政府委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现为独立自治工会厂际组织委员会）所签协议中提高工资及其他经济要求问题没有按工人的每个类别得到具体解决。在工人和其他劳动阶层中的反社会主义力量千方百计保持发生事件时的紧张和不信任局势。辱骂领导干部（车间主任、处室领导人、厂长），要求撤换他们（如新工会组委会要求格但斯克港领导人撤换40名各生产组的领导人）的事时有发生。而且提出条件：在任命时要同工会协商候选人。看来争取每个重要生产组领导干部的激烈斗争开始了，这显然是罢工的组织者和支持他们的反社会主义力量的长远打算之一。

在一些情况下新工会组织委员会努力站在全体批评者的立场上，不负责具体解决现存的问题，竭力发挥合法反对派的作用。新工会厂际组织委员会正式声明不从属于反对派、科斯科尔组织及其他委员会，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推行他们的路线。据现有的资料，曾领导巴黎公社造船厂罢工委员会的该委员会的副主任科洛泽伊，在

会见格丁尼亚市高级海员学校教职工时曾说：“我们需要保护那些日子的紧张形势，以防人们的感情和情绪消沉下去，从而受到官方宣传的影响”。

厂际组委会和各企业、建筑业、机关、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组委会积极鼓动加入新工会。据现有资料，造船厂、港口及其他一些工业企业工人的 80% 以上已表示愿意加入新工会。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大部分职工也支持新工会。据朋友的资料，截至 1980 年 9 月 13 日在格但斯克全省一半企业和机关中（641 个企业和机关中的 331 个）已成立了新工会组委会。现在还难说最后结局如何，因为还没有新工会章程，所以也没有新工会的形式。朋友们在力争尽可能多地保留现有的工会组织，使劳动者相信最近工会中央理事会将通过的决议和关于工会的新法律草案实际上是符合人们提出的要求的。同时朋友采取了这样的路线，即：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就地参加新工会组织，只要这些工会组织领导人执行协议中规定的所有条件，就使用这些工会组织为工人阶级、党和政府的利益服务。据朋友们预测，可能成立造船工业工人新行业工会，许多单位将选举新工会委员会，在部分企业和机关中将有两个工会组织同时并存。

必须指出，成立自治组织的举动已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今年 9 月 13 日格但斯克市波兰艺术电影节期间正式宣布成立波兰电影艺术工作者独立工会。在格但斯克各高等学校成立了组建独立于波兰大学生社会主义联合会的名为“波兰大学生独立联合会”组织的组织委员会。由于新学年即将开始，地方领导人（费什巴赫同志、科洛泽伊斯基同志等）表示非常担心，青年大学生在过去事件浪潮中也提出各种经济的和社会政治的要求。从事创作工作的知识分子、文化机关和学校中的状况也使朋友们感到非常不安。

据当地同志的看法和我们的观察，许多基层党组织的状况现在依然是困难的。许多地方的基层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在上月的震动

之后还没有醒过来，精神压抑，不知所措。据现有材料，党内领导人的变动（1980年9月5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六次全会）地方上基本平静地接受了。但在科学技术和搞创作的知识分子中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同时各地都期望，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在最终期限内制定出克服危机、稳定国内局势的具体行动计划。不久前在各省召开的，有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人参加的党员干部会和党省委全会、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尼同志在格但斯克和卡托维兹的讲话中所阐述的意见和政策，为区、市、乡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会提出了迫切的任务，无疑为加强和巩固党的组织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工作是长期的，要求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做出深入而全面的评价，根本改变整个工作作风，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宁标准。

总之，波兰人民共和国今年夏季的事件，是近十年来在沿海再次发生的严重事件，是和整个这一时期波兰社会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各种现象密不可分的。这些现象根源也可能追溯到国家发展的前一个时期，也可能追溯到国际舞台思想意识斗争加剧方面，以及西方加紧削弱社会主义方面。所有这一切无疑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科学分析，全面的评价，首先是由朋友们来进行。与此同时，波兰人民共和国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局势，正如朋友们所说的，过去的事件为长远的、非单一的、复杂的发展过程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许多好的和坏的现象。最好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出发在最近就组织科学力量研究和分析这一过程。鉴于朋友们的请求，希望尽快给总领事馆发来以下题材的波兰文或俄文书刊：列宁论工会；列宁论思想工作；列宁论党在社会中的作用。

在目前形势下，看来也需要苏联外贸单位特别监督履行给波兰人民共和国造船、修船工业供应苏联设备、材料和仪器的协议和合

同，力争全部、及时或提前履行这些协议和合同。

附件在下页，不保密。

苏联驻格但斯克总领事馆 П. 瓦赫拉麦耶夫

附 件

格但斯克罢工工人提出并由厂际罢工委员会转交的要求

1. 同意根据第 87 号国际劳动组织关于工会自由的公约，成立不从属于党的工会。
2. 保证罢工权利，保证罢工者及罢工支持者的安全。
3. 尊重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保证的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独立的出版社不受惩治，并保证各种信仰的代表能使用宣传工具。
4. 恢复以下人员的权利：  
1970~1976 年罢工后被释放人员；  
因信仰被高等学校开除的大学生；  
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 Э. 扎德罗任斯基、М. 科兹沃夫斯基、Я. 科兹沃夫斯基，取缔信仰迫害。
5. 用宣传工具通告联合罢工委员会的成立，并公布其要求。
6. 采取实际措施使国家摆脱危机：  
无保留地向公众通告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  
为社会各团体、各阶层提供参加讨论改革纲领的条件。
7. 用工会中央理事会基金支付职工休假工资的办法支付罢工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工资。
8. 把每个职工的工资增加到每月 2000 兹罗提，补偿迄今物价

的增长。

9. 保证随物价的增长和货币的贬值增长工资。

10. 保证国内市场食品供应，只出口剩余食品。

11. 在肉的问题解决以前肉和肉制品实行凭票供应。

12. 联消议价商品以及所谓外汇商店。

13. 实行按技术水平原则选拔干部，而不是按党员与非党员原则选拔干部，取消民警、保安部门的优惠：

平衡家庭补助；

取消内部小卖店。

14. 给有35年工龄的职工发养老金，同时缩短退休年龄，女人50岁，男人55岁。

15. 平衡以前规定的和后来规定的养老金数额。

16. 改善劳动卫生条件，为劳动者提供完全的医疗服务。

17. 保证女职工子女在幼儿园、托儿所所需数量的位置。

18. 对妇女3年哺育孩子期实行带工资休假。

19. 缩短排号等候新住宅的期限。

20. 提交工人营养费金额，由40兹罗提提高到100兹罗提，增加出差费数额。

21. 对劳动者实行所有星期六都休息的制度。如果星期六不能休息，用增加假期或付酬休息日补偿。

№06041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 同波兰党政代表团会谈的会议记录

(1980 年 10 月 29 日)

绝密

仅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勃列日涅夫同志

参加人：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格里申、葛罗米柯、基里连科、佩尔谢、苏斯洛夫、吉洪诺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杰米契夫、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索洛缅采夫、多尔基赫、齐米亚宁、鲁萨科夫

### 1. 关于波兰领导人对苏联进行友好工作访问的材料

勃列日涅夫：明天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同志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平科夫斯基同志到我们这里来。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齐米亚宁和鲁萨科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同波兰领导人会谈的材料。我认真阅读了这些材料。我认为同志们阐明了所有的主要问题。可能有人有什么意见。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乌斯季诺夫：我也认真阅读了准备的材料。我认为材料准备得很好。包括了所有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这里所有的问题提得都很尖锐，就是说对，波兰领导人应当这样提出问题。

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现在反革命的确十分嚣张，而波兰报刊

和波兰领导人对此却只字不提，不提人民的敌人。要知道这是人民的敌人，是反革命的直接帮凶和反革命本身在反对人民。怎么能这样呢？

安德罗波夫：的确，无论是报刊，还是广播和电视都没有直接提出关于波兰存在反革命的问题，波兰领导人也不提这个问题。

葛罗米柯：大众传媒对这个问题也是沉默。

安德罗波夫：波兰报刊以揭露中央领导的缺点取代揭露反社会主义分子。应当直接抨击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瓦文萨、库伦之类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想要夺取工人的政权。波兰领导人应当直接指出这一点，但我们在波兰报刊上却看不到。

勃列日涅夫：他们已开始夺取议会，但他们说军队支持他们。瓦文萨周游全国，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到处受到尊敬，波兰领导人沉默不语，报刊、电视对这些反社会主义分子也不表示反对。可能，已确实需要实行军事管制。

安德罗波夫：我认为事实也证明，波兰领导人不理解形势的严重性。

乌斯季诺夫：我完全同意同志们准备的材料文本。我们的波兰朋友说得很多，但没有成效。事情已到了如此程度，瓦文萨及其帮凶已占据了费弗茨瓦夫市广播电台。他们实际上是重复盖莱克的工作作风。他们没有把任何人投入监狱，他们没有惩罚过任何一个工人阶级的敌人。

勃列日涅夫：南斯拉夫不久前发生了小规模罢工，但他们对此事很认真：逮捕了300人，并投入了监狱。

乌斯季诺夫：如果不实行军管，事情会糟糕、更糟糕。军队里有骚乱。而北方集团军是我们培训的，已做好充分战斗准备。

葛罗米柯：应当坚决地告诉波兰朋友们，他们应当首先把这一切告知人民，让人民了解当前形势的紧张程度。而他们现在批评盖

莱克，批评党中央，另一方面，反社会主义分子已肆无忌惮，却给他们自由。

至于雅鲁泽尔斯基，当然，他是一个可靠的人，但现在他说话也没有激情。他甚至说，军队不会去反对工人。总之，我想应当把一切都不留情面地告诉波兰人。

勃列日涅夫：当雅鲁泽尔斯基同卡尼亚谈谁应当做第一把手时，他坚决拒绝当第一书记，并建议卡尼亚当第一书记。这也说明一定问题。

葛罗米柯：我认为在准备的材料中正确地提出了所有主要问题，至于在波兰实施紧急状态问题，这应当认为是拯救革命成果的一项措施。当然，可能不是马上实施紧急状态，也不是卡尼亚和平科夫斯基同志从莫斯科回去后立即实施，而是要等一段时间，但是要实施的。我们不能丢掉波兰。苏联在同希特勒分子的战斗中解放了波兰，牺牲了 60 万官兵，我们不能容忍反革命。

当然，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平科夫斯基是忠诚的同志。我在华沙同他们会谈时，他们非常担心所谈的一切。卡尼亚甚至非常激动，而他受到党的信任。

勃列日涅夫：反社会主义分子非常无理，他们拒绝华沙省法院关于他们登记“团结工会”时所提意见的决定，以后对议会议员的批评也置若罔闻。以后将怎么样？

苏斯洛夫：我认为材料准备得很好。这里一切都谈到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现领导人不是坚强的人，但他们是领导核心中诚实的、优秀的人。当然，奥尔尚斯基工作不好。莫洽尔是“左”倾分子，他可能坏事。他们应当反击，而不应当站在防卫的立场上。这一立场恰好在我们今天讨论的材料中也得到反映。

勃列日涅夫：他们应当有自卫队。

安德罗波夫、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这一措施是必要的。卫



队应当成立，而且要处于战时状态，可能还要预先装备好。

苏斯洛夫：我们当时曾给哥穆尔卡写过信，请他不要用武器反对工人，而实际上他们没有听我们的话，当时波兰领导人使用了武器。

波诺马廖夫：为同波兰领导人会谈而准备的材料是合理的，里边一切都符合实际。材料中非常明显地反映了我们的忧虑。这种忧虑我们应该告知波兰领导人。

葛罗米柯：也许我们应该把材料交给波兰领导人。

安德罗波夫：如果我们把材料交给他们，那么材料就有可能落到美国人手里。

勃列日涅夫：这确实有可能。

鲁萨科夫：让他们仔细听列昂尼德·伊里奇讲，并作笔记。

格里申：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在会谈开始时就应讲一下我们的忧虑。然后让他们回答。材料准备得很好。

吉洪诺夫：列昂尼德·伊里奇，当然，您应照材料开始发言，并把所写的全部讲完。我们请他们来就是要向他们讲我们对波兰形势的忧虑。材料中对所有问题谈得都很好。现在在波兰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让他们说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准许反革命活动，让他们解释。共产党员退党，因为害怕反革命分子。请看，已到了何种地步。

鲁萨科夫：我认为材料中确实提到了所有的问题，但卡尼亚可能提出材料中未涉及的另外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干部问题。特别是，他们看来要提出让亚勃伦斯基、维尔勃里扬、科瓦尔奇克、克鲁奇克离开政治局的问题。应当指出，尽管克鲁奇克有用处，他是个有威信的同乡，过去是工会活动家。

卡尼亚同志可能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多边援助波兰问题。问题在于卡尼亚反对这种援助。这里我说的是，巴伊巴科

夫同志在材料中提到对波兰的国际主义援助，而波兰同志却说，他们的情况和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不一样。

还可能出现一个问题。波兰同一些毗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不太好，比如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以前他们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所谓免签证制度。波兰公民利用这一点，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购买食品和粮食。德国同志认为必须取消免签证过境制度，波兰人当然反对。我们怎么办？我认为我们不应干预这件事，让他们自己决定。一切其他问题材料中都写得很好。

契尔年科：委员会准备的材料具有全面性。要决定波兰同志应注意的主要的、基本的问题。而且问题越来越尖锐。可以直接谈尖锐的形势和必须采取的反对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措施。

基里连科：罢工已开始 3 个月，一点也不见平息。我们为波兰做了许多事，建议他们正确处理发生的问题。现在他们不让军队参与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实际上正如同志们所说的，他们也不揭露反社会主义分子。现在他们那里的青年不好办。实际上没有共青团，没有青年队伍。也许应当让军人换装并让他们到工人中去。当然，首先应当动员共产党员。卡尼亚令人奇怪的是无所事事，越来越让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不能理解。比如我同胡萨克及其他捷克同志会谈时，他们对这种行为表示惊奇。捷克同志举例说，他们坚决反对了一个企业领头罢工的人，而且收到了效果。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政治局做得很对，就是请波兰领导人到莫斯科来会谈。应当直截了当地、坚决地告诉波兰朋友。他们现在不采取必要措施，站在防卫立场上，而这种立场是不能坚持太久的，人们会将他们抛弃。

列昂尼德·伊里奇，会谈应由您开始。我认为材料文本很好，没有什么意见。应当向波兰朋友讲的意见，里面都有。您讲了以后，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那时也许能弄清楚应当再讲些什么，并

交换意见。

巴伊巴科夫：如果在会谈中卡尼亚和平科夫斯基提出经济问题，那么应当说，我们收到了波兰方面关于这一问题的信。我们已委托有关同志准备给予经济援助的建议。我们能给予什么？当然，我们可以答应延长 2.8 亿卢布贷款的期限，然后再给 1.5 亿卢布的贷款。这是他们现在需要支付借债利息用的短期贷款。接下来说，我们可以稍增 1981 年的燃料供应量，比如增加 5 亿卢布。也许可以同意减少波兰商品进口量约 2.5 亿卢布。总计我们可以援助他们 10 亿卢布。我想，也许我们应当给兄弟党准备信。我们已准备了关于明年稍减向他们供应石油和石油制品的信，自己卖掉这些石油制品，把得到的钱交给波兰人民共和国，让波兰人民共和国购买所需要的商品。除古巴、蒙古、越南外，取消对所有国家的石油供应。至于粮食，我们已决定给 50 万吨，不能再多了。也许应给点棉花、柴油，再增加 20 万吨。接着，显然应当告诉他们，我们的经济学家将帮助波兰有关单位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和摆脱困境的办法，即为摆脱困境应采取的内部措施。我们将把由于波兰事件稍减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石油制品供应告知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这些国家可能会反对。但又有什么办法？别的办法没有，看来，我们只能这样做。

勃列日涅夫：现在世界市场上石油多少钱？

巴伊巴科夫：1 吨石油的价格 150 卢布，1 吨汽油和 1 吨柴油各 190 卢布。

阿尔希波夫：在材料里有经济问题。我想同卡尼亚就这些问题会谈时，应概括地谈。我们准备材料，草稿我已经看了，我们再稍做修改，然后交给吉洪诺夫审阅。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给他们石油和石油制品，因为他们用不上。各工厂都罢工，会任意挥霍燃料，所以我们最好卖掉，把钱给波兰。

鲁萨科夫：有过卡尼亚关于经济问题的信。他们请求制订进一步发展波兰经济的方案和摆脱困境的办法。列昂尼德·伊里奇，我想你就答复卡尼亚，我们的同志正准备材料，一定给予帮助。

勃列日涅夫：看来应当通过提交的材料，并认为在同波兰朋友的谈判中代表团应遵照这些材料。

№11859

## 罗曼诺夫关于整顿波兰出版物 在苏联发行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0年10月30日)

7Д-199

绝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有关整顿波兰出版物在苏联发行的一些措施”（Ср - 231/8с1980年10月4日）的决议<sup>①</sup>中规定，建议苏联部长会议保护出版物国家机密管理总局应加强对用波兰语和俄语在苏联发行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的内容进行检查。该决议中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提出的任务已解决，必要时，可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相应的建议。

根据今年10月21日在苏共中央对外宣传部会议上得到的指示精神，管理总局开始检查了31种波兰报刊和杂志，其中（目录1）应停止零售和订阅，只能将他们送往有权专门保管，限制公众利用国外参考书的单位和机构。另外26种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报纸和杂志（目录2）经检查之后，未发现在政治方面有不良内容，可以发给零售商和订户。所有其他寄到苏联供零售和预订用的波兰定期出版物，正如上述会议所决定的那样，就无需再通过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检查了。

---

<sup>①</sup>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决议。

由于对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定期出版物，上述目录 1 和目录 2 所列举的只能在莫斯科由管理总局进行检查，而从波兰发出的这些出版物（除莫斯科之外）先到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维尔纽斯、里加、基什尼奥夫、利沃夫和布列斯特，然后才能分发给全国各地。所以，应协同苏联邮电部制定通告上述城市邮政管理部门关于莫斯科批准检查决定的办法，以便能根据决定就地进行相应的检查，然后，再将允许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出售和分发给订户。

关于要将限制公开发行的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物送到那些有权专门保管这些出版物的单位和机构手里，这一问题的解决得要耽搁一些时间。问题在于，苏联邮电部“苏联报刊发行总局”机关，根据其领导人所表示的情况来看，在莫斯科和在当地相应（按地址）送波兰定期出版物预订卡工作的同时，能够给国际邮政总局有关上述机关和单位订购经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检查过的波兰出版物的报表，无法早于一个月、一个半月。这样，在送交这种报表之前，按有专管权单位的地址分发这些出版物是不可能的。

管理总局同时也开始检查那些从波兰人民共和国邮寄来，先经过莫斯科国际邮政总局，然后再按地址分发到苏联各机关和个别公民手中的信件。这样的邮件每天就有 1000~1200 件。然而，直到目前仍然还没有解决的是，关于从波兰寄往苏联路经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维尔纽斯、里加、基什尼奥夫、利沃夫和布列斯特，然后再送到莫斯科的那些邮件的问题。虽然，已达成协议的是，波兰发往苏联作零售和订购用的那些报纸和杂志只能在莫斯科进行检查。苏联邮电部认为，从上述城市将邮件送到莫斯科（根据初步的统计资料，每天可达 3000 件）的花费太大，因此，主张这些城市的邮件检查应由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所属的地方机构去进行。

管理总局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地方机关从来都没有检查过用其他国家语言出版的外国参考书，他们

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干部。这里的主要任务是，按9个居民点（包括莫斯科）分散进行检查，这就可能对某一种出版物在政治上做出不一致的决定，那就不行。应该指出的是，目前，从世界所有的国家都邮寄来印刷出版物，其中从南斯拉夫、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寄出的，都只能送到莫斯科。这种邮件每天通过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二分局的就有5万件以上，而且在这个数目上还要追加3000~4000个波兰邮件，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任务的实质。所以，请求苏联邮电部下达指示将所有的波兰邮件（除了零售和预订的定期刊物之外）都送往莫斯科国际邮政总局检查。

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直到今天对波兰人民共和国寄来的出版物还没有进行检查。在我们的编制中，甚至连一个懂波兰语的编辑都没有。现在从其他分局的编制中挑选了一名这样的编辑。考虑到上述有大量波兰出版物应进行检查，要求解决增加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中央机关懂波兰语4人的编制（2名编辑和2名主要工作检查员）的问题。按服务类别各编辑都应读国外的出版物，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自己就可以解决某种出版物应受限制的程度，或者可以经常给领导提出建议，以便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检查工作应是：打开邮件；作登记卡；在检查员检查过后在出版物上打上书刊检查章；准备好出版物按地址发出，以及其他等。

附件：1.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лб. №1563сс, экз №1, 1页，绝密

2. 目录1，лб. №1564сс, экз №1, 1页，绝密

3. 目录2，лб. №1565сс, экз №1, 1页，绝密

苏联部长会议保护出版物国家机密管理总局

局长 П.К. 罗曼诺夫（签字）

1980年10月30日

№06143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的会议记录

（1980 年 10 月 31 日）

绝密

仅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出席者：尤·弗·安德罗波夫、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阿·雅·佩尔谢、米·安·苏斯洛夫、尼·亚·吉洪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Т.Я. 基谢列夫，瓦·瓦·库兹涅佐夫、米·亚·波诺马廖夫、米·谢·索洛缅采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弗·伊·多尔吉赫、米·瓦·齐米亚宁、康·维·鲁萨科夫同志

1. 关于同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劳动党委员会主席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谈判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同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的谈判无疑是有益的。

我的印象是：同政治领导人、组织者门格斯图的会晤一个接着一个。他的发言说明，解决埃塞俄比亚面临问题的办法是经过深思的，是成熟的。事实也说明对他是有利的。埃塞俄比亚革命力量的地位已经巩固，领导人的政治方针得到支持。

但是，国内形势依然是困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本身就是复杂的，门格斯图和他的战友要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不断的外来



武装入侵的条件下完成这一任务。

谈判记录已经分发，看来同志们已见到了。我仅谈谈同门格斯图面对面的谈话情况，这具有互相信任的性质。在谈话中我们也研究了对埃塞俄比亚人来说很微妙的问题，如他们同索马里的关系和埃塞俄比亚内部的民族问题。

2. 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卡尼亚同志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平科夫斯基同志访问苏联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我们同波兰新领导人的会晤是及时的。波兰事件变化很快，如果不及时纠正波兰同志的立场，我们可能陷入困境，以致必须采取非常措施。

波兰同志没有掩盖对反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活跃的不安。但在谈到同反革命作斗争的措施时，则显得犹豫不决。

他们说，波兰被欠债缚住手脚。一切从西方的进口都靠贷款，而许多企业功能的发挥和国内市场的状况都取决于进口。波兰的经济直接依靠西方。波兰同志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国内形势稍一紧张就会给资本家拒绝延期还款提供借口，按卡尼亚的话来说，波兰就会被迫屈服。

我们直截了当地问过卡尼亚，如果出现直接威胁人民政权的情况，党是否有对付非常情况的计划。他说，对付非常情况的计划有，他们知道该逮捕什么人，如何使用军队。但从全局来看他们还未准备走这一步，而是把它推到不定期的未来。

我不准备转达我们谈话的全部内容。谈判记录已经分发，如果同志们没来得及看，可以看一看。

上次会议上我们说过，同波兰同志会晤的目的有二：一方面，帮助他们深入理解危险性，促使他们采取较坚决的行动；另一方面，给他们鼓劲，坚定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我想，谈判对这两方面都是有益的。

我已说过，卡尼亚只是对如何对待非常情况表示了一定的保留。至于我们提出的其他措施他都表示同意。在评价危机原因和反革命威胁程度方面我们也做到了互相充分理解。

卡尼亚保证，回华沙后把我们的观点介绍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我们所说的话他们都认真地做了记录。当然，卡尼亚说，不向政治局委员做全部传达，因为担心把情况传到西方。而对波兰领导人来说重要的是，不让人说他们按莫斯科指挥棒行事。

至于卡尼亚和平科夫斯基本人，他们给我，看来也给参加谈判的其他同志留下不错的印象。他们是严肃认真，勤于思考的人。当然，他们作为政治领袖究竟支持什么，还要根据行动来判断。

同志们大概会认为，当前就波兰问题我们已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当然还要严加提防，因为波兰的局势简直是随时都可能爆炸。

应当加快进行的是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它能使波兰人渡过难关。无论我们多么困难，这件事还必须做。现在让我们说好：下次政治局会议时所有必要的建议都要提出来。

可能，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及其他同志想补充我的传达？

如果没有什么补充，那么我们通过关于谈判的总结。

安德罗波夫、苏斯洛夫、基里连科、契尔年科、吉洪诺夫都说，邀请波兰领导人访问苏共中央并进行谈判是及时的，极其必要的。

勃列日涅夫：建议通过谈判。

全体：同意。

吉洪诺夫：波兰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他们欠很多债。现在就须还债 5 亿美元。此外，他们现在想借 15 亿美元用于周转。我们要准备建议。

勃列日涅夫：下次政治局会议前准备好建议。

吉洪诺夫：好。

阿尔希波夫：我们同时准备提出援助波兰的建议和由您，列昂尼德·伊里奇，签署的致兄弟国家领导人的呼吁书。

勃列日涅夫：我想可不必同时准备，呼吁书要快点发出去。

葛罗米柯：我想当然不必同时准备好。我想说几句关于谈判的事。谈判时卡尼亚和平科夫斯基同志关于以前的政策，即盖莱克的政策什么也没有说。他们说到现有的政策和他们需要的政策。

安德罗波夫：通过这次会谈波兰同志对他们的形势理解得更好了。到华沙后卡尼亚同志在机场说，他非常满意同列昂尼德·伊里奇的会晤，列昂尼德·伊里奇极为重视波兰的需要。

勃列日涅夫：他们怕提“反革命分子”这个词。你们请听谢苗诺夫自波恩转达一件事。他转达的恰恰是同一位波兰活动家的谈话。这简直是说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武装起义。波兰同志不能理解一个简单的事实，在他们那里反革命在全力反抗。

安德罗波夫：这个意见确实很重要，需要认真检查一下。

乌斯季诺夫：我们应当提高警惕，以防万一。

契尔年科：同波兰同志的会谈帮助他们看清了波兰现在的真实情况，并认真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评论已形成的局势。当然，这也能使他们更有力地实施反击反社会主义份子的措施，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成果。

No06141

## 泽列诺夫关于反对派在格但斯克海岸的 活动给国内的汇报

(不早于 1980 年 11 月 20 日)

机密

苏联驻格但斯克总领事馆

格但斯克海岸各企业的大罢工表明，大罢工之所以发生不仅仅是由于劳动人民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经济、满足居民食品需要、涨价、提供住宅、工资比例、一些领导干部千方百计发家致富方面所犯错误的不满，而且还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和政府对于反社会主义分子破坏活动的危险性没有足够的估计。许多党的活动分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安全机关和警察局的代表提意见说，如果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首先是盖莱克能及时听取各地关于群众不满情绪、反对派的活动日益猖獗、当前国内政治和经济危机的话，大罢工是可以制止的。

通过分析近二、三年来格但斯克的形势可以看出，反对派逐渐增加了自己组织的数量，并在不受任何惩罚的条件下逐渐使自己的活动合法化。秘密出版物的数量增加了，散发传单的数量也增加了。在这些传单中隐蔽地或公开地宣传西方思想意识的准则，破坏我国现行的制度，也有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言论。反对派举行的祈祷和集会一年比一年多，参加的人数和反对派领导人的反社会主义讲演也有增加。比如为纪念 1970 年十二月事件，由“保卫人权和

公民权运动”、“年青波兰运动”、自由工会组织的集会，1977年有将近1000人参加，1978年有将近2000人参加，而1979年则有3000多人参加。此外，为纪念1918年波兰获得独立、1791年宪法，也举行群众集会，参加人数也越来越多（2500~3500人）。在这些集会上公开号召收回波兰东部领土，站在煽动的立场上解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关于波兰独立的言论，降低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解放作用。

许多党的活动分子代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反社会主义力量日益频繁的活动表示担忧，并认为必须加强同破坏分子的斗争。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一般只批准拘留活动分子48小时，只有一次在“年青波兰运动”领导人舒德洛夫斯基和科勃兹杰伊充满敌意的演讲后才批准行政拘留他们3个月。

在海岸大罢工最初几天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库伦、勃鲁谢维奇、舒德洛夫斯基、科勃兹杰伊等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实际上领导了罢工活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墙上的口号说明科尔科斯这一组织对罢工进程的思想影响。而罢工领导人却尽量掩盖科尔科斯及其他集团在罢工运动中的作用。当政府委员会主席亚格尔斯基在谈判时提到厂际罢工委员会同反对派领导人的联系后，一夜间口号就被仔细地涂抹了。

大罢工停止、厂际罢工委员会改组为独立的团结工会厂际组织委员会以后，“流动大学”组织者之一马佐维茨基成为工会领导人瓦文萨的首席顾问。格但斯克组委会主席团成员为科尔科斯组织的积极分子科洛泽伊、瓦连金诺维奇。1980年9月科尔科斯格但斯克组织领导人鲍鲁谢维奇成为上述主席团的成员，他是著名的社会主义和国内现有制度的狂热反对者。毫无疑问，工会领导人瓦文萨受反对派的影响。

科尔科斯组织领导人库洛大罢工以后几乎一直在格但斯克。根

据瓦文萨的要求他不去团结工会办公处，但在市内其他各地常同他见面。他还定期同鲍鲁谢维奇及该组织的其他活动分子会晤。科尔科斯组织越来越想办法使其活动合法化，并表明它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10~11 月份在团结工会办公处和市内其他地方贴出了关于社会自卫组织“科尔”委员会的传单。传单上指明“科尔”的目的是：

1. 同压制政治信仰、世界观、宗教信仰做斗争，帮助被追捕的人。

2. 同违法现象做斗争，帮助受苦的人。

3. 为公民权利和自由而斗争。

4. 支持和保护旨在实现人权和公民权的一切社会倡议。

以下是科尔科斯组织成员名单（包括 2 名已故成员）：

科学工作者，其中有 3 位世界著名科学家、波兰科学院院士克拉诺夫斯基、利平斯基和牛津大学教授科拉科夫斯基、巴兰恰克、别林斯基、策林斯基、霍叶茨基、利普斯基、马切列维奇、纳伊姆斯基、罗马舍夫斯基、什奇佩尔斯基、沃谢克；

著名演员：加利娜·米科莱伊斯卡；

天主教教士：兹比格涅夫·卡明斯基、扬·泽娅；

律师：柳德维格·多尔恩、安顿·帕伊达克、阿涅拉·什捷恩斯别尔托娃；

社会学者，法律顾问，历史学家，语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谢维林·勃柳米坦、鲍格丹·鲍鲁谢维奇、维茨拉夫·肯奇克、亚切克·库伦、扬·利京斯基、阿达姆·米赫尼克、叶瓦·米列维奇、沃伊采赫·奥库什克维奇、尤泽夫·雷比茨基、赫恩里克·维叶茨。

其中有：

军团士兵安顿·帕伊达克、阿达姆·什切朴尔斯基。

1920 年士兵柳德维格·沃伦，传教士兹比格涅夫·卡明斯基、

安顿·帕伊达克、尤泽夫·列比茨基、阿达姆·什切朴尔斯基、瓦茨拉夫·扎瓦茨基、传教士扬·泽亚。

九月运动和边防军士兵柳德维格·沃伦、叶日·费佐夫斯基、传教士兹比格涅夫·卡明斯基、扬克拉诺夫斯基、扬-尤泽夫·利普斯基、尤泽夫·雷比茨基、传教士扬·泽亚。

波兰地下组织领导人、在莫斯科法庭受审者安顿·帕伊达克。

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犯柳德维格·沃伦、安顿·帕伊达克、尤泽夫·雷比茨基。

哥穆尔卡时期的政治犯谢维林·勃柳姆什坦鲍格丹鲍鲁谢维奇、瓦茨拉夫·彼得·肯奇克·亚切克：库伦、扬·利蒂恩斯基、阿达姆·米赫尼克。

受检察院起诉的哥穆尔卡时期和盖莱克时期的政治犯谢维林·勃柳姆什坦、鲍格丹·鲍鲁谢维奇、米罗斯拉夫·哈叶茨基、维茨拉夫·彼得·肯奇克、亚切克·库洛、扬·尤泽夫·利普斯基、扬·利蒂恩斯基、阿达姆·米赫尼克、安顿·马谢列维奇、彼得·纳伊姆斯基、兹比格涅夫·罗马舍夫斯基、恒里克·夫尼叶茨。

波兰社会主义党活动家柳德维格·沃伦、爱德华·利频斯基（自1906年）、安顿·帕伊达克、阿涅利亚·什太恩别尔戈夫、阿达姆·什奇潘斯基、瓦茨拉夫·扎瓦茨基。

传单由格但斯克科尔科斯组织签署。

从名单中可以看出，传单中有些人的姓名在几部分中重复出现。据波兰朋友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居民中树立这些人为真理而斗争的形象，他们由于官方政权的镇压在这一或那一时期遭受了苦难。

库洛和鲍鲁谢维奇现在特别积极。库洛最近这个月曾向格但斯克港格但斯克大学、工学院、医学院师生作过讲演。他的讲演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进行了政治抨击，有关苏联的讲话很谨

慎。据民警领导人讲，这些限于允许的范围之内，不给提供对他采取镇压措施的借口。鲍鲁谢维奇成为团结工会格但斯克组织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利用这一点把自己的拥护者推向领导岗位，提出解除不利于反对派的领导人的要求。最近他在造船厂、港口及许多其他企业团结工会大会上多次讲话。

团结工会、科尔科斯组织、青年波兰运动和保卫人权公民权运动 11 月 11 日在格但斯克组织群集会，可以说明反对派在扩大合法活动并争取更多的拥护者。根据波兰朋友的资料，波兰独立纪念日时有 2 万人参加了格但斯克马里亚茨克天主教堂的祈祷，而以后在格但斯克中心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有 1 万多人参加。瓦文萨及其他人的讲演，主要内容是团结工会的活动，解释医务工作者、教育文化工作者罢工的原因。但是，青年波兰运动的一个领导人舒德洛夫斯基特别强调波兰领土，要求规定 11 月 11 日为国庆节，说这一天的意义与苏联的 11 月 7 日一样。据波兰朋友说，舒德洛夫斯基曾想使自己的讲演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精神，但青年波兰运动积极分子加利等害怕招致当局采取镇压措施并失去合法活动的条件，警告加利说当前不准发表类似言论。所以舒德洛夫斯基在一小部分朋友中宣称，他们打算退出上述组织。由于十二月事件十周年即将到来，现在反对派和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正积极准备采取措施。他们准备召集 10 万人参加在列宁造船厂附近举行的纪念碑揭幕式。预计揭幕式以后，参加集会的人将沿格但斯克大街和索波特大街去格丁尼亚，因为那里也举行纪念碑和 1970 年 12 月牺牲烈士光荣榜的揭幕式。应当指出，近来又恢复了威胁格但斯克苏联总领事馆和苏联公民的电话，11 月 20 日总领事馆收到反苏的匿名信，信中建议苏联人在 1980 年 12 月 20 日以前滚蛋（附匿名信复印件）。

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中的波兰朋友在秘密谈话中提出，说反社会主义力量通过团结工会得到扩展活动渠道以后，在形势尖锐情况



下可能对总领事馆和其他苏联代表处进行挑衅。因此，鉴于国内形势，特别是格但斯克的形势，以及即将发生的事件，总领事馆要采取相应措施，提高苏联公民的政治警惕，保证苏联机构的安全。

苏联驻格但斯克总领事馆领事 B. 泽列诺夫

№11860

苏共中央关于为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  
中央机关增加编制的决议

(1980 年 12 月 2 日)

Исх. №190сс.

绝密

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问题

为了加强对波兰人民共和国发往苏联的出版物内容的检查，批准苏联部长会议保护出版物国家机密管理总局提出的关于为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中央机关增加 4 名懂波兰语人员（2 名编辑，2 名主要工作检查员）编制的建议。

交齐米亚宁，鲁萨科夫，扎米亚京等同志。请你们审理此建议。

苏斯洛夫（签字）

1980 年 12 月 10 日

请苏共中央书记们阅。

扎米亚京（签字）

佳热利尼科夫（签字）

萨温斯基（签字）

№11861

## 扎米亚京等关于采取补充措施监督波兰出版物 发行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0年12月5日)

绝密

分析波兰群众舆论工具的内容证明，他们所发表的大多数文章都带有反社会主义、反苏的性质。他们的活动不受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控制。

敌视我们的宣传中心，帝国主义列强的特工机关，首先是美国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等的行动都在证明，直接或者通过第三国寄往苏联的邮件，其中包括波兰的反苏材料的规模和数量都在扩大。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СТ-231/8с1980年10月4日）所规定的一些措施正在贯彻中。与此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实施，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部门的意见，还必须采取一些补充措施。

已得到苏联部长会议保护出版物国家机密管理总局（И.К. 罗曼诺夫同志）、苏联国家计委（B.E. 比留科夫同志）和苏联邮电部（B.A. 沙姆申同志）的赞同。

附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草案<sup>①</sup>。

苏共中央对外宣传部部长 Ⅱ. 扎米亚京（签字）

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E. 佳热利尼科夫（签字）

苏共中央机关部副部长 O. 拉赫马宁（签字）

1980 年 12 月 5 日

---

<sup>①</sup> 参见 №06099 文件。

№05994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的会议记录

(1980年12月11日)

绝密

仅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苏斯洛夫同志

参加人：安德罗波夫同志、格里申同志、基里连科同志、佩尔谢同志、吉洪诺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杰米契夫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卡皮托诺夫同志、多尔吉赫同志、齐米亚宁同志、鲁萨科夫同志。

1. 关于1980年12月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参加国领导人会议总结

苏斯洛夫：全体同志都读到了报刊上已发表的公报。应当指出，关于召开华沙条约参加国领导人的会议的决定是非常及时的。会上认真地交换了意见。各国代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第一书记做了严肃认真的发言。应当指出，卡尼亚同志的发言是有内容的。当然，在有些问题上可以说得更尖锐一些。但是，如果总的来看卡尼亚同志的发言，与他在本国政治局和全会上的发言相比，他的发言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尖锐的、正确的。最主要的是，波兰同志认识到波兰面临的巨大危险，他们认识到反社会主义份子活动的危害，这种活动是波兰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的巨大威胁。卡尼亚同志

现在较清醒地看待波兰的经济形势，欠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和给予的帮助。

应当指出，卡尼亚同志在发言中坚决反击了反社会主义分子并指出，今后对反社会主义分子不会再姑息、退却。同时他还指出，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人民、人民中的健康力量、武装力量和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国家安全机关和警察，能用自己的力量控制局势和恢复秩序。

在其余所有同志的发言中都建议波兰朋友如何行动，坚决反击反社会主义分子。比如胡萨克同志举了 1968 年不少实际例子，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不得不同右派分子进行顽强的斗争。卡达尔同志也谈到 1956 年反革命分子在匈牙利的进攻，当时他不得不采取行政措施镇压反革命。齐奥塞斯库同志主要谈了独立、主权、不干涉内政等。

大家兴致勃勃地倾听了勃列日涅夫立场鲜明的发言。他的发言是经过深思的，包括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对波兰同志全部必要的指示，正如波兰同志自己后来说的，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发言鼓舞了他们。其他党的领导人和代表也对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发言评价很高。

总之，我认为应当赞同华沙条约参加国领导人会议的总结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的工作。

安德罗波夫：这次会议是高水平的会议。当然，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发言是主要的，它定了整个会议的调子。

乌斯季诺夫：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发言阐明了所有的问题。每个人都清楚怎么办，波兰同志应如何行动。

葛罗米柯：我认为，无论波兰同志，还是其他与会同志都对这次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他们得到了关于与波兰形势有关的所有问题的指示。

政治局委员格里申、基里连科、佩尔谢，苏共中央书记鲁萨科

夫等同志也就这一问题发了言。

决议：赞同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华沙条约成员国领导人会议上所做的工作。

苏斯洛夫：我认为，我们应在报刊上公布赞同会议总结的决议。苏斯洛夫同志宣读了决议草案：赞同华沙条约成员国领导人会议的总结，以及以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会议上所做的工作。

全体：正确。同意。

苏斯洛夫：那么，就建议报刊明天发表这个决议。

## 2. 华沙条约参加国的国防部长委员会第13次会议总结：

苏斯洛夫：有关记录已经分发给政治局，是否有必要再听听乌斯季诺夫同志的？

乌斯季诺夫：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我再逐字地讲几句。

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国防部长委员会会议是在非常务实的气氛中进行的，军事问题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定是会议工作的基础。会议讨论了四个问题，即北大西洋公约基础组织的状况和必须继续完善华沙条约成员国在业务关系方面的工作；交流在军队和地方院校培养军事干部方面的经验；对于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的关于军队管理机械化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关于明年11—12月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委员会下一次会议的日程。对于所有问题的决议都一致地通过，委员会工作结束后，齐奥塞斯库同志接见了我们，会谈很平常，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苏斯洛夫：提议赞同。

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格里申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同意这个建议。

决议被通过。

№06099

## 苏共中央关于限制订阅波兰报刊的决议

(1980 年 12 月 22 日)

绝密

№СГ - 242 / 61гс

中央委员会记处第 242 号 61/гс 记录摘抄

### 关于有关监督波兰印刷出版物在苏联发行的一些补充措施。

1. 苏联部长会议保护出版物国家机密管理总局 (П.К. 罗曼诺夫同志):

应将停止零售和订阅的波兰定期刊物 (见附件 1)、图书和其他出版物, 提交各苏联机构并附上专门保管的规定制度;

应监督没有不良内容的波兰报纸和杂志发给零售商和订户 (见附件 2);

应保持现有办法: 从波兰人民共和国寄给苏联境内的波兰机构和公民的定期出版物和印刷品、邮件, 以及寄给各苏联机构和公民的科技参考书, 都免于检查; 从波兰人民共和国发给苏联机构和公民, 其中包括通过邮递发给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维尔纽斯、里加、基什尼奥夫、利沃夫和布列斯特等各机构的所有书信、邮件都要进行检查。

2.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保护出版物国家机密管理总局提出关于为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中央机关增加 4 名编制 (懂波兰语的 2 名编辑和 2 名主要检查员) 的建议。

3. 苏联邮电部 (B. A. 沙姆申同志):



应实行发送从波兰人民共和国寄往苏联各地邮件的新系统图，以便使全部书信邮件不间断地通过布列斯特发往莫斯科；

应重新预订 1981 年度的波兰出版物。

4. 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保护出版物国家机密管理总局（П.К. 罗曼诺夫同志）协同苏联国家计委（B.E. 比留科夫同志）和苏联邮电部（B.A. 沙姆申同志）在 6 个月之内制定和提交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各机关，特别是在第十一至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进一步完善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议。

5. 责成苏联邮电部和对外贸易部在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部门和苏联外交部协商之后，在近期就有关在苏联限制发行波兰出版物问题同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机关进行谈判。

6. 批准发给苏联驻波兰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指示文件（见附件 3）。

中央委员会书记

分发给：

从收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书记处 1976 年 6 月 17 日 пю. №12, п.4c）之日起，15 日后应返还苏共中央（总部，2 处）

附件 1

绝密

属 п.61rc, пр. 第 242 号

## 停止零售和订阅的波兰报纸和杂志目录

### 一、报纸

#### 1. 青年旗帜报

2. 劳动之声报
3. 人民日报
4. 波兰快报
5. 文化报
6. 政治报
7. 波兰农民大众报
8. 土地报
9. 农业工人报
10. 文化周刊
11. 民主周刊
12. 文艺生活报
13. 教师之声报

二、杂志

14. 计划
15. 最新消息
16. 现代农业
17. 农业经济问题
18. 电影
19. 文化与你
20. 文化与生活
21. 文艺月刊
22. 戏剧
23. 记事
24. 旋律
25. 我们的生活
26. 问题
27. 共同

- 28. 为了自由和理想
- 29. 展望
- 30. 影片
- 31. 高校生活

附件 2

绝密

属 п.61гс, пр. 第 242 号

应通过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检查的  
波兰报纸和杂志目录

一、报纸

- 1. 华沙生活报
- 2. 青年圣徒报
- 3. 人民论坛报
- 4. 自由战士报
- 5. 绅士报

二、杂志

- 6. 画报
- 7. 银幕
- 8. 人民文学
- 9. 权利与生活
- 10. 波兰（俄文版）
- 11. 波兰评论（俄文版）
- 12. 波兰科学
- 13. 新权利

14. 贵族与权利
15. 当代高等学校（俄文版）
16. 波兰科学院杂志（俄文版）
17. 历史公报
18. 历史评论
19. 展望
20. 友谊
21. 新道路
22. 党的生活
23. 劳动经济与组织
24. 经济学家
25. 波兰劳动
26. 波兰经济通报（俄文版）

### 附件 3

#### 给苏联驻波兰大使馆的指示

华沙

苏联大使馆

请拜访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并且通知：

“我们将采取一些措施限制在苏联发行某些波兰的定期出版物。应特别强调这种限制带有时间性”。

请电告执行情况。

№06042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的会议记录

(1981年1月22日)

绝密

工记录

(仅此一份)

主持人：米·安·苏斯洛夫同志

出席者：尤·弗·安德罗波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阿·雅·佩尔谢、尼·亚·吉洪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彼·尼·杰米契夫、瓦·瓦·库兹涅佐夫、米·亚·波诺马廖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弗·伊·多尔吉赫、米·瓦·齐米亚宁、康·维·鲁萨科夫同志

### 一、苏共二十六大问题

苏斯洛夫：中央书记处审议了涉及苏共二十六大的两个问题，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代表资格审查程序和发表召开二十六大的消息。这个问题的有关材料已发给了同志们。有什么意见吗？

表决：没有意见，通过。

苏斯洛夫：第二个问题关系到邀请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民族民主党和左派社会党代表团和代表参加二十六大的问题。

如你们所看到的，这里附有电文，这是准备发给苏联驻各国大使的，由他们转交给我们的朋友。看来这里也没有意见。

全体：没有意见。

通过决定。

……①

苏斯洛夫：我们不要指望民主德国的经验，但是一切有益的东西都可以吸收，这是正确的。

我认为应该表彰多尔吉赫同志，委托基里连科、多尔吉赫、阿尔希波夫、巴伊巴科夫、马丁诺夫、马尔丘克、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起草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就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将其提交给苏共中央。

全体：同意。

八、关于派遣由列·米·扎米亚京同志率领的苏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波兰的问题

扎米亚京：波兰目前正在进行党组织活动积极化的渐进过程。对党组织力量的信心正在增强。党已经经受了最初的考验，但是还没有达到这种考验的高潮。现在要谈的是所谓“非工作的星期六”和团结农会的问题。显而易见，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重要的是指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就这些问题与联合农民党已达成了谅解。波兰局势的复杂性在于：进行活动的不仅有应该坚决与之斗争的敌人，而且在于：党在过去的错误的压力下失去了与人民真正的创造性的联系。工人阶级有许多理由表示不满。这一点对于青年工人来说很典型，因为他们还没有经受过困难。“团结”工会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现在波兰劳动者提出了革新社会主义生活的口号，也就是在党和国家中回归到列宁主义准则上来。

至于“团结”工会，就其组成来说是很复杂的。顺便应该说一

---

① 所收集的档案文献此处缺 7 页。

下，这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目前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主要力量。据瓦文萨说，目前他的“团结”工会拥有1000万人。波兰统一工人党认为那里只有600万。反革命力量麇集在所谓保卫工人委员会里面。这就是库隆、米赫尼克、格维亚兹德、利斯、瓦伦蒂诺维奇——总共大约40人。“团结”工会现在实际上是一个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家公开为敌的政党。

此外，瓦文萨一伙之所以构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还因为有主教团作后盾。如果目前看看波兰的局势，那么就会发现其特点之一就是党的作用的积极性的提高及其具体行动的加强。这当然也导致了紧张性的加剧，因为反革命势力有自己的计划，他们想要窃取政权。可是看到波兰统一工人党对他们予以回击，使他们没有可能实现这些计划。

目前，波兰各部门工会，大约拥有650万人。朋友们有意把这些部门工会联合成为工会联合会，通过政治手段把“团结”工会嚣张的一翼的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准备使保卫工人委员会脱离“团结”工会。波兰统一工人党现在正在筹建第三个工会，即所谓自治工会。当然，这项工作也是在那样一些党组织和企业中进行的，在那里“团结”工会的活动很强大。波兰统一工人党正在积极工作，以求在群众中恢复信任。

至于青年，独立青年团包括了大约13%的青年。年轻人中间不断进行争论。这是高等学校不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结果。

至于大众信息工具，他们目前的状况不能满足当前的要求。党正在采取措施整顿秩序和控制局面，但这距离正常化还非常遥远。大多数报纸还没有处在党的监督之下。电视方面的状况尤其不好。意识形态上的侵蚀是党在群众中间教育工作削弱的结果，是在群众性信息工具中放弃这一工作的结果——波兰的状况就是如此。问题在于，例如电视和广播中虽然更换了领导，但是广大的基本工作人

员，也就是直接提供材料的那些人，却同情“团结”工会。国家处于经常不断的争论之中，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企业里，都是如此。群众性的信息工具里也进行这种争论，有时争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波兰模式、自由化、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生活中多元化问题，等等。

为了稳定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秩序，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我们认为，对党施加的顽强压力以及我们提供给朋友们的指示，不能不迫使他们积极地改进工作，其中也包括信息工具的工作。党如果忽视这些工具，使其完全脱离自己的监督，党就不能赢得对国内社会舆论施加影响的斗争，现在对这一点的注意有所加强。

我曾经跟卡尼亚同志进行过谈话。他谈了国内的情况。朋友们认为当前不应该急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我们的意见是当前不应该往波兰派出许多代表团，而应该派遣由高水平的同志组成的代表团，他们能够回答反映苏共中央的观点的问题。从总体来说，领导层加强了注意，认为在对敌斗争中必须表现出坚决果断，不过目前主要是在政治领域里。不能说领导层中没有统一，不能说这种统一已经破坏，在改变力量配置的初次试尝的良好影响下，全体都在工作。要求与前领导“清算”的浪潮已经低落下去。波兰朋友们让我们相信，他们有足够的决心与敌人斗争，已经没有退路了。卡尼亚同志请求向列·伊·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全体委员转达谢意，感谢苏联给予波兰的援助。必须指出，我国驻波兰大使阿里斯托夫同志进行了大量工作，向中央委员会提供了有关发生的事态的正确信息。

葛罗米柯：关于波兰的状况，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交换一下意见。当前须要采取某些必要的步骤。必须让我们的影响保持持续不断的进程。也许需要与波兰朋友们会见。在何处——这得考虑考虑。不能缩小来自“团结”工会方面的危险性。“团结”工会——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应该经常不断地向波兰领导人灌



输这个思想。他们对讨论的问题保密工作做得特别不好。凡是政治局讨论的事情，第二天就被居民的广大阶层知道了。虽然我们提出了建议，可是波兰朋友们却不愿意采取非常的措施，他们实际上完全没有这种观念。例如，他们决定收回被“团结”工会抢占的工会组织的用房，可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军事委员会书记却没有执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这项指示，没有收回这些用房。

扎米亚京：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两个省的军事委员会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安德罗波夫：今天收到华沙来电，说对扎米亚京同志的波兰之行反应很好。此行是有益的，代表团工作得很好。我认为我们应该委托鲁萨科夫和扎米亚京两位同志准备几点建议，以后可以在波兰问题委员会里进行审议。

鲁萨科夫：我们给了波兰朋友们很大的影响。应该说，列昂尼德·伊里奇几乎每周都跟卡尼亚就各种问题进行通话。我觉得，列昂尼德·伊里奇在通话中以很策略的形式涉及了所有的问题，同时让卡尼亚同志明白应该如何行动。应该让我们的各个机构——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选拔一批有代表性的人，可以经常跟他们一起研究和解决波兰问题。

基里连科：我觉得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目前还看不到真正的活跃。也许只是刚刚开始。

扎米亚京：我谈到波兰统一工人党内工作的活跃时，指的是党的组织下到基层去，在工人集体中的谈话，等等。

乌斯季诺夫：库利科夫同志不久以前去过波兰人民共和国。库利科夫同志的印象是这样的：波兰目前还没有发生重大的转变。我们应该经常不断地给波兰领导人施加压力，经常不断地给他们鼓劲。我们计划三月份在波兰举行军事演习。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地提高这次演习的规模，换句话说，也就是让他们明白我们的武装力

量已经做好准备。

苏斯洛夫：当然，首先应该把支持波兰领导实施其措施当作主要任务，同时也要施加必要的压力。我们现在通过扎米亚京同志之行已经严肃认真地让波兰朋友们懂得了应该如何对待群众性的信息工具。这是他们的最薄弱之处，在这方面应该帮助他们。也应该看看他们筹备党代表大会的情况，党章做哪些修改，提出哪些经济问题。的确，我们必须往波兰人民共和国派遣的只能是一些聪明的人。

通过决议：批准扎米亚京同志率领的代表团波兰之行。委托中央委员会有关部门、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考虑政治局会议上的意见，准备相应的建议，供波兰问题委员会讨论。

№11862

## 罗曼诺夫关于检查波兰出版物情况总结 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1年3月19日)

绝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保护出版物国家机密管理总局以通报的方式报告关于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0年10月4日（СТ-231/8с）和1980年12月22日（СТ-242/61гс）决议精神，检查波兰出版物的情况总结。

根据第242号（СТ-242/61гс）决议，有波兰人民共和国13种报纸和18种杂志，不能个人订购寄到苏联公民个人手中，也不能通过“苏联报刊发行总局”公开出售。管理总局通过公开邮政渠道收到这些出版物时，只能将其送到有权保管外国参考书限制使用的单位和机构。

正如上述有关决议所规定，波兰人民共和国的5种报纸和21种杂志可以在苏联公开发行，一旦发现其中有不良的政治内容，苏联报刊发行总局就全部或部分停止其销售，也不允许发给订户。更严格受限制的有：《华沙生活报》；杂志有《画报》、《银幕》、《展望》（见附录1）。

这种限制的理由是：在一些材料里否定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对波兰共产党人在国家发展中所取得的成果发表有

敌意的批评；怀疑波兰人民共和国社会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他等。

下面列举一些这样的例子。

今年 1 月 9 日的《华沙生活》报写道，波兰统一工人党“没有能力采取社会主义革新的措施，因为，该党滋生了一些官僚主义分子。如果波兰统一工人党真是工人的政党，那么它大概不会允许有这样的偏差。组织就能克服这些，也能团结一致”。该报于 1 月 21 日发表 Я. 普哈利斯基题为《善于成为领袖》的文章，其中说，“在波兰直到今天也没有实现 1956、1970、1976 年的口号。局势更为复杂的是，波兰人民的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地在恶化，而当前领导们的生活却愈来愈好。波兰统一工人党贯于讲空话和漂亮话，破坏了党的威信。现在的发号施令者已改换成较晚组成‘团结’的那些其他力量了。”

2 月 8 日出刊的《银幕》杂志确认说，“在波兰形成了一种革命形势，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这种革命形势却同习惯于原先政权体制的实际发生矛盾。所谓反革命的‘团结’势力只能是那些惧怕对所有体制进行历史革新的人。‘团结’势力，这是一种群众运动，其中很少有追求个人名利地位和原则性不强的机会主义分子，参加它的都是工人。而部门工会，都是行政当局的人。‘团结’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改变波兰当前政权体制的社会职能条件。‘团结’是预防社会主义变形的重要因素。”

在 1 月 16 日出刊的一期《展望》杂志上写道，“危机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政治体制造成的……在波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国民收入的分配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实际原因。不是劳动，而是领导结构中的状态成为非劳动收入和发财的根源……。派遣和由上级任命干部的制度，这是社会道德败坏的显而易见的源泉。”

破坏波兰统一工人党威信的形象还表现在1月29日《华沙生活》报发表Л. 克拉苏茨基写的题为《论对危机问题的分析》一文里。“今天的危机——在这篇文章中说——不只是由于70年代的的错误造成的，而首先是由于党的领导本身异化的本质所决定的……。头几年没有一项例行革新或者摆脱危机的规划里有克服异化现象的措施：党内生活，社会关系都没有开展真正的民主化，没有进行经济改革，没有采取措施反对保障统治阶层特权的企图……。没有充分估计这一问题的结果，就使得党沾染上多种毛病，其基础就是异化。主要的是党在思想上贫乏起来，因为在很多年内党受到猛烈冲击，目的在于硬性向全灌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研究党领导的异化问题，同修正主义具有同样重要意义。”2月22日发行的《银幕》周刊上女记者伊斯克尔克在这方面更是肆无忌惮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她写道：“在我们国内任何时候也都不像在人民波兰那样有那么多的老爷。情况不同了，这是一大群自封为王的人。但是，他们的影响对一些公民的自我感觉来说是极其有害的。对于国家利益和自己个人利益的认识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应该让那些老爷们失去任何支持。”

在号召创建“民族”模式社会主义的那些材料里，可以认清破坏波兰社会主义基础的人们的真面目。2月1日出版的一期《画报》。杂志就认为：“直到日前波兰现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并没有能够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华沙生活》报（1月31日）写道，“在波兰有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传统，是在许多世纪长期形成的。这些传统始终都存在于社会之中。但是，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原则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些原则发挥作用长达36年之久，同样也有了自己的传统。这些传统表面上多数带有1948~1954年斯大林时期的情调。就是因为如此直到目前诸如此类的概念，如‘统一行动’，‘政治纪律’，‘民主集中制’等同波兰政治传统的一些观念

不相吻合。”在 2 月 7~8 日的同一份报纸上发表的一些讨论波兰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文章中都肯定说，“波兰开辟了社会主义国家现代模式的新道路”。

在“批判”波兰统一工人党活动的浪潮中，不少情况抨击的是党的文化政策和部分书刊检查机关的活动。今年 2 月 15 日出版的《权利与生活》杂志写道：“在波兰的战后历史上首先是一些社会团体不仅处于文化衰落，而且还处于生物蜕化的边缘上。因此，宣传工作就应该为这种政策服务。在这方面得让书刊检查机关发挥一定的作用。由于这一点社会主义民主制原则就完全失去了作用”。根据人民波兰（1 月 23 日出版的一期）《展望》杂志的论点来看：“作家已丧失履行自己职业职责的权利，都在戳他们的脊梁骨，嘴巴被堵住，他们像犯人一样都被打上烙印，还侮辱他们……。一批作家的名字从官方生活中被勾掉。已达到如此的程度，可以说是党的路线的杰作。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支持的论题是，波兰作家协会显得像是一种同所有传统共处的民主行动纲领和一帮令人感到天真烂漫、幼稚无知的作家。”波兰记者协会华沙分会主席 Я. 卡拉宾斯基在 2 月 10 日的《华沙生活》报上的文章中写道：“在今天特别复杂的形势下应该提高信息情报工具的责任，当这种责任压到新闻记者身上的时候，而不是压到新闻书刊检查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上。因为，随着社会局势紧张程度的发展，新闻书刊检查单位的工作就处于成反比例的状态。”

波兰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出版机关特别注意天主教教堂的情况，“为了普遍的人道主义目的号召扩大党和天主教教堂之间合作行动纲领”。“在格但斯克港总圣堂面前，党和非党的差别就都消失了。人们又重新开始信仰宗教，在宗教里去寻找希望”。今年 2 月 2 日《华沙生活》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自己的工作中着手研究很多思想道德口号和与其同时出现的社会主义，其

中包括科学社会主义。遗憾的是，在现实的社会主义中鼓舞人心使人振奋的那些主题却被人们遗忘了”。

在检查寄给私人的一些邮件里，发现有一个名字叫做Г. 多莫罗瓦的人为纪念八月事件而写的打印装订成册的诗集。该诗集的标题就能反映其内容：《上帝啊！祝福“团结”》！，“正当既没有肉，又没有面包的时候”，“却要求公民去当选民”，“因为选举活动也能改善卫生条件，使人健康长寿”。在诗集的最后有一页是用打字机重打的传单：“今天的团结，就是昨天的胜利”。另一种情况就是邮件中有一些宗教内容的杂志，其中有几页纸，印有号召罢工和支持“团结”的字样。上述邮件就得全部没收。

从波兰还邮寄来很多宗教参考书（报纸、杂志、书籍），既有波兰语的，也有俄语的。目前，在检查的有3种用波兰语发行的宗教报纸和17种用波兰语出版的宗教杂志。已调查清楚，现主要居住在比亚韦斯托克（省会）的一些波兰公民以挂号邮件的形式定期寄给我国的一些个人的，主要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用俄语和乌克兰语出版的有宗教内容的一些图书。仅在今年1~2月份就没收了55本圣经，500本宗教历书《光线》，1100册有宗教宣传内容的图书和宣传册。

从波兰人民共和国寄来的，用波兰语出版的宗教图书只允许给宗教活动家和有权使用这类图书的单位，以及中央图书馆的专门藏书部门。

管理总局将对从波兰寄往苏联的邮件继续进行检查。

附件：参考资料 м6. №414cc. 第1份共2页。绝密。

苏联部长会议保护出版物中国国家机密管理总局局长

П.К. 罗曼诺夫

1981年3月19日

附件 1

исх. №216сс。

绝密

экз. №1.

关于对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报纸和杂志

(于 1980 年 10 月 23 日至 1981 年 3 月 1 日) 进行检查的参考资料

出版物名称	份数 (出售)	份数 (订阅)	寄来的期号的数量	完全禁止出售的期号数量	没有发给订户的期号数量	禁止出售但可以发给订户的期号数量	缩减出售份数的期号的数量
1	2	3	4	5	6	7	8

报 纸

1	2	3	4	5	6	7	8
人民论坛报	24513	8487	108	-	-	-	-
自由战士报	200	3815	105	-	-	-	-
华沙生活报	500	7552	109	28	28	2	1
青年圣徒报	800	2162	52	1	1	-	-
绅士报	-	122	18	-	1	-	-

杂 志

1	2	3	4	5	6	7	8
画报	3000	-	18	6	-	-	1
银幕	3000	-	14	10	-	-	-



续表

1	2	3	4	5	6	7	8
权利与生活	-	126	17	-	4	-	-
波兰(俄文版)	142477	87523	4	-	-	-	-
波兰评论(俄文版)	-	1203	17	-	-	-	-
波兰科学	-	23	3	-	-	-	-
新权利	-	35	2	-	-	-	-
贵族与权利	-	84	5	-	-	-	-
当代高校(俄文版)	-	2617	2	-	-	-	-
历史公报	-	50	2	-	-	-	-
展望	3000	3060	18	12	12	-	1
友谊	30000	2224	19	1	1	-	-
新道路	226	200	2	-	-	-	-
党的生活	50	47	5	1	1	-	-
劳动经济与组织	-	98	3	-	-	-	-
经济学家	-	154	4	-	-	-	-
波兰劳动	-	33	3	-	3	-	-
波兰经济通报(俄文版)	-	39	7	-	-	-	-

№06043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报告与 波兰代表会谈结果的会议记录

(1981 年 3 月 26 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康·乌·契尔年科

出席者：尤·弗·安德罗波夫、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尼·亚·吉洪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彼·尼·杰米契夫、瓦·瓦·库兹涅佐夫、米·亚·波诺马廖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弗·伊·多尔吉赫、米·瓦·齐米亚宁同志

### 一、关于加速农业机械制造企业的建设和改造的措施

契尔年科：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审议了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加速农业机械制造企业的建设和改造的报告。政治局委托戈尔巴乔夫、努里耶夫、巴伊巴科夫、迪姆希茨、马丁诺夫、叶热夫斯基、别利亚克、萨赫纽克和德米特里耶夫等同志准备相应的决议草案并且提交审议。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没有必要细谈。

应该说，农业机械制造作为工业的一个部门，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什么样的机械在我们的农田里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收成的好坏，最终决定着入库粮食的多少。

多尔吉赫：我只是想要提请注意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在我们

的决议里明确规定首要的建设任务是什么，如何表述。总之，也许就这个问题还应该再考虑考虑。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红旗。是否还须要并行地确定红旗。我们在制定关于全苏社会主义竞赛的决议时已经确定了。<sup>①</sup>

齐米亚宁：我认为没有必要就这个问题通过专门的决议。已经批准部长会议颁发奖金。被授予奖金的集体，在科技委员会里已经全面地审查了，因此遴选获奖的候选单位这一工作进行得很细致。

各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支持这个建议。

知照执行阿尔希波夫同志关于苏联部长会议颁发1980年度对农业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的开发和生产应用奖金的报告。

#### 五、关于与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会谈的结果

契尔年科：巴伊巴科夫、加尔布佐夫、阿尔希波夫和阿尔希莫夫等同志与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雅格尔斯基同志举行了会谈。波兰方面要求供应轻工业原料，补充供应石油、金属、纸浆和其他货物。建议同意1981年向波兰补充供应铬矿石、木板、石棉和其他材料以及一定数量的棉花和大麦。

阿尔希波夫：我们向波兰提供有限数量的原材料，因为再多一些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特别是在波兰对苏联原料进行加工问题，我们现在不能给以肯定答复。

至于波兰的经济状况，雅格尔斯基同志说，1981年的计划比过去的1980年度计划下降了20%。波兰的煤炭状况尤其糟糕。众所周知，他们的煤炭用于出口，是获取硬通货的手段。计划规定是1.8亿吨，可是在最好的条件下，他们只能开采1.7亿吨。肉类生产降低了25%，糖——下降了25%。本来应该收购150万吨，可是他们最大限度也只能收购95万吨。现在波兰提出了定量供应面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文献此处缺3页。

包和面粉的问题。

至于财政状况，波兰贷款的债务，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已达 230 亿美元，其中 90 亿是在相应国家担保下获得的。其余的贷款，波兰人都是从私人银行取得的。这种银行共有 400 家。现在，波兰朋友面临的事实是在国外购买大约价值 95 亿美元的货物。这一切都得用贷款支付。出口总共 85 亿美元。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拖延解决向波兰贷款问题。现在他们须要支出 15 亿美元。这主要是贷款的利息。他们向我们要 7 亿美元。我们当然拿不出这么大的数额。我们现在毫不拖延地向波兰发运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等。会谈时，波兰朋友询问他们得宣布缓期偿付贷款，还是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且向西方国家请求补充贷款。当然，不管哪种做法，都得向西方国家做出让步。这种让步却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在这些问题上，波兰人意见不一致。他们要求我们增加供应棉花和人造纤维。我们决定增加一定数量的棉花和人造纤维。

**葛罗米柯：**波兰同志们强调进口商品问题的尖锐性，因为他们没有钱支付这些商品。可是应该指出，他们没有认真对待苏联给他们供应原材料。认为这是个不值一提的小问题。实际上却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他们那里用的棉花完全是我们的，矿石完全是我们的，石油也是我们的。

**阿尔希波夫：**我们向波兰供应 1300 万吨石油，每吨 90 卢布。如果考虑到世界价格每吨 170 卢布，我们从波兰那里每吨损失 80 卢布。我们本来可以出售这批石油换取硬通货，卖得的钱将是一笔巨大数目。

**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基里连科、格里申**等同志也就这个问题发了言。

通过决议。

№06044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的会议记录

(1981年4月2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出席者：尤·弗·安德罗波夫、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尼·亚·吉洪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彼·尼·杰米契夫、瓦·瓦·库兹涅佐夫、米·谢·索洛缅采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弗·伊·多尔吉赫、康·维·鲁萨科夫同志

一、关于1981~1985年以及直到1990年国民经济中提高燃料动力资源利用率的基本方向和措施

勃列日涅夫：你们都记得，这个问题早在党的代表大会以前就由部长会议提出来了。政治局交通委员会也同时研究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商定应该把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力量联合起来，以便一起制定一个方案，协商一致以后提交给政治局。

如今这个方案提交上来。在国民经济中有效地利用燃料动力资源——这是党在发展国民经济中重要任务之一。这个方案由于从党的二十六大决议以及会上的报告中引申出来的论点和任务而得到丰富。

方案规定实行许多重要措施，旨在在工业、建筑、交通、农业

和公用住房中更合理和更节省地利用燃料、动力和热能……<sup>①</sup>

**乌斯季诺夫：**问题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同志们无须谈论，我认为建议是正确的。

**契尔年科：**这项决定解决了关于生产现代化坦克的重要问题，同时也能扩大车利雅宾斯克工厂生产拖拉机的能量，这也会在不小的程度上促进国防力量的加强。

决议草案通过。

四、关于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力量军事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例行的）会议

**勃列日涅夫：**国防部提出建议：1981 年 4 月下半月在索菲亚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力量军事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与这个建议同时，还提交了报刊、无线电和电视报道这次会议总结的方案。

如果同志们就这个问题没有意见，就算通过。

**乌斯季诺夫：**这是一次例行的会议，列昂尼德·伊里奇，我想这里不会产生什么问题。

决定通过。

五、关于波兰的局势问题

**勃列日涅夫：**我们为波兰的事件进一步发展而感到极大不安。最糟糕的是朋友们虽然听我们的建议时表示同意，但实践中却无所作为。反革命在全线展开进攻。

政治局委员都熟悉以前历次与波兰领导人谈话的内容。我简要地谈谈最近一次与卡尼亚在电话中的谈话，这是 3 月 30 日进行的。

卡尼亚报告了刚刚开过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的情况。他抱怨说，在全会上，他们挨了狠狠的批评。我这时对他说：“做得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文献此处缺 3 页。

正确。需要的不是单纯批评你们，而是在手里拿起大棒子。那时也许你们就会明白了。”这是我的原话。

卡尼亚同志承认他们做得太温和了，应该更坚决果断一些。

我对此回答他说：“我们劝说你们多少次了，应该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不能无尽无休地向‘团结’工会让步。你们一再强调和平途径，而不懂得，或者不希望懂得你们所奉行所谓‘和平途径’，可能会让你们流血的。因此，重要的是从全会的批评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朋友们防止了总罢工。可是付出了多大代价？代价是在反对派面前全面投降。卡尼亚本人在与大使的谈话中承认，新的妥协——这是一个重大错误。

当前许多情况取决于最近几天事态的进展。特别是朋友们能否通过议会实施与我们商定的措施？今天得到通报，说议会开会的日期从4月2日推迟到6日。这些措施能否全面实施？是否有决心和力量在实践中贯彻这些措施？

我们当然要继续做朋友们的工作，寻求改善波兰局势的新途径。

我想特别值得满足朋友们的希望，批准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二同志前去布列斯特与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会晤。这有可能更细致地分析国内的局势，评价朋友们的打算和再一次阐述我们的立场。

我们还有一项措施备用，就是就波兰问题再一次举行高层次的七人会晤。

我们有波兰问题委员会。委员会的同志密切关注这个国家的事件，或许希望发表意见？

安德罗波夫：列昂尼德·伊里奇在波兰问题上就下一个步骤提出了建议并对那里的局势做出了评价，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的

确，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尽量发挥最大的影响，对朋友们的领导施加压力。我认为建议我和乌斯季诺夫同志前去会晤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是正确的。我们根据在政治局交换的意见和政治局以前通过的决议，以及列昂尼德·伊里奇与卡尼亚的通话，可以进行必要的工作，向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说出我们的主张、建议、劝告等等。

**乌斯季诺夫：**我觉得看来我们的确须要与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会晤，尤其是卡尼亚同志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都要求进行这次会晤。我们必须按照列昂尼德·伊里奇与卡尼亚通话的精神说出我们的一切主张，给他们提出建议。

列昂尼德·伊里奇在自己的建议里说得很正确，得把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七人会晤当成备用措施，而现在必须采取一切措施让波兰朋友独立地行动。

**葛罗米柯：**请允许我简短地通报一下我们从外交部系统得到的情报。有关波兰的情报很多。但是应该说，美国、联邦德国和其他国家都在密切地关注着波兰的局势，大大歪曲事情的真相。当然，美国以及西方关于波兰局势的信息都是有倾向性的。他们把“团结”工会和波兰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描绘成要求“团结”，把波兰的领导描绘成无力解决内部问题。与此同时，还针对苏联用警告我们的口吻大做文章，说苏联不应该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干涉波兰的事务。但事情很清楚，资产阶级的宣传总是站在与苏联为敌的立场上，如我说过的，现在提供的信息也是有倾向性的。

我想要说，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情况不太好。甚至有迹象表明，雅鲁泽尔斯基完全垂头丧气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当然非常不好。波兰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与“团结”工会谈判中变卦了——这非常不好。甚至波兰领导人自己也说最近与“团结”工会的协议是波兰领导的错误。



至于对“团结”农会的态度，它实际上是合法化的。如果把这个问题交给议会的委员会审查，——议会的首脑希潘斯基是个无党派的活动家——那么可以说，决定当然会有利于“团结”农会。怎样评价中央全会以后波兰的局势呢？我认为，如果我们说没有发生丝毫改善，那不会错。相反，进一步恶化了，因为领导后退了。可是正如列昂尼德·伊里奇所说的，卡尼亚提出一个问题，让我们的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同志到布列斯特去跟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交换意见。我认为应该接受这一点，况且这会提供可能性，让我们在面谈中向波兰朋友说出一切。我认为这次会晤是一个中间阶梯，应该充分利用它。如果他们准备部分动用所说的非常手段，那么就得问问他们：军队、内务部和国家安全机关是否会站在他们一边。我认为应该从我们军事力量方面做一深刻的分析：波兰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情况如何，军队是否是基本力量，可否依靠它？

苏共中央政治局对于波兰各种力量的配置应该有个清晰的认识。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波兰统帅部宣称，军队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果真是这样吗？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准备向波兰同志说出采取更坚决果断的措施的必要性，我把它称作非常措施，这是为了稳定秩序所必须的。继续回避这些措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继续回避已经完全不行了。

**乌斯季诺夫：**军队方面的情况如下。今天20点，军队的领导与库利科夫、克留奇科夫以及其他一些我们的同志一起集会。至于波兰的军队，如雅鲁泽尔斯基同志所说的，它准备履行自己的义务。可是如果坦率地说，我们必须心中有数，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考虑到比得哥什的冲突，未必走上对抗的道路。这次冲突的结果表明，只要碰一碰“团结”工会的两个人，全国就会立刻起来抗拒，也就是说“团结”工会能够迅速地动员自己的力量。当然，现在还存在着某种希望，军队、安全机关和警察会采取统一阵线，可

是越往前就越坏。我认为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害怕这一点，那么当然就得一个接着一个地交出阵地。而社会主义的一切成就也就会丧失殆尽。

我也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某些经济性质的措施。目前波兰朋友们怎么看？我们帮助他们，我们从自己手里和我们朋友手里夺过来，提供给波兰，可是波兰人民并不知道这一点。任何一个波兰人都不是清楚地知道，波兰的石油、棉花等等完全是从我们这里得到的。的确，如果很好地算算这笔账，看看苏联给了波兰人什么样的援助，如果通过电视、无线电、报刊讲讲这种援助，那么我想波兰人民就会明白他们从谁那里得到了最基本的经济援助。可是，没有一位波兰领导人在工人中间讲过这种援助。

至于波兰领导人，我认为难于回答他们中间谁更好一些。从前我们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是一位坚定的活动家，可是实际上他很软弱。

**勃列日涅夫：**也正是因此我们才必须弄清一切：他们政治局里的状况，什么人有什么特点。

**安德罗波夫：**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同意您对关于波兰局势所做的分析。的确，“团结”工会现在开始把阵地一个接一个地夺到自己的手中。假如召开非常的代表大会，那么不排除它将完全落在“团结”工会的代表的手中，到那时，他们将不经流血而把政权夺取到自己的手中。我们确实须要在列昂尼德·伊里奇在这里说的单独会晤中再一次告诉波兰领导人要采取严厉措施，不要害怕这会引出什么后果，也许会引起流血。他们本来应该采取严厉的措施，可是却塞给我们所谓“政治解决”。我们告诉他们要采取军事、行政、法律措施，可是他们总是局限于政治措施。

然而，我们必须严肃地把问题摆在波兰同志面前，要他们逼迫“团结”工会对波兰的事态负责。可是现在情况怎样呢？经济混乱，

一团糟，食品和其他物品供应匮乏，这本来是由于“团结”工会的过错造成的，是罢工引起的，可是政府却要对此负责。结果形成一种非常荒唐的情况。政治局委员中间，波兰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向工人们说明：造成经济匮乏和崩溃的罪魁祸首，首先是“团结”工会的首领们。卡尼亚同志在政治局里应该考虑联合一批坚定的政治局委员，依靠他们。

**勃列日涅夫：**必须告诉他们，实施军事状态意味着什么，一切都要讲清楚。

**安德罗波夫：**对，必须讲，实施军事状态——这意味着确定警备时间，限制城市街道上的通行，加强对国家机关、党务机关、企业的保卫，等等。雅鲁泽尔斯基在“团结”工会首领们压力的影响下变得完全萎靡不振了，而卡尼亚近来越来越凶地酗酒。这是非常悲哀的现象。我想我们跟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时的论据是充分的。显然，也应该听听他们。

与此同时，我想要说，波兰的事件对我国西部地区的事态也有所影响。特别是在白俄罗斯许多乡村能够很清晰地收听波兰语无线电广播和收看电视。同时还应该说，其他一些地区，特别是在格鲁吉亚，我们这里也发生了自发的示威，一批吵吵闹闹的人在马路上集会，如第比利斯不久前就发生了这种事，呼喊反苏口号，等等。在这里我们也应该在内部采取严厉的措施。

**乌斯季诺夫：**至于军队，他们那里情况有些恶化。问题在于他们用新征入伍的新兵取代了老兵，而新兵中大多数同情“团结”工会，这样一来，军队变得软弱无力了。我们认为应该在波兰军队中保留老兵，不要裁员。可是波兰人不愿意这样。显然，我们不得不跟他们谈谈这一点。

**格里申：**我认为列昂尼德·伊里奇提出的建议完全正确，应该通过。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同志应该到布列斯特去。

乌斯季诺夫：会晤可能是在边境线上——不是在我们的一边，就是在波兰的一边，这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里最有战斗力的工作人员是奥尔绍夫斯基、格拉勃斯基、巴尔奇科夫斯基同志，可是他们不受重视。

安德罗波夫：我认为暂时不要扩大会晤参加者的范围，而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局限于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两位同志。

勃列日涅夫：何时可以通报我们的这项决定？

安德罗波夫：我认为今天就应该通报。

勃列日涅夫：好。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建议算是通过了。

全体：是的。

通过决定：

（1）批准列·伊·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波兰局势所发表的  
的建议。

（2）知照执行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关于波兰局势和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系统与波兰局势相关而采取的措施的报告。

（3）同意波兰同志的请求，组织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在布列斯特与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同志的会晤。

№06045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与 波兰代表团会晤情况总结的会议记录

(1981年4月9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康·乌·契尔年科同志

出席者：尤·弗·安德罗波夫、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米·安·苏斯洛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彼·尼·杰米契夫、瓦·瓦·库兹涅佐夫、米·谢·索洛缅采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弗·伊·多尔吉赫、米·瓦·齐米亚宁同志

一、关于苏共中央 1981 年五一节的口号草稿

契尔年科：对苏共中央的口号草稿，我们在最近一次书记处的会议上已经讨论过了。书记处对口号做了某些修改，使之更准确了。如果同志们还有什么补充修改，可以转告齐米亚宁同志，他将对口号草稿做最后的校订。

安德罗波夫：口号很好，可以通过。

格里申：是的，如果谁有意见，可以发表。

乌斯季诺夫：我有几点小意见，过后告诉齐米亚宁同志。

葛罗米柯：我也对其中一个口号有一点小意见。

通过决定。

## 二、关于举行五一节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游行

**契尔年科：**格里申同志提议为了庆祝五一节，在莫斯科市举行劳动者代表游行并对城市进行艺术政治的装饰。游行打算在 10 点钟开始，11 点 30 分结束。有 12 万 8 千人参加。红场、莫斯科的主要街道和广场装饰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装饰中也要反映出符合苏共二十六大决议的主题。我认为可以同意格里申同志的提议。

## 三、关于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与波兰朋友会晤的总结

**契尔年科：**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同志与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举行了会晤。让我们听听这两位同志。

**安德罗波夫：**我和乌斯季诺夫根据与波兰同志商定的意见到了布列斯特，我们的会晤是在那里，在布列斯特附近，在火车车厢里进行的。会晤开始于晚上 9 点，夜里 3 点结束，考虑到不让波兰同志暴露自己，不让人发现他们外出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注意听波兰同志讲，并且提出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商定相应的说明。我们与波兰同志会晤总的印象是这样的：他们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焦虑不安，看得出他们精神沮丧。卡尼亚同志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感到做工作非常艰难，“团结”工会和反革命势力对他们步步进逼。可是，他们宣称，苏共二十六大以后，波兰的情况走上稳定的道路。卡尼亚说，他们在大多数基层党组织举行了总结选举会议，值得指出，没有一个属于“团结”工会的人进入候选人名单，也就是说，党的代表大会的候选人都是我们的人。后来卡尼亚同志不得不说，后来的事件，特别是警告性罢工，比得哥什的事件表明，反革命比我们强大。他们害怕警告性罢工，更害怕总罢工，为了防止总罢工，已经做了一切。

卡尼亚同志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什么。首先是恢复人民对党的信任，安排好经济生活，消灭企业里的罢工和停工。当然，

波兰的同志们没有跟这些消极现象斗争的经验，因此他们现在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至于调动军队，他们直言不讳地说，这完全不可能，实施军事状态也是不可能的。他们说，他们不会被理解，他们将没有力量做工作。这两位同志在谈话中强调，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整顿秩序。估计他们目前正在筹备的党的四大不会让“团结”工会的候选人当选为大会的代表。党组织为代表大会推选的代表都是优秀工人。

卡尼亚同志在谈话中也指出，波兰人民对真实的报道非常敏感。譬如说，他们宣布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后来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不得不把代表大会推迟，后来又说代表大会将如期举行。召开代表大会日期上的出尔反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的局势，即对党的信任更加动摇了。我们也坚决地对波兰同志说，敌人向你们进攻，他们占有优势，你们则退却，失去了时机。本来在1980年9月可以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可是你们却什么都没有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既没有采取政治性措施，更没有采取行政措施。我们特别强调，不能把军事行政性质的措施跟政治性的措施对立起来。要把一切都明智地结合起来。

至于军事状态，本来早就可能实施。实施军事状态意味着什么？它有助于摧毁反革命分子、各种闹事分子的进攻，一劳永逸地结束罢工，结束经济生活的无政府状态。关于实施军事状态的文件草稿，已经在我们的同志帮助下准备好了，需要的是签署这些文件。波兰同志说：这些文件得通过议会，等等，我们怎么能签署。我们说，根本不必通过议会，当你们实施军事状态时，这些文件是你们作为行动的依据，而现在，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你们必须签署，以便让我们知道你们同意这些文件，并且知道实施军事状态时该怎么办。如果不得不实施军事状态，到那时已经没有时间研究实施军事状态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应该事先全都准备就绪。谈

的就是这个。

经过我们的解释，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说，他们将在 4 月 11 日研究这个文件，并且签署。

接着我们问雅鲁泽尔斯基同志在议会上的讲话包括哪些内容。雅鲁泽尔斯基讲了很多，但模糊不清。他解释说，他要谈到禁止罢工两个月。我们问道，两个月是什么意思？两个月过去之后将会如何？两个月很快就过去，然后又开始罢工。你们向工人们许诺太多，可是后来并不兑现，从而给对政府，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不信任提供了土壤。

目前摆着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实施广泛的政治措施。举个例子来说吧，你们有粮食和其他食品匮乏，怎样来解释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连续不断的罢工使整个经济崩溃了，所以也就没有。每一次罢工造成的损失是千百亿兹罗提，可是工人却不知道这一点，而把一切都归罪于政府，于是政府、党中央、政治局便成了罪魁祸首，而罢工的煽动者、组织者却站在一旁；你们瞧，他们反倒成了工人利益的捍卫者。我们说，如果就其实质进行分析，造成所有的经济困难的罪魁祸首应该是“团结”工会和罢工的组织者。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不能让工人明白这个道理呢？

你们那里大谈特谈建立拯救波兰民族阵线。许多区里都有这种言论。打算让一些革命运动老战士、军事长官，例如像罗利亚·日梅尔斯基等人，参加这个拯救波兰民族阵线。也可以让它注册。或者再譬如，现在在联邦德国大谈特谈西里西亚和格但斯克，作为划归给波兰的领土，应该归还给联邦德国。为什么不利用这个问题作文章呢？我认为，可以围绕这些问题把人民团结起来。应该唤起人民。

我们说，我们并不反对建立拯救波兰民族阵线。但是这个阵线



不应该取代党和政府。

为党的团结，为民族的统一而斗争的问题很重要。关于党的统一，已经谈了很多。我们愿意再次提醒你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团结全党和建立民族的统一。采取哪些措施，你们自己更清楚。可是有许多问题，我们已经向你们列举了，围绕这些问题能够让民族团结起来，造成党的统一。波兰同志谈到想要吸收三名工人参加政治局。他们援引了列宁，说列宁曾经提议让工人进入政治局。我们说，我们那里没曾有过让工人进入政治局这种事情。不过，如果你们现在的确有这种需要，那么也可以吸收工人参加政治局，但不一定是三个，也可能是一个。可以补选一定数量的工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说，这都是促进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措施。譬如你们说要吸收工人参加人民监督机构。这项措施不错，当然可以实施。能够促进党的统一的，也还有其他一些措施，派一些水平高的、经过培训的同志到党的会议上去讲话。我们举了自己的例子，我们直到政治局委员，都在工人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们同意了这些建议。

接着我们说，你们不要让自己承担庞大的纲领，而要承担不大不小的纲领，但要实现它。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应该到大型企业去发表讲话。譬如说卡尼亚同志现在到格但斯克去。而且不仅仅卡尼亚同志去，雅鲁泽尔斯基同志和其他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则到别的城市去，到工人中间去发表讲话，也就是说应该反对有组织的“团结”工会，表现出自己的团结。“团结”工会因为什么而有力量？它因为进行蛊惑宣传而有力量。它蛊惑煽动工人，许诺他们提高工资，你们瞧，他们达到了目的。你们逮捕几个工人或者“团结”工会的活动家，他们宣布罢工，向工人进行许诺。他们靠着这种办法达到了对工人的维护，也取得了自己的威信。我们直截了当地对卡尼亚说，你们每天都在退却，不断地退却，可是必须行动，必须采取军事措施，采取非常措施。

现在突出的问题是议会。“团结”工会做什么呢？它现在对每个议员进行工作。它建议工人议员在议会发言，内容非常具体，旨在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粉碎“团结”工会的这些计划。譬如说，为什么不让议会的全体代表都支持政治局委员，说他们对这些议员负责，让他在会前做好充分准备。你瞧，事情到了什么地步。例如一个工人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的代表，他接到一份电报，让他在全会上按照给他的指示发言。这个工人在全会上迟迟不发言，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发言。他又接到一份这样内容的电报：“我们为什么没有听到您的发言”。这个工人还是没有发言，全会结束了，他又接到一份电报：“您不必回来了”。你们瞧瞧，“团结”工会在这里对这个工人进行威胁和恫吓。“团结”工会就是这样活动的。

关于政治局的靠山。政治局可以依靠谁。他们的军队有 40 万人，内务部有 10 万人，还有 30 万后备人员，加在一起总共有 80 万人。卡尼亚说，目前紧张性有所缓和，他们得以防止总罢工。可是这种安定能持续多久，很难说。

我们会晤以后，他们要做些什么？应该说，能做一些事。譬如卡尼亚到格但斯克去。雅鲁泽尔斯基同志修改自己在议会上的发言稿。可是应该说，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之间在个别问题的观点上存在着一些分歧。雅鲁泽尔斯基再一次表示要求解除他的总理职务。我们通俗地向他讲解了他必须留在这个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他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强调，敌人在准备力量以便夺取政权。

另一方面，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奥尔绍夫斯基、格拉勃斯基持有比较好的立场，比领导人更坚定。应该做他们的工作。特别是他们提议组织一个地下政治局并且开展工作。他们原来是在日夫科夫同志建议下产生这个想法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可是他们说，日夫科夫同志给他们提了这样的建议。我们也应该由此做出一

个结论：如果各兄弟党的领导人都给波兰同志出这类主意，那么我们当然不会因此赢得什么，而只能输掉。

苏斯洛夫：也许我们应该为兄弟党准备通报。

葛罗米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指望举行会晤。

安德罗波夫：完全不能谈到会晤。

乌斯季诺夫：尤·弗·安德罗波夫一切讲得都很好，因此我只想简要地说以下几点。首先，最显眼的是我们的交谈者那种压抑的精神状态。可是我觉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保留这两个人——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并且巩固他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他们那里以及政治局里存在着分歧。他们当然首先被罢工所震惊，他们非常害怕罢工。我们问道，你们为什么改变了对待比得哥什的态度。大家都知道，他们在比得哥什冲突中本来不想退让，可是后来却让步了。他们让我们相信，他们受到总罢工的威胁。接着我们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工人罢工期间还给他们发工资。他们说，“团结”工会要求这样。我们对他们回答道，这样一来，你们就得迎合“团结”工会。在“团结”农会问题上，他们没有通过决定，可是事实上已经承认了这个组织的存在。

我和尤里·弗拉季米罗维奇强调了政治局内部统一的必要性的问题。如他们所说的，吸收三个工人参加政治局，没有必要。这不会巩固政治局。至于中央委员会，可以吸收工人。但是得以通常的正规的程序，按照党章要求那样做。我们告诉波兰朋友，特别须要认真地做议会代表们的工作。接着，他们举行所谓电话会议。这实际上是公开的电话通话。所说的一切，立刻被大量的人所知道，其中也包括“团结”工会的活动者。这算是什么方法，举行这种会议。我们举了例子：我们那里，列昂尼德·伊里奇经常跟州委、区委、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书记们谈话，可是与每个人谈得都十分具体，只适合该地区的情况。

为了消除他们在实施非常状态或军事状态上的畏惧，我们举例子说，许多国家只要发生叛乱或者开始出现某种混乱，就实施非常状态或者军事状态。就拿南斯拉夫来说吧，科索沃出现了示威，他们就实施了军事状态，没有一个人对此说三道四。为什么波兰人如此害怕实施非常状态，我们无法理解。

关于实施非常状态的计划，尤里·弗拉季米罗维奇谈得很详细。我们说，必须签署我们同志起草的计划。

接着，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就像我们在政治局商定的那样，如果波兰出现了麻烦，它将陷入什么样的经济状况，是很难想象的。现在波兰的全部石油都是从苏联得到的，几乎是只花一半的价钱。它也得到棉花、铁矿石和许多别的货物。而它一旦得不到这些，那将如何。为什么不讲清这样的事实，让工人明白。这是强大的武器。必须向工人讲清楚，也要向“团结”工会讲清楚。现在“团结”工会在最大的企业里已经建立了阵地。必须把这些企业从“团结”工会手里夺过来。你们有很好的工厂，那里的工人拥护领导。譬如生产电视机的工厂。你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支持部门工会，积极地做他们的工作。雅鲁泽尔斯基后来再一次单独对我一个人说，他不能工作，没有力量，恳切要求解除他的职务。

齐米亚宁：我们在保加利亚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时与格拉勃斯基进行了会晤。

这次谈话已经分发了，同志们已经了解。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政治局里的状况的确非常艰难，没有统一。尤里·弗拉季米罗维奇和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讲得很正确，必须为加强政治局的统一而工作。

决定：

(1) 赞成尤·弗·安德罗波夫和德·费·乌斯季诺夫同志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同志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进行的谈话。

(2) 委托中央政治局波兰问题委员会密切关注波兰人民共和国局势的发展，根据需要准备好相应的建议。

四、关于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的谈话总结

契尔年科：4月3日，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克里姆林宫与根舍进行了谈话；此外，4月2日和3日，葛罗米柯同志又和根舍进行了谈话。

葛罗米柯：我在书面报告中全都阐述了。

契尔年科：建议批准葛罗米柯同志与根舍进行的谈话。

全体：同意。

通过决定。

五、关于苏共代表团参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契尔年科：我今天就这个问题与谢尔比茨基同志进行了谈话。他说，我们在电报中把大会的进程都向中央做了汇报，没有必要补充了。因此他请求把这个问题列入政治局会议议程。齐米亚宁同志可以做些补充。

齐米亚宁：如我们在密码电报中所报告的那样，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是在高水平上进行的。分了五个小组。在大会和小组会上大约有200人发言。如果谈到报告，应该指出，意识形态问题阐述得不透彻。他们提出每个州供应自己的食品的问题。这听起来也不够令人信服。柳德米拉·日夫科娃的行为引起了注意。她的行为不够得体，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而托多尔·日夫科夫却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女儿。众所周知，他们提高许多商品的价格。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日夫科夫同志与我们谈话时说，给的补贴……<sup>①</sup>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文献以下缺页。

№06046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与 卡尼亚电话交谈情况的会议记录

(1981 年 4 月 16 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出席者：尤·弗·安德罗波夫、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尼·亚·吉洪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彼·尼·杰米契夫、瓦·瓦·库兹涅佐夫、米·谢·索洛缅采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康·维·鲁萨科夫同志

一、关于苏共代表团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勃列日涅夫：4 月 10 日同志们在飞机场迎接我时，我已经简要地讲了捷共十六大的情况。我们在 4 月 9 日与捷共领导谈话的记录也分发了。我现在补充几点。

总体来说，代表大会、它的组织工作、政治水平、代表们的积极性都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如我已经说过的，有三个主要特点像红线一样贯穿代表大会的整个工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对与苏联友好的热衷和为提高生产效率而斗争。

关于与苏联的友谊，关于应用苏联的经验，不只是说一些泛泛

的空话，而是很具体，很直观，联系到许多实际的事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州委书记、企业经理、工人、农业合作社社员都谈到了这一点。每一次，代表们都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尽管捷克人相当拘谨，如果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总体上来说，鼓掌和热烈欢呼并不很多。）

……<sup>①</sup>

(2) 批准由列·伊·勃列日涅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与捷共领导进行的谈话。

(3) 委托苏共中央书记处和苏联部长会议认真研究胡萨克同志在代表大会报告中和高层次讨论经互会成员国经济合作问题谈话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以及筹备和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新的国际会议问题。就这些问题向苏共中央提交相应的决定。

二、关于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与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C. 卡尼亚同志的谈话（通过电话）

勃列日涅夫：我昨天通过电话与卡尼亚进行了谈话。谈话记录已经分发。同志们看来已经知悉。因此我将很简短。

从跟卡尼亚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朋友们在议会开会之后精神有些振奋起来。他们出现了更多的自信心。这本身并不坏。

可是不能不看到，情况仍然像以前一样极其困难，目前的平静明显带有暂时的性质。如你们所看到的，我也就是用这种精神与卡尼亚谈话的。

当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对待朋友们要坚持正确的调子。一方面，没有必要就不应该打搅他们，不应该刺激他们的神经，让他们无所措手足。而另一方面，要经常不断地施加压力，用很策略的形式提醒他们注意他们政策中的失误和缺点，同志式地商量该怎么

---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文献此处缺2页。

办。

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两位同志与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进行了有益的会晤。这种实践看来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危机的尖锐性和缓下来。也许可以考虑不久的将来再进行一次这类的秘密会晤，由苏斯洛夫、鲁萨科夫等同志参加。

与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同时，还要继续准备更广泛的，可以说，战略上的分析，这种分析不能脱离当前的事件，对波兰局势的发展以及围绕着它较为长远的前景做出评价。

最后一点。我想要征求一下同志们的意见——是否应该把这次谈话的情况通报给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他们都对波兰的局势感到不安，了解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既然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这样做。

安德罗波夫：谈话内容非常丰富。

契尔年科：这次谈话给了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中的一些同志明确而准确的指示。此外，列昂尼德·伊里奇还肯定了他们的某些措施。这非常好。

乌斯季诺夫：波兰朋友们得到详尽无遗的指示。

吉洪诺夫：现在重要的是他们正确地贯彻这些指示。

勃列日涅夫：我认为，看来我们得把这次与波兰领导人的谈话通报给各兄弟党的领导人。

政治局的委员们支持这项提议。

通过决定：

(1) 批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通过电话与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 C. 卡尼亚的谈话。

(2) 考虑到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意见，认为把谈话的内容通报给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是适宜的。

(3) 责成中央有关部门准备就这个问题的通报稿。



三、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吉洪诺夫同志访问奥地利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吉洪诺夫同志向政治局详尽地报告了在奥地利进行会谈的进程和总结。<sup>①</sup>

---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文献以下缺页。

№06047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共与波兰 统一工人党会谈情况的会议记录

(1981 年 4 月 30 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出席者：尤·弗·安德罗波夫、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米·安·苏斯洛夫、尼·亚·吉洪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彼·尼·杰米契夫、瓦·瓦·库兹涅佐夫、米·亚·波诺马廖夫、米·谢·索洛缅采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弗·伊·多尔吉赫、米·瓦·齐米亚宁、康·维·鲁萨科夫同志

### 一、关于与利比亚革命首脑卡扎菲会谈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与卡扎菲会谈的记录已经分发，看来同志们都了解双方所说的内容。

我们在会谈中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苏联在国际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立场，向卡扎菲解释苏共二十六次上提出的积极的对外政策，支持利比亚政策中积极的方面。

卡扎菲从自己方面阐明了对世界局势的评价、利比亚政策的基本原则。他明确地宣布：利比亚过去和未来都奉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在此基础上努力团结阿拉伯东方和非洲各进步国家。

卡扎菲特别重视与苏联进行广泛而密切的合作，用他的话说，苏联应该把利比亚看成是自己的“战略盟友”。

与此同时，卡扎菲的议论证明，他还没有根除左倾的过激情绪。特别是他……<sup>①</sup>

……如果杰卢德同志到莫斯科来，带来准备好的草案和具体建议。他对访问，对与列·伊·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反映非常好，对接见他表示感谢。

格里申：会谈进行得非常好。

葛罗米柯：可以说与卡扎菲的会谈是非常有益的，况且他为人相当喜怒无常，须要向他解释一些入门的东西。

苏斯洛夫、契尔年科、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波诺马廖夫等同志也就这个问题发了言。通过决定：

(1) 批准勃列日涅夫、吉洪诺夫、葛罗米柯和波诺马廖夫等同志与卡扎菲的会谈。

(2) 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外交部、国防部、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中央国际部吸收相关的部委研究利比亚方面提出的要求，并为中央准备好相应的建议。

## 二、关于苏共中央代表团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会谈

勃列日涅夫：如大家所知道的，根据我们的决定，苏斯洛夫、鲁萨科夫同志前几天出使了华沙。代表团还包括苏联驻波兰大使阿里斯托夫同志。

根据中央的委托，苏共代表团进行了座谈。波兰方面有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书记处成员参加。

我认为从同志们的汇报中自然而然地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正当波兰同志筹备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的时候，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文献此处缺2页。

派出这样一个代表团赴华沙是正确的。

我想，我们将来也不该排除这种可能性，即政治局派出个别委员或者政治局委员小组，或者像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不是在华沙，也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别的某个地方会晤。

现在请苏斯洛夫同志讲话，他要汇报与波兰同志会谈的总结。

**苏斯洛夫：**我们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会谈表明，政治局决定派遣我们代表团赴波兰是非常有益的和及时的。列·伊·勃列日涅夫与卡尼亚的通话以及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与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在布列斯特会晤时的谈话，在一定程度上、在稳定波兰的局势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我们从自己方面激烈地批评了波兰领导对待“团结”工会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方面的行动，他们在这种事情上的不坚决果断，缓和局势和在主要问题上不聚精会神的企图。对待所谓“横向结构”也发表了批评意见。特别强调了与“团结”工会及与保护工人委员会领导的右翼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这些人实际上想要把“团结”工会变成一个政党。

**安德罗波夫：**波兰朋友，特别是卡尼亚同志支持“横向结构”。大家都知道，这会导致党的瓦解。

**苏斯洛夫：**毫无疑问，“横向结构”会给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组织带来严重不和，完全背离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参加这些座谈的有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政治局委员以及格但斯克和卡托维茨省委书记。他们一致感谢苏共中央，尤其是列·伊·勃列日涅夫经常不断的关怀和帮助。

**勃列日涅夫：**我觉得他们现在正在举行全会。

**苏斯洛夫：**他们的全会今天清晨闭幕了。我们劝说他们不要把奥尔绍夫斯基、格拉勃斯基和其他一些同志开除出中央全会，他们接受了这一劝告。我们的批评对波兰的领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与筹备党的代表大会有关的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当然，波

兰的领导对我们应该有一定的信任，我们也应该有这种信任。诚然，他们答应照办，却又不能过于相信，但是最低限度，我们还是应该在某些问题上支持他们，鼓励他们。

**勃列日涅夫：**总的来看，他们可以相信的地方不多，因为他们虽然也听我们的建议，可是又不像我们建议的那样去办。

**鲁萨科夫：**我应该说，列·伊·勃列日涅夫与波兰朋友们的会见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此外，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同志进行的会晤和谈话起了重大作用，还有与卡尼亚系统的电话通话——这一切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我相信，假如没有这些谈话，波兰的局势要坏得多。他们的全会在今天清晨5点闭幕了。针对领导，特别是针对卡尼亚同志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全会以后，举行了各省委书记会议，卡尼亚同志在会上受到了尖锐的批评。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要是没有别的意见，那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决定。

第一，批准我们代表团访问华沙期间的活动。

第二，委托波兰问题委员会继续积极地注视波兰人民共和国发生的事件，定期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而如果需要，就事件的进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第三，卡尼亚同志和雅鲁泽尔斯基要求利用波兰开工不足的企业，苏斯洛夫和鲁萨科夫同志建议支持他们的这一要求。我认为应该责成苏联部长会议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还建议向社会主义合作各国的兄弟党的领导通报在华沙举行的会谈情况，并且为苏共党的积极分子准备例行的信息。

**全体：**同意。

三、关于与芬兰共产党代表团会谈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芬兰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了数天。从我们这一方面，……<sup>①</sup>

---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文献以下缺页。

№06048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与 卡尼亚谈话情况的会议记录

(1981年6月18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出席者：尤·弗·安德罗波夫、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阿·雅·佩尔谢、米·安·苏斯洛夫、尼·亚·吉洪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彼·尼·杰米契夫、瓦·瓦·库兹涅佐夫、米·亚·波诺马廖夫、米·谢·索洛缅采夫、弗·伊·多尔吉赫、康·维·鲁萨科夫同志

一、关于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同裁军与安全国际委员会主席  
Y. 帕尔梅谈话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我在6月12日接见了帕尔梅。外交部参加了准备材料。

我们认为这次谈话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帕尔梅的委员会（有不少著名活动家参加这个委员会，如温斯、巴尔、挪威总理、尼日利亚前总统等），继续推动当今世界、特别是欧洲日益加强的反对华盛顿军国主义政策的运动。

因此不得不相当详细地阐明了我们对待里根的现行路线，特别

是对待限制战略军备的进程和西欧部署新导弹的计划的立场。重点谈了我们对谈判的准备以及美国人千方百计地回避谈判。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谈话的效果，我们把我这次谈话中基本声明的全文译文交给了帕尔梅。此外，把声明的大部分加进了准备发表的谈话记录。

……<sup>①</sup>

……就这个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材料已经分发，看来大家都了解其内容。我想我们应该通过这个决定。同志们要是没有不同意见，那么就通过这项决定。

全体：同意。

十二、关于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与 C. 卡尼亚同志谈话内容的通报

勃列日涅夫：大家都知道，我很久以来不愿意跟卡尼亚通话了，可是他坚决要求进行这次谈话：从星期五直到星期一，每天都打电话来。因此，星期二，6月16日，再推脱谈话已经不合适了，于是我跟他接通了电话，与政治局委员们商定了。我在谈话中涉及的问题也都是与政治局委员们谈好了的。

相互问候以后，卡尼亚开始表示感谢苏共中央给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信。他说，他们很重视这封信，把它看成是苏共中央对波兰社会主义命运、对我们相互关系的关怀。这封信的影响，用卡尼亚的话来说，是重大的和有益的。

接着，卡尼亚谈了中央全会以及会上通过的决议。再一次强调了我们的信对全会参加者情绪的影响。卡尼亚本人在全会上宣布说，苏共中央有权做出这样的反应，做出这样的反应是有足够理由的。

---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文献此处缺 8 页。



至于全会的进程，卡尼亚说，出现了许多批评。全会上的争论是激烈的、原则性的。全会上所有的发言者一致称赞苏共中央的信。对政治局，对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批评也很多。甚至提出了信任表决的问题。全会以多数票决定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前不变更领导成员。卡尼亚让我相信，他和全体在全会上发言的同志都怀着这样的心情，决心要把代表大会开成一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代表大会。继续动员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党员积极参与与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

卡尼亚简要地谈了雅鲁泽尔斯基在议会上的讲话。他强调说，那里谈论的是给反革命以更坚决的还击。

这时，我忍不住了，对他说：卡尼亚同志，自从这件扯皮的事一开始，我已经向你讲过多少次了。我一直对你说，要行动，而不是用空话来回答反革命的言论。

卡尼亚对此表示同意，指出，全会以后，敌人的言论少了，挑衅的现象少了。甚至瓦文萨都说，应该更换一种方式。

总之，卡尼亚认为党的斗争条件改善了，现在主要的是通过大众信息工具来安定秩序。他们通过撤消中央报刊、广播和电视部长克利亚萨职务的决定。通过解除电视委员会主席和几名编辑职务的决定。还将有其他一些决定。开始审判莫邱尔斯基。

就莫邱尔斯基的问题，我对他说：卡尼亚同志，你们在这位莫邱尔斯基的身上已经花费了多少精力——忽而把他逮捕起来，忽而把他释放。现在你们又开始审判。而下一步呢？

卡尼亚说，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法律审判他，把他重新投入监狱。他将受到应有的惩罚。用卡尼亚的话来说，他们现在会议开始好起来，气氛比较健康。这里可以看到全会和苏共中央的信的影响。特别是克拉科夫党的会议开得很好。

他们将改善状况，党的代表大会将有工人代表，以便把代表大

会开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立了加强党内和国家机关里的纪律，加强团结的路线。

我对他说，这非常好。关于波兰局势，关于我们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命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担心，我们想要对你们说的一切，都在苏共中央的信中表达了。重新回到这上来，我认为没有必要。你本人大概也明白这一点。我继续说，我只说一点：对反革命无休无止退让的政策彻底证明了自己的破产。

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前，如果你们达不到政治局势的转变，那么你们就要把代表大会搞糟，把党毁掉，亲手把政权交给敌人——这就是当今的情况。你们终于到时候了，应该懂得这一点了。我对你说这一点，是把你当成同志。

卡尼亚对此表示同意。

随后，我对他讲了以下内容。在全会上说了不少正确的话。在全会的决议里也有正确的话。但主要的不是话，而是行动，是实际工作。斯塔尼斯拉夫，你本人声明过，明天就开始行动。我们等着看看会有什么结果。你们早就该行动了。

我对他说，在我看来，由于全会而出现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对我讲过，会上许多不同层次的发言批评政治局在反对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中不坚决果断。我问道：是这样吗？卡尼亚回答说：是的，列昂尼德·伊里奇。批评非常严厉。

是这样，卡尼亚同志，这是一种严重的征兆，明显地反映了大部分党员群众的情绪，假如有人在这个基础上企图记到个人的账上，那可是异常危险的。

我说，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特别重要的是确保政治局的战斗力的，这个集体是党的司令部，应该建立在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这就是我想要答复你的。必须确保政治局的统一。然后，我向你再重复一遍，假如有人站在这个基础上，站在挨批评的

基础上，企图记到个人帐上，那是非常危险的。

这时，卡尼亚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我没有完全懂得您的意思。”

我用同样的话又重复一遍，绝不准算个人的帐。在这之后，卡尼亚说，明白了，记下了，他们都将像对他所说的那样去做。

卡尼亚让我相信，他将竭尽一切力量实现我们的希望。我回答道，让行动证明吧。我和他就此道别了。

你们已经看到，谈话就时间来说并不长，但内容却是严厉的。也许正是需要这样。让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我认为，卡尼亚在这里有一点是正确的，就是苏共中央的信的确积极地影响了党内的健康力量，影响了整个气氛的健康化。也许他们最终会想通，开始更坚决果断地行动起来。俗话说，只要能活着，就能看得到。

同志们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吗？如果没有，那就表示批准这次谈话。

**全体：同意。**

### 十三、关于芬兰

**勃列日涅夫：**我还想要涉及一个问题。

上周，从赫尔辛基传来消息，说吉科宁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而想要辞去总统职务，不准备当1984年例行的选举候选人。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芬兰。关于现任总统继承人的问题，在报刊上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可能成为候选人的列举了各种不同的人物：卡尔亚莱宁（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核心党的主席）、维罗莱宁（议会主席，同一个党的活动家）、科伊维斯托（现任总理，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一些人。

有消息说，吉科宁现在收回他以前反对选举卡尔亚莱宁当总统的主张。诚然，此人在政治上有许多好的品质，可是在私生活方面却表现得不佳（酗酒，多次出现丑闻，等等）。

这在芬兰是广为人知的。

吉科宁不久前在与我们的驻芬公使谈话时亲自谈到自己的继承人问题，提到想要提名现任退休管理局局长帕尤拉担任这一职务。这是一个完全出人意外的大转弯：帕尤拉是个鲜为人知的人，在政治生活中没有显示出任何才干。

这一切说明，芬兰的总统问题已经进入最热烈的时期，局势非同一般。很难说在总统选举中力量如何配置，以及最近一两年内芬兰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11864

## 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等部门 关于完善物质技术基础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1年8月3日)

机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80 年 12 月 22 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1980 年 12 月 22 日 СТ—242/61rc 决议<sup>①</sup>）的委托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苏联邮电部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审理了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进一步完善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机关的物质技术基础问题，现报告如下。

苏联邮电部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第二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并在搬迁到国际邮政总局新楼之前将对旧楼进行大修，设备都以新代旧以及进行一些其他工作等。

苏联邮电部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将采取措施加速莫斯科市国际邮政总局大楼的施工进程并保证它到 1983 年能投入使用。为了装备这一企业需要进口资本主义国家的专用设备，其金额 1983～1984 年可达 10 万卢布。

为此，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苏联邮电部和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申请，在国民经济年度计划草案中规定拨给苏联邮电部资

---

<sup>①</sup> 参见前 №11862 文件。

## 苏联与 80 年代初的波兰局势 (二)

---

金为国际邮政总局在资本主义国家购置“罗坦 600 型”包装机，用塑料带捆扎邮件机，“标准 - 25 型”书信包装机，振动拉紧装置，机械化目录索引卡，万能滚轴运输机和废纸粉碎机等。

从 1982 年 1 月 1 日起，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汽车运输总局将每天派出一辆载重量不大的“莫斯科人”牌小型客货两用汽车，专门为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第二管理局使用服务。

苏联部长会议

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局长 罗曼诺夫 (签字)

苏联邮电部部长 沙姆申 (签字)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比留科夫 (签字)

1981 年 8 月 3 日

№11863

**佳热利尼科夫关于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  
等部门通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1年8月14日)

机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苏联邮电部  
和苏联计划委员会的通报**

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罗曼诺夫同志）苏联邮电部（沙姆申同志）和苏联国际计划委员会（比留科夫同志）通报了关于就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进一步完善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机关的物质技术基础问题执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80 年 12 月 22 日决议（Ср—242/61rc）的进行情况。

苏联邮电部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将采取一些措施加速国际邮政总局新楼的施工进度，以及用新的技术和设备装备起来。同时，对邮政总局的旧楼进行大修，并改善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第二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劳动条件。

苏联与 80 年代初的波兰局势（二）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已了解通报的内容。其中没有需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加以审理的问题。同意通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 佳热利尼科夫（签字）

1981 年 8 月 14 日



№06049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的会议记录

(1981年9月10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出席者：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尼·亚·吉洪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彼·尼·杰米契夫、米·谢·索洛缅采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弗·伊·多尔吉赫、米·瓦·齐米亚宁、康·维·鲁萨科夫同志

一、关于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与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黎笋同志会见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我认为同志们都了解了我与黎笋谈话的记录。因此我将简短地说几句。

黎笋并没有通报什么新东西，但可以发现他的情绪不很乐观。最让他不安的是由于歉收而产生的尖锐的食品问题。用黎笋的话来说，目前河内和越南北部一系列省份正处在饥荒的边缘上。而且这是发生在越南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前夕。

黎笋开始谈话时请求紧急食品援助，结束谈话时还是提出这个问题。看来这是他此次苏联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况且他当然也怀着兴趣向自己的同事们，向党表明，他跟以前一样受到苏共的关

注，正像不久以前克里米亚会晤的参加者一样。

从一切情况来判断，让黎笋不安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北京多方面的压力。甚至党内仍然保留着亲北京的情绪。中国人继续在越南进行颠覆工作。他们的目的是迫使越南同志改变政治路线。

黎笋谈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可能出现解决干部问题的困难，这也特别让人注意。

……①

### 九、就波兰问题交换意见

勃列日涅夫：昨天我见到了波兰“团结”工会代表大会通过的《告东欧各国人民书》。这是一份很危险的和挑衅性的文件。其中话并不多，但全都集中到一点上，即它的作者们想要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引起骚乱，煽动各种各样的叛乱小集团。

我认为对待这种肆无忌惮的卑鄙伎俩不能局限于在报刊上批判。若是由我们一些大型企业，譬如像基洛夫工厂、马格尼托、卡马兹等，以集体的名义对这些煽风点火的人进行还击，怎么样？他们针对“团结”工会代表大会发表公开信，也许那边很难保持沉默。况且我们在自己的大众信息工具上给这些公开信以显著的地位。

如果同志们赞成，那就责成波兰委员会挑选三四个生产集体，帮助他们写出一批高水平的还击“团结”工会的文章。

葛罗米柯：波兰的局势在不断恶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目前政权所剩无几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和部长会议的阵地一天一天地丧失。至于与卡尼亚的谈话，现在也许的确不再需要跟他谈了，因为不久前才谈过。

至于像电话通话这样的连接杆，还不应该切断，因为这是施加

① 所收集的档案文献此处缺 12 页。

压力的一种不错的杠杆。

**勃列日涅夫：**坦率地说，我觉得，现在跟卡尼亚同志通话，没有这种愿望，而且不会有任何益处。

**契尔年科：**以前谈过话，给过很好的指示，在克里米亚举行过座谈。可是这产生了什么效果？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却一直自行其是。

**格里申：**他们现在自己也不否认阵地一个接着一个地交出去了。

**齐米亚宁：**我想要告诉政治局，与“团结”工会的代表大会相关，计划发表哪些东西。可以说，这次代表大会显示了波兰局势进一步恶化。大家都知道，他们向某些国家，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议会和人民发出了自己的“革新”纲领。因此现在我们的报刊系统和塔斯社正在准备相应的材料。这些材料将对“团结”工会的行为进行揭露。我认为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提议完全正确，让几家大型的骨干企业以集体的名义发言。我们也尽力准备。

**吉洪诺夫：**我们也须要做出反响，具体地针对华沙出现的流氓分子的卑鄙行为作反响，政府对他们的行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里，我们的军人纪念碑受到玷污。此外，他们画了各种各样的漫画来污辱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用各种方式污辱苏联，等等。换句话说，他们在嘲笑我们。我觉得，我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而应该或是通过国家系统或是通过别的系统，就此事向波兰政府提出抗议。我认为不做出反响，完全不行。

**葛罗米柯：**这得认真想一想。这涉及到我们的友好国家。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提议完全正确，就是让大型企业以集体的名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团结”工会的行为。

**格里申：**也应该在《真理报》和别的报纸上组织这样的文章。

我们要让一些大工厂以集体的名义发表文章，诸如“季尔”、“镰刀与斧头”等等。

**勃列日涅夫：**我认为可以责成苏联外交部和中央国际部就“团结”工会的代表反对苏联的流氓行为准备起草给波兰共和国政府的照会。与此同时，就像刚才同志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材料，揭露“团结”工会的行为及其代表大会的决议。

政治局讨论了列入议程的各个问题之后，听取了戈尔巴乔夫，米·谢·同志关于收割进程和农产品加工的情况汇报，他也谈到秋播的进度和饲料准备的情况。

№06050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 给雅鲁泽尔斯基口信的会议记录

(1981年11月21日)

绝密

№П137 / 21

送：勃列日涅夫、吉洪诺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波诺马廖夫、鲁萨科夫、阿尔希波夫、巴伊巴科夫、扎米亚京、斯米尔秋科夫同志

苏共中央政治局 1981年11月21日会议№37记录摘要

关于苏联接待波兰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和列·伊·勃列日涅夫给沃·雅鲁泽尔斯基的口信

一、批准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给沃·雅鲁泽尔斯基的口信的文本，责成苏联驻波兰人民共和国大使转达给沃·雅鲁泽尔斯基（见附件）

二、认为苏联在1981年12月14~15日接待由沃·雅鲁泽尔斯基率领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是适宜的。

批准与波兰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进行会谈的苏联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列·伊·勃列日涅夫（团长）、尼·雅苏斯洛夫、尤·弗·安德罗波夫、尼·亚·吉洪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康·维·鲁萨科夫。

三、责成苏共中央国际部、苏联外交部、国防部、苏联国家安

全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委在 1981 年 12 月 1 日以前准备好与波兰党政代表团会谈用的必要材料，包括在报刊上发表的公报。

责成苏共中央国际部和苏联外交部提出与在苏联接待波兰代表团有关的组织措施。

中央书记

№37 记录第 21 项附件

机密

### 勃列日涅夫给雅鲁泽尔斯基的口信

华沙

致苏联大使

请您拜会沃·雅鲁泽尔斯基，说明受委托向他转达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口信：

“尊敬的雅鲁泽尔斯基同志！

我们仔细地研究了您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提议，该代表团也包括与波兰统一工人党联盟的党派的领导人，我们对此表示同意。至于访问的日期，可以在 12 月 14～15 日，当然，如果您觉得方便的话。

与此同时，由于会见之前还有一段时间，我决定通过阿里斯托夫同志转达我就波兰当前局势问题的一些见解，因为波兰的局势一直是引起我们严重不安的对象。

我们怀着很大的期望听到您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我这样说，并不想公开秘密。我们考虑到您以前作为部长会议

主席在与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中，看来由于党的领导方面缺乏政治上果断的决心而受到限制。如今这种障碍业已不存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四次全会把更换第一书记与拯救波兰的社会主义而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联系起来。

我当时通过电话向您表示祝贺，我非常愉快地听到您同意在如此危难的情况下承担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负责岗位，您在我们方面感到的对您的信任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对我的同志们讲了这一点，我们的希望更加强了，我们在您身上看到了自己在与帝国主义斗争最激烈的一条战线上的志同道合者和同盟者，波兰现在就成了这样一条战线。

记得我在电话交谈中表示希望如今在波兰和在国外都能感觉到国内的事态有所转变。我们当时谈了局势转变的决定性前提，您同意应该从忠诚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中间为自己挑选可靠的助手，整顿全党，让党鼓起斗争的精神，不耽搁时间，转入向反革命积极的进攻。显而易见，现在的基本问题——这就是为争取群众而斗争的问题。然而形成一种印象，在这方面暂时还没有看到转变。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不仅主宰着许多大型企业，而且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越来越广泛的居民阶层。‘团结’工会的首领们、反革命分子们没有一天不在各种集会上公开发表煽动性言论，矛头指向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社会主义，鼓吹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敌对活动的直接结果就是反苏主义在波兰的增长。

我们觉得，现在必须动员全党为争取人们的智慧而斗争，走到人民中间去，提出摆脱危机出路的明确而鲜明的纲领，让每个人都相信它的正确性。换言之，重新做争取劳动人民信任的工作，人民政权建立的初年，共产主义者们就曾做了这项工作。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活动家和积极分子定期会见劳动集体，在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在大型企业，——不仅在首都——因为敌人得以把大

型企业变成自己的堡垒。当然，假如不能通过大众信息工具确保党的真正领导，假如敌人跟以前一样畅通无阻地扩大自己的敌对宣传，那么争取群众的斗争也不会带来所需要的结果。

我还想要涉及这样一个问题。近来在波兰，很多人写文章谈到您与格莱姆普和瓦文萨的会晤。有些人把这次会晤称作历史性的，从中看到从混乱向社会安定转变的开端。我们得悉，政治局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次会晤给了肯定的评价。

我们当然理解，您在会晤时作为一个关键问题提出创建‘民族和解阵线’。您这样做是遵循一系列策略目的，首先是扩大支持政权的社会基础，分化‘团结’工会的上层。可是，丧失了对局势的监控而通过协商的途径究竟能够走得多远呢？阶级敌人可能企图赋予‘民族和解阵线’以这样的政治内容，把自己的思想作为最低纲领强加给它，即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团结’工会和天主教教会之间瓜分政权，而下一步则瓦解社会主义。还有一点也是无容怀疑的：他们利用自己目前对群众的影响，确保自己在即将举行的人民会议选举中取得优势，为在国家合法地夺取政权铺平道路。

因此，我觉得，牢固地确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民族和解阵线’中的领导作用，其参加者承认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承认社会主义和波兰的国际联盟，具有原则的意义。在阵线的章程和其他文献中能否做到这一点，而主要的——能否在实践中得到保证？您是否考虑到党在地方政权机构选举中存在着失败的危险，而您又打算如何应付这种可能性？

与此相联系，还有另一个问题。在多次会谈中，我们方面经常强调同一个思想：我们并不反对协商。可是协商绝不应该包含着对社会主义敌人的让步。而主要的——事情不应该仅仅归结为协商：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种社会力量都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与这些措施同时，还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反对人民政体的敌人。您曾同意这样提出问



题并且亲自谈过自己打算为争取劳动者而斗争，而同时打击阶级敌人。

可是现在却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只是把指望寄托在这个二位一体的公式的第一部分上。我们知道，在你们党的领导层中，有些人把自己的一切期望全都寄托在继续已经破产了的卡尼亚路线上。屈服于他们的主张是很危险的。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假如不与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不可能拯救波兰的社会主义。问题实质上并不在于是否会发生对抗，而在于是什么人开始对抗，对抗将采取什么手段，主动性将在什么人手中。

我想要强调一点：我们谈到对抗性，指的是要求把处在‘团结’工会影响下的工人、劳动群众吸引到波兰统一工人党方面来，以及为此而进行的斗争，要么就是持消极的立场，等待着谁占上风。

沃伊采赫·符拉迪斯拉沃维奇，我和您都走过了战争的道路，斗争的策略提到首位的问题是时间问题。这也完全适用于当前波兰形成的尖锐局势。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首领们早就一步一步地，而有些地方则公开地，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搏斗，只是暂时拖延着，一旦他们占有优势，便会着手进行。他们尤其是寄希望于征收新兵时让经过‘团结’工会改造的人混进军队。这是否意味着您对反革命如果不马上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您就要失掉宝贵的时间呢？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孤立社会主义的公开敌人。只要做不到这一点，一切都将会照旧是老样子。不仅如此，诸如‘独立波兰联盟’这样的公开的反革命组织，在招募新的拥护者，实际上在进行着合法的活动。显而易见，这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党丧失了对司法机关的监控，审判莫邱尔斯基和‘独立波兰联盟’的其他首领的整个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还想就当前一个迫切问题与您交换一下想法。显而易见，为保卫社会主义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要求首先为保持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特别是提高它的战斗力而进行坚持不懈

的斗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四次全会之后，党组织显示出活跃的特征。据我们理解，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致基层组织的信对此也有所促进。重要的是更积极地进行这项工作，不允许基层的共产主义者重新陷入消极状态，由于气馁而不做工作。为此，首先必须让党员相信不能再言行脱节，领导有意坚定不移和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通过的各项决议。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巩固也取决于对待自己队伍里各种思潮的明确路线。你们那里有些人断言，目前党内存在着三种流派：左派、右派与核心，建议砍掉左派和右派，给他们以同样的打击。这是一种危险的建议。说实在的，哪些人可以称作‘左派’或者‘保守派’？指的是那些牢固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绝对不否认改正所犯的错误的必要性。哪些人是右派呢？这是指鼓吹修正主义观点的人，他们最终与‘团结’工会同流合污。很清楚，反对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任何行动，对于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来说，都是一种自戕的行为。也很清楚，只要你们不摆脱修正主义分子，其中包括党的领导层中企图继续以前的投降主义路线的人，他们都将是挂在你们腿上的沉重负担。

我想，这些想法也会为解决业已成熟的干部问题提供一把钥匙。我相信，跟那些被称作‘左派’的同志一道工作，给他们以支持，您在为克服危机而进行的斗争中将会在这些人身上得到有力的支持。

尊敬的沃伊采赫·符拉迪斯拉沃维奇！在您面前提出某些我们深为关心的问题，并且交换了自己的想法，我自然还没有提到一系列问题，留待见面时讨论。

列·勃列日涅夫”

电告执行情况。

№06051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的会议记录

(1981年12月10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出席者：尤·弗·安德罗波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阿·雅·佩尔谢、米·安·苏斯洛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彼·尼·杰米契夫、米·亚·波诺马廖夫、米·谢·索洛缅采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弗·伊·多尔吉赫、康·维·鲁萨科夫同志

### 一、关于波兰的局势问题

勃列日涅夫：这个问题本来没有列入我们的议程。可是我认为政治局会议应该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专门派遣巴伊巴科夫和库利科夫同志出使波兰，以便与波兰同志讨论业已成熟的迫切问题。12月8日，库利科夫同志汇报了他在华沙会谈的情况，12月9日晚巴伊巴科夫同志从华沙报告说，他与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进行了谈话。从这些以及巴伊巴科夫同志随后的几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波兰同志指望明年第一季度追加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大约价值15亿美元的原材料，其中包括铁矿石、有色金属、肥料、石油、轮胎、粮食等等。

各位看到，波兰同志指望苏联 1982 年向波兰供应商品的数量保持 1981 年的水平。巴伊巴科夫同志向交谈者们通报说，他们的一切要求将向莫斯科汇报。

也许我们应该委托吉洪诺夫、基里连科、多尔吉赫、斯卡奇科夫、阿尔希波夫等同志不等最后商定，考虑到交换的意见，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现在让我们听听巴伊巴科夫同志。

巴伊巴科夫：根据政治局的委派，我出使了波兰。在那里会见了应该与之讨论的所有的相关同志。

首先，我与部长会议副主席奥鲍多夫斯基进行了会谈。在这次谈话中，波兰同志们提出了经济援助的问题。我用密码电报向这里汇报了波兰的要求。

应该说，他们开列的我方援助波兰的货单包括 350 大类，总价值为 14 亿卢布。这里包括如下货物，如：2 百万吨粮食、2 万 5 千吨肉类、62 万 5 千吨铁矿石以及其他许多商品。我们打算在 1982 年向波兰供应的货物，考虑到波兰同志提出的要求，援助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总额大约为 44 亿卢布。

现在波兰偿还西欧各国的债务已经到期。为此，波兰要求最低限度 280 万外汇卢布。我听取了波兰同志要求什么以及这项援助多大数额之后，我提出一个问题：让我们进行一种建立平衡基础上的相互经济关系。这时我指出，波兰的工业不能完成计划，而且数量相当大。煤炭工业是获得外汇的基本来源，可是实际上却瘫痪了，并且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罢工在继续。而现在虽然没有罢工了，煤炭开采量也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或者举个例子来说，农民拥有产品，有粮食，有肉制品，有蔬菜等等。可是他们却不向国家提供任何东西，而持观望的立场。在私人市场上贸易进行得相当活跃，价格非常高。我直截了当地对波兰同志们说，既然出现了这种局

面，就应该采取比较坚决的措施。也许须要实行类似余粮征集制的政策。

如果说到粮食储备，波兰今年收获了200多万吨。人民却在挨饿。城市居民到市场、农村去购买一切必需的食品。而且有这些食品。

大家都知道，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和波兰同志的要求，我们要援助他们3万吨肉类。这3万吨中，已经有1.6万吨运往国外。应该说，食品，在这种情况下是肉类，是用装运矿石的车厢发运的，车厢没有清洗，很脏，肉运到以后外观很难看。在波兰车站上卸这些货物时，发生了真正的怠工。波兰人针对苏联说了一些最下流无耻的话，拒绝清理车厢。针对我们而发泄的种种侮辱，简直是数不胜数。

波兰人感觉到支付平衡的状况，想要延期偿还西方各国的债务。如果他们宣布延期偿还，那么所有的正在某些国家水域航行或停泊的波兰船舶，以及在波兰欠债的国家的一切财产都将被没收。因此现在波兰人下令船长驶离港口，进入公海。

现在我要谈谈与雅鲁泽尔斯基同志会谈的情况。他肯定了奥鲍多夫斯基提出的供应货物的要求。后来晚上，我们和大使以及库利科夫同志一起再次拜会了雅鲁泽尔斯基。奥鲍多夫斯基和主管这些问题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也出席了这次会谈。雅鲁泽尔斯基心绪极其不佳。可以感觉到，波兰天主教教会首领格莱姆巴大主教的信对他产生了强烈影响，这个大主教正如尽人皆知的那样，准备向波兰政权当局宣布神圣的战争。诚然，雅鲁泽尔斯基这时回答说，如果“团结”工会采取行动，他们将把所有的敌对分子孤立起来。

至于党组织，他们在基层事实上已经瘫痪，不起作用了。谈到党的总体情况时，雅鲁泽尔斯基说，它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国家

瘫痪了，地方得不到任何巩固，因为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不下达坚决的和明确的指示。雅鲁泽尔斯基本人变得非常喜怒无常，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

**鲁萨科夫：**巴伊巴科夫同志正确地描绘了波兰的经济状况。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应该向波兰发运经济协议规定的那些货物，发货量不应该超过我们在去年第一季度发运的。

**勃列日涅夫：**我们现在能够提供吗？

**巴伊巴科夫：**列昂尼德·伊里奇，这只能从国家储备中提供，或者靠着削减国内市场的供货。

**鲁萨科夫：**前天，他们开了各省委书记会议。阿里斯托夫同志报告说，各省委书记完全不理解雅鲁泽尔斯基同志的讲话，他没有拿出一条明确的路线。任何人都不了解最近几天将要发生什么事。谈论的是“X”行动。起初说将在 11 至 12 日夜间进行，后来又说在 12 至 13 日。可是现在却说大约在 20 日前后。指的是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勃隆斯基将发表广播和电视讲话。与此同时，雅鲁泽尔斯基宣布说，关于实施军事状态的法令只有在议会讨论之后才能执行，而议会定为 12 月 15 日召开。这样一来，一切都变得非常复杂了。议会的议程暴露了。实施军事状态的问题并没有列入议程。但最低限度，“团结”工会已经清楚地了解政府将要实施军事状态，因此对于将要实施军事状态也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

雅鲁泽尔斯基本人说，他准备发表告波兰人民书。可是他在告人民书中却不会讲到党，而是呼吁人民表现出爱国主义感情来。雅鲁泽尔斯基谈到宣布实行军事专政的必要性，就像毕苏斯基时代那样，认为波兰人民对此会理解，而且比对任何别的事情都理解得更清楚。至于像奥尔绍夫斯基这样的活动家，他近来表现得更坚决了。应该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实施军事状态、对“团

结”工会极端分子采取果断措施的决定，任何人都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但是雅鲁泽尔斯基却打算在这个问题上与盟国建立联系。他说，如果波兰的力量不能制服“团结”工会的反抗，波兰同志就得指望别的国家的支援，直到向波兰领土出兵。这时，雅鲁泽尔斯基援引了库利科夫同志的讲话，似乎是库利科夫说过，苏联和盟国将以武装力量向波兰提供援助。然而，据我所知，库利科夫同志并没有直接说过，他只是重复了列·伊·勃列日涅夫以前说过的话：我们不会对波兰人民共和国遭到灾难时置之不理。

要是说到各省的情况，那么应该直截了当地说，那里完全感觉不到党组织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感觉到行政部门的权力。实际上整个政权都掌握在“团结”工会手中。雅鲁泽尔斯基说的话，很像是在愚弄我们，因为他的话里感觉不到正确的分析。假如他们现在不能迅速地组织起来，对于“团结”工会的进逼不准备，并且不进行反击，那么改善波兰局势便不会收到任何成效。

**安德罗波夫：**从跟雅鲁泽尔斯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暂时还没有坚定的决心实施军事状态。虽然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实施军事状态的决定，但目前我们还看不到领导方面的具体措施。“团结”工会的极端分子卡住波兰人民共和国领导的脖子。天主教教会近日来也表现出自己的明确立场。它实际上已经转到“团结”工会方面去了。

当然，在这种条件下，波兰同志应该迅速地准备“X”行动，并且实行这一行动。可是雅鲁泽尔斯基却宣称，当“团结”工会把“X”行动强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实行它。这是个令人担忧的征兆。况且，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最近一次会议及其通过的实施军事状态的决定，证明政治局做事比较坚决果断。全体政治局委员都赞成采取坚决的行动。这项决定把雅鲁泽尔斯基逼得万般无奈，他现在不得不设法解脱。我昨天与米列夫斯基谈话时问他，何

时采取措施，将采取什么措施？他回答我说，他并不了解“X”行动及其实施的具体日期。这样一来，要么是雅鲁泽尔斯基向自己的同志们隐瞒具体行动计划，要么就是他逃避执行这一措施。

现在我想要指出，雅鲁泽尔斯基相当顽固地向我们提出经济要求，想要把我们的经济援助当作实施“X”行动的条件。我甚至可以说得更严重一些，他尽管不是直截了当地，但毕竟提出了军事援助的问题。

现在如果看看波兰同志要求的货单，那简直可以说，对提供这些货物的必要性不禁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譬如说，肥料和某些其他货物对于实施“X”行动的成败有什么关系？因此，我想要说，我们的立场恰如以前在上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所表述的以及列昂尼德·伊里奇从前不只一次说过的那样，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应该离开它。换句话说，我们所持的是国际主义立场，我们关心波兰形成的局势，可是说到实施“X”行动，这完全应该由波兰同志自己决定，他们怎样决定，就怎么样好了。我们不必坚持这么做，也不劝阻。

至于经济援助，像他们所要求的规模，我们难以办到。看来应该给一些。但是我想再说一遍，把商品作为经济援助而单独提出来，这带有厚颜无耻的性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日后我们一旦不供应，他们便可能把罪责推到我们身上。如果库利科夫同志真的说过出兵的事，那么我认为他做得不正确。我们不能冒险。我们不打算出兵波兰。这是正确的立场，我们应该坚持到底。我不知道波兰的事态将会如何发展，可是即使波兰将在“团结”工会控制之下，那将是一回事。而如果各资本主义国家攻击苏联，而他们已经商定采取各种各样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制裁，那么我们将十分困难。我们应该关心我们的国家，关心苏联的巩固。这是我们的主要路线。



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对待波兰的立场，列昂尼德·伊里奇在其多次讲话中都做了表述并且在今天政治局会议的决议里规定下来，我们非常细致地交换了意见。这一切都应该构成我们在对待波兰问题上应该坚持的政策的基础。

至于从苏联经过波兰通往民主德国的交通线，我们当然应该采取某些措施进行保护。

葛罗米柯：今天我们讨论波兰局势问题，非常尖锐。恐怕我们以前没有如此尖锐地讨论过。这是因为现在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波兰事态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波兰的领导自己也感觉到政权正在从他们手中滑掉。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如大家所知道的，曾把赌注押在依靠中立派上。可是现在没有了，中立派已经不存在了。形势相当明朗：“团结”工会暴露出自己完全是个反革命组织，公开扬言

领导的坚决意图。如果他们打算实施的措施都将执行，那么我想，可以期待良好的结果。

现在谈谈创建一个新党的问题，雅鲁泽尔斯基曾经谈过这种想法。我认为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雅鲁泽尔斯基，完全没有必要创建一个新党，因为这意味着波兰领导的退却，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确不是一个战斗的政治组织，而是个犯了错误的组织，等于承认它的软弱无力和自己的软弱无力，等于助“团结”工会极端分子一臂之力。再者，波兰的居民本来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怀有同情，把它看成是领导力量，这样也会对它大失所望。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允许下达激烈的指示，逼迫他们采取某些行动。我想我们在这里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整顿波兰的秩序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事。我们从前对波兰朋友们说过，今后还要说，应该采取坚定的立场，完全不可漠然置之。

当然，如果波兰人给“团结”工会以打击，那么西方很可能不再给贷款，并且不提供任何援助。这是他们的打算，看来我们也得予以注意。因此列昂尼德·伊里奇正确地提议责成一批同志研究这个问题，考虑到我们向波兰人民共和国提供一定经济援助的可能性。

**乌斯季诺夫：**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局势当然非常糟糕。局势日益复杂。领导、特别是政治局没有决心，意见不一致。这一切对事态都有所影响。只是在最近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才一致决定实施军事状态。现在一切都指望雅鲁泽尔斯基。他能否实现这项决定。不过暂时任何人都不能公开谈论雅鲁泽尔斯基的行动。我们也不知道。我与西维茨基谈过话。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将军在想些什么。这样，一个现在实际上履行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职责的人，竟然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部长会议主席和

部长将要采取哪些行动。至于说库利科夫同志似乎说过向波兰出兵的问题，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地说，库利科夫没有说过这种话。他只不过是重复了我们和列昂尼德·伊里奇说过的话，即我们不会对波兰人民共和国遭到灾难时置之不理。他清楚地知道，波兰人自己要求不出兵。

至于我们在波兰的驻军，我们还要加强。我也倾向于认为波兰人不会对抗，或许只是当“团结”工会卡住他们的脖子时，他们才会这么做。

糟糕的是波兰领导人没有表现出坚决果断的精神来。如同志们在这里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必把自己的决定强加于他们，逼迫他们贯彻我们商定的政策。首先自己要随时准备好，不做我们的决定没有规定的举动。

**苏斯洛夫：**从同志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到，我认为大家对波兰局势的看法是一致的。在波兰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我们表现出克制和冷静。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全会上讲了这一点。我们公开地向人民宣布了这一点，我们的人民支持共产党的这种政策。我们为了和平进行了巨大的工作，现在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立场。世界的社会舆论不会理解我们。我们通过联合国进行了巩固和平的重大举动。由于列·伊·勃列日涅夫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我们奉行的其他和平举动而获得了巨大的成效。这让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有可能明白苏联坚定而一贯地奉行捍卫和平的政策。因此我们不能改变自己对待波兰的立场，我们自从波兰事件一开始就持有这种立场。让波兰同志自己决定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不应该推动他们采取某些坚决的行动。但我们跟以前一样，将告诉波兰人我们以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行动。

我觉得，雅鲁泽尔斯基表现出某种狡猾。他想要用向苏联提出的各种要求给自己制造各种借口。我们自然没有可能完成这些要

求，而雅鲁泽尔斯基以后就会说，我曾经向苏联请求过援助，可是没有得到这种援助。

与此同时，波兰人直截了当地宣布反对出兵。一旦出兵，那就意味着灾难。我认为我们大家在这里意见是一致的，不可能谈得上出兵。

至于给波兰援助，我们已经提供了超过 10 亿卢布的援助了。我们不久前通过决定往波兰发运 3 万吨肉类，1.5 万吨已经发出。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把 3 万吨全部发运，但是根据这一决定，看来还得提供一定数量的肉类作为援助。

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以及创建一个新党来取代它，我认为不应该走解散波兰统一工人党这条路。大家在这里谈的都是正确的，这将是一种不可取的举动。

**格里申：**波兰的局势正在走向进一步恶化。我们党对待波兰事件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至于雅鲁泽尔斯基提议解散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创建一个新党，不能同意这一点。关于出兵，根本谈不上。经济问题也应该研究一下可以向波兰人提供些什么。

**苏斯洛夫：**我们应该在报刊上揭露“团结”工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的阴谋。

**契尔年科：**我完全赞成同志们在这里所谈的。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对待波兰事件的政策，在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和政治局的决定中都有阐述，确实完全是正确的，不应该改变。

我认为今天可以通过这样的决定：

(1) 知照执行巴伊巴科夫同志的情况汇报。

(2) 在我们与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将从苏共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 1981 年 12 月 8 日的决定和 1981 年 12 月 1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意见出发来处理这个问题。

(3) 委托吉洪诺夫、基里连科、多尔吉赫、阿尔希波夫、巴伊

巴科夫等同志继续研究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考虑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意见。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全体：**契尔年科同志对各项提议概括得非常正确，应该通过。  
通过决定。

№06054

**苏共中央关于向兄弟党和国家领导人  
通报波兰问题的决议**

(1981 年 12 月 13 日)

绝密

№П40 / 26

送：勃列日涅夫、吉洪诺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波诺马廖夫、鲁萨科夫、扎米亚京同志

**苏共中央政治局 1981 年 12 月 13 日会议 №40 记录摘要  
关于就波兰问题向各兄弟国家领导的通报**

批准给苏联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古巴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大使的指示草稿 (见附件)

中央书记

№40 记录第 26 项附件

机密

索非亚、布达佩斯、柏林、乌兰巴托、布拉格、哈瓦那、河内、万

象

致苏联大使

抄送：华沙——致苏联大使

请您拜会日夫科夫同志（雅·卡达尔、埃·昂纳克、泽登巴尔、古·胡萨克、菲·卡斯特罗、黎笋、凯山·丰威汉），说明受苏共中央委托，转达如下内容：

“如朋友们所知道的那样，波兰领导人在国内实施了军事状态，宣布成立救国军事委员会，孤立‘团结’工会、‘独立波兰联盟’和其他反社会主义集团的极端分子。

沃·雅鲁泽尔斯基发表告人民书，在我们看来，正确地着重强调了基本问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尤其重要的是肯定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波兰人民共和国忠诚于对华沙条约各盟国的义务。波兰同志认为严格保密是实施行动成功的条件。惟有沃·雅鲁泽尔斯基同志周围极少数人了解这一行动。因此，朋友们才得以让敌人措手不及，目前行动进行得令人满意。

沃·雅鲁泽尔斯基在执行拟定的计划前夜就此通知了莫斯科。向他转告说，苏联领导对波兰同志的这一决定持理解态度。同时，我们的出发点是波兰朋友将会以国内的力量解决这些问题。

据我们事先的评价，波兰朋友的行动是还击敌人积极的步骤，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合各兄弟国家的共同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出现一个问题，亦即给予波兰同志们以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以及经济上的补充援助。苏联领导一如既往，在波兰问题上与各兄弟国家采取合作。”

电告执行情况。

№06052

**苏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同奇莱克会谈总结的会议记录**

（1982 年 1 月 14 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出席者：尤·弗·安德罗波夫、米·谢·戈尔巴乔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阿·雅·佩尔谢、米·安·苏斯洛夫、尼·亚·吉洪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彼·尼·杰米契夫、瓦·瓦·库兹涅佐夫、米·亚·波诺马廖夫、弗·伊·多尔吉赫、米·瓦·齐米亚宁、康·维·鲁萨科夫同志。

一、关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进一步发展商业和改善对居民的商业服务的措施

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尼·亚·吉洪诺夫同志）提交了报告和  
建议草案。

各位还都记得，我们在 1980 年 12 月就这个问题通过一项决议，并且委托部长会议研究和提出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进一步发展商业和改善对居民的商业服务的建议和措施。

各位都看到，方案中给各共和国以及苏联各个部委规定了发展和巩固商业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资金投入利用效率、从机构和技



术装备上改造商业企业、确保正确分配商品资源、完成商品周转计划和在不增加工作人员数量的前提下改善对居民的商业服务的任务。

责成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改进集体农庄市场，扩大农产品市场货物的运送量，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措施。

方案中规定的措施保证使国营商店的覆盖面积扩大为 340 万平方公里，而数量……<sup>①</sup>

通过决议草案。

罗曼诺夫和乌斯季诺夫同志提出的意见只采纳了一点：从住房建设资金中提取 5% 的费用不能转交给地方执委会，而将用于发展驻军中的军事商业。

二、关于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Ю. 奇莱克同志会谈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我想我们大家都认为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和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与奇莱克同志的座谈是有益的。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波兰施加了最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经常不断地从政治上支持朋友们，让他们振奋起来。不能允许他们情绪低落，把来之不易的阵地交出去。

波兰人民共和国实施军事状态已经一个月了。初步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如雅鲁泽尔斯基所说的，反革命的骨干已经被摧毁。然而，未来的任务更加复杂。

波兰同志相对地整顿了国内的秩序，如今应该解决的，可以说是战略性的问题——如何处理工会，如何把经济扶植起来，如何使群众的思想发生根本的转变，等等。

最主要的问题——这就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局势，朋友们在寻

---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文献此处缺 2 页。

找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好像是雅鲁泽尔斯基不打算解散党，而只是更换它的名称，利用军事状态对党进行彻底的清洗。这可能会取得成效。

总体上来看，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将军作为政治活动家坚强了、并且照例在寻求正确解决办法。有时让人觉得，他过于谨慎，更经常地看着西方和天主教教会的脸色行事。可是在如今的形势下，采用迎合的方式，只能把事情办糟。在原则问题上，在采取坚决强硬的措施的同时，也需要灵活性和慎重性。雅鲁泽尔斯基在研究匈牙利与反革命斗争的经验，这不错。

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波兰局势完全稳定的关键条件是经济的恢复。捷克斯洛伐克 1968 年以后政治上的复兴之所以很迅速，正是因为那里的反革命事实上没有触及这个领域。这里却相反。

因此，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在给波兰人援助方面已经处在我们的能力的边缘上了，可是他们却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或许不得不再做些努力，可是大量的援助，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然而，对雅鲁泽尔斯基的来函，当然要回复，同志式地向他解释我们不能办到什么，没有什么。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准确地坚持完成第一季度的发货计划，因为这对波兰人来说是最艰难的冬季月份。

政治威望性质的支援并不加剧我们的经济紧张，这则是另一码事。譬如说，在华沙地铁的修建中给予促进。对于这项要求应该予以呼应，把我们的参与公之于众。

顺便说一下，波兰人的食品状况并非无法解决。国内有足够的粮食，只是须要找到一条与农民沟通的途径，让他们发生兴趣，如我们从前所说的，搞好城乡结合。

波兰领导还继续指望从西方得到援助。好吧，我们原则上并不

反对，尽管说实在的，西方人能否从物质上援助军事政权，是很值得怀疑的。他们无疑将要一味强求让步，这里必须保持特殊的警惕。

雅鲁泽尔斯基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可否接受中国人的援助。说实在的，为什么不接受呢？在这种情况下，在经济援助上要把中国与美国分开。

归纳起来，可以说，波兰问题长时期内还将处于国际政治的中心。因此我们的波兰问题委员会还应该像以前一样，积极工作。

吉洪诺夫：关于修建地铁问题，部长会议已经准备好相应的建议，并且提交给了政治局。

契尔年科：关于我们参加华沙地铁修建的建议，由政治局表决。

苏斯洛夫：我认为与奇莱克的谈话是非常有益的。他本人得到了良好的印象，正确地认识了波兰的事态以及波兰领导面临的任

务。  
葛罗米柯：我跟波兰外交部长进行了详谈，我可以这样说，是进行了会谈。涉及了我们两国相互关系的许多方面。当然，重点是波兰目前的局势以及波苏关系。谈话是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奇莱克同志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我回答他说我们将认真研究。如吉洪诺夫同志所汇报的那样，参加地铁修建问题已经研究过了并且提交给了政治局审议。

乌斯季诺夫：奇莱克的确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同志与他的谈话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谈话过程中提出了所有的问题。

安德罗波夫：奇莱克同志一定会向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汇报他在这里进行谈话的过程，这将具有重大意义。

通过决定：

(1) 批准苏斯洛夫，尼·雅·和葛罗米柯，安·安·同志与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奇莱克同志的谈话。

(2) 责成苏共中央政治局波兰问题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研究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同志与奇莱克同志谈话与会谈中提出的问题，并且在准备好以后向苏共中央提交相应的建议。

### 三、沃·雅鲁泽尔斯基同志 1982 年 1 月 3 日来函

勃列日涅夫：我要求把此信分发。据我所知，吉洪诺夫同志已经指示相应的部委准备给雅鲁泽尔斯基的回信。

各位看到，雅鲁泽尔斯基在信中对苏联给予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兄弟般的援助深表感谢。与此同时，他要求苏联方面肯定两国就 1981~1985 年石油、汽油、石油制品供应计划协调备忘录规定的 1982 年发货量。1982 年度石油发货量保持 1300 万吨的水平，石油制品——293 万吨，确保 1982 年第一季度燃料供应的最大数量。

接着，雅鲁泽尔斯基通报了他请求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向波兰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特别是供应国内市场基本的农产品和工业品。

我们不只一次回到增加援助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数量问题上来。现在我提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想要交换一下意见。很显然，我们这一次也不能在一切方面都完全满足波兰的要求，须要设法给一些援助。因此，一方面，我要求受委托的那些同志尽快研究这些问题，向政治局提交相应的材料；另一方面，力求定下某些基本数据。

吉洪诺夫：当然，我们显然不得不再次研究能给波兰什么援助，尽管这也有困难。

巴伊巴科夫：列昂尼德·伊里奇，我想要提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关于增加石油发货问题。我仔细审查了我们所有的石油基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增加向波兰人民共和国提供燃料的数量。我觉得，给波兰供应足够数量的石油制品，他们可以靠着多给他们的那

一部分来渡过难关。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供应烤制面包用的粮食。波兰人民共和国有粮食。他们今年的收成并不坏，可是虽然有好的收成，储备却远远低于去年。

安德罗波夫：他们现在要求一定数量的粮食，是为了在第二季度归还。

苏斯洛夫：换句话说，他们不是要求追加粮食，而是答应以后归还。

契尔年科：说的是第一季度给波兰人50万吨，下个季度归还。

乌斯季诺夫：应该仔细地对待这项要求，研究一下是否有可能。

基里连科：目前他们当然很难从别的国家得到粮食，尽管从加拿大购买了一定数量的粮食。

勃列日涅夫：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通过如下决定：

责成苏联部长会议、苏联计划委员会和外贸部研究雅鲁泽尔斯基在信中提出的各项要求，考虑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意见，并且向苏共中央提交相应的建议。

通过建议。

#### 四、关于苏联和古巴就南非问题的磋商

勃列日涅夫：1982年1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与由古巴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X.里斯科特率领的古巴代表团就南非问题的第二次会晤。

古巴代表团团长通报说，古巴领导考虑了1981年12月初在莫斯科苏古会晤时提出的意见，修正了自己对待南非的立场。

古巴领导同意我们的观点，1982年1月举行苏美会晤时将涉及安哥拉有古巴军队驻扎以及可能削减其数量和撤出的条件问题。

里斯科特转交了就这个问题的长篇报告，这是与安哥拉领导商

议的，必要时可作为古巴的正式文献交给黑格。通报了与安哥拉人达成的一致意见，亦即就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问题将根据我们的精神发表一项声明。

声明拟于我们与黑格会晤之后发表。

里斯科特以古巴领导的名义对苏联在波兰事件上的立场给了很高评价。

苏斯洛夫：我看磋商是好的。

№06053

苏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与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总结的会议  
(1984年4月26日)

绝密  
仅此一份  
(工作记录)

主持人：契尔年科，康·乌·同志

出席者：盖·阿·阿利耶夫、维·伊·沃罗特尼科夫、米·谢·戈尔巴乔夫、安·安·葛罗米柯、格·瓦·罗曼诺夫、米·谢·索洛缅采夫、尼·亚·吉洪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彼·尼·杰米契夫、弗·伊·多尔吉赫、米·亚·波诺马廖夫、米·瓦·齐米亚宁、伊·瓦·卡皮托诺夫、康·维·鲁萨科夫、尼·伊·雷日科夫同志

一、关于1984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发展和努力执行年度计划的总结

契尔年科：我想没有必要证明，1984年度的计划执行情况决定着整个五年计划的成败。我甚至要说得更严重一些。今年的总结将为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也许甚至为更长远的前景打下基础。

政治局考虑到这一点，决定不像以前那样审查前半年国民经济工作的结果，而是审查第一季度的情况。

显然同志们都会同意，认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和及时的。

苏联部长会议详细地讨论了经济建设各主要部门的情况。相当详细地查清了苏联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部委在今年前三个月业务工作中的优点和缺点。

这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不必深入到细枝末节，而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sup>①</sup>

六、关于葛罗米柯，安·安·同志和乌斯季诺夫，德·费·同志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沃·雅鲁泽尔斯基的谈话总结

葛罗米柯：我们与雅鲁泽尔斯基谈话的记录已经分发给政治局的全体委员。我不准备详细地说明这次谈话的细枝末节，只想指出谈话具有坦率的性质。

雅鲁泽尔斯基向苏联领导人转达了致意，首先用了大约三个小时的时间向我们通报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局势。他在发言中谈到别的问题时指责苏联至今没有对波兰方面去年 9 月份就经济问题提出的建议做出答复。雅鲁泽尔斯基大谈特谈波兰经济发展中由于受到西方的压力和反革命势力的阴谋而遇到的各种困难。

应该注意雅鲁泽尔斯基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当代波兰社会中的地位的评价。雅鲁泽尔斯基承认，党在群众中还没有占据先锋队的地位，尽管波兰领导人，特别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更经常地努力到劳动集体中去会见工人、知识界和农民的代表。

雅鲁泽尔斯基介绍农业的状况时说，这里总体上一切正常。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提到把农村转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的任务，实际上也跟哥穆尔卡、盖莱克一样，认为在波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条件还没有成熟。

雅鲁泽尔斯基描述波兰天主教会时认为天主教会是同盟者，如今没有它就不可能向前进展。关于与天主教会的阴谋进行坚决斗争

<sup>①</sup> 所收集的档案文献以下缺 20 页。



的问题，只字未提。

这样一来，雅鲁泽尔斯基的路线首先就在于为波兰现在发生的事辩解。如我们的谈话所表明的，他对党在群众中的思想工作有着最一般、最不明确的解释。

至于国际事务，雅鲁泽尔斯基同志则持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与苏联的对外政策完全一致。尽管我们形成一种意见，认为波兰领导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与西方合作。

如果对谈话做个总结，那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对波兰形成的局势总体上还是满意的，看来他内心里同意这种现状。他从这种立场上评价了我们关于诸如拉科夫斯基和巴尔奇科夫斯基这些众所周知的持有右倾立场的波兰领导人的意见。

我们受政治局的委托，向雅鲁泽尔斯基说明，特别引起我们不安的是努力加强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波兰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的工作向前进展不大。实际上这里的天主教会已经变成了站在反对国家的立场上的政党。我们提醒雅鲁泽尔斯基注意在选拔和配备干部、彻底贯彻党的决议方面的缺点。从雅鲁泽尔斯基对我们这些意见的答复中，感觉不到他对党在群众中的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总体上来看，如果可以这么说，党的建设问题并不符合他心意；他更关心的是在波兰加强总统的权力。

我们与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时特别谈了经济问题，指出经济机构的中心环节在一系列情况下阻碍波苏经济关系的发展，继续观望西方。雅鲁泽尔斯基承认是这样，可是他却说，波兰统一工人党正在与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评价农业状况时，我们直截了当地对雅鲁泽尔斯基说，波兰农业居民进一步分化事实上是非常明显的。假如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党实际上或迟或早就得与富农一起走上社会主义。诚然，雅鲁泽尔斯基宣布说，波兰并没有富农，尽管大家都知道，国内有不少

农户占有经营的土地达 100 公顷，他们积极利用雇佣劳动。雅鲁泽尔斯基说，波兰领导“在非常小的范围内非常秘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可是却没有说波兰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得出了哪些结论。因此在农村发展私人经济、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富农经济的路线事实上是显而易见的。

吉洪诺夫：而在这之后，他们却向我们要求粮食。

葛罗米柯：我们告诉雅鲁泽尔斯基，只要波兰统一工人党不进行积极的思想工作，特别是与天主教教会斗争失利，苏联就不可能不产生担心。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千百万人跪倒在罗马教皇的面前。然而，谈话表明，波兰领导人在这方面没有积极的纲领，对摆在党面前的任务缺少明确的理解。

总体来说，我们的结论是：雅鲁泽尔斯基目前没有成熟到在政治上发生根本转变的程度。得多多做他的工作，我们应该经常不断地对他施加影响。

与此同时，与雅鲁泽尔斯基进行的谈话，大大减轻了康·乌·契尔年科在雅鲁泽尔斯基即将访问苏联期间会见他的困难。

我们在谈话结束时问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他对我们的想法是否有不同意之处。雅鲁泽尔斯基回答说，他没有发现有这种论点，只是希望对某些要点再做些解释和确切的说明。

乌斯季诺夫：安·安·葛罗米柯在这里详细地阐明了我们与雅鲁泽尔斯基谈话的基本要点。我产生了一种意见，觉得他对我们当然没有完全坦诚相待。我们的谈话总共进行了九个小时。谈话表明，雅鲁泽尔斯基对目前波兰的局势总体上是满意的。他与地方党组织和工人集体的联系很薄弱，不懂得加强基层党支部的任务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不得不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波兰现在没有一个真正坚强的党。众所周知，近年来波兰统一工人党退党的党员已达一百多万人。现在党内剩下的大约有二百万党员，而且其中大部分表现得

相当消极。我们跟雅鲁泽尔斯基就青年问题谈了很多。特别让人不安的是，如果可以这么说，有百分之百的“团结”工会的子弟在波兰军队中服役。军事学校的学员有25%是没有经过挑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对雅鲁泽尔斯基说，他们对青年、共青团的工作做得很不好（大家都知道，波兰存在着四个青年组织）。他不得不承认对青年，特别是在高等学校里缺乏有成效的工作。因此我认为我们须要更积极地向波兰派遣我们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和共产主义者，而且要对我们那些到波兰去的同志认真进行培训。

还不得不向雅鲁泽尔斯基指出党在波兰工会中工作的薄弱。大家都知道，在事件发生之前，工会会员有1200多万工人和职员。而现在波兰工会只剩下4百多万会员了。况且工会组织的工作异常薄弱。

**吉洪诺夫：**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对待波兰方面应该采取哪些步骤。

**乌斯季诺夫：**我们在报告中已经提出了我们的一些建议。但我认为雅鲁泽尔斯基到达这里以后还会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经济性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再次向他提出与加强党在波兰社会中的作用、加强与天主教教会斗争、巩固与青年以及波兰社会其他阶层的联系相关的问题。简而言之，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做波兰领导人的工作。与此同时，还要更积极地援助，因为波兰靠着自身的力量不可能走出目前业已形成的处境。

**葛罗米柯：**尽管雅鲁泽尔斯基也认为他们到2000年初能够还清西方的债务。

**鲁萨科夫：**我认为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同志详细而正确地说明了波兰的局势。应该考虑到波兰虽然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从来都不曾是这个词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我们在干部方面总体上来看做了正确的挑选。在目前的

形势下，雅鲁泽尔斯基还是这个国家惟一能接受的领导人选。

我觉得，我们的同志给波兰领导人提出了所有的最重要的问题。雅鲁泽尔斯基需要工作，而且需要顽强地工作。在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莫斯科前夕，苏共中央政治局两位最有权威的委员与波兰领导人进行了预备性的谈话，这是非常重要和非常需要的步骤。

戈尔巴乔夫：的确如此，这是我们很有远见卓识的一步。重要的是这次谈话是在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莫斯科前夕进行的。因此，我觉得，可以批准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两位同志进行的谈话总结。我仔细地熟悉了这次谈话一百多页的记录。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雅鲁泽尔斯基无疑想把局势说得比实际情况好一些。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向雅鲁泽尔斯基解释清、分析透，他是否愿意在波兰有一个多元化的局面。同时也显而易见，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局面日趋尖锐，首先是国家政权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日趋尖锐。这是事实，不久前在格但斯克一家造船厂，有 1200 多人退出波兰统一工人党。这说明，波兰的领导没有做好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形式主义地对待他们。因此毫无疑问，今年 5 月份我们的代表团将与雅鲁泽尔斯基举行会谈，担负着重大而复杂的任务。我们在这次会谈的进程中应该积极地贯彻政治局所确定的路线。

切布里科夫：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和有益的谈话。根据我们现有的材料，波兰的反革命现在企图在两个方面进行活动：首先，积极地准备在近期内制造组织上的混乱。其次，准备宣布抵制今年年中将要举行的地方国家机关选举。上述几点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心中有数。

契尔年科：首先应该说，会晤是非常及时的和有益的。

我们的确不能不为波兰的事件感到不安。这些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民族的范围，涉及到整个社会主义的合作，对于我们的安全具有最直接的关系。

让我们不安的是：尽管在政治局势中有一定的正面进展，但反革命势力继续行动，天主教教会煽动和联合社会主义的敌人以及对现行制度不满的分子进行进攻。当然，波兰困难的经济状况、工人阶级中日益增长的消极情绪、私有者不断加强的阵地也让我们不安。但主要的——引起我们严重关注的是党本身的状况。波兰统一工人党一直还没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恢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队伍的统一。它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进程不能完全给以必要的影响。总之，如雅鲁泽尔斯基所承认的，不能履行自己的领导作用。

波兰的同志们告诉我们，经济工作和党的工作领域里这些或那些缺点、对天主教教会和私有者的让步，只是一种策略，而战略路线则像从前一样，仍然是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的路线。可是不管怎么样，出于策略的考虑而交出某些阵地，却没能摆脱困境，没能实现战略构想。

这一切都是与雅鲁泽尔斯基会晤时说的。我们当然信任他、支持他。可是我们应该继续对他施加影响，帮助他找到比较正确的决策，以便在波兰的土地上巩固社会主义。

此外，可以责成苏共中央政治局波兰问题委员会考虑到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同志谈话的总结以及今天交换的意见，准备向苏共中央提交一份综合材料，内容包括当前波兰人民共和国形成的局面和关于苏联方面与此相关的步骤的建议。

还有一点。我们应该认真地准备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会晤。要不惜一切力量来推动事情的进展，促进波兰领导人、波兰共产党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工作的积极性。这也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志们，我想问题总体上是明确的。就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表述决定的草案。

**全体政治局委员：**可以。

通过决定。

七、关于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兰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部部长 Ф. 西维茨基同志的谈话总结

乌斯季诺夫：关于与波兰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部部长西维茨基同志的谈话总结，我只想指出一点，西维茨基总体上来看是个忠诚于我们的人，对波兰的局势有很好的理解。可是与他谈话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与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谈话中感觉到的那些问题。这就是波兰经济发展、党在青年运动中工作薄弱、与天主教教会缺少实际的斗争等问题。西维茨基同志在基辅访问了我们的军事学校和队部。我们给他提出的问题中一个主要的，——就是波兰必须购买我们新式的军事技术。这时，波兰同志借口说没有钱。我们不得不劝说他们实际上没有别的出路，惟有购买他们所没有的苏联的新技术。我们还强调，保卫社会主义合作的龙头落到苏联身上，正是苏联手里掌握着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核保护伞。我认为从总体上来看，西维茨基同志之行是我们准备雅鲁泽尔斯基访问的一部分，雅鲁泽尔斯基的访问将在今年 5 月进行。

契尔年科：我认为可以批准对波兰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部部长访问苏联的总结。

## 【专题说明】

# 关于改进劳动组织和加强 劳动纪律的决定

(1980年10月)

针对80年代初苏联许多工业、建筑和交通运输等国营企业中职工表现出来的不满情绪，苏共中央分析后认为，造成这些消极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执行合理的生产定额和劳动报酬定额；劳动组织和生产条件不佳；管理者对劳动者的申诉和抱怨采取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等等。为此，苏共中央做出了改进劳动组织工作的决定。本专题收入的两份档案文件反映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张环海翻译)

№06140

##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改进劳动组织工作的决定

(1980年10月15日)

绝密

第233号

### 关于因职工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中的 缺点而产生的一些消极现象

1. 近来在一些工业、建筑、运输业中发生了职工停工及其他一些消极现象，原因是领导人没有执行修订的劳动定额和劳动报酬，劳动组织中有缺点，劳动条件差，以及对劳动者的意见和申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态度。

2. 苏共中央责成中央各部门会同有关部和主管部门、党、苏维埃、工会机关采取全面措施，消除上述缺点。加强对企业和组织按集体合同遵守劳动法规和履行行政义务的监督；注意整顿劳动定额、劳动报酬和劳动组织方面的秩序；创造标准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工会在这些方面的作用和责任心；严惩对劳动者的意见、建议、请求漠不关心，拖拉、不予解决的干部；采取措施，改进劳动集体的教育工作，在与行政发生分歧时要解释法规规定的职工的权利。

表决结果 1980年10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

中央书记 M.A. 苏斯洛夫

同意



К.У. 契尔年科	同意
М.С. 戈尔巴乔夫	同意
Б.Н. 波诺马廖夫	同意
И.В. 卡皮托诺夫	同意
В.И. 多尔基赫	同意
М.В. 齐米亚宁	同意
К.В. 鲁萨科夫	同意

机密

第233号决定附件

### 关于因违反职工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条件 而产生的一些消极现象

根据委托，苏共中央各部门分析了中央委员会收到的关于一些企业工人和行政领导之间发生的误解和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停工和其他消极现象的报告。

我们认为必须报告的是，类似的消极现象近来又有所增加，这使我们非常担心。分析表明，其中绝大多数和违反修订的劳动定额、劳动报酬、不合理的工资（特别是奖金）提成和不及时发放、劳动条件恶劣、对劳动者的申诉漠不关心有关。

在这方面有的情况很典型，比如，斯维尔德洛夫州下伊谢特金属构件厂就是这样。这里工厂行政领导和工会工厂委员会已批准了奖励条例并实行了一个时期。条例规定，如果一个车间未完成生产计划，那么车间全体人员都无权受奖。在工厂生产进行顺利时，没

## 关于改进劳动组织和加强劳动纪律的决定

有出现任何问题。今年 8 月，有一个车间第一次没有完成产品生产任务。该车间有 100 多人，大部分劳动者是合同工，每个合同工都超额完成了本人的月份任务。车间主任要求厂长给合同工发 8 月份奖金，但厂长根据现行奖励条例拒绝了他的要求。工人对这样的决定不满，要求重新研究奖励条例。工厂行政领导和工会工厂委员会拒绝这样做。第二天，两个作业班的 57 名工人没有上班。后来召开工厂工会委员会、厂长办公室和党支部联合会议，决定同意提出的要求，对奖励条例作相应的修改。

类似情况在立陶宛阿利图斯棉纺厂也有发生。那里没有明确的劳动质量指标考核制度，所以织布工人 8 月份的平均工资由 171 卢布降到 134 卢布。这种情况的原因未向劳动者解释，工厂行政领导和工会组织都未深入研究问题的实质。只是在 9 月 5 日和 8 日有 116 名纺织工人拒绝上班以后才开始实行劳动报酬制度。

在兹拉托乌斯特市奥尔忠尼启泽厂机工段，车里雅宾斯克州南乌拉尔交通建设托拉斯第 156 火车制造装配厂、乌克兰乌曼农业机械化及兹多尔布诺夫机械修理厂、阿什哈巴德第 20 儿童用品厂、爱沙尼亚塔尔图农机维修厂等单位，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都是严重违反劳动报酬制度，拖欠工资，而且不认真解决问题。

有些冲突的原因，是企业行政领导和工会委员会不研究解决工人对恶劣的劳动条件的申诉，修改劳动定额不经集体讨论，修改职工劳动和休息制度也不经集体讨论，还秘密地解决其他问题。

由于改变铸件工段计划工资额，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卡拉恰耶夫铸件厂 42 名铸件工人在 9 月 18 日没有上班。由于未做应有的准备，未在工人大会上进行讨论就实行新的劳动报酬条件，马哈奇卡尔市选矿机厂有 25 名电钳工拒绝上班。在车里雅宾斯克州科佩伊斯机械制造厂和叶曼热林斯克汽车厂，由于破坏了劳动和休息制度，有的工人拒绝上班。

近来，有关这类问题的申诉（包括集体的）越来越多。其中一些申诉在当地得不到及时而圆满的解决。比如，陶里亚蒂市伏尔加汽车制造厂铝铸车间大部分工人对劳动组织中和劳动定额中的缺点的申诉，在中央出版局和部直接干预后才得到解决。

在一些经常缺少原料和配件的企业，人的工作十分难做。

比如，伏罗希洛夫内燃机车制造厂轧钢车间自9月3日到9月10日停工，全体570名工人都给公共设施部门和建筑一维修部门干活去了。基辅州瓦西里科夫冰箱厂由于没有聚苯乙烯，自8月5日至9月末实际上停止了生产。

就所出现的这些消极现象有关党市委和州委对工人不满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制定了消除缺点的措施。责成对工作和劳动者的申诉犯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的领导人承担党和行政的责任，并采取措施提高这些单位的教育工作水平，加强劳动生产纪律。

苏共中央各部门加强对各部、主管部门、地方党、苏维埃和工会机关实施与消除消极现象有关的措施的监督，要求各单位领导人积极而灵活地管理所属企业，严格遵守劳动法规，改进对人的教育工作，提高警惕。

同时我们向苏共中央报告一些与上述现象有直接关系的普遍性问题。

必须根本改善各企业和单位完成集体合同工作。去年，约50万条合同中规定的义务和措施没有完成。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这占总数的5.4%，而在农业部门中占9.8%，在煤炭工业中占7.6%，在建筑业中占6.2%。未完成的措施中差不多有一半和劳动组织、劳动报酬有关；劳动保护占21%，住房和生活条件占13.7%。

我们认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会部门委员会、工会委员会，以及部和主管部门都要过问各企业和联合体完成集体合同，遵守修改定额规定办法等情况。

## 关于改进劳动组织和加强劳动纪律的决定

---

其次，要特别注意必须严格限制在工业、建筑交通部门加班工作、休息日工作。

去年，工业部门平均一个工人加班工作 17.1 小时，建筑部门 19 小时；工业部门平均一个工人节假日工作 2 天，建筑部门 2.5 天。在煤炭工业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大部分休息日被宣布为工作日。比如在克麦罗沃州的矿井，今年 7 个月中按日历有 30 个星期日，平均有 26~28 个被占用。在汽车工业、运输业和农业机器制造业、食品业、森林和木材加工业各企业中也有许多违反规定的情况。

以下问题也值得注意。在许多企业近来广泛推行职工对劳动纪律和社会秩序集体承担物质责任的制度，实质在于由班、组、车间集体承担这样的义务。即：如果班组或车间里某人违反了劳动纪律或社会秩序，职工就不能得到劳动报酬制度规定的奖金。比如今年仅一个下德聂波罗钢管厂，就有 600 名勤恳劳动、没有违反社会秩序的工人因此没有得到奖金。这种义务和与此有关的奖励制度简直是和劳动法规、社会主义按劳付酬原则相矛盾。上述办法在劳动者中不受欢迎，所以未必值得推广和支持。

1979 年一共近 300 次 9000 多人拒绝上班。今年上半年和七、八月份有 22 次 2206 人拒绝上班。不能不指出，近几周来拒不上班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在许多地方拒不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不仅限于一个班次，而是延续到以下的班次，人数相当多。比如北方镍联合体自 10 月 10 日到 12 日，在电解车间的三个班次中有 120 名工人没有从电解槽里采掘金属。苏共中央各部门应就涉及的问题向部、主管部门、地方党、苏维埃、工会机关提出相应的建议。

И. 卡皮托诺夫

В. 多尔基赫

1980 年 10 月 15 日

№06098

## 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劳动组织和 劳动纪律工作的指示

(1980年10月24日)

绝密

№СГ - 233 / 8c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第233/8c记录摘抄

**关于与职工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中的缺点有关系的某些消极现象**

1. 最近在许多工业、建筑和交通运输等企业中存在着个别职工逃工和其他一些消极现象。这些都是下述原因所造成的恶果：不遵守已规定的修改生产定额和劳动报酬定额办法；在劳动组织中有缺点；生产条件不好以及官员们对劳动者的申诉和抱怨所采取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附有记录）。

2. 苏联共产党中央责成中央各部门，会同有关各部和主管部门、党、苏维埃、工会组织采取一些全面措施消除上面所指出的缺点。根据集体合同不断对企业和单位遵守劳动法令与履行行政义务加强监督，应特别注意在修改生产定额和劳动报酬定额以及正确组织劳动等问题上实施合适的办法，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创造正常的生

## 关于改进劳动组织和加强劳动纪律的决定

---

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工会在这些方面问题上的作用和责任。对劳动者提出的申诉、请求和建议的态度表现漫不经心，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表现出因循拖拉的官僚主义的那些工作人员应严加处分。应采取措施改善劳动集体中的教育工作，当同行政当局发生分歧时，应用法律解释规定的职工权利。

中央委员会书记

分送给：契尔年科，佩尔谢，波诺马廖夫，卡皮托诺夫，多尔吉赫，鲁萨科夫，戈斯捷夫，德米特里耶夫，扎米亚京，卡布科夫，卡尔洛夫，科斯托夫，莫恰林，帕夫洛夫，别哥夫，萨温金，萨赫纽克，谢尔宾，西佐夫，西蒙诺夫，特拉佩兹尼科夫，恰热利尼科夫，弗罗洛夫，绍罗，雅科夫列夫，博戈柳博夫。

## 【专题说明】

# 苏联的生态环境问题

(1989年12月至1991年8月)

苏联的领土面积有2240万余平方公里，其中森林面积约738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全国领土的1/3是被森林覆盖的。苏联的人口为26800万余。自然环境是非常优越的。但是，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的破坏，水、空气的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的生存，也尖锐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苏联是世界上和美国对抗的两个核巨头之一，但是这也恰恰成了严重威胁苏联自身的污染源：核废料的堆放，报废的核潜艇、核战舰，更不必说像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了。苏联的科学界在大声疾呼，包括剧变后的俄罗斯联邦，因为没有多少钱投入，他们自己也说：无法解决过去已经存在的和新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本专题文件共4份。作为附录，本专题收入了关于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一份材料。瓦·阿·列加索夫是苏联无机化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直接参加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他的谈话记录反映了处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过程中的一些真实情况；对造成这次悲剧的原因也作了如实的阐述。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贾永宁、沈友泰翻译)

No03712

## 关于苏联全国生态环境的报告（摘录）

（1989年12月）

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如此程度，几乎可以把行星周围所有的东西引入生产过程中。这时工业国遇到的难题就是周围环境严重恶化和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损耗。

生态问题是一个区域性、局部性和全球性的问题，在我国也不例外。在苏联的许多城市、工业中心和许多区域，这些问题现在非常严重。不但如此，这些问题从客观上讲是整个不良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个环境是在改革之初就已形成，不可能马上与其他严重的问题孤立起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复杂严重的时期就摆在我们的社会面前。

……我国的生态环境不能单一地进行评价：在一些地区正在好转，而在其他地区则正在恶化。生态问题在许多区域变得更加尖锐，像在咸海、里海水域和伏尔加河流域。

### 一、空 气

苏联国家自然资源委员会的部门负责监督执行废弃物标准，而环境质量监控则由苏联国家水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有关部门负责进行。

目前对8种不同物质的密度在每个城市都进行系统测量，并监测空气中80种物质的含量。现在有53座城市的1167个常设点在



观察大气的污染程度。

其中大部分观察点（423个）是一昼夜固定观察3~4次。每个城市都设有1~10个观测点（莫斯科有23个），观测点的多少取决于城市大小和工业发展程度。

各种杂质的平均浓度可以说明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情况。

我国每个城市平均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二氧化氮和硫化氢的浓度均在卫生标准要求的范围内。但灰尘、本酚、氨气、二氧化碳的浓度则超过标准，二硫化碳、苯嵌二茶和甲醛为3~4个标准额度。

7%城市的一氧化氮和8%城市的二氧化氮的平均浓度超过标准。城市大气污染问题基本上是由于氨气、苯嵌二茶、一硫化碳、甲醛和其他有害物质的含量过高造成的。……

## 二、水

水资源是周围环境中易受损害的组成部分，随时经受着人为的影响。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伴随的不久是用水量的急增，而且使产生的废水明显增多。同时由于像化学工业、石化工业、采矿业、纸浆造纸业等工业领域的快速增加使污水的成分更加恶化。排放到水利工程中去的受污染的废水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1998年向水利工程排放的废水、管道排放的污水和其他水达到15.24立方米，其中来自工业部门的（包括热力工程的）为7.94立方米，农业部门的为5.27万立方米，公用事业的为1.96立方米，其他领域的为7百立方米。

从1987年开始，根据有序计算，统计排入水利工程的污水有所增加，在1988年达到2.8万立方米。废水变成污水没有增加水利工程的压力，但却需要增加大量资金来净化这些水。

陆地表层水的污染程度通过物理、化学和水生生物指数在 2206 个水利工程上进行监控。这些地方有 3173 个观察点。在水生化学实验室可测定 106 项水质指数，其中包括约 40 种特殊的污染物质。

在苏联领土上受污染最严重的水域是西布格河，德涅斯特河、多瑙河、顿河、萨哈林河、科拉半岛的河流和湖泊，以及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在这些水域中，许多污染物的浓度严重超标（超出 10 个极限容许浓度）。

在庫班河水域石油产品和铜中盐的含量超出容许极限的 4~6 倍。在伏尔加河中游苯酚和石油产品的含量为 8~9 个极限容许浓度，氮和铜合在一起的含量为 3~4 个极限容许浓度，在下游地区由于受铜中盐的污染，水质达到 7~15 个极限容许浓度。

1988 年西德维纳河水域（根据所有的成分），额尔齐斯河（受石炭酸、锌中含的盐铬和铅的影响）、伏尔加河（受石炭酸、斯钨夫和镍中所含盐的影响），同样在科拉半岛上的河流和湖泊（受石油产品、氨氮和镍中所含盐的影响）的污染程度有所减弱。

### 三、土地

土地资源的情况令人非常担忧。在国家领土上到处可以看到土地的天然肥力下降和土壤退化，这是由于侵蚀、盐碱化和技术负荷的影响。在农业用地中有 157 百万公顷的土地全部盐碱化，113 百万公顷的土地被侵蚀，62 百万公顷多土地和 25 百万公顷过分潮湿和沼泽化的土地。饲料地中有 12 百万公顷的土地灌木丛生和林林化，460 万公顷的土地被草丘覆盖。仅仅由于侵蚀每年肥土地就要

减少人均 15 亿吨<sup>①</sup>。同时流失的营养物质超过了他们从肥料中获取的营养物质的 0.5~1 倍。

有肥力的土壤还在减少。最近 25 年内土壤中腐殖质的含量就全国来讲平均减少了 0.4%。只有在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加盟共和国和乌克兰及俄联邦的有些地区，腐植质才保持无亏损的平衡。土壤中缺少磷、钾、钙和其他成分。

土壤中肥力的下降是农业产出减少的主要原因。从 1965 年开始农业的固定基金增加了大约 4 倍，而农药的使用量增加了 3.5 倍，可浇灌和可排水的土地增加了 1.5 倍。而植物栽培的总产值总共才增加了 20%。

在最近 20 年内由于侵蚀和沙漠化过程使得大约六百万公顷的农业用地不能使用；因兴建水利设施开始淹掉和已淹掉的农业用地达三百万公顷。

从 1968 年开始建造了大约六百万公顷的防护林带并耗资 19 亿卢布修建了防侵蚀的水利设施，在十万公顷面积的陡坡上修建梯田，增加了许多防止侵蚀的农业技术措施。所有这些可使一些地区的土壤免遭尘暴的破坏和流水的冲刷。

那时，农业和国民经济领域的集约化的最后几处，使得防止土壤侵蚀的问题更加突出。在陡坡为 1 度的坡上 243 百万公顷的农业用地上的雪水和雨水的表面流量每年大约为七百亿到九百亿立方米，与此同时每年流失的肥沃土壤为 15 亿吨。

在很大一部分土地上堆满工业废料、生活垃圾、农业及其他种类废物，从而引起农业产品的收成减少和质量下降。……

---

<sup>①</sup> 原文如此，恐有误；不是每年人均，而是每年。本文后面说是每处流失沃土 15 亿吨。

## 环境质量和居民健康

目前，经济活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大气中排放废气；用水增加，排放受污染的废水及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滥用。虽然减少废气排放的措施已取得一定的效果，许多种类产品的原料和动力资源的单位耗量也在减少，但排放污染物质的总量还是很大。根据苏联国家统计局委员会的数据，1988年从固定源头向大气中排放了大约6200万吨污染物质。

由于汽车运输排放的尾气达到大约3600万吨，这使得许多大城市的大气污染受一氧化碳、一氧化氮和碳氢化合物的影响而加了很多。汽车运输尾气污染物质排放绝对量最多的城市有莫斯科（多于84万吨/年）、列宁格勒（大约37万吨/年）、塔什干（31万吨/年）、哈尔科夫、阿拉木图、埃里温、第比利斯、巴库（每年从15万吨到30万吨）。

1988年往国家水域中排放的污染物质连同受污染的废水超过3000万吨，其中有1500万吨氯化物，1100万吨硫酸盐，175.2万吨有机物，209万吨悬浮物，23500吨CIIAB，57500吨石油产品，82吨杀虫剂和其他物质。

№03713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基洛夫格勒市  
保护生态环境倡议小组  
致科尔巴科夫的公开信

(1990年1月18日)

尊敬的谢拉菲姆·瓦西里耶维奇<sup>①</sup>！

我们寄给各机关、部委和您本人的信件、电报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因此，我们决定通过报纸向您汇报。我们要谈的问题是，我市的生态环境非常糟糕。每年炼铜厂和铁合金厂向城市排放大约87000吨有害物质，每个居民按“风图”<sup>②</sup>来计算会受到1吨有害物质的损害。这些物质有二氧化硫、硫酐气、含铅的悬浮粒气体等。

除此之外，还要定期向“风图的每束射线”上排放20种剧毒物，这是从被称作废热利用的再生原料中炼铜时排出的。废热利用就是将用过的电缆作为再生原料回到工厂进行燃烧。绝缘外壳烧完后，剩下的就是铜。这样做就向大气中排放漂浮的石炭酸、氯化氢和其他东西。极限容许浓度的超出值结果简直是荒诞——从20倍到750倍！

所有这些化学物质都被吸入我们的肺部和渗到土壤中。实验结果显示，我们的菜园和公共花园的土壤中有砷、锌、铜和其他物

---

① 谢·瓦·科尔巴科夫，时任苏联冶金部部长。

② 根据多年观测绘制的表示某地风况的矢量图。

质。长在这里的蔬菜和水果简直不能吃。

根据……1989年死去的11个新生婴儿中，有9个死于呼吸器官疾病。在第11个五年计划和第12个五年计划的年份内，新生婴儿由于体质恶化使发病率增加了50%。我们这里的职业病多年内一直未下降，发病率很高，比情况不太好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平均数还高。……

化学产品生产是工厂生产的一部分。根据上级命令生产氨基磺酸。这是各种药制剂的一种成分。以前由部属企业独立生产，以后与纯机械化的生产联合体合并，化学品生产怎么也不能与铜的生产发生关系。

但现在它像是成了一个“弃儿”，联合体和冶金部都不想要。许多年来既没有改建过车间，也没改造过生产酸的能力。那里都是侵蚀性物质。不仅仅侵蚀设备，就连厂房也快轰隆一声倒塌了。不仅仅使砌的砖受到破坏，就连大楼的承力骨架的金属结构也受到威胁。

区流行病预防站，市执行委员会和其他部门不止一次决定停止化学品生产。但在部委的压力下，这些决定始终未被执行。……

10月25日，这一次又有2吨的氯化氢使工人中毒。他们不得不从烟气弥漫的地方撤离。10月27日我们惊讶地在听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电视台荧屏上正在播放的B.马萨尼克发来的电报。电报证实氨基磺酸的生产没有任何生态方面的危险，所以城市自然保护委员会的恐慌是多余的。

这种“游戏”只能激怒人们。像在过去那种令人窒息的年代里一样，又试图用欺骗社会舆论的伎俩掩盖实际情况。如果州里其他城市的居民还能相信厂长的电报的话，那我们是决不会受骗的……

仅仅因为七月份一个月的排放物就有大约90公顷的森林遭到毁灭。花园和菜园的损失达30万卢布。没有人计算过人们由于这

些排放物中毒使健康遭到多么严重的损害，而这是任何金钱也赔偿不了的。

尊敬的部长同志，市民们在急切地等待着这封信的答复。但光给回答是不够的。承诺和号召“再忍耐一下”，我们已经听够了。必须在最短的期限内解决问题。因为我市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正在危及到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决不允许对此不予置理，否则就是犯罪。

No 03714

## 苏联关于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 计划及远景目标（摘录）

（1990年12月）

### 《苏联关于1991~1995年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的计划及到2005年的远景目标》

#### 前 言

保持国家经济和社会稳步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然环境状态和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有关。因此苏联政府将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列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在1976~1988年期间由于采取一些措施从而使从固定源头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质大约减少了15%。循环水和重复使用的水增加了14.4万立方米。目前每年所节约的、从天然水源中汲取的纯净水超过27.4万立方米，从而使伏尔加河的年均流量增加。复耕土地的工作量也在增加，从而使土地保护网络也随之得到扩大。包括300亿卢布投资在内的、用于保护环境的所有费用超过1000亿卢布。

但是对环保活动及自然环境的现状分析结果表明：国内生态环境并没有实际的好转。

在持续发展和配置生产力时，如不对生态因素做应有的研究和考虑，势必对将来的国内生态、经济和社会政治形势产生严峻影



响。

在国家规划的基础上，还应制定相应的各共和国、大区、边疆区、州和城市的环保计划以及各部门和企业的规划。

规划草案应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自然环境问题委员会会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院、卫生部和各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共同制定，并提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事先进行审议。

### 第一章 国内自然环境的现状

那些有害于人体健康，对动、植物界同样也有很大危害的物质，其对大气层、水和土壤的污染成为当今环境诸问题中最为尖锐、迫切的问题。

大气的主要污染源是工业和交通业，他们每年向空中排放约1亿吨有害物质。近三年来已在国内一百多个城市发现浓度最大值一次超标10倍的物质。其中浓度超标最严重的城市集中在乌克兰的顿涅茨克—第聂伯河沿岸地区、乌拉尔地区、库兹巴斯、外高加索及哈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在这一名单中还包括一些大型工业中心，如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列兹尼基、伏尔加格勒、顿涅茨克、杜尚别、埃里温、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克麦罗沃、古比雪夫、新库兹涅茨克、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塔什干和哈巴罗夫斯克等等。

近年来大气层受到极度污染的趋势日渐严重。国内现有近70座城市发现大气层不断受到严重污染，而其中30座城市近五年来每年都时有发生。……

每年有1500多亿立方米工业废水及城市污水排入国家的水域，伴随他们一起排入的还有3000多万吨污染物。

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是：多瑙河、西布格河、北顿涅茨河、托姆河、乌拉尔地区中部诸河、哈萨克东部地区、萨哈林岛等地的河

流及科拉半岛西部的河流与湖泊，以及伏尔加河与阿穆尔河下游。许多内陆水域受到生物物质、矿物肥料以及杀虫剂的污染。有害物质严重超标的水域有以下地区：土库曼、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大量水域、摩尔多瓦共和国、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国内其他一些地区。

在黑海、鄂毕—额尔齐斯河流域和亚马尔半岛进行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及开发活动，导致这些极为重要的渔业水域遭受到石油产品的大量污染。在现今环保措施所能达到的条件下，在沿里海海域进行的石油、天然气开发，只会造成对伏尔加河下游及里海北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散漂流送木材对水域生态系统造成了负面影响。

锡尔河和阿穆尔河的水几乎全部规划用来灌溉田地，但同样也遭受到严重污染。咸海的水位较 60 年代初下降了 14 米。这使得它的渔业大受损失。那里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破坏殆尽。

库班河、顿河、乌拉尔河、捷列克河、库拉河以及其他一些河游水的净消耗量已超出生态安全线。而贝尔湖、巴尔喀什湖、拉多加湖和其他许多大湖的状况也一直令人担忧。

苏联各大海域的生态系统由于不堪日益增强的人类活动重负，正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破坏最为严重的海域是：黑海西北部、亚速海、里海的巴库湾、芬兰湾和波罗的海的涅瓦河口。

巴伦支海由于长年大面积无节制的过度捕捞，使当地鱼类资源遭受破坏。

现在有 4 亿公顷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土地遭受侵蚀，有 1.57 亿公顷的适耕地被污染，3600 万公顷土地过度湿化或沼泽化，6800 万公顷土地酸度超标。兴建水库占用了 700 万公顷河滩地。近 15 年来国内各大区土壤中腐殖质损失 8~40% 不等。有 1.87 亿公顷耕地土壤使用过度，5000~5500 公顷的耕地被杀虫剂所污染。土地退耕改作其他农业用途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矿产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总体利用水平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仅在1988~1989年间开采损失为：煤-1.89亿吨，铁矿石-4900万吨，磷灰石-740万吨，磷钙矿石-330万吨，钾盐-1.38亿吨。迄今为止已有500多亿吨的矿石在矿井废石场上与选矿残渣堆积一起，未被利用。

每年都会产生大约3000万吨有毒工业废料和5700万吨生活垃圾，而其中被回收利用的仅占很小的一部分。

国内森林资源使用不尽合理。森林采伐所使用的重机器并不适应当代生态环境的要求。在森林采伐和加工过程中大量木材被浪费，而在广大地区乔木林的更新并不理想，每年记载的森林火灾有1万~3万次，其面积达50万~210万公顷。有100万~200万公顷面积森林有严重的病虫害。有100万公顷的森林因工业企业的废料而受害。因过火而致树木死亡的森林面积达3000万公顷。

对动物界进行的保护不容乐观。野生运动自然栖息地日益严重地遭受破坏，这导致动物种类减少，自然生物圈被破坏，动物总数量锐减。

许多植物种类也逐渐消失了。

许多休闲、疗养地区和水域，由于缺乏应有的保护，已经在逐渐退化和失去医疗保健的功能。

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相当部分的地区都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而受害。除了核电站附近的主要近源地带外，还在莫吉廖夫州、戈梅利州、布良斯克州、基辅州和日托米尔州，都发现高度放射性物质污染。

由于在国民经济中对电离辐射源和放射物质使用情况缺乏完善的统计和监督体系，以及这些放射物质在国土上的违规存放，从而出现了危险的放射源。

自然环境遭受污染已经成为影响人们健康乃至影响寿命的最重

要因素，同时它还加剧了对遗传变异的危害。

全世界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使得有机燃料大规模地广泛应用，规模已开始严重地影响到全球气候。气候的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着农业，而且影响到许多经济部门——能源、水资源和森林工业，建筑业和交通业。它进而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影响整个自然环境。

生态局势最为严重的地区有：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波及地带、咸海沿岸地区、顿涅茨克沿第聂伯河区域、黑海和亚速海的西北部、里海沿岸地带，尤其是：伏尔加河下游、黑土地区和基兹利亚尔牧场、库兹巴斯、巴伦支海和北极地带的一些区域、波罗的海流域、中乌拉尔和南乌拉尔以及哈萨克斯坦东部。其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区和咸海沿岸地区则属于生态灾难地带。

## 第二章 苏联在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战略目标和任务

苏联国家在环保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战略目标是：

维护有利于健康的安全生态环境，以保证全国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

保证合理地、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以利于国内社会经济稳定与有效发展；

保持对可再生性自然资源利用和再造的平衡，合理消耗再生性自然资源并广泛回收生产废料；

保持地方性、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生物圈平衡；

保护好大自然界的遗传储备，物种和地理景观的多样性，保护好农村地区和城市中的风景建筑特色，并把他们视为我国民族不可分割的无价宝藏，民族文化的根本和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财富。

保证国家和全球整体生态安全，并把它作为国家级重点任务之一。

№03718

## 纳扎尔巴耶夫关于关闭 哈萨克核试验场的总统令

(1991年8月29日)

### 《关于关闭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地》的命令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塞米巴拉金斯克州从1949年开始进行核武器试验。在此期间这里共进行了大约500次核爆炸，使上千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了损害。

鉴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确保当时苏联对美国的战略军事均势，在建立核潜能力方面已尽了自己的义务，同时考虑到共和国内社会各界的要求，兹命令：

- 1) 关闭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地；
- 2)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应配合国防部和苏联核能源工业部，将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地改建成为加盟共和国的科研中心……
- 3) 鉴于1949~1962年间多次进行空中及地面核试验，使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附近地区居民身体健康受到损失，需协同联盟机构一同确定给受害的哈萨克公民发放损失赔偿金的范围与程序；
- 4)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办公会议，应配合在此进行核爆炸试验的中央有关部及主管部门，制定项目，发展社会经济，改善试验场周边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州、卡拉干达州及巴甫洛达

尔州人民的生活条件及医疗服务条件，并将联盟有关部门所提供的资金用于实现上述目的。

本命令自决定之日起执行。

附录

№03720

## 列加索夫院士谈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摘录）

（1988年5月20日）

.....

还有一个政府部门应解决的更重要问题，即有关普里皮亚季<sup>①</sup>市的命运。1986年4月26日晚上该市的辐射情况时强时弱，测得的辐射标志从每小时一毫伦琴到每小时数十毫伦琴。当然，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但似乎还容许人们再作些思考。

有关这期间个人的一些印象。

驻地人员问题。我们要求所有的人员做好应对各种情况下的所有突发事件。针对这样的事件，要求做好在此情况下的安排和组织工作。——在这里，电站负责人不懂得按必要的顺序处理事件，也没有能源部的领导。对事情既不懂得事先进行分析和研究，也没有应付事情的对策。政府部门只好承担起弄清情况和采取必要行动的责任。

人们的注意力分散在小事上。我现在还能想起检查组在普里皮亚季市最初的那些日子。既没有足够的防护面罩和个人的辐射测量器 TJIД，甚至对所有的人来讲连被叫做铅笔的东西也显得不够，就连用于自动显示数公里半径内辐射情况的遥测数据的外部辐射测

---

<sup>①</sup> 普里皮亚季，苏联乌克兰共和国城市，属基辅州。

量自动装置在电站也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组织大量人员进行探测工作。

由于没有带辐射测量仪器的无线电操纵飞机，所以需要相当数量的飞行员和直升机飞行员进行测量和探测工作。开始时甚至连起码的卫生条件也不具备。在普里皮亚季市度过了27、28日两天，直到4月29日驻地还是太脏，但当运来食品——香肠、黄瓜、瓶装百事可乐和果汁时，只好堆放在房间里，这时马上会让人哄抢一空，拿去分享。过了几天，当周围多多少少有点秩序时才出现了食堂、售货亭和相应的医疗卫生设施，条件真的很简陋，但从污染度方面讲已可以监控双手和食品的质量……。

5月2日当政府检查组开始在切尔诺贝利工作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和伊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便出现在这里。他们的这次行程具有重大意义。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在切尔诺贝利区党委召开了会议。从我们的汇报中（作为主要汇报人我只好发言）他们了解了情况，知道这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大范围的灾难，并将造成长期的后果，面临的工作相当艰巨……

汇报完毕，在我们说明情况及我们自己如何理解问题后，通过了一些主要的决定，确定了所有随后要进行的工作安排程序。此项工作的范围涉及全国的所有主管部门和企业。当时还成立了一个由H.И.雷日科夫领导的工作小组，实际上全苏联整个工业部门都包括在内。从这时起政府检查组才开始发挥对国家的这一重大工作进行具体管理的职能，当时这项工作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行动小组的领导下进行的。

我知道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都在政治局行动小组的视野内。应该说，他们每次会议和每项决定都很慎重，尽最大可能建立在各个专家的意见之上，并对比专家的不同意见。对我而言这是正确搞好组织工作的范例。首先我认为，在当时可以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以尽



快平息事态，这也许会淡化所发生事件的影响。类似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工作由出色的科学班子进行组织。首先就是仔细研究情报。从各种渠道收集想要的情报。但总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从军方获得的情报有别于从民间科研机构获得的信息，不同的科学机构在第一阶段也同样拿出过不同的资料。所有这些造成了一个令人焦躁不安的环境。但行动小组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情绪，只是坚持反复的测量、确认，千方百计设法弄清事件发生的真实情况。同时，在决定中，行动小组一直都是按照全力保护人民利益这一原则开展工作的。可以说，考虑到污染区范围及疏散群众所需的现今赔偿数额，所有的决定都有利于事件的受害者。这涉及到每件事情。

有关军队的几句话。军方的工作区非常大。化学部队首先要进行探测工作并确定受污染的区域。部队不仅承担着电站里的工作，同时还要对方圆30公里区域内的树木、村庄和道路进行清除辐射污染的工作。在普里皮亚季市的清除辐射污染活动中，部队承担的工作量非常巨大。

我一次也没有见过应召入伍的专家、地方人士玩忽职守，或是觉得自己是被强行拉来干这些总的说来是困难而又危险的工作的。或许在别的什么地方有过这种情况，但我却从来没有遇见过。我曾不止一次地亲自到过第四区的那些相当危险的地区。我告诉人们，他们将要工作的环境，并表示我本人希望同那些愿意协助我的人一起工作。没有发生过一次这样的情形：就是某个人就如常言所说的浑身没劲，不愿意奋勇向前。……

物理学家预感到这种情形还将继续恶化，所以坚持必须疏散（人员）。医务工作者在这里也似乎同意物理学家的意见。因此在4月26日10点到11点，鲍里斯·叶甫多基莫维奇·谢尔宾娜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和认可了我们的预测后决定实行疏散。

疏散定在第二天进行。可惜这个决定是以口头形式通知下去

的，而不是挨家挨户张贴布告，很明显，没有通知到所有的人。因为第二天也就是4月27日早上在市里的街道上仍可看见母亲用手推车推着孩子，也有小孩子在街上玩耍。所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天的生活仍像平常的周末一样。

直到早上11点才有官方的通知，要求全市疏散。快14点时所有的车辆已全部集中起来并划好了行车路线。疏散工作当时进行得相当有序、快速和确切无误。当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也不免有疏忽和遗漏之处。比如当时有许多老百姓找到政府的行动小组要求乘自己的车子疏散。而私家车在城里有数千辆。稍加考虑后允许这么做，但似乎不大稳妥，因为部分车辆此时已受到污染，而检查污染程度的测量部门和有关清洗事宜是稍后才组织的。但我想再次说明，疏散工作是在城市的污染程度还很高时进行的。随后的实际情况也证明：当时在电站周围大约5万居民出事时没有一个人的身体受到实质性的损害。

随后由国家能源冶金部、比卡洛夫将军指挥的部队、电站的有关部门和物理学家们组织实行的一系列测量污染的措施十分仔细。同位素成分的检测也很细致。军方测量部门的工作进行得很出色，但有关同位素成分和放射性扩散的更确切的情报，我们则是从污染地的设备先进的实验室获取的。我们决定都是建立在他们的数据之上。

显然，最初几天由于大气团流动性的改变，以及由于在第四区随着往反应堆中排放气团，致使尘土飞扬，因而情况一直都在变化。

在到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后我就得出了一个绝不会引起歧义结论：切尔诺贝利事件是由于个人崇拜及在我国延续了几十年的错误地进行经济活动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引起的后果。当然，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肇事者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保

护这个反应堆的控制系统有故障，许多技术人员也清楚，并对如何排除故障提出过建议。设计师不愿很快就去干额外的工作，因此没有及时更换保护控制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本身发生的事故在许多年内都有，因为进行过实验，而实验计划却编写得极不认真和极不仔细，实验前也没有预定任何应付可能出现情况的对策。……打仗还要求所有操作规程的准确无误，而这里全然忽视设计师和专家的意见。在计划预报维修前既不注意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也不检查设备的状况。核电站的一位厂长竟然对我说：“你担心什么？就算是核反应堆吧，也不过像咱们的茶炊，比热电站简单多了。再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有经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

当把有些事联系起来看时，就会发出疑问：为什么有人这样做，而其他的人又那样做，等等，那么就不应该说导致这起犯罪事件的罪魁祸首只是一个人。因为这正像是一个“闭合电路”：操作者犯错误是因为他们必须完成实验——他们认为这是一件“诚实的事情”；而进行实验的计划却编写得极为低劣和粗糙，应该由专家核准的也未经核准。我的保险柜里现在还保存着在事件发生前夕操作员电话交谈的记录。现在读这些记录都不由得令人毛骨悚然。一个操作员给另一个打电话问道：“这儿计划中已经写明应该做什么，而接着又勾去好多，我到底该怎么办？”他的交谈者稍加思考后告诉他：“你就按勾掉的去做”。像核电站这么严肃的文件竟是这种水平：什么人把什么内容勾掉了，操作员可以自由解释；删得对与否，他可以任意采取行动。不应把所有的罪责推给操作员一个人。因为有人编计划，又在计划中涂抹；有人签字，而别人又不同意。事实本身说明：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可以自行采取未经专业人员核准的行动。这就是说专业人员与核电站的关系有缺陷。事实是，国家核能监督部门的代表也在核电站，但对要进行的实验不在行，对计划也不在行，——这不仅是核电站经历的事

实……。

现在重新回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上来，我已经离题太远了。空军和直升机群的工作非常出色。这是一个组织高超的例子。机组人员冒着种种危险一直在尽力完成任务，而这些任务都是前所未有的艰苦和危险。最艰苦的工作发生在最初的日子。当时命令装沙袋，但不知为什么地方权力部门却不能立即组织起足够的人员来准备袋子和沙子。我亲眼看见，机组人员年青的军官是怎样往直升飞机上装沙袋、怎样飞行、怎样向目标抛沙袋，来来往往重复进行着这件工作。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当时的数字是这样的：第一天抛了数十吨，接着第二天抛了数百吨，最后到第三天傍晚安东什基少将汇报说，在一昼夜内共抛了 1100 百吨沙子。到 5 月 2 日反应堆实际上已被封住，从这时起由反应堆内部排出的放射性核子明显减少。

……到 5 月 9 日这天我们感觉第四区已不再向外喷气、燃烧和活动，从外观看似乎很平静，我们打算在胜利节<sup>①</sup> 的晚上庆贺这一天。但很遗憾，就在这天第四区里又发现了不大、但很亮的深红色光点。这说明有的地方温度还很高。当时很难断定：是不是用来投放铅和其他东西的降落伞着火。据我看，这不像是降落伞着火了，而更像是那些沙子、粘土和所有抛投物在一起迅速燃烧的样子。节日没过成，决定再向反应堆喷口填放 80 吨铅。这之后亮点消失了。5 月 10 日我们在一个更为安详的气氛中庆祝了胜利节。

在那些沉重的日子里，我们的心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地激动。

---

① 1945 年 5 月 7 日，德军元帅约德尔在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签署德国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书。在苏军的坚持下，5 月 8 日，德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在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向苏美英法四国无条件投降书。5 月 8 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节。

倒不是因为我们参与制止了这起悲剧事件。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带有悲剧色彩。我们激动的是因为看到人们是如何工作，我们的建议是如何迅速地得到大家的响应以及各种工程方案是如何快速地得到计算；而我们已在现场开始计算如何在遭破坏的区间上方建造炉顶的第一批方案。

## 【专题说明】

# 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

(1991年2~7月)

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对抗，是20世纪下半期世界冷战格局形成的基本标志之一。1949年1月，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6国，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以后陆续加入的还有阿尔巴尼亚（1949年2月加入、1961年退出）、民主德国（1950年9月）、蒙古（1962年6月）、古巴（1972年7月）、越南（1978年6月）。经互会的总部设在莫斯科。世界分成两个对立的经济体系。1955年5月5日，联邦德国正式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员。5月14日，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等8国在华沙召开会议，缔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称华沙条约）。这是一个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组织。从此，两大阵营的对峙具有了更加明显的军事对抗色彩。后来的历史实际表明，华沙条约组织也被苏联用来对付集团内的：苏联在缔约国驻军；1956年出兵匈牙利；1968年以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部队的名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然而，随着苏联经济力量的衰败以及苏联、东欧的剧变，华沙条约组织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下去，最后不得不由该组织缔约国自己宣布

取消。

本专题收入的3份档案文献，是1991年华沙条约组织缔约国有关解散该组织的声明和议定书。作为附录，收入了截止到1988年华沙条约组织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力量对比及苏联战略武器装备的资料。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贾永宁、沈友泰翻译)

No03715

## 华沙条约缔约国布达佩斯声明

(1991年2月25日)

政府通报 1990年专件汇集第5~6页

欧洲国家现在终于从过去对抗与分裂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了。巴黎宪章宣告欧洲民主、和平和统一的新时代到来了。全欧一体化进程的参与国，本着尊重赫尔辛基宣言<sup>①</sup>十项原则的精神，在共同忠实于民主、法律至上和人权的基础上，正在建立一种友好的相互关系。

22个国家签署了《关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的条约》。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他们不再是对手，要成为一种新型的合作伙伴；并一致确认每个国家有权决定自己是否参加联盟条约。声明为终止欧洲的分裂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性机遇，它在充分尊重各国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在国家安全的范畴内，赋予相互关系一种新的性质。

华沙条约缔约国注意到欧洲发生的深刻变化，为贯彻实施政治协商委员会1990年6月7日莫斯科会议的决议，他们作为平等主权国家决定在1991年3月前取消它的军事组织和机构。

会议代表指出，这一决议定将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欧洲军事潜力，并根据欧安会巴黎高级会晤时达成的各项协议的精神，进一步促进实现由集团安全机构向全欧安全机构的转变。

---

<sup>①</sup> 1973年7月3日，在赫尔辛基召开欧洲安全合作会议。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33个国家与会。8月1日通过了《最后文件》，称《赫尔辛基宣言》。



在新形势下，会议代表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将在双边基础上进行。这不仅符合伙伴和友好关系中的双边利益，而且也符合欧洲当今的现实情况。

№03716

## 关于废除华沙条约的议定书

(1991年7月1日)

关于废除 1955 年 5 月 14 日在华沙签署的  
《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及 1985 年 4 月 26 日  
在华沙签署的《条约延期议定书》的布拉格议定书

鉴于欧洲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意味着欧洲大陆对抗分裂时代的结束；

意欲在新的环境下积极发展相互间的双边关系，并视实际利害积极发展多边关系；

注意到 22 国签署《关于欧洲常规武器力量的条约》，声明彼此不再是对手，以及要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重大意义，

华沙条约缔约国决定逐步过渡到整个欧洲安全架构，根据欧安会高层领导人 1990 年 11 月巴黎会晤时达成的协议，1955 年 5 月 14 日在华沙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各国商定以下条款：

### 第一条

自本议定书生效之日起，1955 年 5 月 14 日在华沙签署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简称《华沙条约》）及 1985 年 4 月 26 日签署的《关于延长（华沙条约）期限议定书》予以废除。

**第二条**

本议定书签署国声明，他们彼此间不相互提出因《华沙条约》所引发的财产要求。

No03717

## 《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

### 布达佩斯声明

(1991年7月2日)

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在布拉格举行了会议。……<sup>①</sup>会议签署了议定书，废除1955年5月14日在华沙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及1985年4月26日签订的《条约延期议定书》。该文件尚待批准。

与会代表声明如下：

他们一致认为，在出席会议的各平等主权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睦邻友好、相互尊重、友好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是完全符合当今欧洲形势的。有鉴于此，他们主张在更新条约法律基础上，在各个领域中发展关系。

他们表明，愿意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根据1990年11月欧安会高层会晤所达成的协议，在欧洲大陆建立一种安全及合作的新机构，并且按照为新欧洲制定的巴黎宪章所规定的那样，构建在安全、经济、法律、文化、生态环境及人文领域全面合作的全欧洲框架。

出席会议的各国一致认为，中东欧各国的稳定、富裕以及在尊重人权和人的基本自由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民主，是完全符合欧安会一切参与国的利益的。

---

<sup>①</sup> 原文如此。

与会代表明确表示：自己的国家已有准备在必要时对共同感兴趣的专门问题进行双边或多边磋商，其中包括贯彻《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问题。

他们再次确认了《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1991年2月25日布达佩斯非常会议声明的原则。

附录一

华约和北约在欧洲武装力量的对比

	华约	其中苏联	北约
武装力量人数(千人)	3573.1	2485.0	3660.2
陆军空降兵和陆军航空兵(千人)	1823.5	1187.2	2115.4
空军(千人)	425.1	345.0	482.3
海军(千人)	338.0	288.9	685.0
现有装备:			
大炮	71560	50275	57060
战术导弹发射装置(台)	1608	1221	136
坦克(辆)	59470	41580	30690
军用装甲车(辆)	70330	45000	46900
飞机(架)	7876	5955	7130
直升机(架)	2785	2200	5270
大型水面舰艇(只)	102	101	499
航空母舰(艘)	2	2	15
潜水艇(只)	308	300	200
其中核潜水艇	80	80	76

附录二

苏联的战略武装力量 (西方的估计)

年份	洲际弹道火箭		潜水艇弹道导弹		轰炸机		总计	
	发射装置	弹头	发射装置	弹头	发射装置	弹头	发射装置	弹头
1956	-	-	-	-	22	84	22	84
1957	-	-	-	-	28	102	28	102
1958	-	-	6	6	50	180	56	186
1959	-	-	33	33	75	250	108	283
1960	4	4	30	30	104	320	138	354
1961	10	10	57	57	120	356	187	423
1962	30	30	72	69	133	382	235	481
1963	80	80	72	69	150	440	302	589
1964	180	180	72	69	173	522	425	771
1965	225	225	75	72	163	532	463	829
1966	333	333	78	75	159	546	570	954
1967	701	701	87	72	159	576	947	1349
1968	909	909	138	120	159	576	1206	1605
1969	1053	1053	221	194	157	568	1431	1815
1970	1361	1361	317	287	157	568	1835	2216
1971	1511	1511	407	362	157	568	2075	2441
1972	1547	1547	503	458	157	568	2207	2573
1973	1587	1587	595	556	157	568	2339	2711
1974	1587	1587	679	640	157	568	2423	2795
1975	1587	1917	771	732	157	568	2515	3217
1976	1539	2099	849	810	157	568	2545	3477
1977	1433	2363	972	1311	157	568	2562	4242
1978	1398	3218	1002	1730	157	568	2557	5516
1979	1398	4186	993	1817	157	568	2548	6571
1980	1398	5002	990	1910	157	568	2545	7480
1981	1398	5302	1038	2426	157	568	2593	8296
1982	1398	5862	990	2474	157	568	2545	8904
1983	1398	6270	978	2462	167	568	2543	9300
1984	1398	6420	982	2646	160	560	2540	9626
1985	1398	6420	980	2872	160	720	2538	10012
1986	1398	6420	948	2888	160	800	2506	10108
1987	1418	6452	962	3130	155	860	2535	10442
1988	1414	6506	979	3378	160	950	2553	10834

注:不单独瞄准的弹头按一个计算。